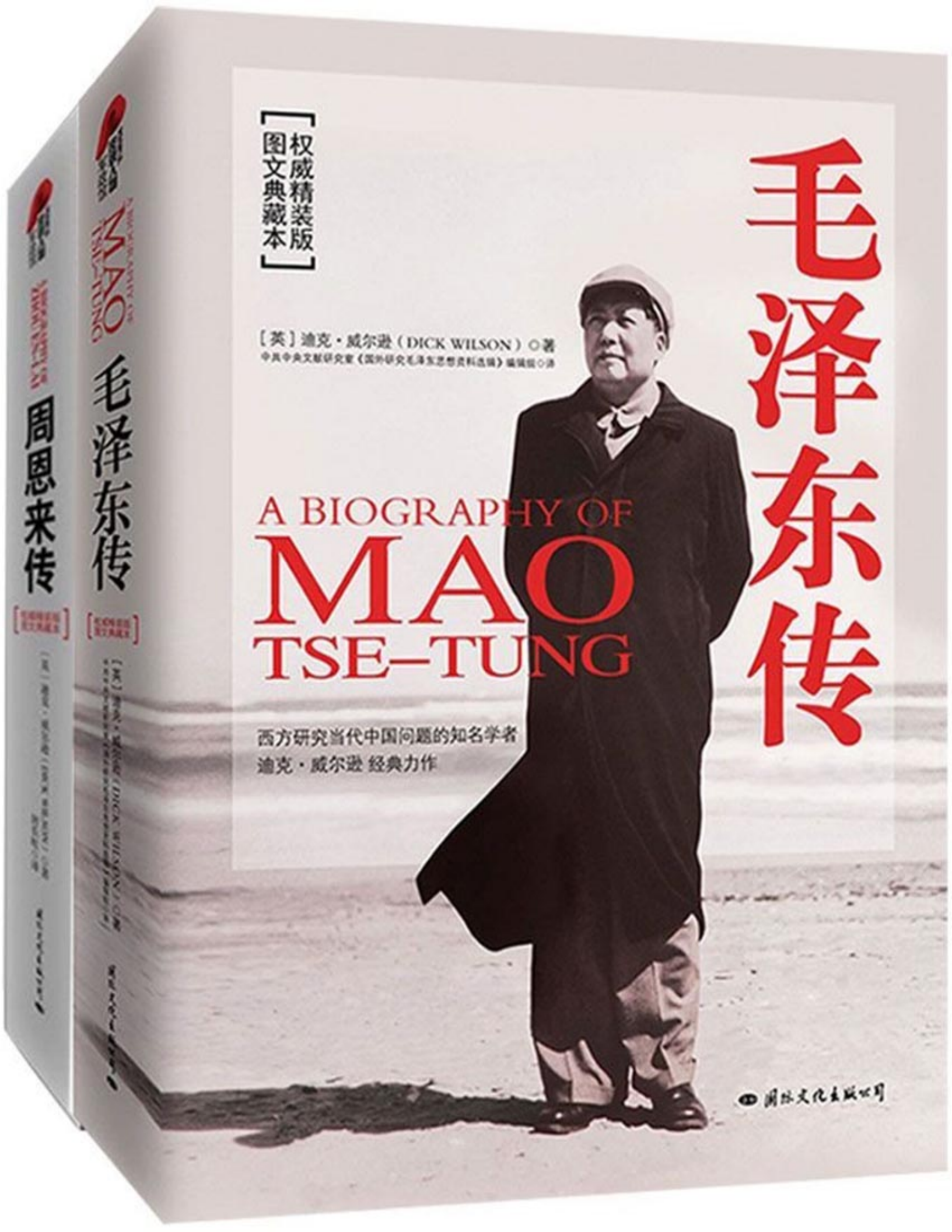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传
周恩来传
权威精装版
图文典藏本
[英] 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译
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西方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
迪克·威尔逊 经典力作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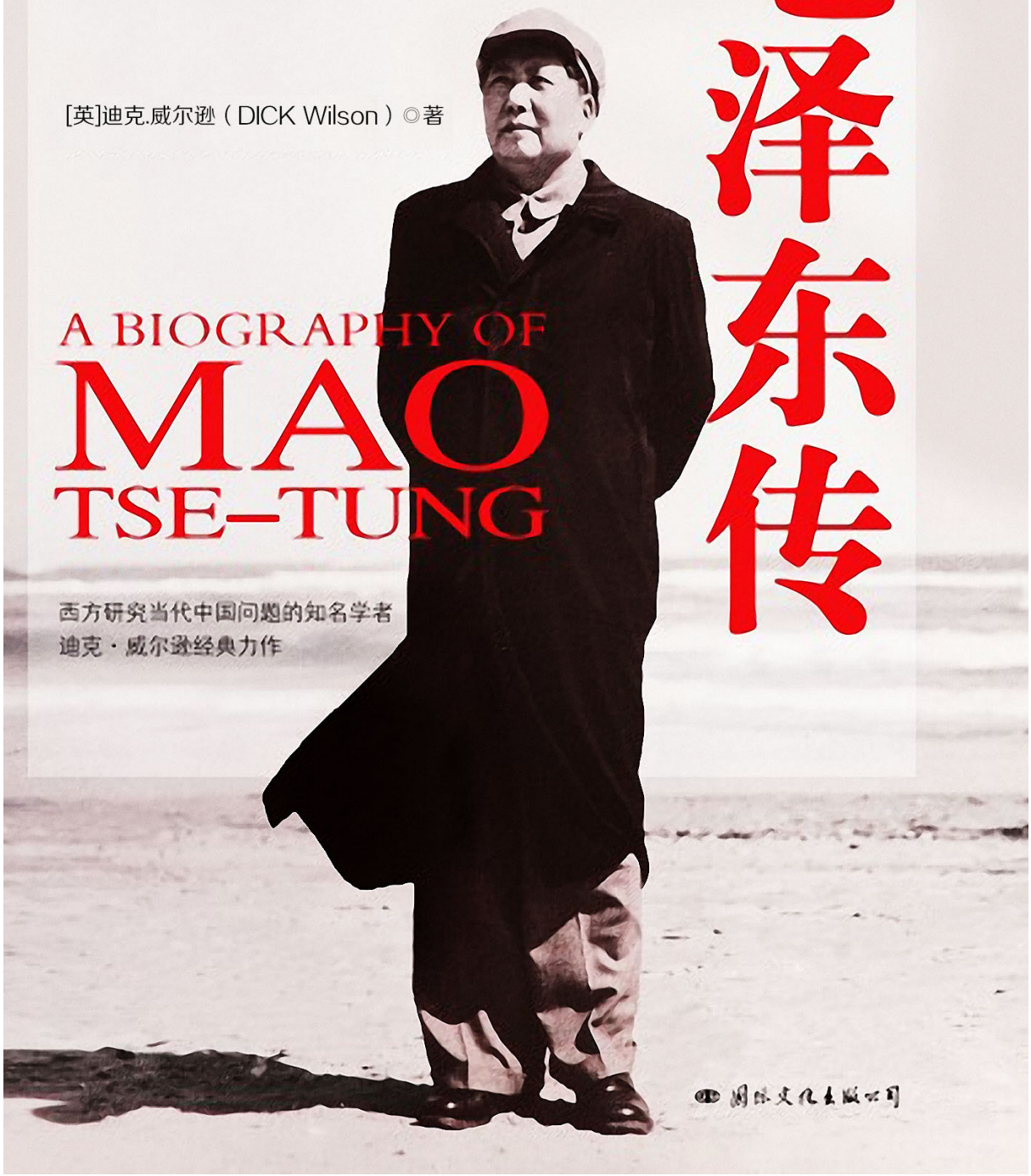
毛泽东传
周恩来传

毛泽东传

[英]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著

A 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西方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
迪克·威尔逊经典力作



团结文化出版公司

目录

目录
作者序
第一部 引弓待发
1　属蛇的孩子（1893~1910）
2　守规矩的学生（1911~1915）
3　深渊蛟龙（1915~1918）
4　转 变（1918~1921）
5　未来的缔造者（1921~1924）
6　三薯饭（1925~1927）
第二部 奋斗
7　“山大王”（1927~1928）
8　抗 争（1928~1930）
9　遭 贬（1931~1934）
10　长 征（1934~1935）
11　延 安（1935~1937）
12　蓝 苹（1937~1938）
13　恶 战（1938~1941）
14　“抽象的爱”（1942~1945）
15　魔鬼的晚宴（1945~1948）
16　兵临北平（1948~1949）
17　虎口取食（1949~1951）
第三部 大权在握
18　挥 鞭（1952~1954）
19　弄 潮（1955~1956）
20　夜 鹰（1956）
21　百花齐放（1957）
22　东风压倒西风（1957~1958）
23　“大跃进”（1958~1959）

24　旧 靴（1960~1963）
25　孤军奋战（1964~1965）
26　文化大革命（1965~1966）
27　黑 手（1966~1970）
28　和尚打伞（1970~1976）
结 论
译后记

作者序

毛泽东是近代最后一位伟大的领导者。他从一个农家子弟，获得神秘的幸运之神的帮助，以坚强的毅力，不屈不挠地攀登着，终于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他的故事是一段不朽的历史。可以说，像毛泽东这样一个统治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伟人，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他为中国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并留下了一批理论著作和评注文章，也留下了一小部分很杰出的诗词，其中很多是在马背上吟诵而成的—本书引录或节引了许多。他为自己规定的使命是把统治中国人民许多世纪的腐败、衰落、无能的帝制引入现代化—这个使命他无法完成。作为一个小省城的小学校长，到1920年毛确信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使中国达到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便捷途径。

因而他扮演了中国的列宁和凯沫尔·阿塔图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有斯大林—的角色。列宁在1917年以后只执掌了短短9年的开创性权力，而毛在历经30年奋战建立了一个共产党国家后，又执掌权力近30年之久，并力图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反共人士，不如说是来自共产党内的对手和竞争者。毛的许多精力花在了同那些与他的基本思想相同的同志的不必要的斗争上。

也许这是由于他个性中的某种不安全感造成的，一些解释说是缘于他少年时期的经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反抗他的父亲，显示他的独立性，这在那个社会是骇人听闻的。作为家中4个孩子中的长子，他

早年的生活并不轻松。他所捍卫的独立，他一心一意地追求了70年之久的个人启蒙和政治权力，有许多缘于那些早年经历。

但他的个人生活付出了代价，他不仅不能为其先后3个妻子提供任何真正物质的保证，而且似乎也未能承担感情上的责任。对他那许多孩子，他没有给予适当的保护，也没有给予传统的做父亲应给予的关怀。

由于他自己从事危险的事业，他的家庭不得不退居第二位，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毁灭了自己的家庭。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的堂弟和他的第一个妻子—更不要说他的众多关系密切的校友—都被杀害了，常常是在残酷的环境下，在共产党与其对手的内战中牺牲了。他的长子死在朝鲜战争中，他的第二个妻子和次子得了精神病，而他的第三个妻子、两个女儿和侄子则在他死后不久很快就失宠了，原因是他们进行了恐怕应该说是为了毛本人的政治活动。

令人惊奇的是毛本人活得那么长，幸运偏袒着他的生命与事业。1927年他死里逃生，在内战的一次战役中站在他旁边的士兵被打死了，他却幸免于难。在1935年史诗般的长征途中，幸运之神一直陪伴着他。他率领部队爬雪山，过草地，渡急流，通过充满敌意的少数民族部落地区，跋涉25000里到达了延安的避难所。

在若干年里，我们将难以知道中国人自己对毛的真实看法。

一方面，他是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旗手，“大跃进”和“文化革命”的创造者，中国社会被压迫者的斗士。另一方面，他又是离不开社会的发明者，他坚持搞不停顿的、剧烈的运动，这种运动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精疲力竭的和可怕的—特别是对技术人员和中产阶级来说更是如此。毛自己承认在1949年以后他引进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死了成千

上万的人，而敌对的外国估计数字高达5000万人。作为国父式的人物，今后一段时间内，他不会得到公正的评价。

林彪是他终生的信徒，但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内又转而反对他。林彪当面说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但林的儿子背后在其父母和亲信面前又称毛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中国以外，毛的声誉同样也是相互矛盾的。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毛是个英雄，他使中国站起来反抗外国的压迫，特别是西方和俄国的压力。

毛是公然反对斯大林的共产党人，又是斯大林的后继者，他想发展新的具有现代色彩的恰到好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是在白种人的西方以外以毫不动摇的自信心面对西方的第一位领导人。在西方面前，他没有丝毫的自卑感，反而向西方作者宣传经过修正和调整的西方理论，同时又适当地糅进了一些原始的道教思想和中国的常理。

斯大林嘲笑毛是一个“人造黄油式的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扔给毛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但毛还是引起了一些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关注。一个东德哲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宣称：“赫鲁晓夫只是个经济上的实用主义者，而毛却是个思想家。”另一个人则说：“我们需要思想，今天我们只能从毛那儿……而不是从赫鲁晓夫那儿得到它。”

中国的情况使一些外国共产党人很难欣赏毛。卡斯特罗曾谴责毛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凡夫俗子”，而他的党居然还把他奉为“尊神”；同时智利诗人巴布诺·聂鲁达则批评说：“毛泽东成了脱离人民的活佛，他通过宗教法庭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事件。”

但在第三世界不那么西方化的地方，在亚洲和非洲，毛更多地被称为英雄。当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尽最后力量要改造中国人时，印

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评论说：“如果毛失败了，那将是伟大革命时代的终结。”

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谈到毛的去世时说，“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百年不遇，也许是千年不遇。他们占据着舞台，以神的启示来书写历史。”毛是“一座奥林匹斯山”，他“使历史为之萎缩”，他是“世界为之震惊的辉煌的新秩序的最杰出的建筑师”。甚至保守的英国人蒙哥马利勋爵也评判毛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

然而归根结底，毛仍摆脱不了他的农民习性，他节俭得近于吝啬。穿的衣服有补丁，睡一张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垫子的宽大木床，住着朴素的寓所，吃的也是粗茶淡饭。

毛的悲剧在于，他最终未能在中国推行他想要进行的所有改革—他低估了阻力。本书将展示他的那些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如何为此而奋斗—既反对敌人也反对朋友—以及他最后是怎样失败的。

第一部 引弓待发

1　属蛇的孩子（1893~1910）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生于华中一个叫韶山冲的小村子里，此时还是19世纪光绪皇帝统治的时期。按阴历算，这一年叫蛇年，如果他的父母向算卦人求教的话，算卦人会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将具有蛇的禀性：灵活、狡黠、生存能力强。当时的算命人一般会这样解释：属蛇的人“在保护自己时，反应强烈，凶狠恶毒；在躲避和击败敌人时，身手敏捷；喜欢黑夜”。



>> 毛泽东出生在其父母的卧室里

毛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毛顺生（1870~1920）精力充沛、性子暴烈。相反，毛的祖父生性懦弱，也不会经营，为维持生计被迫出卖田地—毛童年时，他祖父还活着。毛的父亲16岁就离家出去做工，赚钱贴补家用。毛后来回忆说：“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积攒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另有一次，毛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照料自己，他就会受到老天的惩罚。我母亲不同意他的看法。我父亲死时，

有很少一些人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我母亲死时，却有许多人来送葬。”毛75岁时曾经很坦率地对一些红卫兵说，他父亲不好。要是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要坐“喷气式”（“喷气式”是红卫兵在“文革”时期所施行的一种很痛苦的惩罚措施：弯腰低头，胳膊反剪在背后，高高举起）。但是他并不完全无知。“我父亲读过两年书，”毛回忆说，“认识一些字，足够记账之用。”毛继承了他父亲那倔强的个性。



>>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母亲文其美（文素勤）

毛的母亲叫文其美（1867~1919），是湘乡县唐家圮人。她性情完全不一样，善良、敦厚，长着一副中国妇女所羡慕的梨子型脸盘。毛长得更像他母亲，而不像他父亲。“母亲完全不识字。”毛后来回忆说。但她在村里很受尊敬，按照毛的传记作者的话说，她“心地善

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也很相信各种地方迷信。

半瓦半茅的房子从中分开，毛家住一半，另一半住的一家姓周。房子前面有一个池塘，据说毛第一次游泳就在这池塘里。

毛家还有一个牛棚，一个猪圈，一个谷仓和一个小磨房。韶山坐落在狭长的谷地里，地势蜿蜒起伏，住着300来户人家，许多人都姓毛，毛姓是当地最大的姓。该村的全名叫“韶山冲”，即“美丽和平之山冲”，当地流传着这么一首歌谣：

韶山冲来冲连冲，
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
红薯柴棍度一生。

农民头上三把刀，

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三条路，

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坐落在群山之中，树木葱茏，翠竹青青，离市镇湘潭约有100里路，但毛在童年时代从未去过湘潭。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

湖南省有3，000万人口，在历史上落后而闭塞，脱离于国家世事沧桑之外。但在毛的时代，湖南不仅因为贸易和交通而变得重要起来，与外界的联系得到了改善，而且已经在知识上领导中国，自然而

然地成为变革的中心。在过去两个世纪，湖南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王夫之，已经因为重新解释儒家学说而声誉鹊起。他们强调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要根据新的时代的需要进行演变，必须对法律的产生进行科学的探讨。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影响，19世纪的湖南成为引进现代教育和工业的先锋，成为妇女解放的先驱。这就是毛的诞生之地的知识环境和氛围，他自己就很喜欢引用一句很流行的话：如果把中国比作德意志，那么湖南就是普鲁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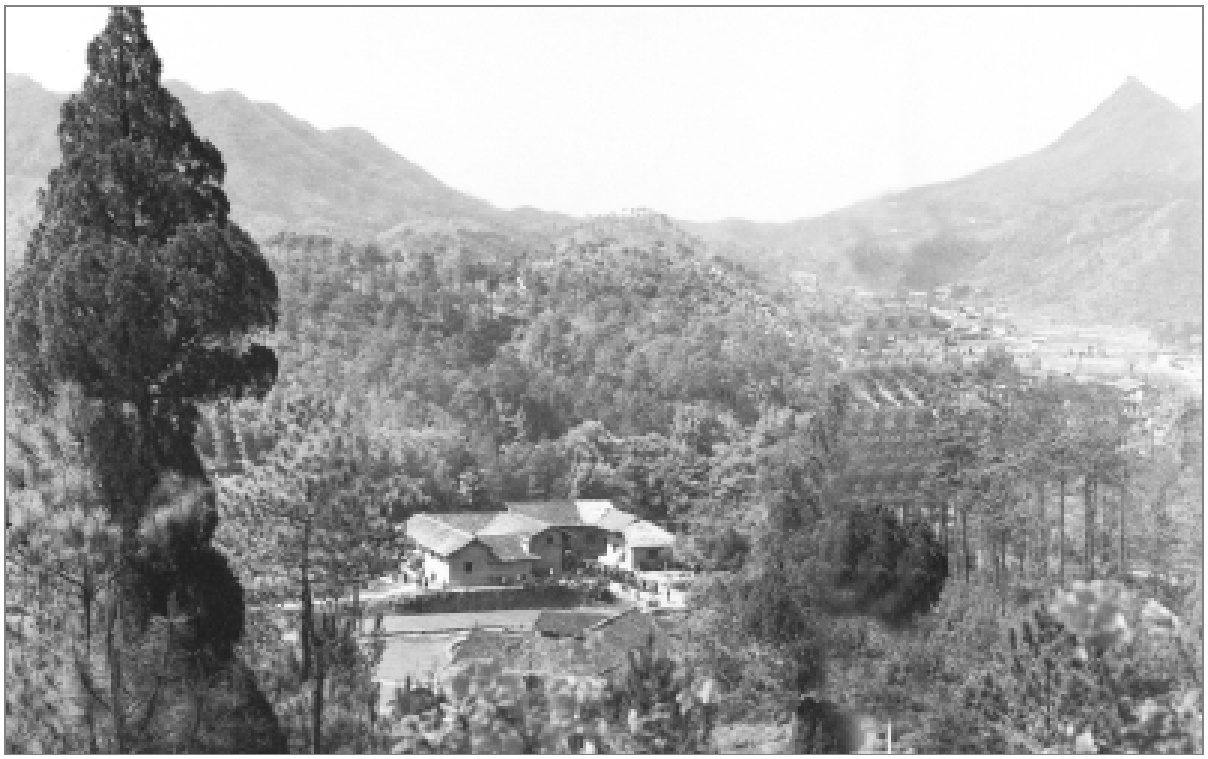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毛描述了横跨湘江的他的湖南家乡的情景：“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议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

毛出生在一个充满巨大潜力的国家，后来他在对自己的共产党伙伴演讲时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但是到了毛的时代，中国已沦为“东亚病夫”，成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毛说：“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



>> 毛家当时居住的半瓦半茅的房子



>> 毛泽东故居—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上屋场

在毛出生前后几十年，列强给他的国家带来了耻辱。毛在一次演说中说：

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4〕

最糟糕的是中国人民不能组织起来以应付各种挑战。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毛抱怨说：

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

人。海禁开了这么久，还没有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惟一的“招商局”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

毛的祖国就是这样腐败，毛后来为消除这种腐败而献身。

毛在韶山冲头三年的生活虽然说不上很奢华，但至少是很温暖的，因为他得到母亲深切的、全身心的爱抚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3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毛泽民（1896~1943），从此毛就进入了竞争的世界。1958年他对自己的同事说：“每一个人都有忧患与欢乐。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8岁的毛在中国的家族制度中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他得在家里负起小责任，尽一些小义务，以补偿由于有了弟弟而突然失去的母亲以前所给予他的那一部分爱与关心。但他可能还太小了，不懂得这种补偿的好处，因而由于有这种失落感而受到了较深的伤害。

与此同时，家业开始发达，毛的父亲逐渐成为“富农”。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84担谷。

最后，毛的父亲做起了贩运谷物和生猪的生意。

“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就开始做贩运谷子的生意，赚了一些钱。他成了‘富’农之后，就用大部分时间做这个生意了。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孩子们和妻子都到地里干活……我父亲做生意并没有开铺子，他只是从贫苦农民那里把谷子买下来，然后运到城里卖给商

人，在那里得到个高一些的价钱。在冬天碾谷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短工干活，那时我家就有7口人吃饭。毛6岁时，义和团（韶山还不知道，因为没有报纸）正在围攻北京的外国使馆。毛的父亲开始要他放牛，干农活。两年后毛8岁了，他开始在韶山的小学堂里念书，一直读到13岁，但家里的活他还得干。“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子的《论语》和《四书》。”(1)



毛刚识了几个字，他的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毛后来回忆说，他“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

毛的母亲教她的孩子要信佛，他解释说：“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8岁时，“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毛当然对宗教更是抱怀疑态度，因而“我母亲……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毛把午饭带到学校去吃。但有一段时间，他晚上放学回来，总是喊饿，吃得特别多。他母亲很奇怪，问他：“你晚上怎么吃得这么多？是不是午饭不够吃？”

毛告诉母亲说：“在我们班来了一个新同学，家里穷，没饭带，我就把自己的饭菜分一半给他。”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母亲赞扬他，以后总是让他带两个人的饭去。

《四书》《五经》引不起毛的兴趣，虽然他背书很在行。“我的国文教员是主张严格对待学生的。他态度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

他又不敢回家，怕挨父亲的打，在外面乱跑了三天，终于被家里的人找到了。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受到了温和的对待，“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老师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1905 年毛 12 岁，他又有了第二个弟弟毛泽覃（1905~1935），这个弟弟受到了父亲的溺爱。12个月后，毛的父母又领养了一个女孩，她本是毛的堂妹，名叫毛泽建，或毛泽红（1906~1930）。大约在这个时候，毛的年迈的祖父去世了，因而毛在家庭中也就有了一定的地位。第二年毛13岁，他离开了小学堂，整天在地里干活，为父亲记账。他种菜、锄草、放牛、喂猪，什么活都干，50年代他住宅的墙上还挂着金属刷，据说他曾用这把刷子为牛刷洗。

但毛的父亲对毛的劳动不满意，“他性情暴躁，”毛回忆说，“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

相反，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后来毛确实用政治术语来分析他家的形势。他说，他家分成两“党”。一党是他父亲，是“执政党”，毛和他母亲、弟弟组成了“反对党”，“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但在这个“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也有分歧。毛的母亲特别反对直接打击或公开的感情流露，主张讲究斗争策略，不要施加太强硬的压力。

毛的母亲也反对毛的激进主义。毛后来在回忆一些哥老会成员抢了他们家囤积的粮食的情形时说，抢得好！人家没有米嘛！但我的母亲不同意我的观点。也可能他们没有偷毛所珍爱的书籍，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宽容。



>> 毛泽东当时的还书便条和《盛世危言》

他后来说他在小学堂里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如地理、历史或科学都没学到，他收获最大、享受最多的是读旧小说—特别是那些“关于造反的故事”，如14世纪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他的老师讨厌这些“禁书”、“坏书”，但毛在学校里还是照样看个不停。“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

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毛常常在深夜里把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他父亲看不见灯光，这样他就可以看书了。

这一时期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是《盛世危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在日本受过训练的中国商人强烈地呼吁给私人企业以更大的发展自由，要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本书确实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甚至跑去找本地的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和他一起学习，以获取更多的教益。稍后，他又在村里从师一个叫毛钟楚的老先生，学习经书古籍。毛钟楚在官方的科举考试中考中最低的学位“秀才”。

毛的父亲不仅对经书很推崇，甚至希望毛能尽快掌握它们，尤其是在一次打官司时，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能恰当地引经据典从而使他败诉之后，就更是这样了。与此同时，老头儿继续聚财，这笔财产在那个村子里已被认为是笔大财了。他不再买进土地，而是典进了许多别人的地。他的资本增加到约300美元。(2)

毛13岁时和他父亲发生了两次严重的冲突。一次他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毛当众和他吵了起来并离开了家。“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前来，竭力劝我回去。”

毛的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他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旁边，”毛回忆道，“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这样他父亲停住了，双方达成了妥协。“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罪。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按照毛最要好的同学的说法，毛两次对他的父亲磕头认罪，一次是在众多客人之前，另一次则是在他们走了之后，他母亲又把他带到父亲跟前，要他磕头，但毛只跪一条腿，他母亲双手压住他肩膀，要他跪两条腿。

“战争这样结束了，”毛后来评论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然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我学会了恨他……”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反抗自己父亲的一个很突出的故事，这个故事选自1936年毛对埃德加·斯诺简述的自传的中文本。

毛13岁那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是个人私事。按照中国的传统，毛的父母在他13岁那年给他“娶”了一个19岁的女子，名叫杨翠花。这桩“婚姻”可能是在一个火柴商人的帮助下安排的，其目的在于促进毛家的农业经济。毛的父亲可以把这个女孩当雇工使用而不付钱，同时，这个女孩的出现可以使毛家传宗接代，养育潜在的劳动力，尽快地派上用场。

但毛背叛社会传统，反对这桩婚事。毛后来在谈到自己的早年生活时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许并没有想到她。据说这个女子最终也没有和别人结婚。

毛13岁时，长得和他父亲一样高大，每天能够挑一副沉重的粪桶往田里送好几趟肥。毛养成了带书到田里的习惯，这样，他随时都可以跑到古墓后的大树下读那些英雄传奇和造反的故事。他的父亲总是抱怨看不见他的影子，最后当场抓住了他，手里拿着书，两只空桶放在他身边。

“你是不是成心不想干活？”他父亲问。

“不，爹，”毛回答说，“我只是歇会儿。”

“今天一早你还一担都没挑呢！”

“谁说没挑，”毛抗议道，“从天亮起我已经挑了好几担了。”

“到底几担？”他父亲问。

“至少也有五六担吧！”毛说。

“半天才挑五六担！你以为干那么点活，我就得白养着你吗？”

“那你说你半天能挑几担？”

“20担，”他父亲回答，“起码也得15担。”

“从家里到田头有不少路程呢。”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把家建在田埂边，你就省心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是一样干这种活。我看你一点也不关心这个家。你说我们该怎么过日子？你生得倒安稳，好像没事人似的。你知不知道感恩图报？耗费时间读这些破书，有什么用？你不是三岁小孩了，要想吃饭，就得干活！”

“够了，”毛说，“你老是唠叨个没完。”

这事发生在上午，吵完之后他们回家吃午饭。但下午五点钟时，毛又不见了。他父亲现在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他径直走到古墓那里，看到儿子像上午一样坐在那儿，手拿着书，身边放着空桶，两个人又吵了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本书的魔了？把你爹的话只当成耳旁风吗？”

“不是，爹，”毛回答说，“我还是听你的，你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的意思明白得很，”毛父接着说，“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毛回答说，“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田里的活干完后，总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吧。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只要做完了田里的那份活，你就不用管我看自己的书了。”

“可是，小子，”毛父反驳道，“你才挑了几担就躲到这儿来看书？”

“来看书之前，”毛坚持道，“你要我干的我都完成了。”

“完成什么了？”

“吃过午饭后，”毛说，“我已经挑了15担肥。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

毛的父亲很吃惊：一个下午挑了15担肥可是很重的活，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他走到田里，仔细数了数，真有15担。他儿子没撒谎。此后这个孩子继续在他那隐秘的地方读他的传奇小说，他知道如果他干完了他父亲规定的任务，他父亲就不会干涉他了。

毛的父亲决定送他到湘潭的米店学徒，他和这家米店有些联系，毛也同意了。但就在此时他听到他的文家表兄说，在他母亲的家乡湘乡县办了一所新学校，这所新学校教授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激进”的，那里不太注重经书。毛此时在地方小学堂受到一个“激进”的反佛教先生的影响，这位先生号召人们去除神佛，把庙宇改成学堂。

他还读到一本谈到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30年后毛回忆说：“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缅甸、越南等地的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切导致毛去寻求更多的现代知识。

但他没有钱上学，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已15岁了，早过了上小学的年龄，当毛最终决定和他的父亲谈他不想去米铺当学徒而想去上学时，他遭到父亲的一顿嘲弄。

“真是白日做梦太荒唐，”他父亲咆哮道，“你这么个牛高马大的人能和小娃娃坐在一起念书吗？你都是在发疯。”

毛决定自己想办法。他不顾父亲的反对，请每一个亲戚朋友借给他一点钱，而他父亲一点也不知晓。当他弄到了足够的钱时，一天晚上他在饭桌上宣布说：

“我决定上东山学堂念书去，三天后我就走。”

“你是不是得了奖学金，可以不交学费？”他父亲嘲弄道，“要不就是你今早中了头彩。”

“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毛平静地回答，“不要你破费一文钱。”

毛的父亲离开了饭桌，点燃了一锅烟，几分钟后又回来问：“你弄到奖学金了吗？我不付钱你怎么能进学堂？我知道上学的人都得交学费、伙食费和房钱，贵得很。王家小儿子想念书想了好几年，也没念成。唉，学堂的门不是可以说进就进的。只有财主老爷家的人才进得去，我们这样的人家那是没有指望的。”

“你不用操那份心，”毛诡秘地一笑，“反正不要你破费，就这么回事。”

他父亲反驳道：“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你要是走了，就少了一个人手，谁会帮我们干地里的活计？你说是不用我破费，可你忘了我得要给顶替你的长工发工钱。小子，你心里有数，我出不起工钱呀！”

毛没有想到这一招，一时无言以对。最后他还是被狡黠的父亲难住了。愣了一会儿，他起身去找一个远亲，这个亲戚有帮助年轻人读书的好名声。毛向这位亲戚讲了自己的抱负和具体困难，于是这位亲戚给了他一笔钱。

当天晚上，毛问他父亲：“雇一个长工得多少钱？”

“每月至少1块钱，”他父亲答道，“一年就是12块。”

毛不动声色地把钱递过去说：

“给你12块钱，明天一早我就去东山学堂。”

第二天，天刚破晓，毛就起身收拾自己的行装，一顶蓝布蚊帐，两条很有年头、已洗得发灰、布满补丁的白床单，几件褪了色的长衫。他把这些东西卷成一捆，扎到扁担的一头，另一头则挑着两本小说。

“你不打算跟你爹道别吗？”他母亲问。

“不。”毛回答说。

“要不要再带点东西？”

“不用，”他说，“够了。”

再没多说一句话，也没挥手作别，毛泽东毅然上了路。头也不回。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山脚的一棵树下，毛看见一个衣衫簇新的孩子和一个老农坐在地上。他走过去，坐下来，和他们聊了起来。

当他知道这个孩子在湘乡县上小学时，毛急忙向他打听情况。他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第二个问题是他最感紧张的：

“他们都是多大年纪？有没有比你大的？”

接着毛又问老师是不是很严厉，那个孩子告诉他，有一个老师经常用粗手杖打他们。

“那么，你们就任他这样而不想法子对付他吗？”

“你真是，”那个孩子反问道，“又能怎样呢？”

“你们不应该让他把你们打得那样重。”毛说。

“但我们只是小孩子啊，而他是一个大人。”

“但是你们有很多人，他只是一个人，要制止他不会太困难。”

“是的，不过他是一个先生，我们必须尊敬先生，你难道不了解吗？”

“但是当他对你们太凶的时候，”毛问，“你们仍然尊敬他吗？”

“我们都害怕他—所有的同学都怕他，我们连一句反驳的话也不敢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

“你们这些小孩简直都是些傻瓜。”毛轻蔑地说。

“你这样嘲笑我们最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在我们那种情况你也和我们没有两样。”

“哈哈，我也会这样子？”毛坚定地说，“假定我是你们，我就把他杀掉！

当毛在路上第一次看见东山小学时，他停了一会儿，仔细地打量着，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房子。一条小河环绕着学校而过，小河有一百来尺宽，上面架着一座宽大的白石桥。沿河有一堵高约15尺的坚固石墙，孩子们称之为“长城”。

在这重要的时刻，毛鼓起勇气，朝着第一道大门走去。他慢慢地跨过白石桥，第一个碰到的是看门人。他不让毛进去，因为毛太大了。

“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进学堂呢？”

在场的一个孩子喊道：“你进大学都够大了！”

另一个孩子叫道：“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上学呢？我们都不是工人呀！”

其他的孩子打量着他的行李卷，发现有两本很破旧的卷了边的小说。

“你总共就带了这两本书来吗？”一个孩子问。

“你知道不知道，”另一个说，“我们不许阅读这一类坏书的。”

“我只恳求你告诉校长，”毛恳求道，“我想找他谈谈。”

“我不敢去打扰校长，”看门人回答说，“你是个傻瓜，而我却不傻！真是胡闹透顶了！”

“要是你们不去通报，”毛大声说，“我就自己去。”

“你敢！”看守人恐吓道。

学生们也都冲着他大声喊叫着，毛挑起行李向门口走着，看门人挡住了他，吼着说：“走开！东山学堂不是疯人院！”

与此同时，一个孩子跑去对校长说：“先生，一个小土匪想进我们学堂……他在打看门人，学生都在帮看门人，但这个土匪又高又壮，非常蛮横，你快去帮我们，先生，快点！”

校长出来察看情况。

“怎么回事？”他问，“这么吵吵嚷嚷的？”

“先生，”看门人指着毛说，“这个傻瓜说他想进我们学堂，并且要见你，他是一个十足的地痞无赖！你见他吗？喏，就是这人！”

毛走向校长，用恭敬的口吻说：“先生，请您准许我在您这里读书。”

“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校长吩咐看门人。

毛挑起行李，但看门人又拦住他：“你以为是让你挑行李进去吗？把行李放在这儿，随我进去！”

毛不想把行李丢下，怕孩子们会拿走什么东西。

“我想带上行李。”

“你怎么带这样的东西进校长办公室？”看门人吼叫着，“把它放在这儿，谁会对这破东西感兴趣？学校不是疯人院，也不是小偷窝，把东西放这儿，丢了我负责，告诉你，东西被偷了找我！

毛犹豫了一会儿，把行李放在看门人的屋角里，然后跟着他进了校长办公室，学童翻遍了他的行李卷，拿走了那两本宝书。

一进校长办公室，毛又恳求道：“先生，您能准许我在这里读书吗？”

校长不能置信似的打量着他，问他的名字和籍贯。

“多大了？”

“刚刚满15岁，先生。”

“你长得可够大的，看上去至少有十七八。”

“没有，先生，我才15岁零几个月。”

“你在村里念过私塾吗？”

“我跟着王先生念了几年书，能够看懂小说。”

“你看的是什么小说，毛泽东？”

“《三国演义》和《水浒》我都看过很多遍。”

“你读过小学的课本吗？”

“没有，先生，没读过。”

“你能阅读二年级的课本吗？”

“差不多吧，”毛如实回答说，“也有些字不大认得。”

“学过算术吗？”

“没有，先生。”

“你了解多少历史、地理？”

“一点没学过。”

“你写两行正楷字给我看看。”

毛写了几行，字写得歪歪扭扭，又大又难看。他的手更适合干农活，而不是拿笔杆。

校长宣判说：“唔，不行，不能让你上这间学堂，我们没有专为初入学者设的初级班，再说，你的年龄进小学太大了。”

“请您留下我吧，我要读书，”毛恳切地说。

“你跟不上来，那是毫无希望的。”

“让我试试，”毛恳求道，“留下我吧。”

“那不可能，你肯定跟不上班，只会是白白糟踏你的时间。”

“但是我一定拼命用功……”

就在这时，另一个老师听到他们的对话，也走进了校长办公室，毛的恳求打动了他。他建议说，让毛跟班试学五个月。校长最后同意了。就这样，毛进了东山小学堂。

毛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他父亲也勉强同意了他进这所学堂。因为朋友们对他说，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教会他赚更多的钱。

毛被其他学生镇住了。“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后来说。他们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有些学生穿绸缎，着轻裘，华衣美服，很少有农民能送孩子到这样的学堂上学，毛与其他学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

毛还成为复杂的地域观念的牺牲品，他们认为他不是湘乡人，把他当做外来者，毛后来说：“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然而毛也交了朋友，其中一个萧三，他的另一个名字叫艾米·萧，更为人所知。他是个瘦弱的孩子，比毛小两岁。前额高高的，偏好语言和诗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还有一些很不错的老师，其中一位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在毛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已剪掉了辫子，回国后，只得戴着假辫子。“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辫子是假的。”毛回忆说，“大家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尽管人们都笑他，但毛从这个“假洋鬼子”那儿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教音乐和英语，讲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事。毛回忆说：“我当时了解到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也感觉到一些日本的骄傲和强大。”例如他在学怀念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的歌曲时就有这种感受。一个受人蔑视的东方民族第一次在正式战争中战胜了一个欧洲强国，日本对沙俄的胜利不仅鼓舞了像中国的毛泽东那样的年轻人，也激励了整个亚洲的青年人。

毛在学校表现不错，尽管他自己说他表现不怎么样。如果老师的课枯燥乏味，他就看小说或打瞌睡—他后来解释说，这是对那些不会用提问和对话引起学生兴趣的老师的一种惩罚。

“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毛回忆说，“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古文的教员，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承认他心不在古文上。他当时正在读表兄送的两本书（毛很遗憾，他的表兄后来在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反对共产党）。这两本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1898年发起的流了产的“戊戌变法”。“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毛回忆说，“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对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不过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变法罢了。

一天晚上玩耍之后，毛和萧三随着铃声走进教室，萧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那是什么书？”毛问。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

几天之后毛把书还给萧三，道歉说把书弄脏了。萧打开书一看，发现书上许多地方圈圈点点—特别是那些讲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章节，圈点更多。

毛后来对萧三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毛回忆说："在一篇讲述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8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

与此同时，毛还关心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危机。他听说在大饥荒时在省城长沙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许多暴动饥民的领袖被砍了头，高挂在树杆上示众。毛的朋友们都在议论这件事，他对政府如此残暴对待起义者表示极大的愤慨。大约在同时，秘密会社哥老会同本地的一个地主发生了冲突。哥老会夺取了他的粮仓；他们的领袖是一个铁匠，后来被砍了头，但他在毛和该省的其他年轻人眼里成了英雄。

一年以后，韶山也闹米荒，穷人要求富户接济他们。毛解释说："我父亲是一个米商，尽管本乡缺粮，他仍然运出大批粮食到城里去。其中一批被穷苦的村民扣留了，他怒不可遏。"毛并不同情他父亲，"可是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也不对。

这个孩子确实在实践他的理想。有一次回家过新年，他父亲让他去收猪钱，一个朋友回忆说，在回来的路上，他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人，便马上把收来的钱分给他们。五个月以后，毛由于取得的成绩而被允许留下来。那些偷了他两本小说的孩童们对毛友好起来，并把书还给毛。他们确实是把他当做讲授这些传奇故事的权威，而这又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三国演义》在毛的心目中占有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不能容忍人们对它表示非议。历史教员告诉他，这本书很多是历史事实的演绎，但毛在激烈的辩论后也不承认这一点，他跑到校长那儿寻找支持，但校长支持历史教员的观点。所以他向镇长写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但其他学生都不愿在上面签名。

在这种情况下，毛丧失了他最初从老师和同学那儿获得的同情，而按照他一个朋友的记述，这是促使毛决定离开东山学堂的原因。

2　守规矩的学生（1911~1915）

当毛决定去大城市上中学时，已快满18岁了。他特别想去离他家约120里的湖南省会—长沙。1911年暑假以后，他请东山小学的一位教员介绍他进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他带着这封宝贵的推荐信和萧三一同步行去长沙。按照毛后来的话说：“当时极其兴奋，一面又担心不让我入学，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

他们在湘潭停下，换乘渡船去长沙，萧三说当他们看见“喧闹的城市，街上拥挤的人流”，他们感到“说不出的激动”。出乎毛的意料，他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地被湘乡中学录取了。

在这里他见到了第一份报纸《民立报》，它是革命运动的喉舌，刊载着反清起义以及孙逸仙在1911年至1912年革命运动前夕政治活动的激动人心的报道。孙逸仙是广州的一农家孩子，他先进教会学校读书，成为基督教徒，后又去香港学医，最后成为共和运动的领袖。毛回忆说：“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他仍然强烈地钦佩他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知道的政治维新派，所以在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里提出，孙逸仙当共和国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后来他自己承认说：“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

帝制政权垂死挣扎，竭力阻止变革潮流，反满情绪在学生中进一步加强了，一群爱国者在湘乡中学相约把辫子剪掉，以蔑视帝制。毛和另一个同学剪掉了辫子，但其他人最后都不守信用，没有剪辫子。

毛回忆说：“我的朋友和我就出其不意强剪他们的辫子，总共有十几个人成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品。”但是毛在这所学校里感到不自在。半个世纪之后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小时候，在中学时，只要一听到不合我意的消息，我就火冒三丈……

毛到长沙不久，武汉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统治、实现共和的大起义。起义代表来到毛的学校演讲。这次演讲激励着毛去参加革命军。他和几个朋友决定到武汉去。出发前他们借了一些雨鞋，因为听说“汉口的街道很湿”。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和他的朋友未被录取，他们只好再返回长沙。

这时毛能够亲眼观察政治风云的变幻。1911年10月22日，他亲眼目睹了共和军夺取长沙的经过。起义军沿着铁路线推进，在长沙城外打了一个大仗，同时城里也爆发了大起义。城门被轰开，被中国工人夺取，毛站在一座小山上观察战斗。

起义胜利后，建立了新政府，但新政府的执政时间并不长，几天之后毛看见新都督和副都督横尸街头，他们成为保守派复辟的牺牲品。皇帝仍未退位，毛因而决定参加当地的共和军，为完成这场革命而尽力。

毛所在连的连部设在法院里。在军队里他接受了正规的训练，当然也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如军队转移时，为长官挑床铺、被褥和衣箱。一些士兵，每天都得到城外的白沙井去为连队、为军官挑水。毛回忆说：“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每月伙食用去2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毛年轻时很看重劳动的贵贱。

毛剩下的饷银主要用在订报上，他贪读不厌。萧三回忆说：“每张报的四面他一字不漏地看完，报纸上也有新闻，也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他觉得，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特别从这时起，他就注意研究时事与社会问题。

就是在一张报纸上，他第一次看到了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文章很简略，写得也很糟，但毛受到了启发，他急切地开始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认为它是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最好理论。”萧三回忆说。在他的战友中，只有两个人毛很喜欢，一个是湖南的矿工，一个是铁匠。“其余的都是一些庸碌辈，有一个还是流氓。”毛后来评论说。

在军队里过了六个月灰心丧气、平淡无奇的军营生活后，毛决定退出军队。上层政界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我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上去”。当时毛已很清楚，无论他们怎么动摇君主制，新的共和军队也无法战胜顽固保守的中国地方军阀。孙逸仙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但不久就被一名将军所取代，湖南的革命者被愚弄，他们的领袖被代表地主官僚的军阀谭延闿暗杀。

毛的军队生活给他上了很好的一堂课。他的一个老师后来解释说：“毛在军营中的雇佣兵生活使他懂得，依靠这种军队来达到革命的目的是徒劳的，因为在政治上很难教育他们。毛明白，要成功地进行农村改革运动……就必须武装农民自己。

离开军队后，毛在省城长沙没有明确目的地转游了一年。他试着读几所学校，但没有一所合他的意。他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毛回忆说：“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去报名投考。但是考试之前，他又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元钱去报考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招生广告说学校供给膳食住宿，还给一些津贴，又大吹制皂业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毛说。

这时一个学法政的朋友劝他进他的学校，毛也读到了这所学校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诺“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毕业后“马上可以当官”。毛听从了他朋友的劝告，向家里写信要求寄学费来。“我把将来当法官的光明图景向他们描述了一番。”

但又一则广告引起了毛的注意，这是一所商业学堂的广告。毛的另外一个朋友劝告他说，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在经济方面，最需要经济人才来建设国家。毛又被他的观点打动了，向这个商业学校交了宝贵的一元报名费，并且被录取了。

他在被录取后，还不断受到新广告的诱惑。这一次看到的是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毛又交了钱，进了这个学校，并写信告诉他的父母，他父亲很赞成—这个老头现在很支持他的儿子接受进一步的教育。

但是毛碰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在这所新学校上学的困难是大多数课程都用英语讲授。我和其他学生一样，不懂得什么英语。说实在的，除了字母就不知道什么了。”而且这所学校没有英语教师。“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很讨厌”，所以到月底他就退学了，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他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他又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结果考试发榜时，他名列第一。这所学校很大，偏重历史。毛受到了校长的鼓励，他欣赏毛的写作。但是毛在这里并不感到愉快。“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自己阅读了一本历史书《御批通鉴辑览》，是一个老师借给他的。他感到自学比在校学习更好，他在这个学校待了六个月就退学了，开始尝试一种新的生活。

在1912年至1913年冬这段时期，他每天都去坐落在浏阳门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一直读到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

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

他那时住在新安巷的湘乡会馆里，因为伙食便宜。唯一麻烦的是会馆里还住着湘乡籍的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工作，总是跟学生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敌对发展成为武斗，士兵想杀死学生。“我躲到厕所里去，”毛回忆道，“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

然而，这是毛的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他阅读了在英国受教育的达尔文主义者严复翻译的许多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我在那里第一次（18岁的时候）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读了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让 - 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

最后一本书对毛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它与中国固有的认为今不如昔的传统思想针锋相对。除了阅读这些重要哲学著作外，毛“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还广泛地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沉醉在知识的大海里，自由自在地畅游，毛父却非常恼怒，到最后断了他的生路，拒绝对他的这种自学提供资助。毛不得不离开会馆，另找安身之处。毛回忆说，当时，“我也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差不多已经作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



>> 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时的毛泽东

毛又开始留意广告了，他看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广告，说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毛的两个朋友也想进这所学校，他们请毛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毛回忆说。他们两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毛夸口道他实际上是被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并不认为我为朋友代笔是不道德的行为，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义气。但正是毛后来要求50年代的年青一代把对国家和国家思想的忠诚放在高于朋友义气和家庭观念之上。

毛将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度过骚动不安而又思想定型的五年。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几个月后就和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它坐落在长沙南门外的“书院坪”，前临湘江，长沙一片新兴的工业包括石墨厂、电灯厂和造币厂就在附近。此外，粤汉铁路在1917年以后就日夜啸叫着从附近通过。

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学生用不着交学费，其方向是把出身贫苦家庭不能上大学的孩子培养成小学教师。学校的基础是最新式的民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还包括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和道德实践。学校还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教员思想比较开明，提倡自己思考，这是毛所喜欢的。学校很强调爱国主义，表现为使用全国通用的语言而不是本省方言，教师强调要牢记中国的国耻。

毛1913年春进入该校时已19岁了，几乎可以说这是毛真正受教育的开始，毛后来回忆说：“我过了20年甘露般的生活，对世界一无所知。”

毛计算过，他在这所学校共花了160元。“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1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星期天如果学生们起来晚了吃不上饭，他们就把

食堂里剩下的冷饭冷菜自己热一下，每当别人热饭、热菜时，毛总是一个人吃冷饭、冷菜，也不知道他是节俭呢，还是不在乎，抑或是太懒了。

这所学校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蓝色的毛料校服，这件校服毛穿了许多年，直到校服已褪了色，磨出了洞还在穿。此外，毛经常穿一件灰色的布料学生长袍，冬天在长袍里面再加一件旧式的夹克衫，一年四季都穿一条肥大的布裤。夏天他几乎从不穿袜子，布鞋也常常是裂着口子。他经常盖一床很粗糙的蓝色棉被，被里的棉花又旧又硬。

毛每天都起得很早，漱洗完毕就去教室读书。下课后，一般都在读报室看报，或去图书馆借书。别人都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茶炉室、读报室看一会书，有时就在走廊里通宵不灭的灯光下读书。他的朋友说，毛手里总是拿着一本书，他从来不开玩笑，也不闲聊。他还常常独自一个人或邀几个朋友到校后的山上读书。难得几次上街时，他一般也都要去玉泉街或府正街逛逛，因为这两条街上有些旧书摊和新书店，毛常掏空了羞涩的腰包买些他喜欢的书。

他学习中国文学、道德、地理和历史。他的一个同学回忆说，毛特别喜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两本书分别成于11世纪和17世纪。毛习惯于把读报时看到的外国人名、地名记下来，和地图上、书上的相比较，再查找原文。正确的名称或引文他就记在一张小纸条上，再把小纸条夹在书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浏览和复习。无论什么时候要找他，朋友们都知道他“在阅报室”。

他的古文和新式文章都写得很好，文笔流畅，为学生们所传颂。他读书时很细心，他所喜欢的句子都圈点起来，而对他不赞成的话则批上诸如“荒谬”、“不通”等评语。每读一本书都这样，甚至第二次读书时还对前一次所作的圈点加上新的评语。

他的苏格拉底式的特征也是很突出的，他的中文传记作者说他：“还特别有好问……的习惯，他最懂得学与问是不可分离的。”

但不是每一件事毛都喜欢。特别是该校至少有35种烦人的校规禁令，限制了他的自由，诸如禁止经商、禁止组织政党、禁止唱下流的歌曲、禁止看坏书、禁止非法集会，等等。毛还讨厌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因为他想专修社会科学。他回忆说：“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他的一个老师还记得，毛的数学成绩特别差，有时考试还交白卷。

毛后来说，他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他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算了。有一次他画了一个椭圆说这是蛋，结果考试不及格。“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

但毛的社会科学各科的成绩都非常好，这就弥补了他在自然科学和艺术各科上的低分数。毛后来描绘自己对学校的态度就像是反抗者一样，“我不服从校规，”他承认说，“我的原则是只要不被开除就没关系。就拿考试来说吧，我的分数从50分、60分到80分都有，平均分是70分。”

毛承认他对学校是欠了债的。“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也没到外国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就是在这里，毛的组织才能开始显露，萧三回忆说，无论什么时候其他人谈话时，毛都“略低着头或偏着头听别人谈话，而自己只‘嗯’、‘是的’的回答，在倾听对方说完之后，他有条有理地给对谈者分析，提出要点，作出结论。他的话并不多，但每一句都很中肯，都

能启发人，再往前进，再往远处大处着想，你有什么疑问他只要一谈，便会迎刃而解，一切都明朗化，都有了办法。

另外一个记述毛这段学校生活的人总结说，毛在会上“从不轻易表态”，无论是主持会议还是一般发言—最突出的是他从不作冗长、离题而混乱的讲话。如果他旁边的其他人开始辩论，甚至吵起来的时候，毛都静静地用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

他的生活方式是清教徒式的，他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一个人如果过不了金钱与女性这两关，这个人就不值得一谈。他的朋友都说他不轻浮放荡，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自己的操行和知识从不感到满足。

但所有这一切加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就有了领导别人的公认的才能。他的老师徐特立后来说：“毛在学校里并没有特别显示出领导才能，他具有一种谦恭的气质……

十年后，当毛被敌人通缉追捕时，他的家人在后院焚烧他留下来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有人从“灰烬里”救出了毛的一本作了注释的课本和一本他自己的笔记本。这本94面的笔记本写了一万多字，其中有一部分是公元前4世纪两本诗集的手抄本。

另一部分是道德和文学课的课堂笔记，可能是1914年记的，内容有先秦的哲学、楚辞、汉赋、拿破仑、恺撒、福泽谕吉（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和把西方文化介绍到日本的人）以及自然科学。

从这本笔记本反映的几个主题可以看出毛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状况。一个是他自己的雄心，这是从他无限的自我中心论发展起来的。笔记中说：“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毛指出古

代的仁人志士“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毛解释说，这样的人毒蛇螫手，他必断腕。

毛评论说：“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从毛自己写的这些话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毛就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有一种社会犯罪感，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他后来抛弃自己的家庭进行辩护。从笔记中当然也看出毛的使命感。

贯穿笔记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刻苦力行的重要性。笔记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又说：“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特别痛恨的是懒惰。“懒惰为万恶之渊薮……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此外毛还注重精细。“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

那本留存下来的加了批语的教科书是弗里德里希·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这门课是毛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最后两年（1917~1918）由杨昌济教授的。在这本约十万字的书上，毛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等符号。毛根据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分，还写上“加5”。毛对此非常骄傲，一个朋友说，毛为此到处向人夸耀。

毛特别反对个人的压抑，他说：“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杨昌济教授曾一度以“长沙的大儒”闻名，他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最深。毛后来评论，杨“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曾在国外留学十年—先在日本，后到伦敦大学，最后到爱丁堡大学，拿了哲学学位。他回国之前在德国一所大学研究康德，成为塞缪尔·斯迈尔恩、T.H.格林和康德的忠实信徒。那些到欧洲“镀金”、到日本“镀银”的留学生回国后大多数钻营从政做官或办实业，而杨先生却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当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培养青年人才。

作为一个唯心主义者和进化论者，杨特别热衷于将思想付诸个人实践，实事求是。他非常相信意识对物质的操纵作用。他特制了一个澡盆，每天早晨都在澡盆里洗冷水澡，不论春夏秋冬，气候寒热。他解释说：“人必须每天做一件艰苦的事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冷水不仅磨炼意志，还能增强体质。但杨自己也乘坐符合他身份的三人抬的轿子来来往往。



>> 毛泽东的导师（后成为他岳父）杨昌济

杨的学生都很尊敬他，一些学生，包括毛，在杨的伦理学课后也常到杨的家里与他继续讨论。在这种非正式的讨论中，杨敦促他们要有所作为，要争取留名后世。“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欲深谋远虑，动之万全……”毛第一次到板仓杨家拜访时，风尘仆仆，一把雨伞，一双草鞋，步行前往。

与此不同的是徐特立。他出身农民家庭，曾留学日本，是学校唯一不坐轿子和人力车而步行去学校上课的两位教员之一。徐先生曾割破手指，在一封血书上签名，向皇帝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这一举动传遍全湖南，妇孺皆知。

徐的坚定信念对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后来对他说：“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在长沙对毛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三个人是袁仲谦，人称袁大胡子，他教古文。毛回忆说，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我只得改变文风……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袁要毛从梁启超的半口语化的文体上改过来，要他改习9世纪韩愈的古文体。

毛开始听他的，但逐渐觉得袁太保守、太专制。有一次他拒绝重写一篇把袁不喜欢的句子删掉的文章，而只是原封不动地重抄一遍，袁气得把它撕了。另有一次毛刚好碰到袁在大声斥责一个工友，毛平静地说：“哪有这样恶，要这样骂人！”

学校里其他教员也都帮助过毛，一个教员借给毛旧版的《民报》，另一个曾让毛暑假在他家住过，第三个和毛一起参加了共产党。毛和他的同学也相处得甚好，特别是有两个朋友不仅和他趣味相

同，而且和他一样很有才华。一个是蔡和森，另一个是萧子升，人们都称他为萧瑜—毛在东山小学的老朋友萧三的哥哥。

杨教授曾经说过，他在长沙教过的几千弟子中有三个最为出色，依次是：萧瑜、蔡和森、毛泽东。这三个人并不都是同一年级的，但年龄和兴趣都很接近，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被称为“三杰”。

蔡和森来自湘乡，上学前是放牛娃，他高而瘦，两颗门牙突出，意志坚强，很固执。尽管他缺乏“首创精神”，但他对他的朋友说，他想书写人民大众而非帝王的历史，他想统一中国的书面语和口语。整个20年代，直到1931年就义前，蔡和森在中共党内一直是毛最亲密的盟友。

在1913年第一师范与第四师范合并的第一天，第一师范的萧瑜好奇地打量着从第四师范来的学生。和第一师范不同的是，第四师范没有统一的校服，穿得五花八门。

“有个‘新兵’，”萧瑜后来回忆道，“长得高大，粗手大脚，粗布衣裤，鞋子破旧，这个年轻人就是毛泽东。“他的脸部生得相当大。但眼睛却既不大也不锐利，看起人来也是直愣愣的。毛的鼻子扁平，典型的中国鼻。耳朵长得倒是很匀称，嘴相当小，牙齿白而齐。这一口好白牙使毛笑起来相当有魅力，所以没有人会认为他不真诚，他走起路来很慢，两腿合不太拢，摇摇摆摆有点儿像鸭步。他坐下或站起来的动作都是慢吞吞的，而且他讲话也很慢，但无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他们三个人在第一天就认识了，因为他们各自的家乡离得很近，但他们结成朋友只是因为该校有每周展出优秀作文的习惯，萧瑜和毛泽东的文章好几次都从各自的班里被挑选出来参加展出。因此他们都读到了对方的文章。

萧瑜后来说：“这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字迹。他的笔画粗重，总是把字写到格子外。”

后来毛自愧地对萧瑜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三个字得占两个格子。”

萧瑜当然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毛也很拔尖，但他主要是作文写得出色，他的作文被认为是特别优秀的。作文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算是好学生。

“他的记忆力很强，”萧三后来回忆说，人们“说出一个地名，他会立刻说出它在中国的哪个省，或在某一外国的具体地点，在对地理进行特殊研究的同时，他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历史—抓住事件的要点，收集广泛资料，但并不扯到题外。这种孜孜不倦地获取知识，很久以来就是毛泽东的特点。而他不遗余力的学习和研究，终于使他成为一个博学者”。

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的几个月后，毛才得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和萧瑜面谈，他们偶然在走廊上相遇，毛站在这个高年级同学面前，用英语打招呼：“密斯脱萧。”当时在学校里，学生们用英语交谈很时兴。

“密斯脱毛。”萧瑜也客气地回答。

“你在第几教室？”毛问。

“第一教室。”

毛说：“今天下午课后，我想到你们教室看看你的作文，行吗？”

下午四点钟下课后，毛来到萧的教室，他们谈了很长时间，谈论学校的课程、组织和教员，最后毛借走了他这位新朋友的两篇文章，鞠了个躬离去。

第二天课后，毛建议萧饭后出去散步。他们沿着湘江走了两个小时，毛赞扬萧的文章写得好，但不同意他文章中就严光问题提出的观点。严光是公元1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他和后来成为当朝皇帝的刘秀私交很好。新皇帝邀请严光辅佐他治理中国，严光应邀前往京城与皇帝同榻而卧。据说当晚睡觉时，严光无意之中将脚搁在皇帝身上，由此可见他们的关系很亲近。皇帝请严光当宰相，但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政治是卑鄙的行当，他无意吃政治饭。

毛认为严光应当接受宰相的职位，而萧瑜则说毛不懂严光的观点。

何叔衡，人称何胡子，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也是毛的校友和朋友，毛说何“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其他还有陈章甫、罗学瓒、张昆弟、郭亮与夏曦—他们都是于30年代初牺牲了的共产党党员，有些人死前还受到严刑拷打。

在长沙上学时，他们常开玩笑称自己是“栋梁之才”，意指自己是经世济国之才，但只有毛坚持不懈，最后登上了权力之巅，而萧瑜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既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国民党，大部分时间流落欧洲、南美。

在所有有关毛的学校生活的记载中，很少提到他的性生活，毛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崇高的责任感。

“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

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这个年龄的青年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当然也有一些青年妇女有着与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共同的理想，其中包括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她后来成为共产党杰出的妇女领袖之一。但是，出于羞涩和社会传统的束缚，毛19岁、20岁待在长沙的时候没有去追求艳遇—作为某种补偿，这些青年通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在20世纪头10年结成了同盟。

一个暑假，毛留在了学校，没有回家帮他父亲干活，他的朋友萧瑜说：“他那唯一的一双鞋，已十分破旧，鞋底都快磨透了，为了拿双新鞋，他晚些时候总得回家一趟。”

毛反驳说：“一心想治理天下的大英雄，没有时间考虑打扫房间！”

在湖南炎热的夏季，萧瑜每天都洗澡，而毛泽东几天都不洗澡，还说萧瑜洗得太勤了。

“润之，”萧瑜揶揄说，“你的汗臭太难闻了。”

“润之”（有点儿女人味）是毛泽东给自己取的学名，意思是“滋润东方”。

这是真的，但毛对汗臭味根本感觉不到，也不在乎别人说他，他不想改变萧瑜所说的“邋遢”样。其他两个暑假留校的学生开始是和毛泽东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后来不得不移到别的桌子上去，与毛保持距离，毛不明白为什么。但萧瑜可能夸大了毛的邋遢，因为后来毛泽东因每天淋浴而在全校闻名。

毛和萧还不断地讨论报纸上登载的最新消息，特别对德国的形势感兴趣，因为中国很尊重德国。按照萧瑜的说法，毛“崇拜”俾斯麦和威廉二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与此同时，中国的共和革命被军阀们叛卖。

3　深渊蛟龙（1915~1918）

毛在师范学校的头两年较平淡，他潜心学习以达到他老师所要求的水平和他的朋友所具有的学问，但1915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引起了他的关注，新建立的共和国走入歧途，全国发生动乱，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始对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毛开始投身繁忙的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第一个活动是以抗议学校当局开始的，这是一个标志。起因是该校的校长下令，从秋季开始每一个学生都必须交10元学杂费。

学生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宣言，专谈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毛认为不妥，说他们应该批评学校的管理不善而不应指责校长的私生活，学生们于是让毛另写一篇。宣言很快被印好了，但从印刷厂携带回校时，被学监截获了。学监报告了校长，校长大怒，决定开除包括毛在内的17名学生。很幸运的是，一些教员进行干预，毛也就未被开除。

毛泽东在师范期间最有成效的倡仪之一是半夜从宿舍逃睡时想出来的。毛和萧瑜养成了一个习惯，夏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每天都要沿着

江边散步，坐在妙高峰的草坡上休息。1915年的夏天，他们有一次在学校后面的山上待了一整夜，讨论他们通过创办一个新的社团来改变中国的计划。

袁世凯曾是满清时期的一个将军，现在已成为新共和国的总统，毛和萧这两个青年急切地讨论着北京事变，讨论这些事件将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当他们交谈时，山下学校的号角吹响了熄灯号，只有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的学生，但当时他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全然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

他们都认为需要一种新的力量，萧瑜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进行改造。

“我们两个就能够做任何事情！”毛热烈地坚持道。但萧不同意，认为必须有许多人、许多有同样思想的人。“我们两个可以去组织他们。

他们对自己的同学进行考虑，决定一些最有才智、具有崇高理想的人，10个最优秀的人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社团的核心。新社团的目标是在社团成员中鼓励良好的道德行为，交流知识，建立紧密的友谊—其最终目的是拯救国家。

他们商定，毛泽东写一封致长沙各校学生组织的信，阐述他们的行为，以引起他们的兴趣，署名是“二十八画生启事”—“毛澤東”三个字共有二十八画。在毛起草第一个章程时，萧也草草写了一些有关学会的规章(3)，然后两人互相交换，并作了一些修改。这时天已黎明，突然他们听见了号角声，这是学生早晨起床的号声。毛泽东和萧瑜为制订他们的计划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对于毛泽东来说，通过在他最喜欢的新闻媒介—报纸上登广告来寻求志同道合者是很自然的事。毛后来回忆说：“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

最终结果是令人沮丧的，那三个响应的人最后都反对或背叛了共产党，只有那“半个”后来部分实现了毛的理想，还在做共产党的领导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这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在1915年秋，广为张贴他那著名的“二十八画生启事”，这封公开信和毛登的广告用词差不多，也是邀请人参加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引用了《诗经》中的一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毛自己动手刻字印刷了这封信，又把它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信封上写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但不是很多人都理解他的曲高之音，毛只收到五六个人的回音。而湖南省女子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毛泽东的信时，非常怀疑作者的动机。

一个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这封信的人给毛写了一封肯定信，并收到了毛的回信。回信说：他的来信恰似“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一个星期天他们在定王台图书馆见了面。没有什么客套寒暄，毛直截了当地询问这个青年读过些什么书。事实上这个青年后来与毛非常接近，参加了毛和他的朋友发起的辩论会。后来，这个思想相同的朋友的联系网正式组织为“新民学会”。

1915年毛当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他引进了日本学校的一些做法，如组织球赛、游泳、远足和其他体育活动。毛还组织了一个“学生自治会”，并成为“船山学社”的会员（“船山”是17世纪湖南的反清思想家王夫之的晚号）。“船山学社”成立于1915年，是湖南爱国人士不满中国的衰落而创办的一个论坛。毛呼吁他的同学参加这个学社的每周例会。

1915年9月陈独秀在北京开始出版《新青年》杂志，从而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复兴的序幕。《新青年》的文章很多是李大钊、鲁迅等撰写的，提倡白话文，强烈呼吁民主和科学。杨昌济教授为他的学生订了几份《新青年》，其中一份给毛泽东。《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许多评论，鼓励青年一代打碎旧中国，创造新中国，号召他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毛被这些文章的语言和内容所打动。

在杨昌济教授的介绍下，毛与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学者建立了通信联系，讨论国内形势、学习方法、物质文化、哲学和世界形势等问题。他给一个据说准备为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效劳的人去信，告诫说：“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 这是1915年11月，几天之内袁世凯采取了自我毁灭的举动，宣布他要称帝坐龙廷，结果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他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于次年夏天死去。

1917年3月毛第一次和一个外国人进行了联系，他和萧三联名给日本著名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白浪滔天写了一封信，这时白浪滔天正来中国参加一个朋友[4] 的葬礼。信中写道：“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

然后，这封信谈到了实质问题：“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我们不知道是否真的实现了会面。

毛确实是在锻炼自己的意志。毛解释说：“我‘身亦不强’。因而他和他的朋友都成为热心的体育锻炼者。

“在寒假当中，”毛回忆说，“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毛第一篇发表的文章《体育之研究》登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认为体育与德育、智育同等重要，忽视体育的学生将“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

毛当时最喜欢的一种锻炼方式是每天洗冷水澡，他从未间断过，冬天也如此。按照他的官方传记的说法，在一师的最后两年，他组织20多人，每天清晨起来就来到井边，大家脱光衣服，各人从井里提起一桶桶冷水从头浇淋全身。自己淋，也彼此对着淋。

即使在下雨、下雪和寒风刺骨的秋冬季节，他们还经常赤着上身，在学校的后山跑动，摩搓.....有次学校开运动会，忽然大雨倾盆，大家都急着跑回屋内，唯有他毫不在乎，候大家走尽，才回教室，全身都湿透了。

另一项喜爱的运动是游泳。毛常和蔡和森等几个朋友课后到湘江游泳，暑假他们结伴住在岳麓山时，常常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到湘江中一狭长的沙洲那儿去游泳。游完后，他们“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

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他们的身体淋浴在流光晚照之中，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

他完全是在实践孟子的教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这时毛的才干开始得到承认。1917年6月第一师范进行复杂的“人物互选”，400余名学生投票选举各方面杰出的学生。毛在德育和智育方面得票最多，尤其是在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方面得到的评价最高。

就在这年暑假，毛顺便去看他的朋友萧瑜。他已经毕业，并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毛泽东想问问萧瑜打算怎样过暑假。

萧瑜告诉毛泽东说：“我有一个新计划。我决定做一段时间的乞丐。”

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萧瑜详细地向他解释说，他曾经当过两三天乞丐，觉得很放松，很令人振奋。他现在想再试一次，时间长些，去体验乞丐的生活。

“听起来很有趣。”毛叫了起来，“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

实际上，毛以前就读过《民报》上登载的介绍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直至西藏的文章。“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毛后来回忆说，“我想效法他们这些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听起来这个新奇的暑假旅行建议似乎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萧瑜则说是他的主意。

最后两人决定一起出去“行乞”。放假后，毛来到萧瑜的学校，他穿着一身旧的裤褂，头剃得像个士兵，带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小布包。包裹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这次旅行他们都是身无分文。

他们离开长沙，萧瑜走在前面，毛泽东走在后面。萧瑜后来据此画了一幅漫画。不久走到了湘江边上，他们都不想弄湿行装，又没钱雇人摆渡，但又不想去上游乘免费渡船，最后他们上了一条划船。直到船行江中，他们才告诉船夫他们身无分文。他们知道这时船东也不会把船划回去，因为船上还有其他几个乘客。船靠岸后，他们和船夫吵了一架，然后把布鞋脱下换上草鞋，继续上路。

下午，他们饥肠辘辘，于是打听附近是否有读书人家。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现已告老还家的翰林。为翰林写了一首诗，翰林才接待了他们，并给了他们一点钱，够他们花一两天。

接下来他们又到了以前的老校友何叔衡—何大胡子的家。

“我们在进行一项尝试，”毛对惊讶的何大胡子解释说，“尝试着不带分文地旅游，愈远愈好。我们真像是叫花子一样！”

何震惊了。萧瑜解释说，他们是想看看他们是否也能解决各种困难。

何叹息说：“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这两个青年人继续往前走，但他们行乞的下一家不愿给他们饭吃，他们就坐在门口不走。最后，吝啬的主人塞给他们一把花生，要他们走。

那老头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答应他们。

在游历中，毛泽东和萧瑜谈政治，谈社会。在谈及公元前3世纪的皇帝刘邦时，他们争论起来了。毛认为刘邦是大英雄，因为他是第一个由平民当上皇帝的，萧瑜则认为他是个暴君。

“他并不能算残暴，”毛大声说，“如果你把刘邦放在他那个时代考虑，并把他与其他皇帝相比较的话。

还有一次他们讨论起中国的家族制度。

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

萧也认为，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

“你对子女的观念，我觉得有些奇怪。”毛认为国家应当高于一切。毛进而说道：“在未来理想的国家中，儿童们将由国家来抚养和教育……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好政府！”

游历一个月，走了900多里路，他们回到长沙，然后就分手了。分手前，萧瑜告诉毛泽东，他想回去看看父母，又问毛：“你呢？”

毛告诉他：“我也要回家，他们给我做了两双鞋子，正等着我呢。

毛自己总结这次旅行说：“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他是把这次旅行与公元前2世纪的史家司马

迁相比的。司马迁差不多在同样的年龄游历了当时的中华帝国，并记载了帝国内的世俗民情。

在第一师范时，有一年毛和他的朋友蔡和森、张昆弟经常住在江那边岳麓山顶上的爱晚亭里。他们不带早饭、晚饭，主要是以新鲜蚕豆为食。每天早上跑到山顶去沉思，再下到江里或池塘里游泳。他们的另一个喜好是“练声”。萧三回忆说：“他们跑上山顶大嚷大叫，或朗读唐诗。他们还爬上城墙，吸足气向呼啸着的亭风喊叫。”

他们宿在亭里时，三个人每人只有一条毛巾、一把伞和尽可能少的几件换洗衣服。毛通常穿一身灰色长袍，和其他两人不同。即使回校后，他们三人也常在操场上露宿，直至寒冬降临。

后来其他朋友也参加了这个三人小组，逐渐发展成一种夏令营。这些青年心忧国家、关心未来，他们把苦难当做一种训练，为即将到来的改造国家的社会的斗争而“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青年毛泽东最初写的一首很有名的诗句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1917年中秋节，他们在一起讨论是政治还是教育才是救国良方，毛坚持必须战斗。

从毛的朋友张昆弟的日记中，可以窥见当时这些身体锻炼和思想辩论的热烈场景。

“1917年9月16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

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湖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待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在几周前另外一篇日记中，张昆弟描述了他夜宿蔡和森家的情况，毛也在蔡家度过很多愉快的夜晚。日记中说：“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毛此时雄心勃勃，要改造中国，要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一个新社会，他的朋友说他“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然而中国的形势，尤其湖南本省的形势正在日益恶化，帝制推翻后，政治力量两极分化，封建军阀在北京建立政府，占据北方，而孙逸仙领导的共和派则以广州为中心，南方为基地，与北洋军阀分庭抗礼。中国的军阀混战“引狼入室”，军阀各自勾结渴望在中国立足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沙的湘江河里，游弋的是列强的战舰，日本的“太阳旗”，美国的“花旗”，英国的“米字旗”随风招展，河岸上则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国公司的洋房。

战火连年又逢自然灾害，民不聊生。1915年有四条江河包括湘江，洪水泛滥，人死无数。土匪趁机烧杀抢掠，强奸妇女，绑票勒索。湖南遭遇了几百年未遇的大劫难，人们看不到一线光明和希望，“中国将亡，中国将亡”的论调随处可以听到。

毛和他的朋友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对中国的前途仍然抱有信心和责任感。他们在1917年下半年受到了托尔斯泰的巨大鼓舞，他的《俄国的伟大精神》一文以及他对世界和平与博爱的向往激励着毛和他的战友们。张昆弟9月23日的日记说：“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毛在读了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所写的批评中也阐发过这种思想：

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1917年8月在写给北京学者的信中，毛阐述了中国哲学之必要，这不是简单的西方来取代的问题，因为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也已表明，它不能解决人类的问题，因而东、西方的思想都应利用。“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有一次在第一师范与耶鲁预备学校（由海外华人资助）进行足球比赛时，毛突然从观众中跳起来大喊：“揍这帮洋奴！”

1917年，毛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两年后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体育研究部部长，他认为“学友会”应注意学术研究和体格锻炼。为此“学友会”设立了15个部，包括手工、拳术、剑术和竞技等。他甚至还提出设立合作社性质的营业部，但校方不同意。

毛主张各部部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不要像过去那样由教员担任。他认为四五年级的学生就要毕业了，应培养主动和管理的能力，根据毛的建议，“学友会”通过的决议有发表学生成绩，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设立图书馆，征集资金等。



>>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其目的是要求学生在下课之后或在晚上，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或体育活动，以进一步培养他们的品格和技能。这样大的一个学生自治组织在湖南历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显然毛泽东功不可没。“学友会”

举办公开的辩论会、学术研讨会和演讲会，并组织体育运动会和旅游，为在雨天提供活动场所，毛还在学校设立了乒乓球桌。

“学友会”的会议通常都由毛泽东主持，他的半官方传记作者评论说：“在大家争辩激烈时，从不轻易表态，等到大家意见发挥已尽，他才从容作出总结。他的总结总是取长舍短，斟酌尽善；对于一个问题，一种争论，总是分析深入，抓住要害。所以大家都心悦诚服。好些争论即因他精切简当的剖析而得到解决。

毛这时与许多城市的学者和学生建立了通信联系。毛后来回忆说：“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当时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建立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所有这些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新青年》的影响。

新民学会是根据1915年某天晚上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的灵机妙想创办的。1918年在蔡和森家举行了一个会议，正式宣布成立新民学会。那天是星期天，出席会议的13个人，除了毛和蔡外，还有何叔衡、陈昌、罗学瓒等人。他们都推举毛当总干事，但毛推辞了，最后担任副干事[(5)] 。一年以后新民学会的成员超过70人，大多数是优秀学生和进步教师。

新民学会甚至还有一些女会员，包括蔡畅，即蔡和森的妹妹，这在那个时期相当不寻常。妇女地位是新民学会从一开始就关心的问题。学会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会，由毛主持，讨论学术或政治问题。据说，有时候，某个问题的讨论持续一个星期。

毛泽东起草了学会的章程，宣布学会的宗旨是改造中国和世界，同时规定：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反对其他不良行为。毛在

1918年吸收进新民学会的数十名会员，后来多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毛派集团的核心成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6]。

除此以外，毛还负责开办了一所夜校。夜校是1917年第一师范的教员开办的，但未能坚持下去，学友会后来接替了这一工作。毛把开办夜校视为扩大学校影响，使其越出校园的重要手段，同时创办夜校可以创造某些一师所缺乏的东西，对一师毛常感到厌烦。有天早晨他对一个朋友说：“昨天晚上我差点退学，我三次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口，准备提出退学申请。”

夜校面向邻近的产业工人招生。招生广告是用白话文写的，这在当时也是新鲜事物。招生广告通过警察所张贴出去，但仅有9人报名，因而毛组织一批同学带了600份广告，深入到住户区进行张贴宣传，结果3天内就有120多人报名，后来又不断地有人来报名，最后不得不截止报名，毛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当时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如嗷嗷之待哺也”。

招生广告是毛泽东写的：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是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

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湖南成为南北各派军阀混战的场所，几乎每年都有各家军队进入大城市招兵买马，烧杀掠夺。毛在1913年、1917年和1918年亲眼目睹了一系列兵祸。来往的军队占学校为军营，因而学校教学常被打断。第一师范有大量的宿舍楼，又紧临铁路，也就成为军队经常驻扎的地方。毛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第一师范就被占过3次。

1915年临时军事当局颁发文告，指责学校的政策，教员和学生都非常愤怒。毛以“学友会”的名义，把以前一些重要学者的文章集成小册子，抨击弊政。同学们都这样赞扬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军方派警察到学校搜查，连学生的书籍、行李都被搜遍了，但因为毛事先做了准备，结果并没有查到什么。

1917年当军队再度逼近长沙时，毛领导全校学生志愿军“分夜逡巡，警卫非常”。他们用的武器是一些上操时用的木枪。军队即将进城时，毛从地方警察局弄到了一些真枪，领人在校后守卫。有一段文字记载说：

“胆小的同学和教职员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地板上，一动不敢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都听从‘学友会’总务毛泽东的指挥。待王部[7]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距离伏地不远时，他就命令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爆竹，齐声呼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

结果溃军把枪缴了，并由地方商会出钱遣散了。第二年当长沙又被侵入时，毛泽东又领导同学们组织“警备队”，并和其他学校联合，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秩序，还组织了一个“妇孺救济会”，到街头救济受兵灾的妇女和儿童，毛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搞军事。他感到这不是最后一次。

毛后来回忆说：“我在……1918年毕业。”5月底，他把“学友会”的工作移交给了别人。他认为，在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经验的。

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在1918年他毕业离校时，“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关于在长沙所受的学校教育，毛一直持严厉的否定态度。在将近50年后，他回忆总结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时说：

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7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5年师范，2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

把国家的、社会的问题同教室、走廊和长沙的山水、田野分离开来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毕业后，毛就立刻面临更困难得多的挑战，这就是寻找实现那牢牢扎根于他头脑中的理想的途径。

4　转 变（1918~1921）

毛泽东毕业时24岁，但在自由等待工作的新生活的最初几周内，他过的仍是一种他喜欢的浪漫生活，他和朋友们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和过去一样用蚕豆拌米煮饭吃，赤脚上山捡柴，到很远

的地方挑水。其余时间则读书讨论他们的未来计划，有时也到爱晚亭上远眺，去岳麓宫、禹王坟凭吊。

1918年夏，毛又徒步游历了湖南。这次是和蔡和森一起。一条毛巾，一把雨伞，一双凉鞋就是他们的全部行装。他们俩用两个月的时间调查各村各乡的风土人情、农民生活、租税情况，了解地主与佃农和无地农民的关系。调查途中，他们常常露宿野外，以山楂野果为食。毛和蔡很快就成为新民学会中亲密的伙伴。

同时，新民学会的会员也开会讨论自己的前途，提出了出国留学的主张。毛在会上说："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去什么国家，然后是怎么去。我们要把每件事都组织得十分周密。我认为我们分开到各个国家去留学最好。主要是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

杨昌济教授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给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现在青年人中出现了去法国的新浪潮。毛回忆说："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

毛热情支持赴法勤工俭学，实地了解俄国和欧洲的革命真相的主张，因此他和蔡和森开始组织湖南省的进步青年参与这一运动。蔡和森在6月底去北京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并与各方面进行联系。蔡到北京后回信敦促毛泽东速去北京，和他一起领导实施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又说杨昌济教授也希望毛到北京，就读北京大学。



>>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为翌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左起：萧三、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

9月，毛泽东决定到北京去，和他同去的还有20多名自愿赴法留学的青年[8]。那一年黄河涨水，冲断了铁路线，火车在河南郾城附近停运。毛利用候车的时间走访了附近的村庄，考察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毛泽东和同伴们抵达北京时，湖南自愿赴法的青年已有40多人，比任何省都多。就连毛的老师徐特立虽已年过40岁，也放弃了在湖南的教授职位，志愿赴法。

毛特别注意鼓励女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在长沙，他组织了一个“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这其中蔡畅是毛最要好的朋友蔡和森的妹妹，后来嫁给中共副总理李富春为妻。值得一提的是，蔡畅自己回忆说，她和她的哥哥和毛一样，在那时都表示反对婚姻，宣布他们决不结婚。

当一群湖南女青年，包括蔡畅以及她哥哥的未婚妻向警予即将赴法时，毛认真地对向警予说：“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

人，即多救一人。

在北京时，毛和萧瑜以及其他两个朋友应杨昌济教授的邀请，最初住在豆腐池胡同杨家新宅，但不久就搬到了邻近北大的三眼井胡同。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来自湖南长沙新民学会的8名会员就挤在两间租来的房子里，其中一间作书房，另一间作卧室。

床是北方的炕，用砖垒起，底下烧火取暖。但8个湖南学生生不起火，所以8个人只好挤在一块儿，以保持体温，抵御北京冬天的严寒。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他们自己在一个小炉子上做饭，大家挣钱，大家花。8个人只有一件大衣，所以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们只好轮流穿着大衣出去。到了年底，他们有了3件大衣，但毛一直没有设法替自己买一件。

然而这个住处地点特佳，对毛和他的朋友工作和学习都很方便，他们可以随便去北京大学听课。罗学瓒在给家里写的信中说，他们“皆敦品力学之人，侄素所钦佩者，朝夕与处，时有受益”。

尽管经常锻炼，毛的身体并不太好。毛在北京的一个朋友说，毛那时还在咯血，可能染上了肺结核，因而坚持要和别人分筷吃饭。他的脚底曾受感染，在医院治了一个月。

尽管条件艰苦，但“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毛后来回忆说，在公园和故宫的庭院里他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最后虽然毛被邀请赴法，但他选择留在国内。对他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决定，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拒绝一个上升发展的机会。他后来解释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向他的老师徐特立解释他留在国内的原因与此稍有不同。

“毛具体研究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徐特立后来说，“得出结论认为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知识领袖要取得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必须密切联系这个国家的公民。就因为这个原因，在大战结束后当我邀请他和我同去法国时，他拒绝了。他更愿意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而不是去法国。

毛对他的同学、朋友谈了4点他留下来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显然是由于资金问题。他一点钱也没有，尽管路费大大减少了。但200元钱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他知道没有人能借给他这么多钱。第二，语言上不能过关。在学校时，他甚至连最简单的英语发音都没有掌握，更不要说学法语了。第三，他觉得留在北京不仅可以继续学习，而且也可以为新民学会招收新会员，并且可以在北京为那些去法国的人充当可靠的联系人。最后，他明白自己是个行动者，自己的未来发展在政治组织上，而不是在学问上，所以他对为学习而出国并不真的感兴趣。学习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

对于那些他不很了解的人，毛首先强调他年龄太大了，那时已25岁了（其他人的平均年龄是19岁），其次说他外语能力很差。但真正的原因，也许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虽然7年以后毛写的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有所披露。毛指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又在资本主义化的城市里学习的学生只能扮演“半身土气半身洋气的角色”。毛害怕法国之行会使他在文化上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因而失去

了他自己国家普通老百姓对他做领袖的支持。他也感觉到在外国环境下，他就不能在他的同伴中出类拔萃。

其他人也同意毛留下来，萧瑜和蔡和森曾就他如何能在首都生活下去讨论过好几次。他们正在北大吸收新民学会会员，因此毛最好的去处就是进北大。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想到教室清洁员的工作，因为教室清洁员做完他的工作后，还可以旁听。北京大学确实需要一个人在课后擦黑板、扫教室。这项工作很轻松，而且还可以经常接触到教授和学生。"但是毛怎样才能得到这样一个工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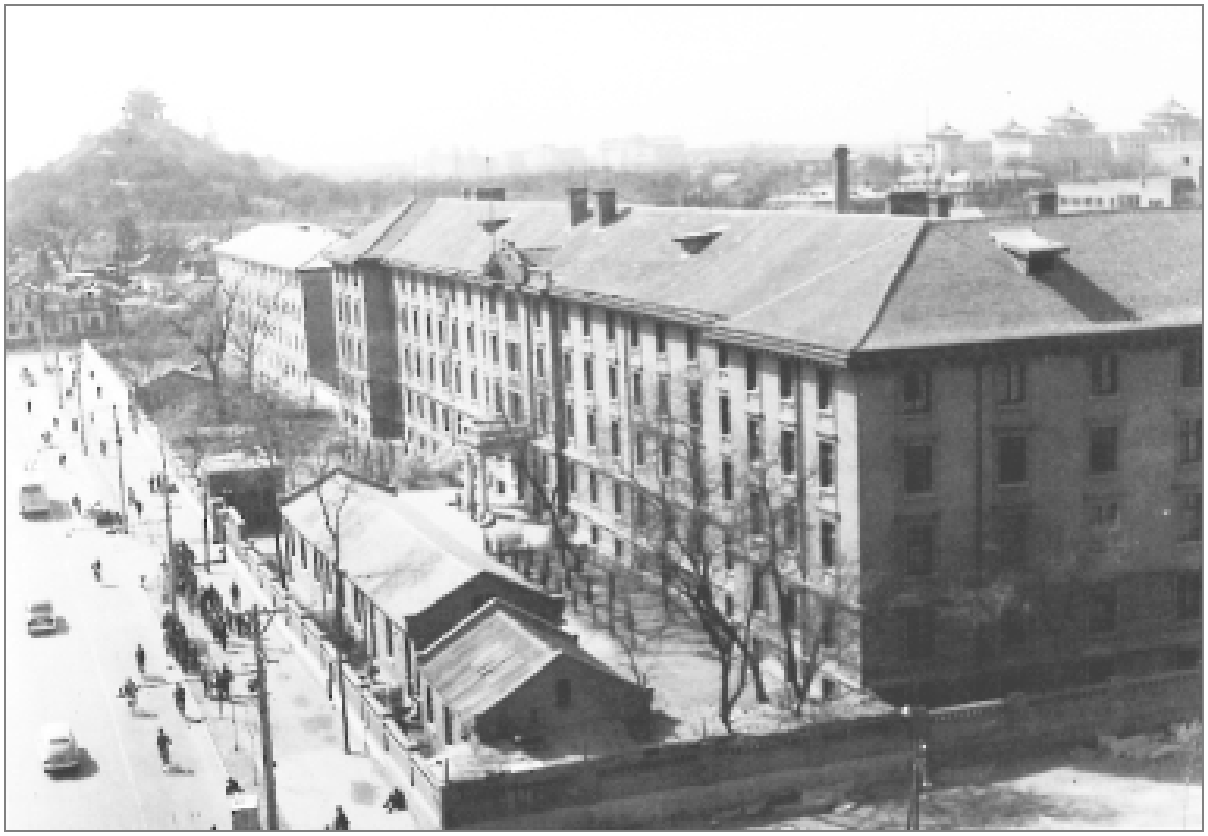
他们去找校长，这位校长当时正密切注意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他给他们写了一个条子，让他们带着去找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条子上说："毛泽东为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工作，请将他安排在图书馆中……"李大钊恭敬地照办了，给毛安排的工作是打扫图书馆，整理书刊杂志。

萧瑜回忆说："这完全是蔡校长帮忙的缘故，因为李大钊身居高位，是不过问用人之类的小事的。"几年后，李在回忆这件小事时还有点发窘。"我收毛泽东做清洁工作，"李大钊告诉萧瑜说，"完全是遵守蔡校长的指示。我并不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希望你能原谅我。

李大钊过去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曾给毛以巨大的鼓舞，又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现在毛发现他就在隔壁房间里。毛回忆说，他当时"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那时一个月五六块钱就够吃饭，但毛仍非常节省，只在晚上吃顿饭，而且只吃土豆和花生，从不吃肉，也不吃青菜。对多数人扔掉的北京大白菜帮子，据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吃法：加盐煮。

如果毛希望通过他的工作之便结识当时的一些知识界巨人的话，那他就会失望。毛抱怨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

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图书馆的人中，毛泽东认出了一些文学和知识界头面人物的名字，毛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 北京大学红楼。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期间，曾在这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当时的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后来回忆说，毛要求去听他的课。胡评论说，在作文方面，他很出色。但另有一个传闻说，有次胡适上完课后，毛想向他提一个问题，胡适拒绝了，因为毛不是他的正式学生。

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政论作家李大钊是北大两位激进领袖，也是无可争辩的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

绍到中国的人，但他们在毛第一次默默无闻地进北京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和过去一样，毛受到了那些表面上是他前辈的人的冷遇。这也正是毛的生活哲学：越是被人视为粗俗的乡巴佬，遭人鄙视，他越是坚定了通过艰苦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强行对社会提出自己的要求的决心。

他在北京的时间并没有完全荒废，他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这些圈子里，他认识了一些人，诸如张国焘，后来成为他争夺共产党领袖地位的对手。

他在首都最好的朋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3个湖南籍的室友，还有一个学生。但这4个人都没有成为共产党，尽管他们也都赞成群众运动和革命。他们介绍毛阅读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和托尔斯泰的著作。

他在北京的时候正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逐步深化的时期。30年以后毛宣布：“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18年10月毛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但更广泛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也是组织者之一。这时毛自己读的书基本还是传统主义者的著作。他告诉他的朋友，他读了许多史书，特别是司马光的古典著作。

但毛最感兴趣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他赞同马克思主义以理性和唯物主义为前提，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定性以及它对人类平等和尊严

的肯定，而毛最为赞叹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信条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当时中国毛那一代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

第二年2月，就在毛离开北京之前，李大钊的文章《青年与农村》发表。其中一些话一定深深地打动了毛，文章特别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毛自己承认正是在北京，他第一次产生了爱情。他说：“也正是在这里，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但他们第二年才结婚。

1919年初，毛陪同赴法的学生去上海，他们要在上海乘轮船。毛记得：“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向前走。”但又是由于运气，他从另一个同学那儿借了20元钱(9)，使他能够继续去南京。这次华北之行，使毛饱览了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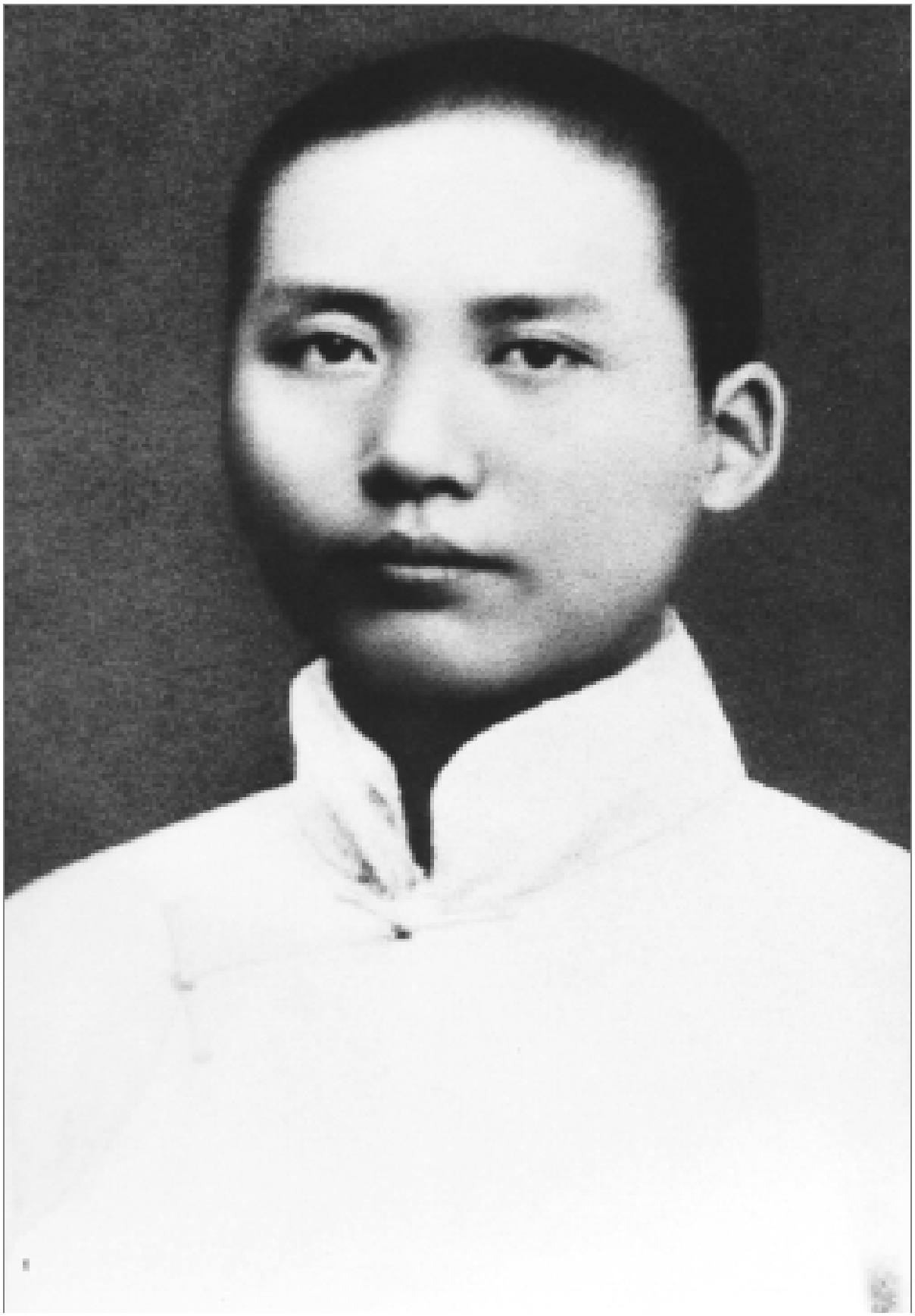
“我在北海湾的冰上散步。”他骄傲地回忆道，还环行走过保定府、徐州和南京的城墙。“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毛看到相传是孔子亲手栽植的那株有名的树，并且看了孟子的出生地，他还登了中国最有名的五岳之一，山东的神岳泰山。

这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国内的动乱和凡尔赛和会上中国在国际上的命运感到焦虑。日本公开收买中国代表团，以谋求日本在中国的特权的继续存在，其他战胜国更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伍德罗·威尔逊所鼓吹的自决难以实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北京自发产生的抗议内忧外患的学生运动，当时毛正在参观他自己国家的圣地—显然他从中汲取了营养。

从南京起，“我……又不名一文了，我也没有车票。”这次没有人借给他钱，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继续前进。“可是更糟糕的是，我仅有的一双鞋子被贼偷去了！”好运又一次解救了他，他在火车站外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这个人借钱给毛买一双鞋，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到了上海，毛了解朋友们到已经募集了大批款项，不仅可以送学生到法国去，而且他还可以回到长沙。

学生们3月下旬乘一条日本轮船走了，毛送他的朋友上船后就起程返回长沙。在长沙，他寄宿在这座城市对面的河边，重新开始了一天一顿蚕豆加米饭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他回湖南后的一项任务是维持新民学会的联系。许多会员当时正在欧洲各地学习，他建立了一个每月通信制度，印刷、发送在法国的会员们给他寄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信件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在毛的编辑下，最后出版了三卷通信集。



>> 1919年，在长沙时的毛泽东



>> 1919年，毛泽东三兄弟与母亲在长沙合影

然而，这个青年社团的团结不可避免地难以持久。大部分会员和毛一样都很革命，他们不满现状，但也出现了一个改良派，主张从现实出发。还有一个中间派，他们左右摇摆，没有确定的思想。后来，当共产党在湖南正式建立组织时，新民学会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会员—但不是全部—参加了这个新党。

毛开始应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在修业小学教历史。作为一个单身汉，他住在学校里，仍然只有几件极简单的行李："一顶农家用的老蓝夏布蚊帐，一床席子，几本书作枕头，经常穿的是一件洗得不蓝不白的竹布长衫。"在25岁的时候，毛终于开始挣钱了。

小学的生活几乎谈不上享受，当了几个星期的教师后，毛在一篇长文里给教师的命运画了一幅像：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笔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成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克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

接着个人的不幸又接踵而来。毛从上海迅速返回的一个原因是他母亲病了，1919年10月他母亲去世，死于急性扁桃体炎。毛写了一篇《祭母文》：

…… ……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头脑精密，擘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尽管他有教学任务，但毛仍投入湖南的组织工作。在1919年6月和7月的5个星期内，他帮助建立了3个协会，都和改革有关。

但毛对湖南政治舞台作出的独特贡献是通过办报实现的。7月14日出版了学生联合会创办的第1期《湘江评论》，毛是《湘江评论》的主笔。《湘江评论》是一张四开的报纸，第1期很快就卖出去了，第2期印了5，000份。在《湘江评论》上，毛对湖南的进步读者介绍了西方工会和工人罢工情况，揭露了西方列强在凡尔赛和会上的分赃行动。他谴责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是“一类的强盗”。

用毛的中国传记作者的话说，《湘江评论》每期付印之前，“约好的稿件往往不能集齐”，于是毛只有自己动手多写一些。在溽暑和蚊虫的侵扰下，他“常常写到半夜之后，早晨一起床，来不及洗脸吃饭，就到教室教课”。《湘江评论》第1期的几乎全部、第2期的三分之二、第3期和第4期的各一半稿件都是由毛泽东执笔的—他不仅要写稿、审稿，而且还要当编辑、看校样。毛甚至有时还上街卖报。

《湘江评论》第2期开始连载毛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是《民众的大联合》。就在这篇文章中，毛最早提出了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敦促他的同胞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建立农民组织和工人组织。文章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的黄金世界，光辉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震惊了长沙政府，只出到第5期就被查封了。毛立刻又接手主编另一份报刊《新湖南》，这是一份地方学联的周刊，不久也被当局查禁。

这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学生恼羞成怒。9月他召集学生代表训话，指责学生干预政治，特别是扰乱了政府的对日政策。他威胁说，你们要是不听，我就砍你们的头。面对他的威胁，一个女生吓得哭了起来，就在她身边的毛要她不要理睬张的恫吓，只当狗吠。

毛在文章中就妇女地位问题慷慨陈词，特别对贞节的双重标准—妇女失贞，导致自杀，而男人乱性却无关紧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就此问题在《女界钟》刊物上撰文，他的长文《民众的大联合》中也有这一段：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

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哪里?

1919年11月14日长沙发生的一件事轰动全省，也使毛泽东大为震惊。一个姓赵的眼镜店老板按照传统的媒人说合，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邻近一个富裕的古董商的儿子。这个姓赵的女青年对婚前只见过几面的新郎非常不满意，她要求解除婚姻，但不被理睬。婚礼那一天，不幸的赵小姐被强行推上花轿，送往新郎家。在花轿中，她抽出剃刀割颈自杀。

这一自杀事件轰动一时。一家地方报纸评论说，这个可怜的女青年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两天后毛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评论这一自杀悲剧的第一篇文章。他在该报共发表了9篇文章，登了两个星期才登完。

毛的文章指花轿为“囚笼槛车”，他进而提出了其他批评，说不仅新郎、新娘的家庭应对赵女士的死负责，罪恶的根源还在社会。他宣称，青年人应该鼓足勇气自己站起来反抗老一代对他们规定的种种框框。毛鼓动说：

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

毛不赞成赵女士的自杀，“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即不应反其道而求死……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

毛在赵女士事件中表现的激情，能否说是他因违背他自己父母为他安排的婚姻而生出的负疚感的一种反应?

驱逐万人痛恨的长沙督军的运动在12月2日达到紧要关头。这一天学联藐视张敬尧的命令，公开举行焚毁日货大会。学生们事先调查了破坏抵制日货的商店，清理出了大批日货布匹，运到中心广场焚毁。但张督军的弟弟带领大批武装军警冲击会场，袭击学生领袖。

当晚毛召集新民学会全体会员和学联领导人开会，他说人民对张敬尧的愤怒已到极点。华中其他军阀也反张，张已成孤家寡人，现在是驱张的好时机。

学生们酝酿二三天内总罢课，并组织驱张代表团，到中国各个中心城市包括北京进行宣传和外交工作。1920年初毛负责领导前往北京的驱张代表团，长沙商会为代表团提供资助。

但毛的行动也不完全是政治性的。1月17日，他尊敬的杨昌济教授在北京去世。毛的朋友萧瑜认为，在北京冬季仍坚持冷水浴的斯巴达式的习惯可能导致了杨的死。讣告是由毛和其他杨先生的学生起草的：“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积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无疑毛要利用这次待在北京的机会帮助料理杨先生的后事，包括杨先生女儿的未来问题，从她那里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

但是毛没有直接去北京，他和他那个驱张代表团在武汉停了一段时间，并起草了驱张宣言送交当地报纸发表。他还组织了一次宣传活动，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拍到了由张敬尧的家人送给张的20多袋鸦片烟种子的照片。照片见报后，张名声更臭。毛还和湖南学生组织了一次驱张运动群众报告会。

第二次进京时，毛住在北长街99号一座喇嘛庙里。他忙碌地进行反张宣传，参加2月4日的赴总理府请愿，尽管请愿没有结果。毛还领导一个通信社，宣传不仅要反对张敬尧，还要全面反对军阀统治。他参加了由李大钊等人组织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组织“少年中国学会”。

毛不断地给他在长沙的同志写信，报告北京的形势，并对他们在湖南的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建议他们组织“赴俄旅行团”，考察和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他再三敦促新民学会发展成一个有统一思想的军事组织，认真制订和执行在长沙活动的二至三年计划。

在北京，毛还利用时间大量地读书，特别是刚在北京出版的新翻译来的共产主义著作。他后来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如果说毛到北京来是为了向去世的教授告别的话，他又遭受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很沉重，但对毛来说可能无关重要的打击：3月他的父亲死于伤寒病。40年以后，毛重回故乡时回忆起他的双亲。毛说，如果是现在，他们就不会死了。但即使毛对他父亲的去世毫不在意，他也有责任在家庭失去顶梁柱后对家里其余的人进行尽可能妥善的安排。

毛还谈不上是直接打道回府，而是一路拖延。他先到上海，后到衡阳。他不得不卖掉唯一的冬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在上海，他靠给人洗衣服谋生。他写信告诉长沙的朋友说，洗衣并不累，但来回得坐公共汽车收衣服、送衣服，挣的许多钱就这样浪费了。

他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长袍到码头为另一拨从黄浦江乘船去欧洲的湖南学生送行。但他在上海有许多事要干，所以轮船刚一开动，他就往回走。

他和《新青年》主编，后来成为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的陈独秀讨论他的朋友们提出的改造湖南的计划，也讨论刚刚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毛评论说：“当时的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然后，毛去了衡阳。在衡阳，他和以前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老师易培基有过晤谈，这个人现在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国民党是孙逸仙领导的中国非马克思主义的共和与民族运动的政党。

毛不在湖南时，张督军被其他敌对军阀赶出了长沙。他的被逐使湖南人欢欣鼓舞，人们纷纷议论怎样充分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南北军阀都在等待时机夺取湖南这块地盘，因此当时地方主义思想抬头，想建立湖南自治，湘人治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也有人提出民主口号，要求实现民治。新强人谭督军假装支持这些主张。

毛当时仍在省外，但他密切注意湖南的形势发展，帮助他的同志准备一个评述湖南面临的几条道路的文件。提出废督、裁兵；乡镇自治；银行、工厂民办；建立工会、农会；保障言论、集会自由。 他会见在外地的湖南各阶层人士，就这些主张和他们展开讨论。

在卷入长沙的这些事件之前，毛回到韶山。“在我的老家安静地休养了3个星期。”无疑他和家里人讨论了如何管理农田的事—他现在成了地主！—如何让他弟弟和妹妹上学。毛现在是一家之主，由毛照料的其他三个人后来都跟着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

当回到长沙时，他自己的知识与文化发展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他后来回忆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

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他从北京带回长沙一些共产主义书籍，并在7月他创办的文化书社中散发。杨教授的遗孀在女儿的劝告下，把北京大学发的抚恤费给了毛泽东，资助他创办文化书社。毛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说：“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毛帮助筹集资金，从长沙社会各界争取赞助，甚至还说服新督军题写了“文化书社”四个大字。

8月2日在毛任教的小学借了一间房子，举行发起人会议。毛是27个投资者之一，他们一共捐资519元，又是这次会上推举出的3个负责人之一。他任书社的“特别交涉员”，通过建立遍布全省的可靠的进步代表网而保证了书社的初期成功。因为书社是营业性的，可以借钱，所以就保证了毛和他的同志在从事政治活动时随时可以用钱。但毛坚持书社要严格记账，账目清楚。书社在一幢旧湘雅医学校所有的大楼里租了几间房子作社址。

毛在创办文化书社时的亲密合作者是故去的杨昌济教授的最有才华的女弟子陶斯咏女士。毛和陶的朋友萧瑜称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女子。

尽管毛给湖南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但湖南同志的活动安排仍具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性。毛回忆说，新民学会的纲领是“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由于对于北洋军阀政府感到厌恶，同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同北京分离”。毛补充说，“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毛很快发现自己处于因张督军的压迫而中断了的各种活动的中心。学联重新开始公开活动，新的激进团体也出现了，毛和他的朋友

组织了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他们在7月[10]发表宣言，阐述他们的目标：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陵侮，据湖南为地盘，刮民财归己橐……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在此期间，毛泽东得到了提升，从一所小学的一名卑微的低级教员成为另一所学校的主事。这一好运应归于他几周前在衡阳见到的一个过去的老师[11]，他现已返回长沙，并担任师范学校的校长。他指定毛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毛第一次当上了校长，第一次领到了很像样的薪水。他在秋天开始任职，既教古文，也管理全校事务。

在写给北京同事的信中，毛强调湖南的自治运动只是暂时权宜之计而不是根本的方略。但如果自治能使改革派改善这一地区环境，那也对将来有好处。

毛在9月16日[12]写道：“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惟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第二天毛写了一篇长文，论述湖南在过去几百年各个王朝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指出湖南现在应该“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从湘人自决开始，广东人、四川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国人也来仿效，实现自决。

10月，将近一万人冒雨游行，要求建立民主政府，毛泽东就在游行队伍的前头。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使湖南改革派与反对改革的长沙督军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严重关头。谭督军假意接见了游行领导人，表示接受他们的意见。但声名狼藉的旧省议会的旗帜仍在招展，于是有人爬上去把它扯下去（谣传说是毛干的）。这给新督军以镇压的口实。

“从此以后，”毛回忆说，“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几周后“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我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导。正是在组织工人的活动中，毛实现了另一个更大转变，即克服了过去蔑视劳动的思想。1942年他在一篇重要讲话中论述了这一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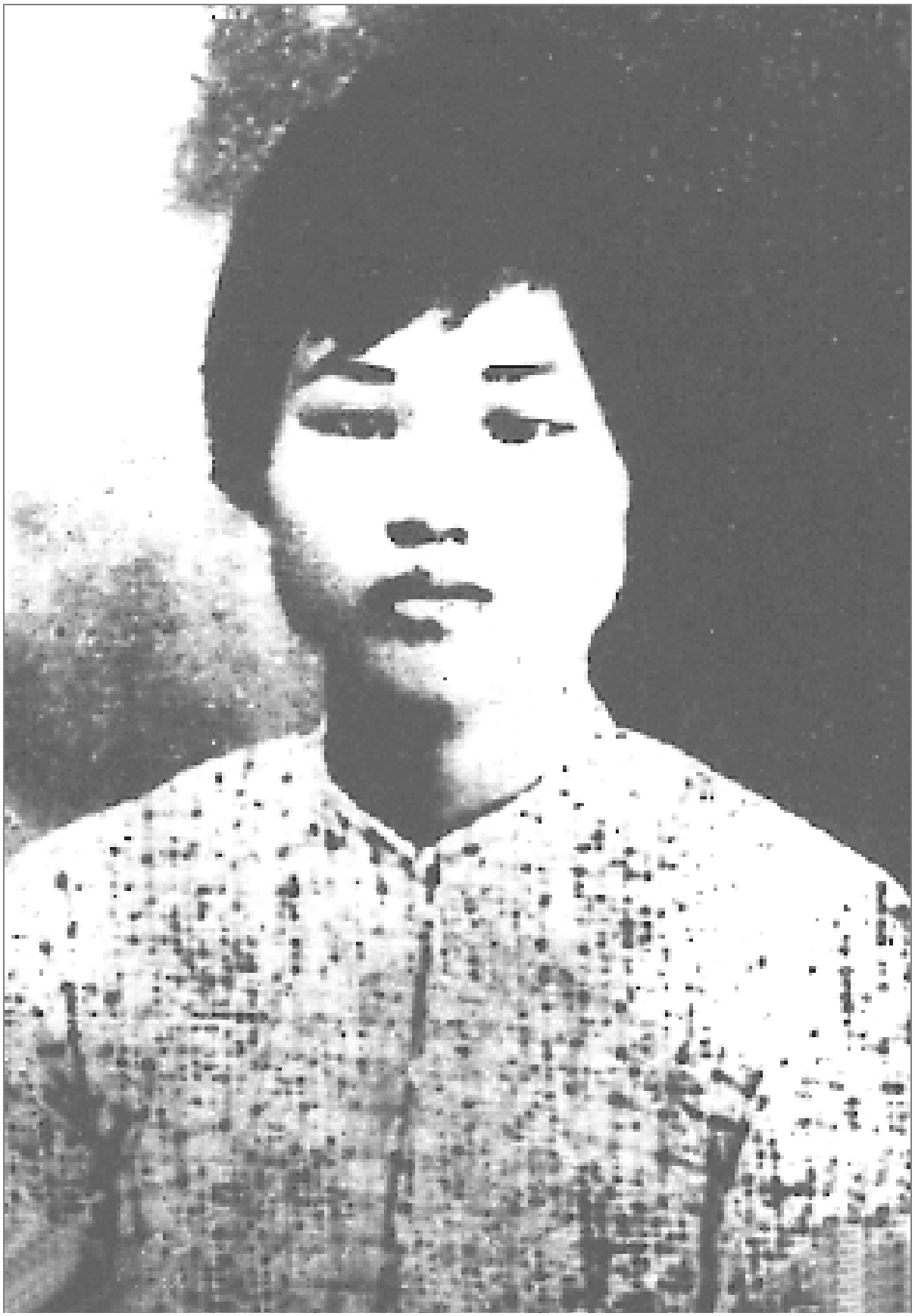
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了，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在实际的组织活动中逐渐形成。1920年夏天毛收到了他的老朋友蔡和森接连寄来的信。蔡当时在巴

黎附近的蒙达尼学院读书。8月，他写信给毛，敦促毛在中国组织一个共产党。在法国的14位中国同志已经举行了5天的会议，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蔡和森为首的革命派，另一派是改良派或称渐进派。两派都给毛写来长信，争取毛的支持。很容易猜测毛会支持谁。

毛已经在长沙发起成立了一个俄罗斯研究会，还制订了一个赴苏俄勤工俭学计划。毛在收到北京和上海的马克思主义同志寄来的会章后，于九、十月间在长沙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几个星期之后，他又在湖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共产党的先驱。

湖南改良派的困境通过一个最不可能的形式而达到顶点，这就是年轻的英国贵族贝特兰·罗素访问长沙，这个英国哲学家在中国讲学一年。作为他在省城游历的一部分，罗素于10月间来到长沙，他在毛反对的督军举行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来长沙演讲联邦主义）。



毛听了罗素的演讲，后来告诉他在巴黎的朋友说，罗素“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严厉指出，这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在这种思想上的大变动中，毛和去世的杨教授的女儿杨开慧结婚了。确切的日期不清楚，可能只是被当做自主革命者之间的一种个人协议。在当时湖南激进的青年中被誉为“理想的爱情”。杨女士当然是一个很出色的女子，一个好学生。

杨身材小巧玲珑，有张圆润的脸庞，眼睛不太大，眼眶深眍。皮肤很白皙，全没有继承她父亲那样的黧黑。据说她的容貌像毛的母亲。在1919年和1920年她已经在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工作。在她自己的学校福湘女子中学，杨开慧是女才子。尽管那一头短发增添了她的吸引力，但守旧的人仍然很看不惯。由于她的激进名声在外，许多学校不愿要她，最后她只得进了一所基督教会学校。

毛第一次结识杨女士可能是在他到长沙杨父的寓所拜访的时候，但这并没有完全得到他们两人的朋友萧瑜对这些拜访记载的证实。看望杨昌济教授一般是在星期天，多半是为了和他讨论什么问题。在饭桌上，杨的夫人和女儿与他们同桌吃饭。

“她们进来时，”萧瑜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礼节性地点头示意。谁也不说话，整整两年，每个星期我们都是飞快地、一声不响地埋头吃饭。我们一句话也不说—有时候我们的目光也会碰在一起，特

别是当我们俩同时从一个碗里夹菜时。我们只是眉目传神，笑都不笑一下……杨先生吃饭时一言不发，我们都尊重他的静默……那种气氛使人联想起教堂里的默祷。杨先生十分讲究卫生健康，但显然没有意识到边吃边正常谈笑有益于健康，没意识到欢快的气氛有助于消化。

后来杨教授让他的女儿也参与讨论。

这时毛的忙碌的生活历程第一次出现了一段空白。整个1921年上半年毛自己记录的具体活动很少，可以假定毛是避居了一段时间，和他的新婚妻子（可能还有他的第一个儿子）待在一起，后来才重新开始政治生活。

3月，萧瑜从巴黎和北京返回长沙。这年春天毛和他的这位老朋友谈过很多次，他们显然已经出现了思想上的分野。毛的兴趣已经从新民学会转到了共产主义。他对萧瑜说：“如果我们要进行改造，就必须来场革命！如果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学习俄国！列宁的共产主义是最适合的制度，而且是最容易学习的。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同我们一起踏上这条路。

但萧瑜反复讲自由的必要，说不能盲目地模仿苏俄革命。他们常常彻夜长谈，有时因不能取得一致而相对流泪。

萧瑜认为人就像一辆黄包车一样，跑动起车靠两个车轮—自由和共产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拥护社会主义，但没有自由的车轮，这辆车就需要借压迫人类来维持平衡。

毛说：“是的，压迫是政治的精髓。如果你压迫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归根结底，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萧利用经典的自由无政府主义来反对善意的命令主义。毛反驳说：“如果领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执行计划，就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拥有的权力多，事情就比较容易办。为了改造一个国家，国民必须刻苦自励，并且需要作出牺牲。”

萧则宁愿没有牺牲来获得后代的幸福，但毛回答说如果人们计较这类事情，那么社会革命的理想1000年也实现不了。萧说他能等那么久。

毛说：“对于你愿意等100年或1000年，我非常欣赏。我却不能等，我希望更早一些实现我们的目标。

争论继续不断，谁都不愿让步，直到1921年7月上海会议前夕两人还在争论。这次会议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代表。

萧瑜回忆说：“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谈到黎明，毛泽东仍在说服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会议。

毛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共产党在30年至40年的时间里，就能统治中国。这个预言相当精确。

那一天乌云密布，山雨欲来，这两个朋友和另一个共产党会议代表何叔衡从西门乘船离开长沙。木船通过中国中部的湖泊到达武汉，最后到达上海，这两个共产党人没有让他们的朋友送行。毛和萧共处一个舱室，毛睡下铺。第二天早晨当萧瑜走上舱面时，发现毛拿着一本书—《资本主义制度大纲》。

5　未来的缔造者（1921~1924）

萧瑜在武汉留下—他在武汉有些事要办，毛前往上海法租界的一个秘密地点去开会。中国的激进分子试图建立政治组织的企图一般都受到地方政府或军阀警察的追捕。而上海比其他城市安全，因为它由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拘捕令在这里行不通，但即便如此也要避免被外国巡捕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一个马克思主义先驱家的卧室里举行的，这间房子只够坐参加会议的15个人。大部分代表都住在附近的女校里。女校当时是空的，只有一个厨师每天为他们做饭，兼放哨。他们在晚上8点钟开始开会。

他们连续花了3个晚上讨论新创建的党的基础和党章。但第4天晚饭后，当他们准备照常开会时，突然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假装说是找错了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警惕地说，这一定是密探，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换个地方开会。于是，他们都分散走了。他们刚走，一队15名法国巡捕和武装警察就来搜查房子，但扑了个空。

毛回到住处，发现他的朋友萧瑜已办完武汉的事，到上海来了。毛告诉萧，他们决定在上海外边的旅游地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开会，以摆脱警察的追踪。萧同意单独活动。毛已被指定为大会起草报告两个人中间的一个，但这并不是很重要的差使，毛对决定这次大会的主题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毛在这时几乎还没有读过列宁的任何重要著作，新党的领袖陈独秀可能把他看做是代表湖南省的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者。他在长沙为共产党和青年团吸收的成员几乎都是他的同学、学生、前任老师、密友以及他的家人。他和湖南的无产阶级或农民还没有建立起任何真正的联系。但他的派系的核心成员都来自这些私人关系，也正是他们最后统治了整个中国。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出席这次成立大会的其他一些代表记下了他们对毛的印象。张国焘，后来成为毛的政治对手，把毛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很少。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另一个早期共产党同志写道：“他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的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是很难发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这些代表在湖上租了一条大船，买了食物和酒，在集体游湖的名义下躲开了警察的注意，因而完成了建党大会的工作。借着傍晚度假

人多、后来又下雨的掩护，他们的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会后毛回到他的湖边住所，发现萧瑜已在蚊帐里睡着了。

毛摇醒他的朋友，急切地告诉他：“我们在船上谈得无拘无束，你没去，真可惜。”

他们一直谈到天快亮。他们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此后毛和萧不得不通过书信保持他们的友谊，但他们的政治观点仍有分歧。

后来，萧就他在1921年所了解的毛的能力作了如下概括：“首先，我心底认为毛是这样一个人：他费心尽力非常仔细地计划他所要干的一切事情，他是一个伟大的阴谋家，一个伟大的组织家。第二，他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他的对手的力量。第三，他能征服他的听众，使他们着迷。他具有一种说服别人的可怕的力量，很少有人能不被他的话语所打动。你要是同意他的话，你就是他的朋友，否则，你就是他的敌人。”

之后两年，毛和妻子、儿子住在长沙，专门组织产业工会，组织罢工。他还让他的两个弟弟和他在一起，最小的弟弟泽覃还在继续上学。毛后来很歉疚：“我年轻时，对毛泽覃脾气很坏，有一次还操起一根棍子要揍他，只因为他说共产党不是毛家的祖宗堂。”

1921年9月毛和两个无政府主义工人领袖[(13)]走访了长沙以东100英里的安源煤矿。他们三人自称是“参观”，下到矿井，观看了铁路机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既是中资的，又是外资的。矿山通过自己的铁路为邻近的一个铁矿和铁制品提供燃料，前不久整个企业被日本股东夺取。

工厂管理部门有不少外国人，其中包括德国人，他们手持硬木棍专打工人。1.2万名工人怨声载道：受工头敲诈，每天要做工12至15

小时，工资很低，且经常拖欠，而食宿、服装、安全设备以及医疗设施都很差。

毛的第一个反应是为工人子弟开办学校，后来又为工人开办夜校，这都由李立三负责，李就是那个对毛当学生时贴出的寻友广告半心半意的青年。他刚从法国回来，命定成为与毛争夺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对手。

毛1921年搬了家，从船山学社搬到小吴门外清水塘。这是一幢很雅致的房子，原是一个当铺老板修建的。这所房子也作为湖南省委的机关，毛在10月10日的成立大会上担任了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14)。

湖南的共产党成立后，就使用了文化书社的经费。毛发行股票，建立了棉织厂，以便为党提供一部分资金，但由于棉织厂难以同外国厂家竞争，一年后不得不卖了。毛的岳母也给党提供捐助。

在新的一年里，毛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反对长沙暴君赵督军(15)的运动。赵督军在雪天将两个无政府主义领袖（即黄爱、庞人铨）杀害了，毛组织了一个抗议罢工。是年夏天，毛前往上海，争取对反赵斗争的更大支持，同时准备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人民画报

1968 9

>> 1968年第9期《人民画报》中文版封面刊发刘春华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我本想参加，”毛后来说，“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即使说共产党的活动必须保持高度的秘密性，但这件事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插曲。有报告说毛确实见到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以很难想象毛不会从他那里了解到“二大”开会的地点。可以推测说，毛在党内的同志正被其他方面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因而决定不事先全力支持湖南的倒赵运动。也许是他们不让他出席“二大”，也可能是毛出于气愤抵制了这次大会。

然而，毛确实遵循共产党1922年下半年制定的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政策。国民党因为俄国人宣布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不同于西方列强）而对苏俄有好感，孙逸仙对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幻想破灭了。毛参加了国民党，并开始在湖南对它进行改组，要把它改造为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地下党。国民党具有发展为激进政党的潜力，它的党员人数也比共产党多得多。

在9月初，毛又一次来到安源煤矿。按照他的共产党传记作者的话说，他认为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刘少奇被任命为罢工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毛的湖南同乡，刚刚从俄国受训回来，将成为毛的党内同事，后又成为对手。毛一定是从刘那里获得了对苏联的最初的具体了解。他们在毛的清水塘家里举行过多次会议。

经过一些动摇和犹豫后，安源煤矿工人在9月中旬终于举行了大罢工。毛为他们写了罢工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第15天，厂方屈服，答应了他们的一切要求。罢工胜利后，工人正式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转过来又组织了一个合作社，由毛管理。几年以后，当毛离开中心城市去农村打游击时，安源煤矿工人

为他提供了许多战士，煤矿的组织帮助他传递文件，使他和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保持联系。

两个工人后来回忆起毛在这次罢工时的情形说，毛穿一双草鞋，裤子挽到膝盖上面，就像刚刚放工回来。他们经常看见毛穿一件破烂的工作服，背上有一大块T形补丁。和工人一样蹲着吃饭，菜碗放在地上，筷子伸下去就夹菜，毫不在乎。另一个矿工评论说，尽管当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完全从容自若，似乎一切都在安排之中—许多人都这样评价毛在危机时的态度。

毛帮助取得的另一个工人运动胜利是9月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原因是一样的：工资低，又常常拖欠，监工打骂处罚工人，这使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准备充分，罢工得到了全力支持，“一列列火车像死蛇一样，躺在轨道上一动不动”。

不久政府调军队和工贼镇压罢工，工人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军队的刺刀下躺在铁道边上不让货车通过。在这次事件中，有70多人受伤，后有6人重伤致死，“有的人头被劈开，有的人手足被砍断，有的人四指被砍去”。大屠杀更坚强了其他地段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决心，毛通电全国说：“虽日之于韩，英之于印，亦不过如是残酷……”最后政府不得不让步。

同时毛在长沙亲自领导了4，000名泥瓦工与木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营业自由。罢工坚持了近3个礼拜，成为长沙城第一次取得胜利的罢工。毛帮助这些没有组织的个人手艺人组织工会，并通过报纸反映他们的状况，后来在泥瓦工冒雨前往市政府请愿时，毛又走到他们中间。

毛从人丛中跳到市政厅外的大圆花坛上，向工人说道：“我们泥木工人为了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他时不时

吹起哨子，指挥工人喊口号。当官的发现他是领头的，便来捉他，他从几棵树间穿过去，跑到工人队伍中间去了。

市政府当局同意开会讨论工人的要求，毛反映了泥木工人的状况。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一个当官的对他头头是道的讲话感到惊讶。

毛回答道：“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政府又一次作出了让步。

在此事后毛又帮助铅印工和人力车夫进行罢工。毛还兼任过铅印机师和铅印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秘书，同时还在人力车夫夜校教课。与此同时，毛失去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的职位，表面看来是因为他组织工人运动而无法把很多时间用在学校管理上，但也还有政治原因。这时反共活动正在进行，新任督军比他的前任更不宽容。但毛不想失去对教育的兴趣，他已在去年帮助成立了长沙自修大学（他让弟弟在这个学校学习）。1922年底他又协助兴办美国支持的群众教育运动。毛没有薪水后，他的岳母就在经济上支持他。

1922年11月，许多工会组织在湖南开会，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毛被选为总干事。担任这一职务后，毛就同众人痛恨的赵督军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长沙罢工浪潮之后，赵督军散布说罢工只是湖南以外的人雇用的过激分子的滋事骚扰，扬言今后要采取强硬措施镇压工人。

赵的威胁使得一部分工人和他们的代表发生了动摇，毛决定与督军正面交锋。在讨论人们的集会权时，毛引用英国和法国的法律条文

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

后来有人问赵督军，当时毛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为何不加以杀害？赵回答说：“我没有想到他会变得如此可怕。”

但赵督军并没有忘记毛，1923年4月他发布通缉令，逮捕毛。毛暗中对各个组织的接任者交代了有关工作，了结了在城里的事务后才离开长沙去上海，在上海他开始在共产党中央工作。毛的妻子陪着他过这种流浪生活，大约在同时，他的第二个儿子岸青出世了。

毛和他的妻子立刻又南下广州参加1923年6月底召开的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志们都对年初北方和中部军阀屠杀罢工工人感到沮丧。党的领袖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作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依靠幼弱的无产阶级不能取得胜利，需要有强大的同盟者—孙逸仙的国民党就是显而易见的同盟者。

陈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的身份领导工农，以发展成为国民党中强大的左翼力量。毛反对这一主张，指出就湖南而言，产业工人的数量非常少，而国民党或共产党的数量就更少，遍布山野河谷的是农民。如果农民能像湖南的煤矿工人一样组织起来，如果共产党能像国民党那样花大力气做农民的工作，他们就有成功的希望。但马林和陈不赞同毛对农民所抱的热情，而毛可能觉得国民党对农民问题的理解比他的共产党同伴更深。

陈的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也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他一直在组织党的工会工作。他提出了一个修正案，宣布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工人运动和工会应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

就张的修正方案进行了表决，8票赞成8票反对，陈作为主席否决了这一方案。那些反对的人现在都被邀请表明他们的立场。张国焘回

忆说：“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即是说毛拆了张的台。实际上看起来毛只是服从委员会的一般规定。当时毛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处理党的事务并对党的各个下级委员会下达指示。这年下半年毛代替张成为组织部部长，可能就是从这时起就开始了毛与张的个人斗争。不论有关毛在“三大”上投票表决的记录如何错综复杂，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即毛对贯彻实施他所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持积极态度。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就是“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反对北洋军阀的统一战线”。这是毛的话(16) 。

毛在7月和8月再一次来到上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北洋军阀—他们当时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可耻地屈从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要求。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是最凶恶的刽子手。”在谈到烟税问题时，毛评论说：“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毛特别把愤怒发泄到英国头上，“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但这年年底，他又一次乘船到广州，这次是出席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和李立三是出席大会的两个地位很高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后来说，李在发言中批评了国民党，而毛“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

毛清楚地记得在广州听孙讲话以及与他交谈的情景。毛说：“他是一个演说家，一个鼓动家，讲起话来雄辩有力，赢得了一片掌声—他不容别人与他争论，或提出他们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他的话水分很多，油很少。他不讲民主。”在40年后的同一次谈话中，毛还谈起了他的湖南同乡给这个广州籍领导人取绰号的趣事，称孙逸仙为大广孙或大嘴孙。

一个国民党代表还记得一个操湖南口音的人在背后喊叫着要主持人让他发言，说：“本席主张本案停止讨论，即刻会表决！”“他穿一件棉袍，身材中等，面皮发青，态度倔强，一股蛮劲，像一个才到城里的乡下人，一点没有君子风度，不像是个能登大雅之堂的人。我后来查知姓名，才知道他叫毛泽东。

在广州，毛当选国民党的高级职务，所以后来他回到上海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共产党执行局工作的同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委员。在后者的工作中，他的合作者是汪精卫（汪后来成为总理）和胡汉民，这两个人是国民党的左翼领导人。李立三嘲笑毛是胡的“秘书”。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认为毛同国民党合作热情太高。

在毛正开展与国民党的联系时，共产党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在毛和李立三缺席的情况下，会议重申要坚持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独立作用，要放松与国民党的联系。但毛仍坚持认为统一战线是共产党的最佳的可行政策。他回忆说：“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担任该校顾问，其他苏联顾问也从俄国来到。国共合作开始具有全国革命运动的规模。”这是夸大的说法。

为两个主人服务实在是太紧张了。1924年的剩余时间，毛又一次没有活动，他说“我在上海生了病”，因而“回到湖南休养”。无疑，他对国民党领导人对他的指责可以不在乎，但要忍受他的共产党同事的污辱那就困难得多，特别是这时他失去了他们当中同情他的李大钊

的支持，因为李当时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去了莫斯科。10月以后这种压力变得难以承受，特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最蔑视他的批评者张国焘被释放，重新进入政治争吵。毛在这段时期继续强调团结农民的重要性，他可能在回家之前就此问题和鲍罗廷商量过。鲍罗廷是最近到上海的俄国“专家”之一。



他的不得志或生病使他回到童年时的村子韶山。在家里他过了31岁生日，他的弟弟、妹妹和两个儿子簇拥着一家之主的毛，他沉思着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政治死胡同。

6　三薯饭（1925~1927）

没有理由怀疑毛是因生病才回到他出生的村子，但他回家除了单纯的休养外，还有更多的含义。整个1924年至1925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毛远离火热的政治生活，一定与他因未能进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魔幻般的内部领导层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有关。尽管他在31岁的时候进入了两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他并没有被完全接纳，他没能使任何全国性的领袖相信农民这个因素在中国革命方程式中的意义。

毛没有大学学位，没有写过书，没有学术成就，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在公认的领导人中的地位下降到底层，他在能量、想象力和人格方面足以弥补上述一切缺陷的优势还没有产生任何真正的效果。尽管有时他在新闻界也取得某些成功，但政治刊物主要是被已经成名的作者和具有外国文凭的归国留学生们所把持的。除了这些人的作品外，毛的文章也显得眼界狭隘，地域色彩太浓。

他从来没有在大工业城市生活或工作过，因而无法与他的同事如李立三、张国焘或刘少奇等人的经验相匹敌。例如，1925年初，当他住在湖南乡下时，在中国的城市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而这一切并没有触及到毛，因而他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他所做的只是证明农民这个武器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再没有比韶山更合适的地方来思考这样一种挑战。

由于退隐到韶山，毛错过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1月份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3月份孙逸仙的去世，孙的去世使国共合作的前景发生危险。与此同时，湖南的农民组织也受到5月30日英国警察在上海杀害工人的影响。

毛解释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这引起了地方的仇恨，他们要求把我抓起来。 蔡和森[17] 从法国回国帮助毛应付这场危机，而毛的妻子则在韶山帮助建立共产党支部。

若干年后毛回想起那些日子他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他说，你不能仅下到村里去就希望能了解他们的结构和社会状况。

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先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1块钱。我给了他3元，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

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外国阔佬！”这一切并不使赵督军感到意外。在地主的坚持下，他最终发布了对毛的缉捕令，在10月派军队抓他，毛逃到广州。在去广州前，毛以怀旧的情绪作了一首第一次发表的古体诗，咏怀他所热爱的长沙城：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1925年秋毛到达国民党的首都亚热带的广州，感到一种乐观的气氛。他的前上司汪精卫在孙去世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新主席，立场仍不明确的蒋介石担任第一军总司令。第5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刚刚开学，100多位学员参加了这期讲习所，其中五分之二的学员来自湖南，包括毛的弟弟毛泽民。毛在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担任宣传部长，同时被指定为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编辑。以这种身份，他结识了国民党左翼学者诗人柳亚子，后来与他保持了著名的文学友谊。他回到国民党营垒似乎很快就受到了欢迎。接着，国民党自身发生分裂，分成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最后以蒋介石为首）和左派（以汪精卫为首），毛继续支持左派。

12月毛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国民党右派。其中一篇第一次提到了香港，他自己从未见过香港，但文章称香港为一座“荒岛”。就是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第一次使用市井语言称呼外国人。他问，如果上海工人监禁所有“红头阿三”，又有什么要紧。

1925年的圣诞节，毛从逃出湖南的工人运动组织者那儿了解到，赵督军派出全副武装的一团军队野蛮镇压了安源的一次矿工罢工，工会的领袖是个共产党，被杀害了，几个工人也被打死了，工会被摧毁。毛大怒，他到上海是想由共产党组织一次反对赵督军的行动，但陈独秀拒不支持，使毛的计划完全落空，毛感到非常失望。按照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刚刚投票决定把国民党约束在广东省。毛没想到在湖南发动的那场运动被看成是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北伐计划。毛为他的朋友报仇的愿望不得不屈从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奇思怪想。

对自己的政治主张在上海遭到拒绝，毛感到很懊恼，他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阶级关系的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成为50年代出版的他的标准“选集”中的第一篇，题目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这篇文章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毛在这篇文章中估计，在当时中国的4万万人口中，“大”资产阶级约有100万人，中产阶级约有400万人，只有这两个集团可以说是反革命的，中产阶级的左翼也能参加革命—但它会和敌人妥协，因而是不能信赖的。



>> 1925年，在广州时的毛泽东

中国人口的其他部分都会支持革命。在15，500万小资产阶级之中，有1，500万是富裕的，他们一般接近于半反革命，想成为中产阶级，但在战时，他们也可能参加革命。7，500万在经济上可以自立的这一部分人在平时采取中立的态度，但在战时也会支持革命。而6，000万始终不能自足的人则欢迎革命。

2万万半无产阶级都会不同程度地积极参加革命，包括5，000万半自耕农，6，000万半富农，6，000万贫农（他们会“勇敢奋斗”），2，400万手工业者，500万店员和100万小商小贩。

至于4，500万无产阶级，200万产业无产阶级，他们当然是革命的“主力军”，300万都市苦力是一支仅次于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和贫农一样，2，000万农业无产阶级也能“勇敢奋斗”，同样，2，000万游民无产阶级也可以引导成为一种革命力量。毛从这种算术中得出来的结论显然是为了鼓舞士气。

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3万万9千5百万。我们的敌人有多少？有100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万算作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3万万9千5百万人的一铺唾沫。(18)

在毛的亚分类表上，游民无产阶级或流氓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一种新发明，他们将成为毛的老话题。下面是毛对他们的描述：

游民无产阶级为……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

这五种人名目不同，就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作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2，000万以上。这一批人很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9)

这是毛新式文章中的第一篇，写于1926年1月，初稿曾送给共产党领导人审看。毛后来说：“陈独秀反对……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这篇文章可能是两头都挨不上。因为根据前三四年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发表的东西来看，这篇文章（甚至）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创见；有创见的地方，按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又不太正统。

毛在2月份修改了这篇文章，但陈仍不予发表，因而毛只好在广州的《中国农民》上发表。这个小插曲之后，毛开始对陈不抱幻想：“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毛对自己文章中的许多说法不满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50年代把这篇文章收进“选集”时，作了大量的修改。

有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话被划掉了：“中国各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与西洋资本主义国家各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态度几乎完全一样。”总起来看这段话很像是仿效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在50年代，组成游民无产阶级的不切实际的五种成分—士兵、土匪、强盗、乞丐和娼妓被删去了。

这篇文章的要点是依据财产把中国社会分成各种阶级，把大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划作其他人要反对的对象，这就混淆了历史发展的封建主义阶级和资本主义阶级，而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这两个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农民成为“半无产阶级的”主要的革命力量。

尽管他向共产党呼吁了，但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毛是和国民党一道奋力前进的。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它对共产党政策保持不变，毛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是他与蒋介石竞争的少数几个时机之一，蒋和其他几个国民党高层领导人一起，得票最多，获得了248票，毛也不错，获得了173票。

毛在大会上讲话，拥护坚持和扩大民族解放统一战线，甚至为了这个目的，他还支持国民党右派重新统一。1月8日，他发表了一个《宣传报告》—非常自豪地宣布：“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的侵略。

3月，毛被国民党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他在广州主持了5月至10月的第6期讲习所，他自己就中国农民问题演讲了33个小时，此外还讲了9个小时的农村教育方法问题。

在这些演讲中，他就像面对小学生一样，介绍和说明自己的想法。他谈到了牛王庙和三薯饭—分别指地主法庭和广州附近东江农民吃的甘薯、白薯、山芋加带壳大米的饭食。但毛也想从他们那儿了解情况，了解“农村的状况，农民状况和土地状况，生活方式和人的经历。他们如何发家，如何变穷，村里官地或公地有多少，谁管理谁经营，租金情况……”毛喜欢用这些资料在课堂上和他的学生们讨论，也利用这些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



>>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课堂

毛甚至还教了点地理。9月他带领所有学生组织了一次海丰两周游。著名共产党领导人彭湃阐述了农民政府制度。讲课在一所孔庙里进行，有一次当毛看见一个学生戏弄孔子的牌位时，毛停了他好几天的课，毛不想支持这种无礼的嘲弄。

有些共产党人相信毛为国民党干得太多了，但他告诉他的密友说，准备用他的讲习所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培训忠于共产主义的干部，共产党这时在国民党组织上层很有影响。但他们企图靠沾国民党的光获得权力的梦想在1926年 3月20日破灭了。这一天蒋介石大肆宣扬要驱逐在国民党中任职的共产党员，要逮捕许多重要的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虽然失去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宣传部长的职务，但继续领导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可能是因为蒋不想触怒亲共的左派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缘故，蒋在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需要他们的支持。毛的对手张国焘后来指责毛拒不出席讨论如何对蒋的政变进行反应的共产党会议，而是采取不卷入漩涡的态度，“袖手旁观”。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很难采取什么行动，尽管有一份俄国人的报告说毛敦促苏联迅速采取反蒋行动。

在国共两党突然分裂的日子里，毛在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上提出一项决议，要求在北伐将经过的省份开展农民运动。他把农民运动和蒋的军事计划联系在一起，以从国民党那获得对农民工作的最大支持，农村工作最终使共产党获得了基层群众的支持。毛这是与斯大林唱反调，因为斯大林反对北伐。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全文）

毛澤東著

新華書店發行

共产党的“桂冠诗人”郭沫若在这一时期曾见过毛，留下了一段对毛的肖像描写：

“毛泽东留一头短发，中分，倒向两边，一瞥之下给人一种谦恭有节而又深奥莫测的印象。皮肤白皙，说话时声音低沉柔和，富有感染力。但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现他体态不俗，有帝王之相。在中国人中，特别在革命党党员中，说话声音这么柔和的人还真是少见。毛讲话时声音确实很低柔，再加上我一直听力不太好，所以他的话听懂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毛目标很单一，就是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帮助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便利条件，组织农民运动。这年夏天，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共产党农民部部长(20)，并前往上海讨论农民部的政策。但他发现在上海没有农民，而且也许是难以与陈独秀共事，因而毛返回广州的农民讲习所。9月，他为国民党出版的一套关于农民运动的丛刊写了篇序言，明确地阐述了他的立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在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农村革命不同于城市革命：

“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当不及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共产党领导人根据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决定不顾蒋的逮捕，继续坚持统一战线工作，反对北方军阀。同时为了统一战线的团结，停止讨论土地问题和武装农会的问题。毛现在又回到了长沙的根据地。这时，毛的一个助手在毛的家里工作，与毛和他的妻子在一起过了4

年。他回忆说，毛总是出去活动，有时几天都不回家。陈指派毛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可能是希望在北伐经过湖南时能阻止农民惹是生非。

但毛并不想抑制湖南农民的热情。12月在长沙农民和工人代表会议上，毛发表了一篇闭幕讲话，号召发动打倒地主的斗争。在他的指导下，农民协会立刻开始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并接管传教点作他们的办公处。

湖南省农民协会接管了长沙原属于神学院的5所房子。毛的母亲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的家乡湘乡县是全省最激进的一个县，传教士被强令离开家里，20多人被农民协会在“人民权力”的名义下枪毙了。农民协会还在秋收前强征埋藏起来的稻米，作“人民的粮食”低价卖给贫困农民。

所有这一切本来都可以说是令人钦佩的行动，但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人害怕农民进一步如此猛烈地实施他们的要求，那么各阶级的反帝阵线将会瓦解，国民党军队中的保守派掉过枪口来对付工农。这种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

毛对这些相互矛盾的压力的反应是：和往常一样，到基层群众中去。但这次是为了进行细致的调查，这种调查最终使毛出了名。调查导致他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文章中，他最激烈也最熟练地阐述了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这思想使欧洲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惊愕。这篇文章1927 年3月发表在《向导》周报上，并很快就译成了俄文和英文。共产国际的译文称之为“在已发表的英文报告中，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揭示最深刻的一篇，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它是“一篇出色有趣的报告”。

在1月份进行的考察包括5个县，其中有毛出生的家乡县，还有一个是他母亲出生的县，他在那个县走访了小学堂。在考察过程中，他

顺访他的岳父，已故的杨教授在板仓的家，他的堂哥还记得他与3个贫农，1个手工艺人，1个店伙和几个小学教师晚饭后交谈至深夜的情景。他的妻子杨开慧帮助准备材料，抄写文件。报告最清楚地揭示了他的家乡农民在进行革命活动中所展现的能量，这既使他惊讶又使他受到鼓舞。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作结论说：“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在许多地方，农民协会自己成为“惟一的权力机关”，既解决经济纠纷，也处理夫妻吵架的小事，以至于“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放个屁也有分量’”。

“如果计分合适的话，完成国民革命共以10分计，那么城市居民和军队只能占3分，农村农民在革命中要占7分，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21)

认为农民的举动“太过分”的议论是错的，农民只是对千百年来土豪劣绅暴行的反抗。“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接着，毛驳斥了国民党认为农民造反应该服从于统一战线的全国目标的论调，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革命高涨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地位，“把一切绅权都打倒……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毛在他的“报告”中还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富农在革命高潮时期很沉闷，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

“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民。从秘密时期起，到公开时期，他们都在那里积极奋斗，组织也是他们在那里组织得特别积极，革命也是他们在那里革命得特别积极……他们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22)

这些农民被富农讥笑为“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但他们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据长沙县的调查，贫农占70%，中农占20%，地主和富农占10%，几乎所有最基层农民协会的主席和委员都是贫农，毛不允许他们因此受到指责：“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毛还描述了农民对地主采取的某些行动。

“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至于枪毙，毛报告说，只限于最坏的土豪劣绅，他举了几个例子：“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10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1,000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14年间，杀人50多，活埋4人。被杀的50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花子开张！’这两个叫花子就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就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接着毛又论述了他的祖国传统的社会状况，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国家的政权、家族的社会权和鬼神系统的神权。

妇女们除了上述三种权力外，还要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然而农村妇女“也享有相当的性自由，三角关系和多角关系几乎普遍存在”）。但现在在湖南的农民革命中，这些权力都在被打倒。旧的规矩，如妇女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就被打破了。“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

但毛也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人为地加速造反的行动。“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毛在“报告”中还引用了他对一些乡农进行宣传时所讲的话，这些话使他们都“笑起来”。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他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农民新的造反造成新的禁绝。麻将、骨牌、纸牌在农会势盛的地方一概禁绝了，一个地方的农会烧了一担麻将牌。鸦片烟枪都得上缴，花鼓戏在许多地方也都禁止演唱，有些县把轿子砸了，或者农民大涨抬轿价，以惩罚富人。铺张酒宴受到禁止，在毛的家乡韶山，“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

农民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兴办夜校，而且是根据“洋学堂”的样子来办，而这种“洋学堂”过去被视为是最新式的。毛承认自己对学校曾经有过错误看法。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司’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14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

最后，毛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对农民的创举感到不满和惊愕的蒋介石和其他“诸公”，说他们是“叶公好龙”。叶公是中国远古时期的人物，他喜欢龙，因而在屋里屋外到处画着龙，刻着龙。但当真龙听说他好龙而下来察看的时候，他又吓得丧魂落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碰巧是毛第一次公开谴责蒋介石，后来他与蒋为争夺中国的领导权斗争了20年。而毛写完这篇报告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去武汉参加国民党左派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毛为农民反对地主的剧烈行动辩护，要求实行比共产国际更激进的土地改革政策。他在武汉写了一首短诗，名叫《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土地政策问题，毛在委员会中继续有力地论证不仅要没收地主的土地，还要没收富农—斯大林厌恶富农—的土地，要承认他们的行动是合法的。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试图包容各种相矛盾的观点，但遭到了左派和右派两面的指责，左派说这个决议还不够，右派则说它走得太远了。就在讨论进行当中，传来了蒋介石在上海利用自己的盟友、流氓组织、秘密会社青红帮血腥屠杀工人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消息。蒋的军队在秘密会社的帮助下，把上海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国民党的右派在公开活动并占据了支配地位，奉蒋为超凡神授的领袖。

毛把他那激进的土地问题决议提交给4月1日举行的中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并得到了真正具有地方组织经验的农民领袖和两名俄国共产国际顾问的支持。这次会议支持毛，选他为新的农民协会的主席。

但几天后当共产党在武汉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不愿听这些主张。毛10年后回忆说：

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但是，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改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交大会考虑。

大会第二天，介绍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被袭击事件中被捕，并被北洋军阀处以绞刑。在武汉参加会议的同志深感震惊，也许在决议中加强了要与国民党结盟的思想，尽管有上海的大屠杀，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蒋介石本人很担忧。毛的土地纲领不适合他们的观点，他的激进的论调被拒绝，毛被免去了农民部长的职务，只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而不是正式委员，这使毛很没面子。

几天后，毛托病不参加会议。他回到长沙，进行了第一次但不很辉煌的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及武装力量的斗争。地主们劝说湖南新军阀唐督军[(23)] 发布了逮捕毛的秘密通缉令。

但毛的运气救了他。他的同事向他透露了通缉令，于是毛在5月和几个朋友逃到靠近江西的浏阳。农民在长沙附近继续没收地主土地，长沙的卫戍部队进行报复，捣毁了农会和文化书社的办事处，宣

布忠于蒋介石。毛的一个密友在长沙的这次“马日事变”中被杀。结果，共产党湖南省委的大部分领导人都和毛一样逃到了浏阳，以便组织一次新的起义。

有一个报道说他们动员了30万农民准备在5月30日进攻省城，但武汉派来的一个共产党高级官员在最后关头让他们取消了这一计划。他说，进攻胜利的唯一结果是激怒唐督军，促使他向武汉推进，推翻共产党支持的武汉政府。而唐督军本来对共产党并无恶意。省委会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个“可耻的”决定，这是毛及其支持者的看法—但这个决定太晚了，未能使几千农民免遭被长沙军队枪杀的命运。毛应陈和党的领导人的要求回武汉，这时他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中公开采取极左的政策路线。

左派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事后都进行了调查，他们感到极度的痛苦。国民党的报告说，长沙的“马日事变”是由于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对此，毛应受到谴责。报告指出，农民协会受无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方帮派的控制，他们只知道杀人放火。

6月13日毛写了“全国农协会临字第四号训令”，伤心地承认失败。农民运动发展很快，但“土豪劣绅猛力反攻”比预期的更激烈，“而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对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领导人一种隐蔽的批评）。在记载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和农民在过去几个月被杀害的事实之后，毛不切实际地要农民协会“请求”国民政府保护他们，保障他们进行革命和发动一场“讨伐蒋介石”的运动的自由。

“因为土豪劣绅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还需要进行更彻底的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毛和他的妻子、孩子分开了，因为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他们住在一起太危险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妻子，17年以后他才见到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又有了一个孩子，这第三个男孩叫毛岸龙，但在随后的动乱岁月里失踪了。他们4个人现在都被送到毛在长沙的堂哥家里躲避。

7月，共产党最后与国民党左派决裂。共产党不再与不合适的盟友合作，他们决定在秋收后发动一系列起义，7月份召开了许多会议准备起义。在共产党为夺取权力而斗争的新阶段，毛将发挥巨大作用。



(1) 毛在此用的是中国式的计年法，比实际年龄大一岁（下同）。—编注
(2) 当时1块银元或1元等于1美元。此处“300”疑为“3000”，参见《西行漫记》，第107页。—编注
(3) 疑有误。实际上，毛写那封信是在1915年，而萧子升草拟新民学会的规章则是在1917年冬至1918年初。—编注
(4) 即黄兴。—译注
(5) 据历史资料，毛泽东任干事。萧瑜（子升）赴法国后，新民学会实际上由毛泽东负责。—译注
(6) 据历史资料，刘少奇、任弼时和王若飞都不是新民学会会员。—译注
(7) 指北洋军阀的第八师王汝贤部。—译注
(8)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25名准备赴法的学员动身去北京，8月19日抵达北京。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52页。—编注
(9) 据毛泽东的回忆，他当时向这位同学借了10元钱。参见《西行漫记》，第128页。—编注
(10) 《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在6月份发表。此处作者所指的宣言是《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6月间先在上海发表，7月在湖南再次发表。—译注
(11) 即易培基。—译注
(12) 毛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译注
(13) 指黄爱、庞人铨，均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译注
(14) 应该称为中共湘区工作委员会。湘区工委正式建立的时间是1922年5月1日前后。—译注
(15) 指军阀赵恒惕。—译注
(16) 此处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17) 蔡和森早于1921年底从法国回到中国。—译注

(18) 《毛泽东选集》收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无此段话。—译注
(19) 此段文字与《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20) 应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译注
(21) 此处文字与《毛泽东选集》收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22) 此处文字与《毛泽东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23) 指唐生智。—译注

第二部 奋斗

7 “山大王”（1927~1928）

在突遭国民党左派的排挤之后，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产党同伴在九江[1] 举行紧急会议，商讨他们的前途。由于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他被从中央领导中驱除出去，当了党和俄国顾问们（或按一些说法是俄国主子们）失败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党的总书记，他是个受过俄国训练的新闻记者。毛再度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会上，他向他的同志们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此之前周恩来、贺龙和朱德已在南昌发动了秋季暴动，后来，这一天被作为红军的正式建军日来庆祝。



>>“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会址

会后，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受命去组织湖南省的秋收暴动。他必须使省党的组织从国民党中脱离出来，在那里创建一支工农革命军。在重组的共产党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进的暴动计划，这个计划比中央委员会所指示的建立农村根据地和没收地主财产走得更远。

毛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主张，应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建立工农根据地。他写道：“我在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他建议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按共同的标准，公平分配给愿意得到土地的一切乡村人民。中央委员会警告毛这些是不对的，但毛拒绝服从党的政治决议案，在秋收暴动中掺入了自己的主张。

9月9日起义爆发，毛将参加暴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地方农民自卫军，以及脱离了国民党的持不同政见的军队编成四个“团”。可是，毛本人却不能对这支部队行使有效指挥。当他在整顿这四个团时，被国民党民团抓到并解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他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毛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他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

“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国民党方面对此事的说法是毛的贿赂起了作用。

最初几天起义进行得很顺利，许多重要城镇落到了起义军手里。然而，长沙的工人并没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样，起来支持农民。当两支已脱离国民党的部队决定在他们之间开战后，力量单薄的起义军就面临内部火并的危险，于是，安源矿工差不多都被消灭了，毛的农军也中了埋伏。

在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星期内，毛不得不放弃毫无希望的整个行动。正如他所承认的，“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在起义中，共产党杀掉了许多国民党人，并烧了他们的房屋，而这些人在统一战线时期被称为同志，所以，湖南当时流行着这样一支讽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头！

烧，烧，烧！同志烧掉同志的屋！”

在浏阳县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义军的残部，前敌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9月20日毛率领他们向井冈山进军—沿途趁势释放了被监禁的共产党人，并打开公仓，把粮食分配给农民。

尽管他的部队在芦溪突遭袭击，但毛在9月底还是把他们重新集合起来，并在永新县三湾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将残存的400余人整编成一个团，在部队中实行民主，由党掌握军队，废止打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红军的开端。

从文家市经300多英里的行军，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团到达了湘赣边界上的井冈山，这个地方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以后几年中时断时续的一个山区根据地，而且也是他此后全部事业灵感的源泉。

后来，毛断然把1927年的悲剧归罪于陈独秀（中国人）和两个共产国际顾问罗易（印度人）和鲍罗廷（俄国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应负最大的责任，而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

徒。而罗易则指责毛是一个顽固和有意阻碍我们的革命计划的、完完全全的动摇分子，因此将他免职。

给毛的评语之所以下得这样刻薄，是由于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个星期内，对革命局势的认识发生了激变。8月间，毛曾断言中国将会发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装进攻长沙失败后，他转而相信，“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他看错了时机。

毫无疑问，毛以前过分夸大了农民起义的真实潜力。一个当时曾参与起义的同志后来说：“毛向瞿秋白保证湖南至少可以发动10万的武装农民参加暴动，而瞿电告莫斯科的数字增到20万，结果最后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把长沙失败的不幸归之于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被指控为军事投机，不充分发动农民，收编土匪和公然违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讥讽的口吻为他的失宠辩解：瞿秋白的人偶尔发现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包含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这激怒了他们。枪杆子里面怎么可能出政权呢？因此，他们撤了我的职……他毫不后悔地说：“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其实，毛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

但是，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动会扩散到广大的地区。并且，他把从湖南带出来的队伍整编成为正规军，这样，他们被作为“客军过境”来对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员会批评毛“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实真相的。

毛所发现的得以躲避国民党和军阀追击的圣地，纵深30英里，方圆180英里，满目荒芜，人烟稀少。只有六七条狭窄的山间小路，穿过茂密的松杉树林和枝繁藤绕的竹林，通向井冈山的心脏，它的直插云霄的峰顶，终年云雾缭绕。毛在给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描述井冈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州、草坪、白泥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但对毛的“团”来说，井冈山并不是一个休养所。许多战士只穿着薄棉衣，来抵御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们的日常主食。

他们一到井冈山，便与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发生了冲突，后者属哥老会，有600余人，120余条步枪。显然，毛的小部队是没有希望消灭他们的，于是毛采用了结交联合的策略，以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是能够在相处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冈山期间，”毛后来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后来，在他们独自留守井冈山时，又恢复了土匪的习气，终为农民杀死，当时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苏维埃，有能力抵抗他们。(2)

结果，党内毛的批评者们斥责他，竟联合这样明显的落后分子。但是，毛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所谓游民问题绝不仅是在井冈山求生存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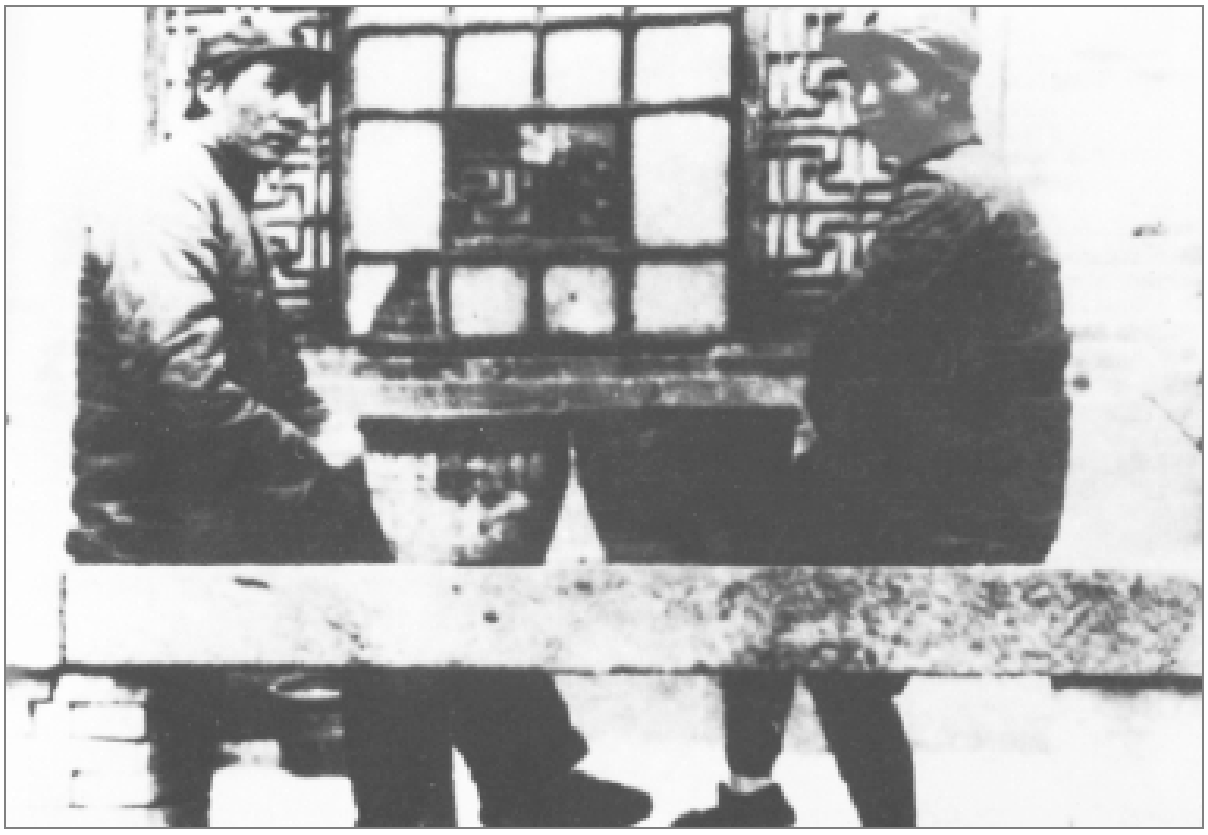
毛的批评者之一王明声称，毛在30年代末曾告诉他，在进入井冈山一年后，使用“鸿门宴”的手法，处决了两个土匪首领，由于当时已有几支共产党军队与他会合，安全有了保证。[13]随后，他解除了土匪部队的武装。

1928年间，毛开始和贺子珍一起生活，贺是一个漂亮的、举止羞涩温柔的娇小妇女，18岁，只有毛35岁的一半多。她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曾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后当了教员，1927年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时，她曾领导一支妇女队伍，对于流亡中的毛来说，她是一个十分般配的佳偶。



>> 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她的唯一不足是，由于出身富裕家庭，从未做过体力劳动，因而不愿负担日常的家务琐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产党人当做热心家务的模范，因为在选择自己的工作时，她情愿去照顾毛个人。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后来的井冈山上的战友朱德将军身上，他是这样解释当时自己的婚姻的：“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有时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属于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了。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们并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当然，像其他妇女一样，她还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村子里。

毛以井冈山为中心谋求扩大他的影响，并逐步壮大他的400人的部队，以控制更多的地区，这表明他是一个中国式的罗宾汉。为了得到粮食和其他补给，他不得不征服四周的农庄。但是，为纠正单一的

流寇式游击，他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中心设在茶陵，中国共产党称这样的政权为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机关，而由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组成立法机关。毛从他前一时期的狂热后果中吸取了教训，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温和的，既不是没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领导的针对这一地区地主豪绅的游击暴动，旨在得到粮食和武器。因此，他并未取得当地农民的合作，他们对待他就像对待其他“客军”一样，是冷淡的。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产党官员，侵入毛的领地，把他们的权力扩大到这个偏远的边界地区。毛到达井冈山5个月后，湖南特委代表到达井冈山，取消了毛前委书记的职务，改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仅成了一名部队的指挥员。当时，毛被指责为对地主过于温和，而在一两年前，同样是毛却被看成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可是此时，他已经学会了在农民之中促使社会转变的更合适的方式。

领导变更的结果是暂时丢掉了井冈山根据地，可毛却在湘南与伟大的南昌起义英雄朱德会师了。朱德率领一支暴动残存的杂色部队，已经到了湘南的桂东，队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击溃的大量军队和农军。朱德已按自己的计划举行了湘南暴动，毛派他的弟弟毛泽覃与他联络。然而，朱没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镇往东向井冈山退却。5月，两人在酃县会面。

朱德的传记中写道：他“曾经见过毛泽东一次，不过是在秘密会议的昏暗大厅中远远相对而坐，没有真正见过面。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会面，从此，他就和这个率直刚毅的战士结成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中国共产党队伍中最强有力的团结。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略有些夸张地说，假若没有朱德，毛在以后的生涯中有可能

变成一个土匪……然而，更为确切的假设应是，如果没有这种团结，毛的最好结局是当一个不受信任的省级领导人。

朱的传奇甚至比毛更富有色彩。他比毛大7岁，出生在四川的一个农民家庭，不仅参加过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同盟会，而且入过秘密会社哥老会（他必须喝血起誓）。在活动中，他失去了两个兄弟，妻子和儿子也被军阀杀害了。在20年代初，他染上了鸦片瘾，但是又戒除了，后来赴欧洲在戈丁根学习。他是一个坦率耿直、极富有智谋的可爱的人：一次他被抓获，在要被枪毙时，这样救了自己的性命，他说："不要枪毙我，我只是一个伙夫。"

两个领导人率队退至井冈山脚下的江西茅坪，其中毛在湘南之征中招募的农军达8,000余人。不久，林彪也来会合，当时他只有19岁，可是到70年代却成了毛晚年最大的权力竞争者。林是一个湖北农民的儿子，跟随他的哥哥和表兄投身革命活动，在任蒋介石的北伐军排长之前，曾在黄埔军校受训。南昌起义时他先任连长，后任营长。在井冈山，他的队伍并入红四军，最初他任营长，协助抵抗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进攻。毛对他的评价是："林彪不仅有能力，而且是一代天才。像他这样的人，能把整个局势都装在脑子里，将来我们的军队就需要这样的人来指挥[3]。

一个当时访问过毛的根据地的同志，记下了他在晚饭上的谈话：晚饭中间，毛经常微笑。当他谈到繁荣美好的未来时，他由衷地大笑。可是，当他谈到目前经济和粮食问题时，他的表情显得忧虑悲哀。他提到当他退到井冈山时，如何被称为是"抛弃群众的逃跑"，如何受到党中央几次警告，他变得极为愤怒。毛紧握着他的拳头，奚落负责的中央领导人只知道空洞的口号，而不注意实际情况。他的姿势表明，除非进行报复，否则是不会满足的。我感到毛是一个天才，在短时间内，他表演了高兴、愤怒、悲哀和喜悦的全部情感。

1928年5月20日，井冈山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茅坪召开会议，作出了含有下一年毛主义政策路线的所有本质特征的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等决议。在军事策略上，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十六字诀：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还包括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以加强共产党军队的管理，争取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三大纪律是：（1）行动听指挥；（2）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3）打土豪要归公。几个月后制定了前六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一年左右又增加了后两项：（7）洗澡避女人；（8）不搜俘虏腰包。

红军在井冈山建立了士兵苏维埃，这较以前通过政治委员进行工作，更具有民主性和教育性。“政治部存在时，”毛评论道，“战士们都以为政治工作仅仅是政治部中少数几个人的事。其他人的任务只是打仗。政治部取消后，战斗员和政工人员一起做政治工作，这样就打破了先前的单纯军事观点。”

茅坪会议决定，井冈山地区应作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渐次向周围地区推广扩大。无偿地没收土地分配给农民，并武装和组织农民起来保卫分得的土地。但是，对小地主和富农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政策。这些决议的制定，是基于毛在茅坪对他的同伴们所讲述的五个因素。首先，他告诉他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政治发展不平衡，产业工人很少，而农民很多。第二，对于革命来说，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大国。第三，然而反革命力量还很强大，国民党政府通过与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第四，革命力量还很弱小，红军仅控制少数贫穷落后地区。第五，农民只要有机会，就会随时参加革命，重新分配土地。



>> 毛泽东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在延安合影。左起前排：罗荣桓、张文彬、陈光、杨立三、陈士榘、宋裕和、林彪，后排左一赵尔陆、左六毛泽东、左八谢今古

所有这些主张都为朱德和其他人所通过，尽管他们很清楚，毛在党的正式领导层中的地位并不稳固。

可是，当夏天毛的上级共产党领导设法将毛调离井冈山时，这些惬意的计划就被推翻了。他们先是命令他率大部分部队去湘南，仅留一支小部队守卫井冈山根据地。毛的同志们决定拒不服从这个脱离实际的命令，可有一个团在与党的特派员之一直接谈话后，确信了有这样的命令。前往湘南，朱将军决定最好还是多派些部队去增援。党的特派员持有在毛的区域内按他的意见行事的文件，因而，差不多整个夏天，毛被迫靠边站了，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在错误策略的指挥下，损失了一半。

据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讲，毛对他的新伙伴朱德将军消极地接受那招致军事大失败的极端命令，感到很恼火，责怪他“理论上无知”和“机会主义倾向”，而朱将军则转而批评毛当时深居井冈山，以井冈山为轴心“陀螺似的向外扩展”的军事策略。

据布劳恩讲，1929年两人再次会合以后，毛一步一步地削弱朱作为军队领导人的威信，并争取一些朱的高级僚属站到他这一边，其中包括朱的政治委员陈毅，以及当时还只是营长的林彪。朱在表面上听任了这种权威的丧失，形式上他还是总司令。布劳恩所讲的这些，其必然结果就是把军队置于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个原则是毛、朱都赞同的。可是，后来林彪却声称朱将军对这一思想的支持，并不像一些描写中所讲的那样是一个坚实的栋梁。他有突出的军事素质，但缺乏政治判断力，当冲突的命令来自不同的政治司令部时，往往发生动摇。他的忠诚主要是依靠有毛和他在一起。

在领导空缺期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许多在井冈山最近吸收的共产党员成了叛徒，当败退的红军返回以后，9月毛再次接任，并开始在地方党组织中进行大清洗，重新登记党员。为此目的，他还创建了新的保卫机构，使毛能够统辖较以前更忠诚、更守纪律的组织。

在几个星期内，毛和朱就恢复了年内丧失的大部分区域，他们的根据地也再次能够生存下去了。为此，毛作了一首题为《井冈山》的诗，以志庆贺：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10月，毛在一篇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文章中，分析了井冈山根据地的特点，他夸耀地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可是，敌人制造的经济压力，却使他们感到窒息。“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

1928年底，毛得到了一件令他极为满意的财产。红军在长汀从一个正坐在滑杆上指挥部队的国民党将军手里，缴获了一匹暗褐色的战马。这匹马被分派给毛，成了以后几年里他最喜欢的坐骑。

8　抗 争（1928~1930）

1928年11月，毛给中央委员会打了一个很长的、苦苦恳求的报告，题为《井冈山的斗争》。报告提到士兵和党的干部中，伤亡人数都在增加。毛特别抓住这一点，为他使用土匪新兵辩解。“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毛承认道，“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

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但是，根据地最需要的是更多的共产党员，毛希望从外界“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30人来”。“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需要治疗，但没有足够的医生或药品。毛恳求中央委员会“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他解释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

可是，要把革命向根据地外扩展，却是困难重重的。“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在赞美军队中普遍实行民主制的同时，毛承认大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埋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

由于这样一些原因，革命的进程是缓慢的。“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接下去从毛的笔下流露出的便是他一生中最具动摇和痛苦情绪的句子：“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实际上，在写这份报告的几天之后，援军就到了，但并不是中央委员会派来的，而是由前国民党湘军军官彭德怀将军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到井冈山与毛会师，他的部队包括1928年夏的兵变部队和一些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残部。加上毛朱的部队，井冈山部队的人数差不多达4,000人，是毛最初力量的10倍。

彭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被描绘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以及“是一个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的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仅仅是因为发脾气，就踢翻了他祖母的鸦片炉，以反抗祖母，实际上当时他已被父母判处溺死。只是由于他勇敢的舅舅站出来调解，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刻，他与朱德、林彪一起，成为忠于毛的红军将领中的栋梁之一。



>>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发起秋收起义，10月率部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毛两军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图为1931年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合影

1929年初，毛、朱从井冈山大举出动，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受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困，粮食短缺。他们向赣南闽西的粮食产地行进，相继占领了瑞金和汀州，寻找更适合养活他们军队的地方，扩大他们的根据地。

在那里，毛接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此时，李立三成了中央的新的领导人，李曾在长沙响应过毛的求友广告，并协助过毛组织安源的煤矿工人。然而，此时李不是要求提供帮助，而是命令毛解散红军，到上海去，协助领导他所断言的即将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农村的革命高潮，有待于城市共产党力量重建以后才能到来。

毛拒绝服从命令，并在回信中斥责了他。“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所以，毛仍留在江西，巩固新开辟的以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并进行温和的土地改革，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动富农和中农。毛想要保护商人的利益，而不是把他们从中立推到另一边。

毛对党的权威进行了全面的抗争，他否定了李立三命令的三个内容—延缓土地改革，红军分散成小股独立的游击队，以及取消农村根据地—并与他对农村革命形势估计的意见相左。毛明确表示他是正确的，而许多脱离实际的领导者是错误的，并且相信大部分有亲身实践经验的人是赞同他的。

在以后的两年期间，为了巩固他的权力地位，毛重新整顿了红军。这时，包括招募的新兵和地方赤卫队，在他的麾下已有1万人左右。

1929年9月，毛患疟疾病倒了，在福建山区的小镇古田渐渐痊愈。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评论蒋桂战争的词：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他还作了一首有关当地重阳节的词：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利用因病被迫躺倒的空闲，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同伴中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有些错误思想很明显，例如个人主义，或单纯军事观点。有些则比较复杂，像极端民主化，毛指出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

他告诫说，民主应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就必须“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决议不要太随便，一经形成，就必须坚决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党内批评应该加强，必须认识到“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另一个需要纠正的极端是绝对平均主义。“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有些人要求分物品和背米一律平等：“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解释说：“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也“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

1930年元旦，红四军领导在古田举行会议，毛同意重新恢复政治部，牺牲了士兵苏维埃的权力。毛按会议精神对部队官兵进行了整顿，巩固了他的领导，因为类似苏维埃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给他的对手钻空子的机会。

他还建议加强党在军队中的作用，党支部由官兵混合组成。那些有“错误的政治倾向”的党员，那些只想“大吃大喝”、抽鸦片、赌博，或不惜犯罪去获取外币黄金发财又不思悔改的党员，应被从党内清除出去。

至于军队本身，毛建议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委员应该“共同的平等的”参与决策。他制定了详细的、新的、严格的纪律条例，要求官兵在

党的政治口号下进行工作。

总之，他这样对待他的同志是有点过分的。林彪支持他，但彭德怀有意见。在井冈山周围游击了两年之后，毛的战地指挥员们对以江西的贫瘠农村为支撑红军的根据地，已有了显而易见的不满。从而更倾向于李立三路线，在城市地区振兴革命，现在听来就要比毛的路线更具有吸引力。指挥员们试图立即就移驻到城市去。毛使用整编打乱指挥的方式，才调换了许多高级指挥员。

为庆贺新年，毛写了一首短词，呼吁在农村建立新的根据地：

宁化、清流、归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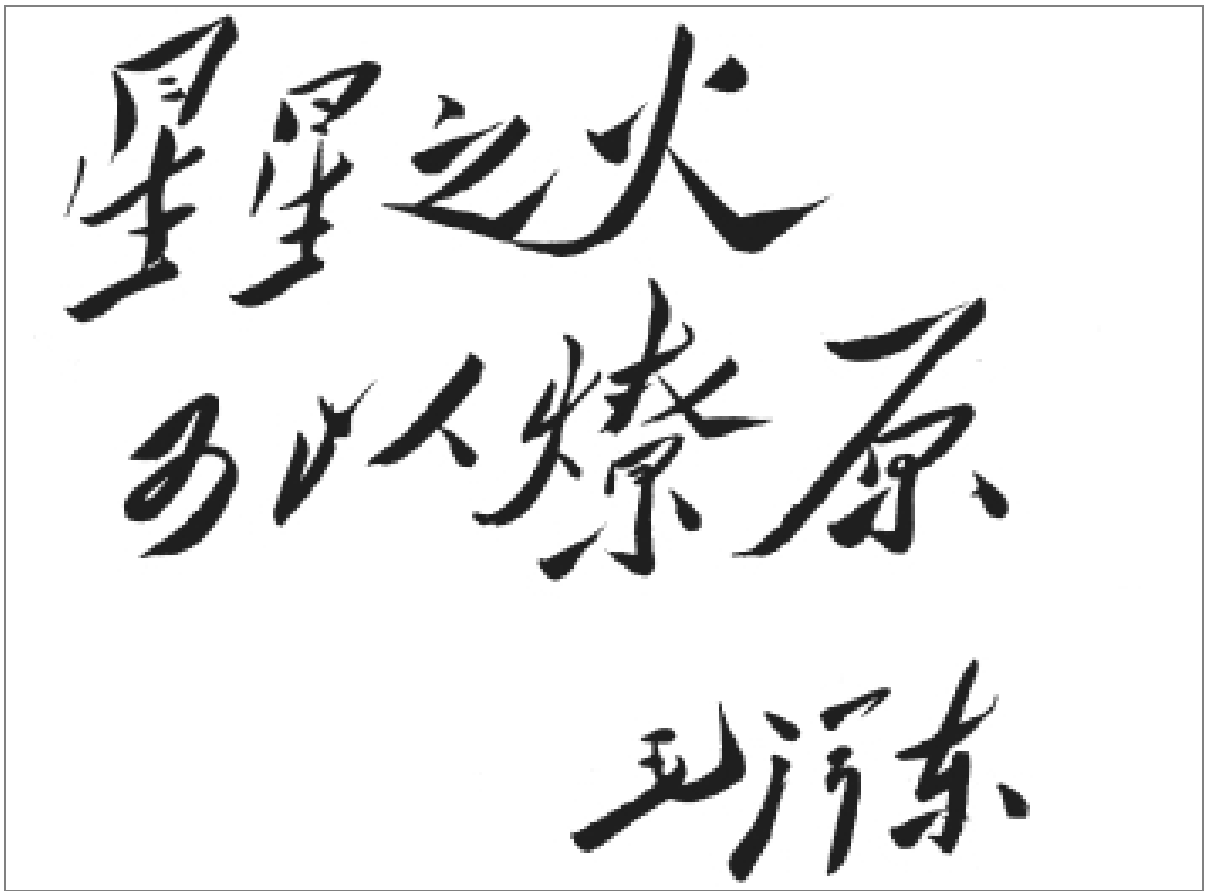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 毛泽东题词

林彪在古田支持了毛，但也许为进一步坚定他的信心，因而毛于1月5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信中，毛谈了他的乐观主义的理由。“中国，”他写道，“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在一年内，江西、闽西、浙西创建独立政权的目的都达到了。只是规定一年为期，不免伴上一些“急躁性”，但是，毛的结论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快要”一词应如何解释呢？毛对他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听起来像是饶舌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

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尽管李立三嘲笑毛是“旧式的流寇思想”，但此时，红军毕竟是更加强大了。毛在他的部队首次占领江西吉安县城的前夜，写了一首词，赞美部队旺盛的士气，那年，他们占领吉安不下于9次。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3月底，给毛派来了一个新勤务员。小伙子十分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与毛会面的情形，当时他称他为“毛委员”。

“我……好奇地望着他，”年轻人后来回忆道，“他穿一身和我们一样的灰色军装，所不同的只是他的上衣口袋显得特别大。他的黑头发和苍白的面色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他显得有些太瘦。”(4)

毛转过身来欢迎他的新助手，而他直到早晨时，还是红四军司令部的一名号兵。

“你姓什么？”他问。

“姓陈。”这位战士回答说。

“叫什么名字？”

“陈昌奉。”

“十几啦？”

“16岁。”

“为什么当红军呀？”

“红军好，打土豪！”

这时毛指着一把椅子，示意年轻人坐下，很有兴趣地问他：“你们家乡有土豪吗？”

“有！我就是被土豪逼出来的。”

陈详细地叙述了他的身世。

“很好！”毛说，“以后在这里要好好地工作和学习。你能写自己的名字吗？”

陈站起来，难为情地捻着衣角小声地说：

“我没念过书，不会写字。”

“以后要学会写……”

后来，毛替他的勤务员写过一封家信，经邮局寄给他的父亲。

当时毛的全部行装有两床毯子，一条布被单，两套普通的灰军服，一件银灰色的毛衣，一件旧大衣，一把破雨伞，一个吃饭用的缸子和一个九层的灰色挂包，他用的地图、文件、书籍—其中有一部他少年就喜爱的《水浒传》，都装在这个挂包里。

每当行军作战，他背着挂包拿着雨伞，他的勤务员背其余的东西。到了宿营地，勤务员找两块木板对起来，铺上那仅有的两床毯子和小被单，用衣服打成枕头。这就是毛的床。

毛晚上睡觉很少，吃过晚饭便点上小马灯，打开挂包，拿出文件、地图、书籍和纸笔就开始工作，有时一直到天亮。

陈回忆道："我那时年龄小，不能熬夜……在旁边坐着，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有时竟伏在主席的办公桌上打起鼾来……常常在半夜时分，主席轻轻地把我叫醒，说：'搞点水来吧！'我这才醒来，提着江西那种小木桶去打一桶凉水来。因为没有脸盆，他便用毛巾在桶里蘸着擦擦脸，有时擦擦澡，提提精神。往往擦过了脸他就饿了，我便把下午留下来的一缸子'三层饭'—最底下一层是米饭，中间是一点菜，顶上面一层又是米饭—去热一热给他吃。有时这一缸子饭吃不了，他就叫我用纸盖起来，留着下顿再吃。"

一次，陈把毛剩下的一点饭倒掉了，第二天毛便问：

"陈昌奉，昨天剩下来的饭呢？"

陈告诉他已经倒掉了，毛批评他说：

"群众的每一粒米来得都不容易，一次剩的不准倒掉，留着下一顿再吃。

4月间，李立三发起了一次攻势，导致了共产党严重的失败。李批评毛的保守主义，命令他去上海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并命令红军展开猛烈的进攻，以赤化整个华中。毛后来称：“李立三既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也过高估计了全国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认为革命已经接近胜利，很快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李认为蒋介石和军阀之间旷日持久、消耗实力的内战，造成中国政治局势的混乱，从而给共产党打开了夺取国家政权的大门，反过来，毛却不这样乐观，认为这两个敌人可能联合大举进攻苏区。

毛未理会让他去上海的命令。与此同时，在欧洲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国际新闻通讯》（《Lnprecor》1930.3.20，10：14）上，登载了毛的讣闻。以后又出现过几次这样类似的过早通告。

1930年5月，毛在百忙中写了一本教育性的小册子，题为《反对本本主义》，文章开篇道：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毛忠告做领导工作的人，“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

李立三的攻势很快就消失了。彭德怀将军曾一度占领长沙，但立足未稳就被迫再次撤出—这导致了毛的家庭惨遭不幸。毛在这些事件

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而此时他却以喜悦的情绪为这些事件进行欢呼：

六月天兵征腐恶，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

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为我从天落。

不久，毛、朱进攻南昌，但未能打破敌人防御。他们不得不转回向长沙，与彭的部队会合，以执行李的最后指令，试图再次占领这座省城。

9月上半月，经过持续多天残酷的激战，红军遭受严重损失。最后，毛为这些惨败所震动，从而不顾中央委员会在当天的号召，劝说他的同志向赣南撤退，以便挽救他们的军队。在平江整顿后，10月，这支合编的部队攻占吉安。

但在此期间，杨开慧和她的儿子毛岸英，毛的妹妹，以及其他亲属，在长沙被捕，据一种解释的说法，“由于叛徒告密，有六十余个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匪徒”前去搜捕。几天后，10月24日，毛的妻子在长沙浏阳门外被公开处决。据说，警方提出她只要公开与丈夫和党断绝

关系，并且提供长沙共产党全体成员的名单，就可不杀她。杨拒绝了，遭受了严刑拷打，但即使如此，至死她也未泄露任何秘密。

至少在公开场合，毛不允许自己因悲伤而落泪。5年以后，当他叙述这件事时，只是简单地陈述了事实，还同等地提到，在他的家庭遭残杀前财产的损失：

我在湘潭的地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还有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个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了。其余的后来得到释放。红军的威名甚至于扩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里，因为我听到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的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

很多年以后，毛为一位曾投身于30年代红军运动的同志遗孀[(5)]写了一首词，在词中，他赋予他的妻子杨开慧和他的已故同志柳直荀两人的姓以特殊的意义：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一位老朋友后来问毛，他使用“骄”这个形容词描写妻子，用意是什么。

毛解释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头，焉得不骄！”

杨被杀害一段时间后，毛与贺子珍结婚，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了。毛还给长沙杨的家庭送信，让他们把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一个已从监狱放回）送到上海，由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安排入大同幼稚园。各种说法都提到他们在上海的几年，处境十分凄惨，使用假名来掩护，靠在街头捡垃圾为生。

10月初，红军再次占领吉安。毛的勤务员在“一家逃跑的土豪家里得到一个搪瓷暖水瓶”，他很高兴，有了这个暖水瓶，给毛委员准备热水就不成问题了。但他也清楚，如果毛发现了，就会让他送回去或照价付款，因此，在行军中，他让其他人带着它，所以毛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朱将军在城里国民党军司令部文件中，发现了声名狼藉的国民党AB团（反布尔什维克）地方成员的材料，根据一张由当地地主签名的得款收条判断，有些AB团分子已经渗入共产党内，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共产党内毛的批评者之一。

毛对此事的反应是，派他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打入AB团内部，最终他就可以说，他的反对派中的一些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密探。可是，他和他在江西党内的批评者之间，也还存在着政策上的不一致，在11月中吉安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就土地改革政策展开了争论，当时，他们必须赶紧分散开来，因为国民党军队已经迫近了。

吉安的占领、放弃又再度占领的多次反复，在共产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恩来在11月对政治局说，毛完全忽视了共产党国际有关“在进一步展开进攻之前必须进行巩固的阵地防御”的指示，而党的总书记则斥责毛在吉安得而即失的行为，是对“局势的绝望”。

11月底，毛起来镇压涉嫌的国民党密探，逮捕了4,000多红军官兵。一些人遭逮捕后，所提供的口供，又牵连了某些反毛的共产党高级人士。

12月初，红军一支部队的指挥员也率领部下的400人举行了兵变。他们逮捕了部队指挥员，把队伍拉到富田，攻占了监狱，释放了一些监禁在那里的毛的囚徒，捣毁了地方赤色政府，并逮捕了其中的一些人。在富田，大约有100名毛的支持者被杀害，他们的亲属中有许多人被扣留。其中就有朱德将军的妻子。

毛的批评者的首领从富田的监狱中逃脱出来后，即号召推翻毛，攻击他是“党皇帝”，拒不服从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他在邻近的乡镇成立了一个敌对的赤色政府。迟至12月，毛在党内的敌人才送信给朱、彭二将军，罗列了“叛徒毛泽东”的罪行，还附上了一封可疑的、被看成是毛给他的一个密探的信。这封信命令攻击各部队，因为这些部队领导人在事变时期供认，朱、彭是国民党的“最高”代理人—“这些口供有利于我们”.....以便早日捕杀.....[6] 毛的反对者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7] 。

这次使用暴力镇压的、最为严重的派别斗争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一位罗同志的“暴露”，毛的反对者起初是以国民党奸细调查他的，但他们发现他实际上是毛安置的秘密反间谍人员。换句话说，毛和他的党内对手双方都派人打入了AB团，但都没有通告对方。起初他们揭露对方的秘密网时，还相信他们正在挖出真正的国民党奸细。

1931年初，毛和他的支持者已能掌握新的苏区中央局。新中央局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把在江西向毛挑战的那些人开除出党，并使他的解释合法化，“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AB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为。

然而不久，毛的根基就被抽去了。就在他巩固在红色根据地的地位时，中央委员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1930年，一批20年代期间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共产党员返回中国。他们的特点是，在俄国时就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因此，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起初他们被称为“归国留苏学生”，当他们的主要领袖王明写了一本题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后，他们就得到了又一个绰号，即“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其他成员包括博古和洛甫。

1931年初，这些人把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大权，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在毛的“实力派”和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9　遭 贬（1931~1934）

此刻，蒋介石才完全醒悟到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革命潜力。1930年底，他发动了所谓五次“围剿”中的第一次“围剿”。他派遣10万军队去围攻苏区，但善于运用运动战术的毛和朱将军，是能够将他们击溃的。后来毛解释说：

我们贯彻执行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以我主力各个击破敌军。我们诱敌深入苏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进攻孤立的国民党部

队，取得主动地位，能够暂时包围他们，这样就把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敌人所享有的总的战略优势扭转过来。

但是，毛后来也抱怨，由于共产党内部不和，致使在反攻中遭受了挫折。毛为庆贺粉碎第一次“围剿”，活捉敌前线指挥官[8]，写了一首词：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月，“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党的领导权，随后苏区也建立了以项英为首的新的中央局。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后来他叹惜道，1931年到1934年期间，他在中央没有一点声音。他的作用更多地局限在起草新婚姻法之类的民政事务上，1931年1月28日公布了由毛签署的新婚姻条例的决议[9]：

“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

第一次“围剿”之后，仅用了4个月的喘息时间，蒋便在春天发动了他的第二次“围剿”，被派去捣毁苏区的军队翻了一番。但共产党仍然成功地运用了他们的老战术，毛写了另一首词，来纪念粉碎第二次“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次只用了一个月喘息时间，蒋就亲自率领30万大军—差不多是毛的军队的10倍，发起了第三次“围剿”。可是，蒋的“长驱直入”，快速占领苏区心脏的战术，却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发挥游击战术的条件。到10月份，蒋不得不撤退，后来毛引用一个敌军将领的评论，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夏季的战斗期间，留驻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蒋的破坏，已不再是安全的了，因而纷纷前往内地各地区。周恩来假扮一个留胡子的天主教神甫，首先到达了江西根据地的首都瑞金。他一旦到此，毛作为党的下级，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一个只是在江西的赤色共和国的名义上的主席。

周是一个与毛有着完全不同特征的人。他比毛小5岁，出身于一个满清官吏家庭，他的优雅气度使得他在共产党同伴中显得十分突出，而且他也许还把他的谦谦君子意识传染给了他们。1920年至1921年间，他在法国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小组，从那时起，他在外交和协调政治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才华。

此间对毛的行为和政策的批评越来越频繁。1931年9月1日，周在一份给根据地政府的训令中，反对毛有关战略、军队管理和土地改革的观点，毛被迫签署了一项土地法，而他本人关于对待富农的思想遭到驳斥。他曾经主张过的关于没收土地的激进理论，现在，由党的新领导推广到各地。

在自身的沉浮之中，毛还必须以铁石心肠去面对他的朋友和妻子所遭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命运。除了早些时候他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1931年的此刻，他又得知了蔡和森在香港被捕遇害的消息。蔡

是他的同窗好友，党内最亲密的朋友，他曾多次住在蔡的家中，蔡被捕后，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据传，在广州，反革命刽子手扯开他的四肢，把他钉在墙上，惨无人道地毒打致死，并剖开他的胸膛，把脏腑剁成碎片。

9月间，日本人展示了他们预谋征服中国的野心，用武力侵占了满洲，并强化了在华北已取得的各项特权。显然，只有进行全面抵抗，否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快就会扩展到整个中国。

毛起草并签署了一封红军致国民党军的公开信，号召他们起义：“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手里现在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

毛强烈要求新的政治局讨论这些重大的民族政治问题。例如，1932年1月，日寇进攻上海之后，他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将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军队—这是一个受莫斯科影响的中国的政治局根本不能接受的政策。1932年4月，在毛的首倡下，江西政府对日宣战，但政治局再次未给予支持。



>>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瑞金召开。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



>>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合影。左起：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1931年11月初，为制定新的政治局路线，由“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主持，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迎接不久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决议激烈地攻击毛的政策，谴责江西根据地的共产党领导“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非难他们未和其他根据地联合行动，并攻击毛的红四军的游击战术，还宣布他主持制定的1930年2 月7日《赣西南苏维埃土地法》中规定平均分配土地是向富农投降。

毛个人的错误是犯有狭隘的经验主义，独裁专断的机会主义，以及思想意识极为空虚。新的党的全国领导重申土地革命应由无产阶级领导。红军应占领城市，使用正规战，抛弃旧式的游击思想。

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新来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外，在根据地，莫斯科路线并未得到有力

的支持。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并保住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位。因此，毛的许多支持者，像朱德、邓子恢、何叔衡等，也都当选了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主持政府和军队的各个部门，然而他的新对手却控制了党。

而且，据说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支持，政治局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出席大会的代表们接受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实质性建议中的绝大部分，其中包括根据地建设、土地法和红军的指挥，只有少数修改是适中地采纳了毛的观点。

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高级领袖博古和洛甫，从上海到达瑞金，一道来的还有共产国际的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他的中国名字叫李德。从此，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了。

第四次“围剿”之前，1932年至1933年间的冬季，红军抢先发起进攻。

5月，[10] 周取代毛任第一方面军总政委，[11] 成为红军中的高级权威。同时，周的支持者在根据地政府内，也攻击毛的土地政策是“右”倾。

尽管有这样的窘迫困扰，但毛仍专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立法工作，并提出了很好的、细致的设想。8月，在一次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他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共产党治理区域内的300万群众，必须自力更生。他责备那些以为在革命战争时期，不可能从事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等到最终胜利后的和平条件下才能进行的意见是不对的。他特别强调必须做好土特产品的生产。我们必须“恢复钨砂、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他还继续关注国际事务，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通电中，表达了他对李顿报告书在中日问题上的虚伪态度的蔑视：“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

第四次“围剿”在僵持中结束，毛作了一首词，谈论它的结局：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11月，共产党取得了一次侥幸的胜利。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行兵变，试图建立一个与蒋介石对立的民治政府。起义之前，十九路军的领导人在上海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可是，过于谨慎的共产党人未作出明确反应。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即毛和朱—签署了一件与这个非共产党起义者联合的文件。但是，政治局却认为福建的起义者主张的是虚伪的民主，不值得支持。毛和朱则希望福建事变的发动者能真正给予该省人民以自由权利，并与共产党结成真诚的联盟。

正当毛争取实现联合时，兵变已被忠于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在结成有成效的联盟机会丧失后，毛也加入了对政治局的公开抨击。假

如更为迅速地采取行动，福建的兵变军队就可以得到红军的支援，这样兵变就有可能成功，就可能控制相当大的领土和资源—尽管瑞金的军事战略家必须斟酌，从苏区派出援军，会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后来毛抱怨他的党内对手，错误地处理了福建事变。

毛40岁生日后不久，1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中央全会，毛的所有政策都被攻击为右倾路线。毛已预料到会上将发生些什么，所以就通知一个同伴，以健康原因，未参加会议。可是，德国顾问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却说："博古讽刺地说，毛又犯了'外交病'。使毛感到愤愤不平的原因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将不是由他而是由洛甫来作；另外，他希望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在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之时，在瑞金所有的主要中国领导同志中，奥托·布劳恩发现："给我印象最深的当然是毛泽东。他是一个身材修长的，几乎可以说是很瘦削的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在很少的几个庆祝会上，我们见面时很随便。在这种场合，他总是保持一种威严而又谨慎的态度，总是鼓励别人喝酒、说话和唱歌，他自己则在谈话中插进一些格言，这些格言听起来好像是无关紧要的，但总有一定的含义，有时还含有一种揶揄的暗示……当有人第一次提出，我们的主力是否应当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他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想可能是老子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类似这样的格言和比喻，我们还可以随意举出一些例子，这暴露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但其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它们毕竟适合了一定的具体情况。毛不仅在私人谈话中或小范围里运用这些格言和比喻，而且还把它们引用到他的讲话中，并以革命的激情从中引出令人铭记的口号。我自己就经常亲眼看到，他是怎样用这种办法深深地影响听他讲话的农民和士兵。

“……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毛从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不懂外语；中国又非常缺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有限的几本至多也是第二手的，原著更是屈指可数。然而，布劳恩自己就不懂中文，充其量仅认识不多的几个字。糟糕的是，毛用折中主义的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加进其他的内容。例如他常常讲无产阶级，但是他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不仅仅是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

但是，博古和他的朋友，以及共产国际都不想抛弃毛，他们意识到他在根据地已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尽管三年以来毛派不断遭到斥责和排挤，毛还是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但是，这一次他只是一个傀儡。“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中超过半数，并选举了自己团体的人担任主席。这样，他们就敢于选举毛，如果他不与他们合作，就可以随时撤换他。毛的职务是名誉性的，没有实权，而洛甫实际上差不多成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首脑。

毛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的两段话，表明了他仍代表着的力量：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

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最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可是，毛在政治上所受的屈辱仍然存在。2月间，他被免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样，又失掉了一个更有实权的职位（同一个月，他的勤务员找到了一个搪瓷饭盒，因此，他不再使用他的喝水缸子吃“三层饭”了）。3月，洛甫以同一个委员会的名义发布训令，批评了由毛主持的查田运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了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用毛自己的话来说，敌人动员了近百万军队，采用了新的战略战术。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开始使用他的德国顾问推荐的堡垒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把希望都寄托在堡垒政策上了。

共产党试图以阵地战来抵抗强大的敌人，这显然是灾难性的。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共产党内对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出现了分歧。毛称广昌战役是一次“大灾难”。

他指责采取分散兵力的堡垒战术是消极防御，并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就轻率发动进攻。布劳恩回忆说：“他利用一切机会，不断

重复数落着这些罪名，甚至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他在公开会议上很少这样说，但在背后同他的亲信交谈时，就竭尽诽谤之能事。”

毛之所以选择布劳恩作为他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可以理解的，布劳恩对此解释说，他毫不含糊地在他的同胞中煽动民族自尊心和仇外情绪，进而推论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

广昌失败后，5月初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提出了一个张皇失措中拼凑的计划。毛建议进行四面反攻，虽然这会把红军分成四部分，但每一支在不同方面的进攻都可以吸引国民党军队，从而创造打破“围剿”的机会。他的建议也未得到支持。最后，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折中方案，在石城以北建立强大的防线，并派遣一支红军先遣队越过敌人防线袭扰闽浙，以及秘密组织从中央苏区撤退。

如果说毛在军事政策的纷争中，对未来有所预示的话，那么他于1934年夏所写的一首词却并未表现出他对未来的这种预见性：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因此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以北上抗日来为撤出江西根据地辩解，因为日本在华北的扩张正在加剧。当时，日本人已经越过了长城，击败了在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并扶植从前的小皇帝溥仪为新的“满洲国”的傀儡统治者。

然而，当第五次“围剿”残酷地推进到苏区时，毛突然再度屈辱地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斥责，说他在土地问题和军事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被排挤出所有党的会议。他可能是和他的湖南同乡刘少奇一起，隐居在瑞金城外几英里远的名叫沙洲坝的村子里，刘也是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排挤的。

8月，毛在距瑞金以西60英里的县城于都的住所中遭到监禁，第三次被从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由于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在瑞金的博古的共同努力，此时，毛面临被永久排除出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层的前景。由于身患疟疾，发着高烧，只得请一个名叫傅连暲的教会医生治疗，所以毛没有作出反应。

当听到他被监禁的消息后，一个后来脱党的老伙伴龚楚，带了一些酒和鸡看他，他们一边吃一边回忆上井冈山之前第一次会面的情形。日落后，他们又喝了很长时间，当他的朋友要回去时，毛打着手势说：“唉，井冈山同志的天下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城镇乡村仍然不断落入敌人手中，10月初，毛由于他的谨慎和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的有限职权，参加了有周恩来、博古、布劳恩，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高级负责会议，决定撤出江西根据地。两个星期后，长征就开始了。

10　长 征（1934~1935）

毛的勤务员回忆道，毛和二十几个人走出于都北门往西一拐，“一条宽大的河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顺着河水往上走去。滚滚的河水带着黄色的泡沫翻腾着，大声地发出呼啸，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太阳落了，冷风一阵一阵地扑来，寒意很浓。主席没有穿大衣，只穿了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八角红军帽。他迈着大步，带领我们前进。10月的一天下午5点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

疟疾高烧之后的毛，被描述得瘦弱而憔悴，他的勤务员解释说：“由于他患病”，大部分时间“不得不骑马”，所骑的还是6年前缴获的那匹毛喜爱的暗褐色战马。陈勤务员补充说，毛的队列中包括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虽然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了；一个男卫生员钟福昌，是在毛患疟疾时派给他的；还有秘书黄有风。

但是，贺子珍所生的两个孩子太小，不能随队行军，只好寄养在江西农民的家里。15年后，人民解放军又回到这一地区，尽管毛派部队四处寻找，但未能得到他们的消息。他的小弟弟毛泽覃和其新婚妻子（贺子珍的妹妹）留下掩护。他的大弟弟毛泽民作为银行行长，随队长征，负责根据地政府的货币、金银和印钞机器。

后来毛泽东声称，长征是在我们犯错误的时期进行的，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他拿丧失江西根据地与失败的俄国1905年革命相比较。还有一次他断言长征是完全不必要的，假若有更高明的指挥才干，是可以击破第五次“围剿”的。

长征开始时，红军并不真正清楚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后来毛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假如你以为我们有过确定的计划的话，答案是我们不曾有过这类的计划。我们只是打算突围，与其他根据地

会合。此外，惟一有意识的打算就是转移我们的阵地，以便可以与日本人作战。

毛能否参加长征也是有争议的。假如他的疟疾没有痊愈，就有可能和其他生病的领导人，例如像瞿秋白（也可能像他们一样被国民党抓获）一样留下来作掩护。即使他康复了，考虑到领导层中有强大的反对毛及其派别的力量，决计把他留在江西也不是不可能的。如同他的许多亲密同志和支持者，其中包括陈毅、谭震林、萧华(12) 和邓子恢等被留下来一样。显然，控制党的那些人这样做是希望避免路途中的各种争吵，因为在突围之前，他们的士气已经大大低落了。但毛曾任第四军政委的这一资历，又使他不得不去。据一种解释说，“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曾想把毛留下，但林彪和其他将领却坚持他应该随从。

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力量，才冲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而惟一通向最近的贺龙的共产党根据地的道路，也被蒋介石堵住了。贺龙的根据地位于北部250英里的地方。这时，毛的运气发生了首次改变。毛建议放弃与贺龙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沿一条很长的弧形路线穿过贵州，渡过长江，红军就可以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张国焘的四川根据地。张曾是毛的老对手，后来也一直是他的对手。当时军事指挥员们已开始怀疑布劳恩的指挥才干，毛的意见被采纳了。

红军在艰难地穿越贵州期间，受到贵州军阀的堵截，到黎平暂驻休整，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毛在这次会议上重返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向遵义前进。在这段长征路上，毛的妻子贺子珍在低空轰炸机的轰炸扫射中负伤。据说有20块开花弹片留在她身上，但她还是活了下来，并产下一

个婴儿，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在长征路途的前半部分中，毛写了三首十六字令，盛赞大自然的伟力：

其一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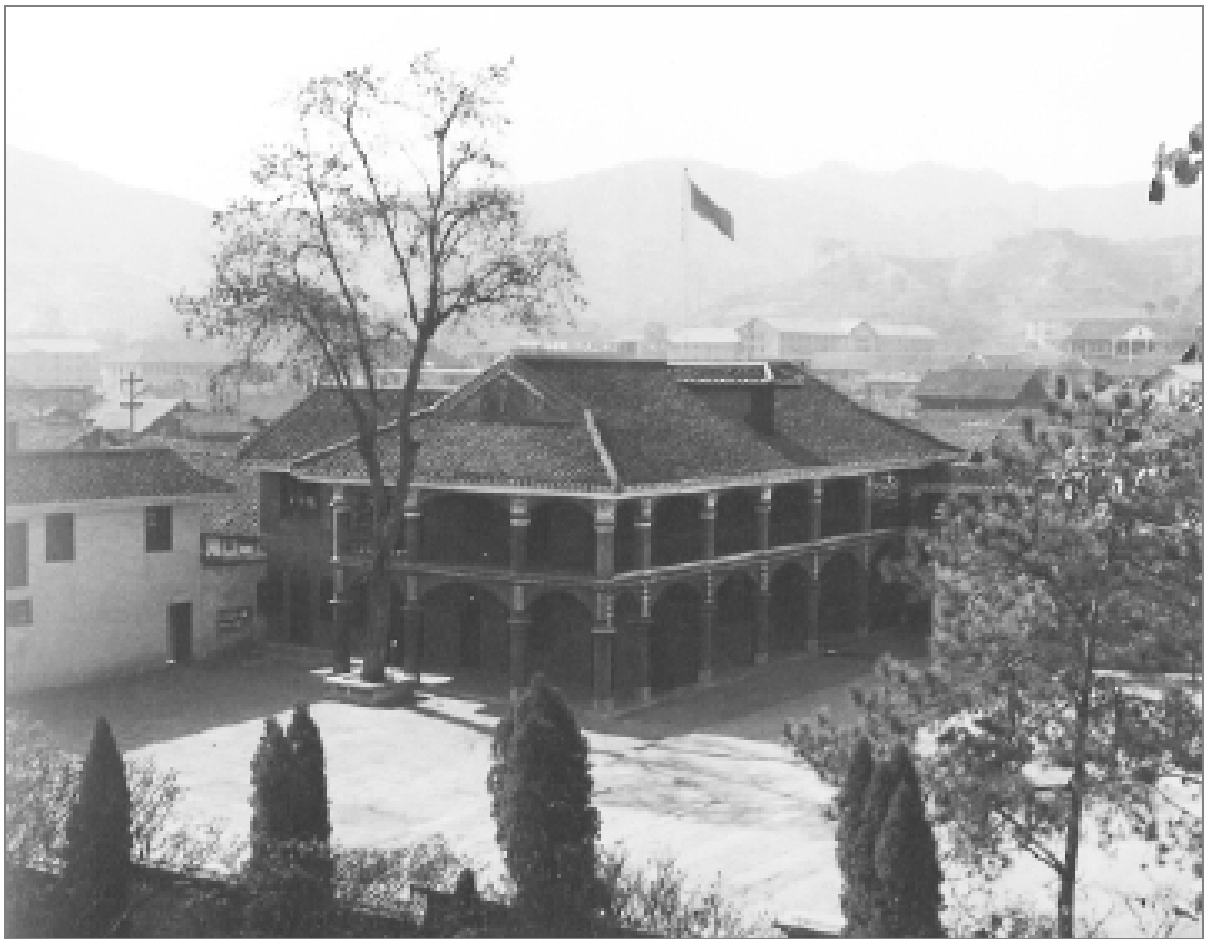
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

刺破青天锷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其间。



>> 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他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进攻，得以休整12天，招募新兵，并继续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他们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红军的指挥员或政治委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就展开了攻势，提出以博古为首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策略是错误的。最终，会议采纳了毛的意见，并把它写入了会议决议：

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

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敌人向我们进攻与进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

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当以……主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

博古因没有纠正“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和拒不接受批评而受到了毛的指责。毛在遵义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继而“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此时周恩来则意识到，事态正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他承认了人们指责他的那些错误，并建议由毛接替他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一种有效的先发制人的做法，致使博古和其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除了接受周的建议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毛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考虑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通常就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成为党的惯例。在被排挤出党的高级领导层两年之后，毛又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从此他再也没有被罢免。这使他在后来的10年中扶摇直上。现在他成了党的五或六人最高领导中无可争辩的一员。

一般认为，在大约20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也许仅有2人是毛的支持者，即林彪和聂荣臻。但是毛还可以利用正在增长的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可能已经失去了生杀大权，因为领导上谴责他采用残酷屠杀的方式镇压反革命。彭德怀将军和刘伯承将军对于过去制定出的军事决策十分恼火。再者，由于要扔

掉从江西带出来的、不利于军事行动的过于笨重的民用设备，张皇失措地撤离根据地，同时又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致使干部们士气沮丧。

毛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失望情绪，一方面由于他特有的朴实的军事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像丘吉尔一样，能提出近乎冒险的，但同时又是明确的爱国主义的呼声。像丘吉尔一样，他知道如何把握国民的最深层的本性，激励他们去战斗、去忍耐、去持久地反对一切不平等。

但是，也许功劳必须归之于洛甫，在遵义会议上，正是洛甫对达成妥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决议中，确认了旧领导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抚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同时也抛弃了旧领导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以得到不满的将领们的谅解。毛后来评价洛甫时说：“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

这样，当毛从后门溜进政治局时，也就是说，作为他成为新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的结果，洛甫取代了博古任总书记，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从这一天起，毛得到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呼—毛主席[13]。洛甫走上了当时党内最高的职位，毛也登上了通往权力顶峰之梯的第一步。

很可能在1935年1月8日政治局决议之前，毛和周就曾有过某些谅解，因为从那时起周再也没有试图制定有关军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决策，并在以后的40年间一直是毛忠实的副手，从未对他的最高权威提出过挑战。

诚然，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考虑在非常时期转向毛，希望毛出来领导，是有实际原因的。此时他们已深入中国内地，在那里，以前那些受外国训练和只有城市经验的领导人是不适应的。他们

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这位领袖至少应领导他们到能够再次起来占领城市之时。

此刻，毛主要关心的是前进途中将会遇到的军事挑战，这就必定要依靠周在组织上的支持和刘伯承的军事谋略。到遵义时他的部队仅存30，000人，招募了20，000新兵后，红军人数上升到50，000人左右。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渡过防守严密的长江，到达张国焘的川北根据地。第一次尝试过长江用了5个星期，但没有成功。2月底，毛的部队再次占领遵义。而且，他们至少在这里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毛为庆贺重占娄山关，写了一首词：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然而，毛从红军的老式收音机里得知，在敌人的压迫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他的四川根据地，向西撤退，这样，渡过长江已无助于毛

的计划了。3月，毛率领部队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穿梭运动。毛指挥部队三渡赤水，迷惑国民党把军队集结在长江北岸。但共产党却很快掉头，再渡赤水，挥师向南佯攻贵州首府贵阳。

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佯攻、强行军和运用计谋，红军终于在皎平渡渡过长江，这段长江当地又称金沙江。江中流急滩险，难以航行。共产党成功地从江对岸缴获了6只小船，部队一批批摆渡过长江，用了9天9夜，胜利地闯过了天险。

毛的勤务员描写金沙江，“水急浪大，凶龙般地翻腾着”。天快拂晓，他和毛一道过江。此后，在安排毛能办公前，他去安顿临时的床铺和烧开水，毛对他发了脾气。

“这里连张小桌子也找不到。”陈随口答道，“您、您先喝口水吧！”

“现在重要的是工作，”毛用他那严肃的但又温和的语调说，“吃饭喝水都是小事，江那边有我们两三万同志在等着哪！这是几万同志的性命呀！先去找块木板架起来也行！”

陈飞也似的跑着四处搜寻，好容易找到一块小木板。毛亲自动手和他把它架了起来，摆上了办公用具。

巧渡金沙江靠的是胆子大和运气好。除此之外，似乎还因为云南军阀龙云并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真心支持者，他最后反叛了蒋，在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得到了一个荣誉职位。当时，云南是国民党军队还未进入的省区之一，仍处在各地方军阀的复杂的政治统治之下。

此刻，毛进入了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是完全生疏的区域。毛后来回忆说，他们回师南向，渡过金沙江后，就陷入毒蛇、蚊虫、炎热的

气候和食品短缺之中。[14] 但他至此，对于他的成功仍然是洋洋自得的，在会理，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洛甫给予军事指挥以明确的支持。

可是毛却严厉地批评林彪，在执行命令时表现得不够坚决。林在给彭德怀将军的电话中曾这样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应当出来指挥。”林也写信给毛解释，他认为所有这些迂回转向，是毫无必要地削弱了部队。

毛回答他：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

下一个冒险行动是抢渡大渡河，这是一道在山间奔腾的急流，是整个长征途中最为困难的障碍。红军打算在安顺场渡河，19世纪的太平天国起义军就是在那儿被消灭的，《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许多英雄也是在那儿被打败的。

这时出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一个敌军指挥官以为共产党还要过好几天才能从他们预计的位置到达这里，所以他仍去南岸他妻子的亲戚家赴宴。一支红军先头部队活捉了他，缴获了他乘坐的一条小船，然后过河又夺取了另两条船。红军就使用这三条小船渡河，用了三天三夜。但是，春水开始上涨（已时至5月底），增大了渡河的困难。每渡一次，就要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同时，在天上蒋的轰炸机不断袭击，在地上敌军正从至少两个方面赶来。他们决定夺取更靠北一些的泸定桥，这也许是他们渡河到中国北部的最后机会。在那些绝望的日子里，毛甚至与布劳恩讨论穿越西康和青海，到新疆靠拢俄国人的可能性，这个德国人劝阻了他。

夺取泸定桥是又一次英雄主义的壮举。这座桥由13根铁索组成，底下9根上铺桥板，作桥面以供行走，另外4根分列两边为护栏。当共

产党到达时，敌人已拆除了大部分桥板，以为没有人会愚蠢到试图从光铁索上过河。

在他们缴获的敌人的一道命令上声称：朱德和毛泽东“已面临石达开（太平天国领袖）第二的危境”。“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消灭共军，在此一举。

可是，毛的战士的作为是他们所想象不到的。他们手把着铁索，身体悬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过河，尽管前面有敌人猛烈的射击，下面是奔腾的急流，但是他们仍然冲了过去，占领了北岸桥头。敌人点燃了留在他们一侧的桥板，即使如此，也未能阻止共产党。紧随在后的红军士兵们，在铁索上由南向北铺上木板、树棍，作为新的桥板。

毛全神贯注地观察着渡河。假如此刻在桥头系上一磅炸药，就有可能结束他的事业和运动。

毛后来回忆说：“过了大渡河，我们应该向何处前进呢？我们拍着头思索。事实上，已经无法选择了，他们只能继续向北，经过已经开化了的西部山区，到达陕西苏区。但是，自然界的困难是极其巨大的。首先遇到的就是大雪山。

途中，穿过一片开阔谷地时，他们突遭三架敌机的俯冲扫射。站在毛身边的警卫班班长被击中，无声地倒下，当毛蹲下看他时，他正用手捂着自己的腹部。

“没关系，你会好的！胡长保同志，”毛说，“你不要紧，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疗一下就会好的。”

可是，他的头垂了下去，他的眼睛闭上了。毛慢慢地从他的脖子底下抽出手来，然后站起来，拿出一条夹被，小心翼翼地盖在胡长保

同志的身体上，低头肃立默哀，然后掩埋了他的尸首。毛距离死亡仅仅只有几英寸之远。

翻越大雪山，红军必须爬上1.6万英尺的高度。许多人在山上长眠不醒。毛的疟疾又发作了，部分路途不得不躺在担架上。他写了一首词，以磅礴的气势将当时环境和政治地理融汇在一起：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关于炮铜岗[15]，毛回忆道：“在这个山峰上，有一个军团死掉了三分之二的驮畜。成百上千的战士倒下去就没有再起来。在下一段长征路途上，毛感到是进入了神秘的奇境。

“在西康边界附近，”毛回忆道，“没有渔民，所以鱼儿不怕人……我们杀我们的牦牛、马匹吃，把肉驮在仅存不多的驮畜背上，最后我们就吃驮畜，而自己背肉。”

“尽管条件极为艰苦，但与我们交战的最好对手只是当地土著部落—有苗、番、彝，也有汉。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在其他地方学到的更多……我们必须感谢（蒋）总司令，把我们赶到这样神奇的地方—如果不是总司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见到这些。

在危险神奇的川西北藏区的山麓小丘的另一面，毛和他的对手张国焘相遇了，张是另一块共产党根据地的领导人，在党内与毛的地位相等，并指挥着红四方面军。两年前，他们撤退到西部地区。7月20日[16]，在倾盆大雨之中，两支部队在一个名叫两河口的村子里会师。

那天晚上，朱德将军步行和张一起去张的住所，与他彻夜长谈，向他解释了遵义会议时面临的紧迫困难，当时为解决眼前危机，选举毛出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以缓和党内领导层的争论。朱要求张眼下支持只讨论军事的议程，不再重提政治问题。

可是，张肯定是从双方军队的比较中，增加了勇气。双方军队在人数上大致相等，各约4.5万人，但四方面军没有同国民党追兵正面作战，得到了良好的休整，有更好的士气、食品、服装和装备。一位长征亲历者这样评论张的部队："他们的举止就像一个富人对待一个穷亲戚。"在宴请和大会演讲之后，领导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就展开了暴风雨般的个人辩论。张主张继续向西撤退，到新疆就有可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结果遭到否决。加之他过于迫切地要求由他出任党的总书记，更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激起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毛派的一致反对。

毛十分清楚，林彪和其他将领对他的指挥才干并不完全满意，后来毛承认，同张国焘的这场斗争，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党有可能分裂，甚至在意见分歧的党的领导人中间会进行内战。然而，他自己的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同伴和大部分政治局成员还是接受了他的计划，由西康向北，朝着蒙古继续长征。

两支部队会师不久，又再次分成两支混编的部队，一支由毛率领，一支由张率领。这也许是朱德将军的一个妥协建议的结果，朱还建议任命张为合编部队的总政治委员，与他相并列，朱自任总司令。张后来声称他接受了这个职务，但毛继续加以干涉，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核阅所有文件，径行批准决定，交总司令部执行，而不是在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之间划清职权，把部队交总司令部指挥。

8月初，两支部队沿不同路线向北行进，可突然被一条河分割开来，由于河水上涨，浪大流急，难以通行。张声称渡河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的左路军必须返回西康；并命令朱德将军和刘伯承将军，以及部队中唯一的一架电台，随他一起行动。朱和刘拒绝了，张即监禁了朱，命令他谴责毛，并断绝他与毛的一切关系。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朱反复地说，“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对此，张说，如果朱将军还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就枪毙他。

“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朱回答，“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但是，张并未履行他的威胁，也许是害怕会导致忠于朱的部队攻击他的部队。由于不愿意看到两支共产党部队火并的可怕惨剧，朱将军极不情愿地随张返回。

张在回忆中说，他电告毛的右路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而毛带走了他的部队，拒绝回来商议或帮助他的同志。此后，国民党集结了军队，防止张沿毛的路线北上，所以他转而南下。结果，在与毛及其他人在陕西再度会师之前，他率领他的部队在西南又坚持了一整年。

毛的右路军用了6天时间走出了青海草地。这里是海拔8，000英尺的高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下雨（特别是在8月），由于积水无法排出，形成了一个绵延数百英里的大沼泽，不见一棵树木，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

“如果我们掉头南下，”毛对他的干部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逃跑，就会断送革命。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在进入草地之前，红军必须收集食品，他们用尽各种办法，从这一地区的藏民那里得到了数量可观的青稞、羊、牛和萝卜。

毛在到达陕西根据地后幽默地说，“有一天我们必须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毛的勤务兵在回忆中这样描述草地：“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踏在上面，发出使人厌倦的‘噗唧’、‘噗唧’的响声；一不留神，就会双脚深陷，甚至埋进这无底的泥潭中。在这种时候，要是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想拔出腿来势比登天还难。

长征途中最后翻越的一座大山是六盘山，在那里，毛忠诚的勤务员差点死于疟疾。登上六盘山后，毛写了一首词：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1935年10月底，毛和长征的亲历者们到达了目的地，陕西苏区的吴起镇。当他们第一次住进顺山坡挖成的窑洞里时，十分惊愕地发现，这里的朋友没有大米，只有金黄黄的小米。毛的炊事员不知道如

何做小米饭，只好买了一只羊杀了，煮了当饭吃，抬着一条羊腿给毛。“那很好办！要学嘛。”毛得知此事后说，“到了新的地区，就要学会新的地区的生活习惯！要不，我们就会饿死的。

尽管天空纷纷地飘着鹅毛大雪，毛还是立即率一队人去陕西根据地司令部所在地夏师湾，会见当地领导。

“主席穿着那件从江西带出来的、已经破了的大衣，”他的勤务员回忆道，“头上戴着那顶很旧的帽子，和欢迎的人群频频点头招手。这时，欢迎的群众让开了一条路，有数十位首长跑过来热烈、激动地和主席握手。他们中间有刘志丹和红25军军长徐海东。

“是海东同志吗？”毛问，气质有些像斯坦莱，[17]“感谢你辛苦到这儿来迎接我们。”一年前离开江西时，差不多近10万人的部队，一路上衣衫褴褛、饥饿疲惫地挣扎到陕西，仅有5，000人活了下来。他们饿了吃树皮野草，渴了喝自己的尿，饱尝风雨霜雪，闯过沼泽险滩，经受住了各种严峻的考验。

毛的军事指挥得到一致拥护，他的政治指导也得到有保留的拥护。不久，他对长征作出了自己的评价，这就是著名的《七律·长征》一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外部世界震惊了，共产党的支持者们高兴地得知毛的队伍仍在继续战斗。中国进步作家的领袖—鲁迅和茅盾，打电报赞颂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对于难以置信的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的更引人注目的结论，包含在几个星期后他向他的同伴们所作的报告中：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

也许这读起来有点像丘吉尔式的夸张，然而，其经过完全是真实的。

11　延 安（1935~1937）

自学生时代以来，毛第一次能够过一种较稳定的生活。他在陕西的红色根据地待了八年多，头几年是住在有着旧城墙的保安镇，这个地方曾是帝国抗击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的一个要塞。其他时间毛都住在延安，这使延安天下闻名，并在毛的与众不同的共产主义特征中印上了延安的名字。在那11年当中，毛躺在长征的荣誉簿上，安全地生活在一个受到很好保护的大根据地里。在这里，他关于改造和革命的思想得以实施；从这里，他不仅可以对中国的其他地方说话，还可

以向外部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人们对延安的岁月是带着眷恋之情来回顾的。



在保安，毛拥有一所两个房间的窑洞，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和墙上的地图。虽然当了多年党的领导人，尽管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和官员的财产，毛的个人财物还装不满一只箱子。虽然他是红军的指挥员，但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毛和其他人吃一样的伙食，唯一的例外就是他有湖南人“爱辣”的嗜好。他甚至用馒头夹着辣椒吃。除了这一嗜好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他阐发爱吃辣椒的人就是革命者的理论。

“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摆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他非常喜欢一首叫做“红辣椒”的滑稽歌曲。在这首歌里，辣椒痛心自己活着只是供人吃食的命运，它嘲笑白菜、菠菜和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辣椒最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

然而，毛的消化功能并不适应西北的定居生活，他便秘的毛病在保安人所共知，以至于埃德加·斯诺报道说：“毛每周解大便一次也成了值得庆贺的大事。”有一次当被问到是喜欢过国家首脑的定居生活，还是喜欢过转战南北的战场生活时，毛如实地回答说：“我更喜欢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

但在其他方面他很适应。一个刚从欧洲学医回来的中国留学生对毛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宣布毛身体非常健康。彼得·弗莱明散布说毛得了肺病或其他“不治之症”，但这不真实。一个体检的见证人说：“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

没有烟抽是毛在长征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沿途他遍尝各种各样的植物以寻找香烟的替代物。他的牙齿都熏黑了，几年后当一个德国牙医到延安时，这个牙医不得不来了10次给毛补牙。

毛的不拘小节—对处于他这种地位的中国人来说，很是少有—还扩及到第一次在陕西见面的外国人。一个美国客人在与毛谈话时，曾“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即捉虱子。还有一次，这个美国人与林彪在一间小屋里谈话，毛也在场，房里很热。“妈的，太热了！”毛骂道。边说边脱掉裤子，一屁股坐在地上，那种神态和甘地缠着腰布时一样自然。正是在这次访问中，采访者报道说，毛“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

充沛的体力对毛后来的政治斗争非常有利。

自遵义会议以来，尽管毛由于走运和判断力强而经受住了领导长期的艰苦行军的考验，但从政治方面来说，他的领袖地位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毕竟他领导的军队在长征结束后几乎丧失了一切—地盘、重型武器和政府的象征，甚至他们最好的武器和服装。毛和张国焘在四川会合时，他在这些方面就明显不如张，当时，他对此就已经感到屈辱。在陕西，毛又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势：当毛的部队被赶出江西时，陕西的地方红军领袖们不仅一直固守阵地，而且还扩大了他们的阵地。当破衣烂衫的长征红军于1935年走完长征路时，他们对陕西的共产党是欠了很大情的：因为没有他们的这些成就，长征红军连一块安身的地方也没有。

从毛个人的立场看，幸运的是陕西的红色领导人碰巧也发生了分裂，而且与在江西发生的分裂和长征路上的分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个“土生土长”的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与党中央从陕西以外派来的更教条的亲俄的领导人有摩擦。毛处于调解的位置，他自然

是支持刘与高，因为他们的立场和他的一致。这又使刘、高欠毛的情。



即使这样，他们的品格和他们的追随者也使他们成为角逐全党领导人的可怕的人选。毛到达陕西不久，刘就在战场上阵亡了，但高仍是延安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又去莫斯科短期受训，回来后成为靠近俄国边境并具有战略地位的东北工业区的红色掌柜。

在延安时，毛总是小心地称赞高岗：“他执行了正确路线，为红军和革命在陕西创建了一个根据地。毛在一些地区性问题上听从高的意见，但高对毛的挑战直到50年代才到来。在延安，既然党和红军疲惫的长征已经结束，于是毛集中精力对付博古和宣称有俄国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企图重掌领袖大权的挑战。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1935年冬圣诞节期间召开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再次侵犯中国领土，爱国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人义愤填膺。为什么我们不和他们一起抗战，进而影响他们，使他们更为同情共产党在中国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毛的观点，但布尔什维克则被吓呆了。

毛指责他的批评家们采取关门战术。他模仿他们的腔调说：“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惟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后来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党不应该再依附莫斯科，听莫斯科的指挥，“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他宣称：“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改变。我们相信它能。”进而他又详细阐述了对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什么是极端重要的理论鉴别力：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么，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

毛试图通过领导一次横渡黄河的军事远征，与日本交战，从而使抗日民族同盟在他的同志们面前变为一个现实。当时日军占领了河北，控制了北京，以作为他们蚕食中国战略的一部分。但国民党军队挫败了红军的这次东征，红军不得不退回陕西。也正是在这时，毛写下了他最著名的诗篇《沁园春·雪》，抒发了他自比中国历史上伟大皇帝的雄心壮志：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国民党的飞机此时正在撒传单，告诉毛的士兵说：“杀死毛泽东赏大洋10万元。”后来这一赏格提到24万元。

根据共产党当时在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毛确定了他的基本策略，然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积极活动起来。1936年5月他通电国民党政府，敦促它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许诺给中国的穆斯林以自治权，如果他们支持这样的统一战线的话。他还建议召开所有爱国抗日力量参加的会议。他甚至还向哥老会发出强烈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哥老会是著名的秘密组织，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朱德、贺龙都曾是它的领导人。

毛过去因与土匪和帮会头子联系，一直受到政治局的批评。但现在他提出在抗击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中，要尊重这些人。“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水浒》正在变成现实。

但毛和其他共产党人致蒋介石的一封敦促两军停战共同抗日的私人信件，则遭到了蔑视。

1936年7月，一个密苏里州出生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人急匆匆地到达延安，这是第一个到毛在陕西总部的西方记者。他从中国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其他报刊写了好几年的报道。斯诺发现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

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接着斯诺描写毛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也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毛“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斯诺发现毛对当前世界政治相当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

他不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投票权的国家，为什么仍然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他对于拉姆塞·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另一方面他又把罗斯福当做反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问斯诺关于印度的许多问题，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就不会实现独立。他还问到美国少数民族的问题。

毛同意回答斯诺的问题，斯诺描述了这一场面：“1936年7月16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过了晚上9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都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

在一次毛结束与斯诺谈话的时候，已是凌晨2点了，斯诺精疲力竭，这时出现了一个愉快的插曲："他们[18] 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了起来。这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当问到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即他与俄国的关系时，毛回答说：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但这决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莫斯科支配……我们的斗争当然不是解放中国后再把它交给莫斯科……

当许多国家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可能要出现建立国际苏维埃联盟的问题，看看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很有意思的。但今天我不能提出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也不能事先解决它。在今天的世界，由于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有一个联盟似乎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是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话。

实际上当他私下与斯诺谈话时，毛有点想"损"俄国人："毛在和我的交谈中称苏联为他的'忠实的盟友'。"他把酸梅做的甜食讽喻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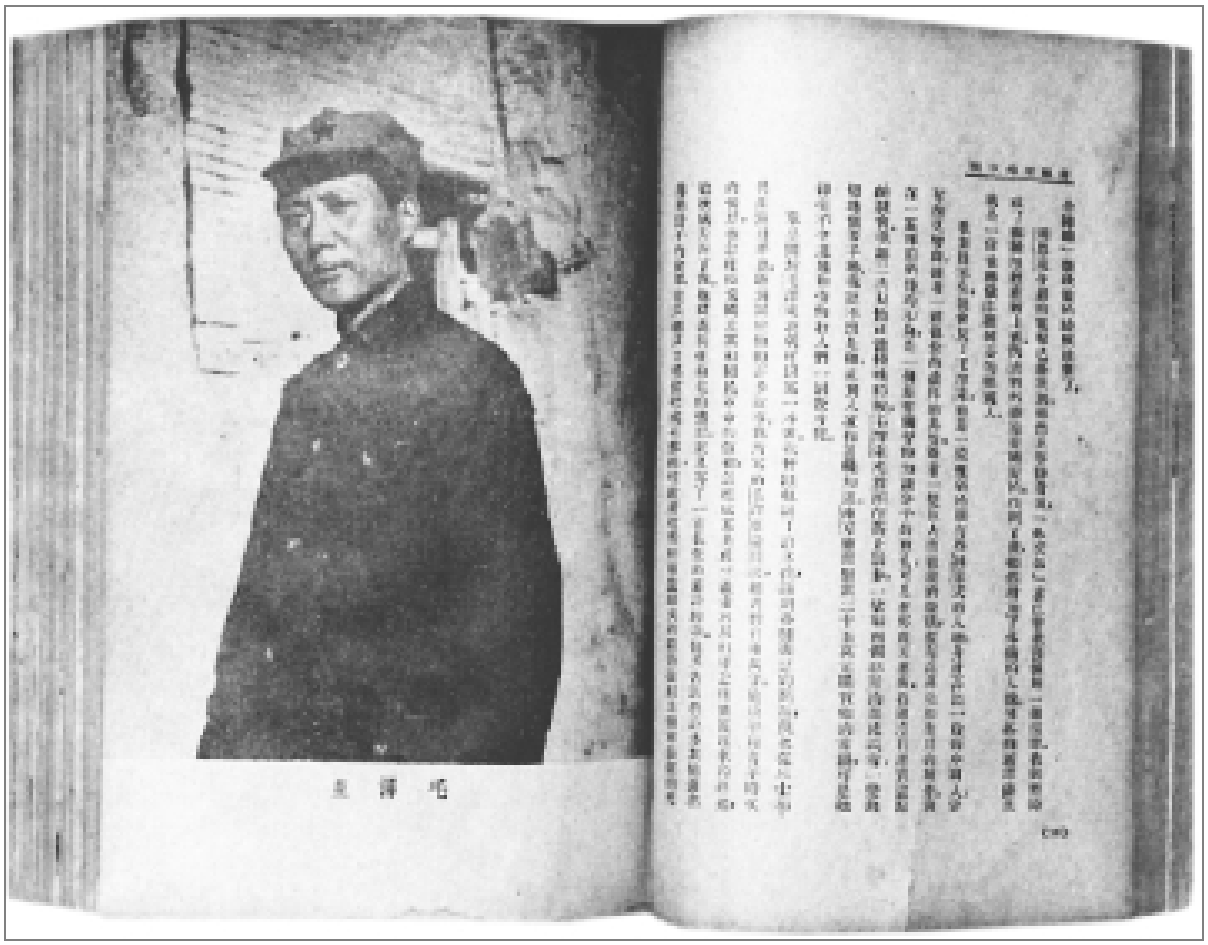
毛在一次与斯诺谈话时，告诉他说："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想在其中实践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不能独立，那么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

在回答了政治问题之后，毛勉强转到斯诺提的个人问题上。这个美国人敦促毛纠正流行的关于他的歪曲的不真实的传闻。

最后毛说：“如果我索性撇开你的问题，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

“我要的就是这个！”

因而在以后的4个晚上，他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斯诺埋头记录，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翻译坐在他旁边，把毛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j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l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



>> 1936年，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诺访问陕北，写出了第一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这是1938年复社在上海出版的该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这样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前一部分就有了毛泽东告诉世界的唯一的一份自传，它在最早出的左派图书俱乐部的版本里占54页。这个故事对毛自己的同事产生的兴趣就像对西方读者产生的兴趣一样大。斯诺指出：

“在毛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

“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1936年秋，张国焘和朱德将军衣衫不整地从四川回到陕西的根据地，与毛待在一起。张不仅得承认在长征的紧要关头，他南下是错误的，而且承认他还犯了一个错误，这就是在到达陕西前不久，他派遣他的红四方面军最精良的部队在西线进行野鹅式的追击，结果被消灭。他希望带领他自己的人马来扩大陕西根据地，但结果却是不光彩地请求毛帮助解救他的部队。毛拒绝冒这样的险，因为当时是几面受敌，他还谴责张损失了宝贵的力量而没有达到任何目的。这一事件使得毛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很容易处置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的对手。



>> 1936年冬，毛泽东与朱德在保安

朱德将军，毛的老搭档，无疑与毛关系和睦，当红色“土匪”贺龙不久之后带领他的部队从南方进入陕西这个根据地时，共产党在陕西集中领导权的过程也就完成了。所有使共产主义决定性地走向全中国的工作已在这个西北根据地准备就绪。

“1936年12月12日上午，保安出现了不寻常的活跃情景。”奥托·布劳恩（李德）后来追述道，“毛的住地同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进行联系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着。就连习惯于夜间工作、次日睡到中午的毛泽东也一大早就出来了，周恩来来到他这里，过了一会儿，洛甫、博古和其他几个人也来了。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毛泽东、蒋介石争夺对中国控制的22年斗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北方的主要军阀之一[19]—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持“中立”态度—在蒋总司令到西安视察的时候扣留了他。

所谓“西安事变”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世界，惊动了各国朝野。毛很激动，要求把蒋介石押到保安来就他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债进行审判和惩处。但斯大林持不同的看法，他打来的电报称，蒋介石是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唯一可能的领导人，因而毛应争取使蒋得到释放。[20]

毛派周恩来去西安，以使事件朝着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发展。12月19日为安慰斯大林，毛致电蒋介石，敦促他召开各党派会议，讨论联合抗日的政策问题。周恩来后来说：“我们一个礼拜都没有睡好觉……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作的一个决策。”

最后，这个军阀在蒋总司令许诺与共产党停火、更坚决地抗日、更民主地管理中国之后于圣诞节释放了他。毛在如何处置蒋的问题上

无法压制政治局内的分歧，但国民党领导人至少在现在公开表示为了共同的目的要与共产党合作。

与此同时，红军扩大了地盘。它占领了延安，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移到这个较大、较方便的城市。延安是座古城，面临一条河流，周围都是黄土山，窑洞都是凿山修建的。延安是座集镇，有很多历史古迹，包括一座建于宋代的宝塔。

在延安，毛搬进一处有3个房间的住所，还有一个“胜利花园”，园里种着蔬菜和烟叶。后来在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延安的时候，他又搬到杨家岭山上一个完全防空的大窑洞里居住，但他仍在原先住的地方开会。奥托·布劳恩回忆说：“住在窑洞里非常舒适，冬暖夏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御日本飞机的轰炸，只是跳蚤和老鼠使我们很伤脑筋，以后我们慢慢地习惯了。



>>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

但毛的个人生活并不美妙，他的妻子贺子珍从来没有完全从她在长征路上可怕的经历中恢复过来，长征途中她正要生毛的第四个孩子时突然遭受空袭，受伤很重。她到陕西时，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状态：6，000英里路她多半是在担架上度过的。在毛的新大本营她也从来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她曾经被说成是执拗的妇女，从来就不理

解毛的政治世界。他们的第5个女儿是在陕西怀上、于1936年夏埃德加·斯诺访问期间出生的。毛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她长大后叫李敏，在“文革”期间很出色。



正因为毛的家庭生活不大理想，才使他在陕西这个不同寻常的道德氛围下进行积极的社交活动。这里毕竟是一个力图使他们的生活建立在一定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共产党人的社会。这时，大量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带着各种各样的理想从上海和中国各地涌入延安，对于那些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的长征的士兵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事。

有伙儿学生因建立一个自由恋爱俱乐部而被抓了起来。但奥托·布劳恩指出："体现红军面貌的严格的纪律和严谨的生活方式，在延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慢慢松弛了。"他和另一个外国人乔治·哈特博士（黎巴嫩籍美国人）[21] 曾在周末招待过各种类型的文艺界人士，"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主要谈艺术和政治，也打乒乓球，有时甚至还跳舞，在这以前跳舞一直是被当做外国的恶习被禁止的"。

时间一年年过去，社会气候也更为宽松了，周末梨园舞会成为人人期待的活动。音乐是搜寻来的一些唱片，或是乐队伴奏，什么乐器都有，从中国古老的二胡，广东的板胡到脚踏风琴（传教士留下的）、口琴和西洋小提琴。传统的中国乐曲与西方的狐步舞曲和华尔兹一同演奏，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妇女自己挑选自己的舞伴，这是违背中国传统，显示妇女解放的举动。毛自己也不是没有受到这些新风尚的影响，女同志也有权走到毛的跟前，邀请他共舞一曲。

外国客人非常喜欢周末晚会，一个外国人描写道："你可以看见头发浓密的毛泽东穿着衬衫和延安大学漂亮的女学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毛也能和中国的女共产党人消磨时间，他特别欣赏生活豪放不羁的女作家丁玲—毛的湖南同乡，也是杨开慧的老校友。

毛还第一次有机会与西方妇女亲密交谈。两个美国记者，一个是为《法兰克福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写稿的艳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另一个是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她的笔名叫尼姆·威尔斯。她们俩都是较早访问延安的人。她们俩不喜欢待在一起，并为了博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任而成为对手，但她们都经常见到毛，毛也喜欢有她们作伴。

后来又来了王安娜，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女郎，在欧洲嫁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22]。她到延安几天后，有一次正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她的院子里喝咖啡，突然，毛闲逛过来，加入她们的谈话。当他得知王安娜有一个儿子时，马上问道：

“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



>> 1937年，毛泽东、朱德和访问延安的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在一起

王安娜略感意外，解释说她的男孩是黑头发、黑眼睛。然后，毛问得更细：“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接近中国人的颜色。”

“这真有趣！”毛泽东道，诡秘地一笑，“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1937年春，史沫特莱到延安的第一天，她半夜去拜访毛，后来她描写道：

我……掀开一个窑洞的门帘，进入一个黑洞。洞中阴沉黑暗，中央一张粗笨的木桌上面点着一支巨烛，巨烛光在一堆一堆的书报和低矮的窑洞顶上晃动着。一个人影，一只手按桌而立，脸朝门口，面目不清，我见到一堆黑衣服上面盖着一件宽大有补丁的大衣。那人个子很高，令人生畏的人物向我们移动了脚步，并且大声说：“欢迎！欢迎！”接着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很长，也很敏感，就像女人的手一样。我们互不说话，互相打量着。他的脸又黑又长，莫测高深，前额宽阔而高，嘴唇女性化。他是一个审美大师，且不说其他方面的造诣。实际上，他身上的女性气和洞中阴暗的景象令我不安，心里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敌意……

后来，史沫特莱发现：

最初令我强烈地感受到的那种气质，后来证明是一种心灵的孤独。朱德受爱戴，毛泽东受尊重。最了解他的人很少喜欢他。他的灵魂高傲，并且使他孤独……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我有这么个印象：他可以等待、观望许多年，但最终他要为所欲为。

第一次见面后，毛经常去史沫特莱的窑洞，史沫特莱和吴莉莉合住一个窑洞—吴莉莉被史沫特莱选作自己的翻译，被说成是延安唯一一个有永久的窑洞住的女孩。

史沫特莱回忆说：“我们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因为他从来没有出过国，所以他提出了成堆成堆的问题。我们谈到印度，谈到文艺。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爱过什么人，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

什么。有时他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他低吟他自己写的律诗。

在许多方面，毛的个人品格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访问中对这点很有感触：

“在个人意志服从群众意志达到迷信的地方，毛显然是个个人主义者。抽烟在共产党人中被视为缺乏个人纪律的标志，受到劝阻，但毛从不间断抽烟。保安人大多数天一亮就起床了，而毛习惯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中午以前很少能爬起来……

“毛的大多数追随者都留着普鲁士式的短发，而毛却讨厌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与周恩来等其他人的清洁、机智和军人般的忍耐力不同，毛走路时随意散谩，肩弯背驼，像个老农。我给他和林彪照检阅军校学员的相片时，我看见毛的敬礼最是无力。周恩来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看你，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显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样子。毛是侧着头看人，等着他的话产生效果、他的逻辑被理解，一副怀疑的神态。表面上看起来心不在焉，实际上这是毛为了掩饰他那始终警觉而富于联想的头脑而戴的面具。

但斯诺也正确地看到了毛作为党的领袖的积极成分：

“毛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能回忆得起来多年以前与人谈话的日期，客人的姓名，谈话的确切内容和事件的细节。他领导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各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于忠于他的人开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但他们不会像斯大林的个人对手那样遭到大规模清洗和肉体消灭的命运。



>> 1937年6月，毛泽东和访问延安的美国友人拉提摩尔等

毛开始更经常地处理对外事务，并反映出他在党内新的卓越才能。1937年5月15日，他在写给西班牙人民的信中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几个星期后，他又致信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埃尔·白劳德，称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又有一批外国客人来访问他，想了解他对当时国际问题的看法。除了斯诺和史沫特莱外，他在陕西的初期阶段，还会见了欧文·拉提摩尔、T.A.比生、詹姆士·贝特兰，以及瓦列特·克特茜-玛尔克丝。克特茜-玛尔克丝小姐对中国政治并不太了解，所以最初和毛谈话时出现了一些紧张气氛。

“你听说过我什么吗？”毛问。

“当然只听说过正面和反面的宣传。”这个英国女探险家回答说。

“哪些正面的宣传？”

“说你人特好，你正在改善大批中国人的生活，你不会犯错误。”

“那你听过哪些反对我的宣传？”毛又问。

“说你血洗了许多市镇，把8岁以下、40岁以上的人都杀了。还说你是土匪，是流氓。”

克特茜－玛尔克丝记得，说到此时屋里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当她的话翻译出来时，椅子背后、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的士兵身子轻轻地抖了一下。她说话时，毛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她。

突然他笑了：“不，午饭我不吃小孩肉。”寒冰也随之消融。

12　蓝苹（1937~1938）

除了女人和政治，毛在保安和延安这种安定的环境下，得以放纵自己的第三种激情，即读书与思考，他花费大量时间为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寻找哲学基础。不难理解，由于要同其他受过更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的领导人竞争，因而他在陕西的头两年间—从容不迫地，也是第一次有这样的闲暇—阅读和消化了大量翻译过来的俄文哲学著作。由于他过去一直处于四处奔波的游击环境下，这样的时间对他是很少有的。

斯诺回忆了193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采访毛时的情景：当时一个客人给他带了几本哲学方面的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毛在陕西的最初行动是新创办了一个研究院，对干部进行军事和文化培训。他自己亲自到这个研究院讲课，既讲军事战略，也讲哲学，并根据这些讲演撰写了一些重要著作，其中第一篇是完全论述军事战略的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他具体总结了在江西和长征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现在又被用来抵抗日本的蚕食。

毛认为游击战只是一种暂时的战术。“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毛并不放过抨击他的接受过苏联训练的对手的机会。他说：“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这册军事指南最后以典型的、夸张的一段话结束，“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毛的哲学著作是通过这些年在陕西的读书和推理，又经过在红军学院的演讲而形成的，所以他的哲学著作势必会引起争议。他毕竟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读遍并消化马列主义的全部信条—也许仅仅是因为所有的马列著作并没有都被译成中文。就拿他的《论辩证唯物主义》来说，一个西方学者发现，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抄袭苏联哲学著作的中译本。据统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专门领域，毛只阅读了三分之一的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著作，列宁的著作也只读了五分之四。毛后来否认他是《论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的作者，但不是所有西方学者都相信他的话。

毛撰写出版的两部最著名的理论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都于1937年出版。但西方评论家认为，从这两篇著作的文字上看，都很“平常”和“沉闷”。毛作为一个抽象的思想家天赋并不高，后来这些著作都由陈伯达整理出版，陈是中共知识分子，1937年下半年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来到延安成为毛泽东的私人秘书。

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是具体阐述了他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者（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观点，这些教条主义者力图劝说中国同志照搬苏联的教条，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和方式。毛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即要了解某一事物，你就必须实际地接触它，确实地变革它。“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他引用中国的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

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是毛的唯意志论的超级乐观主义发展的顶点。

《矛盾论》阐述了研究各种力量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的重要性。从特定意义上来说，毛试图对莫斯科发生的围绕德波林哲学学派而发生的争论提供一种答案。德波林学派否认在当时的苏联，在富农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毛解释说：“这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性，存在于事物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存在于苏联的富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

毛撰写这些文章时，日本军队正在进攻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从而使几年来日本的挑衅和中国徒劳无益的姑息终于发展成为正式对抗。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朱德将军奔赴前线。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问毛，她是应该待在延安以完成朱将军传记的撰写工作，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情况。毛建议她到前线去，“这次战争比过去历史更重要得多。

毛是对的。这场战争是阻止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剿灭中国共产党的因素。后来，在60年代，当日本领导人就侵华战争向毛道歉时，毛回答说：

“不用道歉，没有你们的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日本皇军使我们的军队发展壮大，达到100万人，解放区的人口达到1亿。”

毛顿了一下，笑着说：“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8月，日军对上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立刻开始认真考虑与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对毛的通电作出反应。9月，正式达成了共同抗击日本的协议，这使得在延安既可以穿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装，也可以穿红军军服。毛通过接见到延安的访问者时戴国军军帽，而在参加共产党会议时则戴红军的五星军帽，来体现统一战线的性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军也完全享受中央政府的军饷以维持八路军，毛现在每月从最高统帅那里领取相当于5美元的薪水。

8月底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以决定新形势下的策略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受到了最后的清算，他被谴责为“右倾”，他本人也（敷衍塞责地）承认了错误。第二年春天，他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然而，当时的重大问题是共产党在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的同时应保持自己多少独立性的问题。毛认为，共产党不应该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命令，而要扩大自己的力量。

洛川会议对毛泽东的个人生活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洛川会议期间，毛第一次见到了一个对他的未来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在会议的第4天，一群来自上海文艺界的年轻人在日本侵略之后前往延安参加共产党，他们路经洛川。这群人中有一个23岁的女电影演员，这就是后来的江青，当时她叫“蓝苹”，即蓝色的苹果。

她当时搭乘给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那天，她与毛眉目传情，从

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

江青1914年生于山东省，其父是个贫穷的手推车制造工。她的哥哥、姐姐比她大许多，因而她童年时代生活很孤独，也饱尝了其父发怒时的拳头。她从未穿过新衣服，总是穿她哥哥穿小的破衣烂衫。

她和其他几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一起被选入一所供“展览”的贵族学校读书。当她全家迁到济南时，江青加入了这个城市的“实验艺术剧院”，第一次得到了免费学习戏剧和音乐（包括钢琴）的机会。

她表演很出色，因而参加了一个流动戏剧团到北平演出。“我走时没有告诉我母亲，”她承认，“只在火车快开动时在车站上给她寄了一封信。”当时她16岁。

她对北平的主要印象是，北平的冬天很冷。她没有衬衣、衬裤，她从家里带出来的最好的被子也因用得太久而磨薄了。不久她就到青岛去了，一个曾在济南教过她的男子已成为青岛大学的教务长。他设法为她安排了工作，流言说江青成了他的情妇。

在青岛，她喜爱上了小说和诗歌，并读了第一本马列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她参加了各种左翼社团，并很快结识了当地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昌[(23)]。她声称在1933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无论如何这表明，她要为此付出代价。

她在青岛跟一个叫俞启威的共产党员结了婚，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俞是江青一个情人即青岛大学教务长的小舅子，那个大学教务长与国民党政府人士过从甚密。

中国每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迟早都会被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所吸引，因为西方文明的风尚正是从这里传入的，江青当然也不例外。在

上海，共产党作家周扬安排她在一个无产阶级剧团工作。后来，她又参加了“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的工作，为劳动妇女开办夜校课程。

这时，国民党开始怀疑她的政治背景，她遭到绑架，在监狱里关了8个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在一个外国人（美国人？）提出抗议并作保的情况下，她才被释放出狱。

1935年她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扮演娜拉的角色（“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此外还扮演了易卜生和果戈里剧中的其他重要角色。公司里的前辈都瞧不起她的表演，因而她拼命要提高自己的演技。

1936年她以“蓝平”的艺名进入电影界，她自己挑选的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蓝色的和平”。但使她恼火的是，她的老板给她改了第二个字，由“平”改为“苹”，“苹果”的“苹”，以使她的名字更具有刺激性。她在上海拍了好几部电影，最有名的是《王老五》，这部电影反映的是城市贫民窟中的社会压迫和爱国抗日运动。



>> 蓝苹，即江青，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人。1933年进入上海的影剧圈，以演《娜拉》主角成名。后去延安，成为毛泽东夫人，改名江青

在上海，流言传播得更加广泛，其中一则是说她曾与演员兼电影评论家唐纳结婚，但后来又无情地抛弃了他，使唐纳悲恸欲绝，几欲自杀。还说蓝苹在1937年又抛弃了另一个电影演员常明。当年下半年她离开上海去延安，陪她去的却又是前夫俞启威。有关这个5.5英尺高的漂亮女人的花边新闻随着她的到来，也传到了毛在大西北的地盘。



>>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江青的传记作者罗克珊·威特克写道，蓝苹自己说，她一到延安，毛就亲自过来问候，并给了她一张票，说他要在马列学院演讲，请蓝苹参加，蓝苹去了，她坐在前排，而且不断地提问，十分引人注目。

为开始新的共产主义生涯，蓝苹改名“江青”，意思是“蔚蓝色的江河”，她否认这是毛为她取的名字。

李德说，当江青到达延安时，人们一般都把她当做非党人士，虽然后来宣称康生在30年代初曾介绍她入党。

江青在后来的言论中非常明了地表白了她当年待在延安的动机，她说：“性吸引在最初几个回合是重要原因，但维持长久兴趣的是对权力的渴望。”

毛希望能用现代的、革命的和非传统的标准来评判他的行为，而他的大多数同事则用非常古老的个人品德的观念来看待这件事。

王安娜在70年代的一本书中引过毛的话说：“我敬佩、尊重贺子珍同志，但说真的，我们不应该再用封建的眼光来考虑问题。按照封建观念，离婚总被认为是对妇女名誉和地位的损害。我不希望再这样了。

后来他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婚姻的非正统态度：“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

毛的辩白又由于贺子珍的孤僻执拗而加强。有一段时间，贺独自住在西安，坚决拒绝了周恩来、邓颖超要她回延安的请求，张国焘的夫人[24]曾经和贺共居一室，发现她脸色苍白，对返回毛的总部有一种病态而强烈的反感。

江青的传记作家威特克写道：“贺子珍抱怨说，泽东对我不好，我们经常吵架，不是他摔板凳就是我砸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至于毛，斯诺写道：“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的和无法招架的。按照史沫特莱的说法，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像是从穷苦思索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嬉笑怒骂。我对他又有这么一个印象：他的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

1938年江青搬进了毛的窑洞，开始是做他的秘书，后成为他的妻子。江青的同乡康生，毛的老资格的党内同事，可能帮助促成了这桩婚姻。

似乎没有人知道结婚的日期，显然没有举行婚礼。毛也许仅仅告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就算这桩婚姻完成了。江青本人1972年在对威特克讲述自己的生平时，故意不谈她与毛的婚姻是否办了手续，不告诉具体的日期。她自己在回忆与毛共同生活的头几年的情景时清楚地表明，毛特别冷漠，他不想反驳党内对江青个人历史的非议。当时，党内对江青的党员身份和早期活动议论纷纷，尤其是那些当年在上海曾与江青有过摩擦的人，现在在延安共产党根据地都是地位很高的官员。

后来据说毛的同事曾就毛离婚再娶江青提了一个条件，这就是江青不能参与公共活动或党的活动。江青自己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有一点是明摆着的，江青至少有25年未在前台亮过相，直到“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战争也开始逼近红军的营盘，林彪在1937年9月取得了共产党对日军的第一个胜利，在平型关战役中打败了精锐的板垣师

团。

但在此时，毛在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又受到了新的威胁。1937年10月底，唯一一个能对毛的党内至尊地位产生严重挑战的人突然来到延安：王明乘俄国飞机从莫斯科飞到延安—这是自红军占领延安以来着陆的第一架飞机—并且带来了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指示。毛和其他同志在机场为他举行了一个适当的欢迎仪式，给了适合他身份的安排：补选他为政治局委员，任命他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正式代表，最重要的是王明还进入共产国际执委会，成为执委之一。

王明既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老资格成员，又是在莫斯科长驻12年、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人，因而他对毛构成了强大的威胁。当毛看到俄国飞机在延安降落时，他心里一定产生了某种复杂的感情，因为飞机送来的既有受欢迎的高射炮、大功率无线电发报机和苏联的其他援助项目，也带来了他的老对手。他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以主人的身份发表了预料中的词藻华丽的讲话，说王明的到来是天降大福—始料未及……

王明带来了斯大林的一系列新指示，这些指示总的来说有利于毛。俄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控制下的势力范围的发展，而不是外部世界的存在。斯大林对中国同志的主要指令是撤销洛甫的总书记职务，因为他早期与托派有关系。这使直到最近以前还被认为是党的最重要职位的总书记一职出现空缺，王明可能认为自己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然而，政治局最后决定让这一职位空下去。

至于其他领导人，斯大林要求停止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但他说得太晚了）。考虑到毛在过去三年取得的胜利，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地位得到承认，但同时接受过俄国培训的同志应该帮助毛克服他的理论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含糊的理解。显然，斯大林希望他的意见

能成为一个公式，把所有争吵的派别统一成一个团结、和谐的中国共产党。

因此，毛不得不为维持他的领导地位而付出代价：他不能不向王明报告对当前重大问题的看法，报告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工作。12月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是在12月，日本进行了“南京大屠杀”），王明所作的政治报告被通过，报告明确要求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两党长期合作抵抗日本侵略。

但毛为自己的让步获得了极其重要的补偿。他被选为下届党代会筹备委员会的主席，王明任书记。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党代会最终于1945年召开的时候，这一安排对毛获得最后的胜利是个重要的武器。

王明回国不久就访问了国民党的总部武汉，寻求改善中共在全国地位的方式和方法。随同他去的有博古、周恩来、项英和其他领导人，毛留在延安。毛一定明白，如果蒋介石精明到敢冒险的话，以王明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右翼很可能抱着改组的幻想与国民党合并。王明回来后说，红色政权应该进入蒋介石的联合政府，通过合法斗争在联合政府中逐步夺取权力。其基本假定是说中国社会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准备在不远的将来起来反对自己的敌人。毛由于出身于农民而对此有更深的认识。

王明的知识分子优越感在延安绝不是毫无根据的。从学习的角度讲，王的书籍以及他那些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团的同伙的著作是延安唯一能得到的中文书，因而毛自己演讲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他把这视为打破王明的迷信，粉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集团“思想封锁”的唯一途径。

江青把这些毛与王明的斗争称之为断断续续的、烦人的、冷嘲热讽的、唯心主义的、挖空心思的。斗争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取悦于斯大林—革命的家长，每个人都想使苏联“教皇”注意到他担当中国革命领袖所具备的权利和才能。

毛的王牌是他的土生土长，他后来讲：“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们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

1938年5月，毛亲自登台演讲军事策略问题，题目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毛还作了多次演讲，这些演讲后来汇集成一本很长的小册子《论持久战》。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毛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话，进而指出：“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因此，战争最强大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自己。

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最后，毛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大胆的预言：

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20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

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毛为了写这本小册子，连续工作了一个星期，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到第7天，他的卫兵在他身边生了一个火盆，以抵御寒气。毛一下把脚放到火盆上，鞋子都烧了好几个洞，由此可见毛专心到何等程度。

毛在延安讲课时，完全征服了他的听众，瓦列特·克特茜 - 玛尔克丝评论说，毛是她从未见过的演说家，他“从来也不打什么手势”。她描述了毛的一次讲话：

他把手背在身后，讲了3个小时。他没有笔记，只是看着听众。外面一片漆黑，大厅内只在台前悬挂着一二盏灯笼，室内其他地方也是黑的。大家神色庄重、严肃，一齐看着毛的脸，一刻也不离开，静得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谈论他们的目标、统一战线带来的喜悦和持久的和平。指出，统一战线只要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打败日本。毛不停地讲着、讲着，他讲得很平静，但很清楚，完全是平心静气的。无疑，所有这些人都崇拜他，他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尊敬他。毫无疑问他们都听从他的指示，信奉他的教条。只要毛泽东活着，他就能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写道，毛的演讲“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收精神养料，毛泽东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与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引用《红楼梦》一类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故事……



>>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演

为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官方路线保持一致，毛尽力缓和他的政治观点，例如1938年他在与克特茜 - 玛尔克丝谈话时，当玛尔克丝很尖锐地问到他对集体主义的看法时，他就很谨慎。

“你是不是认为，”玛尔克丝问，“妇女喜欢在一个灶上做饭，而不喜欢在自家的灶上做饭？你是否认为中国农民喜欢平分农具和土地收成？”

毛很小心地回答说：“如果没有足够的农具，就必须平分。”

“是不是说，如果你有很多农具，其他每个人也都应拥有自己的农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就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制，就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了。”

“人们自己会解决这个问题的。”毛回答道。

“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吗？”

“会的。但他们必须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知道如何投票。如果机器用来取代手工纺车，人们就会痛恨机器。英国考察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强迫的问题。



>>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这是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洛甫）

9月底，毛再次热情地向总司令蒋介石致信，信中说：

周恩来和其他同志回延安后，都一致称赞您的盛情款待，对此我深表感谢。全国人民都尊重您的领袖地位，是您领导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重要关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联合起来了……无论敌人多么残暴，最终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中国……一定能在东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您也会同意我的观点。谨祝安康并致以革命的敬礼。

慕尼黑协定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关于英国将背信弃义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说张伯伦的政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而毛很快就挣脱了束缚，这一点儿也不奇怪。10月当日本正在快速推进，夺取武汉、广州时，中共在延安召开了一个时间很长的中央全会。经过一段时期的克制后，毛现在站出来公开攻击王明。他首先抨击王明提出的党对统一战线的路线：“在抗日战争中，在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地位是坚持抗战和统一战线的主要条件，据此人们可以预见国民党辉煌的未来……”

然后，毛谈到了共产党的地位问题。首先他讨论了作为国际主义者在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爱国战争时的顾虑问题。他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他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加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后来的一篇演讲中，毛谈到了武装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

许多事情都可以用枪杆子来创造。我们“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毛认为红军应该对蒋介石统率的军队保持独立性，这一主张使毛在中央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尽管这一原则在当时没有公布，为的是不让国民党知道。王明虽然说服了他的同事为统一战线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但他作出军事让步的主张遭到拒绝。红军的将领们在高层领导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毛知道得很清楚。就像10年前的遵义会议一样。这一次又是军队使天平倾向于毛。

共产国际完全支持中共在1938年底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而毛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与此同时，莫斯科的一份刊物第一次承认毛在中央政治局中实际的领袖地位，王明靠边站了。

13　恶 战（1938~1941）

毛在1939年5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定为“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 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显然对许多党员来说，要区分短期和长期目标是很困难的事，毛在另一篇讲话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

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中国的青年要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毛在一篇讲话中又指出，要发挥这一令人振奋的作用是有条件的，这段话从后来的《选集》中删掉了：

青年要成功，还得跟成年人做朋友，要跟25岁以上的大多数人结合起来。老头子要不要呢？也一定要，老人有经验……因此，一定要青年人同老头子结合起来，就是100岁的人也好，一道同他们团结打日本……老头子做起宣传工作来好得很，老百姓欢喜听他们的话……同志们，青年运动中组织娃娃也是一个重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那里训练我们的娃娃，叫他们当小汉奸，我们还可以不去联合娃娃们吗？……娃娃组织起来有很大的好处，可以捉汉奸，可以查烟鬼，可以抄麻将，更可以放哨查路条……

5月25日，俄国摄影师罗曼·卡门来见毛，他和他的同伴都被“一个骑马飞奔的女骑手惊呆了，她在我们的面前勒住马，很优雅、很洒脱地欢迎我们”。这位女骑手就是江青，她因是主席的夫人而拥有一匹马。俄国人给她拍了几张骑马的彩色照片，尽力把她拍得更像斯拉夫人而不像中国人。

卡门的回忆录进而描述了江青作为毛的私人秘书的工作，“她给他准备日记本，记录他的谈话，抄写文章，料理日常琐事……她很自信地骑在一匹矮小而性烈的马上，时而策马腾飞，时而勒马吃草。脑后的辫子用绸子扎着，穿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光脚蹬一双木屐。

江青刚刚结束了几个月的增产节约活动，当时毛发动了开垦离延安30英里远的南泥湾荒地的运动。参加这一垦荒运动的同志都得自耕自织，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粮食和布匹。在这种挑战中，江青的双手第一次打起了血泡，她以前从未干过体力活。但由于有结核病，她被免去了织布的任务。

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协定，毛表示欢迎，称协定是苏联力量壮大的证明，任何支持日本的人都会反对。德国以前帮助过日本，但“如果今德意放弃其助敌政策，那我们就不妨与之接近，用以减少敌人的力量”。毛还非正式地对一个客人讲过：“斯大林把希特勒装进了口袋……但只装进了一半。

两周以后，在对延安的共产党官员的谈话中，毛把这场战争称之为“一群疯狗打架”，所有卷入的帝国主义国家，不管它是站在德、日一边，还是站在英、法一边，都是对反革命掠夺感兴趣的帝国主义国家。应该“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者，这个强盗魁首”。

毛对英国表示了最大的蔑视。9月14日他就战争问题对他的同志们演讲，他说：“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他谴责参加欧洲战争的各方—英、法、德—称欧洲战争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

这时，埃德加·斯诺第二次访问红色根据地，在他到达延安前，有人告诉他，延安有了腐败迹象，说毛现在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在确切知道斯诺要来后，毛派他的“高级轿车”来接斯诺。当车子开来之后，斯诺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辆救护车，车门上清楚地印着一行字：“献给中国英勇的保卫者—纽约中国洗衣匠协会谨赠。”斯诺写道：

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的装饰。如此而已……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有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依然是世界形势的研习者和政治的分析家。在他开始夜工作之前，他先要阅读一大堆从附近军队无线电台收集的当天电报—从山西前线，从中国各地，乃至从海外各国。

10月19日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

“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了坚定决心。他在一篇文章中主张打落水狗，他说，如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不仅要咬你，而且最低限度溅你一身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倒它。他一点也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

1939年出版了毛和其他人合写的，由毛本人主笔的教科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这篇长文中，毛就资本主义发表了一番有争论的评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



>> 1939年10月，毛泽东会见重返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毛补充说，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在斯大林的60岁生日时，毛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而是从中国的经书中摘取祝寿词。“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

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毛的公开祝词是这样结束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毛尚未见过斯大林，由于日本和德国东西两面夹击绵长的苏联，因而毛不再害怕他了。斯大林这个名字，主要是毛用来反对他的中国对手的咒语。

第二天在延安对他的同志们的演讲中，毛坦率地谈到了共产党人的家长：“斯大林同志就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那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无产阶级，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的事情就好办了。”

接着，毛又说了一段红卫兵在60年代大加张扬的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

1940年初出现了毛打击知识分子地位的第一个迹象。他指出，如果知识分子还没有改变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态度，那么通过他们去改变经济关系就不足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论点很难说是大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独特的“文化革命”是毛对20世纪语言发展的最大贡献，这个词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的，它出现在1940年1月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本小册子被当做实现现阶段中国革命政治、文化目标的指导性文件。

他的开场白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表明他知道自己的话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对，他说：

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才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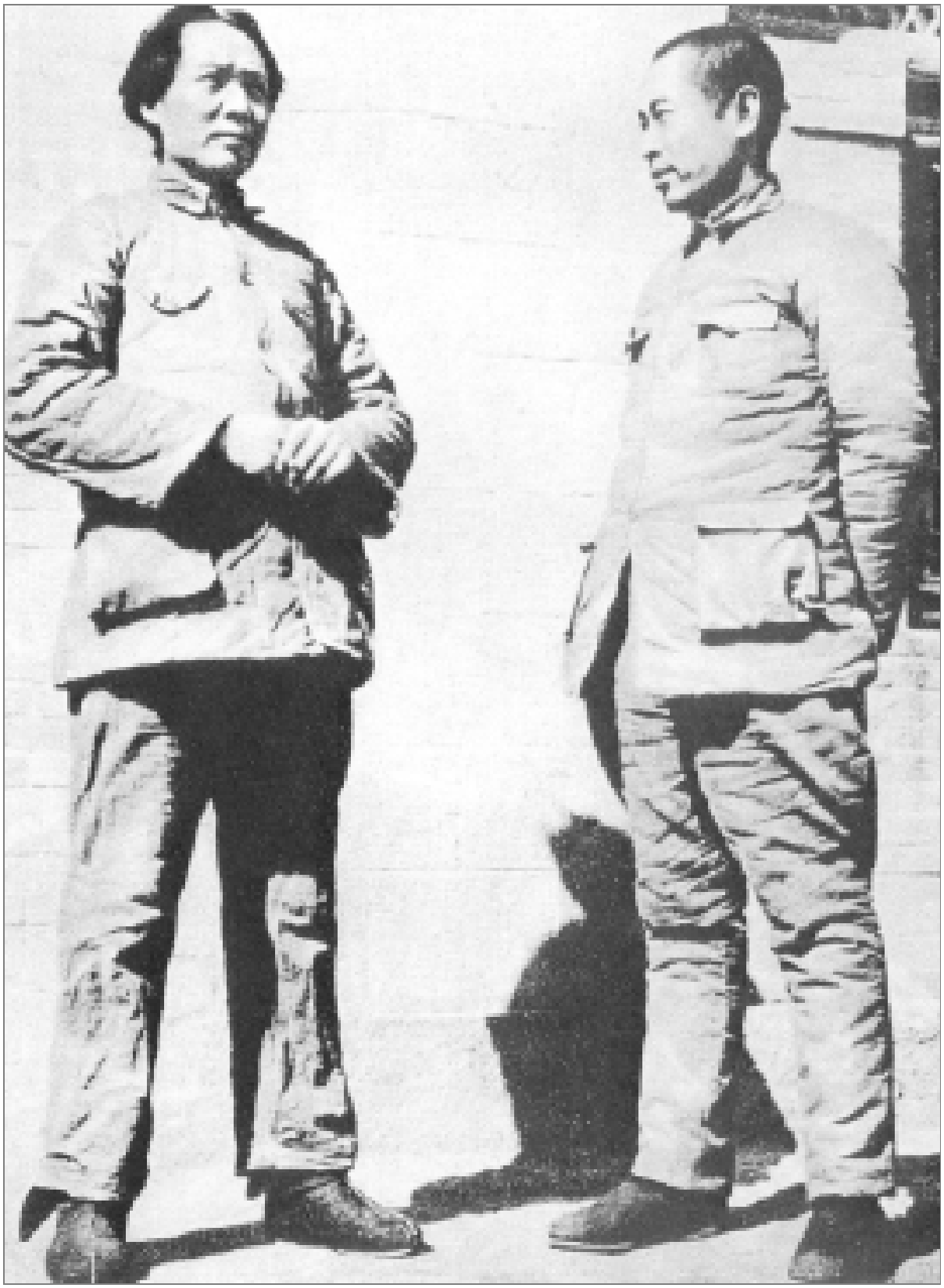
8月，红军进行了它最著名的对日作战“百团大战”。彭德怀将军不顾毛的劝告，他不仅没有分散他的部队，还把力量集中起来。这样过早地把军队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做法，很容易遭到攻击—这是后来毛分子说的。红卫兵在60年代甚至说发动这次战役没有得到毛的允许，虽然这难以置信。

后来苏联人指责说，毛在日本侵略时只想保留他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日本人得以腾出手来，迫使苏联人在满洲边界布置更多的军队，否则这些军队本可以与希特勒作战，尽管这种说法有所夸大，但似乎有些道理。1969年的一次苏联广播说：“毛泽东只是袖手旁观苏联人在流血……这当然不是一个多年从苏联得到金钱和武器援助的人所应有的态度。”最后，苏联评论员补充说，毛不得不退却到一部分中

苏接壤的边境地带，“马歇尔将军曾经很精辟地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是在苏联边境一带发现了一个避难区，毛泽东无疑要遇到他的滑铁卢。

一年后莫斯科电台把这种说法更推进了一步，“毛泽东待在延安多年，只是要完成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垄断控制。尽管他赞扬党的抗日举动，实际上他只是保存实力，准备以后同国民党作战，因而他实际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导致中国人民极大的牺牲。

如果毛对日态度暧昧需要有辩护理由的话，那么1941年初发生的事件就是个很好的借口，当时红军在安徽省的一支重要部队几乎完全被消灭—不是被日本人消灭，而是被国民党军队消灭，从而导致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实际上的瓦解。在延安，共产党人等待着国民党何应钦将军再来一次这样的行动。国民党在延安联络官紧张地问毛，他将作何反应。



>>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及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时拍摄的

“你一直待在延安，你会不知道？”毛反问道，“他袭击我们，我们就袭击他。他住手，我们也住手。”

但毛在延安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国民党中止了对红色政府的津贴，同时加紧对红区的封锁。

二三年后毛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941年春毛更大胆地公开批评王明，在《农村调查》的序和跋中，他再次谈到必须谨慎地、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中国同志要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进行自己的调查研究：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我却至死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最后，他以私人的、有点想消除疑虑的话来结束：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

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在5月份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毛进一步阐述了要谦恭地学习、了解中国国情的主题：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但中国的共产党人仍有许多缺点：

20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

但现在战争发生了毛所没有料到的转折。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开进苏联，撕毁了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使得毛不得不改变对西方列强的立场。现在帝国主义者丘吉尔正在支持共产主义苏联抗击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日本，毛必须和他极不信任的英国合作。毛在中国实行的统一战线不得不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用毛在德国入侵苏联第二天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而不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这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曾直截了当地问毛，如果日本侵犯苏联，他打算怎么办，但毛避而不作直接回答。苏联人后来宣称：毛无视他们要求破坏铁路，阻止日军向苏联边境移动的要求，他“实际上停止与日本军队作战”，把他的将军们留在延安，而不是让他们去前线打日本。他们还说，毛低估苏联的军事实力，认为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更有利于进行抗德游击战。

苏联的参战意味着毛得承受莫斯科更大的压力，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内独立的领袖地位再一次受到威胁—那个完全得到克里姆林宫支持的名叫王明的竞争对手就坐在附近的窑洞里。毛的不安全感从1941年对王明讲的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根据王明的回忆录，毛对他说：“我们党内有三个人受到党内干部的爱戴。第一个就是你，王明，第二个是（周）恩来，第三个是老彭（即彭德怀）。

有天晚上，毛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电报，正式要求中国共产党帮助阻止日本在东方开辟进攻苏联的第二战场—有关这个请求，政治局讨论了好几天。王明说他们应有所行动，但毛说这不明智。

王明冗长而火暴的回忆录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回忆录在电报问题上歇斯底里，使人怀疑电报问题的真实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回忆说，从那天开始，他每天至少要在毛的家里吃一顿饭，逐渐“我的胃由于大量失血而变得极不正常，头晕得厉害，心脏虚弱。医生诊断说，症状很像中毒”。与此同时，在毛的指使下，开始在离王明住处仅30步远的地方动工兴建新的会议厅，昼夜施工，使王明寝食不安。

毛命令王明住院，直到第二年8月才让他出院。王宣称在这十个月里，负责给他治病的医生金茂岳蓄意用大剂量的含汞药物来毒害他。王具体指出下毒是在1942年3月至5月这段时间，当时毛反对王

明和其他“莫斯科帮”的运动达到了顶峰。王明说当时他能活下来全仗他妻子，他妻子观察了药效后把一些药扔掉了。

王明声称，毛指使进行的这种医疗护理在第二年他得到赴莫斯科治病的邀请后又开始了。王明断言，金医生在2月份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甘汞和碳酸氢钠及硫酸镁合制的内服药水（会产生腐蚀性作用），一周后又给他用高浓度的单鞣酸液灌肠。

毛对这个由苏联培训的亲斯大林的争夺领导权的对手的突然上升肯定感到不安，但看起来他不太可能会采取如此容易被发现也如此不成功的手段。此外，王明潜在的癔想症也不应该低估—他没有给人留下脾气稳定的印象。毛的王牌当然是他的土生土长以及他是亚洲人几个世纪之久不愿听从于欧洲人发号施令的意愿和象征。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蓄意的，他在1941年主持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时相当精彩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次大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出席大会的除了有中国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的代表外，还有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蒙古的代表。毛的延安声明开始播及到邻国。

最后，为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人也由于日本在12月8日轰炸珍珠港而卷了进来，正像希特勒早些时候进军苏联迫使毛投入丘吉尔的阵营一样，他现在也不得不把罗斯福当做抗日的盟友。当然，这也使局势更加明朗化了，即日本最终要被打败，对中国共产党人构成主要威胁的仍然不是日本，而是国民党。

14 “抽象的爱”（1942~1945）

1942年，毛感到发动党内整风运动的时机终于成熟了，此举的目的是要说服党的干部们接受他的，而不是王明或其他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领导。苏联人培养的小集团因其老师（指托洛茨基）和支持者

巴威尔·米夫在斯大林对右倾分子的清洗中被控有罪而声名狼藉。斯大林则一门心思地扑在与德国人的争斗上。

新的共产国际不再试图自莫斯科控制中国党。不久之后毛就它的解散作出决议，其中承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运动。”

日本对华的不断进犯也给毛以帮助，使之有借口将1938年以来一直在筹备召开的党的“七大”推迟举行。[25] 实际上，如果“七大”在1942年以前举行，毛说不定会在巩固其至尊地位上兵败落马。而且，许多红军机关回到延安休整和躲避日本人的扫荡攻势，也使毛有机会采用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强化他们的思想意识。

此刻，他已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被其对手们称为“小集团”的人，其中包括谭震林、陈正人、邓子恢、邓小平和林彪（1942年初自苏联疗养归来）。毛还获得了刘少奇的支持。

然而，延安也出现了对毛的领导的公开批评—而且这些批评不仅仅来自布尔什维克。周扬—江青早在上海时的老对手，竟在这个将毛比作太阳的社会里撰文称“任何太阳也有黑点”。另一位作家在延安的机关报上对一些领导人的不诚实言行颇有微辞。他们不实行男女平等，他们中的一些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这种做法是一般老百姓无法接受的。这些小品文辑在一起，取名为《野百合花》。野百合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却有着略带苦涩的鳞状球茎。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后来被逮捕，并遭处决。毛对此内疚了多年。关于处决一事，20年后他对其同志解释说，这件事发生在“部队转战途中，是保卫部门自作主张处决的；决定并非来自中央。

我们如此对待批评，经常搞得非常麻烦；我想他不应被处决。即使他是密探，写文章攻击我们，而且拒不改造……留他条生路，或让他去劳动有何不可？”(26)

正是为了回击这些批评者和怀疑者，毛在1942年2月，借一所新党校开学发动了他的整风运动。他在开学典礼上所作的讲话题为《整顿党的作风》(27)，毛再度号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



>>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集会上讲话

他取笑那些脱离中国生活实际的知识分子。他说，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无知，还不及工人或农民懂得多。他在笑声中继续说："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得多少有点道理……"他接着说，一个人大学毕业后，但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活动，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说实话，这样的人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其知识尚不完全吧？书本知识没有什么内在特殊的东西。

像大师傅煮饭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们家的大师傅比较起来，就有很大的区别。火大了要焦，盐多了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

书本上的知识呢？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么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点……我这样说，难免有人要发脾气，他说："照你这样解释，那么，马克思也是一个半知识分子。"我说：是的，马克思一不会杀猪，二不会耕田。但是他参加了革命运动，他又研究了商品。

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工具，而不是宗教。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像道士们到茅山去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

毛的意图并非是将犯了错误的人一棍子打死，或惩办他们，而是为了挽救他们。

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

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

不固执错误，以至于到达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解决问题的。思想上的毛病与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一周后，毛又以《反对党八股》为题作了第二篇整风运动重要讲话。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党内有些人行文“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东西，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他最后讲述了自己的写作方法。“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

该讲话中另两个有趣的见解是关于外语学习和反对吓人战术。毛主张，“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共产党不

靠吓人吃饭，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一些中国人对外国语近于憎恶与畏惧，但在这一讲话中，毛公开宣称：“外国人民的语言并不是洋八股，中国人抄来的时候，把它的样子硬搬过来，就变成要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们不是要硬搬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的工作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语言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国的。

接着，毛向艺术家们、作家们和知识分子们讲道，要成功地完成他的整风运动这一使命的话，就需要他们这些人集结在他的旗帜之下。他还安排自己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他的妻子在此任教。此刻住在延安的一位苏联人[28]如此描绘江青：“她身体苗条，有一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站在她壮实的丈夫旁边，更显得弱不禁风。

这位观察家对这个既是毛的秘书，又是毛的妻子的女性评价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的突出特点。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毛在他妻子工作的地方观看排练，并与演艺人员和教师长谈，以弥补他对现代文学与艺术知识的匮乏。

5月的第二天，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一位当年的与会代表回忆，那时“延河解冻了，黄浊的泥水冲刷着浅浅的河床，淌过沙子和泥土。柳树变绿了，刺儿梅花香逸满沟壑与平川。春天来了……”毛在蒙蒙细雨中乘车前来，大步走进拥挤不堪的礼堂，连门外操场上都坐满了人。

毛的主旨在于艺术家应服务于社会，应该走出象牙之塔，去普及新的文化形式。以毛的秘书身份参加座谈会的江青觉得，他不仅仅是对少数艺术家，而是“对更广泛的，受到王明蛊惑的人在讲话，王明与主席的敌对在延安是尽人皆知的”。

“我们今天开会，”毛说，“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的听众们将有可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工作将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

他解释说，中国人有些缺点—落后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他们进行斗争的包袱。“我们应该长期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



>> 1942年5月，毛泽东等人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座谈会的最后一天，讨论在晚餐前结束，而此刻将落不落的太阳光线，正好尚够集体合影的要求。毛被安排在前排中央，但正当要按动快门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走向丁玲，将自己的位子让给她，边让

边说：“让我们的女干部坐在中间，我们可不要在‘三八节’又受到责难。”引得众人大笑。

晚饭后，毛作总结发言，来听的人太多，所以大家移至礼堂外的空场上，毛就在油灯下讲话。他抨击一些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持的观点—“任何事情都要从‘爱’出发”。他明确道：

……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至于所谓的“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艺术家和文学家应该接触了解普通老百姓。“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

程。否则你就只能做……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毛用对知识分子如何成为一个更出色的共产党员的忠告，结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

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毛在集体合影时让位于丁玲的殷勤之举，并没能消除延安座谈会暴露出的深刻的矛盾。作家们就毛对他们的要求争论不休，并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支持毛关于艺术应服务于社会的路线。这些人以毛的老朋友周扬为首，该人与毛的妻子江青交恶颇深。另一派作家，以丁玲为首，他们将重点放在艺术的独立需求，强调艺术所具有的想象力、审美观与创造性等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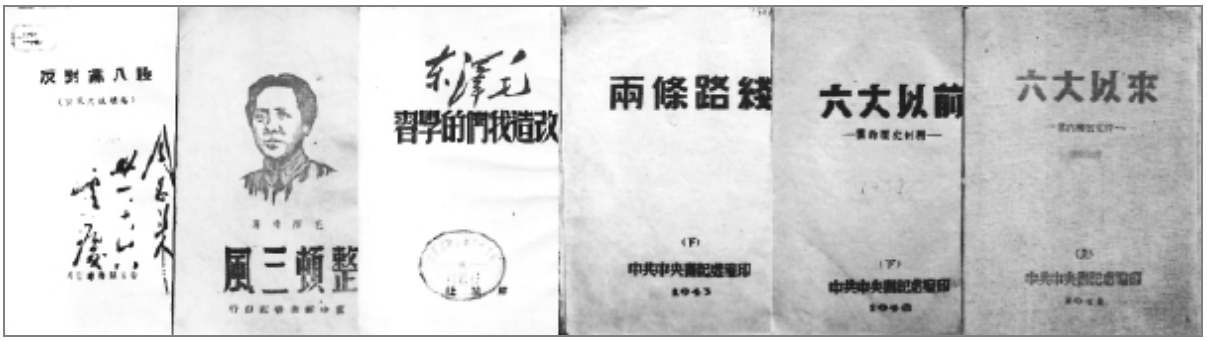
1943年6月，中央发出的一项指令，第一次详尽论述了标志着毛式共产主义特色的现象，即后来广为人知的群众路线：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指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

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到1943年夏，毛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他最终当选为新设立的党的主席，正式在领导集团中占据了最高地位。党的总书记这一旧职仍然空缺，没人能与毛的杰出地位一争高低。如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已完全破裂，共产党人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作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树立在公众面前。毛是显而易见的候选对象，由于他的地位上升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高度，因而他也不再冒险攻击全力铺展西方战线的斯大林了。

从此，对毛个人及其思想的崇拜开始建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如此，甚至40年代中后期成为毛的狂热支持者的刘少奇也涉嫌在1942年对他的朋友说：“什么是主席？我从未听过苏联人管列宁叫列宁主席！……中国的斯大林还没出现呢！



发表在共产党人报纸上的毛的第一幅肖像—木刻作品—要追溯到1937年。林彪在1938年以一份称赞毛的“领导天才”的报告，开始了他乏味而漫长的谄媚生涯。但是直到1942年至1944年的整风运动，毛的个人崇拜才系统地发展起来。毛儿时的伙伴萧三[29] 1941年末在延安的机关报上撰文，称毛是“我们英明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导师和我们的救星”。这就为党报的社论作者来日的写作定下了不健康的调子。毛的同事开始在各自的讲话中称毛为党的“开明领袖”和“旗手”，与此

同时，西奥多·怀特[30] 发现他们对毛在延安的即席讲话也浮华夸大地加以评论，“就像啜饮知识之泉”。

艾青以《毛泽东》为题，写下了拍马奉承的颂歌：

毛泽东在哪儿出现，

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

“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

他以对人民的爱博得人民的信仰；

他生根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

把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

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

革命者—以行动实践着思想；

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概括，

一手推开仇敌，一手包进更多的朋友；

“集中”是他的天才的战略—

把最大的力量压向最大的敌人；

一个新的口号决定一个新的方向；

“一切为了法西斯主义之死亡”。

始见于1944年的下面这首歌，后来几乎成为一首国歌：

东方红，

太阳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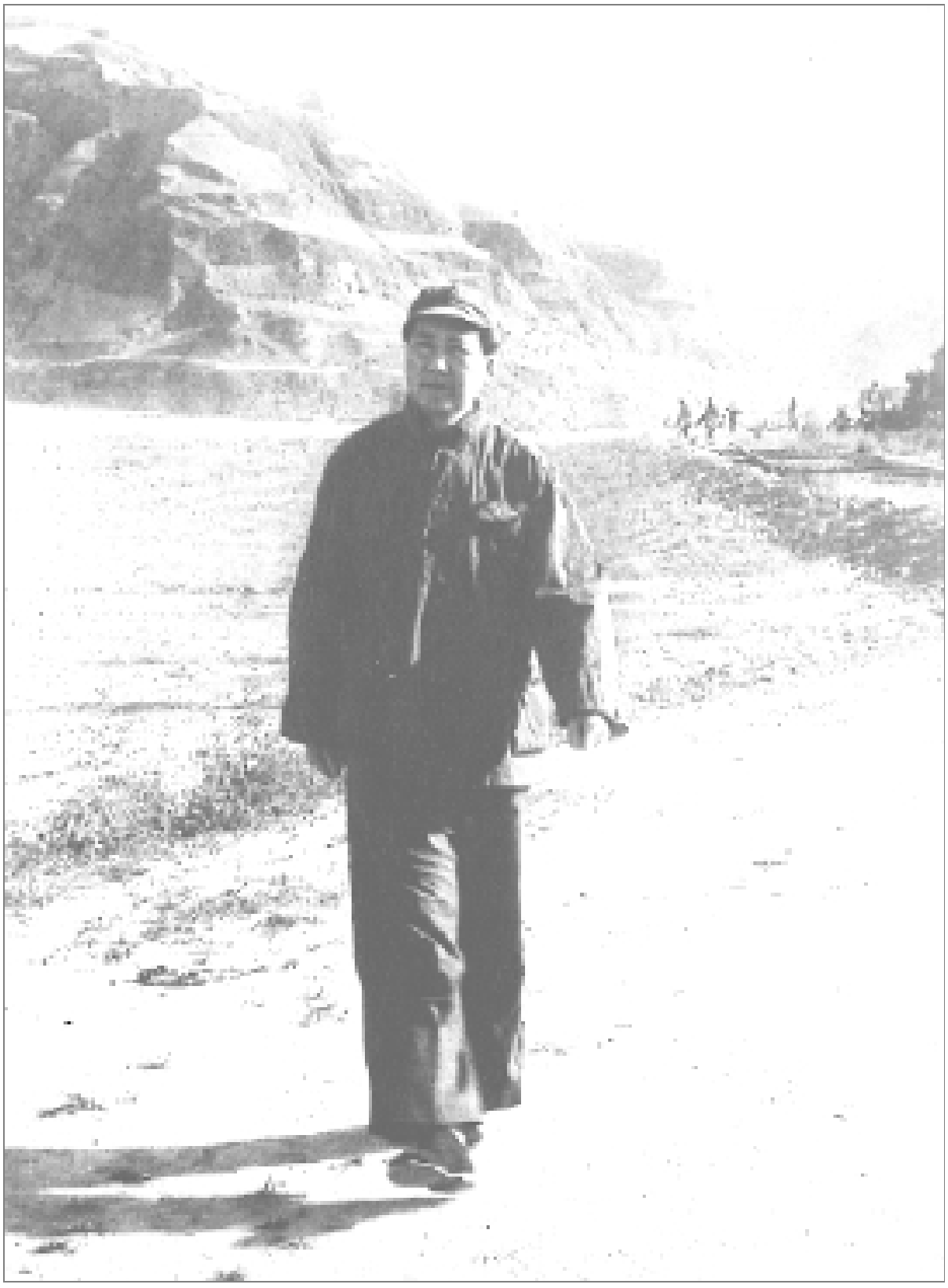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赢得了延安一批极为能干的年轻官员的忠诚，其中包括邓小平、彭真、陈伯达、陶铸、饶漱石等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在将来的中国政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有可能成为战后中国的第二代红色领袖。

刘少奇赞同对毛的吹捧。尽管在重庆的统战工作阻碍了周恩来积极为此而活动游说，但周已明确地拜倒在毛的无上权威之下。只有王明、洛甫一直保持着沉默。



>>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西奥多·怀特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道：“毛的个性支配了延安，他被置于崇拜的顶峰。”一位中国记者发现，1946年的延安，毛的肖像及其手迹无所不在，而对于工人、农民来说，他的话便是“绝对的和极其通俗易懂的”。

然而这一崇拜并没有在整个共产党区域内全面发展。毛的“选集”就压根儿没在延安出版过，其早期版本倒是在1944年至1948年间在热衷讨好的助手林彪负责的哈尔滨出版的，聂荣臻辖下的晋察冀边区也有出版。毛的“三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的综合学习是在晋绥地区着手开始的，而不是在延安本地。

王明声称，毛在这段时间里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援引马克思、列宁、孙逸仙的例子，向他谈起创立“毛泽东主义的客观必要性”。据王明说，毛承认，人民在他们刚刚被灌输的时候，是不会沉迷于一个新的主义的，同时他声言，“我们必须以穆罕默德为榜样，他一手执剑，一手拿《古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教”。

在毛这一代领袖们当中，正是与他同上过一所学校，20多年前在安源矿工大罢工中首度合作的湖南老乡刘少奇，在提高毛的地位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1943年，刘发表一篇文章，验证毛在过去20年中的政策一直是沿袭苏联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这与那些认为毛已成为党内孟什维克的观点恰成对照。这对于依照苏联人的观念使毛的地位合法化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刘在1937年党的代表会议上，曾以同样的说法（尽管没有赞颂毛）回敬过毛的反对者。但他的分析随即便被否决，代之以由洛甫提交的与之观点相对立的报告，并被通过。结果，刘丢掉了他在党的华北局的位置。是毛帮助他得到了新的职位，于是在1940年刘夸大其词地将毛说成：“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领袖，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当然，刘并不赞同毛的独裁。1941年他警告说：“在我们党内，不存在对个人的额外特权，任何不代表组织而实行的领导都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同志是全党的领袖，但是他也要服从党。红色领袖即使明白多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在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方面以身作则。当刘被安置在党的书记处取代洛甫而成为五人核心集团的一员时，他对毛是否取胜所可能产生的种种怀疑大概也就烟消云散了。这也算是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他6年前蒙受的耻辱。

继1929年革命战争中失去妹妹泽建后，1943年，毛又失去了他最后一位同胞手足，二弟泽民。1936年泽民在陕西升任财政部长负责整个共产党地区经济工作后，于1938年离去，就任其时正与共产党人合作的新疆军阀的财政顾问。不幸的是该军阀后来投靠他方，于是毛的弟弟锒铛入狱，在狱中被送以毒酒鸩杀。

毛的家人没有一个能活到看见或分享他的胜利喜悦的那一天。泽民之子远新如今在延安加入了毛的家庭，由江青照料。

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访问了毛和他的妻子。他是如此描绘他们的：

……她穿着朴素，身着一套实用的类似睡衣式样的衣装，用皮带在苗条的腰间束住，他上着粗糙的家织布衣，下穿肥大的吊脚裤子。我被让进“会客室”——一孔青砖漫地、白粉刷墙、简单地置有坚固却颇为粗陋的家具的窑洞。现在已是晚上，唯一可供照明的是一只粘在倒扣的杯子上的蜡烛。为了提提精神，主人给我送上淡茶、香烟和本地产的糕饼及糖果。整个谈话过程中，孩子们跑进跑出。他们站在那盯着我看一会儿，随后抓起一块糖果又跑了出去。毛对他们毫不在意。

同年6月，毛曾与《曼彻斯特前卫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晤谈长达12个小时，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

3点，地点在毛的窑洞的接待室内。斯坦因写道：毛“坐在摇摇摆摆的椅子里，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发出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特有的奇怪声音将烟吸进去”。他“在窑洞内踱来踱去，而后人高马大地站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目不转睛地盯看我的眼睛好一会儿，这才以沉静的语调，有条不紊地缓缓道来”。

他们一起“在一棵老苹果树下”吃了顿简短的晚餐，随后在窑洞里燃上两支蜡烛，“……将毛的巨大身影投射在窑洞高高的拱顶之上。他注意到我在与面前摇晃的小桌子的较量，于是走出去，带回一块扁石头垫在一只桌腿下。不时地，我们来杯葡萄酒，我们谈着谈着，一包本地出产的纸烟被一支支抽光了。夜里，虽然我渴望提出更多的问题，可还是几次提出离去。但他不听这套。他说他想给我更多的采访素材，何不今晚能谈多久就谈多久呢？

“凌晨3点，我最终离开时，手酸眼涩，心里也十分过意不去，他却依然精力旺盛如初，和下午时一样谈吐条理分明。



>> 毛泽东与江青及孩子李讷在延安枣园

斯坦因的笔记被译成中文交毛审阅，几天后当毛在街上遇见斯坦因向他解释说：“我已与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商量了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他们认可了。”

他笑着对斯坦因说：“中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也许比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晚得多，这是十分可能的。”

斯坦因问他：“你还没发现自己现在是少数，以致你自己的想法无法付诸实施？”

“是的，”毛承认，“我已使自己成为少数，现阶段对我来说惟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近些年来已极少有此类事情发生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介入了战争的美国人与重庆的中国政府建立了多方联系，并派来了各类使团，同时也准备向延安派遣首批观察

员，因为共产党人也在同日本人交战。毛曾就中国式的“民主”向一位美国记者自夸。7月18日，他对《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莫里斯·沃陶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其民主传统。共和政体这一说法可溯源自3000年前的周朝。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是富有民主传统的……

延安的新闻媒介发表了赞美华盛顿，以及罗斯福、华莱士是如何足以继承亚伯拉罕·林肯之事业的文章。1944年7月22日，被热切盼望的，命名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机场。几天后，毛设宴欢迎美国人。他告诉小组中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美国应在延安设立在战争结束后仍能继续起作用的领事馆。

美国人爽快开朗，而且不拘礼节，并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冈瑟·斯坦因评论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一大群中国人与外国人如此不拘惯礼，快活地聚在一块儿，如此对不同的背景、政治信仰和种族阶层不闻不问—如此彼此成功地合作，如此互相真诚地理解”。

8月底，毛与约翰·谢伟思会谈了6个小时，吁请美国直接干预战争。他说：“我们想，美国人必须在华登陆。当然，这取决于日本的实力和战事的发展……如果美国不在中国登陆，这将是中国之大不幸……假如登了陆，美国人将有可能与中国两个方面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那么国民党作为政府将一如既往。”

谢伟思对此表示异议，认为这不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切实需要，因而毛转而要求美国迫使蒋介石对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他坚持说：“蒋处在一个非听美国人不可的地位上……且看经济形势！蒋正逢绝境。蒋倔强，但他基本上是个恶棍……驾驭他的惟一办法只有狠狠地激他……美国曾十分有害地对待蒋，他们帮助他逃避了进行讹诈而应得的惩罚。”

毛告诉他的非正式美国大使，内战已无法避免，除非蒋被管制起来，同时他想了解美国对此事件将采取何种政策：“我们能担保不与美国发生冲突。”他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减租减息，包含外资的私营企业自由竞争的工业化、民主，以及提高生活水平。“即使最保守的美国生意人，”毛声称，“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反对的东西。

谢伟思后来回忆：

毛也许缺少周的谦和、文雅，但他可能更加色彩鲜明，天造地设。交谈时他总是妙语连珠，恰如其分地运用中国典故，他所作的论断精辟而独特，对于恰当而又显而易见的则往往是点到为止，心照不宣。谈话有时还在形形色色意想不到的和不着边际的范围内游走。博览群书使他几乎无所不通，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话题。

我想，常常是他在主导着交谈，这是很正常的。你时时感觉到是你在接受采访。诚然，这是花了大量的策略技巧才做成的。他并没有独占谈话，这里不存在“hard sell”（硬性推销），你也不会有精神上被压倒的感觉。实际上，在小组会议上，他很细致地留意给每个与会者参与并表明自己观点的机会。屡屡是毛来概括总结会议的意向，他的总结每每都是巧妙顺畅，全面而又简洁的。

10月9日晚，在中共总部曾举行了一场即兴舞会。毛与江青双双参加，用谢伟思的话说，他们“优雅、幽默，彼此之间，并且与多数与会者再三起舞。想起毛平常沉静淡漠的举止，在某种意义上只能管这叫‘放浪形骸之外’了”。



>> 1944年11月1日，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检阅即将开辟抗日根据地的359旅南进支队

11月初，美国人着手努力将国共双方捏合到一块儿。他们派来了赫尔利将军，11月7日赫未经通报便出人意料地在凄凉萧瑟的延安机场着陆。毛是在赫尔利的飞机已然着陆后才得知他的到来的。他召集高级官员一道挤上他那辆弹痕累累的救护车，匆匆驶上跑道。据怀特记述，“全权代表[31] 和蔼地向他们致意，然后爬上了救护车。”当他们途经一群由牧羊人赶着的羊群时，毛回忆说他自己也曾是个放羊娃，赫尔利接过话说他年轻时做过牛仔。接风宴后，毛和赫尔利已经像是心腹之交了。

毛是友好、坦诚的。但赫尔利一方的政治共识却少得可怜。第二天，他便以强调国民党的和解之意的方式开始与毛协商。于是乎，毛

对其美国客人大发了一通反对蒋总裁的议论。谈判的头一天，便以争辩得不可开交而告结束。



>> 毛泽东与赫尔利、张治中

可是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早晨，赫氏又走向了另一极端。他起草了一个建立真正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其中共产党人可享有有保障的言论、活动、集会自由。毛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保存了由赫尔利签了名的建议副本，以作为信义的标志—尽管赫尔利周全地提醒毛，他不是能代替蒋总裁讲话的人。对毛来说，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以他的名义起草这些建议，并以此来驱策国民党，这已经足够了。

几天后，晒着11月的太阳躺在病榻上的王明接待了笑眯眯的毛泽东的意外来访。他要王明看一封电报，这是罗斯福总统对毛祝贺他在

美大选中获胜的答谢。王显然相信，这一纸公文开辟了可能与白宫进行直接个人接触的前景。

然而，蒋总裁理所当然地拒绝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美国人力图使国共双方和解的努力化为乌有。也许是那封电报给毛壮了胆子，他决定向可以对蒋施加压力的唯一来源求助。1945年1月9日，他告诉“迪克西使团”的高级官员，雷·克罗姆利少校[32]，他与周恩来已做好准备，飞往美国会晤罗斯福总统。克罗姆利给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发了封电报：“毛和周将即刻单独或一道起程前往华盛顿作探查性商谈，罗斯福总统应否表示在白宫以中国主要政党领袖接待他们。

此事被列为秘密，以免一着棋错，殃及国共谈判。第二份电报发给了美国军事代表魏德迈将军，大意是说周已要求此事不把赫尔利大使考虑在内，“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决断力”。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毛也可能将其希望寄托在赶赴白宫谒见所得到的拥抱嘉奖上。但是两桩互不相干又出人意料之外的坏事，却使毛功败垂成。

第一桩，魏德迈将军外出缅甸，请赫尔利大使处理其函件，致使赫尔利看到了周对他的评论。第二桩，赫尔利为两项显然是为中共提供的军援动议事先没与他作任何商量而大为光火。结果，他将这一动议压了一段时间，最终，把情况添油加醋地通报给华盛顿，建议反对向中共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于是白宫就将这件事情搁置起来，认为没必要一定要对毛的要求形成一个大致看法。此事从未有过定评，任凭世人评说。

在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同时，毛的长子自俄回国。这是15年来父子二人的首次重聚。毛岸英，现在已是25岁的小伙子了。1930年曾与母亲杨开慧一道被国民党拘禁。杨开慧遇难后，他和弟弟岸青被偷偷送往上海，隐姓埋名，在穷途末路、艰难窘迫的情况下，由从长沙逃

亡来的毛的家人照看起来。苏联人打起仗后，孩子们被送到苏联，就学于伊凡诺沃的共产国际学校。

岸英取了个苏联化名谢尔盖，他学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开始把中文忘掉了。俄国人发现他害羞，讨人喜爱，还有点被宠坏了，但从没人提起过他的父亲。他在东欧前线坦克部队里参加了战斗，斯大林还给了他一支手枪。

小一点的孩子岸青，化名尼古拉，也有近似的经历。他学过机械，给他的苏联同志以一个性格举止热烈而古怪的印象。头脑容易发热，却往往有始无终。毛曾经透露说岸青有精神疾患。这也许就是毛在50年代一个有关岸英、岸青的讲话的脚注吧，讲话大意是“一个儿子死了，一个疯了”。

红卫兵声称，岸青在其母亲被捕后曾经受到照料他的资产阶级家庭的虐待。一些苏联专家认为他是“类精神分裂症”患者，另一些人则确信他的行为是因为曾被西方传教士的棍子击中头部而造成的。在俄国，他曾下过国际象棋，还爱上了一位金发姑娘，像个小花花公子。

1944年至1945年冬天岸英回到延安时，弟弟也离开了苏联。毛明显地感到大儿子在完成其旅苏经历后需要去去骄娇二气，于是便把他送到几英里外的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处一道生活。吴战前来到延安时还是个饥馑的难民，从共产党人那儿分得一小块土地后，侍弄得相当成功。据中共领导层中一位亲苏成员说，年轻人对其父的安排大为不满，并在事后告诉他：“我没有向这个Kulak（富农）学习，我非常讨厌这个大富农家庭生活的一切方面。我永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苏联学校培育出来的学生。我任何时候也不以为耻，而是反以为荣。

毕竟这是毛氏家庭中的传统，儿子应当反抗老子。但毛这一方面多少有些公正可言。后来干了一年农活手上长了茧子后，年轻人得到了个差使，在中苏人员之间当翻译，一个中国同志当着苏联人的面问他：“你到底学过中国话没有？”

这家人还救出了毛的年幼的侄子，泽民之子毛楚雄[33]。自从其父被鸩杀于新疆后，他一直由姥姥抚养。但是刚过一年他便死于非命，在内战中被敌人活埋了。

这段时间里毛试图彻底探明美国人政策之玄秘。3月13日，他邀谢伟思作了另一番长谈，他向美国人保证，中共的政策于美国之利益并无威胁。毛声称：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为同情、理解和共同的利益紧紧地联结起来。两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尊崇民主和个性的。两国人民生来都是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后中国之最终需要是经济的发展。她缺乏独立实现这一目标的资本积累。她自己的生活水平相当低下，再不能进一步抑制其对资本的需求了。

“美国与中国经济上彼此互相补充，他们之间将不互相竞争。中国不要求发展大型重工业，她并不希望在高度专门化的工业方面去迎合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为重工业和这些专门化工业需要输出市场。她还要为其资本投向寻求出路。



>> 毛泽东和儿子毛岸英在延安

“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保证自身的市场供应，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她还可以为远东其他国家供应轻工业物资。她拥有原材料和农产品，用以帮助支付外贸及投资之开销。美国不仅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最合适的国家，而且也是惟一能够完全参加这一合作的国家。”

为了所有这些原因，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能有冲突、疏远或误解发生……〔36〕

其后不久，谢伟思奉召将返回华盛顿。4月1日毛最后一次接待了他。谢伟思回忆，毛“兴致格外的好，离开座椅，奉上激动人心、词藻华美的谈话”。他重申了对美在华继续实施积极政策所抱的希望。

谢伟思抵达华盛顿这天，正是罗斯福去世之日—4月12日。他很快卷入了联邦调查局对《亚美》杂志案的调查中，并因涉嫌向新闻界透露外交机密，于6月6日被捕。这一连串相关事件使毛放弃了对美援的希望，他将谢伟思的被捕看做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

从表面上看，毛仍对来自美国人的理解与帮助抱有希望。他以猪肉丸子、豹子肉、百年陈酿款待7个前不久在华北失事跳伞生还的美国B-29飞机飞行员。共产党人护送他们穿越日军前沿，到达通往延安的安全之途。毛送给他们每人一件礼物—清一色红区产的厚毛毯。他们都曾谈到毛边走边与以迅速而机械的方式挥着手指头纺棉线—用近似于甘地的纺车—的同志交谈的情景。

毛在4月的一个讲话中评述：“中国人民一向视为居住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民，如今看起来就像隔壁的邻居了。中国人民将愿同那些伟大民族的人民一起工作—美国、英国、苏联和法国—并与所有国家的各族人民一道创造一个‘稳固而持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幻想之破灭很快地公开化了。到了7月，毛对非共产党的来访者夸耀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

在此期间，毛还在筹备被大大拖延了的党的“七大”。这个所谓“胜利的大会”，1945年4月在延安开幕。大会的开场戏是，在会议举行的前几天中央委员会通过的由毛起草的一篇长文，题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以将毛推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得胜的关键角色为目的，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重写：“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光辉地发挥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

在这令人惊异的“决议”中，用毛自己的话说：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10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自我庆贺不可做得太过火。在这份文献中，毛在军事战略和政治两个方面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批评者作出了不利的判决。他援引斯大林的一个命题，正确的策略指导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进而说道："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

援引斯大林的话，在整个决议中仅此一例，并且它还是间接引用的。[34]因为斯大林对中国形势之洞察力已表现为格外缺乏先见之明。决议澄清了毛对斯大林的预见缺乏尊崇，以及斯大林的指导对毛的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形成没起作用或作用甚微这一事实。实际上，决议正本直到8年后斯大林去世之前才发表。

当然，如何作出正确的主观判断从而进行策略上的指导，是无法汇集整理的，整个决议对此也只能如此说："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

决议作者继续毫不汗颜地写道："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的……光辉成果……

最后，这个被中央通过、英雄在其内大唱自己的赞歌的决议确认，"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于是乎4月23日开始的“七大”成了毛的凯旋式。其最精彩之处是刘少奇所作的新党章报告。该报告宣称，全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这个报告中，刘提到毛或他的思想不下105次。刘的妻子后来告诉其女儿，“毛泽东‘七大’前尚无威信可言。是你爸爸和其他领导人为他建立了威信。”

刘的兄弟后来的一次议论可以证实，做此姿态并非出自全心全意：刘少奇毕业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35] 是刘少奇把他的地位给了毛主席；刘少奇本来有可能在初选中获胜。这当然是夸大其词。到1945年，再没有人能向毛挑战。但正如60年代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毛是将胜利建筑在不太牢靠的基础上的。

尽管如此，刘还是选择1945年，以他作为副手与第一继承人为条件，将他在城市和工会中苦心经营的党的基层组织并入毛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军队（党现在自夸已拥有百万以上成员。—作者注）。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对毛的赞扬慷慨而无节制：

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毛泽东是中国人，他分析中国的问题，指导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走向胜利。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阐释中国的历史与实际问题。他是第一个成功地进行了这一工作的人……他创造了中国式或亚洲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广大人民耕种着极少量的土地，生活在饥饿的边缘。要想过渡到更加工业化的经济，中国面临着……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压力。南部和东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中国选择的道路将完全影响他们。

6月11日，通过了新党章，毛被选为党及其首脑机关的主席，刘少奇为他的第一副手。即使这样，仍有迹象表明，毛对自己为防备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来的联盟有所保留。



>>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

最后，毛给两个生病的领导人送去了担架，其中之一是王明，以使他们的出席能够证明大会的团结。王明描述这一幕为：

毛泽东一个人站在台上，向主席团成员热情挥手以示邀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走上台来，和毛泽东一起站在主席团的长桌子后面。其他10位主席团成员（陈云、康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彭真、林伯渠、董必武、贺龙、徐向前）仍旧坐在大厅里。毛泽东一边做手势一边点头，向他们示意，请他们上台。在这以后，他们才一个个好像很拘束的样子，不慌不忙地登上主席台，走到主席台右边的一个角上，远离主席团靠墙坐下。坐在前排的代表，甚至都看不见他们。同时，在前台主席团桌后站着上面提到的5个人，这时的情况是：毛担心地在他们中间来回走着，不时望望每一个人，其余4个

人窘红着脸走来走去，互相催促着，好像孩子做客一样。他们还不知道谁应该坐在哪里。

“团结”的取得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对日战争即将结束，毛厌恶地评论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匆忙准备紧接而至的内战。他在7月中旬预言：“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曾一度寻求与罗斯福会面的毛，现在转而给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发出了一份亲如兄弟的电报。

8月初，原子弹落到了长崎和广岛。几天后，毛向其干部保证，这样的武器解决不了战争。“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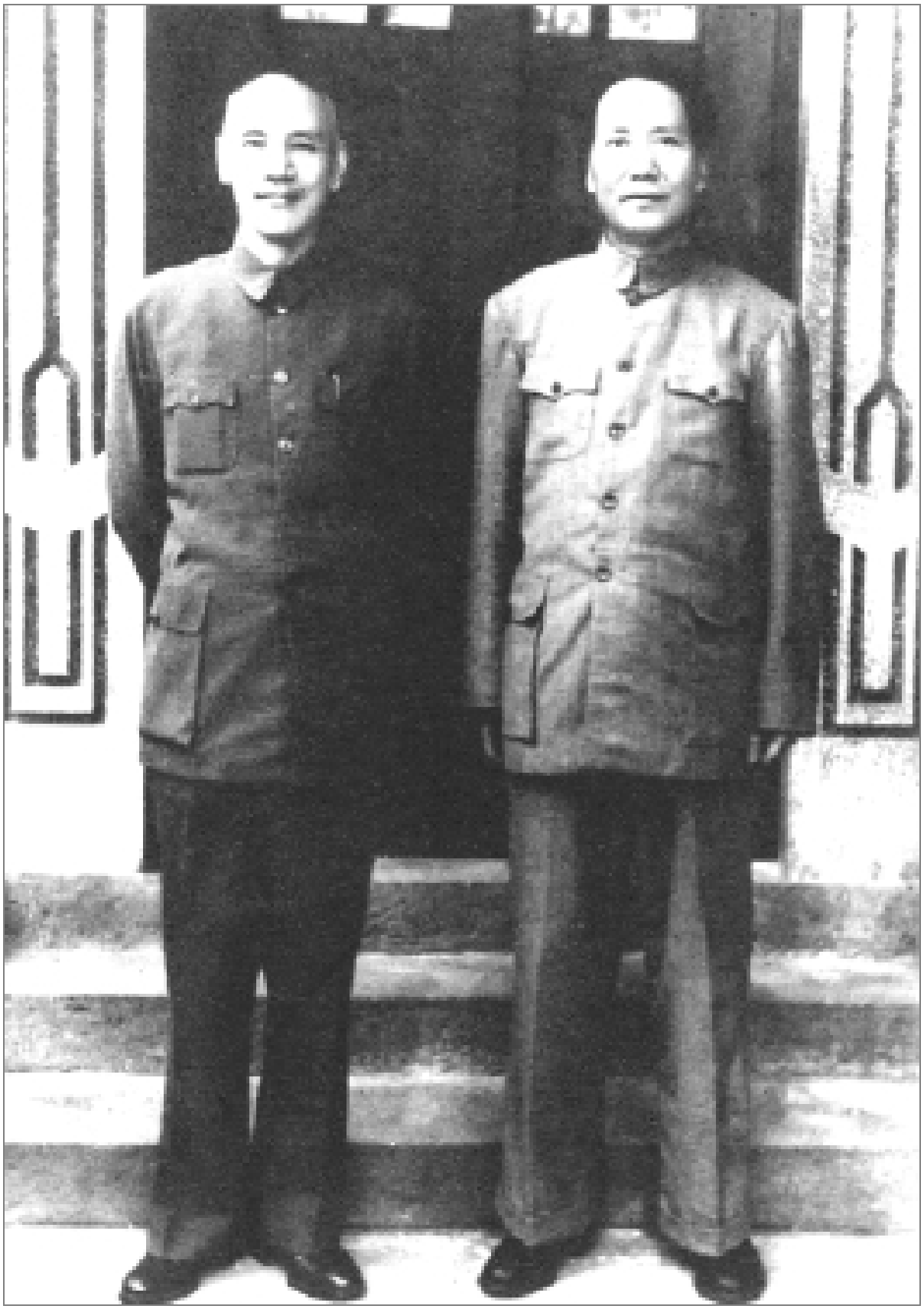
日本投降后，蒋总裁即刻电邀毛赴渝和谈。双方电报往来持续了大约两周时间，但毛规定了若干条件。8月末，赫尔利大使飞赴延安，敦促毛南下与对手谈判，毛被说服了。他致电蒋：“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8月28日，他起程赴渝，去与明知一心要毁灭他的人打交道。

15　魔鬼的晚宴（1945~1948）

1945年8月28日夜，蒋介石元帅为毛抵渝设宴接风。这是他们18年来的第一次会面。一个现场目击者记述：“蒋为他祝酒，他仅仅用嘴唇碰了杯子。头两天，毛作为客人住在重庆城外他的死敌的避暑别墅里，而周恩来为防投毒，总是先替他尝第一口酒。

有周和一同从延安飞来的王若飞作后盾，毛一头扎进了与国民党领袖的谈判中。毛事后回忆道：“蒋谈论的是和平……可他又下了不光

明正大的命令。谈判期间他对我党发动进攻，被歼灭了3个师……9月4日，毛和蒋第一次举行不带任何助手的私下会晤。但是，分歧依然如旧：蒋要求在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军队不得超过12个师，而毛则要求占20到24个师。



>>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合影，经过43天艰苦谈判，国共双方代表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这段时间里，毛巡回穿梭于茶话会、鸡尾酒会、欢迎会和记者招待会间，向中立的中国人阐明中共的观点，并向这个当时作为中国临时首都的城市里的外国人做各种说服工作。他除了会晤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法国大使之外，还会见了几个国家的援华组织领导人。他将他的诗《沁园春·雪》的抄件送交《大公报》发表，借以改变其粗陋、没文化的农民领袖形象。“全国人民希望和平，”他告诉应召而来的外国记者，“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5〕

毛特别热心于会见进步的美国人，他在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威廉·欣顿和杰拉尔德·坦南鲍姆。八路军办事处坐落在重庆一条肮脏狭窄的街道上，是一所白灰抹墙的房子，这里实际上被当做中共的临时“大使馆”。使这两个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毛详细地向他们评判了杜鲁门和美国的劳工运动。

他想弄清楚“Farm Bureau（农业协会）和Farmers’Union（农民联合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大多数工人没有组织起来？……”

毛还会见了三个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霍华德·海曼、艾德沃·贝尔和杰克·艾德尔曼。这三个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知道毛的烟瘾很大，而延安的香烟短缺，“所以我们从我们的定量中拿出几盒美国香烟，并写上了简短的话，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的繁荣、和平将来的祝愿”，〔6〕把它们留在了毛的总部。

作为回敬，毛邀请他们吃饭，对此，二等兵海曼回忆：“毛与工人、领导人、厨子、侍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爱与热情。我从中找不出哪怕一点儿傲慢浮华、礼仪规矩和屈尊俯就之感，或者其他什么矫

揉造作的东西。”毛泽东是否抽了这些烟，无从知晓，但其后不久，毛在重庆时的一位中国老熟人收到了毛赠送的“好运”牌香烟，因此，也许这些礼物又被当成礼物了。



>>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准备由重庆机场飞返延安

5个星期后，双方开始达成谅解。10月8日，毛出席了国民党的一个招待会，并乐观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的祝酒词是：“新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两天后，他与总裁签署了临时协定，当晚，蒋介石邀请他看歌剧。就在毛看歌剧的时候，他的汽车在停车场被炸。如果说应有所暗示的话，这便是一个信号，无论总裁作何打算（共产党也因20年代的经历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国民党中总会有一些不愿与毛合作的分子的。10月11日，毛在这不和谐的旋律中飞返延安。

他是在情绪低落、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返回的，他对他的同志说：“在重庆期间，我的神经过分紧张。现在还感到十分疲乏，体力衰退，时常心动过速，头昏、失眠、梦中出汗。”据他的一个同事说，他患了半年多的神经衰弱。

就其从重庆带回的协定，他解释说：“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前途有两个，一个是继续谈判，另一个继续打下去。“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只要毛泽东有几个月没有发表声明或公开露面，传闻便沸沸扬扬。其中有一个传闻是，毛已到苏联，正与斯大林共商共产党接管中国之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刻正是斯大林已经得出中国共产党过于弱小，无法赢得反抗国民党的国内战争这一结论，因此不准备帮助中共之时。1945年末，苏联人将离苏联边境不太远的重镇山海关交给了红军，结果却眼看着国民党麻利地挫败中共，将其占领。

1946年4月，与毛同辈的4个领袖，在一架美国运输机自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因坠机事故丧生。他们中有毛当时在权力场上的老对手博古和颇具潜力的新手、毛在重庆的谈判伙伴王若飞。但与此同时，过去共产党领导层中的另一个幽灵，在莫斯科待了15年之后，又突然在中国出现。人们从李立三在哈尔滨的露面推测，他可能是被斯大林派回来接替毛泽东的位置的。然而红色区域对毛的迷信仍有继续，毛的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张如心[36] 在1946年声称：

有人说毛泽东是个天才，一个英明的人。的确，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但必须指出的是他的天才既不是神秘的，也不天赋品质的结果。他的天才、智慧、才能是中国人民才智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是最杰出的炎黄子孙，是中国人民最卓越的象征。同时，他也是世界人民的领袖，一个科学家，一个天才和一个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忠实信徒。

5月间，国民党和西方的新闻机构又坚持说毛去了莫斯科，但是这一谣言又被有力地否定了。10年后，毛在谈到中国革命这一极为艰难的阶段时，公开地、半真半假地诘骂斯大林。他在1956年宣称，斯大林“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

英国作家罗伯特·佩恩6月间在延安一所挂有孙逸仙、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肖像的简陋房间里见到了毛。与30年代相比，延安诸方面都略有改善。承蒙“迪克西使团”发电站的特许，这里有了电灯，电影则正在上映1946~1947年的《舍伍德森林匪徒》和有点不合时宜的《多莉姐妹》。

佩恩声称，拍照并不能反映自己对毛的以下真实印象：

“……这个人留着青黑色的飘逸长发，戴着圆圆的银边眼镜，柔和的下颌，缩拢着的，甚至有点女性化的嘴唇，大学教授般的风度……一会儿像孩子似的痴笑，一会儿又深沉地富有权威性地、带着十分独特共鸣的轻声细语。他已经53岁了，看起来像30岁……他穿着黑棉布拖鞋，棕色羊毛中山装。摆手时，他将肘部抬到肩膀的高度，这是个古怪的姿势……



>>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进步作家、记者斯特朗的地点

国民党现在全然丢掉了合作的伪装，对共产党发起了全面进攻。毛不得不面对一场既得不到苏联的支持，也没有美国援助的武装斗争。然而他似乎知道自己是赢定了。正如他8月间对美国作家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也正是在这次会见中，毛详尽地阐发了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名言。斯特朗想知道如果美国用原子弹对付苏联，那将会发生什么。毛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他还对今后世界区域性划分作出了分析：“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他预言，这一地带反抗超级大国压迫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

8月底，毛到哈尔滨与林彪商计东北红军如何对付国民党进攻的问题。据说，刚刚从苏联回来的李立三已经得到林彪的政治保护。在众人面前，李立三表现出一副忏悔的面孔。9月初，他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表示：“历史事实表明，毛是对的而我错了。庆幸的是我又被引回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但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却报道，李正在北方组织一个反对派，以削弱毛的领导。此举的目的在于在苏联帮助下，在东北或蒙古建立一个自治地区。

10月，《纽约先驱论坛报》的A.T.斯蒂尔采访了毛。斯蒂尔想弄清毛是否把蒋看做中国“当然领袖”。毛回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

袖’。毛对美在中国伪善调停颇有微词。

毛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这场国内战争是血腥残酷的。在对其同志所作的关于日本投降一年来中共抗击国民党的报告中，毛说：“过去3个月经验证明：歼灭敌军1万人，自己须付出2000至3000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力量四倍于共产党，在1946年到1947年内战的开始阶段，红军在长城与长江之间被消耗了六分之一。(37)

1946年末，毛在延安接待了一群西方记者。其中一位记者报道说：“他看上去明显地从去年冬天那令他倦怠的过度劳累中恢复过来了。他时常解颐开怀……”〔21〕《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把他描述成一个“颇有些女人相的男人，穿着家织的棕色上衣，戴着黑布帽，坐在那儿熟练地用牙嗑着西瓜子……几天后，《新闻纪事报》的杰拉尔德·山姆逊在席间提起苏联人正将工业装备从东北撤走之事。毛解释说：“苏联军队从未用它来屠杀中国人，可如果蒋总裁得到它，他会把它用于这个目的。”当然，一些观察家相信，斯大林这是在蓄意拒绝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至于将来，毛向山姆逊保证：“共产主义中国的最初阶段是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期。

此时，毛也十分清楚党内外在反对他的领导，他对此深恶痛绝。从他抄录给一个朋友的唐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毛在1947年头几周内果真“卷土重来”了。这也是他通向北京权力的艰难历程中最后的一搏。3月12日，国民党对延安发动了意在迫

使中共放弃其首都的大规模空袭。在指挥疏散的紧张日子里，毛比平时花费更多的时间同孩子们玩耍，明显地要给人以轻松的印象。



>> 1947年，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前的毛泽东

3月18日黄昏时分，积雪厚达12英寸，红军出发了。身后留下了被敌人炸得遍地瓦砾的空城。几乎同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延安。

毛坐在一辆吉普车上，这辆吉普车驶出延安仅几英里远时曾被敌人飞机的机枪击中。一个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他左胸中弹负伤。实际上，尽管车顶被穿了几个洞，但车上乘员没有一个受伤，随后，他们用树叶将车子伪装起来，继续前进。

就在此刻，毛和妻子恐怖地意识到，他们没把孩子带在身边。毛的小女儿毛毛在从延安仓促撤退的慌乱中走失，[38] 从此杳若黄鹤。但在紧急搜寻中却在一户农家里找到了天真活泼、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李讷。为了安全，小姑娘被送到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身边，后者被派到军事上相对安全些的地方。小姑娘在邓的监护下生活了几个月。直到70年代，她仍称邓为“邓妈妈”。

始于1947年3月的这一旅程，变成长达两年的另一次长征。毛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躲避国民党军队。危险与骚扰相加，使毛及其部下养成了日出而息、日落而行的习惯，后来他们发现，这种习惯已很难改掉。不论到哪儿，只要能待几天，他们都要在那一地区搜罗转战需要的“三大法宝”—毛皮、草药、食盐。为将被敌人发现的机会减到最低限度，领导人都用了化名。毛化名为李德胜—意为“坚决要战胜”。中国的一些报纸谣传说毛已去了朝鲜。

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放弃延安时都已分散，大部分书记处成员，包括毛和周恩来，在坚守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北上向长城推进，与此同时，刘少奇、朱德则向东，在河北西柏坡建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毛在负责指挥整个前线战局的同时，还“亲自指挥了陕北战场”。



>> 1947年，毛泽东率队撤出延安，在西北高原与国民党军周旋，左后侧的身影为江青

毛的小分队辗转到了青阳岔。4月9日，毛在此起草了一份通知，向党内其他同志说明眼下发生的一切。他命令他们保卫西北解放区，“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时他说明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要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向王家湾进发。毛不得不吃“用谷粉和榆钱”做成的稀糊糊。他的警卫员发现他因饥饿劳乏上马后在鞍子上直打晃。他的助手们慌忙拿来担架。

“这是什么？”毛笑道，“你们又想让我上担架？”

“您太累了，”警卫员说，“同志们都愿抬您。”

“大家都累了。”毛争辩着，继续骑着马。

在王家湾，他们休整了近两个月，在这里，毛给彭德怀将军和前线其他司令官发了一道命令。他写道：“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

王家湾是座仅有10户人家的村子，坐落在山脚之下，而敌营距此仅6英里左右。一个老农将其摇摇欲坠的破窑洞借给了共产党的领袖，窑外是一座充斥着腌菜缸辛辣气味的小院子。

这是两孔相连的窑洞，毛与妻子住在里间，周恩来和其他两个中央委员住在外间。每当四个人要商议什么时，江青只好离开窑洞，待在一间驴棚里。江青后来还曾经回忆她是如何一连几天和驴待在一起无所事事，一身虱子跳蚤，身体也掉了分量的。

正是在这里，毛有了非比寻常的机会去扮演一个可亲的校长角色。一天，他们的“东道”，村子里那个借窑洞给毛的老头儿，在他们听收音机时走了进来。他以前从未见过收音机，见了之后便大为惊异，前后左右看了个遍以后，说：“这是什么？里面可有人吗？”

大家都乐了。

“别笑，”毛说，“你们哪一个要是知道这个原理，就把它讲给大叔听嘛。”

可没人能作出解释。一阵局促的沉默后，毛拿出个凳子让老人坐下，然后就像拉家常似的开始解释无线电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当事人回忆：“他讲到了空谷回声，空气的振动，最后是一些有关电磁波的运作原理。我们越听越有趣，像是参加一个很吸引人的讲座。”

对于这一新发现，老人颤着声音说，要是早先他看见这玩意儿，准保劈了当柴禾烧了。以后要找到这东西，他会留着它“听毛主席的声

音”。

由于当时仍秘而不宣，老人家没有认出他的这位新先生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的化名—李德胜。

直到毛离开王家湾，老人才终于知道了以前住在他窑洞里的是什么人。不久，国民党占领了村子，他们试图逼他说出毛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还以剁掉他两根手指头相威胁，即使这样，老人最终还是没有告诉他们。

王家湾窑洞里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紧张而激烈，谁也不知道敌人将从什么方位，以何等力量逼近。毛的观点是共产党应坚持在陕北境内不断躲避敌人的灵活战略，对这个战略他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另一些则吵着要撤过黄河，尽快向东挺进。毛时常是在恼羞成怒和精疲力竭的状态下结束会议的。事后江青回忆说，一开始她也不清楚什么东西使毛的脾气变得这么坏。

4月4日的蟠龙战役使毛的态度变得较为乐观。这一仗红军消灭了国民党一个师，除俘虏外，还获得了大量给养。然而到6月份，当敌人逼近村子时，毛不得不率部离开王家湾，向西转移，来到长城附近，国民党对他们一路追踪，他们不得不在电闪雷鸣的狂风暴雨里连续不断地行军。有一回向导迷了路，他们不得不在敌人鼻子底下折回来，只能靠手势互相联络。

江青有意让她的马落在打头阵的领导人后面，以免除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照顾她的负担。然而她很快发现，她自己成了这一队步兵中唯一的骑手。他们中的一个人将她从马上拽下来，以免马在泥泞中脱缰或打滑摔着她发生危险。这些人不得不手拉手组成人链，以便维持正确的路线。破晓时分，毛捎信儿过来，让她到前面和他会合。

那一夜，他们好不容易甩开了敌人，折而向东，在小河村度过了6月的下半个月和7月份。在此，毛发动红军进行全国性的进攻，并签署同意了刘少奇关于温和土改的报告。这两个领袖仍是双套马车，尽管刘偶尔流露出保留意见，正如那时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领导者，古今中外都没有。如果有人要充作这样一位领导者他只不过是猪鼻子里插葱，一装象而已。



>> 1947年7月，毛泽东和随同转战的机要人员在小河村合影

敌人的追踪使毛于8月初重又开始奔波劳顿。3周内，他日复一日地朝着黄河稳步行进。酣战之中的他，骑在马上爱惜地掏出香烟，可又因“禁烟”命令已下，无可奈何地放回口袋里。他卷起裤腿蹚过激流，折根树枝扔在河里看看河水流速，他戴上柳条帽圈伪装起来，以防头顶敌机空袭，而后，等帐篷支起，电台架好，便没完没了地阅读

电报，并对其他指挥官下达指示以控制战役。有时他走出来，聆听远处山谷的枪声，以弄清他的计划是否在顺利施行。

他们挺进到了黄河之滨的葭县，在那儿，江青给毛买到了一些山楂。敌人仍穷追不舍，先头部队中的毛得到消息，说周恩来病了，毛把担架送给了他那位鼻子流着血、衰弱地坐在草地上的同志。周一开始拒绝用担架，只是在江青回头来查看情况时才让了步。周刚刚躺在担架上，他的鞋底便一览无余，江青叫道：“周副主席，你的袜子全从鞋底里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是吗？”周笑道，“难怪走路时感觉到路上有东西硌。”

另有一次，毛已经睡下，周发现了附近山上敌人点的火光。与当班的高级官员商量后，周说：“别告诉主席，让他好好睡一觉，他太累了。”

但是毛还是在他的房里听到了，并喊道：“不用担心，今天这世界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

国民党迫使毛自葭县再度西进，一直走到梁家岔。在此，毛通过无线电在8月的第3周内指挥了决定性的沙家店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共产党内战中的防御阶段的结束和红军反攻的开始。蒋介石已将其战线伸展到了满洲。据估计，红军已经能从苏联人手里得到枪械和物资了，同时还能从国民党俘虏手中缴获一些。农民们也在响应中共土地改革的号召。毛这时又向东，回到了葭县，随后回头向南，11月中旬到1948年3月间，在杨家沟建立了冬季临时总部。

这段行程期间，江青离开丈夫，渡过黄河来到古城双塔，与她离别了8个月的女儿李讷团聚。周的夫人自春天将李讷护送出延安后一

直把她留在身边。毛的夫人站在城墙上向着西边远方的延安城方向看了一眼，怀旧之痛阵阵袭来。她的女儿很快便和毛及其小分队重聚了。

12月，毛发表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讲话。该讲话稿是毛口授，由江青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毛回忆说：“那时我染上了病，因而不能写字。”

这篇讲话于1947年圣诞节传达给了在杨家沟的中央委员会。毛强调了放宽土改政策的重要性。1947年“土地法大纲”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为适当地实行这一任务，党不仅要组织起农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同时“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

实际上，毛是在空想着中共能够协力，在重新平分土地的同时，保存中农经济。这对整个农村来讲事关重大。毛于圣诞节在杨家沟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讲话十分典型。他说，每个人只需足够聪明、谨慎、富于想象，全面而诚实地执行政策，那不可能互不相容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而在现实生活中，“土地法大纲”正在经由数以千百计的党的干部实施，他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这些品质。

另一个新的问题是共产党庞大的新党员入伍。过去10年中他们膨胀了几乎百倍，达到300万人。这使得党有能力与日本人和国民党双方抗争。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

毛以鼓舞人心的口号结束了这个报告。他将中国的地位与全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对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杨家沟的3个月，也是毛不断著书立说的3个月。他的著作全面概括了从军事战略到与解放区内的中产阶级打交道、土改、经济政策、军内民主、党内行政效率等各种问题。手写麻了，便借握石头来锻炼手指。

毛与各阶层的灵活接触，生动地体现在他对地主的统治上。“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5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3年以上者，一般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在1948年1月同一份指示中，毛提到了惩戒问题。

“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

一旦土地斗争在各地区达到高潮后，“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3.6亿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3600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做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

16　兵临北平（1948~1949）

1948年3月下旬，毛离开杨家沟，开始了他通向北平的权力长征的倒数第二阶段。他率部在寨则山附近东渡黄河，然后转而北上，越过长城，仅用一天时间便进入内蒙古，随后南下河北。他们得翻越高达1万英尺、白雪覆盖着的五台山，这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上气不接下气。毛和江青乘坐几天前刚刚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吉普车来到一座山的顶峰，一览这壮美的山河风光。又向前走了一点儿后，他们便接连几天遭到空袭。

征程之中，毛向解放区传播着智慧。4月，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批评了共产党记者的缺点。尤其是他们中一些人没有彻底贯彻群众路线：

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

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些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

同样，他还要求他的报纸保持其魄力与冲劲儿。“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

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5月底，毛抵达西柏坡，以后的10个月间，他的总部将在此逗留。直到他经过200英里行军，于来年3月胜利进入北平城。



毛在对远方的战场施加他的影响时，遇到了一些阻力。1948年底，他的一个同事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他正在发火。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的办法把他们饿出来，迫使驻防军投降。

几天后，还是这位同事发现毛又在大光其火。因为毛命令林彪将军去给一个国民党将领下最后通牒，要他立刻投降，否则就予以全歼，但林彪没有执行这一命令。林相信，那个将领可能逃走，不会投降。

这期间，毛和王明发生了一场冗长的争论，其间毛显得很痛苦地绞着两手，隐喻地说着党在他的领导下曾经致力于一条同有苏联背景的同志们相敌对的路线。他甚至谴责刘少奇的政治路线上的一些错误。同时他也责骂王明不想让中国有一个与列宁主义平起平坐的自己的“主义”。

他说：“你仍然还想恢复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

最后，王的夫人进来说：“我找你到处都找遍了，原来你还在这里争吵。我们还是回家吃晚饭吧。

一直坐在屋角听着他们争论的江青附和说：“你来了，这太好了！这两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你抓你的，带他去吃晚饭吧，我也抓我的去吃晚饭，免得他们再斗下去。

共产党目前已掌握了长江以北的整个北部中国，同时还在为接管南方半壁江山的渡江战役作准备。1949年毛以此为主题发表了新年献辞。他抨击了优柔寡断的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恰恰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劝毛，要他在长江以北建立人民共和国，而让江南任其发展。他很可能是害怕出现这样的结局，即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苏联不抱好感，并控制住整个中国的资源。尽管这是出于错误的动机，但他也许是对的。眼下毛继续向江南横扫而去，吞噬着人口与土地，但他对今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消化不良将成为共产党的一大难题却没有丝毫准备。有人认为他的胃口太大了。

刘少奇当然倾向于审慎取舍。他在1948年底说，如果革命形势发展过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

当蒋介石拒绝了毛的和平条件时，毛便向江南的亿万人民发出如下号召：

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当最后胜利的曙光在地平线上愈来愈明亮之时，毛开始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他、他的士兵和党必须越来越多地参与和他们已经获得完整经验的乡村地区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1949年3月5日他在西柏

坡对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论述：

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就是在这次讲演中，毛详细说明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国家经济政策，“中国已经有大约10%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但是“中国还有大约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在最初这段时间里，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的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允许其存在和发展。但资本主义将由政府通过税收政策以及制定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手段加以限制和抑制。



>>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对于几乎占了国民经济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必须组织生产、消费和信用的合作社……

这个讲话在对居功自傲的警告声中结束：“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究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

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西柏坡召开的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还在领导权方面同王明进行了一场交锋。王明指控毛假借整风运动搞阴谋才成为党的领袖—针对王明的指控，毛作出了精彩的回答："博古也好，洛甫也好，都只是名义上的总书记。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党内的总指挥实际上是王明……

北平现已被占领，共产党人正准备将政府机关迁入这座历史名城。

红色攻势的下一个巨大猎物是南京城。这一切激励着毛写出一首赞颂正在取得的军事胜利的诗：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北平，毛住在紫禁城红墙后面中国前统治者住过的宅邸里。他选择了紫禁城内、由护城河环绕的中南海里的一座松树掩映、朴实优雅的平房。这是两套分属毛和江个人的、既独立又相互连通的房子，这两套房子由明朝风格的精雕细刻、错综复杂的廊柱划分开来。毛和江还在北平城外玉泉塔附近的西山分得了一套小别墅。

和在延安时一样，毛在中南海里有一小块园子。在那儿，他与江青种上了茉莉、草药和蔬菜。江后来说：“我还曾试着种一小块稻子和一小块棉花。

然而，毛的妻子在到达北平后便匆匆前往莫斯科疗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已经是“皮包骨头，体重减到了90磅”。延安两年的军旅劳顿，拖垮了她，就像15年前长征的紧张拖垮了她的前任，毛的第二个妻子一样。

在莫斯科，苏联外科医生摘除了她的扁桃腺，并把她送到黑海之滨阳光明媚的度假胜地雅尔塔去增加体重。回到莫斯科，斯大林便邀她一叙。他显然有一个错觉，即毛委托她带来了某些信息。实际上，直到她秋天回到北平以后，毛也没有离开北平去朝觐斯大林的宫廷。

毛的妻子对她与毛在北平的早期日子的回忆是，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阅读、时事研究和写作上面。他们很少一同外出，即使是作为消遣，他们也几乎从不到外面的餐馆吃饭。江青描述毛是“毫不在意他在吃些什么”。他吃饭很快，时常在最后一道主菜上来之前便吃饱了。那时他总是把有正菜没吃忘得一干二净。

这倒使江青记起宋朝一位政治家[39]，他总是吃离他最近的盘子里的菜，桌上其他菜一概不问。厨子以为那是他最喜欢的菜，可从主人的妻子那儿他才失望地了解到，他是不论皂白青红，只吃手边最近的菜。

当江青提起这个故事时，毛咯咯笑着对她说："这就是你所了解的历史，你是用它来戏弄我。"

毛并不常讲到他的生活标准，但60年代初，他曾向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表白："像我们这样有车坐、有马骑、有暖气、有司机的人可算是头等公民了。我每月只拿430块钱，雇秘书就负担不起，可我必须雇。50年代，他的月薪能拿600元，相当于90英镑。70年代初，据说他又从月薪中裁减去了20%，但他还说按中国共产党的标准，通过他的著作版税，他变得富有了。

他的卫士们在他死后悲叹："您住的是旧房子，解放20多年一直不让修缮。您的衬衣、皮鞋，都穿了多年，已经破旧，我们几次劝您换一换，您都不同意。他的一床被子从1942年一直用到1962年，然后又被送进博物馆。毛进城时穿上的一双系带皮鞋，穿了近30年，在他死后又被拿去展览。他的浴衣肘部显眼地打着补丁。

这些卫士们隶属于8341部队，其职责是专门照顾毛，而最后，该部队终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角色。他们将毛描绘成一个模范雇主：

"您常常到宿舍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家庭情况和生活情况。您问我们看革命样板戏多少，并送票让我们去看。您问我们家中来信没有，家中情况怎样，让有了情况及时告诉您。夏天，您关切地问我们屋里有没有蚊子，派人给我们打药灭蚊。冬天，您慈爱地抚摸着我

们，问冷不冷。您询问我们伙食标准够不够，还到我们伙房看饭菜做得怎么样。

毛的工作时间很特别。他一般上午11点起床，3点钟用午饭，7点半吃晚饭，然后开始工作，不到凌晨5点是不会再上床休息的。他的卫士回忆说，遇有紧急情况，或特别的工作日，他常常“几天几夜不停地工作，废寝忘食。有时饭凉了，不得不热了又热”。他对伙食要求很简单，“不外乎杂粮、半支莲和其他野菜”。

进京当主席的头些年，毛号称每天抽50支烟，他喜欢抽英国牌子，女王御用的“555”牌—然而，1960年初，传闻他每日削减到20支，并只抽国产牌子的了。据说抽烟使他咳得更厉害了，到其晚年，逐渐妨碍了他在公开场合的讲话。60年代末，人们看到他手拿小雪茄，替代了他通常用的香烟，可能就是出自健康原因。

毛的娱乐之一是定期，而又不事张扬地到鼓楼大街上他喜欢的理发店去，在那里与老友们叙旧闲聊，乐此不疲。在家里，他通常喜欢每天晚上打打乒乓球。据说他很少漏球，将球快速有力地抽回去，而且“经常获胜”。

他喜欢在雪中漫步，他的一个卫士说：“他踏着雪，兴趣盎然，似乎没有比这更让人快乐的事了。我们知道主席对雪的嗜好，每当下雪时，便在院子里留出一块不扫。毛仍是自始至终睡在没弹簧的木床上，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

此刻，毛在家里的地位变得复杂化了，有时一定是很苦恼的—毛已到了总是让亲属们利用其感情的地步。进入北平的最初几个月，他的妻子赴苏疗养，与此同时，他的前妻贺子珍自苏回国。因未痊愈，便被安置在上海一个精神病院里。他们的女儿李敏也随母亲回来与其

父在紫禁城团聚，并开始作为晚女由江青将其与亲生女儿李讷一道抚养。

家里的气氛应该说是自由开放的，然而真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江青后来回忆，“我们的孩子是允许顶撞其父亲的；有时我们甚至故意让他们反唇相讥”。

毛和第一个妻子生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回到了中国。苏联朋友1949年后不久在哈尔滨观察到，后者以他在苏联养成的习惯品位生活着，中国同志无疑对此觉得做作与奢侈。有报道说1950年他为进一步进行精神治疗，又回到了苏联。

这两个年轻人给人以在其父亲的新中国找不到自己合适位置的迷途漂泊者的印象。毛或许很轻视他们变得如此苏联化，却忘记了他们赴苏的原因部分是由他所造成的。他明显地觉得孩子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如若只仰仗他的帮助，则势必毁掉其发展的可能性。对家里的两个女儿，一个十几岁，一个也快到这个年龄了，也有同样的要求。传闻说她们俩都渴望成为芭蕾演员。



>>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

8月，长沙解放，毛的结发妻子杨开慧家也可通过红军电台与毛联系了。毛8月8日的回电提到了杨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们都很想看外祖母。”毛还将他和杨的女儿杨展“于8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为国光荣牺牲”的消息通报给了这个已与北方隔绝了多年的家庭。

也许是想到了家庭，毛在4月份写了另一首诗，和答把他欢呼成“新纪元的创造者”的学友柳亚子。毛在和诗中暗示了他在其政治胜利的环境中忍受的苦楚：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

胜过富春江。

6月末，毛答复了他的一批批评者。他一开始便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的目标：“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

这是19世纪中国思想家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中所设立的目标。在这方面，毛谨慎地将共产主义目的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知识传统，而不是引进的西方思想中，希求以此来安定代表着中国思想家的大多数的非马克思主义者。

接着，他一一历数了他的批评者们的抱怨，他们说：“你们一边倒。”毛答复说：“正是这样……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你们独裁。”对此，毛回答：“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



>>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毛在这一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由衷谈话中，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变革的挑战作出了如下结论。战斗已经过去，摆在前面的是尚不熟习的建设工作。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8月，美国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以惋惜的笔调将中国划归共产主义世界，并称中国国内战争的结局为“不祥之兆”，毛泽东对此则抱藐视心理。在共和国成立的前几个星期，毛向美国呼喊出了他的愤怒和轻蔑。8月18日，他在一篇报纸评论中写道：“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对白皮书中描述的中国的黑暗前途，毛的评论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

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根据的。

9月，毛在北平召集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开幕式上，毛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9月30日，会议选举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选举前，一些非共产党代表在走廊里向他问起此事。

毛俏皮地对他们解释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举选票上印着名字的人，当然他不能勾掉上面所有的姓名而填上西门庆的名字。”西门庆是言情小说《金瓶梅》—中国的《十日谈》中的角色，是个浪荡公子，毛很喜欢看这部书。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图为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在中南海合影。一排左起：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毛泽东；二排左起：安子文、李克农、彭真、周恩来、齐燕铭；三排左起：刘澜涛、陈云、徐冰、陆定一

那一天，他以其浓厚的南方口音朗读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在内的国内战争中牺牲者的墓志铭，他的讲话被电台作为特例录了音。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广东和重庆仍未解放，但蒋委员长已逃往台湾，无疑这便是内战的结局。毛，其年55岁。

17　虎口取食（1949~1951）

(1) 应该是汉口。—译注
(2) 此说有误，所谓“两个秘密会社的土匪首领”指地方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袁、王二人实为红军误杀。—译注
(3) 此段话未查到有关的中文资料。—译注
(4) 这段话与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5) 指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译注
(6) 此处引文与伪造信原件中的文字有出入。—译注
(7) 黄指黄公略。—译注
(8) 指国民党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译注
(9) 应该是11月28日。—译注
(10) 应为10月下旬。—编注
(11) 1932年7月，周恩来以中央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赴前线，随即以前方最高军事会议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作战。他们在红军作战行动方针上与后方中央局发生分歧，为此，毛泽东在这年10月于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主要攻击，并被迫称病离开前方。不久，中共临时中央局决定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编注
(12) 萧华没有留在江西。—译注
(13) “毛主席”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瑞金，毛任“中华苏维埃主席”时。—编注
(14) 此话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15) 《西行漫记》中译作“炮铜岗”，但在其他记载中都作“抱桐岗”。—译注
(16) 应为6月20日。—译注
(17) 斯坦莱（1841~1904），英国的非洲探险家。—译注
(18) 指毛和他的夫人。—译注

(19) 指张学良。—译注
(20) 西安事变第二天（12月13日），中共机关报《红色中华》曾提出过把蒋交付人民公审的办法，后根据国内外形势，改为“保蒋安全”的策略。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独立自主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电报是12月20日才收到的。—译注
(21) 即马海德博士。—译注
(22) 指王炳南。—译注
(23) 此处是音译，Li Ta Chang。—译注
(24) 指杨子烈。—编注
(25) 召开“七大”的最初决定是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所作。到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又决定1940年召开“七大”，但是，直到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才选出主席团，通过议事日程，六届七中全会历时11个月，先后召开8次会议，于1945年4月20日结束。三天后，1945 年4月23日，“七大”才正式召开。—译注
(26) 199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已发文为王实味同志的错案平反昭雪。—编注
(27) 该报告发表于1942年4月27日《解放日报》上，当时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下文中“大司父”系原文如此。—译注
(28) 这位苏联人即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迪韦诺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他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事后著有《中国特区：1942~1945》（中译本名《延安日记》）。以下引文见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延安日记》。—译注
(29) 原文为萧瑜，似误，应为萧三。—译注
(30) 中国通，美国各主要杂志（如《生活》等）的远东问题评论家。其评论“常以熟谙重庆政治内幕著称”。—译注
(31) 当时，赫尔利是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而非驻华大使身份与毛会晤的。—译注
(32) 时为美军观察组代理组长。—译注
(33) 此处疑有误。似应为毛泽覃之子。—编注

(34) 斯大林的讲话在《决议》中曾多次被直接或间接地引用。此处与事实不符。—译注
(35) 此处有误。刘少奇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译注
(36) 原名张恕安。—译注
(37)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总兵力为127万，1946年底到1947年初发展到137万余人。在全国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年底（1946年7月~1947年6月），我军损失35.8万人，其中负伤26.7万人—包含伤愈归队者约20万人，牺牲6.9万人；被俘及失散2.2万人。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132~133页。—编注
(38) 此说疑有误 ，毛毛此时并不在延安。—编注
(39) 此人系王安石。—译注

第三部 大权在握

毛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脑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要同斯大林和解。这对他来说是极为棘手的，因为他目前所处的显要地位主要不是靠遵循苏联模式赢得的。但是现在，身为中国的第一位共产主义统治者，他必须去莫斯科与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握手言欢。无疑，他希望斯大林能从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加入共产主义行列这一事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出发，忘记过去并赞同翻开历史上的新篇章。

毛非常清楚斯大林对他的不信任。13年后，他回忆说，当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

到12月份，毛第一次准备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一位同僚已先他抵达那里。显然，他的这位同僚正在俄国人的支持下，巩固其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的地位。这个人就是高岗。高曾经在长征结束时把毛迎入陕西并使后者免于磨难。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即1946年到1949年期间，高作为东北的领导人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为东北紧扼通往苏联的中国铁路，而且它的重工业对共产党人极为重要。高后来宣称：“我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者，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则是井冈山上的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据此，可以说。高正把自己看成可以取代毛的领袖人物。高并没有公开谋求毛的党的主席职位，却千方百计想攫取刘少奇的书记处书记职位和周恩来的总理职位。所有这些恐怕都得到了苏联的支持。毛后来说，斯大林非常喜欢高岗并送给他一件特别的礼物—小汽车。赫

鲁晓夫记得克里姆林宫曾收到过高岗提供的有关北京领导人情况的许多材料，他说：“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

1949年7月，就在毛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个星期前，高岗率领一个独立的贸易代表团，作为“中国东北人民民主政府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先于毛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

据后来陈毅的一个报告的译本说，高“从苏联邀请专家，派学生去苏联。事后才敷衍性地要求中央政府同意”。[1] 直到1952年，高的东北甚至还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



>>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前来迎接

所以，1949年12月16日毛去莫斯科时，对他以前的朋友和救星的作用心存疑虑。当斯大林把他当做心腹朋友时，毛一定感到很意外。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苏联大使关于毛与高岗争论的报告交给毛，对毛说：‘看看吧，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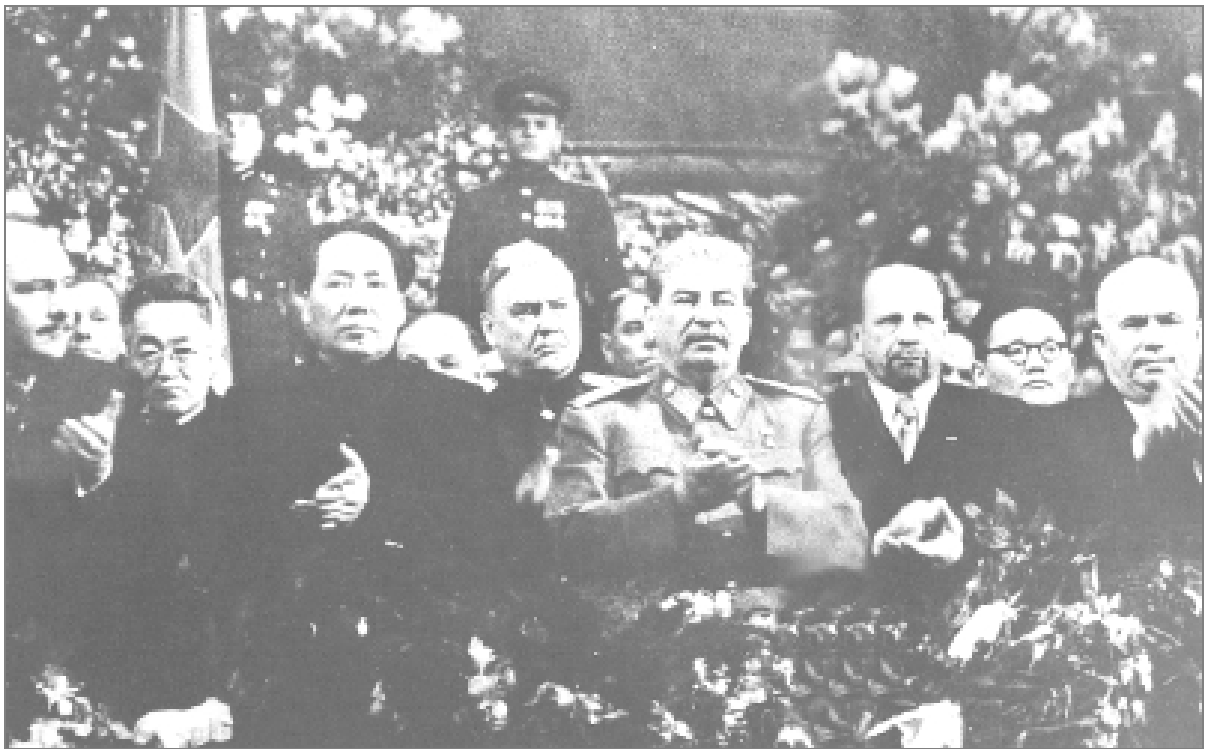
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接着赫鲁晓夫自己解释道：“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秘，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然而，我认为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2)

赫鲁晓夫是对的。毛在访问前没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对他已有好感，谈判的结果又在他心中埋下了深深的不信任感。由于这一原因，高在东北的表现和行为一定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但是，毛必须等到斯大林死后，才能对付这个危险的竞争对手。

在毛访问莫斯科的九周（其中有两天去了列宁格勒）内，中苏双方都令人惊异地沉默寡言。斯大林70寿辰时，毛重新出现在宴会上，之后又受到苏联领导人的多次宴请。然而，他们彼此都发现很难谈得来。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斯大林对中国的新统治者一直忧心忡忡。“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问身边的同僚，“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

斯大林怀疑毛有狭隘的农民观念，害怕城市工人，把红军建立在孤立的基础上而不考虑无产阶级。由于毛在国民党无力防御上海时，对占领该市裹足不前，因而使斯大林确信了他的上述看法。斯大林向毛提起的第一桩事情就是这个问题。



>>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

“为什么不打下上海？”他问。

毛答道：“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这个回答只能加重斯大林的怀疑：毛考虑的不是进入上海并获得当地无产阶级的支持，而是唯恐供应城市食品的工作会妨碍他在全国其他地区同蒋的斗争。

当后来斯大林重温这段争论时，对他的同僚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

最初的会晤一结束，怨气便自谈判中涌现出来。斯大林连续几天不想见毛，而且正如赫鲁晓夫所言，“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谣言传开了，说毛很不

高兴，他受到禁闭和忽视，假如这种待遇继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于是，斯大林为他摆了另一次晚宴，以稳住其心神。一些人把毛的长住归结于下述事实，即他在莫斯科经常患病，身体虚弱无力，无法在会议上讲话。

至于斯大林，由于他要求在华享有和中国过去被迫给予西方人的极为相似的特权，因而加重了毛的忧虑。例如，他提议建立一个联合股份公司来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他还要求毛拿出土地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这两个建议极易让人联想起昔日令人望而生畏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

同斯大林的这些会谈，毛牢牢地记在心里。八年后，他在家里告诉他的同志：

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那时有两个“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任何第三国的都不准住在那里……

1957年毛在另一次谈话中回忆说：“我们要签订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

在俄国首都的寒冬里过了毫无收获的一个月后，毛把周恩来从北京召来以收拾谈判的残局。两个最高级人物能够面对面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的神话破产了。结果，毛在中国的威望降低了。三个星期后，1950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一份友好、互助和结盟的条约在为此而举行的仪式上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俄国在5年内向中国仅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和其他经济协定。用斯大林为东欧各国所做的

一切或者美国为其亚洲盟国所做的一切来衡量，任何人都会清楚，斯大林对待中国明显地吝啬。

中苏还对即将发生在朝鲜的事件进行了讨论。显然，当时尚未认识到这一事件将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斯大林就北朝鲜领袖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征询毛的意见。

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同意金日成的设想，并提出美国不会干涉的看法，其理由是，这场战争是一场国内战争，朝鲜人民会自己加以解决。

几天后，毛穿越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回到了北京。抵京之际，毛对两国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仅发表了寥寥数语的演说。斯大林与毛的“伟大会见”的照片出现在全国，以夸张的语言赞颂他们的新歌也传播开来：“毛泽东！斯大林！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光明！”然而，北京的圈内人物却知道毛受到苏方的冷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出于中国人的自豪与自尊，毛在同斯大林周旋的过程中已经站起来了。他的中国同志无疑钦佩他的气概。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未能把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带回来。俄国拥有的技术和能够提供的资金，中国自己要花费几十年才能挖掘和积累起来，所以毛的同志们对此一定颇为失望。

毛同斯大林最低限度的谅解一经取得，他便安下心来处理国内问题，把延安的经验运用于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6亿人口的国家中。正如江青直截了当所说的那样：“现在，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地位、良好的待遇和巨大的权力，如果我们不能作出新的贡献，那么，人民会需要我们多久？

毛于2月和3月间从俄国归来后，继续在东北的城市和工业区旅行。他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的工厂和企业。地方官员努力让他住得舒适一些并给他提供良好的饭菜，毛没有阻拦任何特殊安排。但在一个城市里，当毛看到他房间里的弹簧软床时，他对贴身警卫说：“我们不习惯睡这种床，你最好用我们自己的。”于是，软床被撤走，毛简单的床上用品铺在了一块木板上。

毛在哈尔滨视察铁路工作时说：“很好。你们有许多熟练工人。我们没有经验，应该依靠熟练工人管理工厂。”

他对一位负责人说：“你懂得怎样管理工厂吗？”

那个官员答道：“不，我不懂。最近我刚被调到工厂。”

毛评判说：“如果你不懂，你应该学。我们都不懂，我们都应该学。 南方的土地改革问题特别困难。1950年初，毛给南方各省党的领导人发出一份征询意见的通知，建议他们放慢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并指出，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党的干部容易发生过“左”偏向。过去，北方人民的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现在已无战争，所以土改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重大。最后，土改将使民族资产阶级不安，而党正在努力同他们合作。基于上述原因，毛极力主张，尽管共产党人取得了胜利，但暂时还不要触动南方的富农。

6月份，毛说，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党已经创造过奇迹了，但现在应当避免冲动。“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

要说服知识分子学习唯物主义以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

在这百业待兴的阶段，迎来了共产主义胜利的第一个周年纪念。在为此而于北京中心举行的舞蹈演出期间，毛作了一首诗：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然而，一个未曾料到的悲剧降临了，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毛本人，它都是一幕悲剧。6月份，金日成越过朝鲜分界线，向南进军，朝鲜战争爆发了。杜鲁门总统认为这场战争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策划的。中国人自己知道，毛在莫斯科的访问作为一次乞求帮助的游说活动是很不成功的，但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西方政治家来说，它更像是一次向莫斯科的控制屈服的旅行。朝鲜战争的突发，被视为在亚洲其他地区进一步扩散共产主义理想运动的第一个行动。

毛错了。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进行了干涉以支持南朝鲜政权。到10月份，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联合国武装部队已逼近鸭绿江，而且似乎要向中国边境进军。在此情况下，毛战胜了自己在向美国人挑战问题上的强烈恐惧，给中国军队发出了一道命令：“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在中国军队开进朝鲜的最初几个星期里，毛作出安排，让他的老对手，亲苏的王明坐火车迅速出发去莫斯科。最后得了妄想症的王，

断言这是一阴谋，让他在美国飞机袭击苏中两国之间的铁路时丧生。他对毛所下达的指示抱怨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所医院里他用消毒杂酚皂液代替医疗药皂刷碗。然而，他平安地抵达了苏联并在那里住了很多年，撰写他的回忆录，编录毛的所谓的罪行。

与志愿军一起入朝的一位官员是毛的长子岸英。这位年轻人在干了一段农活后，先是被分配到北京做翻译工作，后来又参加了军训。据说他在朝鲜指挥一个师。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那时他年仅30岁。

1950年11月，在一次美军空袭或者中国飞机坠毁的过程中，岸英牺牲了。用江青的话说，毛得到的这个消息给他们的个人生活蒙上一层“深深的忧郁”。

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年都在平壤以中国人的悼念方式在岸英的坟墓上放置花圈。因为据说后者的遗体“应朝鲜人民的要求”从未运回他的故乡。

朝鲜战争打断了毛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进程，同时也给蛰居于台湾并随时准备反攻的国民党以巨大的鼓舞。此时已得到美国全面支持的国民党对他们刚刚撤离的大陆加倍地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1951年，毛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领导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违法者、歹徒的运动上面。所谓“三反”（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运动和后来的“五反”（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以及对倔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展开的。

正是这些运动，和土改一起导致了大规模的血腥镇压。5月，毛发出指示，在犯有最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当中，大约10%至20%的人应处以死刑。而这仅仅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些人应当包括“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其他人尽管犯有死罪，但应处以较轻的刑罚，“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与此同时，毛的妻子正逐步介入他的政治生活。50年代中期，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她在文化部的电影筹划指导委员会里谋得一席之地。几个月后，她发现了一个问题，并能就此向毛证明她是其思想的合格的捍卫者。这个机会就是电影《武训传》的上演。武训是19世纪的著名乞丐，他攒钱投资创办学校以便让穷人的孩子受到教育。电影对他进行了称颂。于是江青抱怨说，《武训传》是在鼓励人们去做一个胆小怕事的规矩人，而不是去做一个彻底的激进的革命者。负责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官员、江青在上海的岁月里的宿敌、现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没有理会她的意见。毛对此也没有什么兴趣。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她离开了毛。



>>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一连数日，她没有在毛的房间里露面。最后，毛去了她的书房，而她正在全神贯注地搞她的研究。毛不高兴地说：“原来你仍在忙这个。”

江告诉毛，她想去山东武训的家乡以收集更多的材料。毛反对这样做。尽管如此，江青还是用假名去了山东并胜利归来，因为她搜集的材料表明，事实上，武训后来变成一个地主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者。毛最终信服了，并帮助她写了一些报告。毛自己也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1951年末，江青隐姓埋名去中南地区帮助搞土改。应其要求，毛送给她一件大衣，以备冬季之用。而且，他还与同事们一致同意，她应辞去作为毛的秘书长和电影局局长的职务。据说，这是由于她生病的缘故。

江青胜任政治或文化领导工作的才能，没有给毛的许多同志留下印象。

1952年底，因为抱怨肺疼，她第二次出访苏联进行治疗。苏联外科医生做手术检查她的肺，结果未找到丝毫的病象。接着，她又一次被送往雅尔塔，在那里她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青霉素治疗。只是到了1953年秋，她方获许回国，但仍需医治。

据江青说，斯大林对毛的建议之一是，他应该出版他的著作集。实际上，这是必然的。1950年毛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便开始修改和编辑他的手稿的工作，对这些手稿毛希望作为财富加以保存。修改的原因很多。显然，他需要改正其早期著作中存在的明显的理论错误。其次，在遵义取得党的领导地位以前，毛表达的某些思想也要加以充实，它们曾经一度为党所摈斥。

同时，毛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公开的把柄，以防政治对手攻击他在1935年以前不服从党的领导。最后，在50年代初期，减弱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理论权威的否定程度，对毛是有益的。

出于上述考虑，在修订过程中，通过增、删和各种各样的改动，对原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调整。一位西方的著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得出结论：“在对照原版检查以前，你不能把任何一个句子看做与毛实际上写的完全一致。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于1951年10月，第2卷于1952年4月，第3卷于1953年5月相继面世。此后，隔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60年9月，第4卷才出版发行，而第5卷则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依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的著作，比如他的《两种策略》，我们就不可能解决1950年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如果只有1901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便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十月革命前后所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列宁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等。

列宁死后，斯大林有必要写《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来反击反革命分子保卫列宁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著作我们必须出版以便跟上时代的需要。

要进行系统的考察，就应该判断出混杂在毛的著作中的大量中国引语。毛是写给中国人而不是西方读者看的。据统计，毛著作中的所有参考资料，22%源于儒家思想，12%出自道家或墨家的著作，13%是中国传奇或纯粹的文学作品中的东西。换句话说，他的引语的几乎一半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相比之下，仅有4%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24%引自斯大林，18%引自列宁。

这反映了毛自身的读书种类。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会有选择的读书的人。一位在40年代初访问过延安的苏联人评论说，毛只读旧式的包罗万象的典籍、古代哲学信条和旧小说，漠视西方的经典，蔑视所有的非中国人的著作。这个评论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不着边际。毛对书籍的矛盾心理是显而易见的。他曾经告诉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得越多越蠢”。这句台词在几个场合中都被提起过。

“选集”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呢？毛的一位亲苏的同事强烈地批评了他的哲学文章。他声称，这些文章中包含着严重的理论错误（是“反唯物主义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的”）和方法论错误（是“反辩证法的，与科学的方法论极端矛盾的、诡辩的”）。就毛的《辩证法唯物论提钢》一书来说，它有那么多的错误和幼稚的议论，以至于任何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读这本著作时都要“笑掉牙齿”。

毛公开承认，有些同志说“我甚至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接着，他进而表白自己是怎样在实践中而不是在课堂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以前我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从书本里，我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于是开始改造我的思想。但主要是在过去几年里，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才得到改造。如果我想进一步改造，就必须继续学习，否则就要落在后面。

“选集”里有许多具有特色的主题。比如，实用的中庸之道—中国人的一种典型行为方式。内战末期，毛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建议便是一例。他说：“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贯穿于“选集”中的另一个思想是，不稳定和不平衡是正常的。毛在一篇文章中讲：“树欲静，而风不止”，“没有必要害怕浪潮；人类社会就是在无数的‘浪潮’中演进的”。毛用一句话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平衡、静止和统一是暂时的和相对的，而不平衡、变化和对立则是绝对的和永恒的。

毛的“选集”中还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思想痕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所以，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同群众保持联系并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群众是公平的，他们不会否定我们的成绩”。

同时，毛关于阶级的思想也是不同寻常的。在一个关于阶级问题的指示里，他写道：

……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

这样一来，中国的资产阶级便可获准进入成员杂沓的“人民”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优良的行为样板，让他们转变思想。然而，无论你转变与否，思想毕竟是个抽象的东西。最后，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许多最亲密的同志的欺骗。

毛从未能使自己喜欢上知识分子。1968年，他向来自大学和工厂里的受过军事训练的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青年革命者—红卫兵发表了一个讲话，说：“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最不文明的。我认为朴实无华的士兵是最文明的。”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又明显地接受甚至颂扬生活中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君子……内省不疚。”

60年代初他写道：“我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存在能动的和自由的意志了。”他坚信主观力量改变客观现实的能量，坚信主观意志的威力。在1938年的一本小册子里他已经写出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客观事实……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术……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上述思想和更多的其他思想一齐收入“选集”，以展示毛主义或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性和系统性。这几乎就像古代学者整理孔子及其他圣人的教诲一样。毛泽东思想被描绘为“宝贵的思想财富”和“取之不尽的理论宝库”。一首小诗写道：

毛主席的书是宝库，

总有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

一字值千金，

读了心里红彤彤。

毛对自己的智慧结晶有时是很谦虚的。他说：“《毛泽东选集》，有多少是我的？它是用鲜血凝成的著作……毛选中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用流血牺牲换来的。

除了发到中国的几乎每个党员和非党员手里外，“选集”还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由于中国人做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因而导致《时代》在毛70寿辰之际发表了一篇评论，称毛是“中国的思想之王”。一位年轻的非洲来访者曾经告诉毛：“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毛的著作中有常识性的内容和维多利亚式的带有塞缪尔·斯迈斯思想印迹的关于自立的道德说教，也有哲学论辩和进行革命的策略，这些一直激励着他的人民。

18　挥鞭（1952~1954）

至此时，尚没有一位国家元首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对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表示敬意。直到1952年9月，在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三个年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泽登巴尔才来到北京，成为第一个访问人民中国的国家元首。令人感到惊讶不解的是，苏联人并没有率先做出这种表示，这或许是因为钢铁般的斯大林正在走向他生命的终点。1953年3月，这位苏联的独裁者和领袖病逝于莫斯科，北京的毛泽东写了一篇出人意料的而又明显言不由衷

的悼念文章。悼文中说：“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是第二个访问中国的外国领导人。1953年11月，他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会晤。至少这是对中国人参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包括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的一种表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是印度的尼赫鲁，他在1954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尽管几年前，毛泽东还打电报给印度共产党表示良好的祝愿。在电报中，毛泽东告诉尼赫鲁的国内对手说，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人，“……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羁绊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

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在1953年夏季朝鲜战争停火期间，尼赫鲁证明了他所领导的印度真正地独立于当时世界任何阵营之外。

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毛泽东在1952年夏天的一个讲话中指出，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用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在1952年，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战争开支无疑是十分巨大的，但它确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它证明了中国人能够战胜美国人。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虽然在“武器上是强大的，但是在道义上得不到支持，是弱小的”。

在1953年2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包括许多非共产党人士参加—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党内一些同志缺乏民主，他要求他的听众去反对政府官员中存在的官僚主义。这一思想最终导致了14年后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展开的一场动乱—“文化大革命”。他说，官僚主义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日益滋长，“即以中央一级机关来说，许多部门中的许多领导干部，还仅仅满足于坐在机关中写决议，发指示。只注意布置工作，而不注意深入下层去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使自己的领导常常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以致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的严重问题”。

显然，毛泽东正在制定一些新的模式和法规，试图以此去训练他的党。为此，他请求党外人士监督和批评那些没有能按照他的要求和思想去做的党员干部。在党内，他对这些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用他的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不断地打扫灰尘，使房间保持清洁和卫生。

但是，实际上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并逐渐发展成为党内的一种与毛泽东相悖的异己力量。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人民进入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阶段，这是迈向集体化的第一步。然

而，刘少奇，这位毛的助手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首先应该发展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然后才有可能使土地有效地变为社会所有。

刘少奇的这番讲话最早见于1951年夏天，后来这一讲话被红卫兵视为与毛泽东路线相对抗的证明。刘少奇在一个批示中说：“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依靠互相帮助和合作就能够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农业社会化，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显然这是对毛泽东大力号召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迅速推行合作化的回答。到1951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加快组织农村合作社的建议。至此，刘少奇不得不作出让步。

毛泽东发表讲话公开指责刘少奇，他严厉地说：

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

之后，毛再一次批评他的助手的保守主义，并促使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更进一步加速国有化和集体化进程。

1953年8月，毛泽东再次批评党内领导干部中的稳健派，主要是刘少奇的门徒薄一波，薄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在税收系统，薄一波主张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因此被认为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毛泽东指出，薄一波的“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应该受到批判。而且，薄一波的错误不是孤立的，毛泽东强调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在这篇讲话的最后特别提出了在以前会议中没有被写进决议中的党的有关纪律，并要求全党遵守这些纪律，保持谦虚的作风。他要求说：

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3年夏季以前，毛泽东对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著名的非共产主义哲学家梁漱溟持赞赏态度。梁是一个进步的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农业改良和乡村建设、乡村自治。1945年，他积极奔走，致力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以避免内战再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漱溟提出要改善农民的待遇。因为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工人糟糕得多。他说，用佛教中的等级制度来比喻，“城市工人在九天之上”，而农民却在“九地之下”。

梁漱溟的讲话，马上遭到周恩来的反驳，于是梁漱溟写了一个条子给毛泽东，要求再一次发言。他的要求得到准许，于是，梁漱溟十

分平静地开始了他的演讲。他说：“我再次要求发言，是因为首先我要考验一下我自己的勇气，其次我要考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雅量如何。”

这时，毛泽东发脾气了，他抢过话筒，打断了梁的发言，他说：“我猜想，梁先生自以为是非常美的，‘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这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女）。但是对我来说，你很丑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训斥，梁漱溟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会场的气氛顿时十分紧张。

毛用手指着梁漱溟接着说：“台湾的报纸说你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但是要我说，你很丑，是反动透顶。

于是，梁被出席会议的毛的坚定的支持者哄下讲台。这时一位很受尊重的前国民党官员站起来，向毛泽东鞠了一躬，说道：“请问毛主席，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的政治问题？”

这一插话的目的在于，根据共产党的理论，思想问题是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改正，反之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就要严重得多。这时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毛回答说：“这是梁漱溟的思想问题。”

“既然是思想问题，”这位老者继续说，“我想我们今天不应该过于激动。”

从此以后，毛泽东和梁漱溟反目了，梁被描绘成是“用笔杆子杀人”的人。毛泽东取笑梁漱溟关于九重天的比喻，以及梁曾经提出的“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和“无色透明政府”等观点，指出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只会说胡话。

虽然如此，毛没有将梁划为反革命一类，他要求全党继续和梁辩论，以便把问题搞清楚，并且希望尽可能改造他。另外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这就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喜欢挑战，但是他渐渐

感到来自党内他的同志们的挑战和争辩越来越少，这些人既小心翼翼地恭维他，又在他的背后搞阴谋。

现在毛的妻子江青，经过疗养后病愈回到北京。所以毛又像过去一样，每天坐在她的旁边，听她介绍来自各地经过她选择的有关情况报告和电报，以及一些各地寄来的新书。

但是这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费解的麻烦事，江青失去了对毛的一个儿子的监护权。这个孩子是贺子珍生的，40年代初他同贺子珍一同住在莫斯科。据说后来他返回上海，由一位牧师照管。在牧师家里他经常挨打以致此后精神从未恢复正常，于是他常常左右摇摆，癫狂不止，往往跌倒在地。(3)

在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后，这个孩子回到了他父亲身过。江青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来抚养，努力地去爱他。但当她不得不忍受放射来治疗她的肿瘤时，这个孩子被毛的助手们带走了，而且她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这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毛本人。整个事情是一个大悲剧，对于这个孩子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

这是从江青自己嘴里说出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自己的家里，毛泽东怎么可能不去设法保护他的儿子？难道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神经不正常感到厌烦，以至于让别人将他带走？对这个孩子的处理是用什么方式？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为什么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整个事情像一团迷雾，让人难以理解。但这一切又的确是江青亲自透露出来的。

一年以后，她恢复了和毛的政治合作。当她躺在病床上时，精力全部放在读书上，她看到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18世纪经典小说《红楼梦》的文章。想起毛泽东对这部中国优秀的古典名著十分

推崇，曾说过：“《红楼梦》我已经读过五遍，但是我不受它的影响，我只把它作为历史书来看。”

一位在二三十年代因对中国古籍进行注释工作而闻名的大学教授[4] 最近写了一篇赞赏《红楼梦》的文章，但是文章中没有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内容。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学生[5] 写文章对此进行了批判。江青把他们的文章拿给毛泽东看，毛同意广泛宣传他们的文章。像三年前批判电影《武训传》一样，共产党负责文化工作的官员显然不具备毛主席那样的敏锐和革命性，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拒绝刊登这篇彻底的反传统的文章。一直到毛在他的妻子的刺激下，坚持要刊登出来为止。

是年夏天[6] ，毛泽东和江青离开北京到北戴河海边度假。在这里他写了一首词：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这一时期，毛泽东试图通过清除他的宿敌来巩固自己的地位。1953年底他发动了反对高岗的运动。在建国后的头四个年头，由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毛对高岗的野心没怎么注意。抗美援朝战争使得中国比以往更加依靠东北地区作为战争的直接后方。1953年春斯大林的逝世使高岗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这时起。毛就开始作出了处理高岗的战略安排。

在1953年圣诞节的前夜，贝利亚在莫斯科以叛国罪被捕，毛在北京建议中央政治局以党的名义开展一场批判高岗的运动。他后来回忆道：“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明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10〕一个星期之后，刘少奇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了一次讲话，他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指出一些领导人现在“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做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11〕对于毛泽东本人说，公开地带头谴责他的老同志是困难的，所以在这次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很策略地“走开了”。根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非共产党的政界人士说，毛“要回他的湖南老家，并且说他准备在那里度过春节，这样就可以充当一个旁观者了”。毛泽东后来承认这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四中全会是应当开的，决议是很必要的。否则再让高岗搞一年，是不可设想的。”〔12〕但是由于刘少奇没有完全执行毛的指示，使得反对高岗的运动到下一年度才彻底结束。

1953年底，大胆的王明回到中国。众所周知，他现在已经没有几分价值了。在北京医院里，他住了三个月，治疗胆囊炎。据说，他

拒绝了医生要他做手术的有力劝告，不久以后，他又重新背井离乡回到了他长期居住的苏联。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他称赞了这部宪法草案，并就此谈到对中国发展的若干想法：

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5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不大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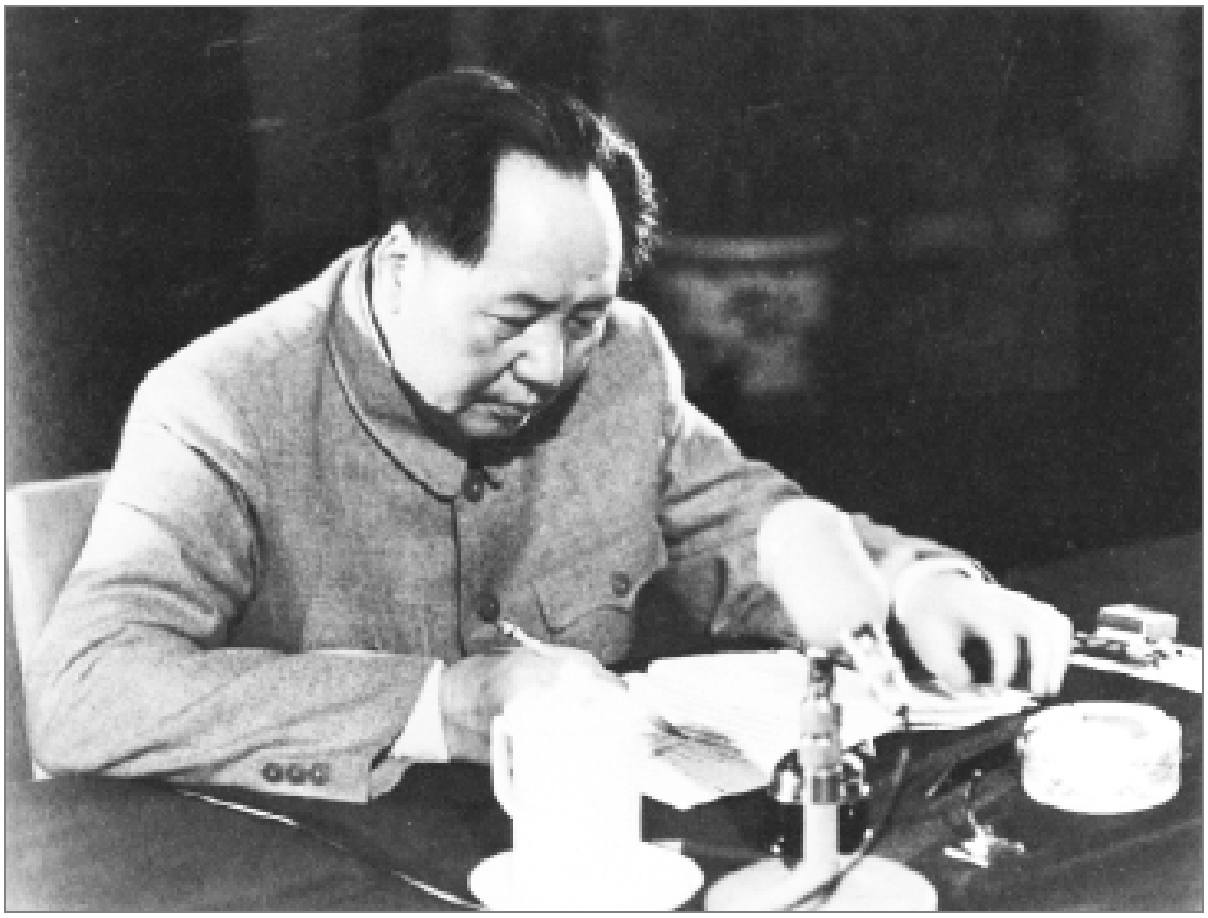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已经着手开始实施他的一些改革主张，包括汉字的简化（他拒绝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3年提出的建议，即步子不要走得太快）。1956年他指出：

洋字比较好……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

不久以后，毛对一些音乐家发表了关于如何学习西方的谈话。他指责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音乐，鄙视中国音乐。他提醒说，全盘西化是不切实际的：

全盘西化是行不通的，是中国老百姓所不能接受的。艺术和自然科学不同，例如，割阑尾，吃阿司匹林，这些医疗方法就没有什么民族形式，但是艺术却不同，艺术就是民族形式问题。

最后，毛泽东接受了音乐家们的一些观点：



>> 1954年，毛泽东在修改宪法草案

要承认，在近代文化上，西方的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是落后了……我们必须善于吸收外国好的东西，以收取长补短之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954年的秋季，北京迎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尼赫鲁访问了中国。1954年8月25日毛接见了由克莱蒙特·艾德礼率领的英国工党代表团。克莱蒙特·艾德礼是英国前首相，团员有埃热那·伯威尼和埃德兹·森默斯克。伯威尼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描写毛很有自信心，并且很有韧性。尽管刘少奇和周恩来在3个小时的会谈中始终作陪，但毛在整个谈话中一直不容别人插嘴。毛想知道为什么英国工党不能把资产阶级消灭掉。对此艾德礼和他的同事持有异议，他们历数了英国大多

数人的生活水平，认为是比较好的。但毛说，这是剥削殖民地的结果。



>> 毛泽东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

艾德礼后来写道：“当我请他们解释一下丹麦、瑞典和挪威为什么在没有殖民地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也很高时，他们没有回答。”

9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西藏的传统最高统治者达赖喇嘛。毛对西藏的情况表示满意，他说：“西藏已经到了祖国怀抱。”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利用开发西藏自然资源使西藏社会得到发展，驻扎拉萨的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帮助西藏人民，而不是对西藏人民发号施令。

然后，毛直截了当地问达赖喇嘛，他们是否反对他的愿望而且事实上已经有所行动。这位西藏前最高领导人后来回忆说，他感觉自己处于一种非常为难和窘迫的境地，但他老练地应付过去了。第二次拜访毛时，他同样富有策略性。这次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当时只有一名翻译在场。达赖喇嘛试图打消毛对他的怀疑，他急于要改变他的处境，于是向毛保证他不可能通过反对中国人而背弃祖国。

几天之后，毛泽东亲自约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人回忆道：“某些事情促使毛认为佛教是一种很好的宗教，尽管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但是他就改善人民生活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他也同意Tara女神是一个好心肠的妇女。”这样的谈话讲行了几分钟后，毛又一次起身离去，将手足无措的达赖喇嘛丢在那里。

不久以后，达赖喇嘛应邀到毛主席家参加一个会议，大约有20多位党的干部在座，达赖坐在毛的身边，毛的独断作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中国农村的生活问题，毛“讲话非常生硬……他说他对目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很满意……他引证了一封从他家乡来的信，说共产党的官员正在做的并不是帮助人民”。

过了一会儿，毛转过身对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是比较团结的，但他们的思想比较复杂。20年后西藏会变得强大起来，现在中央政府正

在帮助西藏人民，20年后西藏将帮助中央政府。”他向达赖喇嘛介绍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将军。这位将军曾打过许多胜仗，后来他镇压了西藏的叛乱。

毛最后一次同达赖喇嘛会见，主要是就民主问题高谈阔论。他认为西藏领导人应该具有民主思想。毛把他的椅子靠近达赖，轻轻地但充满自信地说：

“我非常理解你。但是宗教是有害的，它有两大缺点，它危害民族团结，它阻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到宗教的毒害。”这种对宗教领导人来说十分不得体的谈话使达赖困惑不解，也使他对毛的反感越发强烈了。他回忆说：“毛的表现丝毫没有理智。他看上去并不是非常健康，气喘得厉害，呼吸非常沉重。他的衣服式样与其他人一样，只是颜色有些不同。他很不注意修饰，我注意到他的衬衣袖口已经磨破了。他的鞋好像从未擦过。他的动作迟缓，讲话慢条斯理，用字不多，语言简练，每句话的意思都非常充实、清楚和准确。他讲话时连续不断地抽烟。另外他的讲话方式特别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和激发他们的想象力，给人以和蔼和真诚的印象。

毛也向达赖喇嘛保证，他不会对西藏使用武力，强迫西藏进入共产主义。直到中央政府派兵占领和统治西藏时，这位西藏领导人还以为这个行动并没有得到毛的同意和支持。而周恩来对西藏表现出十分强硬的态度。达赖评论说：“对此我一点不感到惊奇，当我和毛在一起时，我就知道，他（指周恩来）支持镇压西藏的政策。”

达赖喇嘛在北京出席了庆祝藏历新年的传统晚会，毛送来了一些喜饼。西藏迎新年的传统风俗中有一项是把喜饼扔向天花板，认为这样可以把它们敬奉给释迦牟尼佛。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一风俗后，他也把喜饼扔向天花板。1954年 10月1日，苏联三巨头—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来到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这比任何

外国代表团来访的意义都要重大。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三次北京之行的第一次，也是最富有建设性的一次访问。他发现他受到了彬彬有礼但又不很真诚的接待。他回忆说：

“当我见到毛之后，我们互相热烈拥抱和亲吻。在北京期间，我们通常躺在一个游泳池里，像最好的朋友那样交谈许多相互感兴趣的事情。但这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亲密，气氛让你感到难受。此外，毛谈的一些事情使我感到很惊奇，我确实不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汉语具有许多微妙之处及中国人特殊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毛的一些想法令我感到一会儿过于简单化，一会儿过于复杂化。”

毛在中断30年后又重新恢复了有规律的游泳活动，1954年，北京一所大学开放了一个新建的内部游泳池，“我每天晚上带着我的包和换洗的衣服去那里，”毛告诉赫鲁晓夫，“我用了整整三个月来研究水的特性，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不久之后，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在他的花园内建成。正是在这个游泳池他接待了赫鲁晓夫。据说他对党中央花费这么多钱修建它感到十分不安，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为这个特权付钱。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曾提到他与毛的一次谈话，“我和毛泽东穿着游泳裤躺在游泳池边上，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毛开始说，“你怎么想？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军事实力，你就能看到我们显然比我们的敌人强。你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在一起能动员多少个师啊！”

“毛泽东同志，”赫鲁晓夫回答道，“这种想法现在可过时了。你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面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

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哪一方的部队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毛马上作出反应说，“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

赫鲁晓夫试图进行一番解释，他说，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毛根本不想听，他认为赫鲁晓夫是胆小鬼。后来又出现了进一步的分歧，因为赫鲁晓夫想要中国100万工人去西伯利亚帮助苏联开发广阔的森林资源。对于这一要求，赫鲁晓夫回忆说：“毛对我们建议的反应很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并且预示了要发生的事情。他真懂得如何把我们搞得哑口无言。首先，你可以想象毛的样子像什么。他走动起来像熊那样稳静和缓慢，左右摇晃。他会长时间盯着你，然后把两眼垂下来，开始用一种迟缓和平静的声调说：‘你知道，赫鲁晓夫同志，很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人口过多、到处是失业的国家，因为它是廉价劳动力的极好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侮辱。出之于你的口，这倒有点令人为难。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别人会对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产生错误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西方资本家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上述会谈的内容充分地显示出中苏两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志之间的分歧。赫鲁晓夫北京之行的一个有趣的插曲就是他与江青的邂逅。当他们一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庆祝建国5周年的游行时，周恩来为他们作了介绍。根据赫鲁晓夫妻子后来的回忆，毛注意到了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他走到江青的身旁，粗暴地将她带到一边，很明

显，他要阻止她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在她后来的生涯中，再没有会见过苏联领导人。

19　弄 潮（1955~1956）

1955年春天，毛发现，必须除掉党内的一个对手。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发动了一场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高岗还“企图建立东北独立王国”。他“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



>>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赫鲁晓夫是那些对高岗事件的官方解释表示怀疑的人士之一，他评论说：“我非常怀疑高岗是否自杀，极有可能是毛把他掐死或毒死了。但这些疑虑看来是没有根据的。另外一个关于高岗之死的说法是，在一次质问当中，他拔出手枪，大声说道：“如果你们这些同志对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将在你们面前自杀。”但是他被坐在旁边的政治局委员夺下了武器。毫无疑问，当高岗第二次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成功了。在中国，自杀是传统的最后的反抗行动。

高岗事件对毛的领导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毛泽东后来说，高 - 饶事件是一场八级地震。但不管高的野心究竟是什么，毛已经决意开展反对高岗的运动。

据说，毛打算把他的亲信派到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担任最高领导人。而且他还要求清除饶漱石及其亲信，当时饶是负责上海地区工作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毛所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探听日本对于建立反对国民党联盟意见的秘密行动的仅有的几个见证人。

在一次讨论有关批判高岗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对他的同事们说，即使是你崇敬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错误的，也应该同他进行斗争。毛提到了个人的态度问题，这主要是针对那些经过长征并参加1935年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老干部的。他说：

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票，

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

在1955年3月的这次会议上，毛在经济政策上的一些想法遭到了反对：大部分同志赞同刘少奇的更为谨慎地发展经济的做法。为此，毛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反对党，以钳制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中妨碍实施他的政策的大部分同僚。在这种情况下，毛做出了任何统治者都做过的事情，他组建了自己的“近卫军”。

中央委员会已经有了自己的办公厅，承担毛的日常秘书工作，军队也有一支特别部队，这就是后来的8341部队，它是毛的个人警卫武装。这支部队的一些老战士在毛死后回忆说：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业合作化的详细情况和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情况，毛主席要求我们从每个县挑选一个人到他的警卫部队来工作。他通过这些人探亲回家所做的一些调查来了解农村一些地区的情况，从而了解当时全国的形势。

1955年5月，毛为这些战士布置了一项新的政治任务。

他说：“你们都是做警卫工作的，我现在给你们加一样，就是调查工作……你们要有三个任务：一个保卫工作，一个是学习，再加一个调查工作。”

“我们拟个章程，”他告诉那些准备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战士们说，“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老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别摆架子。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

这批战士按时出发，并给毛带回了许多信息。

“1955年7月下旬，第一批调查的同志回来，毛主席一连三天，用了十个多小时的时间听取汇报，并把汇报的同志留在家里一起吃

饭。毛主席仔细地询问农村生产生活等情况，一字一句地看同志们写的调查报告，还把报告中用错了的字和标点符号一一改正过来……有的同志在汇报时，把从家乡带回来的农民经常吃的谷面饼子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吃了一些，并且告诉身边的每个同志都要吃一点。

一天，当从湖南和湖北回来的战士汇报家乡的情况后，毛主席非常高兴地说道：“了解两个省六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他伸出三个指头继续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你们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有了阶级觉悟。”

这些警卫战士不仅被派回家乡搞调查研究，而且还要求他们给家里写信。毛告诉他们：“以后你们两个月写一次信，内容是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合作社情况，每年写四五封，回信拿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和他的同事们之间的分歧是，在当时是否具有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带动全体农民进入农业集体化的第一阶段的胆识。这种做法以前曾经尝试过，但没有取得成功，毛还想再试一次。然而许多农民强烈反对这样做，政府所规定的粮食定额给他们造成巨大的压力。由于缺乏有效的物质鼓励办法，农业产量下降，并且最终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负责农业的官员们，尤其是毛的老战友—邓子恢，认为应该放慢合作化运动的步子。1955年上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接受了邓子恢的观点。

但毛绝不向大多数人低头，即使是他的亲密同事。7月份，他召开了一次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想说服他们接受他的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他坚持认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

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

毛无法理解，为什么建立合作社的计划执行不下去或者不能加快实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到1957年还不能基本完成。

反帝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配给了农民。“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发展。

毛不顾党外专家和党内高级干部的反对和劝阻，置中央委员会于一旁，把全中国都投入到一场迅速完成合作化的运动中来，农民们的私人工具，甚至他们的劳力和土地都集中在一起，用以体现公有制的优越性。

此后毛的同志们一致认为他是正确的，并承认高潮已经到来。在10月份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刘少奇做了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倡和认真地研究……合作化运动……这是错误的。

毛就中央内部发生的激烈而广泛的讨论作了概括性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但在这里，同农民的联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因为资产阶级要受到限制。将来无产阶级要比几百万资产阶级强大得多。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

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们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然后，毛讲到要发动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他说：“准备在今年和明年一年……大概共1200万人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已经从220万人中查出反革命11万人，大概还有5万名嫌疑犯。”这就是进步的代价。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对“左”和“右”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

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这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这期间，毛专心于分析和选编从全国各地收上来的合作化运动的汇报。在这次会议上，他告诉中央委员们说：“我用了11天的时间，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这些报告在9月份首次公开发表，12月又再次出版发行，标题冠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为再版的报告集写了前言，他描绘了1955年下半年发生的“根本的变化”，约占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合作化运动。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到200%。

农民们因为看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刊登的按语，所以和毛一样变得积极乐观。很多人注意到这些按语是毛写的。

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典型，那就是在安阳县南崔庄，党的干部支持贫农创办了一个合作社—穷棒子社，而中农嘲笑他们的愿望是，“鸡毛不可能飞上天”。但这个合作社获得了成功，毛把它树立为一个样板。他激动地写道：“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毛在按语中所作出的著名的论断，体现出来一种高度的、令人吃惊的乐观态度。他说：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6000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二三年之后，毛对此作了解释，他承认过去过于乐观了。他指出，1955年社会主义取得基本胜利的说法是“不合适的”。他说：

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56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浪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料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两件事。这两件事都给了发动全面进攻的右派分子以相当大的鼓舞。



>>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右二）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和荣毅仁交谈

毛当时也正在考虑如何进行国家工业化。1955年11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大约有80名上海著名的工业家被通知去中苏友谊会堂。在那里，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走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上海市长陈毅向他介绍了在座的人士。他们中的一个人后来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他说：“毛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他看上去很温和，面貌要比通常挂的照片显得年轻。他行动缓慢，脚尖向外分开走。同他那高大的身躯不相称的是他迈着小步子，挥舞着胳膊。他的脸很生动……一根香烟总是夹在他的粗大的手指中，他的牙因为不停地抽烟而变黑了。”

当他们明白毛是谁的时候，这位80多岁的老资本家惊讶地坐在那里呆呆地喘着气。毛坐在首席桌旁。

“你们为什么不抽烟？”他和蔼地向他们询问道，“这对你们不会有害。丘吉尔长期吸烟但身体很好。事实上，我知道只有一个人不抽烟而活得很长，他就是蒋介石。”

大家都笑起来了，紧张的空气为之一松。毛称赞“民族资产阶级朋友们”已经作出了贡献。

“他继续说道：‘现在我从北京来，想寻求你们的帮助。’许多资本家当时已经听到宣传，要加快私有企业国有化的步伐，所谓‘不能让民族资产阶级在向社会主义进步过程中落后’。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毛接着说道，‘但我对此并不太清楚。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我只带两只耳朵来参加这个会，如果你们希望从我这里听到些什么，那将会使你们感到失望……

在座的一位，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写观感的那个人注意到，在大会上作正式报告时，毛的讲话是很乏味的，而在这种非正式的小会议上，他那慢吞吞的调子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座的资本家们急忙表示他们完全同意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他们知道这是毛想要听到的话。其中一个人发言说，按照现在的速度，这一转变需要20多年的时间，这样的速度显然太慢了。有些人建议用五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毛认真地和他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座谈，当发言结束时，他对出席会议的人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将认真地去考虑他们的意见。毛走了之后，出席会议的人讨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座谈，大家认为他们会比预料的更早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许就在下一个六年中。

在这场温和的谈话后不久，就有消息说，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在以后的六年中完成。前资本家们必须依靠有限的工资和定息生活。

毛也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但因为他欣赏手工产品，所以对手工业的政策限制很少。1956年3月他发布了指示，指出这些私人手工业者提供了多种有用的服务，包括食品和服装生产。他说：“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杨志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这期间，毛与党的领导们正准备在各省推进农业计划，12月，他起草了一份文件，让中央委员会传阅，他指示在新年前征求基层干部对已拟好的17条规定的意见，这样在第二年的1月份就可以做最后的修改完善工作。17条规定后来演变成为著名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但在这时候它还只是个缺乏全面和具体内容的计划。

17条规定要求在1960年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级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规定指出，只有改造好的地主和富农可以进合作社，但合作社领导必须由贫农担任。

对于工业发展，毛在这一阶段的想法尚不成熟。他在1956年1月告诉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

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

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飞机要到1．8万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20年不行，就30年，最多100年就差不多了，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

尽管国内事务十分繁忙，毛还是花时间接待外国来访的重要人物—1955年来访的是胡志明和苏加诺。后者于1956年再次访华。

“毛兄，”苏加诺在首次访华离京前告诉他，“我希望不久之后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期待你的来访。”

毛接受了邀请，却未付诸行动。11年后，苏加诺抱怨道，他已经8次邀请毛访问印尼了。

在苏加诺第二次访华时，毛对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亚非国家会议上所提出的中国欢迎与美国和解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后来，毛告诉他的亲信：“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而当时中美大使级的会谈已经在华沙开始。

对来中国访问的拉丁美洲共产党的领导人，毛强调指出每个党都必须是独立的，“我看，亚洲一些国家的党，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党，农村工作都没有搞好……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做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他总结道，“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失败是成功之母。

20　夜鹰（1956）

1956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2月中旬，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10天后，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对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进行了攻击。据赫鲁晓夫自己讲：“最初，毛泽东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我们指责斯大林的滥用权力是对的。他说过，第二十次党代会作出的决议，显示出很大的‘明智’。

但是，赫鲁晓夫的行为实际上并不为毛所喜欢。“1956年斯大林受到的批评，”毛后来回忆道，“我们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又很焦虑。对于取消限制、打破盲目崇拜、解除高压和解放思想来讲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斯大林除了偏听偏信和固执冷酷外，这位老人具有他的接班人所不具备的领导才能。

毛曾极力在中国减少个人崇拜。一个曾碰巧坐在会议厅门口的同志回忆道，毛的一位热心助手曾告诉他：“当主席进来时，你应该第一个站起来并鼓掌欢迎。”但赫鲁晓夫讲话后，周恩来告诉干部们：“以后，当主席走进房间时，你们不用站起来鼓掌，这不是好事情。”

几个星期以后，毛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作出了评价，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赫鲁晓夫存在着分歧。毛认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他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共产主义运动需要领导，但当一位领导“脱离群众”时，他的作用就会降低。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尤其表现在农业、南斯拉夫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但他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有错误，除了所犯的错误，“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同一篇报纸评论中毛重复了他的主旨。他对苏联同志极为不满，社会主义并没有结束矛盾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继续进行革新和社会改革，人类仍处在他的青年时代。

这篇评论发表后不久，毛接见了苏联特使米高扬，当面批评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全盘否定的做法。双方都明白，米高扬来北京，是签署苏联对中国经济援助合同。毛提出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给予中国的援助应双倍于合同上的数字。中苏阵营面临着灾难。

在否定斯大林问题上的争论正好与中国对苏联技术援助的失望搅在一起。毛后来回忆道：“解放后，3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毛在其1949年以后最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对苏联模式的疑虑。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震动了毛泽东，促使他重新考虑在中国应该作些什么准备。他后来解释说：“这促使我和34个部长进行了一次讨论，考虑了10项基本关系，我的头脑充实了，‘冒进’了。结论是，首先，中国要摆脱苏联的工业化模式。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掌权7年来的经验和破除对莫斯科的迷信问题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的著名讲话。他认为，每个人都希望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得快一点，但调查研究发现，这是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的—而农业恰恰是给国家提供食品，为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它也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同样，内地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沿海工业为代价的，尽管这样做的理由是害怕美国袭击，但未免做得太过火了。

制造更多的飞机和大炮、原子弹是需要的。但生产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是削减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国家支出三分之一的军费，要减到

五分之一，这样才能建立工业基础。

工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提高，应该增加工资。俄国的农民受到严重的盘剥，被强制以低价出售农产品。中国应避免出现这样的错误。

“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需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中国应该放弃苏联限制地方权力，中央掌管一切的做法。把地方权力限制得太死是没有好处的。他说：“在解放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应该坚决反对。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为了要镇压反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不用说，绝不能有太多讨厌的官僚，“在一不死人，二不费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一个国家领导人，公开要求削减三分之二行政雇员和执政党官员，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

“但将来，应该减少逮捕人数，避免死刑。如果一个人以政治犯被处决，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

“第三条，消灭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

“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除四害[7]，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但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

最后，毛提出了正确地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方法。“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十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应该坚决抵制腐朽的官僚体制，同时，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甚至企业管理。“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

毛进一步说，中国人必须学会丢掉盲目自大的情绪。中国没有理由骄傲，中国革命比俄国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尽管我们的革命比所有的殖民地国家早了一步，但“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

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对毛的经济见解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种过激的经济运动，走的是其他国家没有走过的道路，不可能成功。后

来，毛承认在工业方面发动一场跃进的问题还“没有作明确决议”，尽管他指出有一个“君子协定”可以发挥决议的效用。

中国反斯大林主义的最重大的行动，就是毛决定允许非党人士有言论自由，以便于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一切改革相配合，避免出现在东欧一些国家所发生的暴乱。5月份，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当法国前总理埃德加·法赫访问中国时，毛告诉他，“要允许批评，否则，就会出现不满和不理解。要允许人家说心里话，……”但同时，“一个人必须考虑到特殊的环境。不管你高兴与否，认识到客观限制是有必要的。”

在会谈结束时，法赫谈到毛的诗。

毛说：“那是过去的事了。我曾经写过的诗，这不假。那是在我的军旅生涯岁月，一个坐在马背上有时间，可以研究韵脚和韵律，可以思考推敲。马背上的生活是很不错的。这些天，我一直想念那过去的日子。

几天后，毛横渡了长江。他穿着白短裤，在十几名青年人的陪同下，用了2个小时游了12英里。在以后的3天内，毛又和这些当地的游泳者两次横渡长江，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蝶泳。偶尔他还用手抱着头，在水上漂浮，与身边的人交谈。横渡结束时，他自信地说：“如果我吃了东西，我在水里还可以再待2个小时。”他在一首名为《游泳》的词中，表达了他自信和欢畅的心情：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几个月后，毛主持了长江大桥的落成典礼。他称它是“钢铁长虹”。

这期间，政治局内部的稳健派一直在忙碌着。一篇由周恩来授意写的社论，提出反对“轻率鲁莽的冒进”。毛拒绝阅读此文。他后来回忆说：“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技术专家们集中力量反对他们称为急躁、冒进、力图一夜之间干完一切的思想和行为。

为了说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该社论引证了一个例子，即双轮双铧犁的产量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结果造成70万具废弃。工业用的经济作物的生产得不到重视。由于毛坚持进行强制性的合作化运动，致使大量家畜遭到屠宰。

1957年夏天，周恩来就反对毛的行为做了检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承认自己“要对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负责任，我做了自我批评”。在这一时期，反对毛的还有李富春、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和薄一波。

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坚决。在1956年8月底，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发表了讲话，解释了为什么速度是根本问题。他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

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强调说，这种进步要在苏联的帮助下取得。他说：

“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要不得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

“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正式举行。毛做了惊人的自我掩饰，这反映出因为他的“小跃进”的失败而导致了威望下降，这也是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影响的结果，为了使中共党避免目前矛头指向斯大林的党的那种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设法向人民表明在中共党内没有个人崇拜。毫无疑问，到了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7个年头，人们对毛的性格和行为特征已经感到有些厌恶，对毛的崇敬和热爱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这位在中共党史上和毛的资历几乎相同的军人，有可能也是毛的批评者之一。他提出，在新的党章中，应该删去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它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写入党章的。

彭后来解释说：“我反对个人崇拜。”



>> 1953年，毛泽东和彭德怀

刘少奇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建议，说：“删去这些条款大概是比较好的。”

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辩解道，应当更合理地分享党的成功的荣耀。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

这是第一次把毛的名字与集体领导联系起来。毛泽东本人一定会回忆起几年来他避开同事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所作的努力，难道他会接受他的同志们的暗示，同意服从集体领导的原则，并改正他的错误吗？毛在讲话中，则强调与非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他对国际事务的阐述比有关国内情况的阐述赢得了更多的掌声。

之后，毛责成刘少奇在“八大”上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中共“八大”的另一内容是，毛决定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让他的高级幕僚们去处理日常事务，实现他们在权力继承方面的要求。这是效法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所进行的领导班子的变动。修改的新党章，其内容之一是在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这当然是毛安排的。党的书记处也得到重组和加强，以便能在没有毛的情况下有效地工作。邓小平出任党的总书记。



>>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主席台上交谈

这些变动给出席“八大”的代表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毛不再像以前那样是至高无上的人物了。在解释为什么不把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时，刘少奇对代表们说，在1945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了，“即使我们不谈它，每个人也都清楚。此外，一个人如果总是重复某些事想要人们经常听到它，这实际上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毛的尊敬正在消失。毛肯定十分不满地意识到，他的同僚，特别是刘少奇和彭德怀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公开讲话中，程式化地重复他的名字和思想了。难道他们只是要进行一场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吗？或者他们真的讨厌他了？毛花了许多年冥思苦想这一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情况的报告，强调避免急躁和冒进的必要性，指出国家财政极限不应受到忽视。毛和刘对1956年夏天专家们强烈提出的“减速”要求一度颇为恼火。但在“八大”上，他们服从了省委书记们的意见，后者是支持周恩来和这些规划的制定者的。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爆发。在此之前，毛对波兰人要求从莫斯科得到更大的自主权表示理解。当米高扬和奥哈布分别代表苏联和波兰前来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周年之际，毛向他们谈到了这些观点，并为波兰抵制米高扬的批评进行辩解。随后，他又给奥查波写了一封信。此信对于推动波兰领导人支持自由主义的哥穆尔卡处理波兰问题，可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匈牙利事件爆发后，毛的态度强硬起来。当刘少奇飞抵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商讨处理办法时，他经常请示国内的毛。

赫鲁晓夫回忆道：“刘与毛的电话联系毫无问题，因为毛像只夜鹰，总是彻夜工作。不管刘提出什么，他总能同意……

11月，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就面临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开始对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怀疑。他说：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

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

毛要求在决定国家年预算之前组织更充分的讨论，“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在这次会议上他暗示了专家们对政治家，比如他自己，所应持有的态度。他说：

“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都是举手……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哪个长，哪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我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

毛强调必须提倡勤俭节约的口号：

“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毛转而谈到国际背景，以及在中东和苏联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毛的观点是，“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了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

最后，毛谈到了“大民主”的问题—即更多的言论自由，这预示着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他谈道：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他举了一个例子，河南一个地方因为修飞机场，强迫农民搬迁，事先没有任何商量和适当的安排。农民们抱怨道，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毛批评道：“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毛同样对他的同事们阻止100多名学生乘火车从南方到北京告状表示不满。他说：

“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毛低估了卷进各种不同镇压运动的人数。前几年，四百多万人受到审查，其中3.8万人—占总数的1.2%被确定为反革命，其中5%被错判，因为根据的是“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事实”。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邀请干部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4个小时。他始终抽着烟，烟气在他头上缭绕着足有一英尺高，他说：

在过去的几年运动中，群众和干部都有段难过的日子，我们应当给他们一个喘气的机会。他们应当有机会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意见。我认为听取这些意见，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知道党和非党人士有摩

擦，所有党组织中都存在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人都公开地表达意见。言者无罪，不会有人受处罚。

毛说：“我们必须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看哪种花开得好，哪种思想表达得合理，我们将为最好的思想鼓掌。

到年底，毛为了在1957年开展“百花齐放”运动，在一次有那些正与政府小心合作的工厂主、商人和店主参加的会议上讲了话。

他告诉与会者：“我是个无名之辈，连学位也没有。”接着，就如何管理企业问题长篇大论了一番。然后，又开始就个人的政治改造问题向与会者道贺：“连你们自己也没有想到改造得这么快。一个学习高潮即将掀起。你们准备开展自我批评吗？”大厅里响起一片热烈的回声：“我们愿意！”

毛又谈到了匈牙利问题，他说：“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它正想掠夺兄弟国家的土地，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他向在座的人士保证，他是持自由主义思想的。

这期间，毛遇到了一些棘手的家庭问题。是年冬天，他的妻子再次病倒。前一年，即1955年，她回苏联作过一次无结果的身体检查：和往常一样，中苏两国的医学专家互不同意对方的诊断。此时，1956年，江青旧病复发，持续高烧，体重陡降。

她的妇科医生诊断她患的是脑癌，只能采取手术或放射疗法治疗。由于前一次治疗肝癌的手术后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所以她不愿再动手术，中国医生因此尝试为她用钴放射性同位素和镭60治疗，但这种办法她仍然无法忍受。她的医生绝望地说，她必须回莫斯科治疗。她在莫斯科经受了巨大的痛苦，接受一系列的钴同位素化疗，在氧气罩下面度过一段相当难熬的时光。1957年1月，周总理到莫斯科访问，在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谈后，到医院看望江青，并告诉她，毛

主席让她待在这里，直到身体完全康复。然而，事实恰好相反，江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苏联医生实际上已经表示，基本放弃治疗希望，让她回到北京去。在飞机上，江身体皮下大出血，看起来毫无希望。但是，最后，她却奇迹般地全面康复了。

21　百花齐放（1957）

1957年1月初，毛泽东向中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做出一种大概比他倡导百家争鸣时更为勇敢的姿态。毛通知《诗刊》编辑部可以发表他以前写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此，他解释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者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

毛的诗词的某些私人辑录本已经流传开来，但毛对他的作品似乎总是不以为然。罗伯特·帕宁曾在延安发回的一篇报道中说，“无论你如何谈他的诗，他最后总是只有一个决断性的回答—这些都是非常糟糕的诗作，羞于见人。这纯属胡言乱语，但它恰恰给毛以某种满足，因此他会咯咯地笑个不停，其实他知道，这些诗作是非常好的。”

毛的诗作大多是采用词的形式，这种形式最早起源于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在宋朝得到完善（公元11至12世纪）。毛在1965年给外交部长陈毅的信中说：“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毛察觉到，作为一个革命者写作古典诗词是不合适的。因为这种形式不容易表达有关阶级斗争和革命等现代题材。毛的老对手王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毛的诗词的评价是非常苛刻的，他提醒说：“毛的这些

作品中没有一首歌颂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工人阶级，没有一首描写工农兵的生活。”

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出版他的诗词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他在给《诗刊》编辑部的信中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

一年后，毛在一次讲话中就中国人写的现代诗歌，比较直率地谈了他的看法：“今天的新诗没有什么格式，没有人读，即使你给我100元，我也不读。

那些有资格品评毛的诗歌的人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一位来自湖南的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认为，毛的诗词，“肯定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完成的……在他的诗词中表现出一种旁若无人的冲力和冲动，我不同意那种认为毛的诗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观点。郭沫若，这位毛政府中的优秀诗人认为：“主席的诗词经过反复锤炼，所以气魄雄浑而音调和谐，豪迈绝伦而平易可亲。人人爱读，处处传诵。”他进一步说，“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

陈志让，这位生活在西方的毛的华人传记作者，对毛的诗歌的评价是这样的：“虽然，这些诗词的艺术水平参差不齐，但它们并非等闲之作，这些诗词将使毛本人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这和他在政治领域内的领袖地位毫无关系。”傅聪，这位从毛的中国逃出来的著名钢琴艺术家，一直称颂毛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1945年，毛泽东曾经把他的诗词当做有力的政治武器。当时，他以“雪”为题填写的一首《沁园春》词，轰动了山城，使重庆舆论界俯首缴械。同样，1957年初，在他的最大的言论自由实验—或者像他喜欢称做的“大民主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夕，他以自己古典诗词的公开出版，解除了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上的武装。

在1957年初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他提出，应该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辩论。他通过对党的干部闹级别问题的批评，点明他心中的靶子。级别问题，在党内无疑是十分敏感的。他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

接着毛谈到了大民主问题，他说：

“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

在第二次讲话中，毛泽东再一次支持公开的辩论，在谈到中苏关系时，他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

他强调真理必须跟谬误相比较，相斗争。

“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

不应有之事……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

与此同时，周恩来中断了对亚洲几个国家的访问，赶赴莫斯科、布达佩斯和华沙，就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骚乱申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同志，”毛最后解释道，“这些人是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

1957年2月27日，毛第一次在党外—在有1800人参加的包括许多非共产主义者和党外人士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这个讲话的题目叫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越过了他那些历经百战的同事们，没有就他提出的关于促进党的整风和言论自由的新纲领征求他们的意见。

在毛的这次会议讲话中，领导干部扮演了一个被责骂的角色。刘少奇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没有出席会议，像彭德怀、林彪那样称病不出。林伯渠和朱德则离开北京，并表示了他们异议，甚至罗荣桓，毛的追随者之一，也没有出席会议。大部分关注东欧骚乱的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美帝主义面前保持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团结，“不能动摇社会主义阵营”是共同的目标。周恩来带回一个稍有些不同的信息，他说国内改革是共产主义存在的关键，毛对这些表示完全同意。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毛的4个小时讲话的录音在全国有选择地向一部分人播放。有位上海的商人听了这个讲话录音，后来他描述了“毛主席缓慢温和的声音”所讲述的内容。毛首先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以及在中国的反响，承认在国内发生了罢工、学生骚乱和农民的不满。

毛揭露说，一个高级干部在夜里工作，准备散发反苏传单。一个著名学者公开说，“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杀几千名共产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反革命，问题出在党的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对群众的意见不是采用说服和教育的手段，而是使用压制的方法，所以现在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以便于他们改正这些缺点。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导致了失误，这些错误将得到纠正。但帝国主义分子说有2000万人民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了，是极其荒谬的。实际数字“不超过70万人”。

在全国，将开展一次党的整风运动，为了这次整风运动的成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通过批评达到帮助党的目的，允许言论自由和提出不满意见。他们不会受到报复。实际上，那些不发表批评意见的人“不是我们的朋友”。

至于毛本人，就像一位著名歌剧的主角，现在变得太老了，不便于担任主演。他可能很快退为B角。关于从“香花”中辨认“毒草”的标准，他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出来。这次讲话给他的听众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真诚的领导人将要使其政策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根据来自东欧国家的消息，《纽约时报》登载了毛在2月27日讲话的摘录，显然毛想在北京出版经他本人同意的版本，但直到党中央一致认为在文章中应加入限制自由的论述后，毛方如愿。

这篇讲话先是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这时距讲话首次发表已经有3个多月了。公开发表时删去了70万反革命被枪决的事例，加进了判断言论和是非—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这些标准归结为一点就是，“它们应当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毛在几年后再次谈到它时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允许发表自由言论，成千上万的小匈牙利分子跳了出来，40多万右派分子不得不加以清除。”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终于出版了，它论述了中国国内所面临着的两种社会矛盾，即人民和“敌人”之间以及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谁是“人民”呢?

毛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段、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自然是属于对抗性矛盾。“但是在我们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

人民民主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自由和民主思想之上的。“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毛间接提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但是匈牙利的示威者错误地用暴力行为对付人民政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

如何理解国家的强制作用呢?

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如果采取恐怖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那将会使这些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事件那样……你生前不允许别人批评，死后终将被批评的……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做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做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什么？作为党所一直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否能被批评？对此，毛回答说：

“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最后，在谈到去年在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的危害时，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这最后导致了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

此后，毛到济南和南京视察，并对这两个省的干部分别发表了讲话。他强调广大干部应保持艰苦奋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再次严厉责斥一些干部为了自己的级别四处奔忙的行为，要求他们按照共产主义者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说：

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评级评得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

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 毛泽东在杭州看碑文

1957年4月，毛去杭州疗养。杭州是位于上海西南的一个美丽的亚热带城市，公元13世纪曾是南宋的首都。为了继续他以后20年的政治生涯，毛在此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光，远离北京那些讨厌的报告、繁文缛节和阴谋。杭州在夏末时很闷热，气温高达华氏106°，在

这样的高温下，即使空调也不能把温度降到华氏86°，但作为一个湖南人，毛对这种气候是很适应的。

在杭州，毛抱怨北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报纸（没有刊登有关决定的报道）阻碍了他的“百花齐放”运动。在对地方干部讲话时，他承认他的观点只代表了少数人，他说，军队的宣传干部在报上公开批评“百花齐放”的自由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他们代表党内90%的同志，所以我没有群众基础。”尽管他很被动地强调指出：“我不是鼓励群众造成混乱，我不是开促乱的会议。”但他坚持认为，党在这一时期内要“放”，要接受批评。

在这种情绪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他说：“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几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文章指出：“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认为“在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学得还很少……还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很欢迎，甚至保持敌对情绪”。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教育，必须进行改造。文章强调“要帮助几百万知识分子在当前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荣使命”。

毛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迫使中央委员会同意—显然是极其勉强的—开展一次新的和风细雨的整风运动。尽管这样，由此导致的骚乱仍超过了以前。刘少奇打算提出这一运动的目标，首先应该是主观主义，其次是官僚主义，再次是宗派主义。但是，毛坚持把官僚主义放在第一位，以此作为动员党外群众参加党内整风运动的根据。这种把自己暴露给党外人士的做法，肯定使毛的同志们耿耿于怀。

但在4月30日，毛发出了指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用同志间的谈心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这个运动从5月1日持续到6月7日，毛本来希望能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好进行几个月，但由于他的同事们的抵制，他最终只好作出了让步。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政治家和学生对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表示满意，他们倾诉出长期受压抑的怨言。

5月19日以后，北京大学的自由演讲活动突然变得过激起来，每天都出现数百张标语，不断攻击和侮辱党的干部。5月23日，一位年轻的女演讲者在北大“民主广场”发表演说，指出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今天已不再适用。

一名学生因每天撰写大字报而闻名全国，他的每篇文章都可称得上是“毒草”。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引用了赫拉克利特的话：“在伊佛索，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应该去死，市政应该交给羽翼未丰的年轻人。”他批评《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

这个勇敢的年轻人要求年青的一代去表现自己，“除了那些‘三好学生’（或者说是蠢材、样板学生，或说是‘小小螺丝钉’或是‘毛泽东的孩子们’或随便你怎么讲，都是一样的），即已完全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人外，中国青年中存在着成千上万的有智慧的和非凡的人物。”这条标语署名为“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8)

另外一个参加双百运动的人是前国民党的老将军，四年前他曾介入毛和哲学家梁漱溟的争吵。现在他指出毛的性格“暴躁、冲动、鲁莽”，这就“经常影响他的决策，引起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偏差”。

在这场运动中，毛充满感情地写了一首著名的词作，惟一一次公开地提到了他的个人生活，在这首名为《蝶恋花》的词中，毛回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生平和她牺牲的事迹。他充满深情地写道，“我失骄杨君失柳……”

不久，那位在1927年毛离家出走之后一直在长沙陪伴杨开慧的女士(9) 到北京看望毛泽东。这是一位始终坚持正义的妇女，她的来访使毛重新唤起了对昔日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日子的深深回忆。当这位客人谈到杨开慧的勇气、忠诚和对他们的孩子—岸英的希望时，毛热泪盈眶，“开慧是个好人”，“岸英是个好孩子”，他们能说的只有这两句话。

到了5月15日，也就是在“鸣放”进行了两个星期之后，毛打算中止这场政治运动。他在给党内干部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组成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先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现在又要求退回到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毛指出：“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为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许多人这样做了，例如钢琴家傅聪受官方派遣到华沙学习，但却非官方地逃到英国，在那里与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结了婚。成千上万的人通过香港来到北美、欧洲、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又过了10天，毛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运动。他告诉出席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年轻的非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

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期间，在北京大学传抄着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节译本，这是从《纽约时报》摘录的。

一位在政府担任部长的非党人士说：“尊敬的毛以为民主党派会很有礼貌地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但这一估计是不足的，”他解释道，“他没有想到党可能会犯有那么多的错误。”各省的党的干部们拍来的电报被形容为“似雪片飞来”，他们一致要求停止运动。

到6月8日，毛投降了。他发出了党内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那些公开讲演批评政府的人现在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而受到打击，一些精明的非党人士从开始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武汉骚乱的学生领导人实际上已被处决。

现在，毛在政治局里的支持者已经失去半数，一两个动摇者受到攻击和责难。这种不十分拥护他的情况以前也曾有过。例如，在1955年，当时他坚持要提前进行农业集体化，但那时他的主张最终被大家接受了。现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遇到了麻烦。北京市长彭真曾对他的亲密僚属说：

“斯大林自己认为他永远绝对正确，结果他……被……谴责并被击得粉碎……

“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区别只是错误的程度和性质不同而已……我党的干部都是党的工具，问题在于像毛泽东同志这样的工具怎样才能运用得更好。

但是，学生们并没有善罢甘休，北京大学贴出了又一张大字报，署名是“一部分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大字报说：

“善良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欺骗了！共产党修正错误的目的不是去掉三害，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或改正工作方法，而是获得更大的权力，以便更好地统治‘愚昧’的中国人民，这不是很清楚吗？虽然皇帝给他的党下令改变工作作风和方法，但各级官僚依然故我，一切都像从前一样。最近，皇帝发现了一些‘右翼分子’，他现在要用他们去威吓‘愚昧’的中国人民！”

7月1日，毛在《人民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对“百花齐放”运动中出现的把民主党派引入歧途的问题进行辩护。他说：整风“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毛显然有理由不想看到那些在5月初由他发动起来的一流右派受到他的党内同事的惩罚。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支持他。然而，刘少奇和彭真领导的党组织，仍计划严厉处理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最终的结果是，攻击毛允许散布批评言论的这些政治家们发动了一系列惩罚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一个右派被证明说过合作化运动不好的话，“农民们正在诅咒毛主席”。还有一些人非难毛的性格粗暴，等等。毛被指责不理会党内自己的同志，而去支持非马克思主义的阿谀者和机会主义者。

毛的防卫办法就是到全国各地去解释他对事情的看法，比如7月9日他在上海对干部们发表了一次谈话，其中说：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

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

这就是毛的所有关于人民的乐天派的观点。“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但是，每隔二年或三年“放火”一次是必要的。

“在延安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胆子，没有经验，没有禁止，也没有放。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这次大鸣大放增加了我们的经验。将来还是要鸣放。‘百花齐放’不包括反革命在内，一年一放还会放出来。把人民当敌人压是很危险的。

毛丝毫没有放弃他的乐观派观点，如今他又把这种观点发挥在有关经济问题的讨论中。两天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就人口问题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计划生育，也来个10年规划……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毛建议说，如果建立更多的小钢铁厂，钢的产量将迅速提高。他要求宣传“多、快、好、省”的口号，这个口号在1956年下半年被“一阵风”刮下来了，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毛还谈到了改变中国人的体质的雄心，在1957年10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他提到了“除四害”问题，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他说：

“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毛泽东最后自信地说。

22　东风压倒西风（1957~1958）

当中国的共产主义形势恰如跳跷跷板似的起伏不定的时候，国际共主义的地位却在明显地提高。1957年8月，苏联人成功地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10月，又把他们的斯潘尼克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他们还同意向毛提供国防方面的核技术知识，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及其制造技术。

毛衣袋里装着这个条约，于1957年11月去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建国40周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毛想在这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上阐明他的两个意图。一个是保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另一个是怎样最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技术优势（事实上，他对此估计过高）。

在莫斯科机场，毛把中苏之间的分歧抛在一边，对苏联进行了慷慨的赞扬，并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赫鲁晓夫惊异地发现，毛放弃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工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中国人将集中精力和亚洲、非洲的国家建立比较密切的关系—苏联人则留下来对付西欧和美国。

在莫斯科，当有人向他重提上述思想时，他答道：“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有苏联起领导作用……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惟一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应该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

在另一个场合，毛告诉赫鲁晓夫：“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再则，假使你们自己遭到进攻，我认为你们也不应该还击。”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赫鲁晓夫问。

“撤退。”

“撤到哪里去？”

“你们曾经撤退过。”毛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们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们再次被人进攻，你们可以一直撤退到乌拉尔，坚持两三年就行了。你们有中国作后盾。”

赫鲁晓夫答道：“毛泽东同志，假如战争现在就爆发，你认为会打多久？这回可不同上次大战。那次战争用的是飞机和坦克，现在则有了导弹和原子弹。你根据什么说我们会有3年的时间撤退到乌拉尔去呢？我们很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过此以后，什么也不会留下了，仅剩下一些破烂而已。如果我们告诉敌人我们不还击的话，那就等于是请他来打我们了。



>>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毛泽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李先念等11月4日到克里姆林宫拜会布尔加宁

在莫斯科，毛向最高苏维埃发表了演说，这是中国首脑第一次在欧洲列强之一的立法机构里讲话。在颂扬苏联自1917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的帮助的同时，毛还明确地指出，他的革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将跟着自己的救星前进：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百千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

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折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

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那么，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10天后，毛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留苏学生会议上露了面。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欢迎他。对此，毛的反应是：“请不要这么说，我对个人的未来只做了一个五年计划。”毛坐在主席台上点燃了一支烟并以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层领袖的姿态向学生们发表了演说。后来他们报道说：

“毛主席指出……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68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

“毛主席说，世界上的风向变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10)。现在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10亿，独立了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7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以及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有6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4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那里会发生‘地震’。

第二天，11月18日，毛向莫斯科共产党会议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进一步阐发了上述思想。他用一种温和的、最为理智的方式解释了他同赫鲁晓夫的分歧：

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100%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10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9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8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7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60%的马

克思主义者，有50%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10%、20%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呢？……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

后来，这次演说在国际社会里成了毛所作过的最为著名的演说之一。毛在这次演说当中还谈到了原子弹会派上用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三年前，在同第一任芬兰大使的会谈中，他已经暴露过在这个问题上的某种轻率的看法。当时他曾说：

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没有这样轻率，但他的话却给人以极大的误解，引起了铁幕两边的警觉。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

我和外国一位国务活动家（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相信如果打起一场原子战争，整个人类都会消灭。我说如果糟到不能再糟，

一半人都死了，那另外一半人还活着，帝国主义将被夷为平地，全世界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多少年内又会有27亿人而且肯定会更多。

这就是《人民日报》对毛的讲话所作的报道，但赫鲁晓夫说，原讲话更富有色彩，他对毛当时的议论是这样转达的：“至于中国，如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毛的谈话在莫斯科受到愤怒的反驳。哥穆尔卡，这位一直得到毛支持的、在苏联控制较松的较自由的舞台中上升到掌权地位的波兰领导人发言，强烈反对毛的核战争分折。捷克领导人安托宁·诺沃提尼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实际上，毛只是力图以他对中国听众惯用的方法来给其国际听众打气。这种方法就是，指出事情最环的可能性（以此减轻恐惧），并同时断言，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但是，仍要断言，如果它的确发生了，那么，生活仍将继续下去，一切都不会丢掉。东欧对毛的讲话的态度比毛自己料想的更为严肃。毛也因此得到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公正的国际声誉。由于毛气势汹汹的好斗性，故其从未完全摆脱掉这个名声。

一回到北京，毛便致力于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并准备旗帜鲜明地批判苏联，因为那里的领导人犯了错误。

在1958年南宁会议上，毛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国内，对准了那些对其不同寻常的加速事物发展的方式加以抵制的人们。他指责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

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毛嘲弄了那种典型的议事程序，“开会前10分种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也是红家。政治局的大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毛对下述情况表示同情，即官员们愿意装出对事情充满自信的样子，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美十全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大概像《茶花女》中的女主角玛格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得打扮一番。”毛需要行政机关以一种更公开和坦率的方式行事，“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

他制定政策的方式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

毛的这个讲话的非正式版本的确充分地表明，他的观点与前些时候的讲话或声明相比发生了变化。

毛坚持他在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中提出的不同观点：

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么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

他对于他的政治同僚们对待他的方式抱怨道：

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湖南人

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1958年1月底，毛成功地使全党接受了一个加快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这个规划是后来以《工作方法六十条》而闻名的文件的一部分。它是几位参加拟定文件的领导人互相妥协的产物，但毛自己又对其中的每一段落作了审定和修改。

《工作方法六十条》的中心是，今后三年乃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应当“彻底放手”发动群众。在农业生产中，要推广试验田；所有党委成员应该“一年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做调查研究”。

3月10日，毛在成都奚落了50年代初中国人的不成熟状态：

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之是苏联第一。

这种思想体现在经济中，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抄也不会鉴别。而且还在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

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现在该是分析斯大林这位“老佛爷”的时候了（毛年轻的时候，人们一般都用“老佛爷”这个词称呼孀居的慈禧太后），毛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区分开来，他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胜利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

几天后，在成都的第二次谈话中，毛提出了他的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新思想。他坚持认为中国能比苏联人做得好，“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而他们把列宁主义一部分丧失了，死气沉沉。”

另外，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中国不要勉强。“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接着，毛指出，要适应由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紧张压力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

在此问题上，毛直接向苏联理论家，包括作为第一任大使被斯大林派到北京来指导毛的哲学家尤金，发起了进攻。他认为，30年代由尤金主编并于40年代译成中文《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由何而来？……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12种元素变成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

一通哲学议论之后，毛又回到钢铁生产上：“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

3月份，在成都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毛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和公开辩论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

但将来家庭可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家庭还有用。当共产主义分配关系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龙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在此，毛又大谈他常常论及的话题，即自古以来，未受过足够教育的年轻人有能力创立新的思想流派。“孔子23岁开始，耶稣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

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不应感到困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几十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历史上有创造力的都是没有足够学问的人，而“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

“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染房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的门都关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



>> 毛泽东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

毛与他的中国共产党同胞们就是这样，“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反对“大跃进”的人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遭到毛的反驳。比如张奚若，他是非共产党人士，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50年代任中国的教育部长。

“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水利、整风、反右派、6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毛走遍全国，鼓励地方党的干部抛掉怀疑和犹豫，掀起新的生产高潮：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一场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1958年春夏，中国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源于毛心醉神迷的巴黎公社。陈伯达的文章首先暗示了公社问题，文章指出，毛希望看到合作社转变成为工业和农业兼容并包的综合性机构，构成国家的基层社会组织。事实上，合作社已经在合并，目的是推进大型堤坝和灌溉工程的建设。但是现在，人们知道了毛的想法是要把工业、商业、教育、行政并入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中去。

夏天，毛走访了三个省份，想亲自看看工作进展情况，最后他赞扬了七里营公社，他说：“有希望啊！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两三天后，他以更具概括性的语言提出了赞许，并被农村干部们视为全国都要遵循建立人民公社的信号，尽管公社还没有被党的中央委员会认可。毛以为通过人民公社，再加上若干年，中国在6年或7年内便能达到共产主义。

然而，毛的批评者依旧畅言无忌。4月24日，毛的湖南同乡和井冈山的老战友、国防部长彭德怀，率领一个中国友好军事使团去访问华沙条约国的首都。他正好与高级官员、外交部副部长洛甫同机旅

行。洛甫是作为中国观察家去华沙参加华沙条约国外长会议的。他们大概就最近毛领导下的政策方面的戏剧性变化交换了意见。身为驻共产国际的前中国代表和驻莫斯科的前大使的洛甫，透露了毛和克里姆林宫的争论。

彭对毛的全民武装概念，即所谓创立群众性的民兵组织的思想早就心怀疑问。他相信，假如有一支受雇于军营而不是稻田里的完全职业性的军队，加上唯一可以利用的盟国苏联所提供的核武器，中国的情况会更佳。所以，彭不赞成毛与莫斯科分道扬镳。

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尽管存在着广泛的分歧，毛最终还是得到了会议对“大跃进”的认可。他作了四次讲话，论及所有的重要问题并攻击了几个靶子，其中之一是中国人缺乏自信心，他们总是想知道外国导师，如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楼梯才能爬得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然而，“楼梯是可以造成的，而且还可以造升降机”。这导致了毛非常喜欢的一种教育方法，即通过望远镜的另一头来观察事物的方法的盛行。他让中国人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我问过在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大家都摇头说，不是的，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在地球上看到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一看我们，不就是在天上了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天上，同时又是住在地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也即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把我们看成神仙吗？第三，问他们中国人算不算洋人？他们说，不算，外国人才算是洋人。我说，不对。中国人也叫洋人。因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毛承认他在许多问题上无知。“我也不懂工业，我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

在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之后，毛禁不住历数了所有最著名的皇帝的名字，并且大胆地把自己同这些人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比较。秦始皇乃公元前一世纪秦朝的创建者，毛说他一直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个插话助长了毛的谈兴，他继续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万6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至此，全议厅里大笑起来。

这时，毛是那样地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以至于他居然设想起中国取得强国地位后的情景，“我看，15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但是，中国的事业终于沿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信心提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会提前达到。”

毛申斥了前一天的一位发言者，因为他说跟着“某一个人走”就不会错。“这个人就指的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真理在那，就跟……要独立思考。”

5月18日，毛讲话的每一行字都把乐观主义情绪传输到与会代表们的头脑里去。“明年11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会震动世界，”他自夸道，“假如5年内达到4000万吨，我们可以在7年内赶上英国。再有8年我们可以赶上美国。”

中国不必担心人口会成为厄运的守候神。“我们不要害怕8亿或者10亿人口。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会构成世界人口的一半。到那时，我们文化水平提高了。当全民都受过大学教育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控制人口。”

他还为自己的冲动辩解说：“我有意让右派分子整风。在想出办法前先放。斗争上几轮也就明白了。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使他在百花齐放运动中的同盟者转而与他对立。由于百花齐放运动威胁到刘少奇的党的机构，所以刘及其支持者反对这一运动。而周恩来与该运动毫无利害冲突，所以他支持毛。但是现在，轮到国务院里周的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计划机构受到毛对经济非同寻常的干预的威协了，因此周起而反对。此时的刘在“大跃进”问题上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准备同意毛的见解。

恰恰是在“八大”二次会议给了毛自由行事的权威之后，正在东欧访问的彭德怀，于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和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会谈。后来，有人断言他向苏联领导人发泄了一通怨气，说他与中国党内的其他人反对毛的领导。

6月，毛在军事委员会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言，为了给战友们以震动，使他们减弱对俄国人的依赖感，及时编一本战斗条例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毛说：“当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没有模仿他们时，就进行非难，不高兴。我们可以问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模仿我们的条例吗？如果他们说不，那么我们说，如果你们不模仿我们的，我们也不模仿

你们的……我们有丰富的经验，比苏联丰富。我们不应当认为我们的经验没有价值。这是错误的。”

从来都是人云亦云的林彪插话道：“我们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们不应该因为金子是黄色矿粉而把它扔掉。

6月底，毛读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一则消息，说某个地区消灭了血吸虫，根治了血吸虫病。这使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作之诗名曰“送瘟神”：



>>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中国自己研制的武器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一个月后，由于赫鲁晓夫唯恐苏联人会卷入中国与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强烈对峙，所以他出人意料地飞到中国访问。他和毛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提出一个与9年前毛和斯大林讨论过的占领上海一事相似

的问题。这次令赫鲁晓夫大惑不解的是，当中国人能够从国民党手中解放沿海的金门和马祖两岛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

他问：“毛泽东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停下来呢？”

“我们心中有数。”毛说。

“什么叫心中有数？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要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下来了。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是不是想对我说，你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完成你们的作战计划？”

毛答道：“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待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待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我们就会失去想叫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什么时候让他不舒服的能力。

赫鲁晓夫不懂得这个策略。他提议和中国建立联合海军队伍。毛把这个建议称为无理要求，目的是让中国处在苏联的军事控制之下。

四年后，毛在一个讲话中抱怨（赫鲁晓夫）：“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联合共同舰队，控制海岸……

23 “大跃进”（1958~1959）

1958年下半年，毛一直在国内视察，为经济发展鼓劲，同时召开了一系列通常是充塞着他的支持者的高级政治会议，以取得党的必要的赞同。他夸奖已在全国吐芳的人民公社是合作社的后继形式。

8月，他在山东视察期间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人民公社的初期样

板，包括让男女分开，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带走，让他们分住到集体宿舍里去，如此一来，公社领导人就能够最充分地调动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和公共事业建设。这的确非常便于领导，然而对于被领导者说来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同月，毛在天津大学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年底，他自豪地对中央委员会总结道：“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9月，毛视察完中南地区后回到北京，号召发动群众修建炼钢的土高炉—赫鲁晓夫称之为“炊事钢炉”，以努力提高生产并把技术推广到农村中去。中国准备先工业化，后城市化，同时打算仅仅依靠苦干让谷物产量翻番。

毛就猪的问题谈了很多，并对生猪饲养提出了建议。“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10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可能的。



>>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济南近郊北苑乡视察水稻生产情况

北京的报刊欣喜若狂。10月1日《人民日报》声称：“农业上……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浑成一色，照红了天空……古代有希腊神话，不过，那都是一些‘话’而已，只代表一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党的任何号召都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千百万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预言家。有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预见未来……党和毛主席的每一次预言都变成了现实。”



>> 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如今，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产生，他们观点激进，在反对那些较为谨慎的毛的同辈人的斗争中聚集在了毛的周围，他们时刻

准备着为毛的思想提供理论依据。张春桥便是其中一人。他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主张恢复延安时期的做法，通过免费供应物品来实现同酬和支付部分货币工资。毛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支持这个观点。

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在彻底批判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阐发了有关人民公社思想。他说：“斯大林这本书从头到尾没有讲到上层建筑，没有考虑到人，见物不见人……”他的“基本错误是不相信农民”。俄国人“是一条腿走路，我们是两条腿走路，他们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红，只讲干部不讲群众”。但不管怎样，毛承认中国“商品生产仍然落后，甚至落在巴西和印度的后面”。

然而，到11月底，在武昌召开另一次高级会议的时候，毛的美梦不得不加以修改，他解释了原因，“明年搞3000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毛在接受这种不可能的目标与宣传方面的轻率这时暴露出来了。

11月30日，在同协作区负责人的谈话中，毛第一次显出不安的迹象，他说，我们“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7月1日再定”。对于提高粮食产量的巨大呼声，毛也首次表达了保留意见，“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90%左右，比较妥当。”

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毛同协作区的负责人大谈国际事务。他把杜勒斯和不列颠人作了比较。“英国人老奸巨滑，美国人比较急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的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要翻英文字典。

两星期后，毛又和另一组协作区负责人谈话，并且解释了他计划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原因：

辞职问题，“偶像”总要立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才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久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可少……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非常清楚，毛对宪法极不尊重。他说：“……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搞不成文宪法。

12月，中央委员会在对毛所犯错误的指责声中于武昌召开全会。会上，毛极力为他的政策进行辩解，以维护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绝对领导—在向台湾海峡的金门、马祖两海岛发起的战斗中，他曾冒险向美国人挑衅。毛还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问题明确地回答他的批评者。

两种老虎，毛都需要：它们既是真的又是纸的，是“一个由真的变成纸的过程的问题”。毛的真意是，“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些人想不通，我们还得作些解释工作。”

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1949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上万！成千上万！

最后，毛又转到“大跃进”问题上。他首先对河南出现的人民公社进行了评价：“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4月就没料到，8月才作出决议……”

接着，毛的讲话又谈到有必要避免“由于1958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承认，他一度赞成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目标。“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定那么高，留有余地……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

是经济自身使毛停了下来，因为它并没像毛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发展。另外，毛在武昌也受到周恩来的力阻。那些认为毛同时向俄国和美国人挑衅乃不明智之举的高级军人被周集合起来支持专家治国论者，反对毛在经济上的乌托邦思想。尽管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毛仍充满信心，但武昌会议迫使毛放弃了他的共产主义政策和在六年内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毛后来抱怨说：“武昌会议我不满，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毛想翻案的努力没有成功。根据武昌会议精神，较为激进的公社建立单一性别的“营房”的工作被停了下来，私人所有的房屋、花园和小的家庭牲畜得到保护，伴随第一支人民公社之花盛开而出现的高潮至此降下来了。

毛从领导第一线上退出的事宜也最后安排妥当。后来，毛急于澄清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观看机关干部炼钢。当时，机关、学校也掀起炼钢热潮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要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

……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

在武昌会议上，毛力图减轻人们的下述担心，即毛退出领导第一线可能会引起领导层的变化或者分裂。他告诉中央委员会：“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有可能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再去见马克思嘛。

毛在武昌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道德观念，他告诉与会的同志：

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

就拉倒。

1959年2月，在向党的书记们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毛要求重新发扬“大跃进”精神。他坚持认为“大跃进”不应被放弃，认为在1958年最后两个月里空气有些“压缩”，当然“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于是，1959年又出现一个规模不大的跃进。

“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很快，他又同意“经济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

在195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毛作了最后的顽强斗争，以维护他在“大跃进”问题上能够维护的东西。他作报告，写征求意见书，并分

送全国，企图保住士气。后来，他回忆说，1959年他拿出了3万或4万字的材料，但很清楚仅仅停留在“纸上的战斗”是无用的……

4月，在上海，毛努力在中央委员会面前为他的“跃进”辩护。开始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计划得不太好，“过去往往与相同意见谋得多，与相反意见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但是，毛拒不向他的批评者—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低头：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手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一个人手里。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

毛还拒不承认1959年的经验是对“大跃进”的否定。他以物理学的理论来逃避这一现实：

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都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都是波浪式前进，不是直线上升。

然而，历史显然已从他身边逝去。4月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少奇取代毛为共和国主席。作为后斯大林时代改进党的形象的途径而作出的这个安排几乎在三年前便已确定下来，而且对它所涉及的人员来说，也是适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变动在毛的救星之光明显暗淡下来，声望明显下降的时候，的确发生了效用。

党的宣传部门在重大场合把刘与毛的尺寸相等的照片肩并肩地排列在一起；现在把刘称为毛“培养的最亲密的同志”的说法也广为流传。

刘少奇的妻子告诉孩子们：“爸爸很忙，没有时间休息。毛主席不再管国家具体事务，把它们都交给了你们的父亲。你们一定不要打扰他。

由于意识到是那些虚报产量的过分乐观和野心过大的地方干部拆了他的台，所以毛向省及其以下各级党的书记再次大声疾呼，恳请他们不要因为过分的激情和骄傲而毁了“大跃进”。粮食指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天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 1959年，安徽合肥，毛泽东在蜀山公社座谈

4月，毛对“大跃进”又作出了新的数量上的限定，“每年增产10%是跃进，20%是大跃进，30%是特大跃进。这与产量翻番的前15个月的狂热日子大相径庭。

1959年6月，赫鲁晓夫违背了仅仅是在两年前作出的要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诺言，从而在中苏关系上投下了分裂的阴影。中国建造自己的核武器和核工业的计划遭到严重打击。与此同时，赫鲁晓夫飞往戴维营会见艾森豪威尔总统。恰好是在赫氏去美国前，彭德怀将军在莫斯科与他讲行了会谈。后来有人断言，彭再次向苏联领导表达了中国对毛的不满。大概赫鲁晓夫认为，他的行动会促使毛的同事们抛弃他。

当事态看来正向着与他对立的方面逐步发展之际，毛决定选择这个时候去访问他的出生地—这是他负有盛誉的32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在过去的内战岁月里[11] 他曾于危难时刻回到家中恢复元气。至

今这依然是他的本能。6月25日，毛抵达韶山。踏进家门后，他对着父母的遗像凝视良久，然后对随行人员说，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他们可能不会死。第二天早晨，毛去山上祭谒父母的坟茔并把采摘来的松枝—用在场的某个人的话讲—“以凝重而崇敬的方式放地坟墓上”。他低下头说道：“先辈们历尽磨难，而子孙们享了福。”

此情此景促发他写了一首诗，题名为《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从17年后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毛在这次回湖南访问中任命华国锋为省委书记[12]，并在华的陪同下于长沙会见他的第一个妻子杨开慧的家人，是很有意思的举动（令人震惊的是，华成为毛死后最终继承了他的党的主席职位的人）。



>> 毛泽东在父母墓前鞠躬行礼



>> 毛泽东在湖南和小学生们亲切谈话

如果毛确实从回归故里的过程中得到安慰和补偿的话，那么，这一点不久就得到了证实。7月1日，他乘机前往鄱阳湖西岸的疗养胜地庐山，参加他所经历过的一次斗争最尖锐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会议。他怀着忧虑但达观的心情来到了庐山，正如他在抵庐之日所写的那首诗所描绘的那样：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后来评论说，这首诗和《到韶山》那首诗都是答复政治局里反对他的“那些家伙的”。

庐山的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广东的党魁、支持毛的陶铸在一篇印行于广东省的文章中辩护道，我们说一个人伟大并不是因为他“永远正确”—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他能够把握形势并在机会到来时作出决定。

国家新闻媒介仍在极力抬高毛的声誉。《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没有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我们的革命就会失败。”

但是，有些人则想让强有力的毛下台。洛甫和彭德怀在会议期间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会上的压力很大，“参加者被迫只讲好事，不许进行批评。”他们认为，毛像斯大林晚年那样多疑而残酷。彭评论道，“任何王朝的第一个皇帝都是残酷而英明的。”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敢讲、热心，但言语粗暴的彭，乃是1949年后仍然保持着过去的简朴生活方式的少数第一代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他常常与战士们在一起，而不像毛那样远离他们。对一些中国人来说，彭是除毛以外的另一种值得敬仰的英雄。现在他提交了一份抨击“大跃进”的议案，并宣读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以进一步证实他的批评意见。他宣称，在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年，中国成年人每天能得到2斤多米，1956年降至1斤半，1958年则降至

1斤—已不足以养活一人，于是人民开始吃水藻、棉花叶和芥子叶。彭得到了老战友林伯渠的支持，也得到洛甫和另外两个更为重要的湖南人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支持。

彭特别指责了由于修建小鼓风炉带来的浪费。这种土高炉甚至在无煤可用的地区也建造起来，以致许多树木被砍伐用作燃料。会上的争论异常激烈。在这次长会剩下来的时间内，毛与彭之间的斗争已变成如何制裁彭的问题的争议了。后来，毛指责彭说：“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骂了我50天娘，我骂你20天娘不行？（这是指彭在1945年就内战时期的作战指挥问题所做的自我批评，那时他与毛有过“50天的斗争”。）这一骂，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20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

在庐山发生这些灾难性的变化期间，毛给正在北戴河海滨别墅里疗养的妻子江青写了几封信，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上的情况。于是，江青给毛打电话说她要立刻飞来庐山陪伴他。毛不同意，说“斗争太尖锐了”。然而，江青没有按毛的意愿行事，她不但来了而且出现在会场上。后来她以一种与毛相同的口气说，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比她想象的更激烈。

毛在7月初发出的一系列指示中，已经开始承认他的某些错误，他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毛还接受了对他的生产优先次序—第一是重工业，其次是轻工业，然后是农业—的批评，并说，我们有必要修改这种次序。

在另外一个场合，毛力图作技术上的辩解。“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只有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依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须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的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

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的，但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因为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许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基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我们的速度。

在庐山“审判”中，毛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点，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困不着！……无非是讲一塌糊涂，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大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事实上，不管如何混乱，毛对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如此广泛而深刻的争议可能会扩展到中国老百姓中去而激动不已，“在其他地方怎么能找到这样一所……能让几亿人民和几百万干部受教育的学校？”毛几乎是明确地宣布了他将在7年以后付诸行动的反对其政府的惊人方针。

“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解放军确实会跟毛走）。

“……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

毛在一段感人的讲话中，承认了自己在经济计划方面的错误：

煤和铁不会自己走，需要车辆运输，我没有想到。我和……总理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们可以说我们忽视了。我不应道歉，因为我不是计划委员会的头；但我又应当道歉……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

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再回来争论。我不赞成认为不能反驳主席的思想……事实上，你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反驳过我了，不过没有指名道姓……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

然而，他对报纸上的不满挖苦却忍受不了。“《嵫岈山章程》（第一个人民公社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最后，毛的辩护以低劣的虚张声势和粗鲁的抨击得出结论：“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我……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现在，斗争转到了彭的命运上。彭向中央委员做了自我批评，并把自己的错误一直追究到赣州战役，那时他未能攻占这个城镇。

彭承认，“和毛泽东同志用这么糟糕的方式争论是我的极大错误，结果在争论中带入了我个人对毛泽东同志的偏见。”

彭在1937年洛川会议上也反对过毛。他还承认，在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未能听从最高指挥部的号令，只顾“显耀过分狂热的爱国主义”。

9月，彭给毛写了一封信，在批评自己的同时请求原谅他的错误。“现在我深刻的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评，都当做是对自己的打击……30余年来辜负了你对我的教育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

于是，毛向党内发出一封信，欢迎彭的做法，并说，“尚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让我们“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31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彭要求去当农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而毛则让他走访中国的工厂，以便能看到人们冲天的热情，最后把他派往黑龙江去管理国营“中苏友谊”农场。

1959年9月11日，毛作了第二次重要的讲话，为他在“大跃进”中的瞎指挥辩护，以逃避公众的谴责。这次，他是对军事委员会讲的。像他在7个星期前庐山会议上的表演一样，讲话乃是怒气、自责和嘲讽交织在一起。

“假如没有足够的猪肉，足够的蔬菜，足够的肥皂，他们就抓住机会说，‘你把事情搞糟了！’说那是你的事不是他们的事。浙江缺雨伞，他们说成是‘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等。这一小撮人很难进入共产主义，变成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一次引经据典时，毛声称“即使圣人也犯错误”，他用《论语》中的话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我的话是讲给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自己的。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研究过。我是一个有许多缺点的人，决不是十全十美的。许多时候，我常常不喜欢自己。

“我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所有领域。比如，我一种外语也不懂。最近我才开始学习经济著作。但是，同志们，我下决心要学，一直学到死。



>> 1959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首都机场迎接来华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庆祝活动的赫鲁晓夫（吕相友 摄）

1959年9月，毛接见了赫鲁晓夫。这是赫氏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苏联领导人很不策略地从戴维营直接奔赴中国。在戴维营赫一直同艾森豪威尔促膝交谈。自上次访华以来，赫对中印边界问题

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毛。50年代，中印两方都在逐渐扩大对边境地区的军事控制。这一地区经常无人居住，一片荒凉。在喜马拉雅山的实际边境线问题上，中印双方观点迥异，且态度强硬。但直到这时，基本上还是口头上的争议。边界上的小规模军事冲突和舌战已经损害了中印关系，毛希望得到苏联人的支持。

后来，毛回忆道：“1959年9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压我国，10月在我国国庆10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台上，攻击我们。

赫鲁晓夫，这位曾经那么敏感地注意到斯大林对毛的民族主义反应迟钝的人，现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苏联人的远程潜水艇已开始服役。他们问中国人能否让他们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同远程潜艇保持联系。中国人拒绝了。但赫鲁晓夫在这次访问期间又向毛重提此事。

他极力劝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助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

“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毛答道：“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在“大跃进”的欣快症过后，如今面临的则是令人心碎的物资短缺和工业下跌。在继之而来的1959~1961年三年中，严重反常的干旱和洪水蹂躏着新的公社里的农民。迷信的看法认为这是上苍对毛的亵渎行为—“向地球开战”的报复。向“地球开战”与儒家的传统背道而驰。毛从未完全自这个巨大的损失中恢复过来。

24　旧 靴（1960~1963）

1960年，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奋力将中国推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时候，毛丢开首都的日常事务，动身前往南方，以便用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写作。“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约四分之一，每人的平均收入降低了三分之一，工业生产降低了40%多。这主要应归结于从1959年开始影响中国的连续三年的恶劣气候，但也有些是由于毛在“大跃进”中的政策造成的。

毛宁愿待在温度较高的杭州和上海，而不愿住在有风暴和冰雪的北京的寒冬里。这样，他还可以躲避为来访的大人物而安排的正式庆祝宴会。在杭州，他住在风景秀丽的西湖西岸的一座小山上的新建别墅里。在上海，则住在曾经是法国人俱乐部的一栋建筑中，并且拥有一个很好的游泳池。在这种半退半休的状态中，他会见的政治局成员越来越少，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他的前秘书陈伯达，他的妻子江青和他的老盟友康生。

在向南方退却的过程中，毛发出了一个得到报纸社论和党的官员讲话都恭敬响应的政策声明。这个声明在工作会议上讨论过并准备通

过官僚机构实施。但是，毛对官僚们的工作效率和诚意越来越不满意。

自延安时代以来，首先始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的对毛的天才的过分称颂仍然继续着。《人民日报》在1958年曾把毛尊奉为活着的最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在华盛顿有位外交官就此问过安奈斯达斯·米高扬，犹疑片刻后，米高扬答道，“毛依然像过去那样，是优秀的理论家。”

《人民日报》说，1959年至1960年冬天，毛“解决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有生之年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时间解决的问题”。收音机里说“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由于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赫鲁晓夫于1960年2月在华沙条约国的一次会议上说：毛是“一只穿破的旧筒靴，只能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供人瞻仰”。

然而，毛不愿自己被人们遗忘。在过了6个月隐居生活之后，1960年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5月份，又在中南地区各地会见来自第三世界的众多代表团。月底，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会见了英国将军威斯康特·蒙哥马利，并且对这位政治上的保守人物为何对他如此感兴趣露出明显的迷惑不解之情。

在进餐中，毛嘲讽地对蒙哥马利说：“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饭后，毛以钦佩的口气谈到了克伦威尔，蒙哥马利则热烈地评论了法国、美国和中国的革命。

毛惊奇地说：“你很开明。”

蒙哥马利想知道，当中国再次强大起来时，它的目标是什么。

毛答道：“噢！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毛主动说出了蒙哥马利认为是合乎逻辑的而且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即当将来毛无能为力之时，扩张的诱惑很可能出现。但毛说，在他有生之年，他会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此类事情发生。

蒙哥马利问，中国对西方来访者为什么要如此紧闭大门。“他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人带有道德准则方面的随意性，而这会影响他力图使中国人达到的高标准，他又说，西方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会降低。”蒙哥马利没有回答，但后来承认那个评论是很难反驳的。



>>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7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毛的攻击。据毛自己说，在那里他“围剿我们”。赫鲁晓夫指名道姓地诋毁毛，谴责他变成了另一个斯大林，“除了自己的利益之外，不顾其他任何利益，离

开现代世界的现实杜撰理论。”毛已经变为“一个极端的‘左’倾主义者，一个极端的教条主义者，一个‘左’的修正主义者，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作了长篇发言，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印度边界问题辩护。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并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它纯属民族主义争端，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可言状的损害，完全没有考虑到诸如丧失掉走向共产主义的喀拉拉邦的具体问题……”

“总在增长着庞大的人口的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人口少于印度的苏联的支持？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当印度像它应该的那样，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在这个边界冲突问题上会发生什么？……”

赫鲁晓夫抱怨说，由于中国人阻止安装“用来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无线电发报机，阻止苏联飞机作侦察飞行，因而损害了苏联的防御措施。说毛已经把“彭德怀送往一个劳动营”，原因是他在给苏联共产党的一封信中批评了公社政策。

赫鲁晓夫于7月份从中国召回了所有苏联专家，并带走了珍贵的图纸和方案，致使中国的经济花了5年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后来，毛用略微夸张的口气说：“我们把整个1960年都花在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中。”

事实上，1960年，毛花了部分时间批判性地阅读了苏联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评论说，由于完全把“关心个人物质利益”当做发展生产的一种工具，因而苏联人正面临着“个人主义泛滥的危险”。把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当成“决定性的动力”，导致了“极端错误的分配决定论的观点”，从而对马克思的正确见解进行修正，这是“理论上的错误”。“……好像群众的创造性活动是要靠物质利益鼓励出来的。这本书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是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像这样地宣传物质利益，资本主义成了不可战胜的了。”

这本苏联教科书并未解释清楚，“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近视眼的个人主义。”在此毛又沉溺于回忆创造理论的延安时期中了。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们还健康些，并不为了追求待遇而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了，评了级，反而问题发生得多，许多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

这本苏联教科书的另一个典型错误是以计件工资为主，计时工资为辅。这会“助长部分工人中‘为挣大钱而斗争’的心理，不是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首先关心个人收入”。

由于教科书反复讲这个主题，最后，毛问道，苏联的事情为什么搞到如此糟糕的地步，“现在特别强调物质利益总有个原因。斯大林时代过分强调集体利益，不注意个人所得……现在走到了反面……”



>> 1960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和有关同志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

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都会继续存在—苏联教科书却没有论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还有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要经过很多阶段，也一定会有很多革命。”撇开这个话题，毛带着个人意见谈到了第二代，“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在国际性的问题上，苏联教科书也存在错误。例如，它赞成劳动分工、专业化经济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互助的经济体系。毛强烈反对这种观点：

这个提法不好。我们甚至对各省都不这样提。我们提倡全面发展，不说每个省份不必生产能靠其他省份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我们要各省尽量发展各种生产……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独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国，在很长时间内，全国大体上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控制太死，地方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拉拉，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做到全国是统一的，各省又是独立的……

应当各国尽量搞，以自力更生；自己尽可能的独立地搞，以不依赖别人为原则，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应当尽可能的搞好，吃饭靠外国、外省危险得很。

苏联教科书中再次提倡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和平竞赛，是“把实际存在的两个世界市场变成了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的两个经济体系，这是从斯大林观点的后退”。应当强调，两个体系之间不是共存而是斗争。

最后，毛对苏联教科书中的许多论点进行了挑剔。说它错误地把工业化当成农业集体化的前提，错误地认为在落后国家革命更困难。毛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实际上比较弱小。他论述说：“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法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几十代了。他们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多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所以英国的工人阶级不跟着共产党走，而要跟着工党走。”

在国家消亡问题上，苏联人的观点似乎过于乐观。毛是有保留的，“但是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

9月，毛的“选集”第4卷出版了，这给林彪提供了恭维和吹捧毛的一个机会。他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关于纸老虎）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精辟分析和伟大预见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因为，当乌云遮住天空时，我们能够看到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

然而，当10月份埃德加·斯诺再次来中国见毛时，毛坦白地告诉他，中国人民还吃不饱肚子，并预计，中国要再花60年的时间，才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赶上美国。

斯诺请毛谈谈中国的长远建设规划。

“我不晓得。”毛坦诚地说。这使斯诺一惊。

“你太谨慎了。”斯诺坚持说。

毛答道：“这不是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毛关于经济的辩解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说：“假如在另外50年里，中国群众尚无西方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那又怎样呢？剥夺、节俭、斗争产生自信。沉迷于物质享受会使人堕落和精神空虚。那不是同其他国家一样了吗？”

毛表明了他要去波特马克河或密西西比河游泳，要寻求缓和以迈入70年代的雄心。

1961年初，毛向中央委员会承认他对中国遇到的挫折深感困惑，并再次指出，在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几年，“我们没有深刻理解国情”。中国未能像他原来希望的那样很快现代化。“我们不可能改变我们不懂的东西”。

至于和苏联的冲突，他说，马列主义是基干，它有枝丫和叶子，就像一棵树有许多枝丫和叶子一样。中国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必须继续前进，必须充满自信。过去，公社“借助他人的劳动建房子”，跟通过“剥削得到”一样，“是违反马列主义的”。

一个月以后，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由邓小平准备的打了折扣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毛对于要求他在自己不同意的东西上盖章非常生气。据说，他提出质问，“这是哪个皇帝决定的？”

然而，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毛没有受到打扰。他在此期间写的一首诗称自己“梦寥廓”：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浏览自己的手迹时，毛偶尔看到自己一篇发黄了的且已被遗忘了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他30年没有读过它了。毛后来说，他发现它还有些用处，于是印了许多本供同志们参考。但是，同志们并未因此去读他的大作。



>> 1964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女民兵合影

毛还写了一首有关女民兵的小诗：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然而，这是由一张照片而不是现实激发起的诗兴。

在由他的同事召集的会议上，毛依旧沉重地检讨自己的过失。关于6月份的一次北京会议，他说，“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西方报道说，7月份，在对苏联人应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发生了争吵。毛当然继续宣扬对克里姆林宫应采取强硬路线。但是，在没有苏联技术支援的情况下，拼命工作的中国技术专家则宁愿采取较为温和的态度。正好有一次政治局会议深夜在毛的住所里召开，毛告诉他的助手给与会人员备餐，但每人只能吃一碗粥。

毛命令说：“让他们吃个半饱，他们就会知道普通群众吃不饱时是什么滋味了。



如今，毛的妻子已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用的是少女时代的名字。毛对她在庐山拍摄的一幅风景照特别有兴趣并为照片题了一首诗，抄于照片的背面。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1961年秋，毛第二次会见了蒙哥马利。这次两人谈了9个小时。5点钟，毛说想去长江游泳，蒙哥马利应邀同他一起去。他们乘车到了一艘汽艇上，然后下水游泳。根据蒙哥马利的叙述，毛在大约60位年轻人和助手的护围下在每小时流速为4英里的江水中“漂游了大约1小时”。等毛淋浴后，蒙哥马利送给他一些英国香烟。毛给了译员，因为他只抽中国烟。这位英国来访者发现毛进食很少，不喝酒，只喝水和茶，不吃药丸。

蒙哥马利评议道：“再过50年，你们就了不起了。”

（几个星期后，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解释说：“他的意思是说过了50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

毛的答复同以前的回答不同。他说：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16世纪不算，那还是中

世纪。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

后来，毛去看一出猴子降伏妖精的传统题材的戏剧，在郭沫若的鼓动下，他写了一首诗作为评论：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尤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几天后，毛又赋诗一首，与一位诗人（指陆游）咏梅的作品相对应。诗曰：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 1962年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举行的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毛生涯中的最低点于1962年1月降临，那时他不得不在七千名干部参加的大会上接受对他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严厉地批评了毛“大跃进”期间的政策。他以湖南农民为例证—这对毛是最严重的打击—来证明“大跃进”之后的经济困难只有30%属于自然灾害，70%则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

刘直言道，“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得太快，因为3年跃进后，平衡遭到破坏。从现在开始，要用8年到10年来恢复正常秩序。这还没有把一切都计算在内……主席说形势大好，指的是政治形势很好，不能说经济形势大好；相反它很不好。

在党的全体精英面前，毛选定的接班人公开把毛当做靶子，刘说：“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毛像是一个热情过分的愚笨之人被推在一旁。他在1958年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又恢复了名誉。流传于干部当中的笑话之一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毛对所有这些的答复是，群众会作出最后的结论。他同意，党的领导人应当把自己暴露给群众加以评判，尽管这意味着会被“淘汰”。

“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

“……我不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

毛宣称，党的集体领导应按照高度民主的路线实施，“拿中央党委和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的。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最后，毛又回到自我批评上来，“……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

听众笑了。

毛继续说：“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做一篇检讨。那不是对待批评的方式吗?

是年夏天，刘如此大胆地在事实上继承了毛的衣钵，以至再次印行了他过去的一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著作中有一段话说：“在过去某一时期内，某些教条主义的代表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忠心和热情。我们党的任何人都无权要求普通党员支持或拥护他做领袖。

上述话在40年代原是矛头对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但在1962年，它肯定是被当做双关语来阅读的。

毛后来评价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唯心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的优点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正是这一特质，使他在糟糕透顶的几年经济混乱中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中间阶级的作用，刘提出了比毛更具建设性的观点。他1960年底曾经说：“一个社会中有些资产阶级也是好事。这些人最有精力，而且他们能钻空子……他们之所以钻空子赚钱是因为他们发现

了我们计划中的漏洞。我们的漏洞因此也就被堵上了。当他们开始干什么事情时，我们也应该开始干同样的事情。

一年以后，刘又写道：“有地下工厂很好，他们那里不欺骗顾客；他们生产的东西有用。”1962年，他甚至声明称：“在过渡时期，一切有助于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办法都可以采用……工业必须退回到一定的程度，农业也必须这样，实行包产到户，允许私人有自留地。

在1962年9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彭德怀提交了5份农村实地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是他在1960年至1961年受处罚期间写出的。这些批评毛的8万言书被贴上了自我辩解的标签。但是，这一次彭得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支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持会议的毛虽低头接受批评，但对恢复彭德怀的权力则不予理会。

在为“大跃进”期间下台的干部们恢复名誉的问题上，毛签上了他的不同意见：“最近的翻案作风是不正确的。”

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讲话中，毛大谈特谈国际事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方面还有些实际的东西可言。50年代初期，他对第三世界一直过于悲观。那时，他相信，“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党恐怕会受摧残”，但并不等于毁灭。

“第二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

中国的任务是支持这些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要团结这么多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到现在为止，江青治愈了她的癌病，并从长期的病痛中完全恢复过来。她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疗效，是因为经过了一系列的针灸治疗并有一套严格的锻炼计划，包括游泳，打中国太极拳和乒乓球。9月，江挣脱了毛和党中央缚在她身上的茧丝，作为毛的妻子在招待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第一次公开露面。

9月30日，《人民日报》在设计微妙的政治新闻版中，刊出了第一张官方的毛和妻子与苏加诺夫妇合影的照片。中国民众很容易看到它，因为它登在第一版。而刘少奇及其夫人与苏加诺夫妇合影的照片则登在第二版，但5天前，这张照片已刊出过了。江青对刘的夫人捷足先登非常生气，同时她的对手则抱怨江青的照片刊出的位置较好。在以后的几年中，人们不断听到这两位第一夫人之间的相互埋怨之声。

毛宣称要阻止这场可爱的争吵。1962年期间，他的第一位岳母，他所热爱的老师杨昌济教授的遗孀去世，毛给她的家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在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计算的70大寿（据此，第一个生日实际上就是降生的那一天）上，毛写了一首诗作为对人生又一年的了结。据说，这位老人并未想把它写出来。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3年初，他在和郭沫若的一首诗中，恢复活力的迹象更为明显：

小小寰球，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

飞鸣镝。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毛仍在送到他桌子上的文件里加评注，这是他的老习惯了。1963年5月，毛在一个评注中明确地暗示了将要到来的斗争。

他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如果不开展这三大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

毛决定从这一认识出发开展一场全新的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便为他东山再起开辟道路。他告诉中央委员会，这样一场运动应当是持久的，几乎“需要五代或十代人”，以纯洁共产党的队伍。他把这场运动描绘为“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来没有的”。如果广大党员在运动中得到净化，那就是成功。“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儿女勾搭。

中央委员会在杭州通过了毛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教育范围的十点纲领。但4个月以后，刘少奇则以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方式重写了这个纲领，以强调发展生产的作用，鼓励私人小块土地经营，调动具有创业精神的和先进的“富裕农民”的积极性。

对毛来说，应被放逐到古巴的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的请求，于8月份发出一份支持美国黑人的声明，并不是太大的安慰。这是毛在60年代为第三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暴行所做的八次呼吁的第一次：

>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
> 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
> 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
> 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
> 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

8月，毛告诉某些非洲来访者：“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的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

“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8月份，毛还谴责了南越反共政权迫害教徒和美国违反《日内瓦共同协议》的行径。他声称：“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主义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

9月6日，中苏两党旷日持久的九次辩论中的第一次辩论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发出一封信。信中的某些部分是毛在康生和陈伯达的帮助下撰写的。

对于赫鲁晓夫的苏联站出来反对他关于南斯拉夫的某些评论，毛究竟是怎么想的呢？9月底，毛写道，此事的教训是：“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



>>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姆斯和夫人

赫鲁晓夫于11月份给毛发出一份私人信件，希望说服毛在联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毛曾拒绝过到莫斯科访问的邀请，并把与苏联人的斗争看得异常严重。7月份，他亲自去机场迎接从毫无成效的莫斯科谈判中归来的两位不驯服的助手彭真和邓小平。毛对赫鲁晓夫的“情书”未作公开答复。中央委员会则用下述不合作性的措辞回复了这封信：如果你在某些领域需要中国专家的帮助，我们将很愿意派他们前往。〔25〕

12月，毛就共产党干部的表现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两位湖南领导人，包括华国锋，因其工作方法受到毛的表扬。毛很欣赏地把他们同那些“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的干部作了比较。后者对其他地区的事很少有兴趣研究，只把目光局限在本地区或本单位，“这叫夜郎自大”。〔26〕

当人们只盯着脚下时，便看不到山上和大海那边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夸口。但是，他们一旦抬起头来，看到广阔的世界，万花筒般的人间事务，壮观而宏伟的人类事业，丰富的人类才能，广博的知识，他们就变谦虚了。我们献身于改造世界的任务，一定不要只盯住眼前的工作和幸福。而且还应当着眼于我们大家遥远的将来的工作和幸福。马克思列宁主义会帮助我们克服由于小小的成功或小小的成就而带来的小生产者的自满……

谦虚和自卑并非同义语。谦虚并不意味着小看自己；它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态度和进取的精神，能使一个人客观地看到事实。而自卑则是非现实主义，缺乏自信，害怕困难的表现。自卑和自我吹嘘，或者基于主观主义之上的优越感都是错误的。他们代表着两个极端和两种对自己错误的主观估计。自夸的人脱离现实，过高地估计自己，夸大他的实际能力和作用……自卑的人明显地与自夸的人相反，但他恰恰

也是不现实的。他过低地估计了自己，小看了他在革命中所起的或将要起的作用。结果，他失去了进取的勇气和信心，松懈了斗志。

毛在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命运处于最低点时，写下了这些话，[13]他的眼睛牢牢地停留在经济恢复后的远景上。

25　孤军奋战（1964~1965）

70岁的毛泽东依然激情满怀，宣称他想率领一组专家徒步或骑马考察黄河，从入海口起一直到源头为止。他还指示助手们练习骑兵并翻阅有关背景资料作准备。黄河使毛着迷，毛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并发出许多治理它的指示。但是，考察的特别计划并未付诸实践，而其他计划—这些计划实施的结果更富戏剧性且影响也更广泛—却改变着世界。在1964年和1965年这两年间，毛放手让刘少奇先按照他的保守路线治理中国。同时毛在加紧准备，想杀一个惊人的回马枪。此时，他的健康状况尚好，70岁生日刚过，他便宣称：



>> 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

“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一年不找他，算他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的。完全听他的（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过那么多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

“一个人如果不劳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

在指责其同僚的腐化生活的同时，毛还警告他们丝毫不能放松对苏联的警惕性。几个星期后的一次会议上，他以同样的思想进行说教。他问：“说到底，某些人病了还是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一个星期跳6次舞？还是喜欢漂亮不喜欢国家了？有些人说他们太虚弱，不能做工作。能病那么厉害吗？”

这个时期，毛遇到了一个料想不到的情况，正在中国访问的亚洲共产党领导人力图调解他与苏联人的争执。越南的拉丹和一个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1964年初率先作出了努力。但他们受到冷遇。

毛如此固执的主要原因直到7月份会见一个日本社会主义代表团时方公开表露出来。他谈到了被苏联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的问题，并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1954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2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2亿……100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威，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

毛开始构思存在于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立）之间的中间国家的概念。他告诉一个法国访问团：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不再作美国的代理人的话）、日本和我们—是第三种势力。这对于一个共产党领袖来说是相当离经叛道的论点，这个论点在其他国家的首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在经历了与苏联的风暴之后，毛明显地愿意和西方资产阶级往来。1964年，在评论赫鲁晓夫提出的改善关系的建议时，毛同意可以讨论边境问题，“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物品重、笨、价贵，还要留一手。”“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毛通过关心前幼帝宣统，即人们较为熟知的爱新觉罗·溥仪，树立了他的“宽容”形象。在纪念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的时候，毛发出了对某些政治犯，包括溥仪在内的特赦令。于是溥仪走出监狱，并开始了在他以前的宫殿里做一名园艺工人的新生活。1964年2月，毛在一次会议上说“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他“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100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当下属们正在治理国家之际，不惯安逸的毛选择了他所喜欢的教育问题大发议论：

现在的考试方法是对敌人的方法，而不是对人民的方法。是突然袭击，考偏题，考古怪题……我不赞成……我看先出些题公开出来，让同学研究，看书再作……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他公开。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可以试点……

毛也有更多的时间顾及家庭了。他的侄女和侄子这时正在学习专业知识。1964年夏天，毛和他们作了长长的默示性的交谈。这些谈话的手抄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红卫兵的“课本”广为流传。

6月24日，毛和侄女王海蓉进行了交谈。王实际上是他母亲方面的一个亲戚。那时她正在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后来她成了外交部副部长。

王首先说：“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的用英语写。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毛问。

姑娘答道：“我就知道一条，‘蒋万岁’。”

……

“还写了什么？”毛坚持问。

“别的我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

毛答道：“好嘛！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不杀人？”

“不知道他杀不杀人，”姑娘说，“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评论道：“啊，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又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多少人？”

“大概3000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工。”姑娘回答。

“你们3000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出了一个就不得了，还要七八个，那还了得！”姑娘抗辩道。

毛说：“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为什么要七八个人！”

毛解释说：“多几个就可以树对立面，可以做反面教员，只要他不杀人。”

王继续说：“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70%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都是干部子弟和烈属子弟。”

“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毛问。

“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和你关系好不好？”毛问，“他们喜不喜欢和你接近？”

姑娘小心谨慎地答道：“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这样就好。”

“我们班有个革干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里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有团员开会，他不到，大家都有意见。”

“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毛问。

“不允许。”

毛声称：“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个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呢。”

姑娘解释：“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这个政治辅导员做的对。”毛说。

“我们这里尽是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小组学习。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只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会开会的。”

“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毛告诉她。

王惊叫道：“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毛说。

姑娘表示反对：“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姑娘道：“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你这个人啊！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形而上学。”

后来，话题转到了杜甫的长诗《北征》上。

姑娘问：“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到影响。”

“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啰！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不读。”姑娘答道，“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毛又问：“‘知识分子’英文怎么讲？”

“不知道。”姑娘坦白。

“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毛说。

过了一会儿，姑娘答道：“糟糕，你这本《汉英字典》上没这个字……”

“等我看一看。”毛说，“……这本《汉英字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我们学校怎么能编字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你们学校这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字典来？……”毛坚持道。

姑娘说：“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毛在提出一些建议和一个警告后，结束了这次谈话。

他告诉王：“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搞什么‘5分’，也不要搞什么‘2分’，搞个什么‘3分’、‘4分’就行了。”

“为什么不搞‘5分’呢？”姑娘问。

“搞‘5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生活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

两个星期后，7月5日，毛和侄子远新作了第一次长谈。这样的长谈共有3次。此时这位年轻人尚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位颇具天赋的学生。自40年代初，其父被处死后，他便进入毛的家庭。毛以一种父爱般可爱的语调开始了这次谈话。

“这半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毛问。

侄子支吾道：“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毛似乎从中得到了某些慰藉。

“我看还是有进步的。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么简单了……”

……

“你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毛挑衅性地问。

远新答道：“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那不一定，谁知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侄子认为：“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评论道：“……到底谁打谁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握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都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

侄子谈了在学院中受到的政治教育。毛还鼓励他进行适当的锻炼。

“水，你已经认识了它，制服了它，这很好。你会骑马吗？”

“不会。”远新坦白。

“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你摸过枪没有？”

“有4年没摸了。”这个年轻人承认。

毛搞不清不懂射击的侄子应属于哪种士兵。远新回忆说，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岸上暖和，他上来后觉得很冷，说：“还是水里舒服些。”

此话一出口，毛便生气地瞪了侄子一眼说：

“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吃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我还有点希望吧？”年轻人问。

“有希望好！……你要特别学会与你意见不同的人在一起工作。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吃的是蜜糖，耳里听的是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

在毛的的诘问下，侄子透露，他的课程不允许他有很多时间搞政治或接触普通群众。

毛非难道：“不对。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毕了业。不然，军事工程学院让你毕业，我还不承认你毕业。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学毕业？”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去看科学新成就展览会，毛发问：“你怎么对这个有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

无论如何，侄子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只能说：“很少看，看不懂。

正是从上述这些谈话中，毛逐渐下定决心，要造他的同僚的反，以阻止党的明显的资产阶级化。

他的妻子江青也给他提供了依据。江正开始进入中国传统戏剧改革者的角色。1964年，毛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现代戏并提出了很多建议。然而，毛的一些同志对江青干预传统戏剧并不像毛那么充满热情。

北京市市长彭真评论说，革命戏剧“尚处在穿开裆裤、吃别人奶的阶段”。江青寻求邓小平对其工作的支持，但邓的反应仅仅是：“对她的戏剧改革，我举双手赞成，可我不会留心去看演出的。

是年夏天，邓又公开表露了对江青不断增大的政治作用的不满。毛的许多同僚亦有同感。邓说：“有些人企图通过批评别人为自己赢得名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没有人怀疑，他指的是江青。然而，1964年底江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她积极准备着在时机到来之际支持她的丈夫。

8月，毛在一次哲学讨论会上说，学生应当下到农村中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即使他们身体欠佳，也应如此。“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工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5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5个月，工厂去5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康生插话，抱怨北京的一位一流经济学家[14]“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在此，毛以惊人的对资本主义的辩护作了回答：“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

毛继续为他曾经给予中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大而惋惜。“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15年，三分之一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

9月，在杭州，一个法国使团在毛的乡间别墅里和他一起度过了两个半小时，并发现毛的健康状况不好。一个法国人认为毛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震颤性麻痹症的早期阶段。其他法国人则认为毛可能得过中风。当毛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有位助手陪护着他，不时轻轻地引导着他走路。

有个法国人写道：“毛不停地吸烟。从他晚间扔掉的烟头数量来看，显然他是位一天三包的人。他患有严重的吸烟者常患的咳嗽症，喘气很重，带着清晰的咝咝声。”

“协调姿式时他也有些困难。毛是左撇子，要点燃香烟，他就得把火柴盒放在右手，然后用左手擦燃火柴。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一过程，毛把双肘置于椅子扶手上以稳住自己。

一位法国人谈到了法国在东南亚的“新作用”，但毛打断了他的话。

“自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在亚洲没有作用了。让我告诉你一些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的情况，在奠边府，许多持枪者是中国人。”他说。

在回答经济问题时，毛平静地说：“中国人没有经济计划……我们做过一个长期计划，但错了。从国外借用的太多了。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比你们少，我们还没有把一切事情办好。

10月，尼赫鲁来访。毛对他解释说，中国不想打仗，没有原子弹。即使其他国家想打仗，那对整个世界来说也将是一场灾难，会死很多人。毛相信，原子弹不会毁灭整个人类，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想和谈的政府。尼赫鲁答道，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他知道原子弹的毁灭性。他相信，没有人会从核战争中逃生。毛反对说，大概不会这样。现存的政府可能被消灭，但其他政府会起而代之。

中国的核试验实际上是在1964年10月16日获得成功的。它既标志着毛在5年前苏联核顾问撤离中国后的“单干”的决心的胜利，而且更特别地标志着从事核试验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核科学家的胜利。后来，在一次讨论经济计划时，有人说中国必须赶超其他国家的技术水平。毛赞同道：“是的，我们要有……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

在12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对共产党的15年统治所作的总结是：地主和富农乃幕后主宰，主张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腐化干部则在台上表演。为了农村社会自身的改造，必须纯洁那些正在指导改造的政治机构。有必要向贫苦农民表明，他们可以像以前斗

争地主那样斗争坏干部。至于堕落的分子，我们应给他们贴上“新生资产阶级”的标签。

有位与会者建议，让普通群众来处置腐化干部，因为群众是宽容和通情达理的。毛反驳道：“有时不能这样。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会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

艺术家的背叛也没有逃过毛的注意，他在同一个会议上讲，音乐家傅聪已经跑到美国去了。我说这是件好事。让这种人留在国内有什么用？

1965年1月，毛和埃德加·斯诺在晚宴中谈了4个小时。斯诺报道，毛适量地吃了一餐湖南饭菜，“喝了一玻璃杯或两玻璃杯的中国葡萄酒，和过去一样，极为搪塞。晚上，他大概抽了10支香烟。”

毛透露，他读了马克斯威尔·泰勒将军的书《音调不定的号角》。他说，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但，赢得过从英帝国主义那里获得独立的进步战争，然后又赢得了创建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国内战争。华盛顿和林肯都是他们时代的进步人士。当美国首先建立共和国时，引起了欧洲所有戴皇冠者的仇恨和恐惧。美国人是革命者，现在他们需要为摆脱本国的垄断资产阶级而斗争。

苏联批评中国“搞个人崇拜”，有证明吗？毛认为，斯大林一直被说成这种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大概正由于赫鲁晓夫没有这种个人崇拜，所以他跌倒了……

毛说，他读了美国人在贝肯尼岛核试验6年后所做的有关这一地区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老鼠、鱼、鸟和植物生长状况良好。对细菌、鸟、老鼠和树来说，原子弹的确是纸老虎。对人可能不同……毛

说，他听说美国有部电影叫《在海滩上》，显示了核战争给世界所带来的末日。那是一部科学影片吗?

斯诺询问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毛答道，他的确不晓得。有些人说6亿8千万或6亿9千万，但他不相信。怎么可能这么多？农民有时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斯诺问道，他能否从毛这里给约翰逊总统带个信儿。片刻的沉默后，回答是：不！然而，毛的确期望改善中美关系，尽管在他的有生之年没人强制他这么做。此时，毛正准备很快去见上帝。在谈话中，他回忆了两个弟弟、他的第一个妻子以及他们的儿子是怎样被杀的。多么奇怪，直到今天，死神依然从他身边溜走。他不止一次地准备过死，但死神似乎不需要他。

中国将属于后来人，他们应当比毛更富有知识，将根据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开展革命工作。活在人间的毛变化得越来越快。他说，从现在起，1000年后，我们所有的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可能显得荒唐可笑。

关于目前中国的政治，毛没有向斯诺谈得很多。6年后，当他们再次重逢时，毛解释说，1965年，有许多权力已滑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但是，他准备东山再起。所以，第一步发动了一场无关痛痒的试验性运动。

毛向同僚们提交了一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23条纲领。刘少奇的反应十分消极。后来，毛披露正是这时提高了他对刘的警惕。

毛的23条中的第一条是讲，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必要性。刘少奇无疑从这种威胁里看到了一场没有必要在领导层内进行的制造不和的政治迫害。但是，他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必然会

使他在公众面前自我确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1月底，毛决定刘必须“开路”。

毛还得出结论，官僚事实上已经变成一个新生的统治阶级。他写道：“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是非呢？毛要求每个中国人都要学习模范农业生产队大寨，那里不存在这些弊病。

3月，毛向来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访问者提出了坦诚的军事建议：“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上学，学军事。我劝他们回去。不要学太长。几个月就行了，课堂上尽讲，没有什么用处……大多数时间可以在本国，或者根本不出国，就可去那里。

1965年春，毛继续在华中和华南作长途旅行，以准备发动反对刘和其他人的运动，并促使外国人加强对其健康状况的窥察。5月，他在过了40年后第一次回到井冈山根据地。他曾经在这里创建了现在他企图扩展到全中国去的程式。5月27日清晨，毛爬上了通往顶峰的山坡，纵观昔日每天生活于其中的景色。他把昂扬的激情渲泻在一首诗里：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西方报刊报道了下述传闻，说毛得了中风病，正住在上海或杭州的医院里。据言，他在某个公开场合行走困难，不能说话。毛曾承认他所发表的东西并非都出自亲笔：“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他带着痛楚的表情又说：“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这大概指的是江青和陈伯达。

毛当然在1965年去看医生了，而且这促使他发出了一个对医生大加嘲讽的指示：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

8月，一种世界上最为畅销的出版物《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第一次面世，它成为毛重新掌权的宣言。“红宝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林彪作为毛的新国防部长，印了一批毛说过和修改过的话在军队中散发。一两年后，林在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上开始了用醒目的粗体字在方框内刊印毛的语录的习惯。1964年，林又印制了一种由摘录毛的著作中的某些段落编辑而成的袖珍书本，以便士兵们带在挎包里。它就是1965年8月1日面世的第一个正式版本的《语录》的原祖。在以后的几年中，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的这本《语录》不断重印发行。

1965年8月3日，毛对即将来临的事件作出了最为明确的暗示。安东尼·马尔罗递交给毛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并与毛进行了长谈。当时在场的有刘少奇、法国大使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毛谈到了知识分子的恶劣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人中的影响。鲁歇·佩耶尔大使表示异议，在他看来，中国学生是信仰毛的理想的。毛对此表示怀疑。

毛说："青年人必须经受考验……"—这是对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暗示。马尔罗注意到，毛仿佛是在向一个想象中的反驳者演讲，仿佛在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必将如此。"—甚至仿佛正在通过马尔罗说给刘听。

毛声言："苏联修正主义是……叛徒，正在复辟资本主义，不知道欧洲为什么不满意。"

马尔罗不同意地说："我相信他们并不想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

"他能肯定吗？看看南斯拉夫！"

马尔罗发现毛走路时僵硬而缓慢。但他评论道："并不衰老。他富有康门迪图尔塑像般的那种不平衡性。走起路来像是从某个帝王墓穴中钻出的传奇性人物。"

毛说："赫鲁晓夫似乎认为，共产党一掌握政权，革命就算成功了。—仿佛革命只是民族解放问题。"

接着，毛又嘲笑了考茨基的遗训"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评价说："当然！游泳是穿运动裤的途径之一……它不是用赫鲁晓夫代替沙皇，用另一个资产阶级—纵然它被释作共产主义者—代替这个资产阶级的简单问题。就像妇女一样，当然有必要首先给她们法律上的平等。但此后仍有工作可做。我们认定导致中国停滞不前的思想、文化和习惯必须清除，尚不存在的无产阶级中国的思想、文化

和习惯必须树立。中国女性的形象还没有在群众中树立起来，但她开始想树立了……革命……没有胜利，它需要几代群众和干部的共同努力。”

他们一直走到马尔罗停车的台阶那里。毛又说：“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是孤立的。”

“并非第一次。”马尔罗说。

“我会单独和群众在一起。等待。”这位法国人发现毛的语调中带着怨恨、嘲讽，特别是自豪。他并不是代表同僚们说这番话的，因为他把他们丢在后面，无法听到他的话。只是在离开同僚后，毛才开始慷慨议论。他走得比他的身体所允许的速度更慢，目的是要和一位同情其处境的外国人多谈点个人见解。



>> 再见—1965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外宾（杜修贤 摄）

毛继续说：“修正主义毁灭革命。我对你讲过革命也要有感情……可人们不想终生负有革命负担。中国共产党人只有1%在农村，党的老卫队中的幸存者一直长于行动；另一方面是整个教条主义的青年一代，教条主义牛粪不如……不管你们的大使怎么想，年轻人正显出危险的倾向……是该表明还有另外一些人的时候了。”

道别的时刻终于到了。

“我是孤立的。”毛重复道。突然，他又放声大笑：“嗯，有些远方的朋友，请转达我对戴高乐将军的敬意。

此后不久，毛在一首诗中讥讽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形式并激励自己去斗争：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林彪是唯一坚持支持毛的人物。毛在9月和10月企图说服同僚们在党内进行新的整风运动的努力没有成功。其他人仍在批评毛。刘少奇和邓小平甚至力主恢复同苏联人签订的条约以保卫中国免受轰炸越南的美国人的袭扰。

无论如何，毛坚决反对这种主张，并坚持中国必须有自己保卫自己的信心。反过来，其他人则拒绝他要求急剧改变文化和教育政策的提议。彭真宣称：“即使是主席，如果错了也要接受批评。”邓小平日后则被断言为“冷酷地割断了与毛的联系”。

毛意识到他在北京是无望的，这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谨慎而无决心。作为一种特有的姿态，他离京前往南方并绝望地转向他妻子那

一派政治朋友方面。在周密地安排好他的最后一次庞大的政治运动后，毛长达9个月没有回首都。

26　文化大革命（1965~1966）

毛用来反对党内保守派的直接口实是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保举的人—吴晗所写的戏剧《海瑞罢官》。它是毛所需要的巨大震动的前奏。基于明朝一件小事写就的这个剧本，事实上很少暗含着对1959年彭德怀事件的评论。其主调可以从其中的一段台词里得到评判。那是一位大臣—海瑞（即彭德怀）说给皇帝（即毛）听的：

“……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大小官员谁都知道。”(15)

中国读者不会不去类推。

后来，毛在北京向朋友们解释，他“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江青抱怨右倾分子通过秘密打入其组织的代理人密切注视着这一事件的进程。

“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尾随着；他们安装了窃听器，对主席、林副主席、总理和我搞间谍活动……然而文字工作毕竟在上海党的第一把手柯庆施的帮助下，由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完成了。

1965年11月10日，第一篇文章在上海刊出。但不管怎样，北京的《人民日报》不予理睬。第二天，彭真让一位助手给上海挂电话，想找出是谁未征询他的5人小组的意见便赋予作者这样的权力。北京的5人小组是负责文化改革运动的机构。张春桥答道：“毛泽东。”彭

的助手未发一言便挂断了电话。12月，就全国范围内刊印这篇文章的问题，两个城市之间展开了意识形态之战。月底，彭真在北京党的一次会议上问他的一位同事：“吴晗现在怎样？”

回答是：“吴晗很紧张，他感到批判是有来头的。”

彭说：“不管有无来头，我们只追求真理。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11月29日，毛使上述问题进一步激化，他在其盟友林彪控制的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上刊出了那篇文章，并在电台里进行了广播。这样一来北京再无借口可凭，只得照做。直到彭真仍然可以把吴晗当做替罪羊推出来，让他向毛投降，从而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力。但是，他作了支持下级的选择，这就使这场斗争演化为彭与毛之间的抗衡。

毛正在充分利用他的“秘密武器”—他的个性和卫队，特别是8341部队。早在夏天，毛就通知该部到农村和工厂去宣传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在杭州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毛向科学和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发起了攻击。彭真出席了这次会议，此时他是毛的主要对手。毛把注意力集中在干部、学生和农民之间不断增大的令人震惊的鸿沟问题上。他说：“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特别是人文学科需要改造。毛点出了吴晗的戏剧，认为它有敌对性。

接着，毛话锋一转，以其领袖特有的方式提到了伯翰德·罗素的一个进步，“罗素送给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一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这转而引出了一种对社会折中主义的不寻常的辩护：“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能光同左派接触，还要跟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

接着，亲毛的一位激进者做了极富谄媚特征的插话。而后，毛认为人们应当用更为大众化的形式写作。

“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毛抱怨道。

“主席除外。”陈伯达插话。

这次，毛接受了恭维，而在其他场合他通常是迅速地加以反驳的。

毛很不谦虚地赞同道：“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然而，在清党的问题上，毛依然没有如愿。后来，他回忆说：“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

1965年在家庭的聚会声中结束。毛的儿子岸青及其妻子探望了这位老人。根据这对青年夫妇回忆，毛“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诗。

毛和江青所生的女儿李讷也长大了。1966年，在她学业结束时，毛为她题词，内容是四条建议：

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1966年一开始，这位姑娘的母亲江青便以毛的思想为依靠迈出了进入政治领域的决定性步骤。她与林彪达成协议，主动让国防部长同享她的文化特长和作为主席的妻子的有利政治条件。林则在军队等级的最高峰给江安排了一个职位以示回报。林交给江一个任务，去上海负责召集一次部队的文艺座谈会。

在江青抵沪前，林告诉他的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这预示着毛的妻子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她开始被描述成“折射阳光的月亮”。用她自己的话说，至今她依然“作为主席的秘书而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国际问题。在文化和教育领域，我算是机动哨兵。就是说，我订阅一些期刊和报纸，进行仔细检查，把所有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东西提交给主席……许多年来，这一直是我的主要工作内容”。1966年以后，她又把这些职责同作为中央委员会常委秘书的职责结合了起来。

林在公开讲话中，对毛是千吹捧万奉迎。他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不得不违背自己较为理智的评判容忍上述颂扬，因为林实际上是他在党的高级官员中的唯一同盟者。同时，毛正在宣扬造反的理

论，特别是造宣传部的右倾分子的反。因为他们正在“取缔和压制”左派的工作。2月，毛抱怨：“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同月，他还指出：“愚民对专制君主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

然而，政治局在毛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了彭真的决议案，有效地挫钝了文化革新工作的锋芒。对此，毛表达了他的强烈不满。8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声讨了北京市委的罪状，第一次谈到了需要一场文化革命。

毛离开杭州后，继续前往广州郊外的从化温泉别墅，一星期后，他经历了最后一个促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挫折。一个同情莫斯科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了他。毛告诉他们，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最迟在两年内”发生。他预计俄国会把美国对中国的进攻作为它占领中国东北的前奏，“结果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军队隔长江对峙。”（他的预言并不像40年代那样准确。）

日本共产党人请求毛采取积极措施转运苏联援越物资，当时这需要忍受美国人的轰炸。毛极为震惊。他决不会同意运送来自修正主义苏联的援助，哪怕它是对第三国的。（中国人继续援助越南。战争结束后他们宣称，给予越南的支援要比苏联人多。）毛的一位助手向他披露，苏联人一直在利用中国铁路向北越运送军用物资。

毛对于他们忽视如此重大的问题十分气愤。他当着日本人的面向助手们大喊：“你们待在北京的人都缺乏判断力！”由周恩来和日本代表团签署的涉及中苏两国支持北越的联合行动的公报，在毛的盛怒之下被废弃了。日本人想就援助越南共产党人这样单一的问题在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进行调停的努力失败了。

毛在日本人面前对自己的脾气稍加掩饰后，于同日晚些时候发出一道命令解散原党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和负责文化改革的小组。他投身到与彭真的全面对立之中。

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了，它谱写着毛漫长而功勋卓著的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诗篇。毛自己把这场革命描绘为“课堂里学不到的政治课”，然而这门课把中国导向了“混乱的边缘”（毛的大多数同僚会说，已越过了边缘）。为这场革命设计的方法则含有雪耻的因素。

江青对此作了最充分的界定，她说：“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50天（1966年夏，毛一度被迫离开刘少奇的北京王国）和17年（1949年至1965年，毛的话未得到遵从），而且是19年到30年。这大概是毛在漫长的生涯尽头，为实现至今仍令他难以着手的所有改造和革新而做出的孤注一掷之举。

由于认定共产党自身已经变成了官僚主义和反革命的党，所以大街上的普通群众必须与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毛和两部分人结成联盟—军队和学生—以强力推翻党。他之所以能依靠军队，是因为军队忠于他和他的追随者、当了7年国防部长的林彪；他之所以能依靠学生，是因为青年一代总是激进的并时刻准备剥夺执政的守旧者的权力，而不论其政治色彩如何。

“文化大革命”在三级展开。一级是在毛和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局对手之间展开的“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另一级是贯穿全国的为获得更高水平的民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而进行的改造运动；最低一级是短期内破除强制性的法律和法令以便地方上的宿怨得到解决。权力角逐必然会显出雌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团的。

那些洞悉毛的坚定意志的人很清楚该干什么。4月14日，毛的诗友、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承认：“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在写东西，也翻译

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

5月，毛在杭州[16]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充斥着他的支持者。会议完成了清洗彭真和其他一些“右倾分子”的任务；任命了一个新的激进的负责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小组，其成员包括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会议花了12天的时间来说服彭真承认错误。毛就新形势问题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通报，虽得到政治局的赞同，但直到一年后方印刷发行，原因是当时毛尚未控制新闻出版业。

毛发出了一个暗示，那是他将来真正追寻的目标。他坚定地告诉政治局：“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身旁……

毛的支持者说，“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不久的将来会证明，他们就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不忠诚。

毛得到了庞大的军队的支持。在“文化革命”开始的几个星期内，林彪把完全忠于他的38军调入北京以确保运动沿着他及其老板铺设的轨道运行。5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开始露出真面目，他作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讲话，提出了右倾分子要搞他认为现在“成风”的军事政变的警告。自1960年以来，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发生60多起政变；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中国今天“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笔杆子、枪杆子，

夺取政权非这两个杆子……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

“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5月25日下午2点，第一张大字报由一位激进的响应毛关于批判“右倾主义分子”的新号召的教师在北京大学贴出。这似乎又是一次“百花齐放”。毛从杭州打电话给康生，告诉他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在电台上广播。如此一来，这个事件便从不为人知的状态中走出来。

对毛的神化正在升级。6月10日，《红旗》发表了一篇社论，说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就像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不停地前进，就像地球上的河流和溪水无尽地流淌。7月2日，另一篇中国报刊上登载的文章声称：“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精神原子弹……”

7月8日，毛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对这股相互激荡的潮流，特别是3个星期前林彪向政治局所作的夸大其词的讲话进行了批评：

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给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悲叹他的同志们经常不相信他犯了错误并且必须改正自己：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自信，强有力。—著者），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机敏、冲动、多变。—著者)。

在此毛引用了汉代的一个格言："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他对江青说，最后两句话，"正是指我。"—他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也曾说过这两句话。

毛推测，崇拜者们抬举他的意图，与前几代人在新年之际把钟馗的画像贴于大门上为其家庭避鬼出于同一道理。毛写道："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的钟馗了。"但是，吹得越高，摔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世界上100多个共产党的大多数不再信仰马克思主义了。"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告诉妻子当前在文化革命中的胜利不应是她首先考虑的事，"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不知讲过多少次……"

毛又说，他在给江的这封信里所写的东西不要刊载，"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时，由他们来公开吧。"毛的最后一句话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这段时期，毛一直旅居中国南方。不断有传闻说，毛的健康状况欠佳。1966年春，曾经传说毛由于肺结核、黄疸和高血压而失去了知觉。有家报纸说他被确诊为动脉硬化。5月份的另一则传闻说毛正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于桂林的避暑胜地疗养；他的饮食受到严格限制，以便使他恢复精力，摆脱高血压的困扰。是年晚些时候，香港盛传毛得了喉癌，无法在公共场所讲话。



>>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由于上述传闻的影响，所以，当72岁高龄的毛于1966年7月16日再次畅游长江的消息公布时，整个世界—更不必说中国—都震惊了。《人民日报》一直等到9天后，才把这一消息告诉中国百姓。毛借助水流在65分钟内游了9英里。他身后跟着5000名年轻的游泳者，他们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沿长江一线游泳的比赛，它是10年前由毛首创的。

两天后，毛返回北京。从政治上讲，理应是他取得了胜利，但他自己却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

几乎是一到达首都，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打电话鼓励清华大学的造反者（他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贴出大字报声讨右倾分子），并亮出了自己的立场。

他告诉他们："看来我必须亲自考虑一下这场革命的结局。我是站在正确的一边吗？不是这么个问题！运动结束时中国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天下而是资产阶级的天下吗？绝对不会！我为什么要害怕？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第一阶段过后他们想要干什么吗？诽谤、恐吓、威胁、讹诈—把'造反派'弄到各地，打棍子，一位'大将'的责难之声灌入人们的耳中。这个"大将"当然是刘少奇！

那时，刘少奇大概还不知道，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在一张大字报中批判了他。1961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试验中，有些"志愿人员"甘受铀同位素的侵害，大字报就这一丑闻进行了评论。

毛召开了系列的工作会议以指导"文化革命"的开展。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宣称："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时，毛尚未认定有必要清洗高级领导层。他说："我回北京4天后还倾向保现成

的。”不出所料，毛表扬了大字报，并特别赞赏地提到了那张引发了整个运动的大字报。

有些中小学的革命学生，即少先队员，给他们的爸爸贴上大字报，抱怨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赏。

毛要求把他的话转达给那些少先队员：“大字报写得好。

毛告诫同事们不要带着忧虑的眼光去看事情，或者说，应当正确对待那些需要他们帮助的人。

“好人来了，你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乱的地方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领导？……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毛谈到了残酷的革命逻辑：

准备革命到自己头上来……现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

有的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永远过不了关。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放不放？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是不行的。

几天后，毛召集了一次高级领导人会议，决定撤掉前些时候刘少奇派出去执行整风任务的工作队。现在，刘意识到他无疑是毛的敌对

目标。刘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内心烦躁不安。他告诉女儿：“他们想让我做自我检查，是吗？如果他们让我去你们学校做自我检查，我会去的，因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应当参加点劳动，帮助写墙报，擦地板。这样，同学们就不会指责你的行为像个官僚和贵族了。”

不管怎样，这个女儿是站在其造反同学一边的。这是由于毛的作用，而非她父亲的作用。当她提出父亲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时，她妈妈怒气冲冲地开口道：

“你父亲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有许多事情他不能告诉你。可你总是给他施加压力。”

刘对女儿说：“如果你感到这个家庭对你有害，你可以与它脱离关系；如果你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我可以给你钱。”

几天后，刘向女儿承认，他“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表示愿意重新改造自己”。

与此同时，毛正在鼓励红卫兵。8月1日，他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们所送的大字报已经收到，你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地支持”。

最后，毛进行了讨价还价：“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

8月上半月，毛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会议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进行“文化革命”的决定。一年后，毛告诉一些阿尔巴尼亚的来访者：“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

通的。苏联人宣称，全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91人中仅有56人，8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仅有33人，参加了会议，走廊里则充塞着年轻的红卫兵。

会议第一天，林便定下了奉迎的调子。他告诉同志们：“我最近的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以毛主席为轴心，我们作磨盘……他……有许多想法，我们是不理解的……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一切按主席的指示办事……

第四天，毛严厉地声讨了他的对手们：

我感到危险。他们指示学生革命，但当人们发动起来时，又想压制。所谓方向和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克思主义，都是假的，存在很多年了……

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应当允许群众请愿、示威和争论。另外，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从压迫学生的文化大革命这一行为来看，我就相信没有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天，毛精力充沛地踏入竞技场，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

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少奇紧跟着坦白说，只是在读了毛主席的大字报之后，“我才开始认识自己这次所犯的错误……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

8月8日，中央委员会接受了毛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纲领，它是这场运动的蓝图。“十六条”说：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据出席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讲，毛自己在“十六条”原稿上加了话：“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来到北京的大街上，鼓励过往的行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此庆祝他在中央委员会里取得的胜利。

一家共产党报纸报道这一情景：“无法说清有多少只手伸向他。许多眼睛里充满了幸福的泪花……许多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逢人便说：‘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手刚刚触过伟大的毛主席的手！’”

8月18日，百万红卫兵分列在天安门广场上—这种史无前例的集会共有8次，这是第一次。毛向他们行礼致敬。报纸评论道：“我们将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大海航行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的太阳。”有些红卫兵领袖采用了新的名字—卫东，意即保卫毛泽东。

毛鼓励全国的红卫兵串连以交流经验。他敦促说：“现在坐火车毕竟不要钱，不是吗?

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周恩来告诉清华大学的学生，毛发现“全国几乎90%的工作犯了方向性根本错误”。武汉大学的校长[17]，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得不求助于毛制止红卫兵对他的迫害。然而，禁止对这位老学者进行体罚的官方指令被年轻的造反者置之不理，几天之内，他便死去了。

最初，毛对年轻革命者的过激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他宣称：“应当允许年轻人犯错误。”他甚至对他们结成派系并相互攻击的倾向也采取了宽容的姿态，“年轻人可能会这样或那样地看问题。看法相同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毛为“各地的所谓动乱”辩护，并在8月下旬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说：“我的意见，乱他几个

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33〕

但是，当毛的朋友，比如，老将军徐向前等人受到红卫兵不公正的死亡威胁时，毛的对策是把他们邀进中南海的家中，直至危险过去。

现在，林彪实际上已摆脱了控制，他把对毛的崇拜推到一个显然荒谬的地步。江青后来说，毛在1966年中期，已开始觉察到了林的公然不忠。9月18日，林在一篇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我们要打破洋人比中国人高明的民族自卑感……洋人、古人哪里有毛主席高？哪里有这样成熟的思想？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

毛所处的地位并不令人羡慕，他不得不依靠并非忠诚的盟友来战胜党内的顽固对手。许多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和毛大不相同。9月份失去生命的诗人老舍，据说留下了一纸自杀的遗书，谴责毛背弃了世界社会主义。与此同时，武昌的一派红卫兵指责毛谎报了一份不真实的出身证明，他们的结论是“毛主席出身于富农家庭”。

在10月份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承认了他们在派遣工作队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还通报了自己以前的错误—40年代没有充分支持土地改革中的“左”的倾向，50年代对合作化缺乏足够的热情，以及60年代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以他对刘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一系列不满回答上述坦白，这不仅仅是因为刘少奇等人所承认的错误，而且还因为他们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请示过毛。毛总结道：

文化大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待5年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谁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有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毛继续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我想在我没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广东党的第一把手陶铸评论道："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现在倒闹成独立王国……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

毛继续说："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6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

但毛又回忆说，刘少奇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曾站在他一边。"……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他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

毛用一个对他从领导第一线退下来表示痛惜的讲话结束了会议。毛也力图克服由"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突发性混乱和不安定：

……时间很短，来势凶猛……红卫兵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了起来了，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个不亦乐乎。我这个人闯了这么个

大祸。所以你们有怨言，也是难怪的。上次开会我是没有信心的，说过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是不那么理解……

我看冲一下有好处，多少年没有想，一冲就想了，无非是犯错误，什么路线错误改了就算了。谁要打倒你们，我也是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不好过，你们着急，我也着急。不能怪同志，时间太短。

几天后，在红卫兵的第七次集会上，毛抓紧麦克风喊道：“同志们万岁！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这是毛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面对面地直接向中国民众发表的仅有几句话。

红卫兵的最后一次集会在11月25日。数次集会使中国的铁路系统几乎陷于瘫痪，同时也把对神人的敬畏带给了北京市民。另外，集会肯定使各省的年青一代感到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参与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毛对其指示的贯彻情况并不满意。

他告诉红卫兵领袖：“你们贬低了我，也让中国的工、农、兵感到失望。

最后一次集会后的第二天，毛前往南方，并且长达两个月不与外界接触。他把陈伯达和江青留在北京，以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江青的讲话特点可以从下面这段文字中窥其一二，它出自毛刚刚离开北京后江的一次讲话：

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没落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和资本主义的变种。它们不可能产生任何好的著作。资本主义有几个世纪历史了，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经

典……另一方面，却有一些东西真正泛滥于市场，比如摇滚乐，爵士乐，脱衣舞，印象派，象征派，抽象派，野兽派，现代派—不一而足……一句话，都是毒害和腐化人的心灵的低级趣味的和猥亵的东西……不要打人家，打他们。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他们的灵魂。

最令江青着迷的是她作为受到公众欢呼的毛的信息传达人的新角色。她告诉面前一张张兴奋的脸：“毛主席向你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你们肯定都想知道毛主席怎么样了。让我告诉你们，他非常健康。”(18)

然而，林彪继续歪曲毛的教诲的意义。12月份，在“红宝书”—《语录》第二版前言中，林写道：“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

27　黑手（1966~1970）

1966年底，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毛身体两侧各有一名护士扶助着走路。西方报道说，毛不得不被带往医院检查。在文化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毛庆贺了自己的73岁寿辰。他曾经告诉蒙哥马利，73和84是难以平安度过的年龄。毛未活到84岁，但可以断定，73岁这年是他掌权多年来处境最为困难的一年，他必须决定在支持青年人，替换老练而狡猾的人这方面要走多远。

毛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主要牺牲品是他的老同事刘少奇。没有刘的合作，毛很可能在40年代就无法取得党的主席的职位。江青和红卫兵准备比毛走得更远，他们利用刘的女儿来打倒刘。

1月上旬，在比较激进的上海，红卫兵接管了报纸，工人造反派接管了工厂。毛完全赞成这些夺权活动，他热情地欢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在北京，周恩来力图使“文化大革命”保持在一种平和状况中。当红卫兵大喊“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时，周以背相向。只是在红卫兵高呼“打倒刘邓反动路线”时，他才转而面对其听众。他告诉红卫兵：

刘和邓仍是政治局常委成员。你们要求打倒这两个人，我很难办。毛主席给我的任务是要说服你们不要那么干。你们可以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你们不能把他们揪出来斗争……

你们打算包围中南海揪斗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你们不要采取这种行动……由于你们现在从早到晚包围中南海，在扩音器里气冲冲地讲话，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不能安静地专心致志地工作。

在另一次红卫兵集会上，江青和陈伯达号召按照巴黎公社的路线在北京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毛赞成这一思想。2月初，上海首先建立了这样一个公社。但此时毛又改变了主意。

离京两个月后，毛返回首都，并立即召见上海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讨论有关问题。这些问题在毛的文化革命思想中证明是关键性的。张、姚二人在上海的行动代表着一种比毛愿意认可的更激进的观点。

毛不同意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原因之一是国务院总理将失去首席权力。

他评论说：“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长，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是还要有长，要看内容。”

毛决心反对普遍地改换名称。“这像是我们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把北京的街道名字都改了，弄得我们没办法记住，只好记以前的名字……我认为，应当稳妥些，不要把所有名字都改了。”

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成中华人民公社一类的名字也是一样。“这会引起改变政体的问题、国体的问题和国家名称问题……如果改了，接着将是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我想苏联不会承认……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可能会引起俄国人的困惑。怎么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对他们来说那是相当难为情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可能会承认。如果统统改为人民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把党放在哪里？……把党委放在哪里？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不管我们叫它什么。

在会谈过程中，毛对一些口号进行了批判。他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他还禁止再引用他1919年的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红卫兵曾经极为成功地利用过这句话。毛声明“自己也记不住了”。他开始退却。

特别令毛失望的是，他给红卫兵的清楚解释和指示一直受到忽略。

2月，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最近以来，许多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是武斗的一种形式……（但他又说）这里我顺便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凡动手打人应依法处置。

关于青年造反派对待2月份来北京访问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过分行为，毛公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有的戴黑眼镜、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乱搞，打人，杀人，杀死了人，杀伤了人。这些人多数是高干子女。”

然后，毛对造成这种状况的以往工作中的疏忽提出了意见：

好几年前我就要洗刷几百万……他们不听话么！毫无办法……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陆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

我们过去只抓个别问题，个别人物，53年冬到54年斗了高、饶，59年把彭德怀……整下去了。此外，还搞了一些在……农村、工厂的斗争，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都没有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上而下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这次要搞文化大革命。

在一段有趣的离题话中，他又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2000多个县，一个县选举2个就4000多，4个就1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都没看见我么！见都没见，怎么选呢?

到2月中旬，文化大革命几乎超出了毛的控制。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老一辈人。毛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保护剩下的政府高级官员免受攻击。只是在这个决定作出后，周才第一次出来公开谴责刘少奇。然而，周的一些同事却拒绝做出策略性的姿态并继续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像人们所知晓的那样，“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一次涉及9位杰出领导人的公开抗议行动。他们突然站出来反对毛及其新助手—特别是张

春桥，还有江青和康生—所操纵的文化革命。9个人包括陈毅、李先念、叶剑英、谭震林等人—他们都是地位颇高的老资格的领导人。

他们的愤怒在2月16日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迸发出来。谭震林吼道：“我没有犯错误。我不需要别人的保护。”9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的怨恨积蓄已久。徐向前将军“一小时内敲了20次桌子”；叶剑英甚至因猛敲桌子而划破了手指（他的女婿，一位钢琴家的手指被红卫兵打伤了）。另一位将军聂荣臻断言：“对待高干子女的政策是不教育就枪毙。

上述这些领导人假如因此做过自我批评，那一般也是不被接受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经对朱德说：“你的野心很大。你的自我批评极其荒谬。有些人说你自动作了自我批评。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党中央决定你应该‘一层一层地剖析自己’……朱德不听毛主席的。他企图自己当领袖。

毛解决红卫兵过激行为的办法是把他们置于军人手中。3月7日，他给军队发出了扩大其作用的指示。

他写道：“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的工作。3月10日，毛又发出新的指示，极力主张，现在应当在造反青年、老干部和军队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

如果说毛在此期间的活动合法，那是最为勉强的。1967年3月政治局常委开会时，他只能聚集5个支持者（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对立面也有5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和陈云）。只是在作为主席的毛自己投票时，他才能使自己成为多数派。

毛要求在红卫兵完成清除其党内对手的任务前，不许回学校。4月6日，他又对红卫兵保证说：“不要怕乱，菜上得越乱，吃的时间越长，越好。无秩序和混乱往往是好事，能澄清事实……但永远不要动武。开枪永远不是好事。

似乎是觉察到了毛内心的想法，3天后，一队30人的红卫兵冲入刘少奇的卧室，强迫他妻子跟他们一起去清华大学，在那里她身穿紧身旗袍，脚踏高跟鞋，头戴草帽，脖子上挂着涂成金色的刻有骷髅的乒乓球项链，接受30万青年人的声讨。红卫兵给王的打扮是对她与刘访问印尼及其他亚洲国家期间，在某些公开露面的场合中的穿着的讽刺性模仿。江青，这位在毛作为国家主席期间从未和丈夫一起公开露过面的夫人，通过此举满足了某种复仇心理。

世界上再也听不到刘少奇的声音了。刘本来可以作出与毛战斗的选择。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站在他一边，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由此导致的内战对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刘摒弃了这一方向，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显示了他的尊严和勇气。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毛在政治统治方面的最高权力。

1967年5月1日，毛向阿尔巴尼亚军队的高级来访者发表谈话，反复地讲到接班人的问题：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然而，毛真的知道自己的追求吗？6月初，他否认红卫兵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三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引用了他的话，大意是：“我们共产主义者，不是要做官，是要革命。”毛太了解青年造反派的真正

辛酸了。有个学校的红卫兵在7月份发行的一个小册子里对此作了绘声绘色的叙说：

“17年来，我们学校一直被资产阶级统治着。我们再也不能让它继续下去了！……老少先生们，我们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坏透了，你们不是别的，只是腐臭的垃圾……以前你们处在特权地位上，坐在我们头上，摧残我们以显示你们的至高无上……你们认为可以利用现存的资产阶级教育作梯子向上爬，成为白色专家，进大学，与‘教授、专家’为伍。你们心目中追求的是小汽车、现代小房子、白大褂、图书馆……享有舒适、影响、好名望、高工资……真正的坏蛋！我们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想改造，如果你们继续反动，我们不会饶恕你们！……你们的阶级仇恨将碰在我们的刺刀尖上，你们的心脏将被挖出来……

老年的毛感到进退维谷。他又去旅行了，先到南方，后来又去了北方和东部。3个月的旅途所见令他灰心。

他告诉周恩来：“我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国家分成了‘800个王国’。”在江西，他评论道：“这么多的干部倒台了，是好还是坏？你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们应当批判打倒一切的思想。”

在另一场合，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为什么要分成两大对立的组织呢？我不理解。

当毛正在旅行的时候，武汉军区司令员起而反对中央政权并逮捕了两名北京派来的要求他恢复秩序的密使。现政权要想摆脱十分棘手的危机—由红卫兵提出的长期挑战所酿成的权力危机，就需要周恩来的外交才能。

8月，毛准备同意恢复正常秩序。他在《人民日报》上写道：“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

苏联共产党的新代言人勃列日涅夫到现在可以发出一份令人生畏的声讨文化革命的檄文了。

“中国的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正在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原党的机构和国家组织机构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企事业单位、青年团和公共组织已经瘫痪。许多卓越的令人尊敬的党和政府领导人、中国革命的著名参加者、杰出的军事将领、文化和科学领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正在遭受诽谤，正在受到非人的压迫。”

（此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至少到1969年还和毛、周保持着一条“热线”，以便在紧要关头使用。）

9月下旬，毛视察完各省后返回北京。他批评了妻子江青和陈伯达在他离京期间所做的工作，并要求他们写检讨。在这期间，没有做过自我批评的人几乎没有，甚至毛自己在1969年也稍稍做过检讨。江青发现自己有必要休息7个星期。

恰恰就在毛返京前的一次会议上，江讲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毛主席的小学生，广大群众的小学生。我必须向亲爱的同志们学习。同志们，为人民做点好事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我只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

在文化革命中，毛的两个女儿也是“小小的螺丝钉”。长女李敏成为国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核武器的发展及其他事务）的领导人。后来，她贴出一张反对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的大字报。次

女李讷成为《解放军报》的代理主编，这个时期，此报是中央委员会亲毛派的主要喉舌。

与此同时，林彪仍然在一味地努力宣讲，关键是不折不扣地遵守毛的指示。有一次他说：“毛泽东思想必须贯彻执行，不管我们理解还是暂时不理解。”8月，他写道：“毛泽东思想必须被当做衡量一切的标准。对于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毫不犹豫地坚信。

毛泽东的非正式讲话和谈话，未经他本人同意，林彪便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为书名出版了。毛通过周恩来和江青的帮助得到了一本。他几乎是看到此书的最后一人，尽管它仅以6角钱的价格在全国发行。

12月，毛给林和周写信，要求他们给个人崇拜降温。但在年底，他的74寿辰刚过，一尊巨大的、高过真人三倍的毛泽东塑像在韶山—“太阳升起的地方”揭幕。

在1968年初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毛的同事发现面临着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有位干部报告说：“交通警察把《毛主席语录》当做指挥棒。这怎么能允许呢？它不能被当做口令……”

林彪不信，他问：“他们把《毛主席语录》当指挥棒？这么宝贵的书怎么能用作指挥棒？”

江青权威性地指出：“《毛主席语录》不能当指挥棒，或者‘一、二、三、四’的口令。因为报纸上报道了，我们要调查此事。”

康生插话：“我听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也要学习《毛主席语录》……

正像毛如今发现的那样，文化革命的困难在于有那么多的人缺乏良好的判断力。他说：“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

春天，毛极度渴望解决正困扰着红卫兵的派性问题，以改善他们和军队的关系。但到7月底，他不得不遗憾地派出军队和工人进驻北京大学以结束那里的红卫兵之间的战斗。接着，他召集红卫兵领袖和他的同事开了一次困难而又痛苦的会议。毛与最先进屋的四位造反者一一握手并打量着他们说：“都是年轻人。”

在同第五位握手时，他继续说：“你是黄作珍吗？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没有被杀？”(19)

“好久没见到你了。”江青加了一句。

毛接着说：“上次在天安门我们见过，可是那时没有机会和你谈话。太糟了！你们这些人除非有重要的事情，不然不会来看我。可我看过你们的所有报告。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处境。蒯大富（那位坦率直言的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对于他，刘少奇曾经说过要当“活靶子来打”。—著者）没有来。是不能来还是不愿意来？”

一位年龄较大的头头说，他不愿意来。

“不，”有位红卫兵—一个姑娘插话，“此时，如果他知道和中央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他会哭的，因为他错过了会见主席的机会。我肯定他是不能来。”

“蒯大富要抓黑手，”毛说道，这样他便把要进行说服的主题机智地引了出来，“那么多工人被送到学校去‘镇压’和‘压制’红卫兵。谁是

黑手？黑手还没抓住。黑手不是别人而是我。蒯没有来。他应当来抓我……

“如果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实行军管，让林彪下命令……问题总要用一种方式或者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斗是斗，但那是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北京居民不高兴。你们学校里的大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这样能团结整个国家吗？”

毛继续说：“谁也没想到这种武斗。原计划是停课半年。报纸上就是这么宣布的。后来停课延长到1年，1年不够又延长到2年，最后是3年。我说，如果3年还不够，那么需要多少年就给他们多少年。”

谈话突然扯到了题外，但最后毛又回到正题上来：“今天我请你们来谈谈这件事，以便你们有所准备。以前，我从不用录音机，但今天我用了。你们回去后可以按照你们希望的方式解释我今天说的话。如果你们那么做了，我就要回过头来打开这个录音机。你们最好讨论一下，一旦我放这个录音，许多人都会戒备起来。”

毛又说：“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

会上还讨论了谁曾不失时机地为一派红卫兵说过情的问题。有人说，是毛的妻子江青。

江青解释道：“我特别不喜欢师范大学的驻军。天气这么热，你们切断了他们的水、电和食品供应。夏天3个月，不许他们见阳光。你们怎么能这样做呢？当我听说此事时，我忍不住哭了。他们有数百人，至少有数十人。他们毕竟是群众……无产阶级应该奉行无产阶级

的人道主义。这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毕竟是年轻人。他们想绞死我。我也不怕油炸。我听说北京大学的井冈山红卫兵组织要油炸江青。”

姚文元及时插话：“油炸只是一种说法。”

毛提到一位对周恩来怀有敌意的年轻红卫兵领袖，但又为他进行辩护。

毛说：“人们说总理宽宏大度。我和总理是一致的。这些人本不该抓起来。由于我点头，抓的人太多了。”

安全保卫负责人谢富治坚持说：“这和主席没关系，是我进行的逮捕。”

毛责备道：“不要企图为我开脱错误，或者为我做掩盖。我命令抓人，也同意放人。”

“您没有让我抓这么多。”谢申辩说。

后来，毛说小孩们正在收集大字报当废纸卖。

他问：“几分钱一斤？”

谢回答：“6分。孩子们挺走运。”

这时，迟到的蒯赶来了，毛站起身走上前去与他握手。蒯流着泪解释说，清华大学正处在危险中，因为黑手操纵下的工人正开进校园镇压学生。

毛像刚才和其他人谈话那样，挑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戏剧性地开口说：“我已经成为黑手了，带我去卫戍部队司令部吧。”

然后，是短暂的意见交换，结果，谄媚包围了毛。毛的前秘书陈伯达突然喊起来：“紧跟主席的教导；绝对执行主席的教导。”

毛尖刻地说：“不要谈教导了。”紧接着，毛的妻子的亲信姚文元说道：

“今天，主席的话有着深远意义。”

然后，他们把目标集中到狼狈不堪的蒯身上。

毛声称：“要让蒯大富清醒。”

陈伯达重复道：“蒯大富应当清醒，悬崖勒马。你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从来善于鹦鹉学舌的林彪跟着说：“悬崖勒马。允许你犯错误。”

“不要用‘允许犯错误’的话。”毛训斥道。

林对蒯进行了说教，但是，他却把极为明显的二难推理的窘境带给了自己。

他说：“今天，毛主席显出了他个人对你的关心，作出了最重要、最正确、最清楚、最及时的教导。如果你听而不闻，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们红卫兵起过重要作用。现在，全国许多学校已经取得了革命大联合的胜利。大联合关系重大，有些学校落后了，你们应当赶上来。你们没有认识到在运动的不同阶段，需要也不同。”

有位女红卫兵为蒯解围。她说：

“我非常爱蒯大富，我也意识到只要我和他在一起，就会参与许多事情这一事实。但我感到必须尽力保护他以免他垮下来。他的命运同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江青告诉她：“我批评过你几次了，你从未坦白过自己。”

“不要批评她，”毛以少有的对妻子的责怪口气厉声说，“你总是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

“我是说她太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了。”江青辩护道。

毛说：“年轻经受不住批评。她的性格有点像我年轻时候的性格。孩子们的主观主义很顽固，非常顽固。他们只批评别人。”

“蒯大富现在笑了，”江青注意到，“放松一点，不要那么紧张。”

毛告诉蒯：“如果你想抓‘黑手’，那‘黑手’就是我。你能对我干什么呢？我们同情你们一方。”

毛要结束这次讨论了。

他说：“你们都还没有睡觉。你们几个人一块去韩爱晶那里休息一会儿，开个会……蒯大富，你的行为是反对中央吧？……连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都无法让你停止行动。我也没有办法，但是还要伸‘黑手’。我发动工人去阻止你们武斗。武斗已经继续那么多天了。工人带着锣鼓开进校园，你还没有注意起来。你脱离了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大多数学生和你自己的人。很多人在说你的坏话。”

年长者极力压迫蒯与其他派别妥协、与党的领导妥协。

毛坚持说：“联合是必要的。我们需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联合就不能实现。”接着，会议在没有任何结论，或者说在顽固的蒯未作出任何改变其立场的承诺的情况下结束了。

如今，毛开始谈论的问题，是运用他的权威恢复文化革命期间信誉扫地的某些基本制度。7月底，毛写道：“大学还是要办的，”—尽管他又说，“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

8月，毛结束了他和红卫兵的蜜月，声称，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已经过去。他召集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解除刘少奇党内一切职务的决定，接受了由毛派准备的一份新的党章草案。这个草案重新把毛的思想置于第一位，甚至提出林彪做毛的接班人。党章说：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毛评价了文化革命，把它描绘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他也承认，文化革命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将来还要搞。“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大会错误地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把林彪作为“接班人”载入党

1968年底，毛告诉那些曾经帮助他将党内的主要对手驱除掉的年轻人回家。“青年造反派必须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必要的。”应当说服干部和其他城市居民把高中或初中，学院或大学毕业的儿女“送到农村去”。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战胜刘少奇和其他右倾分子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也埋下了党内进一步分歧的种子，特别是新党章用党的文件的语言指定林彪为毛的接班人，以提供“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毛泽东思想永被坚定地遵循的……基本保证”。再也没有什么比这对人类理性，或者民主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更粗暴的侮辱了。毛明显地不喜欢这样。他自己的讲话显出方寸已乱的迹象和对处处提防的一种新的厌倦。

他讲道：“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

他指出，文化革命期间中国容易受到外来攻击的伤害。人们特别是军队一直关切的中心是：中苏边界的紧张状况这时已达到了顶点。“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

然而，主要的问题还是国内政治问题。“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

毛又重提过去的问题和理想。“多少年我们都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

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然而，现在已经是共产党进城20年了。中国怎么能不把毛看成是生活在过去中的一个人物呢?

在向毛的思想发出冗长的令人厌倦的赞美方面，林彪丝毫没有感到不安。在一段14次提到毛的名字的文字中，他坚持说，每个革命委员会都“……必须在各项工作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从某个方面来讲，毛很高兴听到这些话。一部有关这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情况的电影显示出，当毛提议表决时，他带着明显的高兴之情环视着所有高高举在空中表示一致通过的“红宝书”，并兴奋地宣布“通过”！他两旁的林和周，不时地几乎是偷偷地瞥上他几眼以观察他的动向并及时作出反应。

“九大”后，中国报刊在毛的名字上落下了波折号，很明显，这是为了让毛的名字能更容易地和共产主义统治集团中的欧洲圣人马克思和列宁排在同样位置上的一种文体上的简化形式。但它只适用于毛的名字，而不能用在其他人的名字上。

毛的妻子后来断言，这期间毛的家庭正受到林彪安插在住所里的人用慢性药进行的毒害。据她说，毒药对她的神经产生了影响，损害了她的大脑和记忆力。当时，她毫无察觉，直到两三年后。她还说，毛也曾因毒药病倒。

在随之而来的夏天里，毛泽东思想在官方的宣传中成了红太阳。得益的不仅仅是毛，因为它也为那个接班人继承其衣钵打开了大门。林已经把自己塑造成为比毛更好的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一家省广播

电台在10月份声称，林“……最听毛主席的话。林副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最好、最好，领会得最深、最深，钻研最彻底、最彻底，应用得最全面、最全面……林副主席的每句话都包含着对毛主席无限深刻的无产阶级感情……我们第一次聆听毛主席指示的时候，有可能不完全理解。但是，一经林副主席解释，就容易理解了，或者理解得更深刻了”。

在此期间，毛的妻子出去游览中山公园的一座寺庙，发现毛的一张半身照片夹在佛像和孙的遗照中间，于是她下令把它取走。过后，她又去了排云殿—颐和园的一处建筑，发现那里有6英寸多高的大字是按照林彪的笔迹设计的。那些字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林正在大张旗鼓地树立对毛的个人崇拜，以便能够利用它为自己服务。毛面临着最后的战斗。



>> 1970年，毛泽东、林彪在北京（杜修贤 摄）

28　和尚打伞（1970~1976）

1970年8月，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主要的合作者林彪和陈伯达企图进行一次政治夺权。很明显，他们相信毛已经成为一位令人生厌的领袖，而林彪对军队的控制将迫使其他政治家站到他们的过激政策一面来。这个计划就是，让林彪就任国家主席，让中央委员会通过一份由陈起草的关于天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的决议。将会成

为林彪集团的总理的陈显然认定，林彪比毛本人更坚定地执行毛主义的政策，而且更有力量工作。

林背着毛搞阴谋，并想在毛活着的时候成为国家首脑的想法使毛异常动怒，以至周恩来和憎恶林彪的将领居然能说服他放弃林、陈这两个追随者。面对此状，林大概决定牺牲陈伯达，以便自己安然脱身，因为这个时期只有陈伯达被免去了领导职务。中央委员会在中国的新宪法草案中插入了下列语言，毛“作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首脑和全国与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在有生之年实施统治。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指出，他的敌人“……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指毛、周和康生。—著者），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他们发难……共两天半……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评论道：“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天才是靠……集体智慧。”

毛指出，林的一些讲法是错误的。“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毛把陈伯达的思想批评为典型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会后，陈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

毛如此残酷地攻击一个过去曾经与他过从甚密，并为他的传奇色彩贡献匪浅的同事，似乎令人费解。

但不管怎样，此时毛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影响可能非常之小，以至于他无法阻止周恩来和将军们，以及那些希望切断自己与极端主义分子的联系从而逃脱惩罚的左倾分子们，作出他们希望作的决议。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陈的倒台被党内的许多干部视为毛的激进政策现在正为党所抛弃的征兆，因为那种激进政策是陈积极帮助制定的。

3年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正式将陈伯达逐出领导集团，并斥之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在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眼里，所有这些一定会大大损伤毛对人的本质的判断力方面的声誉，因为主席曾经和一个证明完全是异己分子的人那么亲密地共过事。

毛自己肯定也有这种顾虑，因为庐山会议后，他马上发出了一封致全党的公开信来解释自己的立场。“陈伯达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长期以来，陈伯达一直和我争论天才问题，认为天才是天生的，而不是从实践中或者群众中培养起来的，让我承认他是个天才。他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当国家主席。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投机分子……

10月1日，埃德加·斯诺和妻子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庆典。在巨大的观礼台上，毛让他们站在自己两旁，而对城楼下游行的百万中国市民，俯瞰天安门广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之高的荣耀，外界普遍认为它是一种和解的姿态。毛对于美国的思想路线，当然没有变。是年早些时候，他在有关印中关系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尼克松的法西斯主义暴行”。

1970年11月，毛长期等待的美国承认终于有了突破口，它是作为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进行国事访问的副产品而出现的。几星期

前，这位巴基斯坦人曾在白宫与尼克松总统交换过意见，现在他给周恩来带来了一封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信中建议由一名高级美国人士访华。周对此未作任何鼓励，但答应晚上和毛商量一下。



>>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年12月，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令叶海亚·汗惊讶的是，第二天周告诉他，中国欢迎尼克松的建议，并非常高兴接待“一位高级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周还说，毛自己评论道：“这是第一次通过一个国家首脑把一个国家首脑的信转交给一个国家首脑。

当1969年最北端的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剑拔弩张之际，美国人的行为无疑是最能激发毛的兴趣的东西，它促使毛改变了主

意，邀请尼克松。具体细节尚不清楚，但至少尼克松曾经拒绝给苏联攻击中国以道义上的支持。

在这些戏剧性的变化过程中，埃德加·斯诺一直在中国旅行。12月10日清晨，在北京饭店他很早就被叫醒了并且得到通知去毛在紫禁城的寓所里吃早饭，他们一直谈到下午。

斯诺注意到，“他有点感冒。他疑惑不解地大声说，医生好在哪里。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防止不了，浪费了那么多时间。”他同意斯诺的建议，试服几剂林诺斯·保琳医生推荐的维生素C。

他们讨论了斯诺写的关于他们六年前的那次谈话的文章。那时，毛声言，中国存在着“个人崇拜”，而且有存在的理由。但现在，无疑，个人崇拜搞过了头。毛说，对于人民来讲，要克服三千多年以来崇拜帝王的传统习惯是非常艰难的。他列举了给予他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的评价是，真讨嫌。它们最终都要被丢弃，只有“导师”会保存下来。自年轻的时候在长沙以来，他时常当教师，现在仍想保留这种身份：“其他的头衔统统丢掉。谢谢”。毛又一次说他“会很快去见上帝”。

斯诺谈起了中国最近控制生育方面的进步。毛领会了他的意向，说，不。农村妇女仍然想要男孩。假如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她们会继续生育，力图有个男孩。斯诺又谈到了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毛则谈了他对中国和美国人民的殷切希望：如果苏联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毛将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高的工业生产力和大学教育水平。他将很高兴看到那里出现一个革命政党，尽管他并不奢望最近的将来它就能产生。

毛继续说，中国正在研究允许美国的左、中、右三派人物访华的问题。像尼克松这样的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倾人物可以允许来吗？是的，毛自问自答道，尼克松应受到欢迎。因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和尼克松一起来解决。毛将很高兴与他会谈，不管他作为旅游者来还是作为美国总统来。

中国还将学习美国通过分权—把权力和财力下放到50个州中—而获得发展的经验。中央政府不能包揽一切，中国的未来要依靠地区和地方的主动性。

斯诺问道，苏联人是否怕中国。毛回答，据说是这样。一个人甚至会害怕屋中的几只耗子，也许他担心它们会吃掉糖果。如果有必要，争论将不得不继续一万年。但是，柯西金来的时候，毛却告诉过他，会谈后苏联人可能要被指责一千年，不会再多。

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自己只要发一个命令，其他人就得遵守。他们没有意识到有人不想这么做，其中就有谦卑的毛本人。中苏两国的思想分歧现在已变得水火不容，但他们最终会在两个国家之间解决存在的问题。

当这一天的上午结束时，毛陪同斯诺走到门口，并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带着一把破伞漫游世界的孤独的僧侣。汉学家指出，中国短语“伞下僧”是个双关语，意指“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1971年初，毛开始反击林彪，他改组了华北和北京地区的军事领导机构，撤换了38军中亲林的指挥官，并把该军调出北京，这样一来，便抽掉了他的前副职的权力基石。同时，毛及其私人随从悄悄搬出中南海，因为他们的敌人已潜入那里。后来，他们声称，在中南海吃、睡都不安全。

林彪及其妻子、儿子计划在遥远的上海或其他中国中心城市孤注一掷，发动反毛的军事政变。林的儿子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与空军有着关键性的联系。

3月18日，这位林家少爷对两位空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政变计划。”还说“子爵（指他妈妈）说必须注意安全”。

两天后，第三位空军高级将领抵达上海，参加了讨论，最后，在3月22日和24日之间，著名的《571工程纪要》出笼了。中国“五、七、一”的谐音正好是“武（装）起义”。

林能继承毛的御座的各种方式都由他的追随者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根据其中一人的坦白，他们感到和平演变是最理想的，但需要5年或6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可能发生很多变化，“没有人能够预见领袖（指林彪）目前的地位能保持那么久”。

林彪毕竟有可能被他人取代。“一切都无法预料。主席的威望那么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另一位助手表示异议：“统帅是主席自己选的。”“刘少奇也是他自己选的。”第一个说话者反驳道。于是宁肯提前采取夺权行动的计划便订了下来。

要想保住林的地位以便继承毛的权力，一种方式是除掉张春桥（被认作林的主要对手）；另一种方式是“危及主席的个人生命”，但这会导致难以控制的政治局势的出现。

4月，毛运用他所喜爱的侧翼击敌而非正面进攻的策略开始行动。他安排了一次有99位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进一步批判了陈伯达，而且要求忠于林的5位将军（包括林的妻子）做自我批评。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林的妻子非常紧张以至于想马上实施571工程，但林决定等一等。

8月中旬，毛离京去各省秘密巡视以搞清林彪的行为和作用。他攻击林在政治上利用叶群，对此，他的许多听众肯定在内心里认为，这也适用于江青。毛说：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4个人[20] 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这无疑是要消除下述事实给毛自己的声誉所造成的损害，即陈伯达长期以来是毛的私人秘书。当然，毛的话也拉开了自己与妻子的距离，后者在毛最后的政治斗争中正走向舞台的中心。

接着，毛列举了“十次路线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对党的领导（实际的或潜在的）一度受到威胁—这就是1927年的陈独秀；1928年的瞿秋白；1930年的李立三；1931年的罗章龙；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1935年的张国焘；1953年的高岗；1959年的彭德怀；1967年的刘少奇和1970年的林彪。

当毛正在发表上述谈话的时候，据说林的人正计划在从杭州到上海的路上炸毁他的火车。但是，林的女儿豆豆，良心发现，急冲冲地跑去告诉了周恩来这一阴谋，周得以及时地向毛发出警报，毛的生命因此得救。当毛于9月12日未损毫发地返回北京之际，林乘一架空军三叉戟飞机，掉头逃往西北，大概是要去苏联。但是，飞机于凌晨2点半坠毁在蒙古境内，据报道，9位乘客全部罹难。反叛结束了。

毛对林总怀有某种轻蔑，可能是因为林智慧有限。这位瘦削的、一味顺从的、优柔寡断的人物完全缺乏领袖的魅力，令人惊异的是，他在中国领导层内居然爬得那么高。只有勃勃的野心驱使着他。在一

次莎士比亚也会叹为观止的讲话中，毛说：“林……一天吃一斤多肉，还是没有胖。就是10年以后他也会这样。”整个世界仍然等待林彪衰亡的真相，对此，只有毛主义者知晓。但是，至少可以说，林未能组织一次成功的暗杀。

几天之内，林死后的声誉便受到全中国的咒骂。一家省广播电台把他骂成“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杜修贤摄）

1972年2月21日，最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尼克松总统飞抵北京会见毛。多少世纪以来，诸侯王公携贡物来到紫禁城，但从未有过一个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的首脑来到这里向中国领袖致意。

尼克松在飞机降落后的三个半小时内，就在中国电视摄像机下坐到了毛的办公室里。毛在一位秘书的帮助下站起来。

当他握住美国总统的手时，第一句话是：“我说话不太利索了。”后来，周恩来告诉尼克松，主席患支气管炎大约有一个月了。这次握手并非仅有的一次，在后来的会谈中他又握了一次。尼克松在日记里将它描绘为“最感人的时刻”。当毛伸出手时，“我也伸出手，他握了大约一分钟。”

当时在场的基辛格说，他曾让哈佛的学生阅读毛的著作。毛作了一个表示反对的答复，但尼克松评论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的进步，改变了世界。”

毛坚持道：“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他们善意地取笑了毛和蒋介石各自给对方起的名字，以及基辛格用漂亮姑娘作秘密访问巴黎和北京的掩饰的技巧。

毛畅笑着说：“你上次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我喜欢右派。”他继续热烈地谈着他的话题，并提起了爱德华·希思和德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他吐露说：“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尼克松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他当着毛的面引用了他一首诗中的一句话，毛现出欢愉的微笑。在最后的笑谈中，毛又说，当资本主义被击败的时候，尼克松和基辛格，作为个人，不要在被打倒之列。

他解释道：“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亨利·基辛格发现毛“……异常超重，但有着惊人的支配周围事物的能力。的的确确，他有意志力。毛……用这种意志进行统治”。

“我们只谈了一个小时多一点，我实在无法知道毛在一天之内是否有比一个或两个小时更多的有效的精神力量。但他身上的确能够发出一种几乎让人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最近，我重新翻阅了我们会谈的记录，发现它是一出瓦格纳戏剧的序曲。后来我们和周恩来会谈过程中所讨论的每个问题几乎都在同毛的谈话中提到过了。

尼克松访华提高了毛的威望，大概毛在同意这次访问的时候已经心中有数了。在取得这一成功后，毛的同事要想再次让他靠边站肯定是很困难的。但是，党内的激进分子则把这次访问视为令毛丢脸的事情。他们的观点可以从几年后据说是中国外交部部长乔冠华所作的一次内部讲话中窥其一二。这次讲话是关于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华问题的。乔解释说，伊梅尔达是“通过一次选美比赛挑选出来的”。“她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儿，在这种制度下，资产阶级玩弄妇女。从这里你可以知道菲律宾总统及其夫人代表的是哪个阶级。但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和他们会谈，就像我们不得不邀请尼克松并和他会谈一样。毛主席的光辉就在这里，他能辨别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

尼克松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他是来和周恩来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后来，两位国家首脑一起去看望毛。

毛问他们：“你们吵完了吗？争吵对你们有好处。”

“我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田中谨慎地答道。

毛继续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然后，毛又简略地谈到食品和饮料：“不要喝太多的茅台，那样对你有害。”

田中应道：“我听说茅台有65度，但我的确喜欢它。”

“噢，不，它有70度，不是65度，”毛说，“谁告诉你错了？顺便说一句，中国有许多古老的东西，让它们束缚住你并不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很严厉，我就造他的反……尽管如此，似乎你在日本的选举中要度过一段艰辛的时期，不是吗？”

田中谈到了他所经历过的11次大选，在这些选举中他在大街上发表了许多演说。



>>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会见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杜修贤 摄）

毛评价道：“在大街上讲话是件费力的工作。请你保重。”

这位日本领导人解释说，在日本不去大街上演讲，任何人都不会当选。

“你们的议会制度怎样？”毛询问。

“它也存在自己的问题。”

“日本好像也有许多问题，不是吗？如果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讲话，那么，你的确有个艰辛的时期。”

毛赠给这位日本人几本书，说：“我非常喜欢读书。我想这对我的健康不好，但不读上一本书，我就睡不着。

毛的妻子和一位美国人的会晤可没有这么简单。后者是一位年轻的说汉语的来中国研究妇女运动的美国学者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决定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威特克进行一系列的会谈，大概江认为找到了她的埃德加·斯诺。在1972年8月间，她和年轻的美国来访者大约共度了60个小时，她披露了自己对葛丽泰·嘉宝的崇拜，对好莱坞电影的欣赏一类的情况。这些后来在威特克的《江青同志》一书中面世。

尽管江青的这次冒险得到过周恩来的同意，也得到过汪东兴—毛的贴身警卫的帮助，但是，很明显，她没有征求毛的意见。据江青的敌人说，毛对此事非常生气，认定江的目的就是要树立她的声望。毛还感到党和国家的机密，以及个人的私事被出卖了。据江青的反对派说，由于威特克的访问，自1975年秋开始，毛的身体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此后不久，毛就不再和妻子一起生活了。

从这时起，中国出现了下述谣言，说江青有时向毛要钱，毛把自己的一些稿费给了她。—据说，有一次数达1.5万元。很明显1973年以后江青的寓所搬到了靠近玉渊潭的钓鱼台国宾馆。尼克松和其他外国高级人士曾下榻于此。据说，江若想见毛，必须先写封信。

如今，江在中国已经成为极不得人心的女士。

1973年8月，毛主持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会议由周恩来组织安排。会议通过的公报将林彪斥责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不管怎样，周已患不治之症癌症，所以，毛的新接班人问题变得很难处理。



>>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杜修贤 摄）

9月，蓬皮杜总统来访。毛向这位法国访问者说的第一句话是：“噢，至于我，已经垮了。我被病魔压倒了。”他提到，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曾批评过中国。他解释说：“那时，什么人都反对我们。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冷漠一些……美国人说我们比希特勒还坏。至于赫鲁晓夫……1955年他对阿登纳说：‘帮我反对中国吧。’”

蓬皮杜说，他会见了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双方都宣布要和平，和平是有依据的。

毛不以为然地挥着手说：“我一点也不同意。早晚会爆发战争。最好的计划是推断一下战争的最终结果。只有在战后，你才能考虑和平的可能性。另外，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戒备。”

毛对基辛格和拿破仑作了评价：“基辛格喜欢下达简要的命令，他的意图经常是很不明智的……拿破仑的办法最好。他解散了议会，自己选人进行统治。”

蓬皮杜询问了中国的人口情况。

毛答道：“噢，连我也不晓得确切数字。我不信我们有8亿。就是达到7亿，我也怀疑。人口普查搞得中国人似乎总在增加，另一方面，又总在表明收成不断减少。”

之后，谈话又迅速而概略地转到拿破仑的战争，纳尔逊和威灵顿，甚至亚历山大方面。毛的知识令人钦佩，只是在一个小问题上出了点偏差。他说：“那位法国大使说起法语来像是带着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的口音。”

蓬皮杜指出：“拿破仑有意大利口音。”

“是的，”毛说，大概他自己想起来了，“人们都笑话他。

在最后的岁月里，毛接见了世界上数十位国务活动家，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扎伊尔的蒙博托、加拿大的图德尔、澳大利亚的怀特兰、尼泊尔国王奈尔雷亚、阿尔及利亚的保比·迪恩、巴基斯坦的布托、塞内加尔的桑格和尼日利亚的高汶。



>>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里会见客人（杜修贤 摄）

1974年，毛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批臭林彪，根除其思想影响的运动，并且和批孔一起展开。他的派系中的激进人物，包括他妻子，企图把批孔的矛头转向温和主义者、中间派、现实主义者—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死前所面临的最后一次挑战是抑制他妻子的野心。

1974年3月，他给妻子写信说：“……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岁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但是，江青继续给毛写信，毛又答复说：“即使你见了我，我们也无话可说。已经见过多次了，但你从不执行我的指示。你总是谈琐

事；从不和我讨论主要问题。中央委员会里有二百多人，你要和他们交谈并见诸行动。你要有自知之明。别人对你有意见，你不知道吗?

如今，毛放松了对政府的控制，因为现政府是由几乎势均力敌的两派组成的，非常便于平衡。这两派是周恩来为首的现实主义者和所谓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上海作为青年领导人提拔的纺织工人，后来突然被推上了党的副主席的职位）—为首的激进派。

4月，当周恩来因癌症住院的时候，激进派确保自己继承毛的权力的机会陡然增加。没有周的坚定领导，较易接近毛的激进派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几星期后，江青开始接待外国贵宾。

江开始凭借自己的头衔集结政治势力。7月，她被奉为“毛泽东思想的解说人”，直到此时，这个荣誉只给过周恩来和林彪。新闻媒介开始大吹大擂女皇武则天—公元7世纪一位著名的统治者和一个短命王朝的开创者。平民出身的武则天原是地位低下的妃子，她抱着要在帝王的感情世界里居于首位的雄心踏入皇宫。皇帝死后，他的儿子和武结了婚。后者帮助新皇帝妥善地处理国事，被尊为贤明皇后。丈夫驾崩后，她自己登上了御座。半个世纪以来，武进行了无数的改革，包括妇女地位有所提高。1974年，对她的品性好的一面和她统治期间的功绩的重新讨论，明显地是与江青的政治未来有关的。

是年夏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在他的同志面前批评妻子，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还告诉她：“你也是难改呢。”毛对同志们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接着又对妻子及其三位激进的同僚说，他们不应结成“四人小宗派”。

当炎热的气候过去后，毛又去南方旅行了。这次是去家乡长沙。后来，他的助手回忆说，在那里“他穿的那双补过多次的拖鞋又破了。

他仍然不愿扔掉这双拖鞋并让助手又缝补了一次”。

但是，毛并没有安静地住多久。10月中旬，年轻的王洪文带着一连串攻击周恩来的令人动容的断言抵达长沙。这位年轻人报告说：“看来第二次庐山会议正在北京酝酿。我没有告诉周总理……我要来湖南。我们4个人开了一夜的会，他们同意我来这里向您报告。当周总理休息的时候我离开了。来这里我冒了很大风险……尽管周总理病得很重，但他正‘忙着’找人谈话。经常拜访周总理住处的人包括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李（先念）同志。”然而，毛对此毫无反应，只是说这些都要双方当面对证。(21)

11月，毛又在江青送给他的书信的空白处亲笔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你积怨甚多……

据说，一星期后，江青又给丈夫写了一封令人惊讶的信，在进行卑鄙的辩解和气势汹汹的抱怨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据推测她给毛写道：“我辜负了主席的期望。因为我没有正确的自我评价，醉心于过高地估计自己。我的头脑一直很糊涂……有些不寻常的事情确实让人恐惧。我惊醒了……自从九大以后，我几乎无事可做。我被冷落了，几乎没有工作……后来，她的敌人指责说，她还要钱和官职。

毛的反应是，拒绝承认她清闲。他写道：“你的工作是研究当前国内和其他国家的形势。这已经是个很繁重的任务了……不能说你无事可做。

第二个访问毛的人是他年轻的侄女王海蓉，王转达了江青的要求，即正在为大约于新年之际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人

事安排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把推举王洪文作为一项议事内容。毛生气地听着“侄女”的叙说。他告诉一些同志：“江青有野心，有没有？”

尾声接近了。毛没有参加1975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两次重要的会议。尽管人民代表大会于北京开会期间，毛精神颇佳地在他的南方别墅里接见了保守的西德领导人弗朗兹·约瑟夫·施特劳斯。如今，任何事情都与党和国家领导职位的任命联系起来，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的人被恢复了名誉。

毛将这些事情大胆地交给周恩来去处理，但他的确提过，鉴于邓小平已经改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因而应当恢复邓的副总理和其他职务，让他负责周患病期间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和4位激进主义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后来，王海蓉又一次代表江青向毛报告说，在毛任命了邓小平以后，他妻子几乎不喜欢所有的政治局成员。毛的回答极为简洁：“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

“您呢？”王小姐问。

“她不尊重我。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这个预言完全成为现实。

江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力图做自我批评，但是后来她坦白道：“我没做彻底的检讨……我无法转变思想……理解了存在着四人帮，有助于我意识到这一现实会引起宗派主义，会导致党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有助于我理解主席为什么在去年三四次提到这个问题。我没有想到这是涉及原则性的重要问题，主席很少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5月3日，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以警告的口气批评江青等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的这个人生阶段，许多事情是通过中间人去做的。很明显，在个人访问的场合中，毛最愿意倾听的是年轻人的诉说。“四人帮”选择王洪文或王海蓉而非毛自己的妻子去为他们说话。现在，江青又安排另一位年轻人和毛住在一起，他就是毛的侄子远新。这个男孩受江青的影响很深。一般来讲，他生活在毛的身边，是极易利用毛的体弱状况来为“四人帮”灌输激进材料的，并且在此基础上以毛的名义逐步发出有利于激进派事业的指示。

9月，江青坚持应当在电台上广播她在一次会议中的讲话，并印发原文。根据毛的继承人华主席在毛逝世后的说法，当时毛的反应简短且击中要害。

毛驳斥道：“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根据毛的工作人员讲，毛警告他们提防他妻子。他曾经告诉他们：“江青是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她也害怕群众。你们要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有我在嘛。

1975年7月，毛接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他告诉这位泰国人“水门丑闻”是因为“美国政治言论过于自由……”的缘故，“你身边

正好有部录音机，把谈话录下来有什么错？美国大多数人喜欢玩录音机。”

毛抱怨腿疼，视力不济。他说话时嘴唇抖个不停。他告诉克立怎样与泰国共产主义暴动者战斗。他向克立保证：“你们不必担心泰国共产党，它存在10年了，但没有一个泰国共产党来看过我。

下一个来访的国务活动家是西德总理赫尔穆斯·施密特，他把毛描绘为一个坐下或站起都要别人帮助的人。“他的嘴张着，颚下垂着，脸就像头盔一样僵硬……毛说话的声音很小，只能断断续续地发出困难而嘶哑的声音。3名妇女……看他的嘴唇。在无法确定他说的是什么时，她们就相互协商，然后再通过毛印证她们理解的是否正确。出现混乱时，毛就用一支软笔在信纸上迅速而充满信心地写下他要表达的意思……”

毛向这位总理抱怨说：“没有人听我的。”

施密特引用了德国谚语：“滴水穿石。”

毛沮丧地答道：“我没有那么多水了。

年底，戴维和朱丽叶·艾森豪威尔访问了毛泽东，并发现他很关心年青一代的问题。朱丽叶·艾森豪威尔写道：“实际上，他是在表明，他对自己的人民，特别是未经考验的年青一代心存怀疑和失望。”他对革命将会被永久地继承下去的机会的评价没有超过50%。

毛告诉这对美国夫妇：“年轻人软弱，必须提醒他们要斗争……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肯定没有东西能离开斗争……斗争延续二三百年是可能的。”

毛说话的声音像是喉鸣—“刺耳、单调、吃力”—当会谈结束时，朱丽叶·艾森豪威尔的最后一瞥所见到的是“一个疲劳的人正转过身去，吃力地与护士说话，然后被带走，重新一个人独处”。其他来访者则发现毛脸色苍白，精力耗尽，嘴里流出口水。

1976年初，周恩来与世长辞。显然，周比任何人都更坚定更忠诚。如果他比毛活得时间长，毛本来希望他能在接班人问题上起到桥梁作用，现在这已不可能了。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希望能全部接管政权。作为中央委员会里地位仅次于周的高级人士王洪文—10年前他只是一个纺织工厂里的治安保卫人员—现在接管了周的那部分工作。人们宣称，毛曾绝望地叹息道：“如果让王洪文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很快就会挨饿。”

令人大为惊诧的是，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接替周的职位。据说，最初华对这一职务推辞不就，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其中，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则是事实。

据说，毛对他讲道：“我任命你就是因为你知道自己的水平不高。一个人有缺点就不会骄傲，并且会不断地提高自己。”

当毛的警卫负责人汪东兴对毛的任命道贺时，毛解释了他选中华的原因：“首先，他有专区和省级工作经验，在当公安部长的几年中表现不错。其次，他忠诚、老实。第三，他不狡猾。



>>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一起（杜修贤摄）

从华的履历和为人所知的观点方面看，他个人一方面不会遭到激进派的反对，另一方面也不会招致现实主义者和右倾分子的嫌恶。

事实上，这是毛作出的明智选择的前提条件。毛自己的确于1月21日和1月28日两次向政治局提出任命华国锋的建议，的确于2月2日签署了任命华为代总理的中央委员会文件。但我们还没有其他人关于毛在整个事件进程中的作用的说法，我们有的只是在此进程中主要的得益者华主席本人所提供的材料。

“四人帮”对于他们派系中没有一人取代总理的职位愤怒异常，于是把枪口转向了他们的对手。

据说，毛于2月份以一种备忘录的形式向党发出了他对邓小平的看法。他说，邓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和应该起用的人才”—绵里藏针。他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拒绝批评。

江青的反应非常清楚。她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国有个国际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名叫邓小平。大概叫他叛徒更正确。但我们的主席一直在保护他。我讲的只是个人意见。

可是，毛仍然欣赏邓，除了对邓反对他的文化革命政策不满外。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曾经给他指出过邓并说：“看到那边的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前途远大。”起码邓是坦率的，当他与毛发生分歧时决不搞阴谋。

4月5日，所谓的清明暴乱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周恩来的支持者力图通过对周的祭奠来表达内心的敬仰。但是，他们受到激进集团的无赖们的扰乱。似乎是毛的侄子告诉给毛一系列的谎言，说该事件引出了许多麻烦，并说服毛免去对事件要负责任的邓小平的职务。接着，华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并被正式任命为总理。根据华自己的说法 ，这些都是“毛主席的个人意见”。

叶剑英敦促邓离京避难。后来，邓又参加了一次充塞着激进学生的政治局会议。于是传闻遍布中国，说邓小平如何低下目光听了一会儿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但是，当谴责达到高潮时，他却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去上厕所了。在那里，他待了两个小时，这足以消弭学生们的热情，并达到挫败会议的目的。

4月底，毛接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杜。后来，华留下来继续和毛交换意见。他把毛的话整理成三条指示带走了。这三条指示是：“（1）慢慢来，不要着急；（2）按既定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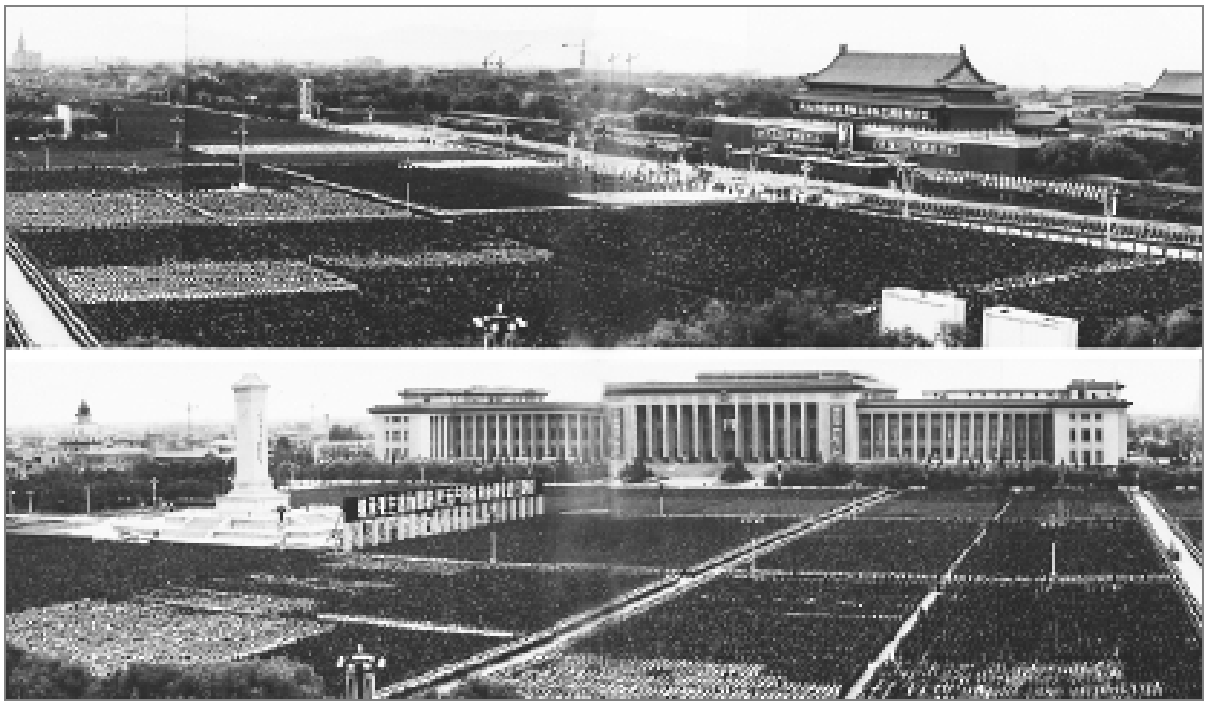
一个朝代行将结束的不祥之兆明显地出现了。3月，一颗陨石坠落在吉林省境内。《人民日报》回顾历史说，公元前3世纪，一颗陨石落地一度引出有关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死后国土会四分五裂的谣言。7月，唐山发生了劫难性的地震。许多迷信的中国人认定，一个伟人的去世就在眼前了。

9月，毛开始感到将不久于人世。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这位老人现在正处于他最后的人生旅程上。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他与世长别。

在如何处理遗体问题上，并没有立刻作出灾难性的决定。越南人被问及他们是如何保存胡志明的遗体的。经过良久的犹豫和心理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剖尸，使用化学药品，以便遗体能在一栋宽大而静穆的房子—也许是毛为自己要的最后一件东西—中展出。

华亲自负责此事，可争吵越来越凶。有人发现江未经授权就拿走了毛办公室里的文件，并断定他们进行了篡改。当受到华指责时，江青抱怨道：“毛主席尸骨未寒你就想撵我走。你就这样报答毛主席提拔你的恩情吗？”

华答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的恩情。我要求你完整地归还毛主席的文件。因为我想报答毛主席的恩情，让每个人都团结起来，永远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至于赶走你，我还没有这个打算。你只要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人敢撵你出去。



>> 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1976年9月18日，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

在北京举行的国葬上，毛的遗体被放在一个水晶棺中。他的遗孀臂缠黑纱，献上一个缀有向日葵、绿色禾苗、麦穗、玉米和黄色谷穗的花圈，题词是“您的学生和战友敬挽……”三个星期后，江青及其三位激进的同僚被华逮捕。她想在毛死后扩大影响的希望化为泡影。



>> 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的首都群众（吕相友 摄）



>> 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

在长达一代多人的时间内，始终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存在的人物的去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当公民们跌跌撞撞地走过他的灵柩之时，泪如泉涌，这个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力图调节无法填补的内心失落感。

结 论

毛泽东尽管有五卷“选集”和一副学者的外貌，然而从本质上讲，他是个重于行动的人。他对社会变革的结果比对隐藏其后的理论更有兴趣。有位易动感情的学者曾经对他说，共产主义很可爱。毛泽东答道：“不，同志。共产主义并不可爱；共产主义是我们消灭敌人的铁锤。”

最初推动毛投身于民众生活之中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在晚年评论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有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始终催毛奋进的是对一个必须推翻的不合时代潮流的社会结构所束缚着的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关心。

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是位粗莽的哲学家。他对理性建树颇有兴趣，但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彻底的伟大思想家。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贡献就是用普通民众和教授都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同时使之地方化，以便中国人民能和欧洲人民懂得一样多。

的确，毛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就之一，是把共产主义从其欧洲无产阶级的发源地中解放出来，并将它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其他大陆、其他国家和其他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来。毛泽东力图用适用于人类社会所有发展阶段和可以为各种类型的革命变革提供依据的普遍性范畴来重新表达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他把农民放在提前为工业无产阶级的精英们准备好了的马克思主义地图上。他告诉马尔罗[22]：“你知道在我们之前，人民当中没有人向妇女和青年发表演说。自然也没有人

对农民演说。这是第一次，他们每个人都卷入了生活。”在这方面，毛是代表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来讲话和行事的。

推动毛前进的内在力量是对最残忍的家伙们的憎恶，它出自毛个人的反抗意识。他的父亲就拒绝在理论上把他当做一个平等的、独立的人来看待，如果这在实际上受到局限的话。他和父亲的争吵逐渐闻名乡里。毛决定从他生长的村子韶山出走，决心要证明父亲错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比父亲高明。另外，毛泽东也想借机提高自己的学识和品格。10岁的时候，他肩上挑着一点东西，第一次企图逃离祖祖辈辈居住的家乡。

一踏入社会，他便备尝各种父权人物的歧视一它们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的同学、传授知识的老师、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育较多的共产党同仁，以及拥有中国人所缺乏的各种技术和特权的外国人。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状况看，毛当时是位引人讥笑且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唯一的渴求是弥补受教育的不足。正如毛泽东自己在伤感的回忆当中叙述的那样，在北京没有人肯为一个年轻的“说南方土话”的图书管理员花费时间（令人惊异的是，拿破仑、斯大林等都有过类似的坎坷）。

在此情况下，毛并未仅仅停留在气愤上，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不为中国精英、中国传统、中国社会制度所接受，他决心在它们的歧视中和农民打成一片。只要他被接受为领袖，农民就有机会变成现代的不受束缚的人群。但是，一旦他的领导遭摒弃，农民的利益就会被忽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会议上，他说：“我是个被别人五次赶下台又请回来的人。所以，群众领袖不是自封的。他的地位是在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这个明确的鉴定人的标准在最初几年里是毛泽东博得拥戴者的广泛热爱的因素之一。

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耻受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中国共产党内其他潜在的领袖，在或多或少地遵循传统的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的同时，总显出有更多的兴趣让他们的莫斯科老师们高兴。但毛泽东却说什么也不追随俄国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大胆的领导方式。《水浒》里的罗宾汉式的英雄的浪漫的平均主义思想给予他的鼓舞同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他的鼓舞几乎相差无几。他教导说，人是平等的，即使他们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也一样—这在中国是个全新的概念。毛最精彩的论述之一是他在“文革”初期的阵痛中所作的一次讲话，其中谈到，愚民对暴君有利，而让人民聪明起来则对我们有利。毛为妇女的权利而战，为青年学生有权利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而战。

所有这些都是认为共产主义应当建立在一个由获得了解放的个人构成的社会基础上的远见卓识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后期，毛详细地阐述了共产党将在必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所遵循的纲领。甚至在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仍然认为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个人的解放完成后，要让人民准备过现代生活。实际上，1945年甚或1949年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不成熟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写这些东西是展示给美国观众看的；当然也是在寻求解除中国右翼势力中潜在对手的武装。但他的理论中有一点是真挚的，当1949年以后实现社会主义的力量积蓄起来时，他无疑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辩论说社会主义和个性—假如你喜欢可以称为集体和个人的现代化—作为中国人生活中的两项革命应该同时展开。然而，这一合理化进程中的缺点他却从未承认和探究过。

困难在于中国人顽固地拘泥于他们过去的行为方式，在新的合理的替代方式培植起来以前，毛的许多精力不得不花费在努力改变不合理的传统上。他的“红宝书”中的撒母耳微笑成分便是一例，读者会发现其中的某个段落在一份《人民日报》的顶端曾大加宣传过。毛的声音出现得那么经常，当他的革命在由旧社会塑造的个人构成的基础上展开的时候，这声音是正确而合理的。

例如，在1956年他说：“要教育出国同志，要老老实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好的、坏的、中间的都给人家看……我国有小脚，别人要照相，让他们照，衣服穿得不好，不怕难看，在外国人面前撒谎，总有一天会揭穿的。”任何访问过中国的人都会认识到，这些话是多么需要说出来，又是多么需要不断地重复。

然而，毛忘记了自己也应当是一个与别人平等的人。这并不是说他有腐化现象，在物质生活方面，他比起任何同僚都更朴素、更无追求。的确，他作为领袖因为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磨破了的袖口、松松垮垮的短袜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闻名世界。不过，使他难于与人相处的是他的孤僻。他始终与其他人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政治伙伴的江青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她既不理解他，也无法了解他。萧三在学生时代就认识了毛，后来他虽站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但仍与毛生活了一段时间。萧承认，“毛是我们当中最复杂的人物……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我比其他人认识他的时间都长，但我从未摸清他的底蕴。”

陈毅解释说：“当他掌权时，所有同志都把与他的分歧掩盖起来。他也不准别人向他道歉。”这可以作为毛的品格的证明。但实际上恰恰相反，他不准备和这些人开诚布公，过去他受到过他们的伤害，他担心将来会重演。

通过不允许同僚在理性和原则的基础与他有分歧，毛确立了自己一贯正确的前提，从而强行建立起一种个人专制。他告诉马尔罗：“我的理想没有实现。我总感到是这样。”毛泽东喜欢辩论上的短兵相接，宁肯与对手直接对垒，而不愿搞不端之举或退缩不前。他曾经说过：“思想要交锋，你一刀，我一枪。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彻底性。”但是，毛从来忍受不了失败，他是一个糟糕的失败者。

毛泽东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56年间，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声势日减的所谓党内“十次路线的斗争”上。在1949年以前的历次斗争中，甚至在50年代初期的高岗事件中，毛反对其对手的行动可以说是出于保护党独立于苏联人的控制之外的需要。可是，当1959年他转而反对彭德怀元帅时，他便开始犯严重错误了。彭对“大跃进”中经济政策的批评切中要害，而且表达了党内广泛存在的看法。后来，毛的某些拥护者对刘少奇的责难更令人发指。刘是位忠实而坦诚的人。当然，为了避免招致党内的混乱，他一直忍辱负重，听凭毛的训使。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两项最大的实验都失败以后，毛只能和一些二流人物—林彪、陈伯达、江青待在一起了，当然还有个别例外。大概可以预见，毛或者寻求打倒他们，或者寻求约束他们的行为。

上面说的那个例外是周恩来，毛和他的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周没有毛的领导魄力。但周身上有一种能使其成为他人思想的执行者，成为一位大臣而非君主的品质。确切地说，他可能更愿意去做别人让做的事情。自1935年遵义会议上，周把指挥棒交给毛以后，周一直是毛最好的外交家和助手。

毛可能富于报复性，但是，他对待反对者并不残忍，至少以其他中国统治者和共产党统治者的所为作尺度来衡量的话是这样。整肃在规模上没有苏联那么大，在导致死亡和肉体侵犯的程度上也不及苏

联。毛希望对手们能从自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改变立场和观点，甚至允许他们从监禁地或接受再教育的农村返回，清除错误思想，治病救人。

毛的缺点是无法和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且不因毛说什么而改变观点的人共事。他越来越不喜欢这样的同僚，有时甚至以个人的好恶报复他们。但毛的个人专断不是那种导致杀戮的或者监禁同僚的过分的个人暴虐，而是表现为不善于和真正有才华的人合作。

尽管毛有着光辉的思想，有和农民打成一片的真挚情感，后者使他产生了高度自信并决心实现他的理想，但是，毛缺乏让理想和情感发挥效用的实际的政治与管理技艺。他也没有起码的在一群政治家和管理家着手实现其理想的工作中进行指导的能力。促使他登峰造极、稳居领袖高位的精力出自他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又悲剧性地妨碍了他信任那些有着同样理想并能和他一起工作来逐步实现理想的同僚。

用毛不可能实现的雄心大志作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生涯只能说是失败。他的确领导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前几个世纪的数代人相比，9亿百姓过上了相当不错的生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客观作用，中国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不再温顺地等别人告诉怎么做，而是要坚持满足自己的要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几代人可能会谴责毛在共产党人统治的第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没能有效地利用国家的政治安定局面。那个时期，在令人发狂的政治口号喧嚣起来以前，本来可以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做更多的事，建设国民经济。以后的历史学家也许会说，毛在一个很多人并不关切人的尊严的时代过于热心地坚持维护人的尊严—但是，在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后，它就变得急需了。毛在“大跃进”中对经济做得太多，而在其他时期又大概做得太少了。

如果毛能够把类似“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这样两种其中都含有激动人心的积极因素的实验结合起来，如果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同事并愿意和他们一起共事，中国今天也许可能处在一种更令人欣慰的境况中。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并且极乐于把对毛的统治的不满意之处归咎于他的下属。

像穆罕默德·甘地—一个在地位上唯一能与毛媲美的当代亚洲人士或世界人士—一样，毛天生就是一位导师。和甘地一样，甚至更甚，毛把改造世界的愿望从教室里带到政治竞技场中。他在解放人们方面是光辉的，但在管理复杂的政治事务方面则是不成功的。与甘地不同，他不愿放弃权力，尽管1958年以后存在着不利的政治条件。他顽强地抱着他的权力，固守着他的信念，如同当年读书时在老师面前错误地抱定《三国演义》不放一样。

最后，谁能否认从韶山到北京乃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历程呢？谁会刻薄到足以说出毛过大于功的话呢？谁会妒嫉毛的声望和传奇生涯呢？他来自中国“受虐待的一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以，他后来非常热爱学习。他所知道的是贫困、堕落、剥削和非正义—他花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尽最大的努力和这些东西战斗。毛所进行的是贯穿整个中国文明国度的革命，这个国家就像整个欧洲那么大。

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武器，是因为他在需要武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正处于时兴阶段。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党逐渐树立起一种现实的观念，即重视农民的作用。这个阶段构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庞大多数，并显示过他们是如何战斗的。



>> 韶山群众前往毛泽东故居向一代伟人致哀

毛能使党掌握政权是因为他的敌人腐败，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掉以轻心。一旦掌权，毛便迅速地把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抵制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坚持保护人，哪怕以速度和经济比例为代价。

在20世纪40年代击败了日本和蒋介石后，50年代毛又宣布向地球开战，60年代则向人的本性挑战。他总是走极端—企求百花齐放运动中彻底的言论自由，“大跃进”运动中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完全平等。每一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党的支持。然而，每一种实验后，总有些沉淀积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无论如何，隐藏在成就后面的那个人仍然是个谜。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物，蕴含了对权势的憎恶和因教育或教养被社会拒于门外的愤怒，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不断从打击中站起，并且这些打击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创伤。他说服了许多最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参加到他的革命事业中来，然而，他见到的仅是他们一个个地牺牲在为革命成功而进行的残酷战争中。从他的几次婚姻生活中，我们只是偶然瞥见一丝感情的流露。在他的孩子们的儿童时期，他爱他们，但一俟他们成年，他便显得严厉而冰冷了。最后，没有人赢得他的心。对他来说，人的感情是第二位的。

译后记

毛泽东留给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科学思想体系。今天，人们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要当之无愧地继承这笔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首先必须对它作出全面正确的理解；而获得全面正确理解的重要渠道则是把这一思想体系同毛泽东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以及这一实践依据的中国特殊历史条件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可能深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而真正掌握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正因为如此，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日益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难度很大的工作。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毛泽东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革命家，他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大国中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为思想家，他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追求真善美的理论创新勇气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一种符合中国历史要求的思想体系，为落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前途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思路；作为

军事家，他依据对人民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制定了高超的战略战术原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战争奇迹；作为诗人，他留下了一篇篇气势恢弘、才华横溢的千古绝唱；同时，他又是一位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像常人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气质和情感，体验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的历史人格。此其一。毛泽东以其毕生奋斗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在中国现代史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的进程中，他始终处于时代潮流的中心，中国革命的轨迹同他的个人经历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烙上了他作为领袖人物的不可磨灭的个人印迹。可以说，不懂得毛泽东，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国现代革命史，反之亦然，要真正理解毛泽东，也必须对中国半个多世纪血与火的艰难历程有一个透彻的理解。此其二。毛泽东的一生全部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事业，他的功绩无与伦比，但是他在晚年也出现过一些严重失误，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他的真知灼见和错误言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状况。此其三。至少是由于以上三点，完整地、准确地、生动地再现毛泽东这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并对其功过是非作出令人信服的评说，无疑是一项相当艰巨浩繁的工程。

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对中外史学界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重要课题。多年来，国外学者出版了许多研究毛泽东生平的传记性著作，我们这里作为《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第六辑介绍给读者的这部由迪克·威尔逊撰写的《毛泽东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状况。

迪克·威尔逊先生是国外研究当代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他早年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后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性刊物《中国季刊》担任主编，现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从事有关研究工作。威尔逊先生在研究当代中国历史和人物方面有一定造诣，除这部毛泽东传记著作

外，他的主要著述还有《周恩来传》《长征，1935年》《亚洲的觉醒》《人类的四分之一》等。他曾数次访华，同我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我们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感到，威尔逊先生是以学者态度从事这项研究的。毛泽东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和讲话稿，这是研究他的思想和活动的基础资料。此外，还有许多有关历史文献和回忆录对于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革命实践及其历史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详尽准确地占有这些文献史料是对毛泽东生平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无论对于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都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工作。可以看出，威尔逊先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充分利用了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材料，这是本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的原因所在。

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有关文献史料是研究毛泽东生平的必要前提，但仅此还远远不够。毛泽东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参与历史活动的，在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的当今世界上，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他的言论和行动无疑会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晚年出现的严重失误，往往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威尔逊先生不是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毛泽东的。但是，作为一位学者，他比较能够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力求从他的角度对毛泽东作出比较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威尔逊先生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采取了以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为主线，兼顾他在其他领域中活动，同时穿插其个人生活的写法。这种有主有次、有详有略的全方位考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再现毛泽东极富特色的个人风貌，使本书具有可读性。

当然，毋庸讳言，像国外许多这类著作一样，本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由于在收集和理解文献史料方面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困难，

作者不得不大量利用第二手材料，甚至某些道听途说的东西，但又没能进行严谨的考证或鉴别，便据此作出某些推测性的叙述，这就难免出现一些不准确或失实之处。

另外，作者采用的某些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也不够妥当。

其一是所谓心理分析法。威尔逊先生很注重分析毛泽东的性格结构，并试图用他早年形成的个性特征作为解释他的政治倾向和历史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在西方传记作者中是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毛泽东作为一位现实的历史人物无疑具有与他人不同的个人特征，这种特征在他作出反应或选择时肯定也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因而确应加以研究，但是，毛泽东作为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毕竟是以他对中国革命特殊规律的理性认识为依据的，他的动机和方式只有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及生动的革命实践中才能找到其最深刻的根源。应当说，历史塑造了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性格，而不是相反。否则，过分强调他早年经历所形成的性格，往往会使毛泽东的革命生涯蒙上一层命定论的神秘色彩。其二是权力斗争的观察视角。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过程中，党内斗争无疑是毛泽东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种斗争，毛泽东带领全党克服了革命队伍内部存在的种种错误倾向，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当然在晚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这种斗争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但是，无论在正确地进行这种斗争还是在出现失误时，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斗争的实质都是事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原则之争。国外学者一般都对研究这种斗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他们往往过多地从个人的角度、从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问题，这就难免混淆事情的本来面目，无法正确地分析这种斗争的真实意义和功过是非。应当说，在威尔逊先生的这本书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

在本书中译本的翻译、校订和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其中有些疏漏和讹误之处做了必要的订正和注释，但未对所有细节一一加以核对，请读者注意。对于作者叙述中过于冗长的、游离于主题之外的或属于道听途说的文字，我们作了必要的删节。作者在英文原版中对所引文献史料没有一一注明出处，只开列了每章的参考书目，现在中译本的注释是译校者参阅作者的书目查对现有中文资料后注出的。本书原中文译本为《历史巨人—毛泽东》，此次重印改为现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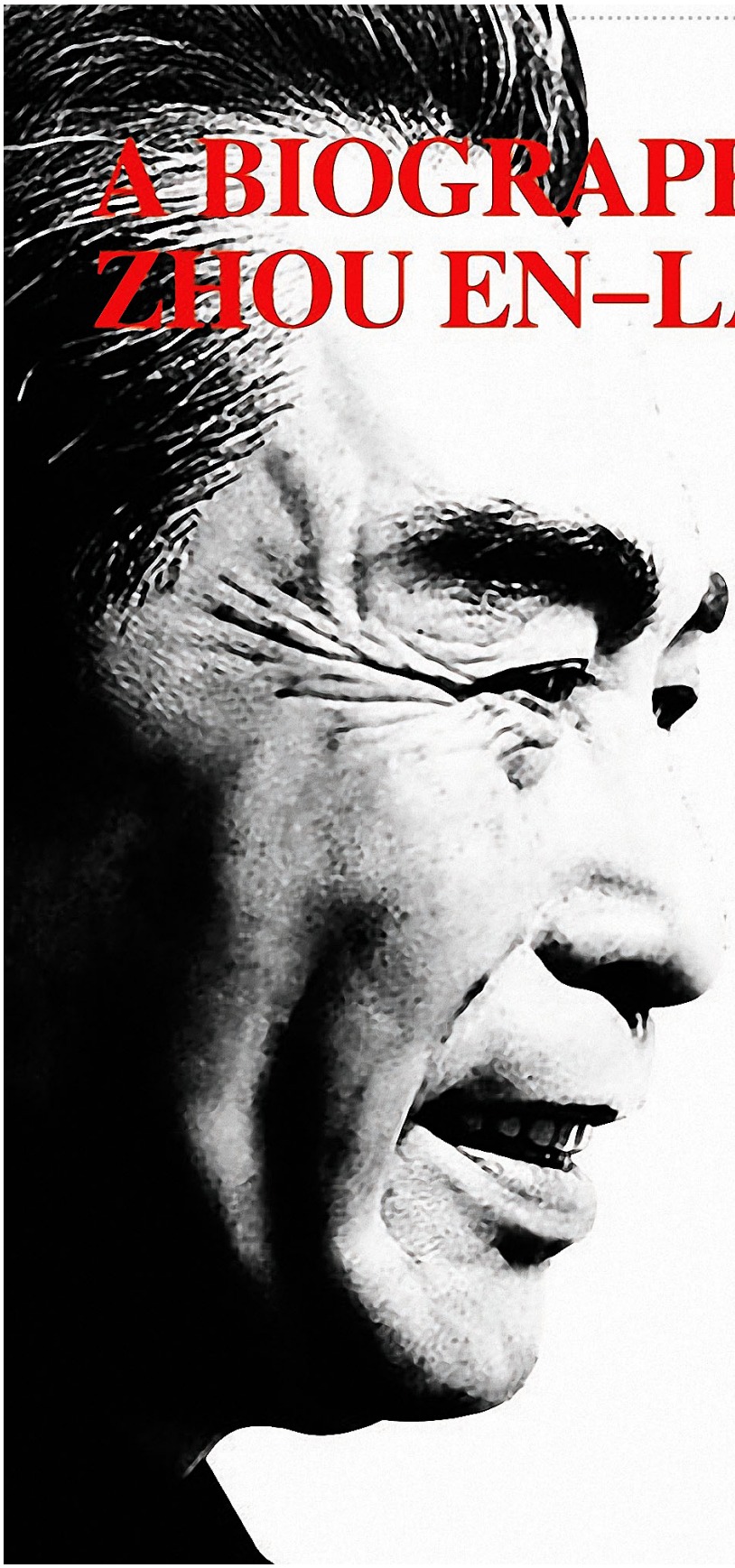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负责组织本书的翻译、校订和编审。参加这一辑编审工作的是石仲泉、张宁。杨凤城和张爱茹参加了本书的统稿和校订工作。张宁和张爱茹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杨凤城（第17、22、23、24、25、26、27、28章和结论）、范琦勇和刘红卫（序、第1、2、3、4、5、6、11、12、13章）、刘一皋（第7、8、9、10章）、毋稷祥（第14、15、16章）、温乐群（第18、19、20、21章），刘晓、刘晶、王树荫、陈先奎参加翻译了第一、三编的部分内容。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翻译、校审和编辑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

(1) 此段话未查到中文资料。—编注
(2) 此处引文与中译本文字略有出入。—编注
(3) 从作者的介绍看，这个孩子是毛岸青。—译注
(4) 指俞平伯。—译注
(5) 指蓝翎、李希凡。—译注
(6) 应该是1954年夏天。—译注

(7) 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由于捕杀麻雀，虫灾日益严重。麻雀被移出害虫范畴后，臭虫填补了它的空位。
(8) 德文，意为“壮实的小痞子”，马克思曾在其著作中用这个词组代表人民。—编注
(9) 指陈玉英。—译注
(10) 《红楼梦》中的一个典型短语。——译注
(11) 指北伐战争。—译注
(12) 华任省委书记是庐山会议后。—译注
(13) 此段话未查到中文原文。—编注
(14) 指孙冶方。—译者
(15) 这段话并不是《海瑞罢官》剧本里的，而是吴晗《海瑞骂皇帝》一文中的话。此文最初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于1959年6月《人民日报》上，后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的《海瑞的故事》一书。—译注
(16) 疑有误，似应为北京。—编注
(17) 李达。—译注
(18) 以上两段话未查到中文原件。——编注
(19) 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政委，陪同接见“四大学生代表”。——编注
(20)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译注
(21) 《问题与研究》，台北，1977年9月，第101页。—译注
(22) 马尔罗曾担任法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职务。—译注



A BIOGRAPHY OF ZHOU EN-LAI

周恩来传

[英]迪克·威尔逊（DICK WILSON）◎著
封长虹◎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录

作者序
译者序
第一部 求索
- 多次收养（1898～1913）
- 就学津门（1913～1917）
- 东渡日本（1917～1919）
- 身陷囹圄（1919～1920）
- 留学法国（1920～1924）

第二部 奋斗
- 革命婚姻（1924～1925）
- 占领上海（1925～1927）
- 南昌起义（1927）
- 重获信任（1928～1930）
- 技高一筹（1931～1934）
- 长征路上（1934～1936）
- 虎落陷阱（1936～1940）
- 猪变成鸭（1940～1943）
- 赢得胜利（1943～1949）

第三部 开国总理
- 蓝色睡衣（1949～1952）
- 国际舞台（1953～1955）
- 百花齐放（1956～1958）
- 拨乱反正（1959～1961）
- 非洲之行（1962～1965）
- “文革”之初（1966～1967）
- “文革”受困（1967～1968）
- 握手言和（1969～1976）
- 尾 声

结束语
新版译后记

作者序

“哎哟，天哪，你还在这里等呀！记者招待会的地点已经变了，我们已在内阁大楼举行过了。很抱歉，非常抱歉未能通知你。不过，我可以肯定，总理将会单独与你会晤，以此来进行弥补……”

尼泊尔礼宾官身着宽松的白衣裤，头戴高高的白色帽，把我引向一簇刚刚来到拉那宫的人群旁。渐渐地，人群闪开了，从中显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惊讶的瘦小而又虚弱的身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真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情形。按照原计划，周1960年对尼泊尔的这次访问将在他的下榻处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下榻在古老的拉那宫，距尼泊尔王国首都加德满都3英里开外。我到尼泊尔去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采访来访的中国人。不巧的是，在他们访问的最后一天，我要替我的杂志干些其他事情，所以没接到记者招待会变更地点的通知。

因此，按照约定的午夜时间，我单独前往拉那宫去参加记者招待会，结果发现那里空空荡荡、寂静无人，只有两个持枪但却熟睡了的哨兵。我战战兢兢地从他们中间跨过去，谷仓般的大厅里见不到一个人，出现在眼前的只是布满地毯的烟蒂和鸡骨。没有中国的采访者，没有尼泊尔的官员。

而此时此刻，我却面对着62岁的中国总理。尽管是由于尼泊尔人的过错而不是周的过错使我失去了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机会，但周却欣然接受了单独会见我以示补偿的建议。当时已过午夜许久，中国方面的随行人员已到各地访问了几个星期，预订第二天清晨黎明时分起飞

回国。他们人人都感到疲倦了，然而周的随行人员中的十几名官员，其中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却站在那里等待着这个未被列入计划的会晤的结束，然后他们才能去睡觉并为他们的启程作准备。他们中的一些人眼睛盯着我，带着一种不露声色的愤懑感。

但是，周却不是这样。他跟我谈了40分钟，却显得谦恭耐心。我感到有点尴尬，便把提问限制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如周的这次访问如何改善了中国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并希望得到简单的回答。但是，周却进行了极为详尽的阐述，一个一个地讲到了他这次所访问的国家。这又持续了大约半小时，其中包括翻译占用的时间。实际上，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他所讲的话与记者招待会上发布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因此，我的单独会晤并没有获得很大的价值。

如果只是周一个人在场的话，我将借他这次邀请的机会多提些问题。但是，由于陈毅不停地交换着左右腿来支撑他那相对而言较为肥胖的身体，再加上那些年轻些的随行人员斜着眼睛望着我，所以我便决定到此结束。然而，周却还没讲完。他继续往下讲，好像时间还很多似的。他问我是否去过中国，是否知道蒙哥马利将访问中国，以及我是否也愿意去中国，等等。

我的心情激动起来了。一年多来，我一直在设法进入中国，但却未获成功。

“欢迎你！”总理突然用学生式的英语说道，并扬起他的双臂做了个表示欢迎的姿势。

中国官员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好像在说：“终于结束了！”我激动地走出拉那宫，闯入了喜马拉雅山那寒冷的夜空之中。这简直是一场梦。周善于使事情看起来像梦一般，但却不大善于把这些梦变为现实。我后来给他写了几封信，但却从未收到过有关邀请方面的信函。

只是过了数年，在蒙哥马利访问了中国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中国访问。但是，周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依然历历在目。他注意尽可能全面地满足我的要求，毫无傲气和任何架子。他的行为近乎卑微，但他的助手们对他的恭敬态度却反映了他所具有的政治权力的强烈影响力。

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相当多的中国人在挨饿，俄国人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经济专家，中国统治阶层两个权力大于周的人物之间难以缓和的矛盾似乎在加剧发展，中国又感到自己正被敌对的美国军事力量所包围，并且尼赫鲁在中印边界争论问题上不愿进行妥协。然而，40分钟的时间内，在繁忙地工作了一天后即将结束时，周却令人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似的，只注意倾听并回答我的提问。而这些问题是别的记者曾向他多次提出过的。这一天是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庭，在外面连续工作了许多天后的最后一天。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这种感觉偶尔也因像尼赫鲁、肯尼迪等权势人物的影响而出现过，但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周几乎给每个见到过他的人都留下了同样的印象。周体现了旧时中国那些文雅、礼貌和谦逊的品质，然而他也用这些品质来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把引起暴力作为自己政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因为这些，才使人们都对这位温文尔雅的总理感到困惑不解。他的言行举止温柔和蔼，然而，为了使他的国家能迅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封建主义进入现代社会，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却显得冷酷、好斗，甚至是不可理解。这个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曾表现出良好理智的人，为了杀一儆百，也曾下令处决过叛徒，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人革命的第一次浪潮中容忍了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

周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大陆欧洲对他的才华和智慧有着一致的印象。《世界报》《革命者》等报刊均用大标题把这些表面印象归纳成文。亨利·基辛格发现周是他所见到过的“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两三个人物之一”，称他“文雅、非常富有忍耐性，极为聪慧、机敏”。哈马舍尔德说周是“目前为止我在对外政治领域中所见过的最优秀的人物”。在法国外交部长E·马纳克看来，中国的这位总理是“一个完人”。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表现虽然略显不同，但他们却都有同样的感受。白修德发现周是他遇见过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面前，我的不信任感几乎完全没有了”。但后来，白修德却改变了他的看法，把周与1949年后共产党机构所实施的统治等同起来。因此，在白修德的脑子里便出现了另一种看法。用丹尼斯·布拉德沃里的话来讲，周“或许是他们当中最好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比毛主席本人更富有弹性的革命者，以及一个对资本主义世界来讲更为危险的长期的敌人”。

这种人最初是如何获得了改造自己的祖国并使之民主化的动力的呢？这是有关周恩来的第一个大问题；而他如何渐渐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这种改造的媒介则是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大问题是为什么在半个多世纪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使他人身居最高的位置，而自己却拒绝这种地位；第四个大问题则是，他为什么继续支持自己过去的对手毛泽东并跟随其后参加狂热的、毁灭性的1958年“大跃进”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与毛及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比，周显得更为开明，更加信任人民，对世界历史了解得更广泛，出访过更多的国家并会见过更多的访问者。但是，在这个面带笑容的领导人和颇具魅力的外交官形象背后，一个真正的周却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深刻认识。

在加德满都的那个4月之夜，当我离开拉那宫时，内心怀有一种良好的感受，即周恩来令我感到更加具体一些了。我羡慕他的魅力与技巧，后来我继而对他的机智、敏捷和远见感到惊讶。这种好奇心导致了20年后我对这个人及其一生工作的刻画与描写。

译者序

《周恩来》一书从翻译出版到今天已长达14年了。在此期间，该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发行数量居高不下，社会效益越来越好。很多读者写信至译者和出版社，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好书，颇具可读性。这无疑使译者和出版社想到了如何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对此书的译文质量和出版质量加以改进的问题。为此，译者集中时间对译文进行了必要的修改，修改的内容既包括语句，也包括部分史实。鉴于出版社要出领袖译丛，译者决定将修改后的译文交其出版。

值此再次出版之际，我们要感谢作者迪克·威尔逊先生。他的支持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该书的先决条件。

1996年11月间，迪克·威尔逊先生曾来华访问，当时他极力在寻找译者，希望能和译者见上一面。尽管我们通过多次电话，但毕竟我们未曾见过面。遗憾的是，译者当时出差不在北京。等我回京后他又离京回国了。在此修订再版之际，我们要向迪克·威尔逊先生道声问候，祝他健康长寿。

封长虹

2003年1月于北京

第一部 求索

多次收养（1898～1913）

在淮安，坐落着一栋雅致的上流社会的住宅。对一个注定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人来说，这里似乎不可能是一个起步的地方。然而，没落的周氏家族的绅士们，尽管他们在中国东部海岸那繁荣的城镇里挣扎着来维持自己的官吏阶级利益，当他们听到1898年3月5日出生的那个孩子成了中国最著名的总理的消息时，却根本不感到惊奇。他们觉得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事。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诞生在淮安城内驸马巷的这所住宅

今天，如果你到江苏省的淮安去的话，人们会带着你穿过一条两壁洁白的通道，进入那老式的却又具有新的传奇色彩的房子里去。房子上面写着：“周恩来总理故居”(1)。这栋房子并不算大，仅仅一层，但那砖砌的墙壁却厚厚实实，那支撑着房檐的木柱雕刻得精致华丽，那传统的灰色中国瓦片昂首翘望着天空。

在这栋房子里，你可以看到周降临人世的房间，他祖父的居室以及他父母的卧室。屋外的院子里，有一小块菜地和一口古井。整个故居显得古老陈旧，在一个国家目前正忙于现代化的进程中，它却俨然像座静静的小岛。按照当地的水平来讲，这栋房子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淮安县城坐落在大运河畔。这条大运河是过去皇帝们修建的一项了不起的人造工程，它连接了中国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通过许多沼泽地、湖泊及水路，使江苏中部变得犹如中国的荷兰。这就是周恩来的家乡所处的位置。长江流域大量的稻田，使这里变成了一块非常富饶的土地。

在填写大学入校表格中出生日期一栏时，周恩来写道：那是在“民国成立之前的第十三年”(2) ——一个令勤劳的中国人民渴望已久的共和国，周为了巩固这个共和国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周恩来出生时，一个旧的世纪正在走向死亡，因此，他的童年经历了犯有时代错误的清朝皇帝统治下的最后几年，而这个清朝皇帝则是一系列统治中国的皇帝中的最后一位。(3)

周的家庭长辈们是一些有修养的、遭受了艰难时世磨炼的绅士。他的国家竭力让人们知道，在无能政府的统治下和来自海外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个自豪的文明的国家走向了衰落是多么令人感到屈辱。欧洲列强正在欺凌中国，侵吞它的领土，强迫它接受带有掠夺条件的贸易，可软弱无能的王朝统治者们却对此一无所措。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

周的父亲—贻能（1874~1942），有着玩世不恭的特点。他一生没有什么成就，但却是个开朗的人。不过，他对长期在中国实行的崩溃中的官吏制度感到不满。他从来没有得到过县官职位，而这是他受的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他那著名的儿子出生时，他才不过24岁。孩子取名为恩来，意为“恩惠到来”，是用以对孩子的来到表示感恩和期望。但是，贻能徒劳地期待着，得到的只是外省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职位。当周恩来几十年后成为总理时，他常常十分严肃地这样回忆他的父亲“一个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时也称30美元(4)。



周恩来的故乡—历史文化名城淮安

这位父亲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在几个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置生活的压力于不顾，对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饴，以喝米酒和吟颂一本诗集来打发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里，墙上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从这张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老式大袖衫，神态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却流露出安宁的圆滑老练。

如果周的父亲当初“成功”了的话，周或许获得的会是一种完全的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正如事实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破产的官吏家庭”里；或用他的中文传记之一的话说，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财产意味着什么，并且也更进一步感到了什么是不公平。在中国的属相中，周是生于狗年，因此，一个算命先生认为他是个具有潜力的正义的斗士—谨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却固执，是个爱挑剔错误的人。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1877~1907），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出身于一个杰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娴熟于中国传统的交往。家中房间里的照片显示出她的热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几乎容易感觉出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并不是通过受教育发展而来的。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她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伤或许使她失去了对孩子的兴趣。

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裂的情况下，主张南北议和。

周的童年并不具有典型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孩子所过的平静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当还是个几个月的孩子的时候，他便被过继给了叔父贻淦，因为贻淦病得很厉害，唯恐无嗣。这种收养并不意味着要搬迁远去，他的许多叔伯都与周的父母同在一个院落内一起生活。周的生父的愿望常常可以用来解释周氏大家庭这种集体精神的非凡表现，即保证他那日益衰弱的弟弟在家族牌位中的位置能通过男性后代继续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中是非常重要的。周的生父的另一个动机是为了治好恩来叔父的疾病，而这一说法是最近才对去淮安参观的人们透露出来的。如果真是出于这一动机的话，那么此举是未奏效的。



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



周恩来的养父周贻淦

一位中国作者评论了这一情节是如何表明“中国的传统具有一种解除无能为力的父母所肩负的重担的办法”。人们不禁要怀疑这位生父的

不负责任。此外，生母因自己的父亲的去世而产生的悲痛，使她变得不能与自己的丈夫一起共同对孩子加以照料。这些表明，周从小就离开了亲生父母，其生身父母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并把他们留养在家中。

根据一种说法，童年的周是屡遭不幸。他被收养后不久，其继父便死了。他当时还只有1岁，由守寡的养母带大。养母是淮安陈氏家族中最了不起的妇女，她有自信心，具有高度的智慧和社会良知。周深受这位妇女的影响，以至于在其后来的生活中，他完全把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正如他曾用此来称呼他的生母。他承认自己有两个母亲，而这使一些传记作者感到迷惑不解。

养母陈氏没有受过教育，[5]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她的暴烈脾气，使她不可能让人来教她。她没有读过书，因此她的一些才艺仅局限于普通女性的料理家务，诸如做饭和刺绣等。但是，她却强有力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威，通常以严格的家教来对孩子们进行约束。当她站起来时，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周胆敢坐着不动；当她发脾气时，没有谁敢插嘴多言，除非周有可能面带微笑提些谨慎的建议或尽力使她消气。她肯定对恩来有着偏爱，她思维敏捷，据说她能在与当地佛教法师的辩论中坚持自己的观点。

她喜欢讲故事，尤其是讲那些抗暴起义的古代传说。在她的身边，听着这些故事，周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而这可能使他反抗家长专制的梦幻得以正式形成。他的同事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对他了解这些故事的程度及这些故事仍能够使他激动不已而感到惊奇。“我感激我母亲的指导，”他这样说，“没有她的关心照顾，那我就不能够在事业追求方面培养任何兴趣。”

然而，在周的性格发展过程中，起过促使其形成作用的另一位妇女，则是那个家庭奶妈。她非常喜爱他，常常告诉他有关周家大门外

农民们过着的艰苦生活。她详细给他讲述50年前太平军起义、惩处贪官污吏、劫富济贫的故事。



当周6岁的时候，他的生母时来运转，她和她的弟弟合中了1张彩票，得了1万元的奖。他们有了这笔钱，就住到了他的外祖母的家中。这里离大运河约有10英里路远。在这个地方，她厮守着一个古怪的家庭。这个家庭包括她的丈夫贻能（周的生父）、周恩来、周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以及周的养母。尽管周的那些亲属关系不断地从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小家庭转变到另一个小家庭里，但他始终是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

在淮阴，周进入了他外祖父[(6)]留下来的大藏书室。在这3年间，他培养了对唐诗的兴趣（他对古诗的深刻记忆，后来使他的朋友们均感到惊讶）。

这是他这段生活中较为轻松愉快的一面。然而不幸的是，其生母中奖的钱不久就花光了。她的身体状况也随着命运而不断下降。当时，中国的这一部分土地正遭受饥荒和经济萧条的严重破坏。周此时才9岁，却不得不经常往当铺里跑，并到亲朋家借债，然后从药店里买些药回来给他那痛苦的母亲治病。但是，她的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于1907年离开了人世。

正像周恩来仅仅不到1岁时就“失去”了养父一样，当他现在才10岁时又失去了两个母亲，因为他的养母在他的生母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了人间。他分别从两个母亲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他从生母那儿继承的是身体方面的东西，而从养母那里继承的则是文化修养方面的东西。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两个母亲中的位置。“我婶子，”他后来解释道，“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便成了我真正的母亲。在10岁之前，我一直跟着她，甚至一天也未离开过她，直到她和我的生母两人都去世为止。”

在周仍未跨出童年之前，无疑这是他生活中最艰难的时刻。他和他的那些逐步衰落的亲属[7]伤感地回到了他们原来在淮安的家中，生活变得更为贫穷了。只有诚实厚道的老奶奶继续留下来照料周和弟弟们。他再度开始往当铺里跑，被迫负责在院子里种点菜以养活家人。

但是，中国家庭制度的好的一面是，它能为有抱负的年轻人开辟一些途径。此刻，周的其他几个叔伯开始对周产生了兴趣。据说其中有一个在回淮安探亲期间同周进行了一次谈话，并让他到北方去。根据另一种说法，是周主动给他的两个叔伯写信的，而这种说法听起来更像其他人后来回忆的那样，即周“说过以后便出走了并一直走自己的路”。

在12岁那年，即1910年春天，周离开了他那绿色遍布的家乡，来到了遥远而干燥的北方。这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满洲，日本对它长期投以贪婪的目光。这两个当时在满洲工作的伯父都在现在的辽宁省。[8]周首先住在铁岭，恰好这时他父亲也在铁岭，他同父亲住在一起。贻谦在一个税务所工作，他乐于给侄子讲清楚国家究竟是如何四分五裂的、需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周开始阅读有关历史上革新者的书籍和小册子，如梁启超—他的革新思想曾遭到宫廷的镇压。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扎过辫子。我满脑子旧思想、旧东西，甚至连资本主义都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一些）。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周恩来在祖籍绍兴书房内曾留下的笔和墨

几个月后，周进入了附近的一所第一流的小学读书。他的伯父贻赓没有孩子，所以不久便把他领走，让他在奉天（今沈阳）进了一所更好一点的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靠近沈阳老城的东门，作为传教士赞助创办的学校，它与其他学校相比，要显得更加进步些。在此校3年间，周在书法和国文两门功课中均属全班第一。他的一篇作文被指定为全区的范文，还有一篇被选入一本集子中而发表并参加了评展。

他采用一些办法来对付学校中的那些恃强凌弱的学生，而他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反复使用了这一战术，与那些受欺负的人结成朋友，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条联合战线，以反对那些横行霸道的家伙。然而，同样的一个朋友却把他描绘得“害羞”，特别是当他被点名站起来朗读课文的时候。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的是，他似乎确定知道自己想学点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学。他在家坚持广泛阅读历史和政治学方面的书籍。一次，校长问学生们为什么要学习，得到的都是些很平常的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或“为了找份好工作”。只有周回答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十几岁的青少年周，现在已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开始与其终生的世界观相接触。他的身边现在都是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男性长辈。在家接触的是他过去远离的伯父，在学校则是他的新老师。历史老师高[9]给他介绍了一份激进的刊物，其中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政治见解和令人兴奋的民族主义语句。周开始了解到达尔文、米勒、卢梭及宪法保障下的人权概念。通过阅读有关康有为的文章，他脑子里产生了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的梦幻，追寻共产和理想的共产主义。在他的同代中国人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方面的热心者，包括湖南省的另一位颇有头脑的十几岁的年轻人—毛泽东。

这些年轻的革新者—包括周，他们的靶子是当时的政府对大众愿望的置若罔闻、中国施政的专断蛮横、当政者对欧洲几个世纪来都已公认的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冷淡漠视、妇女的低下地位、痛苦落后的女人裹足陋习，以及对智力活动与教育的极为严格的束缚。

周的老师通过向他介绍著名的《新民丛报》，给他指出了革命的方向。在这个杂志中，梁启超以激昂的情绪抨击了当时的那些非正义、不平等的现象。这两个老师为周恩来指明了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起谈论早期革命者的殉难事迹，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周和他的同学们潸然泪下。

周在东关模范学校就读的第一年，一个偶然到来的机会使周的一些理想得以付诸实践。1911年，革命党人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取而

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当革命的浪潮冲击到沈阳的大门时，历史老师高毅然剪去了他自己的辫子，或者叫“猪尾巴”，蔑视那古老可笑的人人都得扎辫子的满族制度。周也剪去了他的小辫子，加入那些从异己的清王朝习惯中解放了自己的中国人的行列中。然而，不久他便感到迷惑不解，因为革命党人分裂成了一些集团和派别，各自追逐着他们自己的利益。

唯一的一个有前途的政治团体（其中包括孙逸仙）是1912年创建的国民党，其政纲是使共和国实行议会制。周后来在这一阵营内度过了几年正式的政治生涯。

由于周来自鱼米之乡，那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因此，他发现中国北方显得萧瑟奇异。学校的其他同学都比他个子高，体格也比他壮，所以他们称他为“小南方佬”，也含有“小蛮子”的意思。他们以高粱、小米为食，而见不到他曾常吃过的大米。“我1910年来到沈阳，”他后来回忆说，“在那里生活了3年。当我刚到时，我扎着一条小辫。我的身体之所以现在还这么好，应该感谢沈阳的高粱米和从黄土地上刮起的劲风。”

“在满洲的生活是有好处的，”周回忆说，“当我还在小学的时候，无论是冬夏，我们都要做室外体育锻炼，把文弱的身体锻炼强健了。再一个好处是吃高粱米，这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我的骨骼长得更大了，也锻炼了我的肠胃，这就使我的身体能够适应以后的战争年代和繁忙的工作。”

一个敬仰周的人格的人把此归因于一种“中国的南方人独特的灵活性与北方的勇猛相融合的保持平衡的混合物”。或许，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从中国的这两个“世界”中得到了最大的受益，从而更能够理解并敢于领导这个幅员辽阔并且变化万千的国家。



1912年时的周恩来

1911年，有个朋友带他去参观仅在6年前发生的日俄战争的一个战场遗址。他这个朋友的祖父气愤地讲述了这场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两个外国之间的战争，还讲到了那些被屠杀的及遭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国人。据说，周当场悄悄地发誓，要报仇雪耻。在13岁那年，他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了。

周于1913年即他15岁那年，毕业于在沈阳念书的那所学校，沉浸在一片鲜花的告别之中。周给一个朋友题写了如下激动人心的话："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当中华在全世界飞腾之日，希望我们能再度相会。"[10]这个特别的男同学很幸运地生活了以后的40年，他拿着已经破烂的字条到北京去找周总理，以证明周总理敏锐的判断力。作为一个中年的掌权人，周重新读了他青少年时所写的似乎具有崇高境界的字条。他可能对他在1913年写的带有沙文主义急躁情绪的这种纪念物并不完全感到舒服，因此，据说他很快把这个字条藏到一个没人能够发现的地方。

60年代，在一个很少公开的有关他的家庭的参考资料中，周恩来总理解释了他为什么有半个世纪没有回去访问过他的家乡，尽管周已经"把我家的房子捐给了政府"。他的婶母曾不太合适地指出了"我出生时的地方，事实上她并非真正知道"。江苏省委坚持要保留一间房子作为纪念……"介绍这种封建的思想会有什么好处呢？这难道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再说这还牵涉到一些祖坟，尽是些没必要的东西，请采用深葬法了之。"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想不引人注目地从淮安这一景象中消失，但是人们理所当然对这位当地英雄持有纪念的兴趣。

他的童年始终在不寻常地变换着一身躯从中国的沃土中心移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情感上当他还是个婴儿时便从他的生身父母那里送给了他的养父母。接着，作为一个10岁的孩子，他便开始痛苦地料理两个母亲的丧事。但是，这一切过去以后，他愉快地投入了500英里

之外的伯父家中。每当他谈到家庭的早年破产与应酬门面及自己在中年时对老父亲在经济上的保守行为时，总会流露出一种控制不住的痛苦感。由于生父没有尽责任来照料他，养父在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前就去世了，而几个叔伯又只是部分地对他起了作用，所以周从未有过一个令人满意的父辈形象，也没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行为举止可以作为榜样来效仿。

周把这些经历作为从事革命事业的基本磨炼。他的父辈们终生悔恨那已消失的过去，但对日益逼近的未来却永远是那么的困惑。他们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再也不能认识到的易于变化的世界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周抑制着从小以来就怀藏的怒气，心中燃烧着已经成熟了的改造社会的激情，并认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通过暴力来改变它。

就学津门（1913～1917）

周15岁时，便开始自己操心上学的事。在沈阳时，他住在四伯父周贻赓家中。1913年，周贻赓工作变动，调到天津，在长芦盐运司催运科当科员。周恩来随伯父母一起迁到天津。周贻赓没有子女，周恩来同四伯父、四伯母生活在一起，住在天津河北区的三间平房中。由于天津的学校中有英语课，周恩来先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然后考入天津的南开中学。



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



周的志愿是南开中学[11]，这是一个由美国资助的学校，以不墨守成规著称，而这却引起了他的叔伯们和他父亲的担心。但是，由于已通过了入学考试，周不顾长辈们的意见而注册入学。

天津，一个旧工业城市和商业港口，对中国的未来完整来讲，它充满了教训。这些教训包括大量外国人住在不受中国司法管辖的地区内，叫做“租界”，另外还有残暴的军阀统治。南开可以为促进周的天才和理想得以发挥和实现提供一块合适的阵地。他所经历的封建家庭生活的衰落，使他有条件接近激进主义。现在他的那些想法有了实践的机会。

1913年夏末，周到南开中学报了到。此前教过他文学的老师为庆贺这件事，写了五首诗赠给周恩来重返南方[12]。

南开在对待学生及其观点方面，采取的是自由甚至是民主的做法。然而，该校的学术标准是很高的，考试往往是很难对付的。校长相信应该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发展他们自己。他同情周希望在经济上独立的想法，因为直到这时周还在依靠自己的伯父给予经济援助。[13]但是，伯父的收入后来也花光了，学校的学费又高，周在天津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干点活，如抄写点东西、为学校刻刻蜡纸等，以便挣点钱。

周的一个同学回忆说，周当时只有一件蓝色棉上衣，他每个星期天把它洗洗，晚上把它晾干，然后星期一又穿着去上学。

根据周入学考试的成绩，他被分到五班。[14]但是，由于他的良好背景及他给人的印象，学校允许他直接进入了四班。当他进入四班的教室时，唯一空余的位置是挨着一个叫吴大个的非常高的学生，周不得不与他同桌上课。南开的学生们和中国其他学校的学生一样，常

常根据他们所来的地区形成一些小团体。吴是一个摔跤冠军，是东北小团体的领袖，这个小团体比起其他小团体来，显得大而热闹。吴后来讲道。

当下课时，周向他的邻座介绍了自己。

“喂，吴，你在哪认识了这么一个英俊的男孩？”一个东北学生说。

“还穿着一双非常好看的袜子。”另一个补充说。

当时周的确穿着一双红蓝相间的袜子，对此那些东北学生明显觉得挺好笑，这使周感到不好意思而脸红了起来。姓吴的那个同学带着自己的新同桌到处转。在那以后的几天里，那些东北同学总是逗弄周，说他穿花袜子，还说他穿衣整洁。但后来他们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周和吴一起去上课，当他们再次逗弄周时，没想到他身边的新保护人吴把他们训斥了一顿。从此以后，那帮学生再也不敢开此类玩笑了。但是，周在宿舍里还是受到欺侮。“他们奚落他着衣讲究。”一个与周年龄相同的人记得当时的这一情况。

周渐渐地与吴形成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一起吸收了6个结拜兄弟。周的另一个伙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叫马骏，是个穆斯林。他后来在天津作为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之一与周在一起亲密工作。



在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然而，在南开中学上学期间，对周的进步起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而是校长张伯苓博士。这位杰出的现代教育家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周产生了兴趣。当他几次看到周在一小时内完成了要求两小时做完的作文后，他发现了这个男孩的才能。一种相互爱戴和尊敬之情在他们之间逐步产生，而漠视了政治界限，因为张是一个基督教徒，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跟着几个不尽满意的父辈人度过了他的童年后，周把张校长当做一个可靠的权威和向导，以至于当他第一次离开学校时，他竟把学校管理这一行作为自己选择的职业。

在南开中学的第一个学年里，周写了一篇文章，激励同学们尽可能地为国家而努力学习，肩负起中国未来的责任。这是一种保持了周恩来特点的信仰和爱国热情的混合物。他加入了讲演会，参加和其他学校的辩论。为了使所有的事业都获得成功，他通常在其他同学都入睡后，继续工作到深夜。

所有这些都减缓了他的经济问题，因为他的一个老师推荐，鉴于他家庭经济困难和他在学校的优秀成绩，他应该享受免费。第二年，他成为学校的免费学生。当时的学费是一年36元，另加24元的寄宿费，还有每月4元或5元的伙食费。周的生活作风是简朴的。“我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最后两年期间，没有从家里得到过帮助。我靠奖学金生活，而这奖学金是我作为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获得的。”

作为校长的张伯苓还热心于戏剧。不久，他把周也拉入了学校的舞台演出活动。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常常由男生演员创作的剧本，不仅是为了娱乐，同时也是为了受教育。他们意欲使观众从中发现民主的真谛，科学的思想，妇女从传统的社会地位中获得解放及破除迷信等。在封建习俗中，他们试图打破—但是还不能打破—这样一种说法，即女人不能与男人一起同台演出。因为在莎士比亚的英国，男孩们不得不志愿扮演女性角色。由于周长得好看，声音尖细，以及他巨

大的魅力和沉着冷静，他明显是这类角色的候选人。因为周志愿演了一次，以后便形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扮演女角色，在《玩偶世家》中演娜拉，同样在《一元钱》《一念之差》里扮演了更朴实的女角色。

周的演出获得了高度的赞扬，并且值得自豪的是当《一元钱》这场戏1915年从南开转到北京演出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甚至因扮演女角色而收到了表示崇拜的信件。他长得如此潇洒，以至于他可能成为电影明星，用他的表演技巧和兴趣使他向那方面发展。

他的家庭显然认为让他们的孩子降低身份去扮演女角色是件伤风败俗的事情。或许，这是因为他们瞧不起表演这一职业。演员终究没有资格参加行政公务的考试，而行政公务却是通向社会名望之门。

在后来作为政治家的生涯中，他运用这些舞台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他开展辩论的艺术是绝妙的，”周的一个同事观察到，“包括不时故意装出的语句不连贯和不流畅—但却能说服每个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他演剧时，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使他的观众也都跟着他笑，跟着他哭。这才是在演戏！”

周约在30年后曾回母校[15]看了一场男女共同表演的戏剧，他低声对他的老校长张博士说：“老师，时代真是变了。现在男生和女生可自由地加入同一场戏进行表演。我记得我们在南开演出时女生是不能登台的。”

老师的反应是上下打量了一下他从前的学生，咧嘴笑着说：“你知道，你仍然能够化装上去进行表演。我敢肯定，你比现在台上演出的那个姑娘演得要好。”

当周成为中国的总理时，他能够通过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尽情地表现自己对穿着的喜爱。他在访问国内的少数民族和一些邻国时，总是穿上当地的服装，并且有一些他穿着纱笼和其他服装的图片。另外还有一张他试着戴上华丽的巴基斯坦头巾的快照，他在这张快照中显得幽默诙谐，富有表情，使他能够获得许多镜头。

1914年年初，周和两个朋友建立了一个课外学习的新社团，取名为“敬业乐群会”。这一想法是为了使大家互相传阅书籍，组织讲座和研讨会，鼓励同学们进行交流、结识朋友（而在这一点上，对周本人来讲还是很害羞的），以弥补课程表安排的不足。在乐群会的支持下，周帮助了那些比他自己更体弱、更害羞的同学，也提高了他自己的社交自信心。

乐群会创办了会刊，取名为《敬业》，共出了6期，周用“恩来”“翔宇”(16)（小时候的常用名）及“飞飞”（意为飞翔）等名字为会刊写了大量文章。在周担任主编的后几期刊物上，他开辟了“飞飞漫墨”专栏。其中，他抨击了中国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孔孟思想，表现了他的进步观点。1914年，他在该刊上开始了他的诗作生涯。

春日偶成

一

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二

樱花红陌上，柳叶绿池边。

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

这两首诗的古典喻意是如此浓厚，以至于只有具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逐鹿总是引起朝廷之战或个人最高权力之争，而博浪正是历史上一个爱国者试图谋杀一个异族皇帝的地方。[17]周的诗采取的是隐喻手法，表达了对封建的军阀政府和袁世凯的独裁统治的痛恨。袁世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将军，他接管了共和国的革命，在北京作为总统统治着中国。

在所有这些脑力劳动过程中，周没有忽视自己的身体，他常常一大早就起来跑步，下课后做些体育锻炼。根据记录，他曾在跳高项目中得过第三名，是班上篮球队的队长，还代表班上参加过排球比赛。但是，他却从来不能胜任5英里的长跑。

他继续赢得了作文比赛的名次，其中包括在第三学年里参加的全校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他与高年级的同学们竞争，在800多名学生中获得了第一。使老师们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作文是一气呵成的，从来不为打草稿所烦恼。

同时，他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了解一些激进的革命观点。他欣赏一家激进的上海报纸和非常民主的天津《大公报》。他已经很熟悉孟德斯鸠的著作并阅读了一些英文作品。



周恩来和南开学校敬业乐群会同学张瑞峰、常策欧合影

所有这些都是他在晚上和周末进行的。由于当时没有图书馆可供借书，他不得不节吃省穿来买他需要的书籍。一次，他看见书店里有一本司马迁的《史记》，便立即用下一顿饭的钱把它买下来。回到学生宿舍后，他爱不释手，向其他学生讲述书中的一些故事，使他们也产生了兴趣。

另一个记述表明，他广读博览了大量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同时还阅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他曾经阅读过1915年第一期的北京《新青年》[18]。他开始为学生报刊撰写新文化、民主与科学方面的文章，并强烈要求振兴中华。

他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地谈论着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从中嗅出革命的气息。周在这些情况下常常发表激昂的演说。当总统袁世凯在1915年不得不接受军事强国日本提出的赤裸裸的带有侵略性质的“二十一条”时，周在当地公园发表演说，强烈抗议这一对中华民族的侮辱。接着，当袁第二年自封皇帝时，遭到了周的愤怒讽刺。

作为仍然在中国横行的旧武装唯一严肃认真的现代对手，孙逸仙（孙中山）为青年一代反对旧政权提供了斗争的焦点。周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年轻人一样，备受孙博士的国民党的影响。

为了掌握演讲艺术，周在自己创建的乐群会里进行练习，后来被选为南开中学辩论队的头头，这个队在与天津其他中学的辩论中成功地获得了胜利。

1916年5月，周再次代表班上参加了作文竞赛。他写了一篇痛骂反动军阀政府的文章[19]，其中列举了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事例，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进行了强有力的论辩。他在该文结束时说道：“一人之智慧有限，万民之督察綦严。其以一手欲掩天下睹，实不啻作

法自毙。”他的文章获了奖，评判者在他的证书上写道：“识见高超，理境澄彻。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所读过和学过的东西，能加以理解并掌握其实质。”

在这一年里，他克服了早期对自然科学的反感情绪，文学这门功课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几何、数学也名列前茅。他的中文书法再次被评为最佳。

下面是一首周与好朋友张蓬仙分别时所作的诗篇。张与周一个班，是敬业乐群会的共同缔造者之一。周在这首诗里表现了与朋友分别时可贵的个人情感和热情。当张1916年离开南开中学，经由东北故里去日本时，周提笔惜别写下了几段诗。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

一

相逢萍水亦前缘，

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

持螯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

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

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

东风催异客，

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

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

三

同侪争疾走，

群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

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

孤雁人寥天。

惟有交游旧，

临岐意怅然。

在这首诗中，革命思想居于友谊之后，但事实上诗文提到了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提到了他们的责任。但是，周的愿望非常富有人情味，他觉得一旦责任尽到了，两人便应该在田园处找个宁静的地方去分享幸福。

周看来也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与自己的笨拙相比，他羡慕朋友们的轻捷。我们可以断定周认为自己正处于一个筑巢在繁茂的枝叶下栖

息的“乌鸦”之中，而令人嫉妒的“孤雁”此时却在空中飞掠。更有可能的是，尽管表面上在考试和竞赛中取得了成功，并赢得了老师们的赞扬，周在18岁那年仍然感到自己还不那么成熟，总是想得多而做得少，缺乏拼冲和抓住他人的想象力的勇气。

1916年9月，袁世凯死去了，这样军阀们便开始商讨如何进行割据的事宜。周在南开最尊敬的老师中有一个写了一首诗，痛惜民族的生存正断送在少数人手中。周写了一首政治评论诗：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在1917年的毕业生评语中，周被举为全校文科考试第一名，甚至在理科方面成绩也名列前茅，数学成绩优秀，并在课外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他的书法也得到了表扬。他于1917 年6月26日毕业，平均成绩为89.72分。

周在南开中学度过了幸福愉快、激动人心、颇有意义的4年。但是，自从清王朝逊位之后，政府仍然是越来越腐败。国内到处都是混乱，而外面又充满了外国的威胁。周抓住一切机会来加深了解这些事情的原因，并在必要的情况下运用西方理论家们新的、陌生的方法论来加以分析。他对一些地方事件和即发事件进行政治和社会评论的技巧首先是在南开培养出来的。他对同学们及其他人大讲中国需要搞工业化、实现统一，唤醒民众沉睡已久的爱国之心和使社会关系现代化，甚至讲到了不经父母允诺的自由婚姻。



周恩来同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前排左二）和同学合影

尽管周具有学校辉煌的评语和优秀的毕业成绩，但周本身却并不是一个中国意义上的真正学者。埃德加·斯诺后来把他描绘为“学者转变型的造反者”，但是许多同胞称他为“半知识分子”。尽管他喜欢辩论，但他对理想的态度却是功利主义的，把它们看做是社会改良行为的工具。他在南开的4年奠定了他后来所坚持的学术风纪的方向，而他又充分地加以开拓，用来指责那些后来成了学者的人。但是，他自己仅仅是个实施者，而不是这些思想的发明者。南开使他明白了自己该做些什么，而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加之他与许多人结下并持续了多年的友谊，周总是带着怀旧的情感来回顾南开中学的往事。这种怀旧感流露在他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诗中。

30多年以后，周回到母校向南开师生发表讲话。[20]作为一个新的共产党政府的总理，他向这所中学作了《我的母校》的演讲：“要知

道我们所受的是资本主义的教育。但是，我却获得了一些知识，锻炼了组织才干。”在另一个场合周总理略带礼貌地谈到了他的感激之情：“我仍然感谢南开中学所给予的带启发性的基础教育，这一教育使我能够进一步追求知识。”已经成熟了的周几乎不可能对与资产阶级和美国有联系的南开有厌恶之感。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期间，他不断提及自己对许多南开伙伴和老师们的笃实情感。毕业3年后，他在法国碰到其他南开校友并向他们保证退休后用全部时间来写传记。在共产主义革命的许多艰难时刻甚至当中国同志被迫转入地下工作时，只要周与他尊敬的校长张伯苓在一个城市里，他就给他打电话。同样，他有一个在往东北去的铁路上当火车站站长的同学，只要周路过那里就给他挂电话，而不顾被发现的危险。



1920年，在南开大学时的周恩来

随着岁月的流逝，周和张博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然而周却继续尊敬他十分感激的这位老师。1949年后，在新的人民共和国里，周在国家教育部门给了张一个高级职务。[21]但是，张的正直诚实也不亚于他的学生。他拒绝了。

令人感到朦胧的是周年轻时在南开的感情生活。有个流传的故事说他爱上了一个很漂亮的来自东北的同班同学，并偷偷地与她订了婚。但是，这个传说一直未被证实。尽管周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体育锻炼及政治活动上，但却难以相信像周这样精力充沛、感情丰富、英俊潇洒的青年人能够回避女人的友谊。我们可以肯定，正如周的同学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他在中学时代对具有浪漫色彩的感情是很害羞的，或者他当时在这方面是最谨慎的。总之，他是个具有判断力、具有主见的人。他那不稳定的童年生活不仅使他在与别人处理关系时显得能力薄弱，而且一旦和别人相处了，他很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

东渡日本（1917～1919）

周恩来年轻时在南开中学发誓结下的那些同学好友，现在都成了他的救星。由于周恩来早年想进入美国学校的愿望遭受了挫折，在19岁那年他便着眼于进一所日本大学。日本是亚洲地区唯一深受中国传统影响而现在却已完全实现了西方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由于在国内受到抑制和挫折，中国的年轻人均把日本看成是变革的温床，在那里可以学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像往常一样，周恩来感到力不从心，据说他的老朋友吴—那个曾经在中学保护过他的大个子东北人又出现在他的面前来帮助他。吴已成婚，此刻已享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在日本留学。充满热烈情感的吴劝说其他3个在日

本留学的友好和另一个学生，与他一块每个月为周捐助10美元—占他们每个人奖学金收入的五分之一。

周在起程前写了一首表达自己坚定信念的诗：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这是周恩来赴日前夕写的抒发救国抱负的一首诗

在这首诗里，周恩来决心终生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周恩来此刻正准备向它学习现代化新事物的国家，却是一个曾经比欧洲人更为跋扈地羞辱过中国并很快就要进一步彻底入侵中国的国家。周严肃地对待自己在诗中所下的决心，18个月后他把这首诗抄给他在日本的朋友作为警钟并作为“自己的警言”。

周恩来可能是向北旅行，路过他从前待过的地方沈阳，经由朝鲜，并于1917年9月到达日本。[(22)]他在神户港见到了前来接他的老朋友吴，然后很快赶往东京并首先到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注册。在这所

学校，他可以学习日语并复习准备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因为他打算今后当名教师。学校共有350个学生，都是中国人。只要学完高等预备学校的课程，那么周恩来就可获得中国政府的资助。但是，他从未完成这一学业。尽管他明显在早稻田大学并可能还在其他一些大学非正式地听过一些课，但也不能够被日本大学正式录取。他可能还在日法法律学校上过学，因为很久以后他曾经说过他在那里待过一年。

尽管周恩来成功地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经济上的援助，但他在日本的生活仍然是很拮据的，同时膳宿仍然是个问题。4000名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已经住满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但是，周恩来仍得到了一个许多中国学生称之为教母的日本妇女的帮助。她为中国学生解决各种问题，帮他们洗衣服，甚至为他们的恋爱、婚姻当参谋。在这个善良的妇女的帮助下，周恩来解决了住宿问题，和两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个木工家的楼上。这里挨着一家影院，离学校也不远。

周恩来深深地被日本乡村那美丽的景色所感染，尤其是富士山和中国式的寺庙。但是，他亲眼见到日本工人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压迫下所受的那种苦难，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不幸的是在他到达日本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变得傲慢无理。日本现在是亚洲地区武装最强大、装备最精良的国家。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巨大，把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给了一个软弱贫困四分五裂的中国。然后，广泛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入侵中国的国土。日本人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获得真正独立的古老、软弱、无能的国家，因此把它当做一个合法的掠夺物。周恩来和居住在东京市内中国小社区的同胞们一样，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行径及他们对周的祖国和民族的残酷暴行非常愤怒。所以，当这种状况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周在日本逗留期间早就感到他在日本对现代化的探寻从根本上受到了日本沙文主义气氛的阻碍。其他中国学生，包括对周进行赞助的那些

弟兄（有一个例外），由于受到同样的挫折和苦楚，都卷起铺盖，整好行装，不待学业结束便乘船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周本人也受到影响，决定弃学回国。周来到日本时，已是日本为争取经济发展，获得西方在外交上承认它的平等地位的努力奏效的时刻。日本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了西方盟国的支持并被看做一个平等的伙伴，而日本的爱国者现在意识到日本与欧洲和美国的最终平等也正在得到承认，他们为此而得意扬扬。但是，在他们的野心范围内，唯一能够成为其直接目标的是中国—日本在远东的对手。待在日本继续学习的那些中国青年被自己的一些同胞认为是懦弱胆小、自私自利，不打算回去挽救民族的命运。

日本的敌对，促使中国学生组成了一个新中学会，相集研讨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封建主义和把中国从这两者中挽救出来的办法。周参加了这个学会并为该学会撰写宣传稿件。1918年5月，中国学生在神户一家中国餐馆秘密集会，抗议日本让中国政府派军队去西伯利亚的要求。集会被警察驱散了，而中国学生中的“返乡”运动却从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力量。此外，他们还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一次，当地警察署长在讲话中使用了侮辱中国的语言，为此中国学生宣读了一篇由周起草的抗议书，使该警察头头不得不赔礼道歉。周作为集会的3个组织者之一，亲自作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中国军阀主义的演讲。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处于低潮的时候，1917年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遍了亚洲，受到了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们的欢迎。周和大家一样，无比喜悦，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日本的杂志和报纸上关于列宁及他的同志们的消息。



周恩来和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

正如周的同事们所说的那样，周很少去上课，而把时间主要花在政治会议上和附近的一家革命杂志的编辑室里。

艰难困苦现在又一次缠绕着周。吴此刻在京都学习，他仍然从那里给周寄钱，但周却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他放弃了吃肉，停止了试图获得正规学生资格的努力，把所有的时间均用在阅读和帮助其他学生组织会议上面。

1918年，当秋日来临之际，周感到丝丝凉意。这时，吴邀请周到他那里去和他住在一块儿。吴由于获得了两份生活津贴，再加上有一个聪慧的妻子，他能够继续生活下去，并且按照学生的生活标准，吴过得非常舒服。“你和我们待在一起，”他在信中写道，“这样我们可以抽时间商量一下你上京都大学的事情。京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师

资力量很强，你会喜欢那里的。我已经问了你好几次，但每次你都说不愿意靠朋友过日子。然而，即使你不考虑我们在南开的友谊，可我们现在都是处于异国他乡的外国人，难道我们不该互相帮助吗？”吴的其他信都未能说服周，但这最后一封信感动了周。他整好行装，乘上火车，奔向京都。在京都车站，他热泪盈眶地扑进了他中学时的老朋友吴的怀抱。

吴和他的妻子与其他两个中国学生共同住在一栋租借的房子里。周现在也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他每天早早起床，把整理房间、打扫卫生作为自己的任务。有时，当吴氏夫妇回家太晚时，周便给他们做晚饭。吴不时带回来一瓶酒，他们便一起来欣赏周的烹饪手艺。正如在舞台上演戏一样，周不介意他的伙伴们把这称为“女人的事情”。吴给周讲他听过的课，而周给吴讲他读过的书。

和在东京一样，周在这里实际上没有进入大学。他填过一份申请书，选修政治学和经济学课程，并仍把自己的地址写为东京菏田。不过，这份表格事实上是否交了去都不清楚。

但是，周的确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那儿受益匪浅，因为从1919年起周便成为河上肇博士的半月刊《社会问题研究》的热心的读者。这是一份第一次真正影响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杂志。令人惊奇的是，他却从未见过这位学者。周让吴介绍一下这位学者，但吴却不愿意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怕自己与他的南开老朋友在意识上的不同会因此而变得更大。吴已经后悔把自己的《资本论》一书借给了周。吴正寻求一种对中国的俾斯麦式的领导，吴认为俾斯麦是权威的政治家，这样的人能领导国家强大并使之向着现代化迈进；而周却相信只有对中国人的头脑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使中国发生必要的变化。一个实行“铁血政策”的强人在一个没有普通人民进行的革命中是不可能使中国加以改变的。

吴的妻子经常在这两个老朋友的争论之间进行调停。有一次，争论发生在吃饭后，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拯救中国。由于争论得比较厉害，周不停地往自己的杯子里倒酒喝，在争论的高潮中竟有点失态。“光靠强硬的领导，”他断言说，“是不可能挽救局势的，必须拥有坚定的追随者来支持领导，必须逐步地对年青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包括学生、工人，甚至农民；在革命成功之前，必须使这些人站在自己一边。不进行革命，中国便得不到拯救！”

这时，吴倾过身来从他的朋友手中夺走了酒瓶，把它扔在地上。“如果你坚持这种观点的话，那你就不可能拯救中国！”他叫道。

就连吴的妻子也插话提醒周说：“恩来，你必须关心自己的身体，不要喝得太多。在你来这里之前，吴十分担心你一人孤独地待在东京。他说，甚至在南开时你就爱喝酒。”

据吴说，周当时的反应只是静静地转过身去找来一把扫帚，把乱东西清理了一下。第二天，他给他的主人们带回一束鲜花，尽管他当时实际上已是身无分文。“你怎么能真的和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生气呢？”吴后来说道。还有一次，当吴从喝醉了的周手里把酒瓶夺走时，周冲回自己的卧室并把自己闩在屋里面。吴发现周为自己没有其他朋友而感到痛苦。他的日语还不是太好，影响了他大量外出，而使他的活动显得单调孤独。

1919年春天，周已做好回国的准备，希望加入自己的祖国已经开始的国内斗争。在樱花第一次盛开的节日般的季节开始的时候，周前往京都两个著名的公园，写下了4首充满感情的非凡诗篇。这些诗是用自由体写成的，而不是周早年写诗曾用过的古诗体。他从来没有如此开怀地表露过自己的感情，以后也从来再没有写过如此外向的诗篇。诗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给世界革命带来了光芒，抒发了

自己发现马克思主义后的喜悦心情。这就是第一首诗中所写到的“一线阳光”穿云出。



1919年，东渡日本的周恩来（左二）与留日同学合影

雨中岚山—日本京都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突见一山高，

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到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雨后岚山

山中雨过云愈暗，

渐近黄昏。

万绿中拥出一丛樱，

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

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

登高远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这是日本京都岚山山麓龟山公园内周恩来《雨中岚山》纪念诗碑

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

满园樱花灿烂，

灯光四照，

人声嘈杂。

小池边杨柳依依，

孤单单站着一个女子。

樱花杨柳，哪个可爱？

冷清清不言不语，

可没有人来问他。

周当时愿意谈及这个神秘的女士吗？如果愿意的话，又是什么阻止了他呢？在他的所有诗当中，《圆山公园》一诗表现了一种纯浪漫主义的风格。以上3首诗均写于4月5日。第四首诗写于4天以后：

四次游圆山公园

四次来游，

满山满谷的“落英缤纷”；

树上只剩得青松与绿叶，

更何处寻那“淡红娇嫩”的“樱”！

灯火熄，游人渐渐稀，

我九天西京炎凉饱看；

想人世成败繁枯，都是客观的现象，

何曾开芳草春花，自然的美，无碍着的心。

令人瞩目的是，在这期间，周承认他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也具有某种偶然性，即“模糊中偶然见到了一点光明”。但是，这些诗的实质是写日本政治的反动，写大自然的纯净与肮脏的人类制度之间的对比。“繁枯”是大自然的规律，而在周的诗中，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正在繁荣发展，封建主义正在走向枯败。

导致周恩来回国的直接原因是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所引起的一系列抗议活动。当时，北京爆发了示威游行，东京的中国学生也反对该条约对中国的虐待。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反对老式强国外交的爱国热情。[23]比周晚毕业两年的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好朋友马骏给自己在日本的朋友写信说：“如果当我们的国家就要走向灭亡时，学习还有什么用处？”

这一问题在吴的家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吴自己决定留下来，但也打算加速完成学业。周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想立即回国。“五四”运动召唤着他，使周不顾吴和他妻子为自己留在日本完成学业而作的一切努力。吴太太不得不到市中心把自己的珍贵戒指卖掉，用来作为周的盘缠。当天下午，她把急于回国的周恩来送上驶往东京的火车，然后周再从那里回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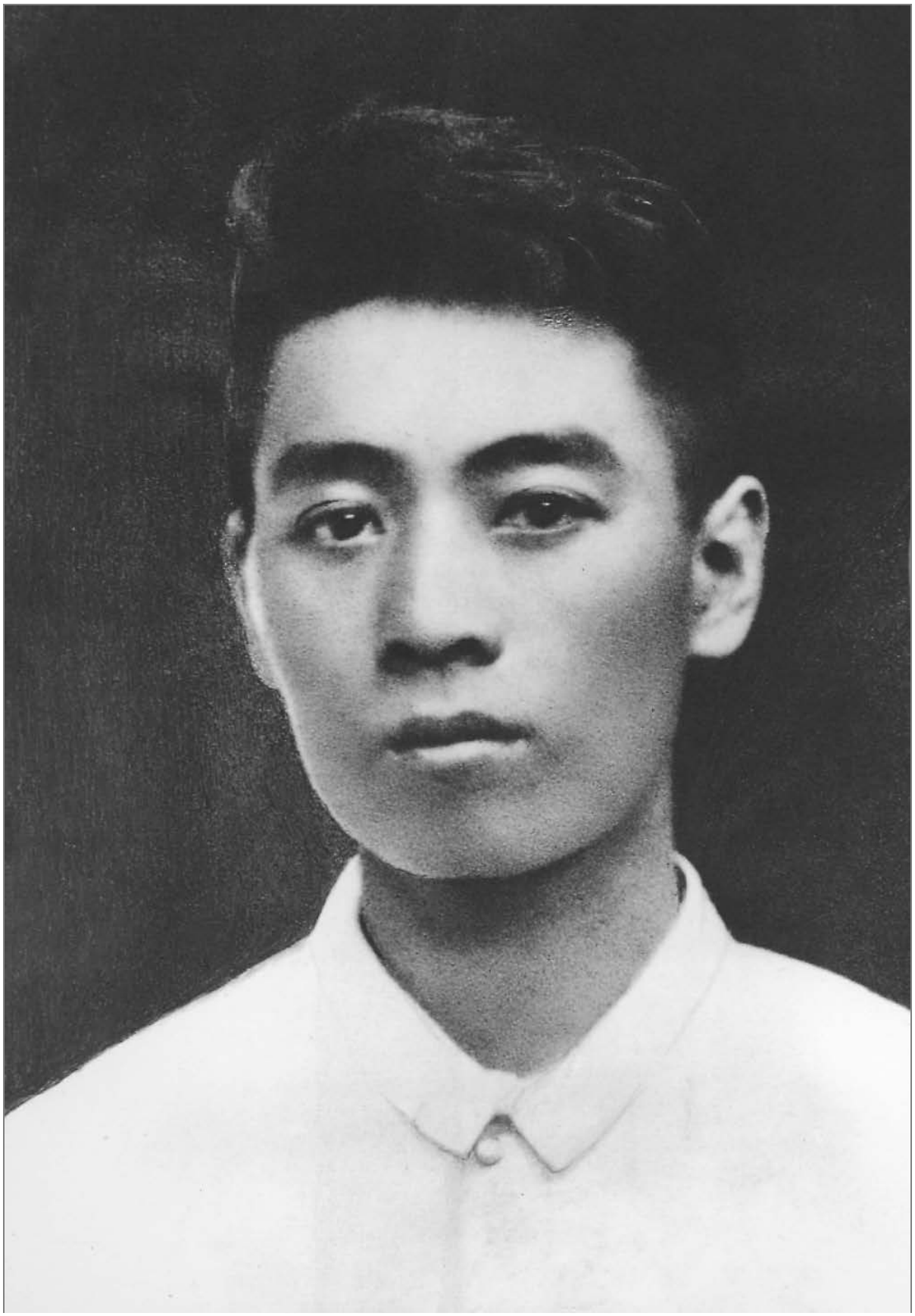
周旅居在亚洲当时唯一的认真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里，然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他什么都没有学到。1971年，他对日本参观者说：“尽管我有机会到过日本，我根本什么东西都没学。日本语言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我通过阅读报纸和对中国文字的理解来自学日语，但最后我却没能掌握它。我的阅读能力还可以，但我的口语却非常差，甚至现在我仍不懂日语。”1955年，当周会见一位日本政治家时，他唯一能说的日本话是Konnichiwa，即“午安”。

还有一次，他对一个日本代表团说，虽然他在日本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但“我对日本的记忆甚少……我真正记得的事情是，日本的豆腐比中国的更有味”。吴自己回忆道，他完全“敬畏”日本，包括它的现代性、它的成熟性，它那合乎职业道德的工作及它的爱国主义。对此，在他家住的人也有同样的反应。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周曾把日本奉为一个使古老的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模型或榜样。因此，在日本旅居了18个月之后，周于1919 年5月离开了日本。[(24)]在那里他没有经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所以也没有什么值得表现的东西。他不得不把书卖掉，积蓄了30美元作为回国的路费。他能带走的东西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记忆和在河上肇博士创办的杂志中所了解到的对他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身陷囹圄（1919～1920）

“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中占据了数年的支配地位。成千上万的学生反对政府和驻京各大国的示威运动受到士兵和警察所规定的线路的限制。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更强烈的抗议，几乎使学生第一次有组织地聚集起来，迫切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在天津的抗议运动领导人中，有一个是位年轻的姑娘，她的名字叫邓颖超，当时年仅15岁。另一个是位杰出的穆斯林，叫马骏。马和他的其他南开朋友对21岁的周于1919年春天重新出现在过去在天津待过的地方而感到非常高兴。在一个大型的茶话会上，周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在日本的经历。当马向他简述学生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时，他才知道他的老校长张伯苓博士已成为新的南开大学[25]的校长。此刻周与张之间的友谊已变得很不正常，因为张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领导人，他试图把自己的学生从街头政治中引开，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他所希望的、不久将在中国实现的一个民主国家的胜任的公务人员，而革命者周却拒绝接受这种渐进主义。不过，他们却仍然互相尊重。



数年后，周坚持说：“南开大学没有把我当成它的学生，因为我的名字没有被列入校友册内。”然而，根据记载，他于1919年9月25日进入了该大学。最近发现的新生表格证明，该表包括了他的名字。可以肯定的是，像从前一样，他在天津时很少学习功课，只是把大学当做一个临时寓所。

经济问题仍是一个需要对付的老问题。他的那个已败落的家庭无法支付他的全部经费。张博士前来解救他，给他找了一个当秘书的活干。周后来解释说：“我在南开大学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26)]，这帮助我解决了部分费用问题。”依靠这两个费用来源，他能够仅仅维持一年的生活。

学生日报的报头上有条显著的英语标语：“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不久以后，周说服了编委会把报纸的主要内容所使用的语言由文言文改为现代白话文，为此编委会成员当即把他选为主编。该报纸的日发行量为两万份，这需要非常强的责任心。周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位于荣恩街的印刷厂里，了解技术操作过程，向工人们传送革命思想。他亲自读校样，有时读到深夜，以此来节省点经费。但是，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撰写稿件上，因为报纸的大部分文字都是由他亲自编写的。他使用各种不同的笔名，目的在于使自己的作者身份的程度不至于太明显。

在这个阶段，尽管他们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式的人物，但他的思想仍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的。他特别尖刻地反对孔子、孟子和军阀，但他的社论也攻击兰开夏和大阪的纺织巨头，揭露他们利用资本来剥削廉价的中国劳动力，抨击毫无用处的老式的中国家庭制度，并报道工人们贫困的生活。用西方的话说，他的态度最接近托尔斯泰。

当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用“列宁第二”的笔名写了一篇欢迎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时，周或许略受张伯苓博士的影响而对此产生了疑虑。但不管怎么说，苏联这一榜样是不能完全被蔑视的，他带着一批学生到法租界去给在北京大学任教并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俄国教师谢尔盖·包列伏依打电话。这是他第一次与国际共产主义的个人来往。

正如邓颖超后来回忆的那样，那批学生其中（“我年龄最小”）谈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由于周住在天津城南部的河北第三大街，他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他每天早上在一个路边的小吃店里以豆浆和炸油条为早餐。然后，他到公共厕所去，并利用这个时间构思每日社论。

一个同事回忆了自己是如何逐渐尊敬周的。那时，在“学生联合会”里有一些爱出风头的人，周却不像他们那样。他不介入权力之争，平等待人、热情善良，他善于迅速处理各种事情，如立刻看完交给他审阅的稿件而不是把它们搁置一边。30年以后，在人民共和国里，人们正是这样评价他的。

在1919年7月21日的一篇庆祝社论中，周坚定地认为要进行社会改造，传播新思想，昂首阔步前进以反对流行的悲观情绪。8月份，报纸的新主题是日本无耻利用凡尔赛和会，通过吞并山东省的部分领土来占中国的便宜。支持日本人的山东军阀加速了他们对学生的镇压，解散了他们的组织，杀害了一个爱国协会的一些领导人。“国民啊！”周8月6日写道，“黑暗势力，越来越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他繁忙地组织天津学生团体的一些特别会议以举行抗议，并与其他城市的学生组织进行配合。他们把自己的组织集中为一体以便准备得更充分，并派代表到北京去参加

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当这些年轻人被逮捕时，周便努力解除仍然在家的同志们的疑虑：“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只要经得起考验，就没什么！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他在学生报纸上写道：“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战斗。我们必须营救被捕的代表！”

此后48小时内，数百名天津学生赶到北京，聚集在中国的总统府外进行抗议。他们在那里等了整整三天三夜。后来，军警开始用枪托来打他们，并逮捕了学生领袖。最后，周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来到北京，组织了数千名学生包围北京和天津的警察署。8月底，政府作出让步并释放了被关押的学生。9月初，周和其他人率领大家凯旋，并开始计划下一步的反政府行动。

周想把分开的男女爱国组织结合起来，而这一举动是如此具有现代意识，以至于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经过4天详尽的谈判后，一个新的联合组织于9月16日举行了首次会议。

“我们今天到会的人，”周说道，“都是受了20世纪新思潮的启发，觉悟到中国社会要从根本上解决，就要把那些不合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全部加以铲除、改革。”他明确地建议创办一份取名为《觉悟》的白话文杂志，并成立觉悟社[27]来主办该杂志。这个成立的新机构与其他城市相类似的学会一样具备同样的目标。这些学会包括毛泽东在长沙建立的新民学会。它的成员都是一些激进分子，尽管他们并未成为共产主义者。后来有些人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还有一些人加入了国民党。

当周用发颤的声音让女士们在首次举行的男女生混合会议上介绍自己时，其中站起来的一个人是当时在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上学的标致能干的邓颖超。她敢想敢干，被选为天津女子爱国学会的负责人。她

写的关于“五四”运动的论文已成为一篇杰作。她像周及周的朋友那样，坚持组织各种讲座和各种会议，不断提高政治觉悟。然而，用周值得骄傲的话说，“她才15岁！”

但是，周的爱情道路却不那么顺利。当周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天津有个最受人追求的姑娘，她是一个富翁的女儿，长得极为漂亮。周早就认识她。她的父亲和兄长喜爱周恩来的才干，主张把女儿（妹妹）嫁给周恩来。他们把这一意思透露给周恩来，周恩来没有同意。他的考虑是对方既富有，家中又有权势，自己家中贫穷，将来会受制于人。

周不得不承认他曾受到这一小插曲的影响。于是，他在学校中宣布自己抱独身主义，以避免来自婚姻方面的干扰。周埋头于学习和追求革命思想之中。

天津的觉悟社开始工作后不几天，周便邀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从北京来与觉悟社的成员们交谈。从这时起，他便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示。他后来回忆说，在天津的这一年，“我阅读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所有这些书是在陈独秀主编的革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的。

用于学习的时间总是不多。日本人的行为继续激怒着中国学生。天津新近被任命的警察厅长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家伙，周公开与他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学生们利用10月10日共和国周年纪念日—著名的“双十节”为借口召开会议和举行示威游行。天津学生们计划聚集的地方南开运动场，此刻被警察严实地包围了起来。邓颖超带领女学生指责警察，她们高喊：“警察也要爱国！”“你们不能打爱国学生！”被包围的学生用棍子打掉警察头上戴的盔帽，使他们狼狈不堪。最后，学生们冲破了包围圈，反过来包围了警察厅。

政府于9月22日禁止了周恩来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但两个星期后周又使该报出现在街头，它是学生们在工人的帮助下自行印刷的。他成功地脱险而未被捕，但他的朋友马骏却被警察抓走了。几天之内，周奔波于天津与北京之间，动员有影响的人出面干预马的释放问题。周对警察粗暴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年轻伙伴而感到愤怒。他写的东西不再是平静的说服规劝，而是认为需要废除中国的匪警、匪兵。愤怒的语调渐渐地充满了他的文章。

1919年末，他写了一首揭露黑暗社会的短诗，名为《死人的享福》：

西北风呼呼响，

冬天到了。

出门雇辆人力车，

车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却嫌累赘；

脱下来放在我的脚上，

我感谢他爱我，

他谢谢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劳动!

死人的享福!

此诗通过与人力车夫的偶然相遇和两件不同外衣，谴责了旧的制度和剥削，显露了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

这首诗发表在1920年1月20日出版的《觉悟》杂志创刊号上。所有的投稿人都用抽签的方式来取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签，用“逸豪”做笔名，意为“一号”；周的笔名是“伍豪”，因为他抽到“五号”签。这个化名周后来用了好多年。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右五为马骏，前排右三为邓颖超

从觉悟社的一张成员照中可以看出，邓坐在前排，打扮整洁，庄重自尊，而周站在第二排的一端，显得不那么整洁，身体略为斜倾一点。

铁窗生活对周来说即将来临。那些从日本货物中源源获利的商人殴打了抵制购买他们货物的人们，为此，1920年1月学生们再度进行抗议，而这一示威却成了当局大批逮捕学生的借口。1月29日，天津的学生们举行群众大会，决定进行报复。他们向省长请愿，要求省长支持他们的抵制运动。这次请愿是由周和一个男生、两个女学生领导的。邓颖超被留下来协助守卫学生总部。

寒冷的北风卷着残雪，扑打着人们的面颊，他们等待着，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便马上出发。周身着一件单薄的短上衣，长长的头发随风飘拂，他一步跃上台阶，提醒人们要记住大家一致同意的请愿要求。

当他们到达省长办公所在地时，通向省长办公室的大门却紧紧地关闭着。“我们是天津的学生代表，”周对一个从侧门出来探视学生们想干什么的官员说，“我们要见省长，要陈述我们的爱国意见。”

这个官员缩了回去，遭到的却是周身后成千上万双愤怒的眼睛送去的谴责的目光。大约20分钟以后，他出来传话说，省长可以召见学生代表，但其他学生必须后退。学生们拒绝后退，结果形成了僵局。

突然，周发现正门底部有一个空当，卫兵们忘了关上，他们正好可以爬上门槛，从空隙处闪身而进。周对自己的同志们说：“打破僵局开展斗争的唯一办法是通过门槛空隙进去。”

学生中有人反对说那样太危险，但是，周反驳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和其他3个同志钻了进去，其中两个是女的，在里面与军警发生了扭打。当他们被带到卫兵室等候省长的决定时，周发现大门旁的墙上靠着一个梯子。他迅速登上去，从墙头上向同学们大声喊道：“如果我们一点钟之后仍不见归来，就是失败了。大家要再接再厉，另寻办法，决不让步。”

不久，士兵和警察们闯到学生中间，用警棍抽打这一老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是一场浴血奋战，而此刻在里面的周和其他3个伙伴还未受到任何损伤。警察厅决定不经审问而无限期地拘留这4位学生领袖，并把他们隔离开来。但周发现可以在厕所里进行联系，随后他们均同意在4月初开始绝食。

这帮助了在外面的其他学生及他们的家人把这一事件和逮捕学生的真相公诸于世。他们通过报纸和其他公共出版物，很快便了解到外

面仍在继续抗议。邓颖超带领一批学生到警察厅，自愿前来替换绝食的代表。

当局为开庭审理周感到烦恼，而此时周已经从单人牢房转移，和其他犯人关押在一起。他抓住这一机会，给同狱的人们灌输激进思想。他和其他3个学生即席给大家讲授经济、法律、马克思主义甚至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周后来还把在狱中写的东西编成《警厅拘留记》，在狱中每日坚持写《检厅日录》。

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年纪念日那天，他们在狱中举办了一个文艺晚会。他们因陋就简，用三块门板拼到一块儿做舞台，用被子做帷幕，用人的模仿声做交响乐。周演了几出小戏，在扮演地主压迫农民以及法帝国主义的行为时，演得也很好。当他表演最后一个节目—他曾在南开中学演过的《一元钱》时，感动得狱卒们都流下了眼泪，使他们都保证今后一定要爱国。

最后一次审讯在8月份开庭。[28]周坐在“被告席”上，几个月的监狱生活使他明显地消瘦了许多。数百名朋友和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当周被问到他非法闯入省政府办公处是否属实时，周轻蔑地一笑，然后接二连三地向法官发出质问：“学生们出于爱国之心，抵制日货，维护民族利益，究竟犯了什么罪？”

“学生们到省府请愿，推举我们当代表，求见省长，这又犯了哪一条王法？”

“当局派军警用刀枪棍棒打散请愿学生，造成流血惨案，又是哪条法律有此种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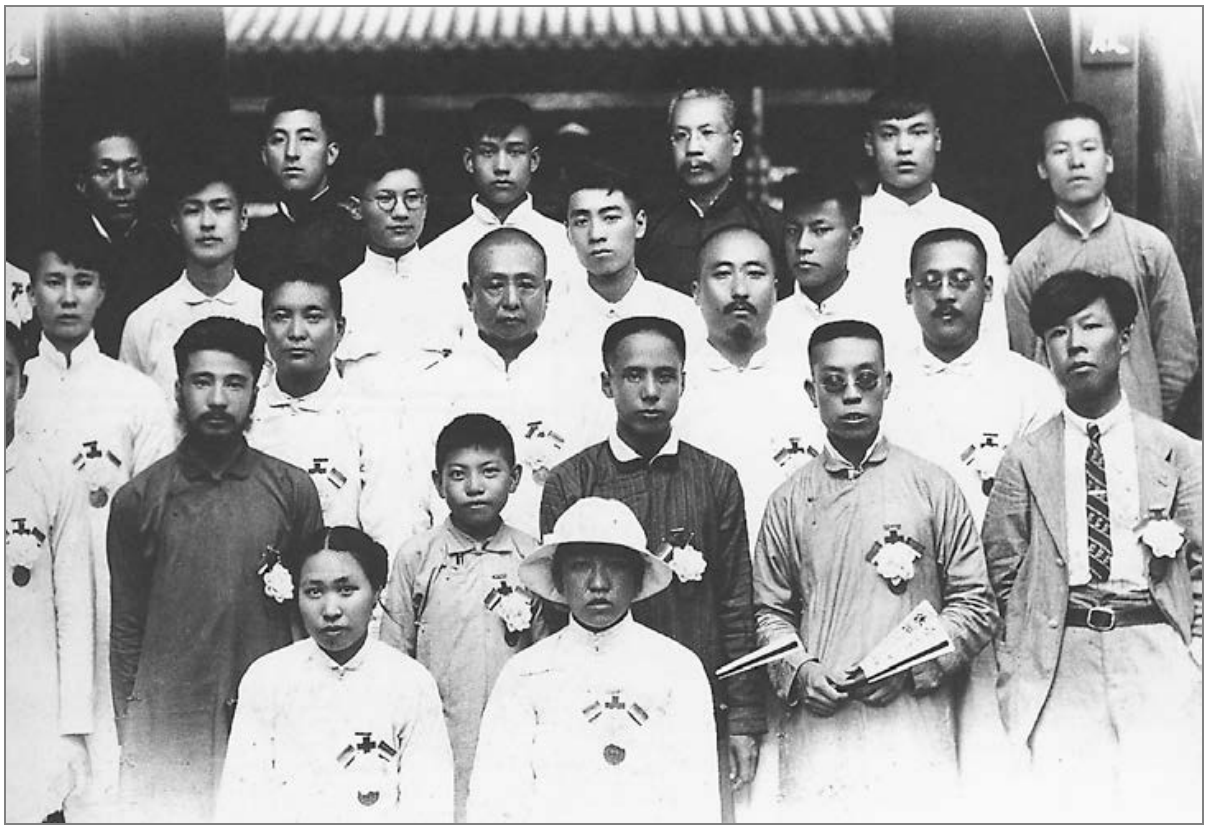
“既不审讯，又不释放，无理拘留各界请愿代表达半年之久，又依据法律的哪一条文？”

……

这一连串的质问，像排炮一样，打得法官招架不住。他恼羞成怒地喝道：

“究竟是你审问我，还是我审问你？”

法官的裁决原来是准备宣判学生重刑，但他只好从违法的技术性上给予学生轻判，包括学生们事实上已在押的日子。这样大家的面子都挽回了。周的祝贺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把他簇拥到汽车上，汽车上插着彩旗和鲜花。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周随汽车一起离去了。



反动当局被迫于7月将周恩来等被捕学生释放，这是他们出狱后的合影

周对自己在监狱期间邓给他的帮助深为感动。他也突然发现有两个出乎预料的人前来欢迎他，一个是他受审中的辩护律师，另一个是南开中学的创办者之一。这两个人都是周的崇拜者，他们都对周的行为和品质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开大学的校董严范荪过去曾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周。周婉言谢绝了。这时他仍拿出500美元，资助周到国外深造，因为当时周把个人私情看得很冷淡，而是正在积极考虑留学法国一事。送中国青年学生到欧洲勤工俭学是觉悟社关心的主要事务之一。1920年6月8日，周在狱中写的一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展望前程的满怀激情。

这是一首写给李愚如的送别诗。李是邓颖超的同学和好朋友，她在远渡重洋赴法勤工俭学之前前往狱中看望周。在一张便条中，周对愚如姑娘解释说："你走了，不能送你，我作首诗送给你吧！今天我从下午4点半钟作起，作到6点半钟，居然成功了。这首诗的成绩，在我的诗集里，要算是'中上'了。"周在回忆了愚如姑娘早期的事业和抱负之后写道：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前些日子念强来说，
你要往英，
我以为不过说说。
过几天丹文又来说，
你要往法，
我也以为不过说说。
哪知不几天，
你来别我，

当面告诉我，

你能去了。

你竟去了。

述弟[29]来信告诉我，

说你给他去的信道：

“……况且我是个人，

可以做工自给的；

无论如何，

总不至饿死他乡！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没有得到一日的……”

你别时也同我说：

“……买四等票，

坐三等舱……

……勤工俭学去；

念一年书后，

工读自助。

……研究实用理化；

本我的志趣，

辟我们女子的生计独立、精神独立的自由径路；

保我们女子的人权天赋……”

念你的精神，

你的决心，

你的勇敢，

兴勃勃的向上；

全凭你的奋斗壮胆。

出国去，

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

一处处的浪卷涛涌，

奔腾浩翰，

送你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到那里，

举起工具，

出你的劳动汗；

造你的成绩灿烂。

磨炼你的才干；

保你天真烂漫。

他日归来，

扯开自由旗；

唱起独立歌。

争女权，

求平等，

来到社会实验。

推翻旧伦理，

全凭你这心头一念。
过南京，
见着述弟；
想象中下关车站，
黄浦江畔，
一刹那的别离难。
同在世界上，
说什么分散。
何况情意绵绵，
“藕断丝不断”。
两月后，
新大陆又见了述弟的足迹。
大西洋的波澜，
流不断你们的书翰；
两个无线电杆，
矗立在东西两岸，
气通霄汉。
三月后，
马赛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行行珍重！
你竟去了。

你能去了。

三个月没见你，

进步的这般快了。

—九、六、八下午恩来作于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30]

在诗中，周预期了自己几周后的重大旅游，“走东海、南海、红海、地中海……”送他到那“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然而，他给他的女合作者提出了具体的希望：“勤奋刻苦……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天真烂漫。”这个有现代思想的人仍对性的贞操抱着传统守旧的观念。

1920年秋，在觉悟社举行的年会上，周建议李大钊指导召开一个由北京和天津各组织参加的联合会议。他说：“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救国道路，只有深入劳工群众，依靠劳动阶级，并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的中国。”这是他和觉悟社的许多成员乘船赴法之前开展的最后一项政治活动。

在李愚如给周的信中，她写道：“你应该出国，在这得到欢乐，坐在大树下面等待将会一事无成。”周当然没有坐在大树下等待。他几乎难以抑制自己的急切之心情，像中国的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去喝洋墨水”。

留学法国（1920～1924）

渴求现代化的中国爱国青年抓住每个去欧洲的机会，特别是到法国去。他们认为法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自由和最繁荣的国家，而法郎又正值疲软时期。1919年至1920年，1600多名中国学生来到法

国，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富春、李立三和陈毅等。



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门前

周恩来同其他人一样，热心留法勤工俭学。而且，要是他没有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也许会成为较早的那批赴法留学中的一员。法国离苏俄很近，又是欧洲革命的中心，身居法国，周恩来不仅可以了解和研究欧洲革命，而且还可以了解和研究苏俄革命。

这样，1920年11月7日，一位羞涩、说话有点结结巴巴的青年学生周恩来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马赛。当时他22岁。当他依依不舍地望着渐渐消失在远方的祖国时，最后掠过眼帘的是飘扬在西方国家商业机构楼顶上及游弋于黄浦江中外国军舰上的大英帝国、美国、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国旗—这是外国奴役中国的一个活生生的表现。一位同船乘客回忆道，一路上学生们热烈地谈论着个人的志向—有位同学说他“极想到英国学建筑”，还有的想学采矿，而周恩来则说他想改变中国社会。

邮轮在香港停了一夜，又在西贡待了3天，然后经过新加坡和科伦坡，驶过苏伊士运河，于12月13日前后抵达马赛。途中每经过一个地方，周和他的新相识的朋友都可以看到更多的帝国主义的印记。他在从西贡寄给国内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地的华侨挥舞着旗帜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他们。在科伦坡，他看到劳动人民栖身路旁，而成群的蚊子苍蝇叮附在他们的食物上。这一切与富有的外国人的高楼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我们经过的许多地方不是英国就是法国的殖民地。”他和周恩来及另外一个同学“都感到越远离中国，就越感到中国人被人瞧不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太低了，令我们感到十分愤慨”。周恩来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切后面的历史背景。他一直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最后，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

经过5个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周恩来从马赛转乘火车，赶往巴黎。到那儿后，他在蒂耶里宫地区的一所学校学习法语。他后来对同事们说有一位私人教师给他上了一年的法语课。然而，同在日本一样，周恩来从未像别人那样到一所大学去注过册。到巴黎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他读了一本比尔用英文写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他在书上写满了旁注。一个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英文的德国人写的著作—这的确让人感到战后的世界是令人振奋的！

虽然他在巴黎南郊的比杨古找到了住处，但由于他只懂很少或者说根本不懂法语，因此而感到焦虑不安，也许还有一种与世隔绝之感。几天后，他还去过英国，考察那里的情况。(31)

在离开天津之前，他已经托人安排（也许是在比利时神甫樊尚·勒贝的帮助下）担任了天津一家天主教报纸《益世报》驻欧的记者。他在2月1日发表的第一篇稿件中反映了他的兴趣所在。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英国的劳工状况。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了众多的变化，使欧洲的劳工运动得到了发展、壮大。劳工问题对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些欧洲工人要求不加拖延地采纳苏俄的制度，另一些则倾向要通过渐进的途径。周解释说："我不能置身于这场辩论之外。"他还写道：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对我们的国家关系重大"。在中国，罢工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铜板，而工人们就像机器一样被人使用着，一点也没意识到社会的其他成员实际上已在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这些"迟钝的大众"。英国工人领取的工资相当于中国工人工资的30倍。

关于周在伦敦所从事的活动，目前还缺少史料记载，也许他和李福景（译音）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李是周恩来相当崇拜的南开校友，还是学校舞台上的同台演员。他们是一起乘"波尔多斯号"邮船来

到法国的。李渴望到英国学习建筑。周恩来在英国曾给朋友们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时间是1921年1月30日，地址为布卢姆斯伯里大学区拉塞尔广场贝纳德大街36号。除此之外，他在伦敦的行踪无人知晓。

返回巴黎后，周恩来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他从中国随身带来一个木质的蘑菇状的东西，用来自己补袜子。他还带着一个汽炉子，用来烧点开水，泡点面包，就着卷心菜或其他蔬菜当饭吃。几十年后，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巴黎建立了大使馆时，周曾不嫌麻烦地为他在奥罗里咖啡馆赊账喝过的100杯咖啡还了账，还送给拉丁区一家咖啡馆300盒中国香烟，还上了另一笔赊账。

由于一直帮助中国留法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破产，结果使周恩来本来就很棘手的个人费用问题日趋严重起来。但他得到了一些有钱的中国人的捐助，并以此来维持生活。他承认：“许多爱国老人以私人身份资助我们留学生，但他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严范荪先生就是曾帮助过周恩来的老人之一。他是南开大学的创始人。周又说：“后来，当朋友们说起我用严老先生的钱变成了共产党人时，严先生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嘛！’”周也许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大约在周恩来到法国一年以后，一位老校友拜访了他。他很欣赏周恩来那身剪裁合体的服装以及那间收拾得整洁的居室。周还承认他既从中国朋友那儿，也从天津和上海的报刊发行人那儿得到一些资助。

天主教报纸《益世报》对社会福利问题特别感兴趣，周便为该报撰写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短文，也报道一些有关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情况，但更多的则是报道关于半工半读的留学生的事情。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撰写了一系列的署名文章，每周发表一次（有时他将自己的名字简写成“恩来”，有时干脆调皮地署上自己孩提时的笔名“翔宇”，其含义是“在宇宙中

翱翔”。另外，1922年年初，在从伦敦发回的最后一篇稿件上，他曾署名“周翔”）。这些文章报道涉及协约国的对德态度、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欧洲对苏俄外交问题、中东问题、希腊问题、英法分歧问题、西里西亚问题、华盛顿会议和日本的地位、苏俄的旱灾，等等。另外，还经常谈论劳工的处境、各种大罢工的进展情况及中国留法学生的艰难遭遇等。他写的文章生动活泼，文笔流畅，笔锋辛辣尖锐。例如，他把劳合·乔治在英帝国议会上的一些讲话，描绘为一个狡诈而顽固的家伙所作的冗长而乏味的讲话。

尽管周恩来正在坚定地向着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是表现出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一次，他穿上他（或是一位朋友的）最好的衣服，外出划船游玩，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未经他要求就被加洗成彩色照片，但他相当喜欢加彩的效果，并把这张照片印到明信片上，马上寄给了世界各地的朋友。其中一张寄给了在京都的老朋友吴，上面写道：“巴黎是美丽的，巴黎的妇女也是美丽的！”在背面还写着：“这儿有如此众多的朋友，有如此怡人的风景，难道你不向往吗？”但他很快意识到作为一名革命者，广泛散发自己的照片是很不明智的。

几乎所有描写周恩来早年生活的中外作家都提到了他曾在位于巴黎郊外的雷诺汽车厂短暂工作过的情况。可靠的细节证实了这些传说。有一个传说说他曾和另一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李立三在雷诺汽车厂干过一天工作13个小时的活。他们和普通工人一样，搬运沉重的铁块来制造供铸造用的铁模具。根据这种描写，李立三比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周恩来要强得多。周恩来仅干了3周就离开了。他还说过：“这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邓小平被证实曾是他的一位工友。然而，许多年后，当一位驻巴黎记者告诉周恩来，雷诺汽车厂行政管理当局声称掌握了有关他当年的记录，并说他是一个危险的煽动者时，周却反驳说他从来没有在那儿干过活，他还说或许那是一个和他同名的人吧。另

外一位法国同志回忆道，当周恩来得知法国报纸说他在雷诺汽车厂挑动骚乱的消息时，他放声大笑起来。



周恩来（前排正中）等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在法国留影

看来，雷诺汽车厂确实被列在周恩来要去考察劳动状况的著名工厂的名单之中了，而这曾激怒了一些经理。然而，周事实上并没有经常在那儿工作。他还曾在靠近里昂的钢城圣查蒙德和许多中国工人暂时生活过。50年后，他的一位房东老太太仍记得每逢圣诞节周都要给她送来鲜花。另一位法国居民回忆说他曾和周打过网球。1972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总统，他曾在里尔的一座煤矿上干过“几个月”。

周还和在法国的一些湖南籍学生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由毛泽东组织来法的，特别是由蔡和森和蔡畅兄妹俩负责经办的。不久，他们便一同出外观光，如攀登圣母岛顶峰等。周还把这

次郊游写信告诉了邓颖超。攀登了数百个石头台阶后，他们终于气喘吁吁地来到了顶峰。“我们一帮人就像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精灵似的蹲在那儿，凝视着在雾霭之中渐渐沉睡的巴黎。风景太迷人了！塞纳河水碧波荡漾，缓缓而流。晚霞辉映着远处的枫丹白露大森林，光彩夺目。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用法语高喊着‘太好了，太美了’。”

然而，蔡严肃地提醒说：“恩来，景色固然很美。”意思是他们不应该陶醉于此。一个革命者的目光应该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痛苦。“看，即使法国也充满了残酷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剥削，以及人民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尽管这儿的一切并不像中国的状况那么可怕（这是中国人公开对法国的进步所进行的罕见的承认），但阶级矛盾和阶级剥削也相当普遍。如果我们想在祖国发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首先应在法国建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和法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这番话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补充说：“为了邓，我到法国后，从没有交过异性朋友。而且，今后我也不打算那样做。相反，我认为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是同蔡和森的友谊。”怪不得有位同学开玩笑说周恩来是个厌恶女人的人。

蔡后来在蒙塔尔吉郊外一块林间空地举行的仪式上，介绍周加入了新民学会。这使周有机会参加由左翼作家亨利·巴比塞组织的有关时局问题的星期讨论会。巴比塞很明显是代表共产国际的。周恩来很快就成为巴斯科咖啡馆和帕迪昂附近的另一家咖啡馆的常客了。他还加入了以蔡为首的半工半读互助会。该会很快就成为留法中国学生聚集在一起发泄不满的场所。

在记载周恩来留法期间参与的众多事件的史料中，第一个便是中国学生向中国驻巴黎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当时，留法的中国学生陷入困境，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没有地方学习或聚会。因此，一帮中

国学生代表要求中国公使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公使只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却回话说不再给这些学生提供资金了，那些既没有钱又没有工作的留学生应该被遣送回国。这下激怒了广大学生，由此导致了1921年2月28日学生向公使馆的请愿事件。公使本人默不表态。后来，法国警察冲出来，驱散了请愿队伍。在这个事件中，总共有4位领导人，其中两位就是周恩来和蔡和森。(32)

第二个事件影响也很大。7月，中国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向法国政府借款。名义上是为了救灾，但实际上则是要购买军火。为此，大多数留法学生和工人都反对借款。夏季，他们召开了拒款大会，以示抗议。就在即将达成借款协议之际，学生和工人包围了公使馆，警告中国代表团："如果你们签了字，就立即打死你们。"周恩来发回国内的文章有意地报道了借款详情并发动国内也起来反对。最后，法国政府只好让步。

但是，令人瞩目的是1921年9月21日占领里昂大学的事件。那里有1000名中国学生既不能注册，也不能工作。

本来中法两国政府均同意在里昂再设立一所新的中法大学。但据透露，这所新设立的学校主要招收刚从国内送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却拒收那些当时正在法国的这批"捣乱分子"。当他们得知对已在法国的中国学生的经费拨款即将停止时，愤怒的留学生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周恩来写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他在巴黎召开学生代表大会，坚决要求在9月中旬"无条件地开放里昂大学"，并在里昂组织了示威游行。

据说，周恩来身穿雷诺汽车厂的工作服，老练地和法国工人们协商。他坐在巴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筹划着最后一刻的行动方案。一位一直注视他的朋友情不自禁地说："除了那个大公文包之外，你真很像

一个汽车工人。因为在雷诺汽车厂，还从没有一名工人提着这样的公文包到处走动呢！”

周抬头看了看，手里却还在不停地写着。

“给，带上它，”他边说边把这个包递给了那位朋友，“等到了里昂，我们也许需要用它来消磨时间呢！”

果然不出所料，他们真的出事了。在里昂，他们被捕了，并被扣押在一座兵营里。他们进行绝食，以示抗议。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等进行营救。

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33)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瞭……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

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

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

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

从这两段话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也许是不得不接受这个可怜的办法，并想最充分地利用它。因为，世界其他地方都在接受这个主义。

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短暂的宣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特点。在周的同志中，很少有人去问无产阶级是否能在新的权力结构

中发挥作用，也很少有人对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的纲领的可行性产生疑问。当时，马克思主义颇为盛行，要想抵御其魅力诱惑，需要有相当坚定的决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值得信奉的科学，这如同人们“信奉爱因斯坦定律一样”。

对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立志使祖国赶上欧洲水平的中国人来说，要想抵御那些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巧妙地提出来的建议的诱惑，真是难上加难！因为这一建议暗示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直奔共产主义。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并能免受走进西方式社会这一必然阶段的痛苦。说得好听点，甚至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许还会超过欧洲。

周恩来是个反叛者，他激烈地反抗中国统治阶级众多的利益、特权及其愚昧。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人，他深深地同情和他同病相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在欧洲，他本能地倾向当地的反叛者们对其政府的反抗。这些反叛者很多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欧洲的大部分年轻的中国人都想摆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周恩来也不例外。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即周没到法国之前，在脑海中把这个国家理想化了。这主要是由于读了陈独秀的文章的结果，使他产生了法国的一切都是现代化的印象。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承受这么高的期待。

周恩来欣赏并喜欢巴黎的许多东西。几十年后，他对法国驻中国大使说：“你们是热爱自由的人民。我在法国时，曾高兴地注意到，在所有的大街小巷，你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尊重种族平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法国警察、政府官员、大学教师、女房东及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与之打过交道的法国人，对年轻的中国访问者都特别友好或能给予特别的帮助。

在周恩来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他的言论流露出一种缺乏信心的痛苦之感。似乎他对在国内和欧洲的朋友说过：“好吧！如果你们开始信奉共产主义，我将加入你们的行列，并尽力使之步入正轨，至少是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虽然它可能不是中国目前之所需，但只要是能使中国投身于社会变革的任何东西都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半保留的思想隐约出现在1922年3月他为悼念亡友黄爱而作的一首诗中：

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

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作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有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那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它，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这首诗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牺牲，即如果是英勇壮烈的死，就不必怜惜生命；第二个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尽全力；第三个主题

是耐心。他指责那些想收获共产主义果实的人忘却了要播种革命的种子。

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这首诗介绍给他们。他还说这是一首表示内心志向的诗。他写道：“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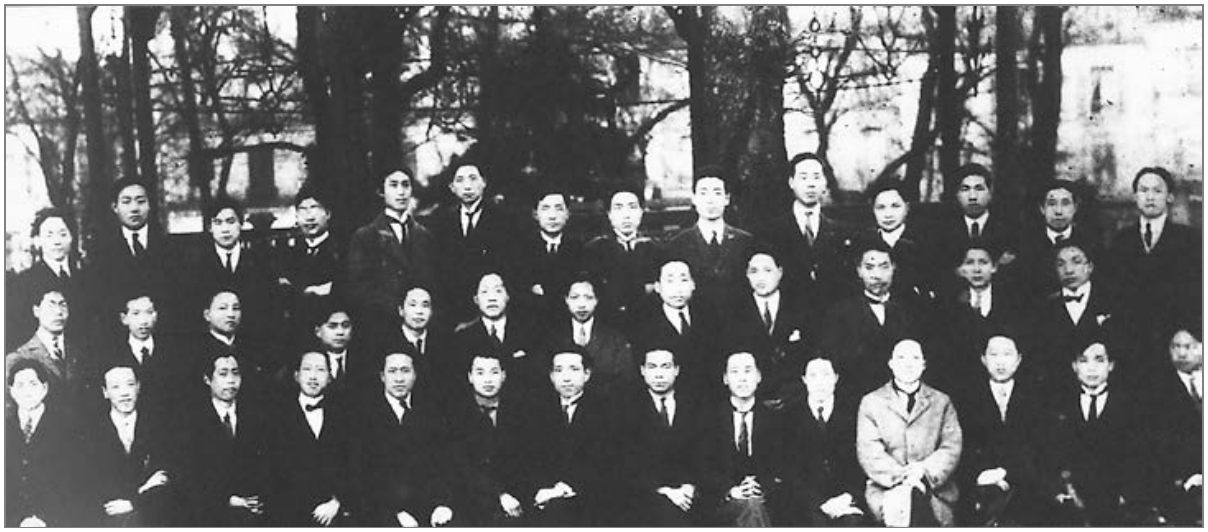


1922年，周恩来和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赵光宸（左一）在柏林万赛湖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50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从未动摇过。

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等在巴黎成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这是参加成立大会的成员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合影，后排右六为周恩来，前排左二为赵世炎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

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34]。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著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 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35]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36]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左一为聂荣臻，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37]宣传革

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

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38]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

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

“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

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

《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39) 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他们

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

1924年7月，周恩来接到党的命令：他在欧洲的任务特别是作为组织者的任务已经没有必要了。在异邦的土地上，他被一帮比在天津见到的还难对付的学生拥立为领袖，他们相处融洽。他领导解决了各种问题，例如学生承认双边政府的合理的贷款，充分利用欧洲教育机构，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欧洲政府对中国侨民的理解，等等。但现在他得返回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青年时代留学欧洲并幸存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周的政治生涯中，几乎人人都支持他，如陈毅、李富春、蔡畅等。即使在经历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这些人虽然不像别的团伙那样来往密切，但所谓的“法国帮”仍然在中国共产党内发挥着影响作用。

在法国，周恩来不仅遇到了李立三（李在几年后就成为周的有力的竞争者），而且还遇上了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周后来谈道:“在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胡志明已经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是我的兄长。”

在欧洲度过的3年半时光，使周恩来得以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使他本人完全同这个主义相融合了。所有这些，加上他在巴黎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逐渐提高，从而为他今后在国内的政治生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24年7月下旬，他离开了巴黎。

6个月后，法国警察在一份缉获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件中发现了周恩来的名字，因此决定调查他。他们除了知道周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

系之外，其他的却什么都不知道了。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足以把他驱逐出境。然而他们的行动足足晚了6个月。

鸟儿已经飞走了。

(1)周的故居是在他逝世后经过翻修的。—译者注
(2)指孙中山先生1911年创立的中华民国。—译者注
(3)指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译者注
(4)在周恩来的大半生中，中国的“元”大约与美国的“元”价值同等。
(5)养母陈氏受过教育，生母万氏是理家的能手，作者将陈氏的情况与万氏的情况弄颠倒了。—译者注
(6)周的外祖父家在清江浦（今淮阴市）。周6岁时曾随生父母、养母迁到外祖父家居住。—译者注
(7)指周的两个弟弟。此时周的父亲已外出谋生。—译者注
(8)周的堂伯父周贻谦在铁岭，周的伯父周贻赓在奉天（今沈阳市）。周先入铁岭银岗书院，后进奉天第六两等（初等加高等，是完全小学的意思）小学。—译者注
(9)指历史教员高戈吾。—译者注
(10)题词的原文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写于1917年赴日本前夕回沈阳母校时。—译者注
(11)南开学校是严修创办的私立学校，后改称南开中学，张伯苓任校长。—译者注
(12)这里把天津比作南方是相对沈阳而言。—译者注
(13)周的学习优秀，这时学校给予他免收学费待遇。—译者注
(14)周一年级编在己三班，后改为丁二班。—译者注
(15)可能指抗战期间，张伯苓在重庆创办的南开中学。—译者注
(16)周恩来的字。—译者注
(17)博浪：博浪沙，在今河南原阳县城东南。历史事实是，公元前218年，张良遣力士行刺秦始皇的地方。—译者注
(18)《新青年》是1915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刊名为《青年杂志》。—译者注

(19)指《诚能动物论》一文，曾作为南开《校风》第三十期“代论”发表。—译者注
(20)指的可能是1951年2月24日周到南开中学时对师生的讲话。—译者注
(21)原文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张致电周，表示祝贺。不久张定居天津，1951年3月病逝后，周曾去张家吊唁。—译者注
(22)周恩来是1917年9月在天津乘轮船去日本的。
(23)周回国是在1919年4月中旬，“五四”运动尚未爆发。
(24)周于4月中旬由神户离开日本，在大连上岸，先到沈阳看望伯父，约在5月中旬到达天津。—译者注
(25)周1919年4月离开日本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要入新创办的天津南开大学。—译者注
(26)周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译者注
(27)觉悟社正式成立于1919年9月16日。—译者注
(28)1920年7月6日至8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此案，周等被捕学生于7月17日被释放。—译者注
(29)指李的男朋友、周在南开的同学。—译者注
(30)原书中只引用了此诗片段，译者根据原诗作了增补。—译者注
(31)周此次旅欧的目的地是英国，抵巴黎后因病延至次年1月5日抵达伦敦，准备入爱丁堡大学，但因英国生活费用昂贵，2月中旬回到巴黎。—译者注
(32)以上原文如此。
(33)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
(34)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60年后近千名中国和法国的崇拜者，在中国总理华 国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率领下，曾在这家旅馆的门 口召开了纪念性的聚会，并为周恩来的一座半身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作者注
(35) 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36) 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37)《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

(38)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

(39)原文如此。

第二部 奋斗

革命婚姻（1924~1925）

1924年9月，周恩来返回位于亚热带的广州。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也是孙中山共和运动的首府。据说，周恩来是经过莫斯科，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回国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常常经过苏联从西欧回国。周恩来在国外待了这么久，他自然很想看看在华北的朋友和眷属。他曾向埃德加·斯诺讲过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了解他的埃德加·斯诺则用肯定的语气说他“在莫斯科作了短暂的停留，旨在听取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位日本作家断言，周不仅经过了莫斯科，并且在列宁大学同铁托、陶里亚蒂和胡志明一块儿学习过。然而，没有确切的事实可以表明周恩来经过了莫斯科，很有可能他是乘船回到中国的。

回国后，他的职务是担任极为重要的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军事部长。他的办公室设在文德路一幢小楼的二层，尽管没有什么标志，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事实上，这是中国唯一公开的中共办事处，门前赤脚的农民与衣冠整齐的官员常常拥来挤去。

这位新书记充满热情地着手他的工作。他对党从1921年到1924年所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他曾这样写道：“如果大家努力工作的话，那么很多事情便会在短时间内做完的。”他就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留沙，陀斯妥耶夫斯基把阿留沙描绘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他笃信真理，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并渴求英雄主义的行为”。

不过，他的思想观点并不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样保守。从法国回来不久，他写道：

仅仅在过去的五十年内才出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发展阶段，或者是其最终产品……由于资本的垄断，世界市场衰落了，世界生存的空间已被分割完毕，资本主义国家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并导致相互冲突。此外，在两次对抗的间歇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就会形成同盟来剥削被压迫民族。这样，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联合控制的半殖民地民族，也不可能逃脱这一现实。

另外，周恩来也常常引用儒学的词语，以便使对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演讲显得更生动。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既然一个人不愿看到善行被亵渎，那他就不会只为自己；既然一个人不愿使他的才华弃之不用，那他就不会只图私利……这样，抢劫和动乱就不会发生，门户也就不用上锁了，这就是大同社会。

周恩来试图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乌托邦思想联系起来。这两位思想家对周的青年时代影响很大。

基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利害关系，周也同时为国民党工作。国民党让他负责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训练部[1]。这时是国共合作的黄金岁月，但后来兄弟反目成仇，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周恩来在广州开始工作后不久，苏联红军的“伏拉伏斯基号”船给孙中山提供了俄式来复枪和大量的军火。西方的忽视促使国民党为周进行革命活动开了绿灯，但这种活动是合法的，不再是地下的了。

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两个党便联合起来了，并在广东建立了它们的共和政府，而它们的长远目标是为了消灭北方的军阀和实现中国的

统一。

在广州，两党都有俄国和第三国际的顾问，此地成了酝酿革命的温床。周恩来回国6个月前，孙中山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新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第三国际建议共产党注意“不失去自己革命身份的同时”“与国民党一道工作，推翻军阀，然后才能走向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运动”。国民党已经同意像周那样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该党。



黄埔军校旧址

事实上，由于共产党的明智合作，国民党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派别。周恩来极力争取国民党的左翼，如财政部长廖仲恺及孙中山比较

开明的追随者。廖仲恺的儿子记得“有一天，一个目光敏锐、眉毛浓密、身着白亚麻西服的年轻人”，是如何拜访了他的父亲。

周恩来成了瓦西里·布留克尔将军的知己，瓦西里将军在中国被称为加伦，他是国民党的高级顾问。埃德加·斯诺称加伦为周的“真正老板”，可是周在筹划革命时那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也受到了另外一个俄国人的指导。这个人就是有名的米·谢·鲍罗廷，他的人品与周恩来极其相似，个人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曾被沙皇驱逐出境，在芝加哥教过书，在苏格兰又蹲过监狱，为第三国际走私过珠宝。这个胡子黝黑而又浓密的犹太共产党人，是苏联驻中国的代表。1924年至1925年，胡志明也在广州，真可称为人才荟萃。

1924年6月，孙中山正式创办了黄埔军校，它是中国革命军队的新的基地。校内的权力由孙中山的军事副手蒋介石掌管，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他对共产党并不钟爱。尽管如此，周恩来仍被任命为校政治部主任，由于他的国民党上司忙于其他事情，这样便使周在他的位置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他发现自己的职务很有讽刺意味，作为中国的桑德赫斯特学院或西点军校的政治负责官员，他并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军事训练。



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许多胸怀大志、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投奔了向现代化军队迈进的黄埔军校，人们寄希望于这支军队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国。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了周的追随者，其中像林彪、罗瑞卿等后来成为中国红军有名的领导人。他们的存在为周恩来的政治生涯奠定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基础。第二届学员中有80多人加入了共产党，加上黄埔军校的新学员，他们为共产党后来的内战准备了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周恩来在学生中努力工作，建立政治组织，创办报纸传播马克思主义。每天清晨，他乘小汽船从广州城去黄埔讲课，而教室内常常是挤满了人。晚上，他返回广州城参加一个接一个的会议并进行会晤。不过，从一开始，他们就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校右翼分子的关系紧张。这些右翼分子成立与共产党作对的团体。周恩来曾同他原来的一个学生进行了几个小时的争论，这个学生是一个右翼团体的负责人。周说：“你刚从俄国回来。你曾与俄国的革命领导人一起战斗过，你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在所有的大国当中，有谁肯给我们枪支弹药呢？只有俄国人，他们是用船运来的。你去年10月7日在那儿时，黄埔港上正卸着俄国人提供的物资呢。”

“英国人向广州商团提供枪炮打我们。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与北方的军阀勾结，攫取我们的钱财、权利和利益……你们这些人应该明白，国际形势要求我们与俄国联合起来，否则，我们的革命势必会被埋葬。”可是那个年轻人却一再申辩，并以俄国共产党拒绝归还满洲铁路为理由来反驳。周最终未能说服他。

他与周佛海的关系相处得不太顺利。周佛海是共产党的一个创始人，可后来想退党。一天晚上，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他踏着朦胧的夜色赶到周佛海的住处。当他接到周佛海递上来的退党信时，随手就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后平淡地说：“我希望你不要介意。党内同志已经告

诉了我你想要干什么，我认为这没有必要。我可以坐下来跟你谈一会儿吗？”周恩来用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想劝说他的同志回心转意，可周佛海则辩解他此时如何如何相信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而不需借助共产主义来满足中国人民的要求。周恩来则驳斥说，国民党的的确确继承了旧社会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现在为了革命，需要一个更彻底的解决办法。

虽然周恩来的努力受到挫折，可他仍频繁地进行夜访，以使他的朋友留在党内，并争取新的同志加入党内来，同时调和相互争吵的两个团体。当然有一些同志却不像周恩来那样有眼光，而认为终日辛辛苦苦地在两种条件下忙碌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一方面要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要秘密保留他们的权力，以便在第一次革命之后进行第二次革命。

1925年，周恩来已经开始向他的学生—将来的军官们灌输关于军队的作用之类的激进思想。他说道：

军队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民，但被压迫阶级也可以利用这种工具去压迫他们的压迫者，并推翻压迫者的势力……西方是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是国民革命，二者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世界革命……而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

在同一年里，周恩来得到了任何一位革命者都梦寐以求的去实现他的理想的机会。他表现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英雄主义行为”。国民党终于开始向反对革命的军阀进攻了。

第一次称做东征的举动给周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陈炯明是广东的军阀，如果不征服他的话，广东就不能成为共和政体的安全基地。1925年，经过两次大的战斗，东征便宣告结束。黄埔军校的两个团参加了第一次战斗，当时周恩来作为高级政治官员随军到了前

线，他负责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这次战斗。周恩来辅助领导的为数只有3000人的小部队，不到5月份便把陈炯明的势力赶出了广东省。



1925年4月，周恩来和梅县商会欢迎东征军的代表合影

在这次重要的战斗中，周恩来取得了辉煌的功绩。他的宣传鼓动工作取得了成效，沿途农民为革命军送粮送酒，军队还未到前线，兵员就增加了一倍。他为农民成立自己的武装，分发武器，传授游击战术，在陈炯明的后方发动起义。

为了政治动机而参加战斗的黄埔军校学生的第一次亮相是极为成功的，这说明周是那个时代杰出的人物。孙中山夫人回忆道，她第一次见到周时，他给她的印象是“一位年轻的，但很有头脑和才干的领导者，在革命活动中立场坚定、目标明确”。

蒋介石不得不提拔他的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下级。周被委派负责军法处并兼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的工作。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中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摩擦加剧了，右翼反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

5月份，周恩来对一个来访的共产党同志说他对黄埔军校的未来是乐观的，他甚至在孙逝世后推荐蒋介石，使他的地位得以提高，以便迅速地发展黄埔的学生。不管怎么说，蒋介石开始时比较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且明显地采取了支持共产党的立场，鲍罗廷同样也持有这样乐观的看法。

到了夏季，一些军阀开始在广东制造麻烦。在香港的英国人为这些军阀提供了资金。周恩来受命带领他的人马回到省府，在那里他赢得了农民和工人的支持，拯救了革命政府。

可是，游行的人群遭到了枪击，导致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罢工。周恩来用声讨帝国主义罪行的宣传来鼓动罢工者。这个时候，他整天为这个跟他联系在一起的党而奔波，穿梭于各个办公室之间，为了方便起见，他分别在广州和汕头包了两个房间。

此时，周恩来正式掌握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政治训导被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周就能影响那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员。在军校的领导层里，他的共产党同事有叶剑英。他曾经不顾很多朋友的劝说，在周的说服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周最亲密的朋友。(2)

在广东与国民党一起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中还有一位是毛泽东。写周恩来的一个中国传记作家认为，从这时起周与毛便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们俩在同一个农民教育讲习所里讲过课，这个讲习所是国

民党创建的。可是，他们在广东真正的合作事例却无人知晓。凭想象认为，他们由于在这儿偶然的接触而开始互相敬慕是不可能的，因为两人的思想迥然不同。例如，一方面，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倾向于农民式的游击战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另一方面，周恩来坚持中国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全力以赴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规化、专业化，并使中国共产党官员形成一个专家团体。"毛泽东认为，这些目标是资产阶级的，对此不感兴趣。

在共产党中另外一个争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大地主朋友违背了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正对农民进行压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应该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另一些人则坚信农民无足轻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身上，像欧洲所进行的革命那样。毛泽东则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3)]一文，以反对这两种观点。他在文章里写道，农民本身就是一个革命阶级。周恩来看来未参与这样的争论，可能是为了保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团结。

周深得蒋的信任，所以在广东的同志就利用他作为向蒋进谏的渠道。可是他在国民党中的主要盟友、具有自由思想的廖仲恺却于1925年8月20日被暗杀了。

这时候，那个意志坚定的"小造反者"邓颖超闯进了周的生活，这是他们自4年多前周赴法分别以来的第一次相见。她作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从天津南下来此，邓在这次政治生活的分离中比周显得更出色。但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不会出现分离。没几天工夫，他们便悄然无声地结婚了。当时，周27岁，邓21岁。对他们来说，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婚姻由父母包办的年代里，他们彼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自愿的、充满热情的、不受他人支配的选择。他们抛弃了正规的礼仪，只是当着许多朋友的面，宣布了他们的"八互"，即"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事实证明，他们是相互

恪守了诺言的。他们的婚姻被证明是中国夫妻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最持久、最具有说服力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类似背景和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生命结合。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邓的父亲是广西人，而她自己则是在1903年或1904年在河南出生的。同周一样，她被中国一个传记作者描述成来自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她父亲死于突发病。同周一样，没有了父亲，成年之后只有靠自己。邓是独生女，她母亲对她要求严格，立志把她培养成人。邓的母亲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她在一些显赫的家庭里做家庭教师，很有可能她也影响到后来的周。她们母女俩移居天津的法租界，在那里邓的母亲仍然当家庭教师，以此挣来的钱使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

1915年，邓颖超考入了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在班上，她的成绩常常中等偏上。她聪颖，但并非出类拔萃；她活跃，善于雄辩又具有直率开朗的性格。据说，这是中国中原人的特点。

她在12岁芳龄时，便参加了反对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学生爱国运动。她后来说：“在两年内，我便完成了学校规定的整整8年的功课，可是由于过度疲劳，我患了肺结核。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地理、历史、音乐、物理和汉语，我不喜欢针线活。”

在离校的前一年，她积极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邓回忆道：“我们分别组织男学生和女学生，因为让他们一块儿行动是困难的。我们是‘女子爱国协会’，并与男同学进行合作，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后来的生活中邓承认，她们所做的一些行为是有些过激的。“在激动中看书学习是不可能的。抗日的热情这么高涨，以至于我们把一个日语教师给赶走了，并撕毁了他的教科书。我现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为了反抗日本，我们必须学习日语。”

1919年秋，觉悟社成立了。这里正是两个未来的情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周恩来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一位中国作家写道，“那时邓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姑娘，她积极参加了所有的宣传和游行活动。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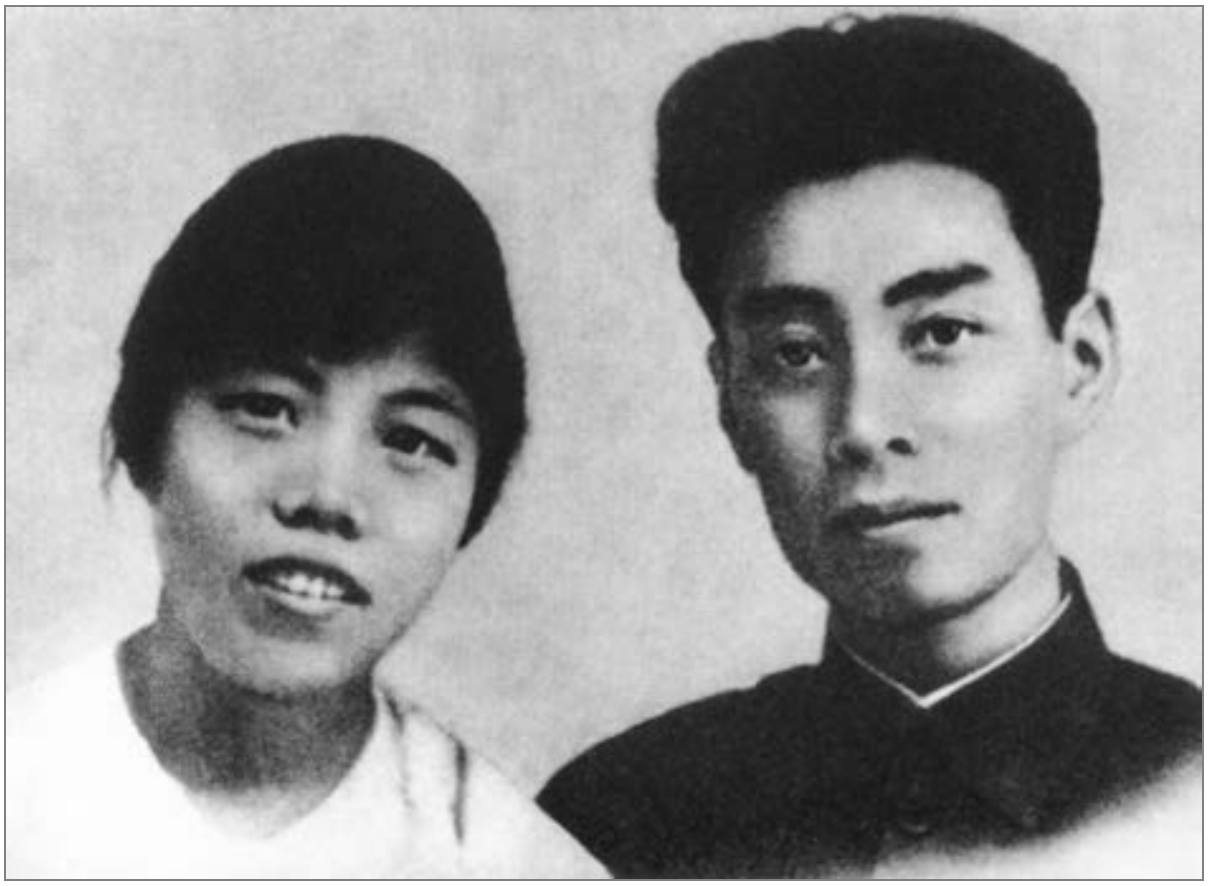
同年10月，在天津，这对情人再次站到了斗争的前头。邓承认，他们利用书中所学到的一切来引起革命。“我们鼓动人民拯救祖国，推翻那些卖国贼。当我们演讲时，经常泣不成声，听者也为之感动。”邓带领一个演讲团，到处散发激进的学生报纸，包括周编辑的那份报纸。1920年夏，邓来到北京的一所私人学校任教。由于她母亲失去了工作，所以她必须赡养母亲而无法出国。

据说，是邓先爱上周恩来的。一个后来跟他们很熟悉的德国人安娜认为，邓相貌一般，所以周“很明显看中的是她内在的东西而并非其外表”—不过那是在长征之后的事了，长征使她变老了许多。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一方面我憎恨旧的婚姻形式，另一方面我也不赞同所谓的自由恋爱思想。”她觉得年轻人对这些事情不太了解，所以形成一种成功的现代婚姻是不容易的。“我没有爱上任何人，周恩来和我当时只是好朋友，那时我只有17岁。”

她的教师工作很辛劳，她希望在收入较高的银行谋一个职，为此便在晚上学习会计知识。正像3年前在天津上学一样，由于疲劳过度，她的身体再一次垮了下来。这样她不得不放弃学习，更谈不上在银行谋职了。在北京住了两年半之后，她又回到天津在一所小学里任教。

到1923年[4]，她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周恩来一起成了天津学生领袖的核心人物。这些领袖定期聚会，讨论俄国革命，并受到北京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的巨大影响。中国的年轻妇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对她们可能有着特殊的意义。这种大胆而又新颖的自由、平等思想可能对邓比对周更有意义。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

邓同周一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感兴趣，并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她见过周所尊敬的同志蔡和森。1924年她又参加了共青团，几个月后转为共产党员，被任命为妇女部部长。1925年，国民党选代表参加在广东举行的第一次党代会[5]，她被选为天津的代表，正是这个机会，使她能与她所爱慕的人结合在一起。

后来，她常常对她的朋友们说当周恩来在巴黎时，他们是通过书信来往而恋爱的。另一位作家写道，他们借鸿雁传书使爱情从1922年便建立起来了。这样，才有了他们在广东的相聚。

一位西方记者是这样描绘邓的，“她有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在表达其思想时又不受感情所左右；她有礼貌、和蔼可亲；而周恩来从根本

上讲是一个坦率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他的夫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长处，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一些弥补”。

周恩来亲切地称邓为“小超”，这就成了她后来的别名。邓是周工作中的好助手，家庭中的好妻子。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党的领导人常常到他们家里来探望，来客都无拘无束。邓从不让她的客人知道她很忙或很累，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然而，客人从用人那儿得知邓颖超总是亲自挑选购置家具，并特意指教厨师做菜。他们赞叹她不辞辛苦，既忙于政治，又忙于家务。一位传记作家这样写道：“结婚以后，他们是由邓来掌权当家。”

有人会说她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习惯，无论如何，虽说他们出身于旧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背叛了那个阶级的习气、价值观及生活方式。

占领上海（1925~1927）

如果说周和他的新娘曾经度过蜜月的话，这个蜜月也是十分短暂的。结婚没几周，他就重返前线，参加了1925年10月开始的反对军阀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黄埔军校学员是第一军的主要成员，周是政治领导人。跟从前一样，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吸引周围的农民参加革命。部队纪律严明，不许拉夫，不强占私房。由于周的影响，据说，该部5个师中有4个师的政治工作是由共产党掌握的。

周被提升为特派员[6]负责东江地区汕头一带的工作。汕头是这次战役中要占领的关键城市之一。有一位中国传记作家评论道：“27岁的周身穿漂亮的国民革命军服，系一条时髦的萨姆布朗武装带。他是蒋介石武装部队的政治领袖，也是国民党最大占领区的主要负责人。”

东征中，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了一个独立团。他还第一次自诩，这是一支归属自己领导的精锐部队。在广东和汕头他下榻的旅馆里，门卫们都尊敬他，就连他的共产党同志们也对他敬佩不已。人们抱怨说，周在汕头的新工作把他“忙坏了，没空到广东去”，而那里却需要他去解决同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争端问题。

这些右翼分子逮捕了周的秘书，因为他给共产党总部送了一封密信，报告了共产党在部队里作用的扩大。于是，他们急忙绑架了这个不幸的人，把他押送到蒋介石那里发落。

周急奔出事地点，耐心地解释了一个小时，为其秘书的忠心作保。共产党可能表现得过于热切，但是这仅仅是为了革命的成功。当各地方部队发生反叛时，必须避免革命阵营内发生分裂，难道这不是必须优先考虑的事吗？蒋介石完全打消了顾虑，同意周保释他的秘书。但是，必须把他调到别的师去。后来，在向自己的部下发表讲话时，蒋命令左右两派敌对势力全体起立，互致敬礼。

周通过一次巧妙的演说，击败了自己的批评者。“我本人是共产党员，”他说，“但是，没接受过党的一分钱报酬，我现在还在共产党内。共产党没有开除我嘛。”一场紧张局势就这样被他的笑语平息了。后来，周告诉共产国际的代表，如果国民党右翼坚持作为独立的右派联盟活动，他将以撤回俄国援助来相挟。

1926年年初，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左派势力获胜。周的新娘邓颖超也是大会代表，并是中央委员。她同孙中山夫人在一起工作。

共产党领导对于自己在这次大会上应采取什么策略是有争议的。有报道说，周坚持共产党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毛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抨击国民党右派分子。他和周不得不对国民党激进派中是否还保留着足够的左派力量值得合作作出明确的判断。

当蒋介石在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中突然把枪口掉向左派力量时，所有这些疑团都解开了。共和国海军的实际统帅[7]—他的上司（一位俄国人）正巧休假—3月份收到了一封伪造令，命令他乘自己的中山舰驶向黄埔港。当蒋发现这一未经许可的行动时，便怀疑是反叛，于是撤了这位司令官和许多人的职，解除了俄国顾问和共产党政委们的职务，宣布了戒严令。周后来回忆说：“他也禁闭了我一天。”

蒋的日益狂妄和法西斯苗头，震惊了共产党人。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自己人的无能。周后来承认：“我对3月20日的事件很清楚。”他和毛泽东当时都在广州，他们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但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

蒋很好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达到了目的。现在，他又向俄国顾问们道歉，并开始释放包括周在内的共产党员。由于蒋采用后来被周说成“背信弃义、冷酷无情的强盗方法”，右翼分子开始掌权了。

在蒋的办公室里，周和俄国顾问们同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求蒋对此事作出解释。尽管如此，蒋还是顽固不化，毫无悔改之意。他又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国民党队伍中被驱逐出去。4月11日，他解除了周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接着，又解除了周的汕头特派员一职。

4月29日，鲍罗廷召集共产党负责人开会，讨论善后事宜。据说，会上在找不到一位合适的中国替罪羊的情况下，鲍罗廷应当承担罪责。他在中国的工作应被停止—这也意味着中止所有俄国援助。然而，周承担了这一过失，从而减少了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损失。正是用这种办法，知情人才用一种英雄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他。

下一步怎么办？共产党员们各抒己见。受一位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已准备同蒋握手言和，并且准备以蒋为掩护，继

续进行革命斗争。然而，受鲍罗廷本人支持的激进的广东共产党员则对蒋的行为深恶痛绝，要求独自采取行动。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和其共产主义盟友的第一次公开决裂。但是，期待已久的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中国革命中的两派力量都希望北伐胜利。因为，不击败势力强大的北方军阀，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统治南方共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基于这个原因，周仍力图吸取“中山舰事件”的教训，共产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北伐战争。

与此同时，在1926年春毛接管“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周仍继续在这里讲授军事课程，包括《军事行动与农民运动》。

如果说共产党需要蒋介石把自己推向北方的话，那么，为了北伐的胜利，蒋也需要俄国的军事援助。所以，两党仍很不情愿地站在了一起。蒋同意周在黄埔军校恢复被清除的共产党人的职务。他的宽宏大量无疑是受到了周拼命撮合国共两党联合的感染。他不仅同意周给那些受过清洗的共产党分子以正规的训练，而且同意他给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样的平等机会，均可提名为北伐军政委。对此，周深感满意。不过，投票时却出现了僵局，直到周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一位左派国民党军官时，僵局才被打破。正是这位军官，在他当选后准许周推荐参谋人员。于是，共产党又一次占了上风。

对周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他迫不得已地终日同那些对他失去敬意的两派人士打交道。有一位同志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环境，它“第一次考验了周的忍耐力，也显示出了他应付局势的才能。他对所发生的一切从不解释或回答。根据我们的决定，他在黄埔若无其事地履行着教学职责，并对蒋介石更加尊敬”。

1926年7月，矛盾重重的中国人联盟加上他们的俄国顾问们发动了北伐战争，以使上海和北京也加入共和政府。周是第一军团的政治负责人，[8]在沿海一带开展活动，武装工人和农民，支援革命军。

这时，周的家里出了一点事。正是在这个时候，周的夫人在广东怀孕流产。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这也是他俩最后一次有孩子的机会。由于革命的需要，在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的命运便同中国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的孩子是中国的下一代—包括他们收养的几个孩子。这一代人的自由与尊严将因他们的牺牲而得到显著扩大和提高。

1926年年末，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研究》，要求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支持国民党左派的反右斗争。周响应莫斯科的号召，让同志们加入蒋介石的部队，壮大蒋的力量，在蒋的部队里英勇作战。

根据一种观点，现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的时候了。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工人集中地，而此时又处于北伐的共和部队的必经之地。10月份那里发动过一次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起义，结果失败了。不久，他们又为占领上海作准备，制定了工会领导人政治条例，并偷运武器。

1927年2月底，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起义，30多万工人参加了大罢工。北洋军阀派出杀手，残杀人民。他们曾真诚地指望蒋介石命令他的北伐部队按时行动，保护上海工人免遭军阀镇压，但他们却大失所望。总之，工人们没受过武装夺取城市的充分训练，结果起义失败了。

周焦虑万分，为了准备第三次起义，他着手加强他的政治领导。他并没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工人阶级也不太了解，而且既无起义

指南，又无苏联顾问的指点。这些武装起义完全是他自己智慧的结晶。周仍然低估了蒋的对抗性。在他的头脑中，他大概以为起义失败是运气不佳，或同蒋关系疏远所致。然而，他没有在自责上浪费时间，而是忙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上海起义。在法租界的一所学校里，他重新训练工人，负责秘密准备袭击政府军和抢占更多的武器。

有人认为，在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人的命运》中，那位名叫京吉索（Kyo Gisors）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周。这是一本关于上海革命的最著名的西方小说。不过，书里的京是位有一半日本血统的人，死在狱中。此外，两人还有许多不同之处。该书可能描述了这些事件的一些背景，但周后来对该书的评论是“事情并非如此”。



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周恩来

这一次，周的指挥部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内。300名狙击手组成了“铁军”，接受毛瑟枪的使用训练。这些枪支都是偷运到上海的。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每月拨给经费3万元，由周和他在上海的共产党部属顾顺章共同分配。顾是一位受过俄国教育的机械师、魔术师及秘密社团的人物，他因能赤手空拳同敌手搏斗并不留下蛛丝马迹而知名（后来他成了周的一大包袱）。3月21日，他们采取行动，举行总罢工，关闭了上海的工厂。5000名武装工人第一次攻占了警察署。随后，又占领了上海警备区兵营。

周率领200人夺取了邮局、警察总部、军火库及火车站。一位外国记者在他的电讯中说，巷子外边和闸北那“令人讨厌”的旅馆外，周的5000名衣衫褴褛的武装工人汇成了一股人流，庆祝胜利。军阀的士兵纷纷败退，周宣布“平民政府成立”。周评论说：“两天内，除租界外，我们占领了所有地方。”

周焦急地等待蒋介石的部队给予增援，以巩固这一胜利果实。此间，工会控制上海达3周，红旗在城市上空高高飘扬。但是，没有国民党部队的援助，上海再度沦陷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

这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种政治行动，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汪精卫与陈独秀在国共两党联合宣言重申了他们的联合，否认了两种自相矛盾的谣言。一是说共产党准备成立工人政府，打败国民党；一是说国民党准备向共产党宣战，镇压工会。

30年后，他对1927年的上海起义作了如下评述：

“我负责领导武装起义，但是缺乏经验，对政治动力也理解不足。我是一位出自封建家庭的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很少，因为我没参加过生产劳动。我的革命生涯是在国外开始的。革命知识有限，仅仅是些书本知识。”

为了证实到底谁有经验、谁有力量，3月21日，蒋介石把自己那装备有机枪武器的部队开至上海附近。4月12日，部队呈扇形穿过工人住地。共产党纠察队员们遭到了袭击。国民党与秘密社团已订过协约。这些社团是一些流氓团伙，它们在很多方面真正控制着上海。这时，它们兴高采烈地攻击工会领袖。中午时分，工人武装仓促应战，并受到机枪火力的追击。蒋想一举全歼对他有威胁的共产党。于是，开始了血腥镇压。5000名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一位目击者说：“头颅滚动，犹如成熟的李子，充满沟渠。疲惫不堪的刽子手们挥动着大刀，拉布风扇的人在一旁一下一下地为他们扇风。”

蒋悬赏两万大洋捉拿或杀死周恩来。在这次袭击时，周正在商务印书馆的大楼里。国民党搜查的前几分钟，他溜掉了。共产党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捕、遇难。有的在严刑拷打后，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同志。后来，陈独秀批评周没能说服工人解除武装，结果才使蒋的部队找到了残杀他们的借口。然而，周回答说，共产党不是要过早地放下武装，而是应该加强军事力量。这样，作为一个政党，他们才能确保自己的独立。

在共产党夺取最后胜利的平静的50年代，周对上海惨案作了这样的解释：

“我们的领导人缺乏经验。我们既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们的胜利成果，也不懂退却的策略。上海工人和邻近乡村的农民们都有准备，可是，我们却没有准备好联盟组织。结果，蒋才能打垮我们。”

国民党来后，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对待共产党人，他们毫不留情，不问青红皂白，立即处决。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工人也格杀勿论。许多人被扔进了火车炉里。然而，共产党领袖们还在举棋不定。这个时候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当周被扣留时，他的运气不错。据说，黄埔军校一位可敬的军人—周救过他的一位兄弟的命—想报答周。当周被

扣时，他佯装不认识。另有一种传说，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第三种说法是，周被判死刑后，“某人为周良好的品行作保”，把他保释了。还有第四种说法，说周被捕后和其他人一起被关押在市政府内，最后成功地越狱。当然，这些传说不可能都是真的。

不管怎么说，周逃脱了，离开了上海。据说，他“刮去浓密的眉毛，蓄着胡子，灰黄色的脸上贴着纱布”。他大胆地申请国民党通行证。他仍然是悬赏捉拿的对象，而且这时的悬赏金额增至8万元。在火车站，周躲开了那些张贴印有他照片的通缉布告的国民党警察，化装后的他乘车逃离了上海，加入武汉的共产党领导层中。

有趣的是周住在武汉一位老朋友家里，此人是国民党军官。然而，“蜜月”已逝，不仅国共两党之间的亲密合作宣告结束，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终结了。蒋介石在上海的暴行，使他的自由主义派分子难以容忍。当汪精卫在武汉领导着势单力薄的左派时，蒋则以南京为基地，留在那里统率着装备精良的右翼部队。最终，争夺中国的这场战争是在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这一复杂范围内左右摇摆。与此同时，中间是处境艰难的共产党和自由派民族主义政党，他们自称要联合起来，结果却渐渐分开了。

现在，周放弃了他的国民党员身份，一心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战争中他曾表现得英勇无畏，如果说他对蒋的计划曾经有些天真的话，那么现在他在党内已经是一个经过风浪的无畏的战士了。

南昌起义（1927）

上海既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又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摇篮。然而，它却几乎轻而易举地被拉进了反动阵营的势力圈内。蒋介石何以

能在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心赢得这场胜利呢？1927年，共产党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会议，分析了失败的原因。

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主张，党应倾全力于政治工作，并认为国民党部队处于优势地位。另一些人则倾向于向蒋的军事挑战应战。浪漫诗人瞿秋白、敏感的农民毛泽东及其他人都提出了对未来的设想。周的态度如何呢？

在第五次党代会上，周首次提出了党内斗争的策略，他也因此而广为人知。他与瞿和毛对陈的批评观点是一致的，并被推举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秘书长。极不寻常的是他却把这一职务交给了他在巴黎时的朋友蔡和森，自己则集中全力于党的军事政策。这一举动本身就是对陈独秀的领导表示不赞成。周并不拒绝政治局的职务，在以后的49年里他始终在这一最高决策机构工作。据说，直至他去世，他的同事中没有一人能够与他相匹敌。半个世纪以来，周一直是共产党的内阁成员，并逐渐树立了一种道德权威，这是除毛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动摇的。(9)

这时，周宣称，共产党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果断行动，向蒋施加压力，以战斗代替退却，争取国民党左派。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赞成他的观点。长沙事件（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一位左翼国民党军队指挥官就下令杀害了100多名共产党人。两党之间脆弱的联合失去了平衡。

当中国共产党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斯大林和印度籍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加速了两党的最终决裂。6月1日，斯大林拍来一份电报，让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共产党员、工人及农民而坚持攻势。由于到现在还弄不清楚的原因，罗易竟出格地向汪精卫透露了这份电报的内容。结果，受惊的左派国民党迅速同共产党决裂。

懊悔莫及的共产党人不知所措。没有国民党左派的庇护，他们就失去了军事实力，无论在哪儿采取任何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受到蒋介石之流的挫伤。共产党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俄国顾问鲍罗廷的建议，要共产党应当自愿地向左派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此重新获得从前的盟友。

由于同国民党关系的恶化，7月陈独秀被解除了职务，铁腕人物鲍罗廷任命了一个5人临时小组，负责党的工作。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周和他的老伙伴李立三、张国焘。张国焘的经历在以后的10年里同周息息相关。他出身于一个客家地主家庭，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党内有一定的势力。许多共产党人小心翼翼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全地方，特别是江西省会南昌。这里是国民党的薄弱环节。盛夏时节，当左派国民党开始逮捕共产党时，周恩来和张国焘等人留在武汉总部，主持工作。有一位同志对当时周的工作作风作了如下的生动描述：

“周恩来孜孜不倦地工作，不夸夸其谈。他夜以继日地冷静处理大量复杂事务，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对种种非难漠然视之。他负责处理大部分与疏散同志有关的工作。这个时期也标志着他受到全体同志爱戴和尊敬的开始，以及其地位的上升。在一些圈子里，人们称他为‘铁人’。”

鲍罗廷打算返回苏联，但是他的继任者还未到达武汉。在这一交接时期，中央和南方各地的共产党纷纷主张武装起义。一切都取决于武汉政治局的明确指导了。然而，左派国民党这时正在追踪周。最后，他在武汉英租界鲁茨主教那里找到了避难所。国民党警察是不能进入这里的。周后来承认，这位主教救了他的命。

通过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政治宣传和直接从农村征兵，共产党现在可以获得1万名军人的忠诚了，尽管这些人缺乏训练，武器低劣。共

产党自成立以来，短短7年间，人数已增至5万多人，而且每个共产党员的身上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南昌是红军最大的聚集地。李立三从那里来信，力主举行武装暴动[10]，联合江西和附近各省的工人农民。

周欣然接受了老朋友的建议，不过他把目标扩大了，包括在广东省仍然是共和运动的精神中枢的东江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政府。两年前，周随同国民党东征军曾到过那里，对那儿的情况非常熟悉。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不多，农民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而且俄国的援助通过广东省边缘的汕头港可以很方便地运到。他相信，俄国的援助将是战斗中一个生死攸关的因素，他还说服了共产国际保证使这些援助兑现。

7月26日，周动身前往南昌[11]去组织前敌委员会。关于这次起义计划，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没告诉。在他动身前夕，张国焘还向他简要叙述了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谨慎从事的观点。周只好解释了其他俄国顾问的态度，指出他们的南昌起义计划一点也不过激。

“你看着办吧。”张国焘说，并补充道，“小心即大勇。”

“到那儿后，我见机行事。”周保证道。但是，他似乎主意已定。1927年盛夏，乘船前往南昌的那些紧张日子是决定周恩来发展的命运关头。他的行动敏捷果断。当他发现李立三领导下的一群共产党领导人仍在为起义的目的而争论不休时，他立即打破了他们在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问题上的僵局，赞成没收土地。这就是埃德加·斯诺把他称为“暴动者”的时期。他的意见和外表也颇为威严庄重。

几天后，他身着灰制服，手提黑皮包，抵达南昌。他隐姓埋名住在江西大旅社。在这里，他和朱德在柏林达成的谅解得到了报偿。朱加入了共产党，但他并未放弃国民党身份，也没向他的国民党上司暴

露自己的新身份。此时，他是公安首领，左派国民党部队的代理指挥官，统辖南昌。他受命来帮助自己的同志。周立即同他取得了联系，商议起义之事。附近还有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他们是两位对共产党友好的国民党将领。另外还有张发奎将军率领的以“铁军”闻名的第四军。这支部队里的许多军官都在黄埔受过周的教育，同情共产党。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



南昌起义时期的周恩来办公室旧址

眼下的困难是如何对付张将军本人。他既不参与国民党将领们的反共活动，也不偏向共产党。当这种势头上升时，周要求坚决举行起义，不惜冒着同张发奎将军发生冲突之危险。此刻，共产国际顾问们则让共产党同张将军加强合作，保护兵力；在进入国民党的这块根据地后，如果必要，再同他决裂。

但是，这将意味着要花去更多的时间，而据周估计，怂恿张将军脱离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不可能的。

周同一群激动的年轻共产党领导在南昌江西大旅社集会，决定不再等待。以周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一次未等莫斯科同意，就自己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

周与同志们一起确定下这个战斗方案后，接着就到第20军军部拜访贺龙，向他表明整个行动计划。这一冒险行动是件好事情。贺将军—这位富有同情心的爱国人士—立即响应了周的号召。他同意照周说的干。周当即任命他为起义总指挥，起义时间定在7月31日夜。

一切准备就绪。然而，那天深夜，贺龙却打电话告诉周，一位下级军官已向武汉的国民党司令部泄露了起义计划，敌人正在派遣部队，准备镇压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周当机立断，下令起义时间提前几小时。

然而，另一个方面又出了麻烦。周的同事张国焘从武汉抵达南昌，带来了一份共产国际代表不切实际的电报，干涉行动计划，要求推迟起义。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对这类玩意儿是畏惧三分的。



《八一起义》油画。图中情景为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

周采取纳尔逊[12]式的办法，打算违背这个命令。他坚持说：“我们必须采取立即行动，起义决不能推迟。不要管它。”张国焘还是倾向于等把张发奎将军争取过来后再行动。但是，其他人则热切地要求起义。周对为什么要执行这个行动尽量作出了解释。他的理由是：有些部队已开始行动，如果撤回命令，就是对他们的欺骗，假如张将军开除他们，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军官将采取必要行动。

“这与共产党领导派我到这儿来的目的不相符，”他说，对推迟计划十分生气，“我只好辞职……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的话。”张国焘把这一威胁视为“这次激烈会议的顶峰”。这些冒险者大多数都希望干到底。周像个任性的学生，已订好的请客计划突然受到了大人的破坏。

由于蒋在上海的背叛和罗易的愚蠢，周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似乎从离开武汉的时刻起就对这次军事行动拿定了主意，而且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说服和诱导自己的同志来实施这一决定。从这一点上来说，他应当是这次行动的设计师。张国焘是当时的参与者，他就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写下了详尽的回忆，赞扬了周处理事情的能力。不过，后来他受到了批判。他写道：

“周有管理政治事务的能力，但是，他没想这么做。他很少谈论政治，极少召开委员会议，会上也从不讨论大政方针。”

“周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上，也许他认为军事胜利才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使起义部队在广东的东江地区扎下根来……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多数共产党要人的看法都一样，他们强调起义的必要性，把所有怀疑和反对起义的人都视为不可靠的人或动摇分子。这种无视一切就是冒险主义的根源。”

然而，张国焘并没当即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拖到了第二天。翌日一早他就回到了前敌委员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辩论，他向“冒险主义分子”们作了让步。他们决定当天深夜两点发起进攻。然而，天还未黑，他们又一次被迫行动。据悉，张发奎将军正向共产党逼来。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于是，8月1日凌晨1点，发出了决定命运的起义信号。

在松坡路一座教堂附近，一所满目弹痕的学校礼堂里，周正指挥作战。身旁是他的战友，他们都是留学欧洲的学生：陈毅、刘伯承、聂荣臻，[13] 还有军事英雄朱德、贺龙、叶挺。有一幅著名的油画，描述的是他们正聚集在司令部门口。画上的周站在其他领导人之中，显然他是在向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毫无疑问，50年代的官方画家们认为周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

城里的战斗进行得很有限。黎明前，城市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这时，周仍主张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国民党联合。他的士兵仍佩戴着国民党徽章。当命令革命委员会掌管这座城市时，市里仍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被任命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并未出席）。

刘宁，一位任命为起义的宣传负责人，受命起草一份宣言，声明南昌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正宗分支，是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刘对此不服地问：“这里的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怎能声称是国民党的接班人呢？”

“我们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停了一会儿，周解释说。他十分珍惜从革命中获得的一切合法性的和有继承性的东西。于是，周让刘起草一份社会主义的土改政策，没收土地。

这是周最得势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他的政治信仰，不足30岁的周此时肯定成了显赫的军阀或国民党要人。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可以领导人民，有效地组织军事行动的。他甚至敢同共产国际作对，而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绝对不敢的。如果南昌起义的结局好的话，周在中共高级领导层中的地位可能就得到了保证。

遗憾的是自己人中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回忆道，就在发出起义信号前夕，当他到司令部商讨军事计划时，第10师师长蔡廷锴将军已表现得非常“坐立不安”，却还让他担任了左翼革命武装的总指挥。

然而，在起义军南下中，蔡却带着自己的第10师站在了敌人一边。周向同志们汇报说：

“蔡假借要向军官们讲话，于是召集起军官，把他们抓了起来，并残杀了……第30团的团长和30名共产党员。其他我们的同志中只有

一人侥幸逃了出来，安全返回，几十名同志则失踪了。我们在第10师的苦心经营全部毁掉了。这是我的过失，我应承担全部责任。”

张国焘火上烧油，指出：“周应当自责才是，因为他没采取预防措施。”不过，据张说，他当时并没有乘机利用周的错误大做文章。他告诉周，这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在这件事上我们太大意了，应当引以为戒。如果这件事被人所知，它将影响我们的士气。我们最好还是保密。在这种关键时刻，不能气馁，不能说你要受到责备，想辞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必须正视它”。周答应尽力而为。

张发奎将军曾给共产党提供过部分物资援助，而现在他则开始反对共产党。迫于军事压力，共产党只好同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的路。周和叶挺径直向南，朝沿海和周早已熟知的汕头地区挺进。他们不仅要同那里的国民党部队作战，而且农民们也不敢向他们提供粮食和水。疾病、开小差、叛变和敌人的进攻，使共产党伤亡惨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错呢？周肯定对这次令人沮丧的南下进军进行过反复考虑。由于某种原因，起义太迟了，未能利用3个月前蒋介石在上海残杀共产党人时席卷全国的义愤，只是在武汉政府结束它同共产党的合作后，才开始行动。所以，未能充分利用那一联盟。对此，共产国际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它的指示是错误的，无用的。共产党不费周折就向农民及自己的部队传达了起义的目的。托洛茨基本人在这一点上对周大加指责。他写道：“周在其报告中，表明了党对部队的态度。他对党员们说：‘加入这支国民党革命军，壮大它的力量，提高它的战斗力，但是，不要采取任何独立行动……’担任政治顾问的我们的同志们则应专心致力于国民党的军事和政治工作。”

不能说周的同志们组成了一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领导革命委员会的那个人[14] 不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也不受人爱戴。周的精力放在军事上，他坚信没有军事的胜利，政治就是空话。李立三同意这种观

点。张国焘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党内的意见分歧远远超出了共同的目标范围。

当然，也有值得高兴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在南昌变得成熟了，因此8月1日被中共确定为红军诞辰日，并受到纪念。作为军队的缔造者，周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也因他终于领导共产党摆脱了在国民党内的寄人篱下的生活走向独立而受到赞扬。8月7日，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周缺席。不过，他还是保住了政治局的职务。

9月24日，周的部队抵达汕头港。时值鲁莽的南昌起义近两月，在这里周接到上海党总部的命令：放弃这座城市，同农民联合，开辟新的农村根据地。事到如今，他还是不让步，坚决要求到前线指挥战斗。但他未能如愿。在国民党陆军与海军向广东开拔之前，周被迫撤退，身体有病，发着高烧。

周命令张国焘和李立三回到共产党总部。他说：“你们两位必须立刻离开部队，悄悄回到上海。我留在这儿，见机行事。”“你的病好一点了吗？”张问。“你应当第一个离开这里，因为你有病。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吧。”

“我的病不要紧。我能够坚持住……我们别争了，咱们最好快点行动。前线局势吃紧，也不知能幸存下多少部队。”周轻声说。

由于部队数量及实力受损，周下令向海陆丰撤退。这里是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在香港东海岸的前哨。周的兵力此刻只有8周前的一半。国民党封锁了他的突围线。战斗中，他失去了几十筐银元，这是他的储备。

担架员放下他，在这一关键时刻，只有叶挺、聂荣臻跟着他，半架半拖地带着他沿一条沟前进。他勉强答应乘船到香港接受治疗。

周乘一条租船来到了香港。据说，他身无分文，高烧得不省人事。西方人所管辖的城市又一次为他提供了避难所，使他免遭同胞的残害。在与朋友联系期间，有好几天他都是在路旁的小饭店里，吃着和黄包车夫一样的东西。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周应当在香港停留，把病治好。

这个时候，周的行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报道说，他留在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埃德加·斯诺认为他逆水而上，到广东组建广东政府去了。而斯诺的同伴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则断定周到了莫斯科。

比较合乎情理的猜测是，周在香港停留了两周，身体恢复后大概于1927年11月上旬来到了上海，承担了党的重任，并受诗人瞿秋白的领导。负责党的工作的新同志们发现，要对南昌起义作出正确官方的评价是很困难的，它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10月，在周缺席的情况下，他们称赞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而一个月后，有人又把这一事件斥责为“军事机会主义的不成功尝试”。

他大力支持中央的工作，对共产国际几乎言听计从。结果，中央没有因南昌失败而处分他，[15] 甚至还同意他留在政治局，负责军事工作和保密工作。通过这些办法，他的结局比他的南昌起义合作者李立三与张国焘都强多了。不过，后来跟他俩不同的是，周强忍住没向中央提交南昌起义的辩解报告。他尽量表现得很冷漠，对那些争吵很超脱，也不向任何同志施加威胁。这使他在受挫后，得以轻而易举地重振旗鼓。最终，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党代会上，重新为南昌起义平了反。它被承认为反对国民党的一次正确军事行动。

在一般人眼里，周现在毕竟胜过多数同志，这是党内许多人和俄国顾问们的一致看法。假如他是在苏联而不是在法国留学的话，那么，在暂时忍受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之后，他这时可能在党内已处于至

高无上的地位。然而，最后还是一位受共产国际偏爱，受过苏联教育的人占据了这一高位。周拥护自己的同志独立于国民党，然而，他却不得不认真对付意识形态上的殖民主义—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

毛泽东是钦佩周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无论是经验还是资历，这时毛都比周低几级。自从他们在广东匆匆相遇以后，彼此很少联系。后来，实际上却是毛肯定了周在红军创建中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周的一项新任务是负责监督顾顺章的秘密人员打入当地警察总部。8个月前，顾曾负责过上海起义。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作为秘密的青帮成员，他可以在警察采取反共行动之前得到情报。

返回上海，给人带来了一点欣慰。1927年年底避开广东国民党的追捕后，邓颖超赶到了丈夫身边。上海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但是至少他们夫妻团圆了，在当时周所住的位于威海卫路的一座西式小房里安顿了下来。

重获信任（1928~1930）

1928年上半年，尽管周的身体已在香港康复，同新的领导人的关系也明显缓和，同妻子也重聚了，但是周仍然感到忧虑。整整一年，他完全错看了蒋介石，由此使上海工人经历了令人震惊的灾难。后来，他又自行决定挣脱了苏联顾问的束缚，组织了大规模的军事起义，但由于党的领导们优柔寡断以及错误地估计了对手，结果导致起义失败。周本来是可以成为党的领导人的，最后其他人却受到了青睐。不过，可能还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

当年那位在女孩子面前面红耳赤的17岁的羞怯的小伙子，而今已成长为一名30岁的军人。他率兵作战，歼敌无数，是一位标准的军

人。他的童年平淡无奇，也没受过这种军事暴动的训练，另外他现在还正处于灰心丧气的时期。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时的心境不佳。

关于他这时的行踪，只有两条线索。一种是说他到天津重建党的北方局去了；另一种说法也许更为真实，说周到苏联的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去了。1927年年底，他可能对自己说过:“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最缺少的是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所以我就必须到莫斯科去，在那儿交朋友。”他究竟是否说过这些话呢?

假如1928年年初的四五个月他确实在苏联，那他也是独自一人，因为邓颖超是5月才抵达莫斯科的。后来，他俩都参加了在那儿召开的著名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出于某种原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国外举行代表大会。共产党摆脱了国民党的骚扰，却又处于苏联的监督之下，就连政治局的候选人名单，也要由布哈林指定。共产党处境不妙，党员人数下降使党士气低落，同国民党决裂后，也不知去向如何。共产党决心放弃马上消灭国民党的意图，集中精力开展农村游击战和城市地下工作。领导者们应该如何搞好团结呢？莫斯科会议上有好几个帮派或集团：工会主义者、像毛那样的农村化的红军领导人（毛本人没出席会议）、青年团、托洛茨基派及当时担任领导的李立三、瞿秋白与周恩来。人们原希望会议就南昌起义展开争论，谁知却开成了一次调解会议。三大领导人一致同意相互忍让，不要给新形成的争斗中的各派以可乘之机。这些派别由一些缺乏教育的农民和工人所领导。由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三位领导人对他们深表怀疑。



中共六大会址

经调解，一位来自上海的不知名的工会领导人—船工领袖，当上了总书记[16]。实际工作则由李立三（负责宣传）、周恩来（先是负责组织工作，后转为军事工作）和他共同承担。周决心担当李的“右手”，为了党的振兴和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周与他密切合作，但只把他看做较重要的领导人。这就形成了周在未来中国政治斗争中的风格。

他们组成了一个良好的集体，就像在法国时那样。周文质彬彬，李则能言善辩。他俩具有相同的中国所需要的理智感。当俄国对中共的帮助是举足轻重时，通过巧妙的周旋，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行动的影响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对此他俩心照不宣。

但是，周去年的错误应归咎于没让他放手工作。与其他领导人一样，他也被迫恭聆布哈林的训斥。这位苏联人说：“周恩来同志，你是

共产党的军事负责人。你本来是可以更精确地估计到自己的实力的。否则，就不会盲目地采取武装起义，造成那么大的损失。”

据说，当这句话被翻译过来时，周的脸红了。但是，这位俄国人没让他作辩护，接着就训开了坐在周一旁的瞿秋白。

不管怎么说，周还是在俄国人中间巩固了自己的声望（这是他首次访苏），而且还被选为不久举行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完这些政治会议，据埃德加·斯诺说，周仍留在苏联，“在孙中山大学接受特殊教育”，同时也继续他的军事教育。他还就莫斯科中国留学生被控密谋暗算政府官员一事进行了调查，澄清了他们的不白之冤，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此人后来接任“中华民国总统”。这么一个孩子竟会被当做革命者！

作为党组织负责人，周在11月致全体党员的一封信中对无产阶级精神的淡化表示了忧虑。他列举了十件需要避免的事，包括激进的民主化、个人间的争端、宗派活动。

1928年的大部分时间，周和夫人是在苏联度过的，年底才回国。这时，他同意李立三继续他俩过去的合作，而他本人则不受任何干扰，继续他的改组党的巨大工作。他从苏联带回了有关秘密警察的许多新的俄式思想。这种警察部队可以在以后的困难岁月保护他的同志。此刻，周为了这个目的组织了一个特别机构，由顾顺章来负责上海起义时的安全工作。

周热切地投入了党的新工作。他用手中的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各种文章中，他警告，由于农民占多数，就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恢复”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是十分艰难的。他严厉批评了那些害怕辩论的人。

我们的同志……对于他认为会在党内引起不和的激烈辩论持惧怕态度……怕得罪人，所以，回避争论，只想把这些问题搪塞过去了事……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政治争论不特指某个人，那么，越是争论，就越是接近真理！

这一劝告在毛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周提出了一个有益的建议，即“党应当成立生产中心部门……试着建工厂”。

然而，他对党的领导的稳定性所抱的希望于1929年夏破灭了。当时，李立三开始在军事战略上和没收土地问题上同周发生了分歧。在9月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这两人一直争吵不休。“我总是充当他们的调解人。”那位船工领导人回忆道，从道理上说是由他主管党的工作，但是他却不能胜任。

周担心党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危险，特别是第四军表现出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的军事观点、土匪习气、军阀主义残余”。于是，由周授意，中央于9月向第四军发出了一封信。周说，第四军的多数党员都是农民，军队里的思想问题大多源于“小农经济的自私、狭隘、保守，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无纪律、犹豫不决和狂热。所有这些，都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原则和组织纪律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消除这些思想，“红军就会在前进的路上遇到巨大危险”。

井冈山的毛具有领导的潜在能力。周希望能两全其美，他告诫毛，不要发脾气，并让毛出来担任第四军的领导，还让别人以井冈山为楷模。他在一份红军报告中写道:“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的，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都要学习朱、毛红军的经验。”周一边批评毛的思想观点，一边又说了上述这番话。这对毛是一个极大的支持，而且保护了他的地方领导权。

周同李立三的争执进一步恶化。李感情用事，让红军准备向政府军发起总攻。1929年至1930年冬，两人整天为此事争吵。李日益热衷于个人作为“中国的列宁”的声望，而这正是他本人对周曾使用过的话。与李的狂妄自大相反，周既不热衷于个人势力，也不看重荣誉。他关心的是所能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向李的党的领导权挑战，以及为什么在权力斗争的圈子里能够稳坐钓鱼台。

到了1930年年初，以上海的地下指挥部为中心，周已建立了一个实力雄厚的以红军为支柱的军事势力网，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均由忠于他的军官领导。现在的问题是，他在中央的那些热情奔放的同志对他的军队建设计划所抱的希望过高、过早。从实际出发，周只好放慢部队建设速度，并淡化红军指挥部的集权化。这使李立三大为失望，他想让别人到部队去，准备对大城市再次发动进攻。周的温和做法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之免遭毁灭。

可以这么说，在反对李立三的进攻城市的战略中，周这时更加站到了毛的一边。毛在井冈山开创的局面和政策不久将证明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捷径。作家韩素音作过如下评述：

“并不是想轻视天才般的、有奉献精神的周恩来，他在领导南昌起义及后来的汕头起义时所表现出的巨大的个人勇气、冒险计划和献身精神……不过，这些进攻城市的计划虽说重要，但并没导致党和红军有所改观。”

1930年初夏，周又去到莫斯科。朋友们认为他是去接受最高荣誉“王冠”。一下火车，他就被俄国人簇拥起来。他们都想知道中国的情况。他们很钦佩他，把他视为唯一明智的和经验丰富的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瞿秋白则被看做感情丰富的文学家，不受重视；李立三则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煽动者。7月，周应邀在苏维埃党代会上发表讲话。这是莫大的荣耀，也是第一次给予一个中国人这种待遇。在讲话

中，他详细讲述了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和农民与城市工人运动的“不协调”。共产国际在一份杂志中作了全文转载。

莫斯科的热烈欢迎使周心旷神怡。有位同志回忆说：“斯大林对他极为欣赏，赞扬了他在解决军事问题和情报工作方面不断取得的成绩，高度评价了他的能力和政治眼光。”他同负责中国事务的新的克里姆林宫负责人帕费尔·米夫也相处得很融洽。

在国内，李立三便开始作茧自缚。他又制订了一个颇有迷惑性的计划，拟借助俄国的军事援助，攻克大城市，并通知第四军首先攻取长沙。长沙之战打了，但并没能拿下来。周说“李立三简直疯了”。

8月底周回国。他完全得到了俄国人的信任。他们希望他在9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央会议上改组党的领导。瞿秋白一直在进行此项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周不在，他不敢贸然召开会议，有人以为这次会议将同李立三最后摊牌，结果却大失所望。瞿当选为主席，周当上第二把手。实际上，他俩都没谴责李立三，只把他的错误视为战略上的失误。在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也只批评了他“过高估计了发展速度”的错误。

这次会议加强了党的团结，但李立三仍是最高领导人物之一。在所通过的一项决议里还引用了李立三的话。这句话，周在莫斯科重申过，但被苏联人根据己见把它删除了，即“新的高潮”的到来是无可怀疑的。然而，为了使共产国际息怒，不得不让王明担任最高职务（从这个职务开始，他成了下次“王冠”的竞争者）。王明是一群留苏刚回国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出席上海会议的代表们保证，他们同共产国际并无纠葛。中国领导人在计划南昌和上海起义时，共产国际原则上并不反对，只是不主张“立即起义”。换句话说，中央只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发展的“程度和

速度”，结果犯了“偶然性的战略错误”。像往常一样，俄国人又错看了中国人在外国批评面前表现出的团结一致的本能。

接着，周发表了著名的《少山报告》，赞赏者们把它看做党的发展史上的一大重要文件。报告广泛分析了共产党所面临的中国局势。在文件中，周首次论述了与共产国际分歧的性质。他辩护道：“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武装暴动的时机还不完全成熟。中央的错误在于同共产国际意见不一致吗？绝对不是！没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当然，中央是有错误的。

我本人有过错……我们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并要指出，李立三同志应当承担更多的思想工作方面的责任。但是，我们决不能容忍其他同志令人气愤的议论……专门对准李立三同志……应当在集体的基础上开展自我批评。

这样一来，周便把注意力从李本人引开，转而集中到对李的错误战略批评上。

但是，周的报告也含有大量积极可取的东西。关于富农问题—是没收其土地，还是保留其财产—他宣称：

在对待富农的态度问题上，存在两种错误。经济上，没收他们的土地，政治上，枪毙他们。这样对待富农，中农会更加动摇……我们现在决不能疏远中农。

于是，周支持分阶段地实行农村革命。

在军事问题上，周又像过去在南昌时那样，开始硬干了。他在江西及其他地方尽一切可能建立了红军队伍，通过宣传收买地方武装，引诱国民党部队，从而导致了他过去曾告诫过的政治淡化的危险。中央会议以后，他向党的军事委员会夸口，红军的力量“现已足够进行大

规模的内战了”。这话听起来恰似重蹈李立三的复辙，乐观地过高估计了红军的运气。

受此热情的感染，红军又在长沙发动了一次进攻。战斗命令是由新的中央下达的，新的中央是李立三在主持的。短短几周后，长沙进攻又遭第二次失败。这时共产国际派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回国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周、瞿回国后说服了李立三，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停止了进攻大城市。

其后，李立三被召至莫斯科，对自己的政治错误作出解释。几个月来周一直精神抖擞地工作，力图使各派力量团结在中央的领导周围。他向同志作的解释是，“李立三已经完全承认了错误”。所以，当共产国际正式责怪李时，李为了党的团结只好作出牺牲。李临走前，周使他宣布放弃他在政治局的职务，并告诉别人，李犯了“单纯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以及“完全否认了组织力量是革命形势成熟的先决条件之一”的错误。周还说服米夫不要改组党的领导，应当让党自己寻求意见统一。

技高一筹（1931~1934）

1931年1月，中央又在上海举行会议。会上，俄国人为了显示自己对中国优柔寡断的领导的关心，米夫便亲自担任了会议主席。当周到达会场时，他被指定坐在两派敌对集团之间。这两大派别是李立三离开后领导权的主要竞争者—以王明（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学生）为首的受过苏联训练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老练的铁路工会领导人何孟雄，他是基层工农的候选人，总爱嘲笑“年轻的学生……我们干革命时，他们还在娘怀里吃奶呢！”周却持独立态度，这既表明他感到进退维谷，也说明了他的骨气。

米夫相信周是会支持王明及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接管党的领导权的，以此作为赦免周过去所犯错误的条件。但是，周不仅担心这些布尔什维克们会被外国人所支配，而且为他们的经验不足而忧虑。另一方面，其他的候选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周大概怀疑他们是否能够如所期望的那样，着眼于党的较高层次的全球性的及思想意识上的目标。结果，像毛这样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者便很快遇到了挑战。周最初还想在两派之间保持中立，但为了大局，还是不得不跟共产国际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站在了一起。

跟过去支持陈独秀、瞿秋白和李立三一样，在以后的3年里，周又忠实地支持党的领袖王明（在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甚至被极左分子们指控为“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是，这种交易并不是单方面的。王明是苏联的代言人，刚回国，且非常年轻，在党内缺少势力或支持者，因此他还要依靠周。当周服从米夫和其年轻的中国追随者们时，王便把大部分权力牢牢地抓到了自己手里。

周恩来、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批评了李立三，但共产国际认为他们只是敷衍了事。他们仍恢复了他过去的许多政策。周的位置是十分微妙的。王明依靠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反对瞿秋白、周恩来，想把他们逐出中共中央。但是，米夫采取了逐瞿留周的方针，同时批评周未严肃地来纠正李的错误，结果周受到了批评。贬低周的人说他是个“生性软弱的人”，这个人为了少惹是非，总爱采取温和态度。

对所有的指责，周通过重新发表他3个月前写的《少山报告》给予了回答。这个报告原封不动，只不过重写了一个序言。他解释说：“它可以为那些想在李立三路线和共产国际路线之间寻求妥协的人提供一个样板。我准备发表它，让我们的党来鉴别，抛弃我的错误。我自己也将在我们党组织内批判这一顽固的、严重的错误。”于是，他就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他人，让别人指出他的报告有什么错误。但是，即便

如此，周还是未能逃避这个问题，他还是对自己过去的“调和主义”作出了“老实”交代。周还是李从前唯一的支持者，但是李没有被要求写出书面检查，人们却对李的主要支持者加以批评。周极力设法成为某种仲裁者，要为别人澄清自己的名誉所作的努力作出判断。

周心情抑郁地参加了这次中央会议。然而，由于俄国人及其追随者经验不足，加上中国人的阵营内出现了分裂，周得以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局职务，分管党的军事工作及其安全机构，同时还是根据地新的中央局的领导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作为反对旧政府斗争中的农村根据地的中国大片疆土的时刻，这不失为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

然而，这次会议不欢而散。工会主义者愤然退席，在旅馆里被英国警察逮捕，并交到了国民党手里将被枪毙。他们中有一位是上海黄包车工人的领袖、一位诗人、作家丁玲的丈夫。他曾公开批评过王明。许多同志不知道这些新布尔什维克是否已向这些外国警察泄露了消息。据武汉的美国副领事说，周也被“抓”了起来，第二天就被蒋介石下令处死了。然而，周并没有被抓，仍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为的是要加强对苏区的领导。

有一天晚上，周带着张去拜访第二个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一位波兰人。令人可怕的是，这位欧洲人威胁说，如果张不接受上次他未出席的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的话，就把他开除出政治局。周赶忙为张说情。他告诉这位波兰人，由于共产党内分歧太多，不要驱逐持不同政见者，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随和的中国人和武断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在价值上相互冲突的又一表现。

这时，周开始向外国人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行事。他告诉一位外国记者：

中国不能轻率地实行像美国、英国和其他真正的民主国家那样的民主。中国人民受过长期的压迫，在他们理解诚实投票的重要性和意义之前，还需要几代人的政治训练。我们还没有为一个彻底的民主制度做好准备。我们必须慢慢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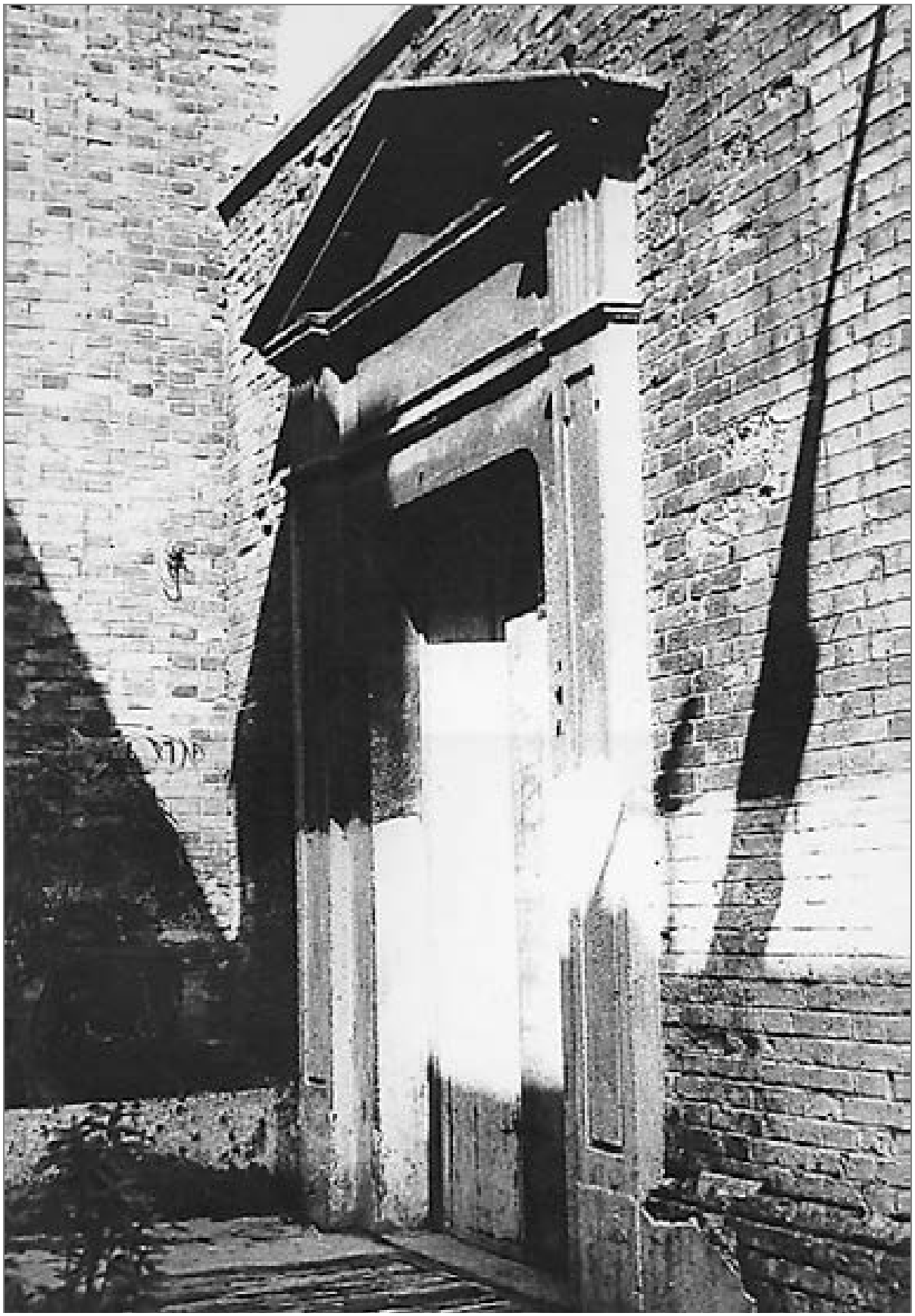
周可能还向米夫和其他俄国人谈过这种观点。

此时，又出现了一起反映不同价值观念的戏剧性事件。周在黄埔时的一位朋友、学生黄警魂—突然要投奔国民党。开始，周还想劝阻他，最后只好定他为叛徒，并下令处死他。这是因为他可能把有关共产党的内部情报带给对方。周告诉一位老资格的同志，由于证据确凿，事情紧迫，他只好迅速作出决定，“先斩后奏”。当他的同事婉转地指出，处死刑在党内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时，周却坦白说，自己从未干过这种事。尽管在过去的4年里他一直同暴力活动相伴，但不得不下令处决一位变节的朋友，这对他来说则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周认为，这个人不仅持有错误意见，而且实际上危及了党的生存。

国民党日益加紧对上海的控制。周认为，党的领导人应当分散到共产党游击队占领地，这是刻不容缓的。他建议，政治局应当迁到江西毛泽东的根据地去，张国焘应到长沙以北的鄂豫皖的根据地去。如果党继续把自己集中在“白区”城市，那么它将面临持久的困难，将会被摧毁。2月份工会领导人遭枪杀就是一个最新的例子。1931年4月，政治局同意周到江西，刘少奇和王明继续留在上海。周指示保安头目顾顺章在去鄂豫皖根据地之前，先照料一下张国焘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顾这时已是一位深受周信赖的副手。他曾在英美烟草公司所属工厂领导过罢工，后来，在海参崴接受过保密技术训练，接着，又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起义（尽管周在起义中技术上是受顾领导，但周是实际上的政治负责人）。顾深受信任。周的同志们认为顾很有能力，但是言谈举止却带点上海滩花花公子的味道。顾现在的身份是魔术师，住在北纬路。他经常在先施百货公司屋顶花园戏院里演出。1931年，他率领一支魔术团到武汉，并乘机建立了情报网。然而，在高尔夫球场他被一个共产党叛徒认了出来，国民党警察随即逮捕了他。经审问，他供出了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和组织。结果，顾带了国民党来逮捕共产党人。周恩来及时地转移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未被捕。据有关资料说，顾继续出卖他的共产党朋友，因为他对新政治局对待李立三的态度愤愤不平。这件事并不是周的过错，但作为顾的顶头上司他信任了一位不忠诚的人，所以他不得不承担一定的责任。

由于顾的出卖，6月24日，一位党的前领导人，那位上海的船工领袖被国民党杀害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安全负责人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行动。周下令（或默许），按上海地下工作的传统，开展反屠杀活动。

如果说共产党领袖们需要更大的推动才会撤离上海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就受到了刺激。周蓄着浓黑的胡须，长五六英寸。如此化装，他就可以和从前一样，顺利通过火车站的关卡和码头。在这些地方，他的照片被贴在显要的地方。

邓后来回忆，她在上海为党所做的那种“秘密工作”已经让人无法忍受了。“每天我出门，都不知自己是否会被捕。警察搜查了我在公共租界的房子……许多好朋友惨遭杀害。我们的工作无法开展。”于是，

她和周先后到了江西共产党根据地。他们是乘一条小船离沪，沿海而行至福建省，在此登岸到了红色根据地。

人们都不知“那位造反者”出了什么事。一位日本人报道，他已到海参崴去做手术了；国民党则声称，周投降了。但是，这位乔装打扮的“天主教传教士”穿过福建省，已于1931 年12月到达了江西省一个大的城镇瑞金。他便是周恩来。他一来，提高了毛泽东游击根据地的地位，使这一根据地将会成为新的中国苏维埃共和国。

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抵达江西时，正值毛泽东与几乎每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关系都十分紧张之际，不久，周就发现自己在江西的毛和上海的王明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1931年1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毛任主席，周当选为委员（周排第四位，位于毛、项英、张国焘之后，但周在苏区共产党组织中的地位比他们都高）。周同时还被选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埃德加·斯诺指出，周在江西的威望现在已开始超过毛。他是一位缔造者，而不是破坏者。

周同各派之间的关系之广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能够充当各派间的调解人和平衡器，而不是通过在重大争论中运用种种压制手段来获得个人领导权。

他稳固地建立了独立于各派并忠于中央领导的军事中心，甚至在12月对两万名受过粗鲁的职业军人训练的、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士兵表示欢迎。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开始在江西衰退，取而代之的是俄国人的“新学派”军事思想，它受到共产国际顾问们的赏识，强调中央对正规军进行控制。

1932年新的一年开始，周似乎承认了毛已牢固建立起来的权力，周希望得到他以后的合作。但是，中央局的最后决定则责备毛落到了“可怜的资产阶级的惊恐与心理变态的地步”。这一表述比周的批评要严厉得多。另有一种说法，周帮助毛和在富田的受害者的朋友们恢复了关系，但是其他人却毫不动摇地把这些罪责推到了毛的身上。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说，这些错误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

那些把占领一省或数省不是看做一个近期目标而是长远目标的人；那些对占领中心城市持怀疑态度的并倾向于率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到偏僻地区去的人；那些对共产主义积极的向外扩展能使红军发挥它的全部潜力而犹豫不决的人，他们更倾向于用村里的宣传任务来束缚我们武装同志的双手，增加部队的开支，忘记了红军的主要使命是通过斗争来消灭敌人；那些仍然对军事行动的逐渐扩大而徘徊不前，犹豫不定，认为防御的和保守的战略更为合适的人，他们必然不愿意直接对非共区的敌人给予致命打击。

这些提到的观点非常精辟，被毛泽东广为宣传，但很快也被其他领导人斥为“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和反共产国际”。

周、毛同中央在军事战略上有分歧。毛极力主张运动游击战略，如诱敌深入苏区，然后一个一个地吃掉。周的意见同毛的一致，这引起了中央和后方同志的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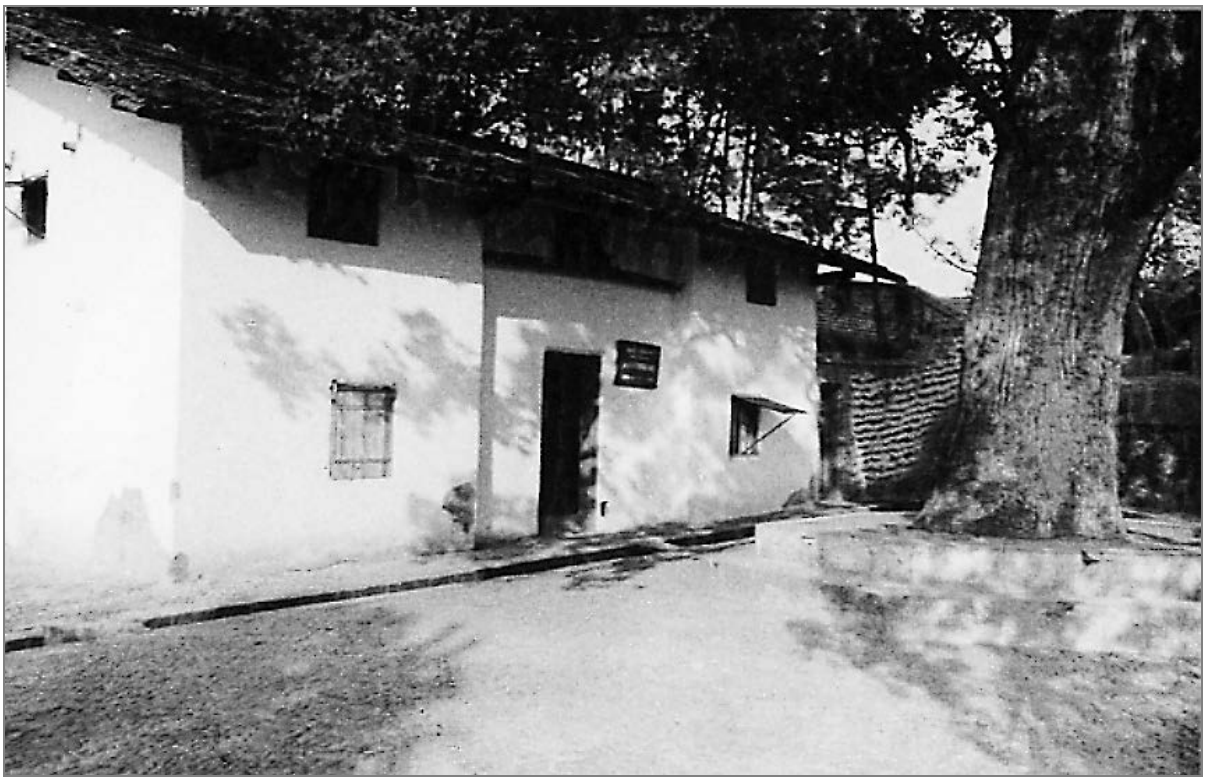
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可能解除了这一紧张局势。会上，周提出毛仍在军队中继续工作。毛借口养病离开军队，党就委任周接管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17]。红一方面军是江西根据地的精锐部队。

为首的批评来自“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博古。他想把毛的职务统统撤掉，而周则不想做得太过分。几十年后，毛还称赞周当时的做法，他告诉自己的崇拜者：“宁都会议期间，我的批评者们都想开除我，但是周……不同意。”

共产国际在江西的军事顾问李德把周描绘成“斯大林集团的一位强硬人物”，但他赞扬了周在动员江西人民和组织江西武装力量中的“突出贡献”。王明动身到莫斯科时，周留下来到了中央苏区，因为国民党部队所谓的第四次“围剿”开始向苏区逼来。在这次“围剿”中，周与朱德领导取得了对蒋介石军队的胜利。

在几次革命期间，当周在他那摆满书本的、相对宁静的办公室里时，他通常是一个渐进主义者；然而，一旦在斗争中，随着他身边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便显得充满信心了。

当时中央曾制定了一条“向前的、进攻的路线”。在此路线指引下，红军可以扩大其力量，同地方民兵合作，动员一切可能的经济资源，进攻城市。毛的一位支持者罗明抵制这一指示，继续采用旧的井冈山游击战略。于是，中央领导惩罚他和其他不服从者，惩罚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毛的兄弟，还有周在巴黎的老朋友邓小平。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办公旧址

1933年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了周军事路线的正确性。毛因病到医院治疗，周接替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

在从前线发给中央的电报里，周详细汇报了战斗情况。他于3月2日报告：

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集中，准备继续战斗。(18)

事隔不久，由于一个战略重地失守，孔荷宠慌忙下令动用征集的民工，加强部分边界的防御工事。结果，周把他叫去狠狠批了一顿。周指责他缺乏阶级觉悟，并暂时停止了他的党员资格。在周主持召开

的“思想斗争”会上，孔只婉转地为自己作了辩护。这件事更加深了周对他的不信任。周后来说：“孔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孔在几个月后投靠了国民党。周在把自己的城市革命观点推行到这一农村根据地和满足共产国际的要求的过程中，他在当时的判断是有失误的。

10月，拥有高度发言权并雄心勃勃的领袖们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即如何对一场军事战役的每日战况作出集体的判断。因为，当时国民党第19路军反对蒋介石，要求同共产党合作。周明知多数人不赞成，还是积极行动，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派人到福州同起义部队签订盟约。

这一次，中央领导人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他们对同非共产党部队协同作战的意义深表怀疑，要求小心谨慎。结果，红军没有及时派兵援助第19路军同蒋介石的部队作战。等援兵派来时，已经太迟了。几年后，周就此事简要作了论述：“我们本该同福建进行成功地合作，可是由于李德与在上海的顾问们的劝告，我们却打了退堂鼓。”

1933年，国民党开始第四次反共“围剿”时，周对军事政策的支配权似乎更加巩固了。红军缴获了大量武器、电台，俘虏了大批敌军。红军的组织也更加标准化和合理化。对周在这次战役中的军事成就，李德后来的评价是“值得称赞”。李德还注意到，重要的军事决定是由周作出的。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依赖他的德国顾问。会前先同他商量军事问题，并常常支持李德的意见。有时，周与这位德国人有分歧。例如，当12月李德视察北线，发现一位指挥员拒不服从命令竟要求重新分配任务时，李德不同意。周则告诉他，做事应当留有更多的余地。“这是……我同周恩来的一点小分歧，他劝我必须考虑这种干部的心理。”

1934年1月，中央召开重要会议。接着，第二届根据地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这时，党内的斗争达到了高峰。周保住了自己的职务，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上，他失去了对苏区地方机构的一些影响，在军事上也少了发言权。坚决主张在根据地实行投票选举的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但是，毛未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不过，他仍为自己的苏区个人计划辩护。此计划是他获得苏区旧式权力组织效忠的手段。他还把周恩来的理论的、书本的改革推迟到情况更适宜时再实行。毛制订的革命计划是深思熟虑、扎实稳健的，而周则想通过一次惊人的意志努力来实现革命。

为了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于1933年9月发动了第五次反共“围剿”。战斗开始时，局势对共产党极为有利。于是，周开始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有关通过取得持久战的战术性成功而获得战略性胜利的文章。他向其干部介绍莫斯科的最新战略理论，采取一切措施，扩大红军力量，动员了11.2万名青年自卫队员，而这些人的作用不久就得到了验证。

不管是出于偶然还是早有安排，总而言之，李德成了前线的军事总指挥。但他既没有接受毛的游击战术，也不同意周的运动战观点，而是倡导自己的“短促突击”战术。有意思的是，周宣传持久战的系列文章只发表了一期，此后便被他取消了。而李德则愈来愈多地撰写有关军事的文章。鉴于周在前次反“围剿”中一直身临红军前线，所以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又到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周则留在根据地首府瑞金。几个月前，周好像就已察觉到共产党不可能守住江西，将被迫撤离苏区。尽管他的公开讲话仍然情绪高昂，但他的心似乎已不在反围剿战上了。4月，广昌惨败，促使他提出了秘密准备撤离江西的建议。

这一次，中国人可以把失败的责任推到那位德国顾问的身上了。李德曾经完全可以通过无线台经上海，同莫斯科上级联系。然而，这一联系现在却因国民党的侦破和共产党上海办事处的关闭而中断了。在此后的两年里，中国领导人在没有俄国指点的情况下，一边行动，一边独自决定自己的命运。留苏或受苏影响的中共领导人也不可能再靠共产国际指示获得威望和权威了—这件事却在此后几个月中，在毛权力的慢慢上升中，帮了这位土生土长的领导人的大忙。

周坚决抵制住李德和其他人的反对，指挥部队从江西突围。高级领导们进退维谷，他们并不完全同意这么做，可是他们明白要紧的是守住秘密。一个月后，周领着由朱德和洛甫组成的精干代表团来到毛的住地。毛因患疟疾在此休养。周可能直截了当地说过从冬季起他就不赞成李德指挥战斗。从毛这一方来说，他也许告诫周要更谨慎地为撤离江西作准备。

国民党向他们无情地逼来，不给红军以喘息之机。8月底，战略要地驿前镇失守，这件事成了战争的分水岭。周曾在那里指挥过战斗。陈毅在和周一起视察北线时受了伤。于是，他们当机立断，突围势在必行。但是，就如何突围—是否要发动最后一次决战及堵截敌人的追击，他们争论了几天。10月2日，事情已到了危急关头。周、博古、李德和毛泽东开会，决定撤离根据地，李德保留了军事指挥权。

长征路上（1934~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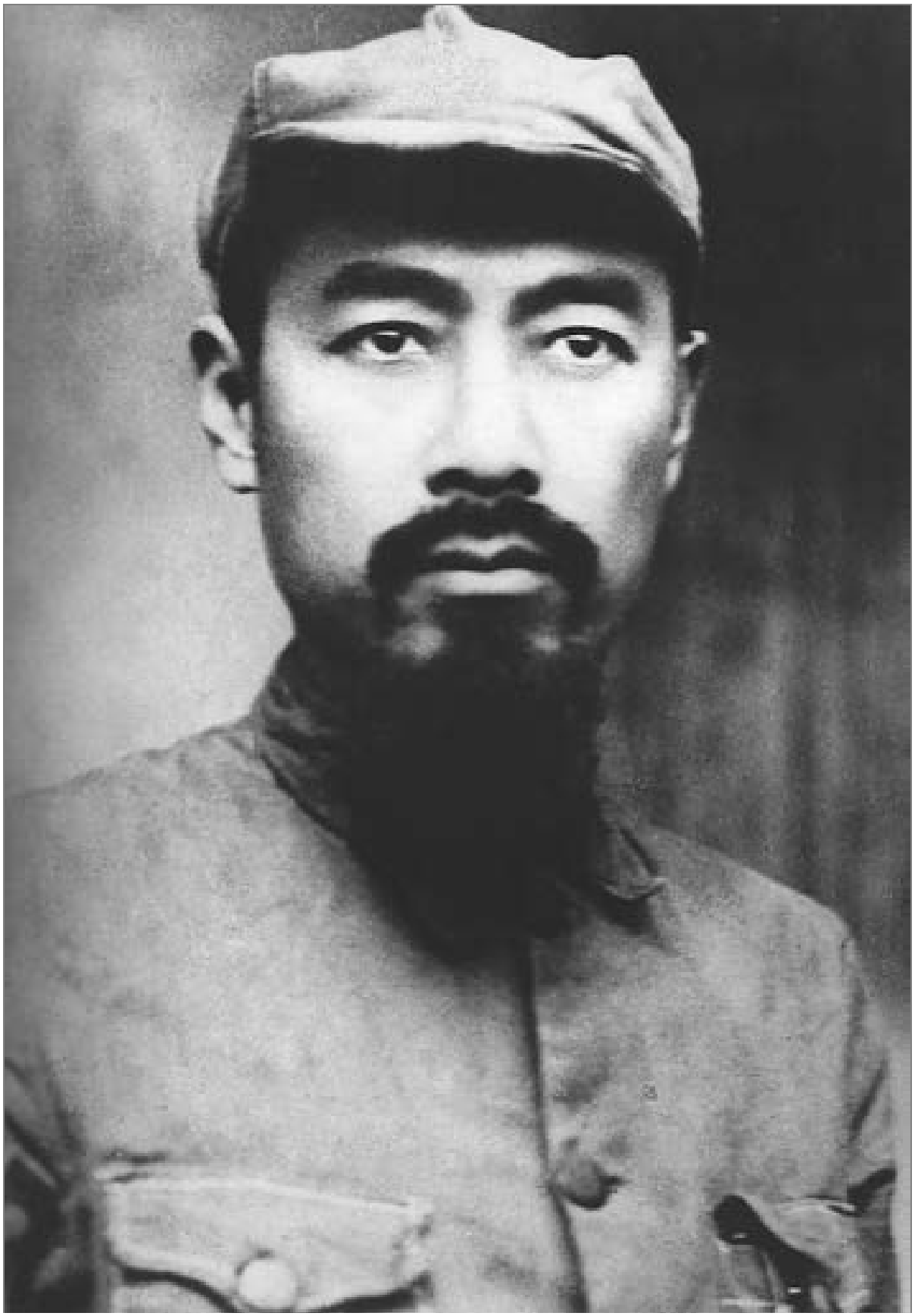
周恩来放弃了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破碎梦想，于1934年10月16日开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红军大撤退。这一壮举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除了避开敌人以外，红军没有既定的目标。离开江西根据地时，周的手下有1万名共产党员。当时他们还不可能知道，长征最终会行程二万五千里，横越11个省，跨过雪山与激流，穿过沼泽与森林，途

经土匪聚集区、有敌意的少数民族区和缺粮区，在这里他们有时甚至只有靠吃自己的皮带才能维持生存。周抛弃一块跟比利时一样大的根据地，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远征，相当于从伦敦徒步到东京，或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

他失望吗？后悔吗？他那发动一场革命的希望再次落空了。这时他才明白，他只好同那些观点与经历都极不相同的人联合战斗了。他或许猜测到，即使俄国的帮助确实能实现的话，它也会带有操纵性。

他又一次携带几件随身用品踏上了征程。警卫员扛着两床毛毯、一床被子、一个包。包里装的是换洗衣服和一件羊毛衫。这样的话，还可以用它当枕头。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铜墨水盒及他那个人们熟悉的长方形公文包。包里保存着他用过的铅笔、地图、指南针、夜晚伏案工作用的放大镜。长征途中，他的夫人邓颖超大部分时间都患着结核病。有一段时间周本人也不得不躺倒在担架上。

周率领着中央纵队，包括根据地政府机构（一个印刷厂、修理厂及造币厂），还有军事指挥部及所有妇女儿童。毛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这支部队携带着易受攻击的辎重，在中国南部翻山越岭，一直向西部山区挺进。为了减轻负担，造币厂和印刷厂等沉重装备一个一个地被丢弃了。



第一军团没带地图就向困难的农村地区进发了。结果，他们不得不返回加入中央纵队。白白浪费了一周的时间，也使国民党的追踪更加逼人。周对毛的抱怨给予冷静解答，说这种错误是情报有误所致，领导是无可奈何的。

有一次冒险行动是横渡湘江。这次渡江损失了很多兵力，但突出了蒋介石的封锁线。不久，他们到了贵州。在这里的一天晚上，周遇到了一场大火，一名敌人的纵火犯点火烧了周住的房屋。警卫员不得不引他逃离险境。

在贵州边界的黎平，他们就是否改变方向，向北进军，并趁身后的国民党部队不备之际溜走等展开了争论。毛断然反对向北这一提议。他坚决主张继续向西，深入贵州境内，那里的国民党部队防备稍弱一些。这次，周加入了反对李德的行列。总之，他是被李德的个人习惯所激怒了，不仅是他的好色（长征途中，他身边曾带着一位“中国夫人”），还有他不停地要烟要酒，而这些东西已越来越难弄到，价格也日益昂贵。因患疟疾，李德只好不出席这次特别会议。他回忆说，当他询问周会议的最后决定时，“他很不耐烦地作了回答。这一举动在这位如此沉静、自制的男人身上是不同寻常的”。

但是，饥饿使他们得以和平相处。因为这个省粮食匮乏，红军一来，当地居民全跑了。

天一片漆黑。为了让身后的同志跟上队伍，夜间行军时每人都在背上系一条白毛巾。有一次，周的警卫员摔了一跤，把他放在周书包里的粮食撒了一地。周让他把自己的那一份拿去。警卫员后来充满歉意地说：“我弄到了一点烧谷子，你要一点吗？”

“烧谷子？”周怀疑地问，“好吧，给我一点。”这总比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强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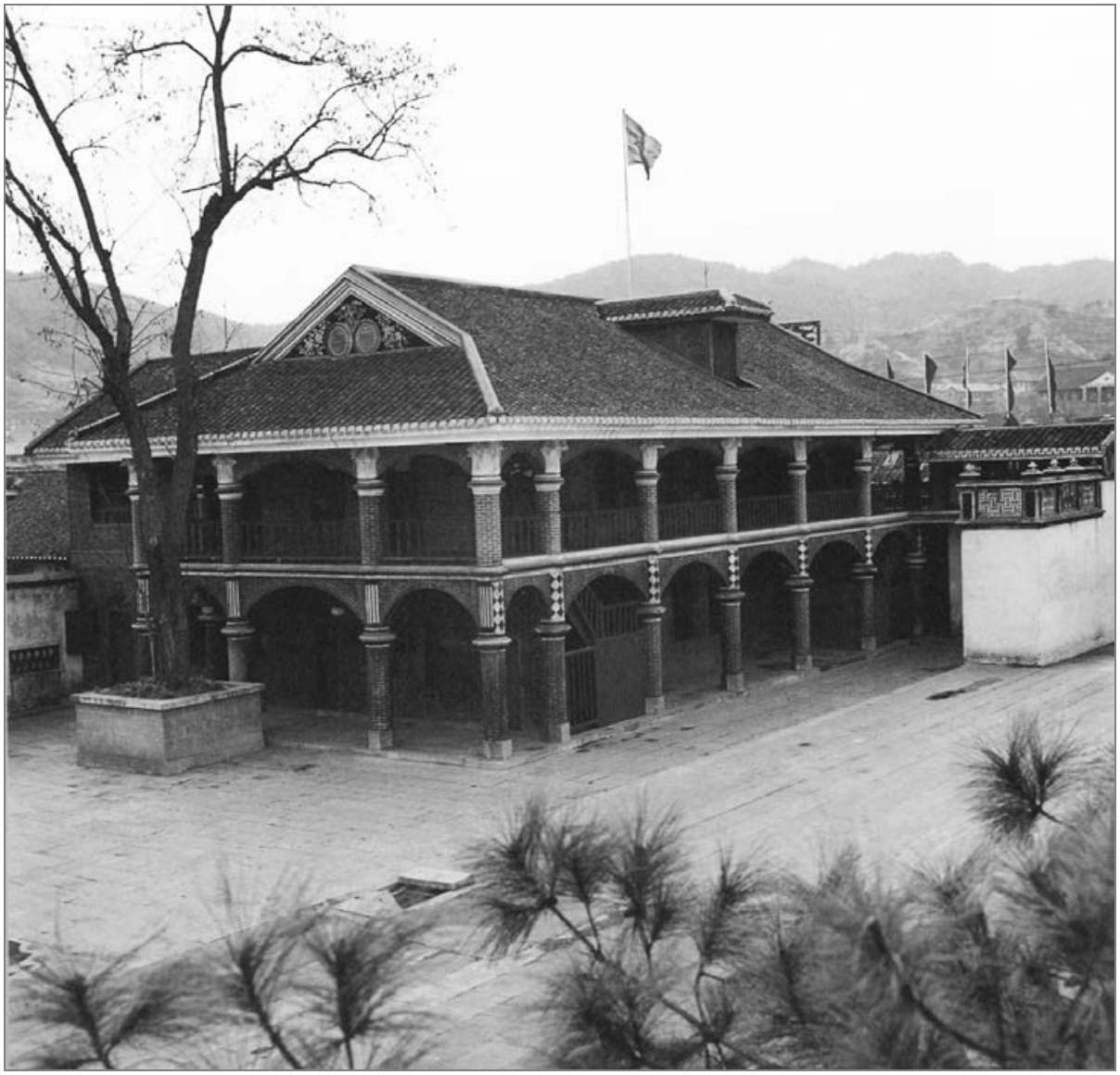
1935年新年，周来到了贵州北部的遵义。这时天下着大雨，周全身湿透了。他跟毛一起坚决要求李德下令停止前进两周，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一下局势。1935年1月召开的这一遵义会议成了当代共产主义史上最有争议的会议之一。会上，毛成功地掌握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开始只是临时的，但毛确信自己的位置以后是会得到认可的。作为党的头号人物，他再也无须向任何人让步了。

遵义会议在毛对军事指挥问题发起不断攻击之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军事指挥，原则上讲是由李德掌握的，也有他的中国同志参与。后来，朱德将军也对毛的抱怨给予了决定性的肯定。博古站出来为官方的领导工作辩护，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辩护。

鉴于博古曾训斥人们看不到党在国际环境中的处境，并明确批评了毛泽东那一部分人的毛病在于其狭隘的农民基础，周坦白承认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领导们的战略错误。这使他们甚感惊讶。不等别人说话，周就接着建议毛从事红军领导工作，“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救他们脱离批评的旋涡。周没有诿过于他的布尔什维克同事们。这些人都曾相当认真，逐字逐句地像教师般的解释过撤离江西根据地的道理—包括后来对共产党不利的诸多客观因素，如国际上对蒋介石的支持，共产党力量在国民党中国的薄弱。与此相反，周则强调主观因素，包括党在群众中及国民党部队中进行的不适当的政治工作；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的失误；各种战术上及行动上的军事错误。韩素音写道，周坦率地告诉同志们，毛“观点正确，我们应当听他的”。一个勇于承认错误的人，是会受到大家钦佩的。正是这样，周逃脱了批评，

而博古和李德则未能幸免，这样就有可能使毛泽东把红军内的不满者的批评集中在这两个人身上，周本人则受到了宽恕。

由此，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



遵义会议会址

在遵义，毛主张的决议总算通过了。决议审查了“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等同志所犯的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并把他们的错误定为在反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单纯防御路线。还有一个次要的错误是，在江西突围中以安全为借口，忽视了政治动员工作。

毛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胜利。周仍是红军总政委从事军事的领导。但是，毛的这一胜利只是险胜。毛泽东后来说，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人们可能以为周对自己与毛的政治联合会感到难堪，其原因不仅在于那几年他曾批评过毛，也在于毛不赞同周所向往的那种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周曾希望过某种超越狭隘的农民眼界的更高级、更城市化的东西。

作为一名外国人，李德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还是准确、公正的。据他说，当周确实站到毛的一边时，他“至少部分地违背了他那良好的判断，成了毛的最忠实的拥护者”。正如埃德加·斯诺两年后所指出的那样，周后来再也没有动摇过对毛的忠心，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他以“毛的行动计划的最得力的执行者”而闻名，同时又被称为“管家”——一个执行家长命令的人。据一位同志说，毫无疑问，周在遵义会议上承认了自己没有野心，所以毛才能把他当做一位“老练”的参谋而不是当做对手接纳了。

从某种角度说，因为克里姆林宫选定的中共领导接班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王明对毛构成了威胁，所以周才能较顺利地进入毛的圈子。毛王之间的敌对，被联合起来击败国民党围剿的需要所遮盖了。周从未亲近过王。他支持王也不过是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或战术上的原因。因此，毛对周独立于王的集团是十分放心的。

遵义会议上，周同自己的追随者即所谓的黄埔派关系的疏远，是影响周与其党内伙伴们关系的又一个因素。黄埔派现已包括许多才华横溢、颇有影响的人物，在遵义那种进退两难的特殊军事环境中，周不会指望他们的支持。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红军官兵们当时需要的是这样一种领导：他善于作战，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资源进行游击战略，对红军即将扎根于其中的中国农村社会有强烈的感情。显然，毛是这一人选。

红军领导人之一的林彪后来指责毛在遵义会议后所采取的“见敌就跑”政策的“破产”，而周的态度却很客观。他镇静地说，你们应当“走着瞧”。

周的思想的这一大转变，很像是汕头往事的再现，而且在战斗失利时把指挥权交给自己的主要批评者，这种做法不失为一个良策。再说，当时周的身体欠佳，无力担负长征所需要的领导重任。

总之，尽管周对毛有许多意见，但他仍被这位传统的却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所倾倒了。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也许，农村根据地的峥嵘岁月已把周在天津—巴黎—上海所形成的有关中国革命城市化的观点的锐气全磨掉了。中国农民必须加入革命运动中的重要性深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机灵的城市人，在农村范围内可能没有多大帮助，但是他可以作为那位可信的农民领袖的助手，提供了解国外形势的渠道和使其思想观点更闪闪发光的人。

就连周的警卫员也渐渐被他培养成了共产党员。周曾住在一座家具雅致美观的房里。他的部下十分喜欢屋里那些值钱的东西。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在打扫房间时拾到了一枚金戒指。因为过去从未见过这种玩意儿，魏便把它戴在了手指上。第二天，当他给周打洗脸水时，被周发现了。魏正要离开，周责怪地问：“魏国禄，你知道三大纪律

吗？”（红军的这些基本行为准则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魏说自己对这些纪律很清楚，而且也照这样办了。

周指着戒指，说：“很好，那么，你手上的戒指从哪儿来的？”

羞愧满面的新兵可怜巴巴地交出了戒指。



长征到达陕北后（右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在一起。

一旦作出决定，红军便离开遵义，迅速向西挺进，向着云南山区前进。作为新的由毛泽东、王稼祥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的成

员，周忙得焦头烂额。在远离内地后，国民党部队减少了。这是长征途中一段相对太平的时期。

在云南山区，有天晚上其他人早已就寝，周却挑灯夜战，全神贯注地在研究作战地图和情报。最后，他来到屋外漫步。

“口令！”（通行口令）路边的值勤战士喊道。

“我是周恩来。”他忘了回答口令。战士马上认出了他。周请他到房里聊天，烤烤火，暖暖身子。

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战士接受了邀请。进屋后，他看到周的脸“几乎被长长的头发和胡子”盖住了。他关心地询问这位长者的身体。

“还说得过去，”周答，“去年出发时，突然得了感冒，总是复发。非常讨厌。”

接着，他们又谈到抓来的那些有钱商人。这些人也跟红军一道在行军。这位战士以为扣押他们是为了敲诈他们的钱，因为军官们对他们太好了。

周解释说：“这么做并不是为了他们的钱。当然啦，如果他们捐献的钱超过了他们一路的花销，我们还是很欢迎的。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赢得朋友。这些商人都是四川的富户和有名望的人。我们就要到那里去。通过向这些人表明我们红军的良好品行，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是一项好政策。”

“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呢？”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如何对付他们。再说，他们也在学习，他们正在把自己那白嫩的脚同我们的脚进行比较，包括你的脚，我的

脚—布满老茧与裂口，跟其他同志的脚一样……我们的铁的纪律将使他们相信，我们是革命战士，不是土匪。”

在一个村里，警卫员魏四处为周寻找食物，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玉米粉和10个鸡蛋。但是，那家屋里没人，没法付款。警卫员们决定先给周做出来，然后再考虑如何付钱。

当这盘菜端到周跟前时，他坚持要弄清楚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付了多少钱。警卫们犹豫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周开了口：“这么说你们没有付钱喽？”

他们只好如实坦白了一切。周严厉地说，应当把东西送回去。但是，有一人恳求道：“如果给这位村民写张字条，解释一下这件事，在鸡蛋篮里再放上一点钱，是不是就可以了？”

周只好答应这么做。于是，他们留下一块银元做付款。还有一次，周坐在一棵梨树下，但他拒绝吃树上的熟梨子，因为无法向主人付钱。

在云南，由于他们的到来太出乎意外，所以轻而易举地缴获了许多国民党军需品。有一次，3辆敌军卡车错把他们当做自己人，径直朝他们开来。结果，红军不费吹灰之力，缴获了大量战利品，有一辆车装的是火腿、药、茶叶和军用地图等。

当朱德看到这些东西时，周告诉他：“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运输队。我们需要什么，他们送什么，还不要报酬……我们正为没有云南地图发愁，敌人就给我们送来了这些地图。我们的伤员需要药，而现在想要的药品都有了。”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在四川，周心情沉重地庆祝“五一”节。因为离开江西的共产党战士们已有一半的人在长征的头6个月里英勇献身了。此刻，当他们向北行进，穿过藏族人居住的四川内地时，每个人都经历了艰难险阻。这里的地形也变得稀奇古怪起来。有天晚上，周只好靠着一棵树睡了一觉，只是因为地面太湿，别无选择。为了保护双脚，他已养成习惯，在脚边塞满旧报纸。

下一个要逾越的障碍是大渡河。它沿着冰雪覆盖的青海高原顺流而下，流经四川，成为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水势凶猛，沿途有几座桥。最初，红军想在安顺场渡河，结果因为船只不足，部队遭到了国民党的攻击。经过焦急地讨论，周和其他人决定在上游再最后试一次，穿过具有历史意义的泸定铁索桥。周冒着倾盆大雨，沿大渡河急速前进。可是，到了那儿一看，敌人已经毁掉了桥上的木板，战士们正在步履艰难地过桥。

“过桥时，”周劝自己的警卫员，“你一定要多加小心，看着对岸，别往下面看。”

他们把木板重修了一下，接着，一边在桥上艰难地射击，一边把木板重新铺上。一步一步地，有时真让人提心吊胆。周和部队准备过河了。可是，一开始过河，周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疼痛突然向他袭来，后来被诊断为肝脓肿。他全身肿胀，但无药可医。过去，离开汕头后他得过疟疾。后来，到了大城市，就医条件好了，他的身体仍一直欠佳。此刻，在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长征路上，他和同志们又经历了全新的、几乎无助的奇迹般的战斗历程。难怪这些幸存者在经历了共同的磨难后，感到彼此间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下一步，他们必须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许多红军战士因不适应这里的严寒气候，倒在路上，壮烈牺牲。其中有一位是周的警卫员

朋友。周和魏在冰山上挖了一条缝，把这位战士安放在里面，脸上盖着他本人的衣服，用雪掩埋了。在这里，他们还遇到了一场冰雹，“像胡桃那么大”。条件急剧恶化。周总算幸存下来。

在川西北这些荒无人烟的高原地区，粮食极为短缺，有位绝望的战士因吃草中了毒。周看到他躺在地上，便给了他一碗面粉。这是他从自己的口粮里节省下来的唯一一点粮食。6月中旬，长征战士与张国焘率领的一支红军部队重新会合。那时，他们一定为处境稍好的新同志们给予的帮助而欣喜万分。张曾经是毛在党内的上级，他对毛的提升流露了不满。他也有野心，而且在他自己的小范围内和部队里，他已习惯于当头号人物。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周，最初还在毛和张之间调停，想让他俩在以后的长征路上齐心合作。最后，张被任命代替周担任新组建的红军的总政委。但是，毛自己仍占据着重要的军事职位。如果当时，周不是大半时间躺在床上的话，他对这件事的影响肯定会更大。他曾想作一次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然而，当几天后重新开始长征时，他又不得不被人用担架担着走了几周。

张国焘的到来是对遵义会议和解的严重考验。在连续召开的会议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建议。会上，领导们仍继续在长征期间制止张国焘—最初他可能受到“布尔什维克”们的支持，也许周也默认了—对遵义会议提出的质疑，因为与整个党休戚相关的决定毕竟是由一群人作出的。



毛的部队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目睹这种惨状，张国焘决定自称领袖。他的一名部下竟然建议他为党的总书记，这一举动是非常无礼的，而且由于张过于鲁莽地公开了自己的宣言，周和“布尔什维克”们便疏远了他。于是，张便失去了机会。

张在会师后最初几周里的所作所为，使周认定毛最有组织能力，依靠他的领导，党的处境一定会有改善。

在一次会议上，毛张之间展开了针锋相斗。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那一决定性会议时，周正发高烧39.5℃，未能出席。第二天，他声音微弱，神志不清。医生让他身边的人从山上弄来冰块，把浸过雪的毛巾放到他的额上，降低他的体温。第三天，他的体温开始下降。第四天便恢复了正常。

事隔不久，周的警卫员魏国禄又因疟疾，一只脚受伤和一只眼感染而躺下，一度成了瞎子。

周镇静地对他说：“别担心。想法找点猪肝来，做时别放盐，就着汤一起吃下去。你还可以在热水里放点盐，用干净药棉做成敷布，睡前敷在眼睛上。”这些办法都试过了。行军时，周还把这位年轻人放到自己的马上。

最可怕的事情还在最后，即穿越四川北端的荒草地。周后来回忆说：“对我们来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是长征时期……特别是在穿过邻近西藏的大草原时。我们的情况令人绝望，没吃的，也没喝的。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

那时，周的身体正处于最坏状态。当那位指挥先头部队的军官前来接受任务时，他才知道，医生已下令周谢绝会客。邓颖超坦率地

说，她“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深感不安，因为没有合适的药物”（整个长征中，红军官兵一直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称呼）。周只好放弃夜晚开会的习惯。他又高兴地琢磨起代用营养品来。有一次，战士们摘下皮带，用水煮软，再放进野草，艰苦跋涉一天后，就吃这种东西。周后来在看卓别林的《淘金记》时，肯定是大有同感的，因为他热情地称它是“三鲜汤”。

草地上时常遇到河流。有一次，周和邓不得不冒着大雨，过一条齐胸深的河。由于水流湍急，脚下的淤泥松动，周让同志们解下腿上的绑带，做成一根绳子，三人一组地牵着过河。可是，绳子后来断了。他们便做了一根更粗的绳子，分成更小的小组过河。轮到周时，部下们说他太虚弱了，水过河会受寒，旧病又会复发。最后，周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被人抬过了河。不久，他们就和陕西省的战友会师，开进了红军在几年前开辟的又一块根据地。

尽管周身患肝病，夫人也得了肺病，但他俩总算从江西至陕西的这一年传奇经历中死里逃生。邓后来在谈到她的肺病时说：“说来也真奇怪，经过一年漫长的行军，我的病却不治而愈了。”

这时，窑洞成了他们最好的住所。在此后的几年里，周还成了一位穴居者，先是在保安，后来又迁至延安。在延安，他才把穿了12年之久的长皮外套丢下。但是，他仍把它挂在那里的旧房子里，由当地的一位共产党员保管。对于自己用惯了的东西，尽管破旧，他怎么也舍不得扔。1935年年底，每位红军战士都发了一件新上衣。可是，周怎么也不肯要自己的那件。警卫员说，现在是在根据地，已经取得了胜利，每个人都理应得到一件新上衣。再说，他的那件旧上衣也太破旧、太脏了。周好像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旧上衣，仔细打量了半天，最后，只好收下那件新衣服。当警卫员让他穿上新衣服时，他还拒绝说：“把这件旧衣服洗一洗，补一下，还可以穿。”

邓表现得像个完美的妻子。她自己凿了一孔窑，把它布置得像个家。邓在窑洞的花格窗上贴上当地产的糊纸，她还解答其他妇女的家庭问题、孩子的现代式照管、结核病、裹脚及当时诸如此类的问题。周这时还留胡子。他们过着这时能够享受得起的较安定的生活。

有一次，周回到家，夫人用一杯咖啡款待他。咖啡筒上写着S＆W的商标。“这是最后的一点了，”夫人解释道，“是老毛送来的。他说，这是一位西方来宾送给朱德的，已经传了很多人的手了，在传到我们这儿之前，大家都喝过几勺。”

后来，周收养了一个女儿，名字叫孙维世。她是许多烈士遗孤中的一个，他们的父母都被军阀或国民党杀害了。她的到来弥补了他们较稳定的生活的不足，也解除了他们对没有孩子的忧虑。邓因过去流产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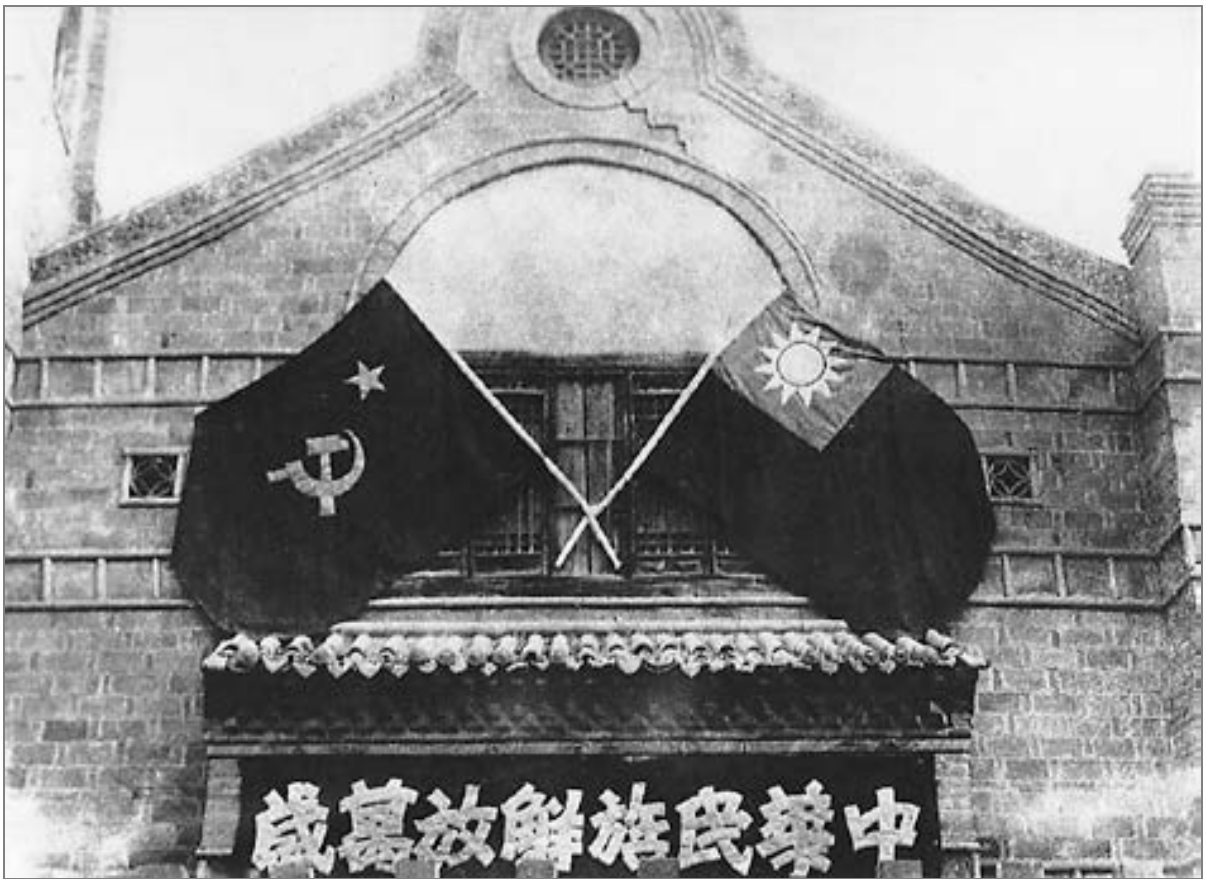


193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

按正常情况，共产党以为蒋介石会发动又一次“围剿”，把他们消灭在中国另一个地方的根据地里。但是，这时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帮了红军的大忙。正值中国的蒋介石军队与共产主义者相互残杀之际，日本军队侵占了满洲。这时，日本将军们企图挑动一场对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战争，其目的在于奴役中国。周早已意识到日本引诱国民党政府的用意。还是在长征途中，他就多次考虑过这个问题。这一新情况表明，在全国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可以同国民党合作的。而且，在此名义下，共产党还可以进一步求助于中国大众及基础组织，使国民党更难以击败他们。

从共产党这一方来说，周承担了主要的重任—创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陕西附近有两支国民党部队是由中国军阀之一—优秀的张学良统率的。他继承父亲老帅的事业，被人称为少帅，广为人知。早年，少帅吸过鸦片，是一位花花公子。如今，他已长大成人，精神饱满，热忱爱国。他和自己的将领们已经正式效忠蒋介石，把蒋视为中国最得力的领袖。不过，他们的内心十分矛盾，对蒋奈何不得。由于日本人步步进逼，少帅认为，大敌当前，理应抗日优先。

1936年1月，周向东北军发了一封由毛、周等署名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这些将士效忠少帅，而不是蒋介石，他们也是统一战线的可能支持者。4月，周和少帅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谈。双方一致认为，蒋介石势力强大，因此他是中国抗日唯一可能的领袖。共产党部队将同中华全国武装力量竭诚合作，共产党将停止政治宣传，但保留自己的政治独立权，而国民党应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这件事不禁使人联想起20年代中期发生的事。当时，国共两大敌对党派在北伐中也曾合作过。当他俩达成一致意见时，周站起来同少帅握手。



1936年4月，周恩来在延安城内这座天主教堂同张学良秘密 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少帅迟疑地说。他还想等待蒋介石的决定。

“我很高兴留在这里……同你在一起，作人质。”周坚持说。“没有必要。”少帅说。此时，少帅和红军达成了他们的地方停战协议，后来蒋介石响应了这一停战协议（周先到上海，后又到南京，直接同国民党代表协商）。在有关统一战线的大部分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看法。

但是，蒋介石本人并不相信同共产党停战的必要性，他也没这么做。他相信，在日本人的威胁恶化之前，消灭共产党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命令少帅向红军进攻。共产党击退了这一进攻，周还派人向

少帅送了一封密信，信上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谁杀害自己的兄弟喂养恶狼，谁就是野蛮人”。

在此期间，周有过一次偶遇。这次邂逅相遇后来证明是很有意义的。那是6月的一天，周路过延安北部的一个小镇，看到了一位西方人。这在当时的陕北是少有的事。

“你好，”周用英语问，“你找谁呀？”

此人便是埃德加·斯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一位热情奔放的年轻人。斯诺把这位问候人描绘为“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军官……蓄着中国人少有的浓密胡子”。

斯诺被这位干练的人物深深迷住了。他详细地描写道：周“身材修长，中等个儿，消瘦但结实。虽说胡子又黑又长，但外表还是有点孩子气。大大的眼睛，热情、深邃。他身上有一种磁力，这种吸引力似乎来自于他的羞怯、个人魅力及对指挥工作的胸有成竹的个人品质的综合。他的英语虽讲得结结巴巴，但绝对正确。当他告诉我他已5年没说过英语时，我感到非常惊愕”。斯诺后来回忆说：“周很英俊，体形像个女孩子，非常苗条。”当周跟这个美国人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斯诺直率地问：“你们是否打算放弃革命？”

“不，”周答道，“我们是在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而不是放弃它。革命可能以抗日战争的方式而开始。”

周给斯诺一匹马，带他一块儿到保安见毛。这位美国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根据这次会面，他对两位人物进行了比较。不如周的温文尔雅，斯诺看到的是一位“强硬、思维敏捷、才智过人的人。尽管他具有理性、有魄力、自信心强、倔犟和善于打动人的本领等品质，但当时他没有打动我，后来也没有”。

这件事发生在6月。随着秋季的来临，统战问题已迫在眉睫。周的将领们加紧对少帅及其官兵们进行鼓动。10月，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重，慌忙从南方返回，为少帅鼓气。此前，他一直在南方对付那里的不太顺从的军阀们。

虎落陷阱（1936~1940）

出乎人们的意料，周的死敌、曾经几次差点抓到周、并且悬赏8万元要周的头的蒋介石，今天居然落到了周的手中。这一不寻常的捉拿上司蒋委员长的兵变是中国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的领导下执行的。当时蒋正在西安视察他们的总部。蒋希望在打败共产党之后再对付日本人，所以他威吓张学良说如果东北军不消灭以延安为根据地的红军，那么他就把东北军调往南方的福建省，然后从别处调派忠实的部队来亲自干这件事，但少帅认为抵抗日本人，共产党是必不可少的。

1936年12月12日拂晓，东北军包围了蒋介石在西安下榻的历史上闻名的“华清池”。蒋闻声从床上跳起，急忙爬出窗外，把假牙都落在了洗漱间，还丢了一只拖鞋。但是，他最后还是被捉住了。少帅不像他的那些性急的军官，他从未想过要害他的上司，现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与周的秘密会晤后希望蒋介石能够抗日。怎么处理这个网中的老虎呢？少帅便请周恩来帮忙来出主意。

收到张的电报，周和毛非常激动。人们的第一个直觉便是，这个中国革命的大敌肯定要被处死，或者起码让他站到法庭上，而共产党则可从中得到巨大的宣传效益。但周提醒他的同志们不要抱过多的希望，“我们单方面还不能决定怎么办，”他说，“还要考虑少帅的态度。”

尽管红军战士用整个上午时间把跑道上的雪清扫了，但少帅派到去保安接周的飞机还是不能着陆。这样周不得不到延安上飞机。后来，他的随行人员写到，从保安到延安，迎着风雪向南行走了50英里，一路上周敦促他的随行人员紧紧跟上。另有报道说，周穿着灰色的棉军服，留着长长的胡子，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他后面的18个随行人都骑着蒙古马。走了一半路后，他们打算在窑洞里过夜。当警卫员拿出一件新棉大衣给他披上时，周生气地说：“不要把我当成一个老人。”

一到延安，少帅的专机便载着他们在一个小时之内飞抵西安。周就住在张学良的住地。由于得到张学良的信任，周实际上成了蒋介石的主宰者，掌握着他的命运，因此他的责任是重大的。只要他说句话，这个曾经杀害过成千上万共产党人，几次竭力捉捕周本人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将会反过来被处死。忠实于委员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逼近。时间是如此紧迫，怎么办呢?

一些同志要求处死蒋，许多东北军官也这样想，而周的想法是可以开设一个进行教育的、具有政治性的法庭。但是，周很快又作了一些具体考虑。他和他的同事们对蒋深恶痛绝，他们痛恨国民党为与日本谋求和平而公然向共产党开枪。还有，从苏联这个角度考虑：周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只占少数，所以还要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苏联的态度是，一切服从建立抗击日本的中国国内联合，委员长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周不能不考虑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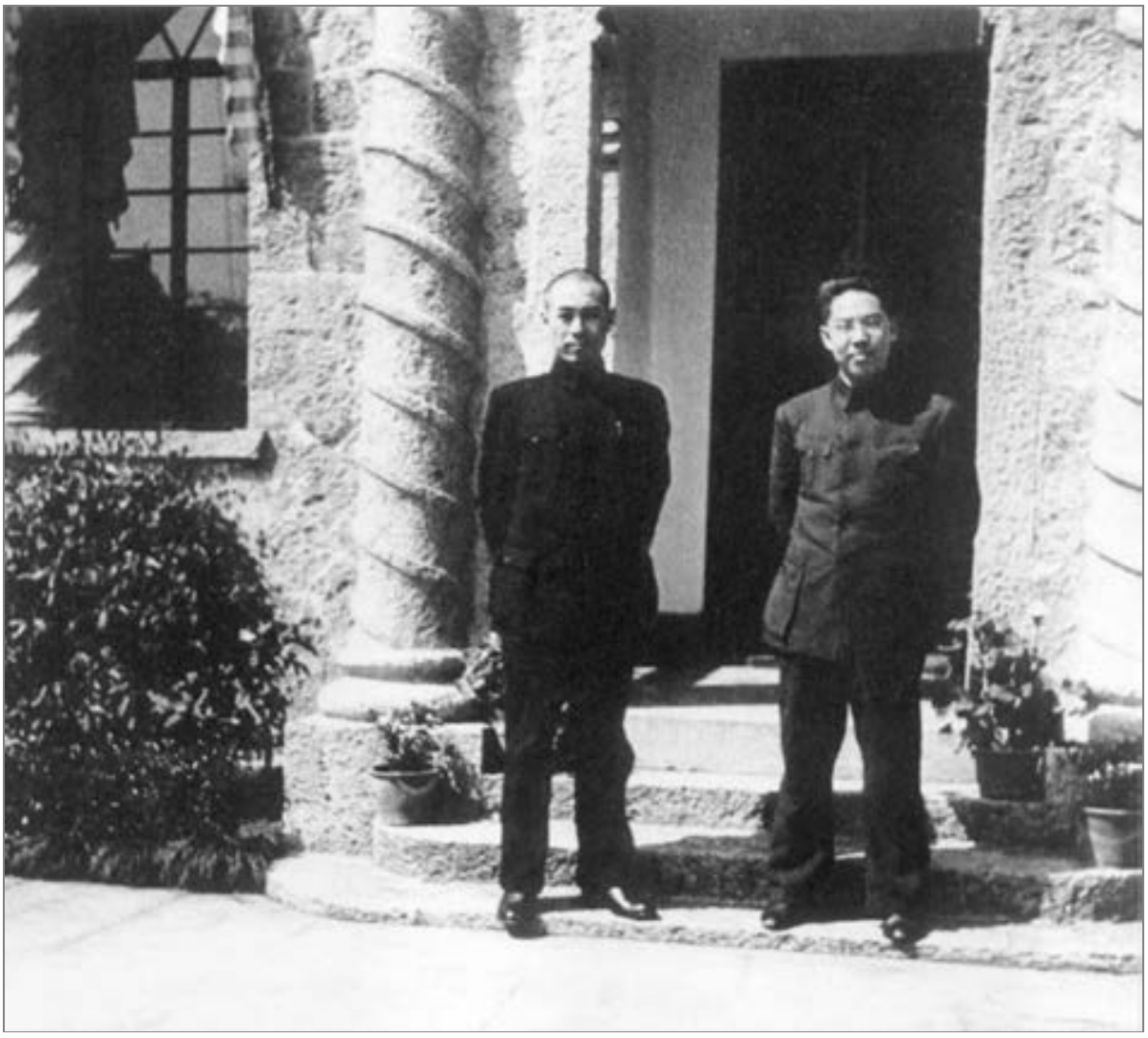
所以周在赞扬少帅的勇敢精神的同时，指出了处理这件事以和平解决为好。他劝东北军的军官们利用这一机会迫使蒋接受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的条件。处死他不但制止不了内战，反而会使战事扩大，进而帮助日本。所以，应把他争取过来，结成统一战线。

少帅显然是要苏联支持他的行动。周恩来用苏联关于中国联盟的思想来开导少帅，但他突然反建议要在西安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以制约国民党。然而，最后周还是劝服了他在达成抗日协议后放掉蒋。接着，周又用他的观点说服了东北军的军官们。其中有一次谈话长达6小时。

不久，国民党全权代表赶到了，周花了大量时间试图使他相信共产党的条件。圣诞节前夕，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毅然飞到西安。“你怎么来了？”蒋问她，“你知道，这里是一个死亡的陷阱。”但她并没因此而丧失勇气。

周诚恳地和国民党领导人商讨了6个问题，包括停止内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吸收抗日人员、释放政治犯，以及保证共产党的行动自由等。后来，他们终于同意了这些要求。他们对这位38岁就显露出不凡才华的共产党的外交官表示出敬意。蒋最亲密的顾问端纳后来指出：“实际上，是周恩来在西安发生的劫持中使委员长免受伤害。”也正是由于周对东北军的好战的批评压抑了他们对他的敬仰，“周的和蔼全是假的，”有人评论道，“他很狡猾，能装出这般可敬的态度。”然而，他的声誉却是无法诋毁的。

周在没有见到他的大敌前就已获得了这一切。实际上，他是在西安谈判了一个星期以后，在圣诞节前夕才见到蒋介石的。会晤是在深夜进行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单独交谈，以后他俩谁也没有提及此事。周的一位同志后来说，蒋开始以为周会使自己送命。在蒋介石对西安事件的说明中，他也从未提到同周讲过话。不过一个英国记者报道说，他们曾有三次秘密会谈，而美国人则说有两次。据说蒋存心用极端无礼的态度对待周。



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杭州合影

关于这次历史性会晤的开场白，有很多说法。

“蒋先生，看到你身体很好我很高兴。”这是一种。

“蒋先生，我是你的学生，只要我们和日本人作战，你说什么我们都能接受。”这是周自己的说法，是由一位东北军军官传出的。

然而，另一种说法是，少帅这样向蒋“介绍”周，说他的前部下要求见他，于是周走上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按照黄埔军校的习惯，周是把蒋称做“校长”进行谈话的。

最体面的开场白是：“主席先生，我是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而来的。”

不管话是怎么说的，身心很虚弱并因被捕而受惊吓的蒋介石，看到他的前政治助手——一个他曾想从中国历史上使之消失的人进来的时候，他的脸色由于不安而变得苍白。共产党人来西安是要处决他吗？他非常虚伪地说：“我们打仗的时候，我时常想到你。我记得北伐的时候你也为我做了不少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再一次在一起工作。”

周恳求蒋顺应历史的潮流，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领袖，帮助其他中国人抗击日本的侵略。他列举了很多事例，说明共产党为了整个民族的事业正在放弃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呼吁国民党也同样地爱国，并进行和解。周的战术是对这个强大的杰出的对手流露出尊敬和谦恭（忍住他的真实情感，就像他在南开学校的舞台上一样），避免胁迫，以便以后达成具体协议时更容易一些。蒋以平时的说话方式谈了结束内战的理想，周认为这是一项君子协议，还可以在以后的会议上使之再具体一些。

据说紧张气氛稍有缓解后，周便谈起了关于委员长的家庭情况。他说蒋的儿子蒋经国（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在苏联受训期间享受了良好的待遇，这正好抓住了委员长不自觉流露出的但又几乎感觉不到的对儿子的失落感。周答应尽力使他们团聚。

但是，周耐心建造的外交大厦倾倒了。他想多扣留蒋几天，为国共两党的协议提供具体的保证。但是，他认真告诫委员长绝不会伤害他并有条件地释放他，这一点是成功的。圣诞节那天，仅在周与蒋会晤几小时以后，少帅便陪着蒋介石—这个他一直敬佩的人，以及他的妻子和顾问前往机场飞赴南京。陷阱过早地打开了，对手不仅身心毫无损伤地回到了他的首府，而且摆脱了任何个人契约的束缚。周在释

放蒋之前没有接到通知，只是在最后他才火速赶到机场，但是已经太迟了，他没能阻止飞机起飞。

少帅，急速登上飞机，加入了曾经是他的俘虏的行列中。从此，他再也没露过面。这样，蒋介石得以安全回到家中，并宣告逮捕他的人犯有叛逆罪，把少帅软禁了起来—开始是在大陆，后来是在台湾，他就这样在度过自己的余生。

这时，周已经给毛发了一封充满希望的电报：

蒋介石病了。我见到他时，他表示要停止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从发生的情况看，蒋的态度确实有了改变。他真心授权给宋子文（银行家，蒋夫人的兄弟、蒋的主要助手），宋也下决心要抗日。当他要离开时，蒋说：“从现在起，我再也不剿共了。”

这是毛和周的又一次配合，毛在延安运筹帷幄，而周则在外面进行谈判。他们的一位同事说：“毛泽东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意图都告诉周恩来，而周则在外边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转变成行动。”

不久，周发了另一封电报安慰毛，“蒋有自命不凡的虚荣心，或许不会食言”。这位同事补充说，“这是周又一次错误的估计”。

在共产党、国民党、东北军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停止内战及抗日统一战线能得到挽救吗？周听说少帅被禁，便向南京发电提出抗议。但是，东北军的军官们却愤怒了，他们有50多人威胁说要杀周，因为他使他们失去了少帅。周使出全身的解数平息了他们的怒火。他问：“你们不想把中国变成第二个西班牙，是吗？”

周得到了苗（译音）的帮助。苗是一个高大的满族人，嗓门大大的，并常常抱有极端的见解，他既不支持共产党也不拥护国民党。他请教周的意见，是为了把少帅救出来。

周回答：“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最后决策我说了不算。另外，少帅仅仅是一个人，我们还有整个民族需要考虑。”

苗谴责周为他的革命把少帅当成了牺牲品。

“不，苗兄，不是我的革命，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了正在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万个我们的同胞。你在少帅的舒适的司令部里待得太久了。你还没有亲自到川西、陕北，以及那么多无法生活的地方走走，你还没有看见我们的大多数人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祖祖辈辈都过着非人的生活啊！”

苗坚持说周对少帅没有感情。“我曾听说共产党人从不为自己同志的死而落泪。”

“不！”周回答，“我们从不为悲哀落泪，我们只有愤怒的泪，这是绝对不同的，我们正在为人民而战，感伤是没有用的。我们的革命经验是我们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政策是用鲜血写成的，靠几滴伤感的泪水是不行的。”

“你太顽固了！”苗骂道。

不久，关于统一战线的谈判有了进展。这对周和他的职业自尊心来说真是太幸运了。2月中，一项有关国共合作的新的协议书送到了南京。很明显，委员长感觉到要对在西安为获释而讨论过的条件尽点义务。共产党愿放弃极端的土地改革来换取共同抗日。

一个国民党密使带着停战条件的修改件走进了周的办公室。这人正是周的良师益友，在南开中学与周同桌的吴—大个子东北人。在那相处的4年中，他常常保护周，使他不受欺侮。后来在日本留学时，他又给过周一些帮助。从那以后的17年，他们分道扬镳了。吴晋升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返抵延安时，在机场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欢迎。左三起：秦邦宪 （博古）、张闻天（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萧劲光

第一次握手是不自然的，接下来便是一阵难堪的沉默。双方都不清楚老关系是否还能再恢复。

“好多年了。”周开始试探说。

“是啊，我们都老了。”

“是的。”

他们悲痛地意识到南开中学帮的6个“结拜兄弟”已有3个死去了。

周试图找出下一个话题：“你夫人好吗？”

“还好。”

“有孩子吗？”

“只有一个。”

“还是那个夫人吗？”虽然在问这话的时候周的眼里闪动着幽默的眼神，但他马上意识到在共产党指责国民党生活腐化的情况下，这样问是不合适的。吴冷冷地摆弄着手里的东西。很快那16年在两人之间又形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有一张照片永久地记录了周胜利返回延安机场的伟大时刻。照片中，周的身边站着毛和其他红军领导，周主人般地倚靠着双翼飞机，手漫不经心地插在他的棉飞行服里。他头戴白色飞行帽，遮风镜在前额上掀起—一副猎手满载而归的样子。

周准备先去南京几个星期，然后再进行另一轮谈判。在一个刮风的阴天，周在劳山的路上遭到了伏击。几名党员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口袋里有一张周的名片，这些神秘的狙击兵实际是抢劫东西的土匪。

不久，周到了南京，立刻处在国际新闻界的包围之中，他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外交特使的生活，并且他也能够去拜访他的老教授张伯苓。“老师，”据推测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你还愿意把我当成一名学生带回去吗？”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想跟他去。但张却不明智地向他的朋友们说了大话，说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说服周离开共产党。

周告诉一个记者：“蒋介石手下的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主要在南京政府内部……国共合作和停止十年内战计划的成功，要靠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民、中国的士兵，以及南京的自由主义者要求在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的时候，结束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局面。”

1937年6月，当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周的时候，周说共产党已经放缓了它的大目标，只需要一个可以包括地主、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工人和农民而没有卖国贼的国家民主体系……我们要在中国各阶级中开展一场大的民主运动……为的是抗击日本的侵略战争。既然国民党打算执行孙中山的三项原则—民族、民权、民生—共产党就准备全力支持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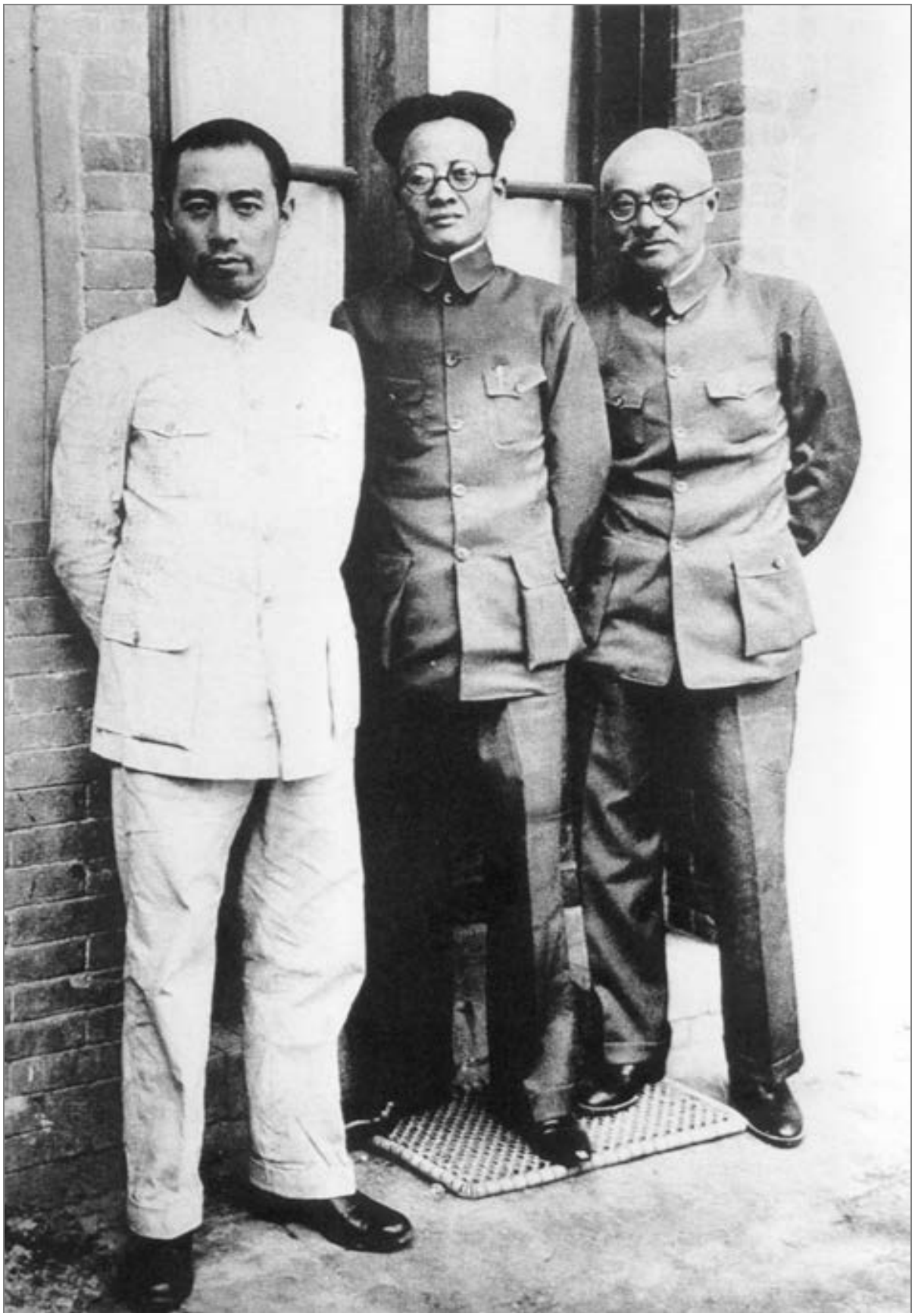
在这个阐述中，周是诚心实意的吗？国民党的许多评论家把他说成是微笑着站在沉思的毛与外部世界中间的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毛同样有着令人吃惊的观点，用来向国外采访者解释和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周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活动家，他那真诚的主张是那样具有说服力，使他赢得了众多的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中国人的同情和信任。

在他的早年，比如在他负责共产党的中央特委和处理叛徒时，他的表现远远不是温和，而是毫不留情。

史料表明在李立三和王明的势力强大的时候，周有时是一个支持者，有时也反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到了1937年他开始变得稳健、中庸，特别是在他代表共产党的利益执行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任务的过程中。

6月，蒋介石派他的私人飞机把周接到庐山—当时中国的避暑胜地，同他和他的部长们一起议事。在这里他们讨论了共产党在立法机关的代表席位问题。但是，讨论于7月7日被打断了，因为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中日之间发生了冲突。因此，统一战线在周的心目中已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中国人民向他们的领袖提出的一个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了。

周返回延安同毛和其他同志紧急磋商，然后回到庐山去见委员长，发现他正准备接受几个月前他拒绝的政治协议。在一系列阐述中，蒋承认了共产党、红军和陕西红色根据地的作用。



周恩来和秦邦宪（中）、林伯渠（右）在庐山同蒋介石谈判 后回到西安时的合影



1937年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周起草了充满不可理解的民族主义精神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

共产党保证，在农村停止没收土地，撤销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一些意识形态举动，比如国民党方面对工会活动者的逮捕、共产党方面的撕毁地契等，为了团结一致对外，都会暂时停止下来。

8月，日军攻占上海以后，周给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带来了一项提议，其内容包括让共产党和红军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周解释说，在他和蒋的这笔交易中，红军将编入国军但不是加入，只是听从南京方面的作战行动安排，从南京方面获取武器和其他装备，但不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毛坚持认为红军要保留全部自主权。

周说，如果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积极，那么它在中国的政治形象便会树立起来，它应信守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在任何情况下，独立都是相对的，可以解释为以多种巧妙的方式与国民党达成基本协议。

在长征快结束时闹分裂的张国焘，现在又重新回到了陕北根据地。由于总是处于这种僵局之中，洛甫便提出进行妥协。周说，现在是我们党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同国民党并肩作战而不是相互对战的时候，这样要比退回游击战，给人一种共产党软弱的印象要强得多。妥协是为了参加到反抗日本的整体战之中。

毛不相信任何经过渲染的事情。当蒋提出要红军到山西前线和日军作战时，毛一直推托他的供给没有准备好，改编还没完成……甚至当红军开到山西前线时，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以防万一在某次战役中被全歼。因此，3个师的兵力被分散在山西几个不同的地方。

9月初，周到山西抗日前线，同阎锡山协调与红军协同抗日问题，并取得了成果。9月末，在平型关战役中，由林彪将军指挥打的胜仗，是得到了周的后勤部队的大力帮助而取得的。这是中国军队抗击日本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虽然侵略者再不会在山区轻易地遭到伏击，但这次大捷却使共产党在国民党的中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的夫人在红军总部组织了庆祝活动，歌颂庆贺长征以来的伟大胜利。

10月下旬，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再一次见到周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情绪激动地说：“在太原我见到的所有人当中，很显然他是最现实的、最聪明的、最有能力的。他英俊潇洒，博学多才。”她把周同世界著名的贾瓦哈拉·尼赫鲁相提并论。“他站立笔直，说话时看着对方的眼睛，语调坦诚，他知识渊博，想象力丰富，判断问题一针见血……如果有必要采取一些类似引进现代医疗设施这类有价值措施的话，那么签署命令并将这项措施贯彻下去的一定是周恩来。”一些国民党人想把他从共产党这里争取过去，“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他从不在意个人的安逸、财富和势力”。后来她要教共产党的领导人跳舞，当教到周时，他“像在解一道数学题”。他想照顾到自己的四周，不轻意地让身体随意摆动，当然他有一种天生的节奏感。

大敌当前，在山西的群众大会上，周发表讲话说如果打败了日本，他们将更加民主。这样的话使他赢得了地方军阀的支持。英国记者詹姆斯·伯特伦是这样描写周的：他身着平纹“中山装”，留着短发和短须，好像是“D.H.劳伦斯的自画像，充满着活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伯特伦心想，“如果他不是一位革命者的话，那么他一定会是一位艺术家。”他浑身充满生气，举止轻快。他熟练地运用着他的各种手势，毫不费力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时常还夹着几个法语单词。

当记者就战争问题向他提问时，周回答说：“即使日本人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它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在中国北部有300多座城市，即使他们在每个城市中驻上一个连，他们也绝对控制不了整座城。这样对我们来说可就太好了—我们可以一个一个地分别消灭他们。”

但是不久，装备精良的日军击败了中国的正规部队。11月中旬，周参加了太原的大撤退并且险些丧命。在敌人攻占这座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夜晚，红军试图将4辆卡车也带走，但汾河大桥上挤满了逃难的

人。所以，他们不得不丢弃卡车，带上能带的东西步行。走了一段路，领导们发现周和其他一些高级官员走丢了。后来人们在混乱中找到了他，当他们到达最近的一个村庄时，第一批敌机已开始轰炸那座城市和那座大桥了。



不久，周带着“特使”的任务又回到了南京。那时估计日军要进攻，这个城市正在疏散撤退。他安排美国海军武官埃文斯·卡尔森少校去参观红色根据地。“那天，当人们都急于从南京乘飞机撤往武汉时，”埃德加·斯诺写道，“周通过红色地下交通站，穿过日军防线，把这个美国人送到了游击队的辖地。”

1937年年末，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是个受苏联教育的知识分子。一天，周正在和张国焘交谈，他们听到了飞机的嗡嗡声，以为是日军的轰炸机。可是飞机却降落在了延安机场，他们便跑出去看。周不知道来人是王明。王很自傲，不仅因为自己是斯大林的人，而且还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自诩。所以他在中央委员会上与周大声争吵。两三年前曾经在莫斯科详细解释统一战线的他，现在还想顺着被周抛出来的统一战线的潮流继续下去。但毛发现王说得太过分了，对国民党的让步也太多。不久，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王。过不多久，毛要送一封纯属私人的信给蒋介石，毛选择了周做信使而没有选择王。从此以后，周长期从事了统一战线的工作。

现在毛知道，他从周这里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周手下工作的诗人郭沫若说：“他处理问题的速度像闪电一般，极为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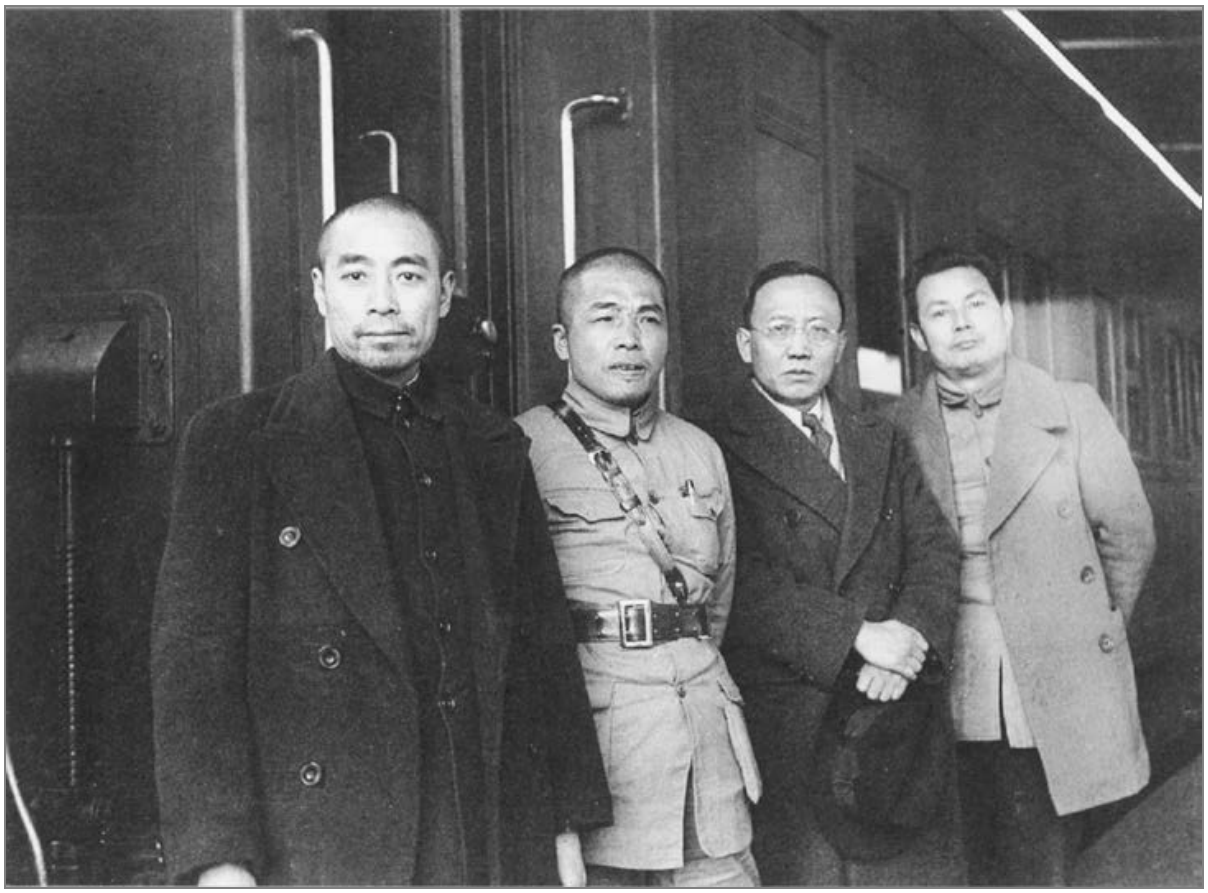
在共产党内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周的外交手腕的事。廖承志是周的一个年轻的密友，由于某种原因，廖被张国焘逮捕并被看管起来。像张这样的人，把部队控制得只忠实于自己，并用自己在党中央的地位来做后盾，几乎像一个独立的军阀，没有法律准则可以阻止他的专横行为。鉴于不是每一件事都能提到中央委员会，周便寻找时机来营救他的朋友。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上了廖，好长时间没见面，周走上前去和他握手，见有张的卫兵在监视，周什么也没说，脸上的表情也没有变。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当张国

煮去红军总部时，周派他的副官将廖带来—这是他能够“使用权力”的地方。



“你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吗？”周冲着廖大声地说，其实这是在说给张国焘听的，“你全都认错了吗？你打算改正吗？”对这些问题，廖一概回答“是”。然后，周叫廖和他们一块儿吃晚饭。这个命令张国焘不敢取消，因为周的官衔比张高。吃饭过程中，周一直和张交谈，没有理廖，好像他们中间从没发生过任何事。因为廖已经承认了错误，许多军官也听到他要改正错误，张就不能再处死他了，也没有再继续拘留他的必要了。最后廖被释放了，是周用他那完美的外交手段救了廖。

由于日军的挺进，国民党政府搬到了更远一点的内地武汉。在那里，周作为共方代表度过了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他刮掉了胡须，穿着笔挺的国民军军服，把时间分别用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和共产党报纸上。在一篇社论中，他曾写道：“从他的革命经验和贡献上看，委员长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唯一领导整个民族胜利的人。”一些人曾经将这一点看做是周政治立场动摇的信号。他和蒋介石的联系，以及和他的老校友、战场上的对手、新的国民党巨头陈诚之间的联络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他究竟站在哪一方。



1938年，周恩来和郭沫若（左三）、叶剑英（左四）同从抗日前线来到武汉的八路军副总指 挥彭德怀（左二）在火车站合影

1938年4月，当张国焘投向国民党的时候，武汉谣传：“周恩来将成为第二个张国焘。”一些人预言，委员长将把毛流放，把共产党易名为民粹党，由周恩来当最高领导。人们推测，这个党将不像共产党那样走极端。有人甚至公开问周是否真的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

“没有的事！”周回答，“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党组织，我就毫无作用，我参加国民党又有什么好处呢？”一些官员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回答，“不，国民党内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都有。我在那里还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当时有一些流言。周的一个前同事刘宁（译音）曾经写道：

周恩来将成为张国焘第二的预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不可避免。毛派对他的多疑和排斥，使周已经感到不自在了。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周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徘徊，在近期内周不会离开共产党，他要考虑他的未来，必须仔细打算。张国焘的叛变影响了共产党的威望。毛派将缓和对周的攻击。但毛、周绝交和周的出逃势在必然，只是不会马上到来。

这些臆测反而使周在武汉的工作极易开展，能达到这种程度他可能颇费了一番苦心。然而，对外国人来说，他成了中国理性的发言人。他的声音全世界都想听，而且也愿意传播。

后来，他的夫人邓颖超来和他一起工作。当时，曾使她在长征中备受其苦的肺结核还没有痊愈。1936年，她曾去北京西山疗养。清爽的气候、良好的食品和休息几乎使她痊愈。但日本部队突然来到这个地区，她不得不脱离此地。她先到了北京城，在那里她找到了早在延安就结识的美国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求他帮助她逃出去。由于日本人正在搜查每一个铁路乘客，逮捕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斯诺建议把她当成他的保姆带到天津。在约好的一天，她出现在火车站。“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保姆，头发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发髻”（斯诺说）。“像一个相当精明的保姆”（这是当时也在协助斯诺的詹姆斯·伯特伦的回忆）。就连美国外交官杰克·谢伟思，他认识周的夫人，在火车上也没认出斯诺的保姆的真实身份。

危险出现在天津。在那里日本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十多个中国乘客由于他们柔软白皙的手和那一身农民打扮的衣服形成了鲜明对照，便被叫出来挨个查问。邓把手插在袖子里。“是美国人。”斯诺对检查者说，并朝邓打了个手势。邓表现出了和她丈夫一样的高超演技，日本人轻蔑地把她的行李倒在地上，看也没看就放她过去了（这是埃德加·斯诺关于他勇敢营救邓的性命的描述。许多年以后，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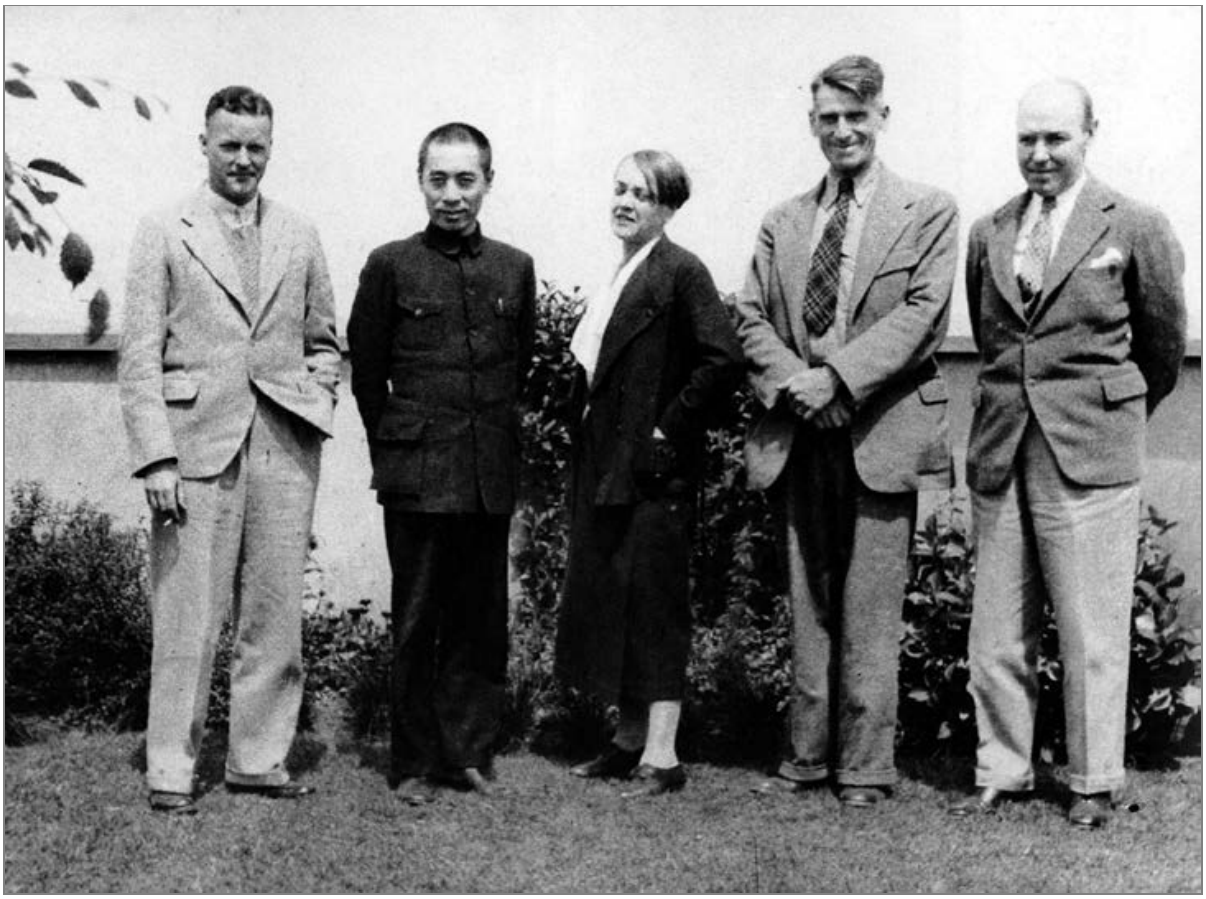
本人说，斯诺说得不对，但究竟如何我们不知道。只是斯诺和伯特伦不会同时编造出同一个情节来）。不久，邓在武汉加入了她丈夫的工作。

周和邓结婚之后条件极端困苦，并且经常不能团聚。在武汉的生活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次蜜月。他们在山腰租了一座外国人建的漂亮别墅，附近还有一座很大的桃园和一个湖。这差不多算是他们过的最奢侈的生活了。

一天，他们在《纽约时报》通讯员蒂尔曼·杜丁家里吃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警报解除之后，他们从掩体里出来，发现杜丁的房子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墟。

1938年，英国诗人W.H.奥登访华，周对他说他最担心的事情是国民党和日军以共产党为代价，双方妥协解决争端。詹姆斯·伯特伦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设在原日本人在武汉的租界里（他看到周面对一幅卷轴古画坐在一张榻榻米垫子上）。周向他表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同国民党是一样的。

“但目前并非如此，”周强调，“我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我们相信中国还必须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长期的斗争直到胜利。因此，对我们来说，得到友好的外国力量的每一种可能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1938年，周恩来和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左三）等国际友人在武汉

“如果我们果真胜利了，我们还需要更多高度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重新建设战后的中国，还有像治外法权和不平等条约等尚待解决的问题，将通过和平协议来解决。我们还将继续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及办企业。”

埃文斯·卡尔森是一位美国武官，周曾经帮助过他参观游击区。有一次，周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和卡尔森一起吃饭。史沫特莱尖刻地说了一些外国记者对中国的失实报道。周凝视远方，显然他对这一通激烈的言辞没有放在心上。过了一会儿，他胳膊肘架在桌子上，双手捧着下巴，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记者们的报道总是那么正确无误，历史学家就没用了。”

他表示他非常信赖在武汉认识的记者。他总是拍着埃德加·斯诺的肩膀对其他外国记者说：“对我们来说，斯诺是最伟大的外国作家，也是我们最好的外国朋友。”

还有一个周比较喜欢和信任的外国人是美国传教士洛根·H．鲁茨主教。10年前他曾来此避难，现在已是这里的常客了。周总是喜欢在主教的书房里和他交谈。谈了很久以后，当主教的女儿问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时，主教回答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朋友为怎样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新的社会里的新型的人而着迷。”多年以后，周告诉鲁茨主教的儿子：“你父亲—我敬爱他。”当这个在中国待了42年的主教退休时，周给他题写了两句《诗经》中的诗：

兄弟阋于墙

外御其侮

他指的是中国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关于军事方针，毛同王明进行过斗争。王认为没有更多的时间打游击战，他比较赞赏国民党的正规战争。毛坚持己见和他争辩说，日军的装备精良，阵地战对我方不利。在他看来，决战应该避免，例如武汉防御计划的制订应该建立在假定它的陷落无法防止的基础上。

在周恩来常常回延安窑洞红区司令部期间，一位曾负责过他的警卫工作的警卫员这样描述他在延安的住所：他拥有两间泥房。外面一间是办公室，屋里放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条长板凳，桌子上有一个砚台和墨水瓶，一个铜质笔筒里插着两支毛笔、一支红蓝铅笔，还有一只旧杯子；紧挨着办公桌放着他那个历尽沧桑的长方形铁质文件盒，长征时他一直将它带在身边。里面一间是卧室，炕上放着两块旧木板，上面铺了一层稻草和一条旧毛毯，床上有一条床单，一床使了好长时间的被子和一只当做枕头的背包。这就是那个在武汉外交场合频频举杯的人家里的一切。



1938年夏，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会见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

1938年秋，周在日军到来之前随政府一道离开武汉来到长沙，但在11月日军又逼到了长沙。市当局为了不使城市为敌人所利用，决定烧毁这座城市。但他们干得太仓促了。当时周正伏在桌上写东西，国民党官兵便用汽油把那幢大楼点着了。结果周不得不从后门逃了出去。周转身看到那幢熊熊燃烧的大楼，心中非常气愤。鉴于这场大火烧毁了这个城，蒋马上处理了那些莽撞的军官。

周劝蒋合法承认那支长江以南由叶挺率领的、没有参加1934年长征的共产党部队。蒋对新四军的认可使共产党在中南地区得到了一个可以发展的很有价值的军事基地。1939年春，周去安徽、浙江和江西省向各部队司令交代任务并作形势报告。他指示新四军政委项英，开展地区游击战，创立一个尽可能大的革命根据地。他还去安徽新四军军部讲了新四军的作战方针，然后到了浙江绍兴。



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在一起

这是周成年以后第一次回到他的家乡，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在绍兴，他拜访了他祖父攀龙的百岁堂，而后乘一只乌篷船沿河而下，到乡村去看望周家的墓地。所到之处都有亲戚迎接和陪同，因为他是周家的长孙。他按照家谱询问周家他这一族支人的生活情况。按照习俗，他向祖宗鞠了三个躬（没有叩头）。由于战时的限制，他没能去他的出生地淮安。3月29日晚，他在绍兴同姑表兄弟等在一个银行经理家里吃饭，饭后他们纵情于家乡的传统游戏—他给他们题字写诗。

这件小事给了我们一个洞察周的心理的极好机会，因为它显示了他是怎样利用这么几天的时间促使这些陌生人改变他们的生活道路，变得民主和平等一些，与此同时又为他这个重新组合的家庭得以团聚

而心满意足。在这个家庭里，他的亲戚们大都满足于他们作为特权阶层所起的半封建作用。周本能地，或在一定程度上凭经验知道，他想把亲戚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企图，将不会得到什么反应。他在浙江的返乡只不过是一次怀旧旅行罢了。在他的一生中，虽然他从不让他家庭的牵涉危及他所从事的党的事业，但他还是有能力处理好二者的关系的。

1939年夏，周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创伤，这个创伤不是来自于日本人或国民党，而是由他的一个共产党同志造成的。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

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

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回到了延安。



赴苏联治疗前周恩来与刘少奇合影

江青伤害周是否有预谋，一直不为人知。在打倒江青和粉碎“四人帮”的前前后后，这个故事才流传开了。这更像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虽然它很不寻常。

周被抬到了学校，他躺在那里浑身冒冷汗，脸色苍白，血渗透了他的衣服。自愿来根据地的印度医生巴苏大夫给他进行了治疗。他的右胳膊打了好多天的夹板，但一直没长好，不能伸直，而且断续地疼痛和不适迫使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尽可能少用它。

毛决定送周去莫斯科，在那里他将接受世界上最好的治疗。毫无疑问，这里面可能还有别的政治上的原因。另一个推论是共产党很有必要了解欧洲局势的进展情况。那里，斯大林已经和希特勒签了协定，战争已在西欧爆发。此时苏联正在和侵占东西伯利亚和中国北部的日本磋商休战协议。



1940年年初，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莫斯科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等合影。右起： 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在莫斯科学习的烈士子女在一起。前排左起 为张芝明（张太雷之子）、赵令超（赵世 炎长子）、赵施格（赵世炎次子），后排左二为郭志成（郭亮之子）

接受了统一战线思想的蒋介石，派他的私人飞机送周到兰州。蒋作为公认的中华民族抗日领导人和莫斯科关系密切。周带着夫人和养女一同前往。

毛利用这个机会把现在已不需要的德国军事顾问李德送回了欧洲。由于天气不好，整个航程用了3个星期。在莫斯科，周代表毛对

李德在30年代所犯的“错误”提出起诉。毛要把李德从第三国际驱逐出去，按李德的说法，“如果可能的话，就杀掉”。结果李德得到允许，退休回到德国老家。

关于周从1939年9月到1940年3月在莫斯科度过的6个月很少有记载。据一位同事告诉我们，周在第三国际发言时说，中国政治的现实性必须认清，农村是革命力量的中心。“第三国际一些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同志对此却感到惊讶，并表示不赞成。”春天，周这位独特的游客，身穿一套粗呢西服回到了中国，带回了一架放映机和5部电影胶片（包括《列宁在十月》和《高尔基的青年时代》等）。他们在延安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放映。周和毛坐在一起讨论这5部电影。随着电影的进行，他把俄语译成汉语，并即兴讲解。他自己操作放映机，是想让人们知道他的手臂好多了，但实际上很显然没有痊愈。尽管他经常按摩，但还是感觉写字困难，时常隐隐作痛。



1940年3月，归国后的周恩来在延安所住的窑洞前锻炼臂力

不久，周又去向外国人简要地作了共产党人对40年代中期的战争局势看法的报告。战争陷入了僵持阶段，日军占领了少部分但十分重要的地区，中国没有能力将他们赶走。周告诉美联社的杰拉尔德·萨姆森，战后还将继续同国民党合作。他特别支持毛的关于游击战的理论，他说这个理论“最适应现在的国家经济状况”。游击战能严重地破坏日军的通信线路，“使他们必须为此在占领区驻扎大批军队，花费大量资金”。在认定常规战和游击战具有同等效力之后，周最后承认了毛所强调的游击战的正确性。

猪变成鸭（1940~1943）

1940年的一天，周请美国作家白修德在一家饭馆吃饭，主菜是一头金褐色的、肉皮松脆的乳猪。周自豪地拿起筷子，做手势请客人先吃烤猪的脆皮。白修德畏缩着放下了筷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解释说，作为犹太人是不能吃猪肉的。对这些未开化的习俗表示惊异的周的助手们为自己的失礼而吓坏了，并且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没有能力换一道可以和这道菜的美味相比的菜了。周拿起筷子再一次邀请客人，他指着桌上的盘子对客人爽朗地笑着说：“特迪，这里是中国，再看看，你瞧……这看起来像猪，但在中国这不是猪—这是一只鸭。”

白修德大笑起来，其他人也都笑了。这个美国人把筷子插进去，夹下了一块脆皮。用他自己的话说，“吃了第一口真正的猪肉，以后就开戒了。但愿我的祖宗能原谅我”。

周的这个令人神迷的促使他人打破旧习惯的举动，对另外的人物可能就不会起作用。但是，这次他的外交才智却使他成功了。这是1940年至1943年3年战争年代里周度过的一个并没什么特别的傍晚。那时，周正代表着共产党的利益驻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3

年期间，他建立起了不寻常的权力，不仅充当着共产党的特使，而且几乎是出于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良知，在发展着与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的关系，努力赢得中间派。

他的总部设在重庆市中心一间残破的旧房子里，对着大街没有窗户，但冲着院子的方向却有一个阳台。

在盛夏的夜晚，他可以向远方眺望，从一排排伸向前方的屋顶一直看到远方的峭壁。在那里，嘉陵江把它那褐色的江水都倾进了扬子江。

一个美国人描述道，这里是曾家岩50号，在一条鹅卵石铺成的泥泞小巷的尽头，窗户上糊着黄色的纸，屋内炒菜的油烟使窗纸也有些油腻。白修德发现这是一个“寒酸的地方，下雨时小巷的泥就没过脚面，接待室的地上也被踩得到处是泥”。楼房有些地方被日本炸弹给炸坏了。



重庆时期的周恩来

周最亲密的助手叶剑英来后，不得已住到了阁楼上。阁楼上没有窗户，在重庆的这种天气里，更使人透不过气来。为使空气流通，叶在棚顶上开了一个小洞做天窗。住在下层的人提醒叶，要是下雨，屋里就要发大水了。果然，叶的活还没干完，周的房间就被淋透了。人们看到他无可奈何地打着一把伞坐在床上。

曾家岩50号住着一些正派国民党人，另外还有一些特务在监视着周。周的门外是厨房，那儿有个雇员把周的一举一动都向上报告。小巷里的每一个小铺和小摊都是国民党的情报点。国民党秘密机构的头目亲自住在周的附近，监视着每一个走过周门口的人。这样的密探监视一直持续了下去。正如他的助手们后来说的，在这种气氛中，“他身在虎穴，但泰然自若”。

警卫员们做的饭菜，明显使人食欲陡增。有些客人吃过之后，说他们“尝到了延安的风味”。人们知道周每天早晨要上街买一个鸡蛋煮熟当早餐。他还有一个习惯无法改变，在重庆的一个警卫回忆说，周总是把报纸带到厕所里去读。现在保存下来的他在重庆的一些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封面上都有他的亲笔签名和日期。在重庆的生活接近于周参加共产党前的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有时也许并无二致。南开大学[19] 撤到了重庆，所以他能够拜访张伯苓博士和周的老师、南开的注册主任康。



1939年，周恩来和董必武（前左）、徐特立（前中）、林伯 渠（前右）、秦邦宪（后左）、叶剑英（后中）在重庆。

一次，周和夫人去南开吃午餐。当时也在那儿吃午餐的一位客人描述了张博士怎样“显得为他的这个任性的学生而感到自豪”。这位身材修长、英俊潇洒、有着两道浓眉的政治家，他的谈话生动有趣，举

止得体，赢得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注意，周在与其他客人饮酒时也被看做是一个好对手。

周知道怎样体贴自己的部下。在重庆的一次宴会上，他问女主人他的司机是否可以入席就座。她同意了。当司机被叫来时，他正利用这点时间缝鞋底。

周在敌人的营垒里生活，身体上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国民党却编造故事诽谤他。诸如他和体态婀娜的年轻电影明星陈波儿的罗曼史等。尽管有这样的谣言，他还是以他作为丈夫的忠贞不贰的品格在党内成功地保持了荣誉。

更重要和更令人头疼的是他父亲贻能的再次出现。他父亲一直四处漂荡，干着挂名的差事，过着窘迫的生活。身无分文又无职业，老人来到重庆求周帮助。据说当时周只是每月给他父亲一笔不多的30元的补助，但那点钱连老周每天喝酒都不够，此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

重庆的外国人对周的印象较深，埃文斯·卡尔森在一篇报道里将他描述为“一个高级官吏的后裔，一个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充满着如此高尚的品格和谦恭的思想”。较有影响的记者，像杰克·安德森经常应邀到曾家岩去吃饭。周会见过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

周告诉他新结识的一个美国朋友：共产党中国愿意同美国结成友谊。许多美国人对周比对蒋及其同伙更热情，这就造成了麻烦，即战后美国国内怀疑自己的外交官在中国受了中共的蒙骗。

与此同时，周抓住每一个机会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从朝鲜到印度，他很后悔在尼赫鲁访问中国首都的时候没能见到他。的确这是一个失去了的重要的机会，如果亚洲这些有很多类似之处的民族主义领

导人在这个时期就获得相互理解和对对方的好感，尽管他们此时都还没有担负起政府的职责，那么，20年后的中印对抗是可以避免的。

不久前，周被任命担任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个职务，紧接着又重开他15年前在黄埔军校和蒋介石合作的先例，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同时，他又是共产党南方局的书记，负责国统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华北他赢得了抗日民众的支持，同时在华南又赢得了反蒋人民的拥护。除此之外，他还负责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

周在谈判方面的才能要胜过党内其他同事，不论是同国民党谈判，还是同外国人谈判，都是如此。他深谙国际事务，和政府官员关系较好，英语流利，他的性格又特别适合这类工作。许多共产党人是带着一种要争吵的架势来到谈判桌的，但周却保持着一种适当的理智，当形势不利时他就摆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打算从对方那里赢得同情心。

白修德称他为毛的“塔中的侦察机”。然而，当时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是复杂的。当周在重庆做特使时，其他人特别是刘少奇正忙着赢得毛的青睐，帮毛建立忠实于他自己的党组织。按苏联观察家弗拉季米诺夫的说法，毛曾经批评过周是经验主义者。然而，周一再宣称自己是忠实于毛的。几个月后，别人引述毛的话说他完全信赖周，并依靠他的支持。王明自己有过记载，说毛一边称赞周的管理和外交天才，一边暗中抱怨周在党内比毛更受人拥护。这些混乱的说法，不可全信。但它却引起毛的自卑感和不安感，再加上周的斡旋调解的才能，使毛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周在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在重庆的那些年中，周创立了一个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及1949年以后作为北京传播工具的编辑机构的核心，他很好地利用了由于国民党专制独裁而造成的非共产党人士日益增长的对蒋离心

离德的机会，同许多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建立了联系。这些人后来都投向了1949年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填补了共产党在管理界、教育界和商业界的许多空白。



1940年7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左四）、邓颖超等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

重庆的许多小政治团体，开始不支持共产党，但在周向他们宣讲了共产党将保证进行下列改革：直接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自治和从乡村一直向上都实行人民代表民主制以后，他们表现出了兴趣。最后，周帮助他们组织起一个倾向共产党的联盟。他们很多人在人民共和国的早年颇有作为。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人时，他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一个美国人想知道共产党会不会废除宗教。

周说：“中国共产党尊重各种宗教，允许有各种信仰。”

1940年圣诞节，卫理公会教徒蒋介石请周吃晚饭以感谢4年前周在西安救他一命之事。他双手紧握周的手，一向沉默寡言的委员长此时异常激动，称周为他所认识的最有理智的共产党人。后来，周回忆说：“他这是在恭维我，我讨厌他的恭维，这只能让我多加提防。”他借机委婉地抱怨蒋不民主。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及此事时，周说，“他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民主？’”

饭后，周评论说：“事实上，我被感动了。只可惜人的情感，尽管真诚，但也无法弥合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在这顿有希望重归于好的圣诞宴会过了几天以后，国共脆弱的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崩溃了，安徽省附近的新四军和国军部队展开了一场灾难性的交锋。周立即向全世界宣布，在新四军执行蒋的命令北上的途中，蒋伏击了他们，官兵被杀，叶挺被禁。

当皖南事变的消息通过延安电台传给周的时候，他正在开会庆祝《新华日报》创办3周年。这张共产党的报纸连夜把周关于这个事件的文章赶印出来，但却被国民党查扣了。报纸以开天窗来表示沉默抗议。其中有一处填上了周奋笔疾书写下的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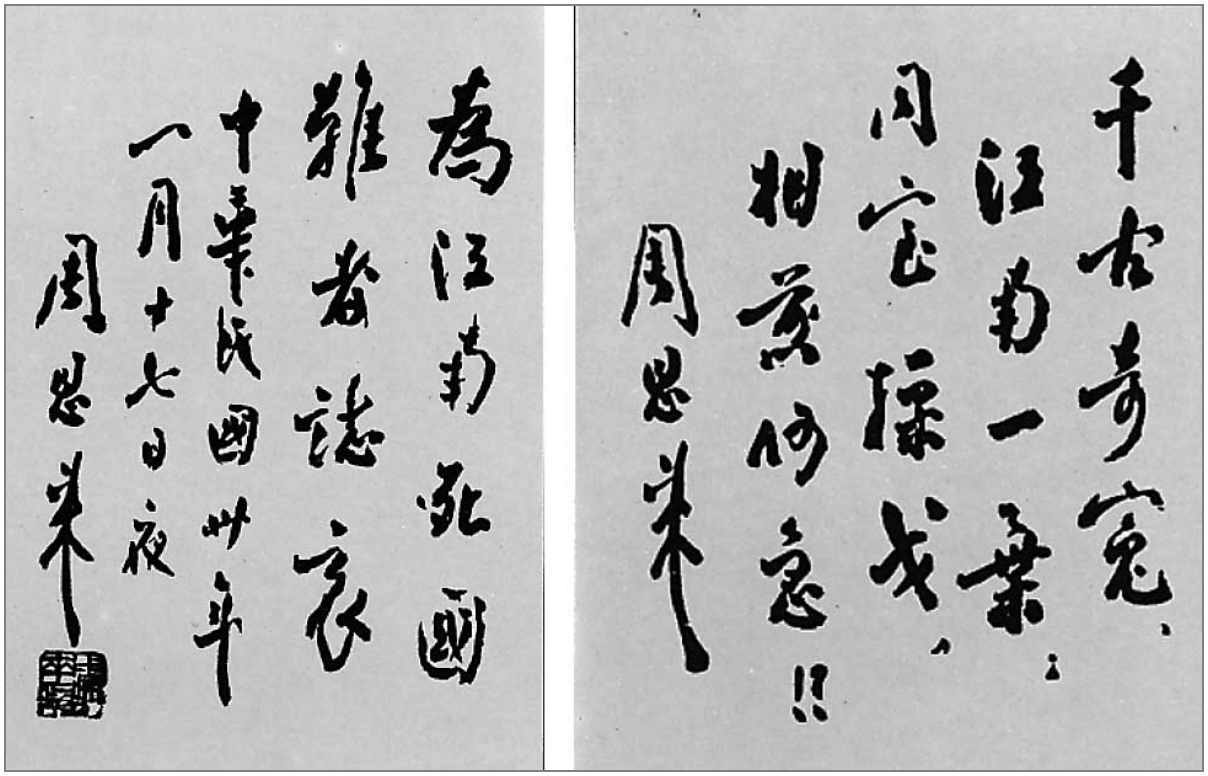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那天晚上，周亲自上街把报分发给人们。在他逝世以后，人们以此为素材创作了话剧《报童》。



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书写的义愤填膺的题词和诗，揭露国民党顽 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

向蒋提出抗议之后，延安的中共中央担心周在重庆不安全，来电报要他回延安。但是周恩来回电说，他要在重庆坚持斗争下去。延安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

现在，蒋介石与共产党之间处于完全僵持的状态。周感到特别悲痛，因为蒋曾在圣诞宴会上答应保证新四军北上的安全。当周听到这个事件的消息时，他给蒋打了电话。蒋说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的事。有人问周，蒋是否在说谎，“不，”周说，“有人对蒋说了谎，但是蒋在某种程度上也说了谎。”蒋说谎是因为他想在各党派中加强地位，蒋在利用全国的矛盾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周同美国人谈话是希望给蒋带来间接的压力。1942年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在纷纷对中国将领们拒不执行他们没有经验的美国司令的命令提出斥责时，周告诉美国人说，只要委员长愿意，他周恩来愿意率领共产党部队重新去作战，“我将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像这样合乎美国主张的灵活请求还有不少。

1941年春，周进行了一次有煽动性的露天演说，很有吸引力。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韩素音的有一半华人血统和一半比利时血统的小说家。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她坦率地说，周没有“演讲的天才，但他通过他那真挚的诚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她看到他“面颊清瘦，头发浓黑，非常镇静，十分英俊。手势轻快而灵活”。她的第一个感觉是，他给人一种“聪明、自信、脚踏实地和克己自制的印象”。他站在一块凹地中间的桌子上，双眼镇定地环视着人群，演讲了足有4个小时。“那是一次人们所听到的最简明易懂的，条理最明细的，最朴实无华的，也是经过煞费苦心准备的演说。”周对国共两党的争端感到痛惜。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他强调说，“无论这个兄弟间相互残杀的悲剧是由什么引起的，我们都应该忘记它。从现在起，我们要向前看。”

他穿着一件新熨过的土黄色军服，没扎腰带，也没戴领章，但穿着一双擦得铮亮的皮鞋。就是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到了他养母被冷落了的墓地。

“我的母亲，我欠了她很多很多，可她的坟墓在日占区。我多么希望能回去清扫她坟上的落叶啊。这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浪子所能为母亲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连这也做不到。”多么感人的演讲啊，他使每一位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

1942年夏天，周突然病倒了，不得不去国民党军事医院做前列腺手术。一个美国来访者看到，他躺在一间墙刷得雪白的小屋中一张用绳索编成的“弹簧”床上。后来他的警卫员用他最喜欢吃的鲽鱼来款待他，周边吃边抱怨太贵了。

与此同时，毛在延安发动了一场毫不调和的整风运动，意在铲除党内的错误思想，而实际上却成了要在这场重大斗争结束后召开的党的会议上，使毛在6年前长征危急时期获得的临时领导权得以合法化和永久化，以保证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筹备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周恩来



周恩来父亲遗像

为此，毛急忙把周从重庆召回。在已经持续了一年半的整个整风过程中，只有毛和刘少奇两人未被触动。这样，仅次于这两人的最高领导人周，就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处境。有资料表明，在一些会议上他被指称为“经验主义者”应受到批判。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像毛、刘要求的那样去咒骂王明和他的布尔什维克。这场整风运动是土生土长的毛泽东思想和苏联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最后阶段。周支持毛，在这布满地雷的区域里，他每挪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周并非犹豫不决，他把旗帜坚定地举向毛泽东思想，给别人做出了榜样。在延安，他对他的同志们说，党的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是正确的，共产主义—

不但适应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

周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场运动，逐一检查自己的错误，并给自己订了七条要则。第一条是“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第二条是“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最后两条要则是针对个人修养提出来的。其一是永远不与群众脱离；其二是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但这两点周却难以做到，尽管他爱交际、有理性。

此时，周在党内的地位并没有由于父亲的死而变得宽松。周按家里要求的老习惯，在共产党报纸上发了一份讣告。这是周仅有的一点孝心，对这个在他还不到1岁时就把他送出去的人，除了尽了这点勉强的礼数外，他再没做什么。然而就是这样，共产党也还有人皱眉头。

1943年，周仍在重庆，与国民党处于谈判中。7月，他回到延安。周从蒋管区开回了几部车，车上装满了文件、包裹和铺盖卷，最后一次走出了曾家岩的老房子。

当周的车从世界性城市重庆经过几个省回到与世隔绝的共产党根据地延安时，他不能不考虑到他的政治前途，以他的智慧去支持毛。

赢得胜利（1943~1949）

由于党内对毛近乎献媚的称颂和毛对自己所不赞成的东西实行的粗暴政策，延安陷入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周恩来在一次欢迎他归来的会议上对毛颂扬说：

共产主义……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

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并把所有这些问题毫不犹豫地交给毛处理。他清楚地知道应在什么时候退让和怎样退让，唯一的例外是关于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继续下去的问题，但即使这时周也没有公开为他在重庆就有的深思熟虑的想法进行游说，而是婉转间接地向全党说明继续与国民党合作有利于党的目标的实现。

但是，周在这次讲话中许多方面是不够老练的。他在谈到他离开延安3年来国内国外的变化时说：“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他用不老练的提法谈到毛的反对者：“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他们错了。”在表面上那是无懈可击的，但在这次含糊其辞的讲话的末尾，他又用原来的口气赞扬这次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他最后说，“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在政治局会议上，周报告了抗日战争的进展情况。很明显，他过去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宽恕，他常常与王明和28个幸存的布尔什维克一道遭到指责，在有些同志看来他能否幸免也许还成问题。“国际主义”一词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所有这些领导人想威胁毛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错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中这种观点只能是有害无益的。

然而，不管他的手下遭到怎样的对待，周与毛的私交却似乎很好。由于自觉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和不失时机地表达了对毛的热烈拥护，他得以幸免。

周在延安是一个独特的人物，无人可与他匹敌。一位观察家注意到，与其他领导人相比他显得非常整洁，“他的衣服不显臃肿，看起来很合体并熨得平平的”。一个俄国人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发现周吃得很少，是唯一的一个喝不醉酒的人。周关心每一件事，倾听每一个人要说的话，并时常亲切地拍拍与他谈话的人的肩膀或握握手。他在宿营中是最勤快的人。他的私生活堪为典范，他的妻子邓颖超为他的形象增添了朴素的特色，邓颖超形容他们在延安的住处是“他们婚后的第一个家”。周的办公室是一间闲置的窑洞，里面放着粗糙的木质家具，家具上刷着黄漆，闪闪发光。

在共产党内，只有周主张与美国人作进一步的和有效的接触。在这些美国人中，任何一个人都能在战后中国的政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一个苏联同志写道，除了与美国人的关系外，他“甚至对英国也有很大的好感。他帮助一个英国贵族从重庆带回了给他儿子的信，此人的儿子是一个激进派，在延安电台工作。同时，他还带回了一批中国的追随者，这些人在经济、政治和国际事务上的能力和才干在党内是无人可比的”。

这时在延安有一个美军观察小组—人们都把它叫做“迪克西小组”—它后来成了周工作的焦点。毛需要与美国人接触以证明他可以不依赖莫斯科方面的对手，周成了毛与迪克西小组联系的必不可少的助手。

周的冷静给这些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与其说像个患霍乱病的人，不如说更像个患结核病的人……将持续不变地衰败下去……不会突然破碎和垮台”。周把蒋介石形容为机会主义的流浪者，“被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货和二流货包围着”。周自然得体地做每一件事，鼓动美国人给红军更多的支持以便在北方打败日本人。

在党内领导阶层，周处于包括王明在内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上，除了毛以外他仅次于刘少奇—他与湖南农民出身的毛有着共同的背景，具有组织政党建设的天赋。40年代当刘在敌后吸引着大批地下追随者时，周则领导着南方和西部的共产党办事处。在那儿，工作人员要受到国民党的监视，正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的那样，“后来，周在新同志中的追随者远远比刘要少”。

到1944年3月，周在延安的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中，首次披露了他4年前去莫斯科说服苏联人相信中共新的农村根据地时，他们嘲笑了他一通，他本意是树立起他自己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由来已久的、坚定的信仰者的形象，但后来他又回忆说：“毛泽东同志也花了时间去认识这个问题。”他解释说，直到1928年，毛还坚信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在城市……所以说，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不同意毛和他的助手标榜的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

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周解释说布哈林曾要求毛离开红军，周回国后正式转达了这一意见。而实际上，毛拒绝离开。但这一切不久便烟消云散，因为中国南部的局势变化使得有必要壮大共产主义队伍，而

这就有用得着毛的地方，但如实地陈述党的历史，就会被诅咒为动摇毛的地位，同时又使得毛对周的意图心存疑虑。

另一个戏剧性的插曲是，周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突然对毛的主要代理人，一个叫康生的讨厌人物在整风运动中的做法进行了抨击，尽管没有人喜欢康生，但周是当时党内唯一勇敢而正直地站出来指责他滥用职权、违反整风运动的原则和采取不正当方式取悦毛的人。在20年后“文革”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谈话中，周召集他的战友说：“你们受冤枉了！你们是清白的！”

毛对周的批评保持沉默，当然这毕竟还没有触及毛自身。毛也许察觉到整风运动产生了违背初衷的影响，于是准备作出一些牺牲以便维护自己的权力—利用周作为他的代理人。

周在10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丘吉尔极想知道中国得到美国全力相助却节节败退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国民党拒绝进行政治改革。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当时在场，他注意到周的接见不如朱德将军热情，朱把他安排在讲台前面。周的语言简洁明了，但也许是他的讲演太正式和拘谨，“没有获得像朱将军似乎毫不费力就引起的那种热情的反应”。

周采取新的强硬立场的另一个迹象是他开始疏远他敬重的校长张伯苓。张曾质问周，为什么共产党报纸是唯一没有庆祝南方一场大的抗日军事胜利（国民党取得的）的报纸?



1944年8月，周恩来和叶剑英（左二）等在延安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左四）交谈



毛泽东、周恩来离开延安时与赫尔利、张治中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住处前合影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两党谈判又一次活跃起来。1944年年底，周和美国大使一起飞到重庆。在机场他与夫人吻别，一个外国记者报道说，这是“我在公众场合下见到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表达私人感情的难得的一次”。周在重庆度过了1945年1月下旬后的三个星期，但一无所获。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也不愿放弃任何政治和军事权力。

周没有交好运，没能受邀请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总统。1945年年初，迪克西小组报告说，毛和周想同总统会谈，但周奇怪地一反平常小心谨慎的做法，劝告延安的美国官员不要让赫尔利大使插手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不幸的是，当这条消息到达重庆时，魏德迈将军不在城里并让他的参谋把这一信件交由赫尔利大使处理，所以赫尔利读到了周对他自己的评价，这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算作要优先处理的信件，赫尔利直到很久以后才把周的请求作为其他东西的不重要的附言转到白宫，这是可以原谅的。如果处理得更好些，罗斯福有可能会受到周的影响，迫使蒋介石交出一部分权力。

然而，周与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谈判技巧是完美无瑕的。一个国民党谈判对手评论说：“他能巧妙地转移话题而往往令人觉察不到，当然他也作出让步，但仅仅是在最后时刻做无损大局的妥协以维持谈判的进行。”

在这些情形之中，周的表现是否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有些相像呢？如果是，那么也做得如此出色以至于你会带着这样的印象离去：他对谈判过程中每一次进展的情绪反应都是真诚的，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正直的人……共产党将在大陆取胜，但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周在谈判桌的另一头的表演来取胜。

有一次，周在辩论中没有考虑好如何反驳对手就讨论的问题而提出的论点，因此他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表，提出他必须赶赴另一个约会，并要求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下一次会上。当下一次会议正式举行时，周的一个同事出现在他的位置上，但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因为他未被授权在该问题上表态。

1945年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毛作为党的领袖，但周还是重新成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成员。毛仍然在闭幕式上把周安排在他的左边坐下，这实际上等于公开指定他为刘少奇之后的第三把手。



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这是他和毛泽东等人在大会主席台上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后，周陪同毛去重庆参加两党的首脑会谈以决定中国的前途。中国在盟国的帮助下击败了日本，但战后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在延安的观察家描述说，周在出访前“积极地准备文件，发出指示和协调各种事情”。

在去重庆的途中，周把自己的太阳帽送给毛，使毛能抵御南方灼热的阳光的照射。在滞留重庆的日子里，周勤勉不懈地工作，保护毛不受国民党方面的伤害。尽管国民党答应保证毛的安全，周还是亲自安排毛的起居食宿、行车路线等，他陪同毛四处应酬，因而实际上很少睡眠，每道饭菜都要经过周的仔细检查，他代表毛干杯以防有人下毒，或像丹尼斯·布鲁沃斯所说：“使毛保持清醒。”

经过6个星期紧张的谈判，毛和蒋委员长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在联合政府问题上达成了妥协。谈判期间，周扮演和事老的角色。当共产党代表团中其他人对毛的意思反应迟钝时，周就加以强调使之明了。最后，共产党接受甚至表示支持国民党执政，因为“民主联合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

但他又愤怒地指责国民党对他们的不信任，不承认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正当权力。更为令人难堪的是，他邀请国民党代表到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去做微服访问，以使他们对地方上对共产党的支持有一个正确的评估。

我们悄悄地去，你可以听到村民们私下的聊天，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庄户人的歌声，你就会知道他们拥护延安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而是因为我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请原谅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一个民兵和一个村姑待在一起，我敢以生命担保，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是在谈情说爱，但绝不会是私通。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时受到各届人士热烈欢迎

毛不久就回到延安，周留下来继续斗争，完善协议中至关重要的具体事项。10月初，他差一点遭暗杀：一个共方的工作人员乘坐周的车返回时遭枪击遇难。这次谋杀的谜底从未揭开，但看来像是国民党某些派系的阴谋，他们要暗杀周以达到破坏谈判的目的。[20] 这次张冠李戴的暗杀也许起到了一个相反的作用，因为两天后两大对立力量在一次协商会上达成了协议。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 周恩来、王若飞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12月，周率领共产党代表团去重庆参加协商会议，而乔治·马歇尔将军也来华执行和平使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意停火，但马歇尔发现他在周和蒋介石之间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不起作用。有一次，当他向周解释蒋介石的最后要求时，周扼住他自己的喉咙，用一种近乎窒息的声音喊道：“他们想叫我们去送死！他们想叫我们去送死！”周清楚这种夸张的表演不会导致国民党内蒋所依赖的强硬派真正地与共产党和解。如果他代表共产党所作的努力会最大限度地增加外国的同情，那他就十分满意了，而他后来设法达成的停火协议为他的政党加强地方力量赢得了时间，从而把八路军从国民党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中挽救出来。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周号召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午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相信人民，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依靠人民和造福于人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无愧于它作为五大强国之一的称号。”他重申，如果作

为一个政党的应有权力得到承认，那共产党就愿意在中国扮演一个次要角色，“我们拥护蒋先生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他还对大会说，“不仅在过去的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战后的年月里我们仍将这样做……我们承认国民党是最大的党”。

拟定的条款包括结束两党之间的战争、改组政府和军队、修改宪法，大会还同意在5月召开国民大会。

周飞回延安与毛商量，两天后又回到重庆。在这架双引擎飞机上随他一起飞回来的有一个11岁的小姑娘—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女儿。国民党曾把叶不公正地监禁起来，叶的女儿是去会见她刚出狱的父亲的。飞机经过一片冷空气层时机翼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飞机本来已经严重超载，这时开始失去高度，机长命令把行李扔出去，周帮忙把提箱扔出舱外，乘客还被告知系好降落伞，小姑娘由于她的座位上没有配备降落伞而大哭起来。在这个时候，周穿过起伏不定的机舱，解下自己的降落伞系在小姑娘的背上。“不要哭，扬眉，”他说，“要像你父亲那样勇敢，你必须学会与困难和危险作斗争。”后来，他们飞出冷空气层到达重庆。这个故事人所共知。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把首都迁回南京，周也移居到那里的梅园新村。他在重庆的送别会上说：“我已经36年没有回老家了，我母亲坟前的白杨一定长得很高了。”离开炎热的重庆，他来到一个街道上还残留着垃圾的城市。他在那儿的许多用品—一顶帆布帽，一只破旧的皮箱，一把转椅和代表团送给他的被子，以及他那黑色的别克牌轿车—现仍陈列在南京。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在武汉以北进行的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的军事调停工作。国民党正在那儿骚扰共产党部队。周的吉普车在大雨中行驶，途中被泛滥的河水挡住了去路。他在一间老式的乡下房子中过了一夜，喝的是大米粥，睡的是木板床。第二天一早起来，河

水水位还是没有下降，但他决定越过山区到处于困境中的共产党部队中去。当地的农民把他的吉普运过河，周脱下长裤和鞋，蹚过差不多100码宽的齐腰深的水到达对岸。

回到南京，周面临着又一次危机，国民党在满洲的行动破坏了停火协议。当美国大使给周带来蒋介石对这一事件的“让步”时，周“把身体移到椅子边，专心地听着，埋着头以一种压抑的沉默想了很长时间”，然后开始“苦笑……轻轻地摇着头”。即便美国人对蒋介石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无济于事。

周绝望地争取全面停火。“过去20年里我们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但没有找到任何最后的解决办法。我敢断定，即使我们再继续打上二十几年，仍然会毫无结果，战争必须停止！”



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群签署 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等文件同时公布。这是周恩来在美国调处代表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住处签字时的情景

挫折对于在两个根本就不打算使谈判成功的大党之间的中间人来说是伤脑筋的。由于经常受到国民党首都那种玩世不恭和自私自利风气的影响，周开始忘记延安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甚至失去了对一些小事的公认的耐心，而他和乔治·菲奇的一次接触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菲奇是一个长期待在中国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热心人士，周在1946年7月去郑州处理又一起调停事务时，菲奇写信邀请他去关心一下黄河边上开封附近的基督教机构提出的问题，他们要求控制这一地区的共产党政权做更多的修复黄河大堤的工作。

当周到达时，菲奇已经给自己准备了一个行军床，而把自己的床腾出来给贵客。他在几年前会见过周。

“我有些吃惊，”菲奇回忆道，“我发觉他与我以前所了解的那个周恩来有了很大的不同……从前他穿着朴素，而今他穿着一套新做的英国花呢西装，穿着丝绸内衣和短袜，他的旅行包是上好的皮革做成的，他还有一个金质的玩意儿。”

“他没有感谢我把自己的床让给他而睡行军床—这对一个从老式学校出来的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他本应竭力阻止我这样做！他的整个态度现在也不那么友好，在3天会谈期间，我们哪儿都没去，他完全支持派到我们委员会的‘共产党顾问团’。”

不容置疑，周觉得他的一切精力都仍然应该放在与国民党的周旋上，如果他在这些对大的历史进程无关轻重的事件上引起地方共产党的敌对情绪的话，那么他就会因为削弱了共产党内部的团结而使得这些谈判更加困难。至于改换衣着，无疑反映了他在高消费的世界性都市的生活，在那儿这类情况对职业活动来说是必要的附加物。奇怪的是他到小乡镇去旅行还穿着它们，而这在那儿显然是大可不必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1946年，周恩来和国际友人在一起

在南京他与自己的亲戚们联系上了，这里毕竟离他的出生地很近。他早早地就探望了他富裕的六叔。周从他那儿得知，他那敏感的居住在上海的婶婶已从战时隐居到家里。他们是1939年逃到那里的，因为有谣传说日本人已经知道他们和周的关系了。后来，据说周有一个弟媳来办公室看他，他丢下所有工作来迎接阔别了15年的她，甚至取消了与马歇尔将军下午的约会。他急切地询问他婶婶的健康状况、侄女和外甥在上海的读书生活情况。弟媳对周说，她相信婶婶对他一直离家在外颇为不满。

他们两人前去探望六叔时，他正在睡午觉。周坚持等他醒来，而他们则静静地等着。“你知道六叔的脾气和他午觉睡得不稳的习惯，”他提醒说，“他可能会听到说话声，那会打扰他的。”



周恩来夫妇与六叔周嵩尧在一起



周恩来的二婶程仪贞。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曾多次住在二婶处

9月，周前往上海，因为国民党在南京拖延和破坏谈判。这次，他更多地涉入私事，多次去探望弟媳和婶婶。有一天，他们听说弟媳

的父亲碰到了麻烦，家乡的共产党正在整治富裕的地主，她的父亲属于整治的对象，所以要求周在这件事上帮帮忙，但周却无动于衷。

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请求，弟媳终于与她的父亲见了一面。她回来后说，他临终的愿望就是要她不要再与周家的任何成员见面。极度悲伤的弟媳和婶婶一起怒冲冲地闯入周的办公室，周不得不忍受她们对他的无情和对共产党的愤怒斥责。后来弟媳离开婆家，生病住进医院，婶婶在那儿和她做伴，而周竟能使得自己即使在最恶劣的气氛下也是受欢迎的，他成了一个常客，陪他的婶婶坐坐打发时间，谈谈有关孩子们的事。

周在上海还碰到了别的麻烦，即他的住所一直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周发觉自己被跟踪时，他非常气愤。当他瞄到一辆可疑的车尾随在自己的车后面时，他要司机把车停下来，然后走下车去警告后面的司机：“你的跟踪技术糟透了，这样你会失业的。”另一次他打算去接头，没能甩掉跟踪的尾巴，一气之下他拦住后面的车，质问是谁让他们这样干的。他要求道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天他就收到了上海市长的道歉。

其他方面的情况依然如故。在午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外国记者发表共产党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就像一个美国记者所写的那样，他们“看着周，听他通过一个翻译用汉语发表讲话，假装自己不懂英语”。

周不得不对美国人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他们和蒋介石靠得越来越近。他向马歇尔将军抱怨国民党军队破坏停火，四处进攻共产党。然而，当他反对美国对蒋的军事援助时，马歇尔辩解说，这是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应有的支援，华盛顿终究只能与中国的合法政府打交道。

“你是不是有点拘泥于形式？”周问道，“难道这里没有一点虚伪的成分？你知道，每个人也都清楚，你交付给国民政府的任何东西都必定会牵扯到对付共产党军队的问题。”

马歇尔厌倦了他那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10月份作出了安排停火的最后一次努力，但周的耐心也已经消失殆尽。当司徒雷登大使邀请他会见一位国民党代表时，周回答说：“够了，委员长不可信。”

甚至连迄今为止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的几个小党都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准备屈服，三个小党的领导人给周带来了一份关于在满洲配置军队的妥协建议。他打断他们的说明大声喊道：“请不要再说了！我伤心极了！国民党压制我们还不够久吗？现在你们又要加入他们一方来压制我们！今天和平的崩溃将从你们开始！”三个客人尴尬地收回了他们的意见。

但周没有忘记此事，在一次为一个他尊敬的、正直的无党派政治家举行的告别会上，他说：“我一想到将来有一天他们三个人，还有许多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将会站到我们的对立面，你今天奉献给我的这杯美酒就变得淡而无味了。”

蒋委员长拿定了主意，相信他自己既得到国人的拥护，又有美国人的支持，一定能重新开始他消灭共产党的进程，完成几年前被日本人打断的商业。他宣布1946年11月召开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对此周进行了愤怒的反击：“和谈的大门被国民党单方面关上了。”周向马歇尔要了架飞机，带走了制止这场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的最后的微弱希望，于11月19日飞抵延安。

毛在延安的简易机场跑道上等着欢迎周，毛知道周可能会受不了西北冬季的严寒，为回报他们一起去南方时周赠送他太阳帽的一片盛情，毛把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送给了周。周现在不得不重过困苦和低

水平的生活，与此同时马歇尔也悲哀地卷起行李回国，中国各地都不再有安全可言。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痛斥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扩大内战、 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从而关闭了和平谈判大门，宣布中共代表团即将撤回延安，并满怀 信心地表示：“南京我们一定是要回来的！”

以后的4个月里，周参加了党制订的令人担忧的计划，冲出蒋对延安的包围圈。这如同长征的再一次开始，只不过更坏的是，国民党配备了大量的美式武器。先是日本人的侵略，后是美国人的抑制，这些都使得蒋介石不能消灭他在国内的主要敌人。现在他不再克制了，周和他的共产党伙伴对这一点是相当清楚的。

考虑到如果有人被俘，其他人还可以继续组成一个值得信赖的司令部，共产党领导便分散开来。毛派刘率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向东冲出

陕西，转移到河北西部较安全的山区。毛自己和周绕了一个长长的半圆向北而去。周不仅成为毛更加必不可少的助手，而且还可以用另一种越来越深的同伴关系，来更加接近这个将是他终身上级的沉默的农民。

1947年3月18日，他们最后一批撤离延安。窑洞城延安作为中国一个政权的根据地，向世界展示了10年的风采。

在此后一年中，周和毛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中常常是冒着极大的危险一起奔波。周取了一个假名“胡必成”，意指“必胜”，但胜利似乎还遥遥无期，因为他们是在敌人的追踪之下，在地形复杂的乡村穿梭行军。



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在一起

至于食物，他们不得不依靠当地村民所能提供的烧得很糟的小米饭、野菜和“榆叶糕”等东西度日。周偶尔流露出一种郁闷的自我解嘲：“这比起长征中过草地时吃的东西强多了！”

离开延安后的第三天，他们乘坐的卡车就被国民党的飞机炸坏了，他们只得改为骑马，不久周的鼻子开始不停地流血。他们只带着一副担架，原打算给毛和女同志使用的，但毛坚持要周用。在周爬上担架时，人们发现他的鞋底磨了个大洞。

“您怎么能穿这样的鞋走路？”有人说，“您的鞋垫都露出来了。”

“那不是鞋垫，”周辩解说，“我在那儿塞了一叠报纸，原以为它会坚持一会儿的。”

顺着长城，他们绕过县城，于4月到达一个脱离国民党的追踪的临时安全地带，但他门差一点在芦河陷入包围。他们不得不在瓢泼大雨之夜从一座门板搭成的简易桥上渡过河去。周冒着大雨在泥泞的河岸指挥这次行动，直到每个人都安全通过。他到达对岸后又帮助运送伤员，这是他们在迁徙中被国民党军队逼得最紧的一次。

不久，他们到达一个小山村，有一段时间他们待在半山腰的又黑又臭的窑洞里，实际上他们几乎是挤成一团，工作和休息都很困难。周找来一个树桩坐下，用他的短上衣垫上，把肘靠在泥炉子边阅读文件。周似乎睡得比毛还少。有一次夜间行军，他看见敌军经过山谷时燃放的一堆大火，便命令卫兵保持安静。

毛说道：“别担心，今天的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是我们的。”周经常彻夜在电台旁指挥战斗。太阳出来后，他出来洗脸准备睡上一两小时，发现担架队抬着伤员从战场上下来了，周立即放弃了他的打算，着手安排他们的接待、医治和饮食。

还有一次他派出了所有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去前线打一场小仗，有那么一会儿他和毛在震耳欲聋的大炮和炸弹声中，连一个警卫都没有。

尽管他起初曾是担架上的病人，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担架队员。一次，两个人抬着担架路过周所在的村子，其中一个累垮了而无人替换，周看出担架上的病人大腿伤得很重，需要立即送医院，便叫自己的警卫把累垮了的担架队员送到附近的一个医疗点去，他自己抬起担架的一头说：“来，我们把他抬到另一个村子去。”

在这一年的躲闪和战斗之中，由于糟糕的饮食，再加上疾病和紧张，周的颧骨变得突出，使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只是后来到北京安定下来过了一段时间安稳的日子后，他的面容才恢复了一些往日的风采。但到了1948年4月，奔波至少已成为过去，周可以定居在河北西部的村庄西柏坡，他和毛在那儿与刘的那一半中央机关成员会合了。尽管延安被蒋介石占领，但这时已收复了。共产党依然存在，并仍然进行着猛烈的反击。



周恩来（前右一骑马者）和毛泽东（前右三骑马者）、任弼时（前右二骑马者）在转战途中



1948年，周恩来在西柏坡签署作战命令

共产党各路头头聚集一起又掀起了一场新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对待苏联和美国的方式问题。斯大林担心引起美国人的干涉和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当时冷战的紧张空气正在上升。然而在中国，国民党在通货膨胀和共产党的抵抗下已经士气低落，共军控制了大片北方地区。经过对这些最高政策性问题进行了一年多的大辩论后，共产党决定将战争进行到底，选择了奋勇前进夺取对国民党的决定性军事胜利的道路。

尽管国民党军队拥有大批新式美国装备，但共产党也缴获了大量的日本武器，并且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了美国装备。他们能打败和战胜他们的国民党敌人。许多国民党部队既无能又士气不振，许多战地指挥官不相信和共产党全力作战对国家来说是件好事。在6个月内，

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府再一次求和，到1949年1月时局势已糟到蒋委员长不得不辞职的地步，共产党军队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几周之内国民党防线就土崩瓦解了。

周和毛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它那战无不胜的军队于1949年3月25日开进北平，并主张将这个城市定为中国的首都。许多人认为共军将占领长江以北，国民党将守住长江以南。但是，共军部队并没有驻足不前，他们在年底渡过这条大江向南方进军。国民党政府只得不光彩地渡海逃到台湾，把中国大陆留给它的第一个共产党政府。这场漫长内战的辉煌战果就连中国人都感到惊奇，现在没有人怀疑国民党是多么的腐败，而像共产党的卓越将领指挥下的士兵是多么英勇善战！这个最后胜利使解放军声誉大震，周在这支军队的组织和战术问题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近30年的斗争中，由于反动派的镇压和内部各种矛盾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几次面临崩溃的边缘。例如，蒋介石在1927年对上海工人阶级进行大屠杀，以及1934年红军进行的似乎注定是一场逃亡的长征等。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取得了统治中国的权力并开辟了一条大胆创新的社会实践的道路，党员人数此时已超过300万，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共军增加到400多万。可以说，周和他的伙伴将坐到北京皇帝的皇座上去宣布一种全新的主义。年轻人会发现它是最为现代化的，它包括这样一个目标，要把中国社会从迷信精英统治转变为真正的社会民主，但这几乎又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困难由于外界（苏联除外）不愿承认这个新中国政府而显得更加复杂，但从现在起周面前的任务是全力指导管理国家和向未来的外国伙伴求援。经过一生的造反，周在51岁时开始正式执政。

在北京，他开始狂热地工作以巩固新生政权和尽可能使它得到最广泛的支持。他提醒每个人胜利会带来的问题。他对一些中立的政治

家说，要接管国家“需要时间和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去做这些事”。“至于合格的人才，不可能由中共一党全部提供，社会各界的所有知名人士一定要参加进来……我们担心的是工作没有做好。”

他补充说，在他年轻时，他和他的同事曾提出打倒孔夫子和反对封建家长制的口号，但今天我们认识到，孔夫子所说的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拿来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如果我们的父母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应该照顾他们，“但知识分子必须改变他们的观点。”周说，“总的来说，脑力劳动者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单独进行工作……这很容易导致个人主义倾向，作家和艺术家应特别努力地学习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说到农村，他预示“在不久的将来，另有两亿农民将参加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来”。

周知道不仅要争取激进主义的支持，而且要争取自由派知名人士的支持。他多次努力说服中国的第一任总统和国民党创建人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来北京，参加新政府的成立典礼。他派宋的老朋友邓颖超去上海落实他的恳求。最后，当宋在9月到达北京站时，周和毛在月台上迎接她，并在人民共和国政府里为她安排了职务。



1949年8月，周恩来（中）和毛泽东（左）、张治中（右） 在北平火车站迎候宋庆龄。

在公开场合，周保证新政府将比以前的政府更加爱国，并将反抗美国对此施加的任何压力，“中国人民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人民……勇敢……勤劳。多么伟大的人民，毫无疑问我们热爱他们（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的优点，我们应该承认这点）”。如果美国帝国主义胆敢侵犯新中国，共产党政府将舍弃一切，“包括手纸和冰淇淋”，直至把他们赶出中国。周清楚他的敌人的弱点。

“周确定无疑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美国外交使团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说，“而且，在对美国的经济制度的认识上，他表现出一些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换句话说，周把自己同正统的对美国经济制度的教条式指责区分开来。此外，美国人对中国人民有着真正的兴趣。

一个月后，当美国外交官试图向周转达美国国务院相当消极和保守的反应时，他们遭到了拒绝。或许周在那时认为，司徒雷登大使是

与华盛顿打交道的更为可信的渠道。

司徒雷登本想在6月底访问北京，但未能成行。他收到周一封相当消极的私人信件，该信戳了一些老伤疤，周取消了对司徒雷登的邀请，几周后又把这个运气不佳的大使描绘成“惯于以和蔼可亲的面目掩盖其虚伪和欺骗”。

追溯上去，人们可以察觉出这些不断变化的矛盾。周可能真诚地为新中国寻求美国的帮助，但又不能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以致受到党内亲苏派的批评和伤害；而美国由于种种令人遗憾的原因，错过了帮助成立新中国的机会，如果抓住了这些机会，那么也许两个国家就可以避免在以后四分之一世纪中许多人为的误解。

周的直率和他那不装模作样的共产主义作风在1949年夏季中的一次讲演中大放光彩，他在北京的一次青年大会[21]上对那些共产主义的下一代谈到毛时说，毛是一个伟人，但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他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年轻人向他学习时应该“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他再次提醒说，毛也曾在农村问题上犯过错误。然而，毛已经开始美化他自己的历史，允许献媚的助手去篡改文献。这一腐败倾向在7年前的“整风运动”中就开始了。

周在讲话结束时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对毛的赞扬之词，即毛成功地运用普遍真理于中国的实际。但他补充说，为了使老百姓在这一真理中受益，必须首先通过教育和宣传来使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因此，周正确地预见了以后10年中国的政策路线斗争，表明他选择了一种缓慢而实用的变革进程，而不是向一种难以捉摸的社会主义作疯狂冲刺。

（1）应是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译者注
（2）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时党组织因不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发展党员，而未接受。后来，1927年7月，经周恩来同意，叶剑英参加了共产党。
（3）此文写于1926年3月。—译者注
（4）应为1920年。—译者注
（5）原文如此。邓出席了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译者注
（6）指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译者注
（7）指共产党员李之龙。—译者注
（8）周这时已没有国民革命军的职务。
（9）周恩来没有参加中共五大，当时他在上海。在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5月他到武汉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0）南昌举行武装暴动，是7月中旬举行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决定的。—译者注
（11）周7月27日到达南昌。—译者注
（12）纳尔逊是曾在海上打败拿破仑舰队的英国名将，他以自主作战著称。—译者注
（13）陈毅、聂荣臻当时不在，是起义军南下时赶到的。
（14）指张国焘。—译者注
（15）周11月上旬从香港到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以周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受到“警告”处分。—译者注
（16）可能指向忠发。—译者注
（17）原文如此。1932年7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时，任命周兼总政委，经周多次提议，中央局于8月8日同意任命毛为总政委。—译者注
（18）这次战役中，红军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一个师和另一个师的主力。
（19）应为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译者注

(20) 后来经调查证明这是一次误会。

(21) 指194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第三部 开国总理

蓝色睡衣（1949～1952）

周恩来毕生奔波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常常是没有一只属于他自己的皮箱。现在，他却成了一名他的家庭一直希望他日后成为的达官贵人。但是，中国以往从未见过这样一位达官贵人。今后26年里，周恩来将生活在北京，处理一些棘手的任务，这些任务不仅仅是四处奔波，而且要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他为这一非凡的目标而执著地工作着，并因此而闻名于中国的每一个城镇乡村和世界各大洲。他在战争方面炉火纯青的才干有助于他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工作的领导；他号召数百万人民揭竿而起的声音，现在得用来号召人民服从政府的管理。

第一件要做的重大事情是为中国崭新的共产党政府和国家创造各种组织机构。1949年6月，周恩来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上当选为副主任，领导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新政协后来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周恩来为之奋斗一年而取得的成果，它把从国民党里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及流亡香港的各政治团体的领袖聚集在一个松散的协商机构里，以便消除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对创建一个红色政权的计划所抱有的敌对与怀疑态度。

在筹建新国家的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同样草拟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非共产党国家应该承认新中国具有自己的内政主权，正式给予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资格。



毛泽东（左二）同周恩来、陈叔通（左一）、沈钧儒（右）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创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与他的党内同僚站在北京天安门（天国和平之门）高耸的城楼上。历史上那些携带贡品的使节正是通过这道绯红色缀满黄铜钉的城门，对帝王那漆满黄色的御座屈膝称臣的。

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内阁）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从这个时刻起，世界逐渐知道了他是周恩来—周总理。他使对立双方互为妥协的技巧为他赢得了—用老一代的美誉来形容—“太和首揆”的绰号。在政务院就计划兴建新建筑物就要拆除阻碍北京交通的古建筑问题而展开的著名辩论中，周恩来机敏地回忆起一首古诗，从而打破了僵局。在他父亲乞灵恩赐后的50年，他的名字恩来中的“恩赐”终于来到了。

作为总理，周恩来的日常工作是连续不断地办公，其间穿插着各种会议。除因少有的两三次疾病或操劳过度而短期间断外，在他生命的剩余时间里这种情况从未中止过。他开创了一种无人能够匹敌的步调，令人惊讶地参加频繁活动，每周召开各种内阁会议，并向会议作无数报告，而其细节又分毫不差。此外，他几乎每年都要到许多不同的国家访问，正像法国政治家特雷兰德提到的那样，他“扮演着黎塞留[(1)]的角色”。



晨曦初照，周恩来在工作

为了遵循政治有赖于意见一致的这一中国传统，周恩来花费大量时间征求并左右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党内同志们的，而且包括在官僚机构与整个国家范围内工作的党外人士和一些利益集团的观点。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稿连续修改了不下20次。一位来访者曾经问他，中国领导人是否

就政策进行辩论。周恩来肯定地回答道：“我们不断地辩论，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辩论。”也许，他后来对他的激动情绪曾感到抱歉。



建国后周恩来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西花厅

对那些敦促他休息的朋友，周恩来会说，他承担大量日常工作是应该的，这可以给毛主席留出时间来考虑一些重大的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他仍然保持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常常每天工作20小时。他一般是从早上9点睡到中午，以及在乘车时打打瞌睡补充一下。他的妻子绝望地说：“我已经放弃了要他多睡一会儿的打算。”如果他的确感到累了时，他就在前额上擦点清凉油。他的公文包里总备有一盒这种油。

周恩来不但没有被这种日常工作压垮，反而保持着活力。据一位美国记者报道，在平静时刻，他表情拘谨，沉闷不悦；但是据另一位

记者说，一旦他放松时，他又变得生气勃勃，变化万千，好像是他在一个令人难忘的会谈中，充当了所有的角色。一位欧洲女作家发现，他目光炯炯，闪烁迅速。眼睛是他最令人惊异的特征。每个人都感到他是令人不可抗拒的。

周恩来与他的党内高级同僚们选择了中国帝王的紫禁城旁边一块静谧的地方住下来。它位于南海公园里面，人们称之为中南海。在这极为清静的地方，硕大的雪松和松树环绕着墙院，周恩来和邓颖超过着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他刚到来的时候，他的新居显露出年久失修的样子，墙壁乌黑，房柱破裂，地面潮湿，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寒冷时，他们不得不用报纸来裱糊挡风。

周恩来经常阻挡那些建筑工与油漆工对房屋进行整修。因此，他的工作人员只好趁他出国访问之际做一些必要的修缮。一次，周恩来回来时漠然凝视着他不在家时安装的新窗帘，命令物还原样。周恩来同样不让他们换掉毗邻一座车库里的一根破裂的房梁。他说，在中国目前的贫困状态下，资源应更好地用在其他方面，如果继续使用，这根房梁肯定还会支撑几年。

与此类似，据说周恩来的工作地外交部小礼堂的通风设备不足。因此，在专家的建议下，有人决定更修房顶。“这是谁的命令？”周恩来听后问道，“这座礼堂比我们在延安居住的窑洞要好得多……只要我是总理，你们就不能改变这座礼堂。”

有关周恩来日常生活方面的诸如此类的故事还流传着很多，他在花钱方面的吝啬是出了名的，甚至在衣食上也是如此。据说，当他最后用坏了一条脸巾时，他又用它做了一段时间擦手巾；当它擦得不能再用时，他又用它来擦鞋。据称，那双在他去世后展出的打满补丁的袜子，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穿了30年，从他做总理之前一直到他逝世为

止。一次，他与另一国总理闲谈时，伸出磨损的外衣袖子，举例说明中国产品质量差，这使在场的中国外贸部长感到极为窘迫。



同郭沫若一家游颐和园（杜修贤 摄）

然而，周恩来并非什么都简朴，他喜欢他最爱吃的各种食品，如多刺但味美鲜嫩的鲫鱼、鱼和面条，等等。但是，他桌上用的谷类食物必须是未经细加工的杂粮。从而，身为总理，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许多低级官员却忽视这些方面。根据一个报道，50年代初期周恩来的月薪只有135美元。许多官员靠着各种酬劳来增加他们的收入，例如书籍的稿费。但是，周恩来却拒收人民出版社付给他这样的酬金。他秉公行事，甚至在支付因公购买的物品和所需服务项目时，他都公私分明。一个星期天，他因出国访问而走进一家照相馆照相时，他要求开两张单张的发票，一张交给他的办公室，另一张留下，由自己支付个人用的几张照片。有一次，在庐山的官方会议期间，他发现他的房间没有遮挡窗外走廊的窗帘，便自己掏钱安装了一个。

他总是拒绝他的东道主、朋友和钦佩者们赠送的传统礼物，使他们久而久之不得不对此也感到习惯。他故乡的共产党官员曾试图通过向北京寄送当地精美的土产来对他们这位著名的同乡表示敬意。周恩来将它们捆好，并直率地附上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收受各种礼品的守则，一起寄了回去。北京饭店的厨师送了半磅花生油以取悦他，周恩来将东西退了回去，并以中学校长的语气说，应先尽外国人用，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花生油。中国政府领导人过去从未这样做过。

在重庆，周恩来常常关照他的司机，尽量带他参加社会上邀请的各种宴会。作为总理，他仍然如此，继续对在他手下的工作人员表示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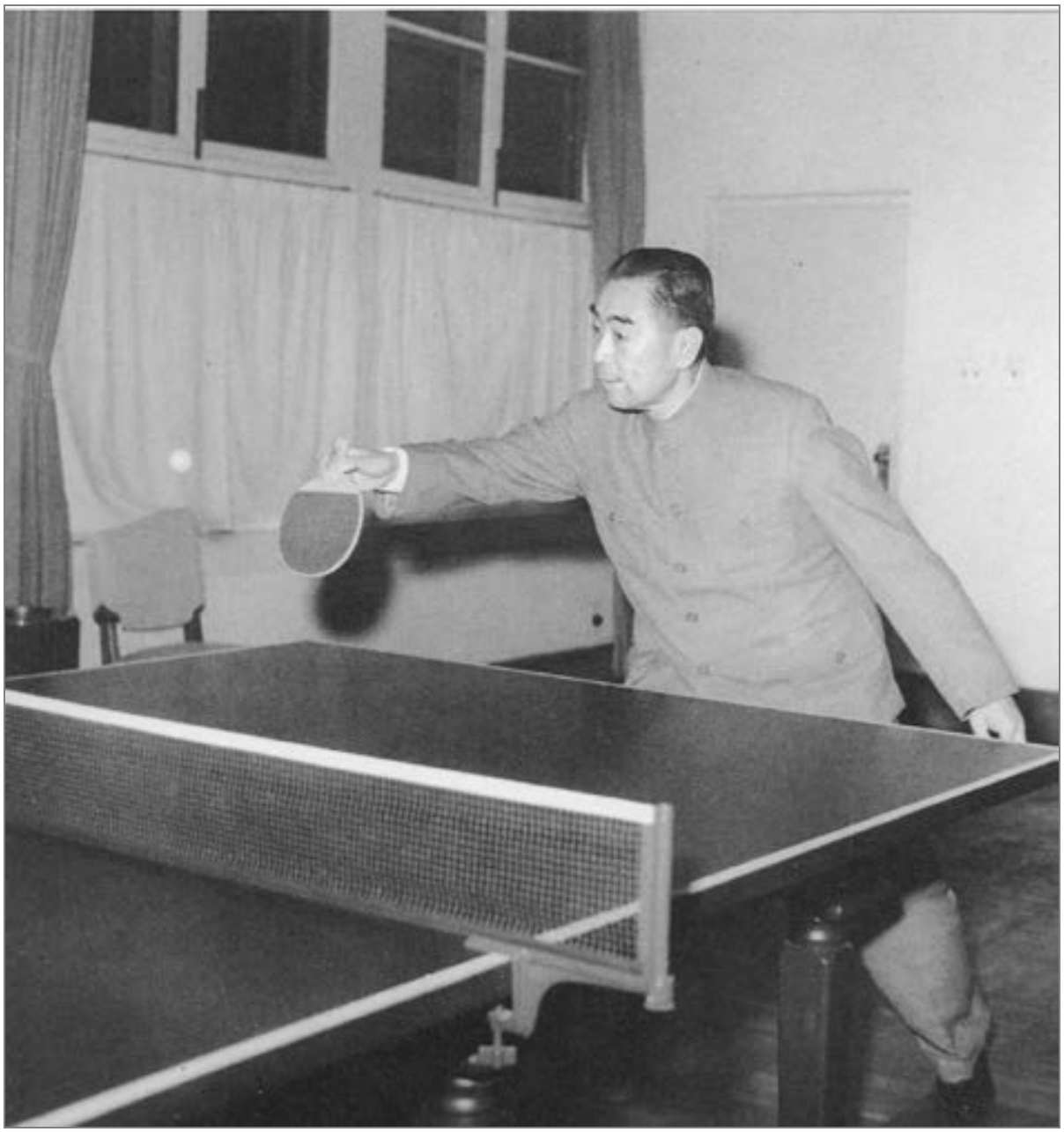
他在北京的主要事迹之一是支持一名士兵的权利。这位士兵勇敢地要求查问一名在暴怒之下打过他的高级领导成员的通行证。在一次修面时，周恩来突然咳嗽起来，结果理发师刮破了他的下巴。周恩来看到他那惶恐的样子，迅速道歉说：“我本该在咳嗽前先给你打声招

呼。”或许，最感人的故事是他对一名警卫战士的关心爱护。当时，这位警卫战士正在周下榻的海滨寓所外站岗。突然，大雨倾盆而下，周恩来的妻子撑着雨伞，腋下夹着件东西冲了出来。

“总理送给你这件雨衣，”她说，“穿上它，他提醒你打闪时不要站在树下。”

战士们最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在岗上向他敬礼时，他走上前来握住他们的手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同志，不要向我敬礼。”

或许，对一位西方读者来说，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乎令人厌烦，会使人想起一个地位不稳的人，为了使自己更受爱戴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但是，周恩来的地位并不是不牢靠，而且由于这种生活作风使他享有盛名，其中主要的动机是深刻和认真的，即要打破旧的高人一等的政体模式。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公共生活中以真诚民主的方式来严格认真地按照秩序办事。然而，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明的那样，中国社会顽固地抵制这种改革。周恩来的许多努力都成了过眼烟云。但是，他是党内同志中唯一尽力尝试将平等主义带到中国上层生活里来的人，这就是他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人喜爱与尊敬的原因。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有中国大陆的，甚至还包括台湾、香港地区和在其他国家的中国人。



周恩来在打乒乓球（杜修贤 摄）

新总理有他自己的乐趣，尽管他的妻子由于健康不佳不常陪他出席各种聚会，但50年代初期人们常看到他们在北京饭店的舞厅一起跳舞。这种行为曾被认为是非革命的，在一次没完没了地等待一批次要的外国领导人的时候，我曾看到周总理紧张地用脚尖脚跟磕打着北京机场的柏油路面，仿佛他要在地面翩翩起舞似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指责周恩来包庇一家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有漂亮的舞伴，麻将可以打到半夜。周恩来同样爱看电影，他最爱看的影片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邓颖超证实说：“不管他有多忙，他都不会放弃打乒乓球。”



至爱深情

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问他的茅台酒量有多大。茅台是宴会上使用的一种烈性中国酒，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总理不醉酒吗？“噢，不，我也是人，我妻子总嘱咐我不要多喝。但是我必须把它作为我的部分工作来做。如果酒喝多了，我就到盥洗室去，把手插进喉咙里，让它吐出来，然后我带着一杯水出来，像以前那样继续碰杯。”他对他的一位官员吐露，喝茅台的诀窍是像喝伏特加那样将它一饮而尽，不要让它沾到舌头和嘴唇上。

他竭力阻止任何努力来修复他的故居，因为过于殷勤的当地官员屡次要求这样做。他多次指示淮安县委将故居拆掉。据他逝世后的报道说：“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总理的爱戴，县委没有将房屋拆毁。”据另一项报道，周恩来就他的旧居对同乡提了三项要求：“第一，不要让人参观；第二，不要让在那里居住的人搬迁；第三，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要修缮。”

尽管他家不再在那里居住，但是他的亲戚继续让他感到麻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有个侄子在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那里工作。10年里，他忠实地遵从伯父的嘱咐，未向任何人透露自己与总理的血缘关系，当他因功入党而不得不因此透露他的近亲家属的名字时，他身边的人才惊异地第一次得知他竟是周恩来的侄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后来这个侄子与一位淮安姑娘结了婚，因此地方官员想通过安排把姑娘调到北京来工作。这是一项干部结婚的极为平常的安排。然而，当他们对周恩来提及此事时，他责问道，如果必须安排他们住在一起，为什么调动妻子而不是调动丈夫？因此，后来这对夫妇很失望地发现，他们是在淮安的一个小镇里工作，而不是在全国的首都。周恩来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让他的亲戚尽可能地远离北京居住，确保不给他造成潜在的麻烦，就像我们稍后可以看到的他侄女的情况那样。

自然，妇女权利是周恩来热忱改革的对象之一。他对上海的一个妇女组织说：“家庭是很重要的。你们不要看不起家务工作。不管怎么说，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个一人政府。你们每个人都管理着你们家庭的内政部和外交部。还有谁的工作比这还重要？”也许一位西方读者又会对此感到厌烦。但是，中国男人仍然习惯于看不起妇女。因此，这种领导是需要的。妇女权利是周恩来领导下共产党取得的成就之一。正如他在学生时代对邓颖超的行为预示的那样。



1956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在北京出席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议的客人步入宴会厅

周恩来对艺术没有多少鉴赏力。他对一位西方来访者说，如果抽象派艺术没有思想的话，“它对人民有什么价值呢？”他11次观看大型革命歌剧《东方红》一事证明了他的爱好所在。奇怪的是，他谢绝观看一个赞颂他本人的节目。

然而这一点也没有阻止他向演员和导演作一些“有益的批评”。的确，他那无休止的革新精神几乎介入了中国生活的任何部分。当建筑师们对新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感到发愁时，周恩来帮助解决了问题。大会堂必须大到能容纳1万人，既不要使人们感到狭小拥挤，但又不要使人晕头转向。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难题，是周恩来首先用铅笔首次画出扁圆形或椭圆形的图案，从而满足了这些需求。这座建筑物的

许多细节也是出自他的建议。从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毛在审阅建筑规划时，周恩来显得希望被理解这是他的创作。

另一个精明的决断是关于杭州灵隐寺的例子。那儿有一尊60英尺高的樟木佛像。按传统姿势，佛像的脚被雕成交叉形。僧侣们要求佛像脚的底部向上翘着，雕塑家却以与解剖学不符加以拒绝。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这个矛盾最终送交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来。

“雕像是为什么地方做的？”他问道，“寺庙，还是博物馆？”

“寺庙。”他们回答说。

“那么就按僧侣们的要求做。”周裁决说。他曾潜心钻研过争论的方式，然而他用一句特有的结尾使僧侣们为他也作出让步。他补充说：“把他的头发改过来，佛祖是印度人，你们把他弄成中国人的样子了。”

他甚至对小事情也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这使他看上去像个喋喋不休的保姆。如果它关系到国家大事，这还情有可原。例如当医生试用一种新眼药膏时，他先让大夫在给毛泽东用之前先给他试试。还有，他曾派一名警卫到有水管的地方站岗，以免毛泽东在开会途中被绊倒，而且过后严厉批评有关的人，说他玩忽职守。甚至当周恩来突然出现在普通列车上，或者在冬天出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时，他都拒绝别人给他让座位。他说：“我来和你们一起体验一下。”他是来观察上下班时间乘客的各种问题的。检查的结果是，他建议采用一些安全岛和其他措施来缓解交通。这样，许多自觉的领导人也跟着这样做。但当周开始在他常去的地方亲自维持交通时，比如在会议厅外和举行招待会的饭店门前等，人们便会无意识地原谅自己，认为这不是他们分内的事，而这需要的是一种热情。

一位日本新闻记者极好地抓住了周恩来的这一侧面，描写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情景。

“当他不谈话时，他的双眼从不停止转动。如果这不是周恩来，我肯定会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在受精神衰弱折磨的人。他会注意最细微的事情。例如，当一个距离很远的招待员泡茶时发出声响，他要他的翻译暂停一下。他亲自把麦克风挪到旁边翻译坐席上，然后从坐椅上向前探探身子，伸手把地板上的麦克风线拉直，似乎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彻底放好会令他感到不自在。”

还有一次，周恩来向离他很远的一位摄影师指出说，他忘记打开相机的镜头盖子。显然，他目光敏锐，酷爱整洁，但有时这些禀赋逐渐被夸大，甚至到了怪癖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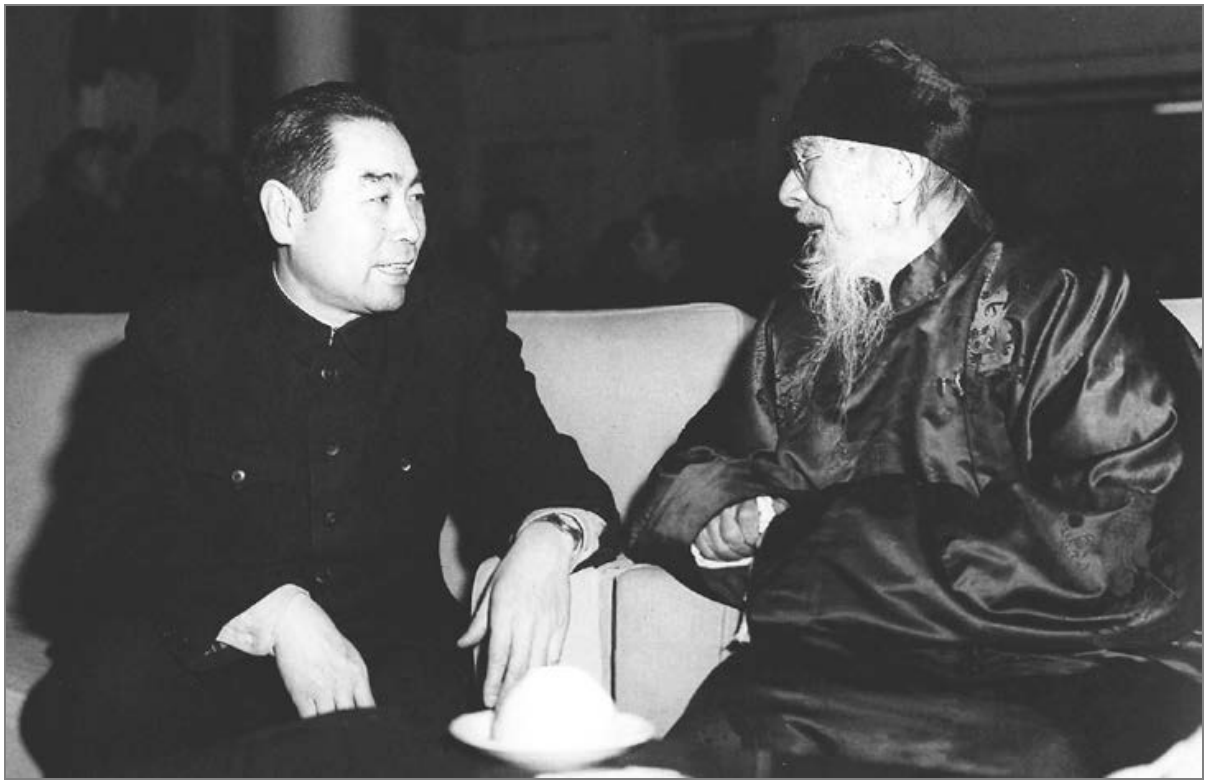
他的官员们抱怨说，他有时容易脾气烦躁。不过当他们见他在公开场合下执行公务时，又常常原谅他。其他人形容他性格多变、行动果断、从不拖拉。他喜欢不停地用手做出大幅度的活泼的手势，双眼总爱不停地来回转动。新政权一开始，周恩来给非共产党知识分子和专家写了很多封信，恳求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里工作。接受他邀请的有大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的著名学者。这些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帮助把中国改革成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也许，马寅初甚至幻想周恩来去领导一种强制可行的资本主义体制，一种周恩来在早期统战时一直预言的制度。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马寅初在失望中死去。但是，也许他们所有的人感到自己与周恩来有着一致的想法，即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统治中国一定是暂时的，未来或许会改变。在过渡时期里，旧中国培养的这种奉献精神有助于保持优良的价值观念。



1959年3月，周恩来审查人民大会堂设计模型时的情景

周恩来使用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些人曾在西方接受过教育，离乡背井地生活在海外，但现已归国。例如，他自己办公室的浦寿昌博士就是一位哈佛培养的经济学家，他归国后成为总理的秘书。当然，周恩来不能管制党内低级官员的每一项活动。有时，他的邀请也出问题。埃里克·仇的例子就是如此。仇是香港的一位青年作家。当周恩来呼吁那些爱国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帮助建设中国，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待在香港、台湾或西方时，一位曾出版过仇的作品的香港华人编辑在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访问了北京。他告诉他的作者说："埃里克，周总理清楚地记得你，他问起了你，我告诉他，你和我们一起在香港。他说他愿意亲自见到你。"40年代，仇作为一名记者的确在大陆见过周恩来，他尊敬这位总理，他的虚荣心被挑动起来，同意到中国作一次短期旅行。但是一到那里，他就被扣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再次见到周恩来就逃了出来。

周恩来试图用共产主义术语将新政权描绘成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权。他对两名英国作家说：“我们并不试图消灭个性，但是我们确实正在尽力消除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政策，如果你喜欢那样表达的话。”



周恩来常同文艺工作者切磋探讨艺术问题，这是1953年1月他在庆祝著名画家齐白石93岁寿辰宴会上

周恩来的同事们希望早点给中国带来一个太平盛世，但这一愿望在初期就由于外部干扰而破灭了。由于美国在共产党胜利前几个月断然拒绝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他们不得不转向俄国寻求帮助。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底抵达莫斯科，平生第一次访问苏联和谒见斯大林。他不明智地将他最干练的谈判家留在了国内。像美国人那样，斯大林可能也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被迫等了很长时间，请求援助没有任何进展。最后，他把周恩来召去。周恩来于1950 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带来一飞机的专家和一套新的蓝方格法兰绒睡衣，这是他专为

来莫斯科而买的。它很快就成了周恩来仅有的一套睡衣。尽管它渐渐褪了色，打满蓝白相间的补丁，变成了模糊的灰色，但他一直穿着这套睡衣，甚至后来出国访问时也带着它，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周恩来到了莫斯科后，花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劝说难以对付的俄国人签订一批协议—这些协议形成了今后1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斯大林仍对毛泽东30年代对待共产国际和与苏联联系的方式感到愤怒。现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2月14日，他们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的条约，这些条约肯定了蒙古的独立地位，规定双方联合管理与俄国有着传统联系的铁路与港口，并且对华提供一项为期5年的3亿美元信用贷款。这些条件很苛刻。为了得到苏联承担中国国防的义务与援助，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得不继续忍受苏联在中国北部、西北部和蒙古的半殖民主义活动。这种义务和援助同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甚至同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援助相比也是吝啬的。

这是周恩来在50年代对苏联进行的6次访问中的第一次。双方的关系在抱怨的基调下开始，彼此漠视，很快便公开化。几十年前，当列宁宣布放弃前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侵略成果时，像周恩来这样的中国年轻一代曾对此欢欣鼓舞，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列宁的继任者不去兑现这些承诺。没有哪个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能抱有好感。周恩来不得不尽可能地拼凑最低限度的协议，他从国民党时期就习惯于这种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然，这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来讲是一个诱饵，使它们知道中国是无辜的，无论是道义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对周恩来来讲，人不能一仆二主，这是古老格言的一则训诫。否则，你对一个人说东，又对另一个人说西，他们俩都会发现，并再也不相信你。周恩来希望俄国人理解中国国内的原因，中国同志必须采

取这种策略是由于关系到国民党的原因。或许，他也考虑到像苏联这样一个先进国家会把自己的民族利益与集团利益置于个人恩怨之上。然而，这两种假设都彻底错了。

人民共和国安定下来还不到一年，中国就成为一场有害战争的牺牲品，这场战争使它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建立与美国的联系变得遥遥无期，最终导致了中美兵戎相见的可怕后果。它对中国没有一丝好处，恰恰是周恩来有意要避免的那种没人能取胜的局面。但是周恩来对此无能为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相信中国人1950年怂恿北朝鲜入侵南朝鲜。事实上，就北朝鲜来讲，这似乎是自由的行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俄国人的怂恿（出于不满，他们不会同中国人磋商）。从中国的观点看，这场战争肯定是不适宜的。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

美国人把朝鲜看成是苏联打算削弱西方在各大洲势力范围的证据。因此，杜鲁门总统派遣美国第七舰队去守卫台湾，防止来自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威胁。周恩来将这一行为谴责为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因此双方很快转而采取敌对态度。

在北京的周恩来政府方面看来，好像世界正在封锁中国，唯有不值得相信的苏联在支持软弱无力的新中国。印度大使潘尼迦与他的缅甸同僚徒劳地试图劝说周恩来。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甚至在英国这样的国家，有一部分重要的舆论对中国与右翼的美国政府的斗争如果不是明确同情的话，至少也是中立的。

周恩来给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位印度人后来写道："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双手。它们不仅得到精心保养，而且就像中国人描绘的那样，每个手指如同细嫩的葱芽。他用它们打着手势，产生出巨大的效果。"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是深刻透彻的。尽管他对印度了解得不多，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令人信服的共产党员，一名训练有素的理论家，但是他的双脚同样牢固地扎根于祖国的土壤之中"。

不过，周恩来还是支持正式受到苏联撑腰的北朝鲜金日成的路线。他在公开讲话中使用激烈的措辞抨击美国，这使华盛顿多年后才能原谅。例如，1950年9月30日庆祝人民共和国创建一周年时，他说美国在通过帝国主义侵略的疯狂行为表明自己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在得到解放后，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只想重新安居乐业，发展经济和文化。但是，他们绝不容忍外来侵略，也绝不坐视自己的邻邦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而置之不理。谁试图从联合国中排除近5亿人民，谁蔑视并违背这个世界上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的利益，并徒劳地幻想任意妄为地解决直接涉及中国的东方问题，谁都必将碰得头破血流。这种粗鲁的语言为中国对美国的目标未起到任何推动作

用。当然，周恩来必须对自己党内强大的具有沙文主义倾向的强硬路线派表明，当需要谴责外来强国时，他并不怯懦。

10月3日凌晨1点，周恩来约见潘尼迦大使，这是他通向华盛顿唯一可行的渠道。这位印度人发现，周恩来在今天清早的会面中像以往一样谦恭迷人，丝毫未显示出焦躁的表情，但是在简短地感谢了尼赫鲁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后，总理迅速转入正题。他说如果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像麦克阿瑟将军断然宣称的那样要发动进攻并进入北朝鲜，中国将被迫参战。外交部通过其他的中立国渠道向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机构发出了同样的危急警告。但是，使用如此多的传播渠道来发出这一警告，看上去似乎又是运用了宣传手段。过去，周恩来的这种大张声势的手法曾起到了巨大反响。不管怎样，潘尼迦这位诚实的印度人却不辞辛劳地注视着中国问题是否能得到理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领导人却怀疑他在打中国牌。

尼赫鲁及时地将这一信息转达给华盛顿。但是，杜鲁门总统怀疑潘尼迦的公正，将周恩来的警告视为一项对联合国明目张胆地敲诈。《时代》周刊将其驳斥为“仅仅是宣传”。据说，麦克阿瑟将军认为，进入北朝鲜会感到自在些。结果，他的确这样做了。

因此，周恩来的威吓兑现了。毛泽东三天三夜在他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周恩来则沮丧地通知官员们召集一次会议。他说：“如果必要，我们必须准备好从沿海省份撤回到内地，并且为了准备一场长期战争要把西北与西南变成基地。”



1953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上

中国志愿军进入了朝鲜。麦克阿瑟声称，他不认为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道路。但是，中国军队阻止了美国人向前推进的速度，并终于把他们从北朝鲜赶了回去。在紧张的战争中，周恩来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官方的说法是他因工作过度而患了病。毛泽东建议他到海边胜地旅大去疗养。他好像花了一些时间与妻子在海滨疗养身体。待他返回北京重新工作时，俄国人已提出停火建议。这一建议最终导致了两年后在朝鲜的停战。

事实上，美国人抑制住了跨进中国及对中国进行的轰炸。他们不想在此时与中国人较量。据周恩来的一位同事说，周恩来后来以一种令人惊异的孩童般的口吻对此事进行了评价。他说：“帝国主义政府的领导人是些平庸小人，你只需用激烈的斥责来抨击他们，并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老实了。”还有一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如果你把帝国主义者打得使他们感到疼痛，他们就会向你求和。”这是中国的政治语言，而周恩来必须擅长于此以保住他的地位。这种语言是要从心理上补偿中国对世界事务的无能为力感。

中国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来恢复生产和进行建设。但是，这一切都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必须重新改变中国的管理体制，应付对共产党改革的不断抵制活动。作为总理，周恩来无法逃避卷入共产党的镇压工作。例如，1951年初，他不得不宣布在前10个月中一个省处理了2.8万多反革命分子。他在所谓“三反运动”中同样走在前面。这场运动始于同一年，是为了反对贪污、浪费和极度的官僚主义行为，很多人为此受到处分。

竭力把红军[(2)]留在朝鲜境内，是在无情地消耗中国的有限资源。1952年夏季，周恩来带着国防专家前往莫斯科，强烈要求克里姆林宫尽可能给予补偿，中国人用鲜血在朝鲜捍卫着俄国的利益。据说，赫鲁晓夫说话时以一种屈尊相就的态度将周恩来形容为“一个聪明灵活

的、目前我们能交谈的人”。通过几个星期不停地争论，周恩来说服斯大林同意放弃半殖民主义的特权。这些特权在第一次谈判中有所保留。斯大林同意进一步增加苏联的经济援助。不过，周恩来不能感到满意。它的数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与中国战士包括毛泽东的儿子作出的牺牲相等。

国际舞台（1953～1955）

1953年3月，为苏联的斯大林举行葬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人都聚集到苏联。许多人预料毛泽东会露面，他现在或许会名正言顺地声称是那个统治集团的最高人物。但是，他宁愿躲避在俄国人手下进一步遭到怠慢，因为这种怠慢是预料之中的，他早已领教过了。此外，他1949年的那次访问还从未得到任何苏联高级掌权者的回访，更不用说他的两位主要助手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那些访问了。

因此，毛泽东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欧洲的共产党同事们不仅把他看成是毛泽东的代表，而且对他本人也表示尊敬。他是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共产党人，在莫斯科的仪式上他是站在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唯一外国人，而没有和外国代表团在一起。当斯大林的灵柩离开时，周恩来迅速走在它的后面，与苏联新的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处于同样的位置上。

周恩来曾深受斯大林的暴躁和吝啬之苦，这时他一定对自己在马克思主义世界中被给予的如此殊荣而感到高兴，这种殊荣是他没有预想到的。当他肃穆地走在这位暴君的遗体后时，他一定会想起他曾怎样等候过来自这个人的遥远的决定。斯大林的威名曾使中国同志感到发抖，他也一定记得斯大林是怎样像一个摩天大厦上的警察指挥下面的街道交通那样指挥着中国革命的。但是，周恩来的复仇情绪很快会转到现实中来。他能从苏联新的领导人那里为中国争得什么呢？与斯

大林相反，这些领导人公开宣扬他们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合作。在那儿，现在开始了一个迟到的蜜月，它将延续3年左右。

周恩来在斯大林葬礼上的显赫地位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新人物。人们到处询问，这位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执掌如此大权的不知名的中国总理是谁？他在后来的朝鲜停战中的作用，以及随后在印度支那会议上的显著成就加深了外部世界要更好地了解他的愿望。印度支那会议于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结束了法国殖民军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

周恩来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3位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同来的还有莫洛托夫外长和越南总理范文同。在前往开会的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周曾对越南战争作过这样的解释。

胡志明同志对我说：“越南的局势毫无希望，如果我们不马上停火，越南人就不能继续坚持抗击法国人。他们要我们帮助他们驱赶法国人。我们简直不能……我们在朝鲜损失了很多人。这场战争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没有力量在此时卷入另一场战争。”

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说点俄国式的谎话，让胡志明继续相信中国可能会派军队越过边界去支援他们。

结果是，周恩来没必要采取这种防御式的态度。会议开始时，越南人已经赢得了奠边府战役，而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领导下的法国新政府已准备妥协。然而，在1954年夏季推敲印度支那问题解决方案时，周恩来却出人意料地与西方领导人结为朋友，这使他的共产党盟友感到吃惊。

这是他自30年前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重返西欧。正如后来的事情所证实的那样，这也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总理，令人吃惊的事实之一

是他从未亲眼见过大工业中心里现代资本主义的战后繁荣。日内瓦和伯尔尼是他仅仅参观过的西方城市。它们很难使他充分理解到中国落伍的程度。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日内瓦

日内瓦的人们最初不明白他为什么通身都着黑色。他头戴黑色宽边礼帽，身着长裾外衣。开始时，他显得紧张不安，在一小队保卫人员中移动，似乎他料到会有暗杀行动。一位记者写道：“他好像不能左右环视，面孔显得冷淡，带着一种蔑视的神色。”《生活》周刊尖刻地把他描绘为一个喜欢享乐的共产党人。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代表团租了一家最好的饭店，并雇了一队小轿车，而周恩来本人则住在一座舒适的别墅里，并在那里会见友好国家的代表团。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左二）、朝鲜外务相南日（左 一）、越南外交部部长范文同在一起

周恩来为促成会议召开所做的种种努力给人产生了一种敌对的印象。他对西方的态度比莫洛托夫还要冷淡。他指控美国人想用越南作为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

在会议陷入僵局的最初阶段，周恩来在一间接待室里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不期而遇，正好面对面相碰。这位态度僵硬的美国国务卿对周恩来的个人诚意公开表示质疑。他宣称只有在他们撞车时，他才会亲自会见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美国人伸出了手，他以前从未见过杜勒斯。屋里的其他人都愣住了，注视着这位美国人如何作出反应，杜勒斯有意地摇摇头，将两手交叉着放到背后，扭转身大步走出了房间，像个新英格兰教徒那样嘴里咕哝着，“我不能”[3]。周恩来凝视着杜勒斯的背影，抬起双手耸了耸肩，好像是说：“这是什么举止？”这

一戏剧性的事态的急转为他赢得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一个法国官员把在这次相遇中“穿着简朴凉鞋”的中国人比作有教养的人，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并很有代表性。在日内瓦要处理的事务结束时，另一位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却对周恩来表示赞赏，称他跟丘吉尔一样，是世界上“最有才干的外交家”。

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抵制了苏联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他断定苏越方面在会上采取的阻碍议事的战略，是在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帮助越南。这既关系到它们之间的共同边界问题，也关系到范围更广的东西方关系问题。他或许已看出，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无论如何已准备与西方进行缓和。6月中旬，周恩来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说，他同意把老挝王国和柬埔寨从越南分离出来，实现独立。这使与会者又激动了起来，他看到印度与其他中立国家在东西方争夺中对这两个国家的独立是多么关心。周还说，中国要与敏感的越南人处理好关系会碰到一些麻烦，不能不让越南继承法帝国主义曾行使过的权力。为什么老挝和柬埔寨在未来的印支地缘政治方面不会像受到中国的大量影响那样而受到越南的影响呢？出于种种不同的原因，莫洛托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但是，越南人却极为恼火。他们试图恢复对这两个小国的霸权，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图谋这种霸权了。

艾登不仅被这一妥协的信息所打动，而且对发送这一信息的人也留下了印象，这位英国人被周恩来的风采所吸引，他不相信周曾经是一名作过战的游击队员。周恩来与艾登相处得很好，几乎像他与杜勒斯之间那样富于戏剧性。英国外交大臣的一位随从对此感到惊异。他想，双方之间的融洽关系是否是由于他们怀有“一种相同的直观和温和的才智”？周恩来对这位文雅的英国人充当他与美国人之间的调停者并不感到怀疑。

在日内瓦的几乎所有其他人都不仅把周恩来当做一名老练的外交家，而且视为一名政治上的“稳健派”。与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空想家截然相反，他也许代表着北京的一批注重实际、头脑清醒的行政官员。杜勒斯充满敌意的反共“边缘政策”逐渐使欧洲人警觉起来，但他们同时欣慰地发现中国总理现在愿意妥协，尽管中国向越南提供武器并有可能使它获胜。欧洲人将周恩来看成是一个做交易时拼命讨价还价的人，但却可以成为一名创建世界和平新时代的合作者。



周恩来同前来拜访的英国外交大臣、会议两主席之一的安东尼·艾登会晤

作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法国在会上处于关键地位。一位法国官员回忆道，周恩来不止一次，而是几次为达成妥协在尽其所能，他有一次主动将住宿地点安置在法国代表团下榻处旁边，以便在那里审慎地会见范文同。周恩来于6月底前往伯尔尼，与孟戴斯—弗朗斯私

下磋商。他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在法国的学生时代。显然，他并未因这次与法国人的会晤会给越南共产党造成坏印象而感到不安。

在6月下旬的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对印度、缅甸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回访。他发现从一种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观点上看，这两个国家对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和谈能起帮助作用。周恩来访问印度并会见尼赫鲁一事是由印度派往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安排的。

“多么富饶的国家啊！”周恩来抵达印度时羡慕地说，流露出一种北方人对热带景致的正常反应，“你们拥有充足的财富。”但是他要做很多解释工作。尽管印度以巨大的同情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许多国际要求，但是尼赫鲁却对中国1950年对西藏的军事占领感到震惊。他从西藏人那里得知，周恩来可能是一名非常强硬的领主。印度理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要求，但不明白为什么要使用武力来保证这些要求。周恩来现在再次对尼赫鲁保证，中国不会在西藏以外扩张自己的霸权。他要求印度与其他的亚洲英联邦国家联合抵制即将出现的反共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个组织是由美国组织发起的。而尼赫鲁却要求周恩来对越南共产党加以遏制，阻止其对老挝与柬埔寨施加压力。他们明确同意，对双方共同的边界及有关难以理解的事物不作详细讨论，但他们会谈的最著名成果是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宣言。几十年来，五项原则成为所有那些既不同美国结盟也不与苏联结盟的国家的宣言。由于周恩来与尼赫鲁制定了这一文件，其他亚洲右翼政府便很难继续将中国当成一种威胁和敌人。

周恩来随后很快拜访了伟大的越南政治家胡志明，要胡对他的日内瓦外交活动放心。但是，胡志明不能够对这种保证感到满意。

周恩来于7月返回日内瓦，孟戴斯 - 弗朗斯急切地向他打听胡志明对国际磋商的反应如何。

周恩来和蔼地回答说：“我发现所有和我交谈的人都对和平持有相同的要求。”然而，他又玄妙地加上几句，“但是，每一方都需向另一方接近……这并不是说每一方都要作相同的让步。”

几天后，周恩来向艾登透露，越南人在分界线问题上将作出新的让步。这一招打破了会议的僵持局面。但是，孟戴斯—弗朗斯劝说周恩来接受在老挝组成一个王室政府（也是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党的政府（但却是亲越的）时，越南人却感到愤怒。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关心的是设法让美国人承担一项义务，即不使用越南的军事基地。或许，他至少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在日内瓦协议签署后，无论如何要保证非共产党的南越敞开大门，以使共产党能渗透进去。有一次，他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见，让他理解这次会见的内容，并及时地转达到杜勒斯那里。这条消息是，如果美国从越南撤出所有军事基地，那么周恩来就接受越南停火的建议。然而，当谈判各国于7月发表最后宣言—一个使周感到极大满足的事件时，美国人却拒绝在上面签字。周恩来不得不发表一项单方声明，要求美国人不要妨碍其他国家达成协议。

亚洲的共产党同事认为，周恩来一开始在日内瓦会议上让美国人撤离而不承担义务是过于天真。数年后，他试图为此进行辩护：“我们……在国际问题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怎么能让一个拒绝签署协议的国家不妨碍这一协议的履行呢？你们可以在这些方面批评我们。作为参加这次会议的一名中国代表团成员，我接受你们的批评。”许多年之后，周恩来对一位美国记者抱怨说：“我们在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为了使周所明显倾慕的法国能够体面地撤出，他的行为客观上帮助了美国人在印度支那获得了一个立足点。



1954年7月，周恩来在日内瓦宴请英国著名电影艺术家查理·卓别林后与其合影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几周活动使他能够将中国从自身感到的孤立状态里摆脱出来。他在会见查理·卓别林时所表示的姿态是充满天才的一招。卓别林是在瑞士的最著名的外国流亡人士，也是一名受到尊重的激进事业的勇士。杜勒斯曾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但是现在有一位更为著名的人前来向周恩来讨好。

正像周恩来被卓别林的喜剧影片《城市之光》造成的错觉所迷惑那样，卓别林对周恩来的外交计谋也是一无所知。他应周恩来邀请前去赴午宴，在最后一刻才知道总理因会议有一些重要事情要处理，晚一会才能来参加午宴。然而，当卓别林抵达时，却发现周恩来正在他下榻处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很自然地问起上午发生了什么，周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显得很自信。

“所有问题都和解了，”他说，“仅仅在5分钟之前。”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另一次交际活动导致了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英国工党领导人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对中国的访问。工党尽管处于在野地位，却受到周的重视。用代表团的秘书摩根的话来形容，他花费了许多时间讨论中国新的组织机构及台湾问题。

从日内瓦归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周恩来又一次展现了恳求的面容。他在日内瓦帮助领导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外交，因而敢于重新对俄国人提出一些长期要求。

“也许，你们能为我们建造一所大学。”他满怀希望地问赫鲁晓夫。

“你知道，我们本身也很穷，”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们也许比你们富裕。但是，战争刚刚结束，我们还没恢复过来。”

周恩来代表中国在日内瓦显示的新的独立性在莫斯科也得到同样的表现。他在欢迎他的招待会上用英文发表祝酒词。“周，为什么你不讲俄文？”米高扬（后任副总理）抱怨说，“你的俄语相当好。”（事实上并非如此。）

周恩来对此同样用英文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中文的时候了。”

“中文是一种很难学的语言，”苏联领导人反辩说。“别介意，”周恩来轻快地说，他仍然讲着英语，“早上到我们使馆来，我们会很高兴给你上课。”

在北京，周恩来努力工作，以便获得对日内瓦妥协的支持。北越总理范文同于8月份来到北京，他认为日内瓦会议仅仅是初步成功，还有待于合作与发展，周恩来却是以另一种不同的语调发言的。日内瓦协议是对和平的重大贡献，它缓和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人们正在对那些坚持所谓实力政策的人日益感到厌倦。这种政策谋求扩军、备战。”与他的越南伙伴不同，他对老挝与柬埔寨的共产党人很少给予重视。

在向国务院作工作报告时，周恩来把美国制订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计划比作一个害人的东西。“这一集团正在筹建，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因而，像在日内瓦那样，他呼吁亚洲国家应该达成自己的安全协议，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

1954年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被选为北京市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的讲话包括了政府职责的全部范围。他说，中国正试图将生产力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在此过程中，国民经济应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系统地、迅速地发展，新的工业经济将由社会而不是私人所拥有。这样才能提高人

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安全。在回顾过去的进展时，他宣布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得到统一（尽管对负隅顽抗的台湾岛仍然在提出要求）。实行土改，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实施，它将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与耕作区域实行合作制。

周恩来在9月23日的这篇讲话中同样强调了新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开拓性，并充满了自信心。“中国愿意与欧洲、南北美洲以及澳洲的任何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只要它们怀有同样的要求与真诚的愿望。”他为中国采取这样一种调和性质的出发点作了如下解释：

每个人都能看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它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国家。我们和平地工作，我们期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与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根本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一种和平的外交政策。

此时此刻，可以稍微乐观一点了，因为朝鲜与印度支那的停战已缓和了紧张局势。在日内瓦，周恩来发现西方对中国提出的关于对台湾的主权及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要求有一种接受的倾向。中印协议中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或许能用来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存在。

周恩来同样对他的同胞讲到如何对待华侨问题。在他担任总理职务的早期，一位印度尼西亚记者问他华侨是否会被当做中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在这位记者的国家里有几百万华侨。一位在场的人注意到周恩来“顷刻间的愤怒”。他挥舞着双手来充分表达他的意思，用严厉的声音来表示他的愤怒。周恩来回答说，中国并不为自己的祖先在过去对邻国犯下的侵略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证决不重犯这样的错误，决不成为帝国主义者。随后，周恩来的愤怒平息下来。“他使这位听他讲话的人对自己的提问激怒了他而感到不好意思。”

周恩来在日内瓦与万隆直接看到了国外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感受。与西方的犹太人的情况有点相似，这些华人迅速控制了当地的经济，但未同化到东道国的社会中。这次讲话是历届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华侨问题的存在。他说，中国准备抛弃血统主义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它从前保留中国人的国籍，甚至包括那些在国外生活了许多代的人，中国将同各东道国政府达成协议，以解决这1200万华人的地位问题。他解释说：

我们愿意敦促海外华侨尊重所在国政府的法律与社会风俗……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从未试图解决华侨的国籍问题，这使华侨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并经常导致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早应采取的姿态，但是对许多听众来讲，周恩来的声明是革命性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自小村镇，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他们或许只知道国外同胞源源不断地给国内的亲人汇款。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成为外国人？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的内心仍然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国并由此开始明白了种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

为了对周恩来在所有这些进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敬意，尼基塔·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1954年晚些时候来到中国，参加人民共和国5周年纪念日的庆典。这是克里姆林宫的高级人物第一次访问盟国中国，新的俄国领导人不仅要弥补他们过去的疏忽，而且把话题扯到了过去遗留下来的各种棘手问题。他们同意从旅大撤出他们的军队，将过去双方共同经营的联合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为中国的发展贷一大笔款，扩大科技合作等。据赫鲁晓夫回忆，周恩来做得有点过分，他问俄国人是否能将他们的重炮留在旅大，以供中国使用。赫鲁晓夫严厉地回绝说，苏联担负不起丢弃这些设备的损失。

在赫鲁晓夫10月访华后，尼赫鲁对共产党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他急切希望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像中国地图显示的那样，中印边界有大量领土似乎被中国兼并，而在印度这些领土被视为是印度的。周恩来回答说，与他们讨论的其他问题相比（诸如阻挠杜勒斯与“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可以暂缓一下，待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再来考虑。正是在这里，双方撒下了未来不和的种子。

看来，只有美国人没有把周恩来真正当回事。当美国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于1954年年底签署安全保障条约时，周恩来隐喻地对美国表示了宣战。他说，美国是历史上所知的最狂妄自大的侵略者，是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和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靠山。

令周恩来愤怒的不仅仅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国与台湾签署的条约。国民党仍然占据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几个没人正式居住的小岛。1958年9月共产党炮击这些岛屿时，激发了一场持续性的国际危机。在美国人看来，这一行为证实了中国的侵略意图。周恩来谴责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人的支持。汉弗莱·杜维廉爵士发现周恩来“处于最激动和痛苦的情绪”之中。总理以这样的话结束了会面：“感谢你的到来，不过，我必须说这是一次最令人不愉快的会见。”艾登试图进行解释，他请求周恩来承担义务，保证中国政府和平地解决金门与马祖的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问题，甚至提议会见周恩来进一步讨论中国与香港的边界问题。不料周恩来却迅速作出答复，邀请艾登爵士访问北京。这会使这位英国政治家失去他对华盛顿的影响。周恩来拒绝了对中国在自己主权范围管辖的领土上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加以限制的意见进行让步。

1955年4月，周恩来取得了他在外交上最伟大的胜利。在印度、缅甸、锡兰[4]、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的发起下，29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万隆会议。在中国的政治中，周恩来与人们打交

道时对人们的心理了解得极为透彻。在日内瓦他已与高鼻子的欧洲人进行了较量，并战胜了他们。但是，他们却将中国看成是一个遥远的目前造不成什么危害的大国，对中国古老的文明非常钦佩，现在他不得不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议程带到一个非共产党的聚会中去，其中包括一些激烈反共的亚洲领导人。他们对本国华侨的经济成就感到不满，而且也担心中国贸然扩张它的版图，或当东道国政府采取行动防备这些华侨时中国政府会进行干预。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亚非会议主席台上

周恩来是否能够出席万隆会议一事至关重大。仅仅两星期前，他由于患急性阑尾炎而病倒。然而刚一拆线，他就宣布自己已经准备就绪。他在位于热带的爪哇岛上艰苦地待了一个月，未表现出任何不舒适的感觉。周恩来尽管动了手术，但他在第一周里却只睡了13个小时，有时甚至和衣而睡。

外科医生们救治的这位病患者，正是国民党破坏者试图干掉的人。在尼赫鲁的关照下，中国人包租了一架叫做“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印度班机，载着他们的代表团飞往万隆。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一

那天，这架载着9名中国官员的飞机坠毁在海上。尽管调查的结果从未令人满意过，但看来好像是国民党特务在机上安置了一颗定时炸弹，企图使周恩来丧生。然而，周恩来本人却取道仰光迂回而行（在那里，他应邀与尼赫鲁总理、缅甸的吴努和埃及的纳赛尔举行了一次小型的最高级会谈）。

周恩来于万隆会议的第二天—4月19日正式在会上发言。他详细阐述了对和平的需要及结束殖民主义的愿望。周恩来不能接受巴基斯坦与菲律宾的声明，即“东南亚条约组织”是一个防御性条约。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扩张主义的意图。他强调要使亚洲团结起来，特别是共同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亚洲人民不能忘记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对社会主义抱有信心，但是他小心地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他在一篇灵活的、带有奉承词句的讲话中对菲律宾与泰国做出了友好的姿态。这篇讲话只会刺痛那些不在场的国家。用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话说，周恩来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印象，好像存在着共产主义者与中立主义者的统一战线。这一统一战线基于这样一种共同认识，即西方殖民主义者与西方军事条约是对亚洲与非洲新兴国家独立的唯一的、真正的威胁。没有人记得俄国人也是白种人、欧洲人，或是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在听了其他领导人的首次发言后，将他自己准备的发言稿放在一边，作了一篇即席演讲，并用他的手势打动了来自亚非大陆29个代表团成员的心。这篇讲话直接涉及了他们提出的有关问题。卡洛斯·罗慕洛，这位精明强干的菲律宾人咒骂共产帝国主义甚至比资本帝国主义更坏，指责中国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记者们蜂拥而至，急切地期待周恩来为此作出评论。

我“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和蔼地回答道，我是为了大家“求同”而来的。

下面是他第二次即席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但是我们仍有共同的基础。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至于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中国得到别国的承认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内政，“不要别的国家承担”。他的讲话受到了与会国的好评。

其他代表被周恩来与尼赫鲁之间的微妙关系强烈地吸引住了。他们两人都是来自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都转变为持有激进政治观点的人；他们都是党内声名显赫、深谙世故的人，并都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们的党是由像甘地和毛泽东这样的较为朴实与僵化的人物领导的。尼赫鲁已经给予周恩来以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已远远超出了外交著述中所谈到的，他感到高人一等，并不令人感到诧异。他本人和世界的各种联系比起周恩来要广泛深入得多。他比中国总理还年长9岁，正像一位友人所说的，“很自然，他感到自己像是周恩来的老大哥”。万隆会议是尼赫鲁的建议，因此在会议上他自然感到要保护周恩来。一些观察家们把他看做是一位陪伴在周恩来身边的保护人。其他人则断定尼赫鲁有意地待在幕后，以便让周恩来出头露面，使其他亚洲人接受必须与中国共处的现实。他把周恩来的成就看做是自己个人的巨大胜利。

至于中立国，它们试图消除周恩来与美国的争吵，以便减少导致冲突的风险。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告诉本国代表团的一小部分人说，中国准备就远东的缓和，特别是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这

样他使几个中立国卷进这一问题之中，促使它们对美国施加压力作出让步。

与此同时，各种关系都得到了改善。纳赛尔经过与周恩来的会谈，几个月后，埃及承认了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向泰国王子保证，中国对泰国没有颠覆计划，而这在曼谷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类似，周恩来与日本代表高崎达之助的会谈为未来日子里的许多非正式交流提供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周恩来建议两国共同简化汉语书面文字体系。这一具有政治家才能的提议由于日本右翼总理岸信介的优柔寡断而未能实现。周恩来希望利用日本作为中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中间人的想法也同样化为泡影。）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他感到激动。锡兰的科特拉瓦拉率领的那些人仍然感到周恩来是不值得相信的。许多人肯定事先对部下下达了指示，尽管乍看起来与周恩来友好交往不可避免，但他们应当记住："当然，周是一名共产党员，要小心。由于他过于吸引人，因此，他显得更加危险。"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周恩来后来告诉北京的大学生说，巴基斯坦与锡兰的领导人向他承认，他们并不像害怕印度扩张主义那样如此反对共产主义。因此，他发现自己在他们与尼赫鲁之间处于一种调停者的地位。）

周恩来对他的印度尼西亚东道主们做出的友好姿态给予了巨大的回报：中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印尼华侨地位的协议，这一协议第一次正式放弃了中国早期提出的要求寄居海外的华人效忠祖国的要求。周恩来实际上延误了返回时间，以便对印度尼西亚进行访问。这是此类级别的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尼。

这是又一巨大的胜利。在印度尼西亚，他总是面带微笑，轻轻地抚摸孩子们的头顶，并与马路两旁的人们握手，接受他们的鲜花。他

还挤进巨大的人群中去而没有警卫跟随在身。他所受到的欢迎反映出人们这样一种欣慰感：普通群众了解到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强硬政府是由此刻身居他们中间的这样一位风采迷人、态度友好的人领导着。周恩来降低了意识形态的温度，他的尊严及他在万隆会议上对性情不好的巴基斯坦、锡兰和土耳其领导人的批评表现出的耐心，都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周恩来和埃及总理纳赛尔在一起

周恩来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愿意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从而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这恰恰是亚洲公众最想听到的。一位记者写道：“周恩来所要做的，就是伸手等待他们的到来。”周恩来言辞谦恭，不像俄国共产党对亚洲人那样讲话。中国人遭受过苦难，仍然落后贫穷，他们不希望战争，但并不对它感到害怕。一位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像以往一样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我相信这个人。”

契机连续出现了。4月份，周恩来宣布中国愿意尽可能使用和平手段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人进行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看来，在消除朝战时期的互不信任问题上，双方已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访问者几乎是开始马不停蹄地来到中国。继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开始访华后，接着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迅速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访问，更不用说尼赫鲁和苏加诺总统了。

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周恩来发现亚洲与非洲都有一个明确的愿望，即取消军事集团，从而发展贸易往来。中国将在今后的任何世界裁军会议上提倡太平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人民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签署一项集体安全条约，以取代目前在世界这一地区正存在的敌对军事集团。”

但是，周恩来同样需要反映他的同事所具有的一些更为保守的观点。西方的三个大国最近在日内瓦与苏联举行了会晤，明显地减缓了国际紧张局势。但是，中国仍然应该保持警惕。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必须加强我们国家所必要的国防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卫我们社会主义重新建设的成果。保证我国主权与领土的安全与完整，并为捍卫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看来，周恩来在1953年至1955年的宝贵岁月里仿佛是主要集中精力于外交事务。首先，他使俄国新的领导人转变了看法，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更为友好的态度。然后，他在日内瓦与万隆会议上接连震撼了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的确，这些岁月是中国政治相对平静的日子。但是，冲突的界限已经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划出。毛泽东急于推进快速的乌托邦式的改革，而周恩来却倾向于另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尽管慢一些，但必定会使中国农民的耕作方式向合作制的转变得到巩固。另一方面，这也是与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的热情的理论家们

渴望快速实现达到无阶级社会的愿望发生争论的原因。从现在起，对农民在多长时间内放弃他们的自留地、知识分子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党的管辖等问题的争论将变得越来越激烈。1953年至1955年是国内动荡的一个平静阶段，它与中国打破闭关自守，走向外部世界是同步进行的。从国内方面来说，这是分析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并制定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的时候，而且也是马上着手进行那些很少引起争论并早该实施的改革的时候，例如教育、语言、法制机构及少数民族问题。



周恩来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右）、刘少奇（左二）、朱德（右二）在中南海怀仁堂。

1956年以后，是应该对这些中心问题采取紧急行动了，而不是应该长时期进行评论了。中国共产党正面对着人类本质和中国社会难

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周恩来从未像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黄金时代那样愉快过。那时，他能够毫不费力地从事协调、平静的说服与理解工作。他肩负重任，在外部世界代表新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知道自己已多么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百花齐放（1956~1958）

尽管人民共和国六年多来一直处在建设之中，周却没有作过任何较为重要的政策报告，而他的那些身居党的统治集团内的对手们及比他年轻的官员们都对土地改革或集体化等诸如此类重大问题进行过阐述和解释。这或者是因为他聪明地回避对这类具有争论性的问题进行陈述，或者是因为他被看做最高行政领导人而不适宜做这类事情，他为自己的政权所作的关于政策界限唯一一次讲话是在1956年1月14日那一天。当时，他对党制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进行了分析。

他在分析中具体说明了为什么中华民族的进步需要使大批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医生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感到心情自由舒畅。周说，中国已经超越了大多数的中国门外汉们曾竭力要赶超的以蒸汽和电力为基础的西方工业革命，中国现在应该欢迎更具意义的“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如果中国要有一席立足之地，那么它就必须在未来的12年内达到国际最高科学水平。

他是政治局中首先提出这一论点的人，并鼓励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们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生活之中，即使他们不同意共产党的政策。是他写了数百封信，呼吁在国外的人重返国土；是他指导地方党的头头们要合理地对待这些人，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这份一月讲话事实上是第二年毛发动并受周支持的“百花齐放”运动的信号。

周在夏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重申了他的讲话实质。他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的真正伙伴，共产党必须谦虚地听取他们的批评。韩素音把此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的讲话”。后来，韩驱车经过一条“整洁的两旁长满了夹竹桃的小道，来到了一个朴实的阁楼”，这就是周的住处。他很简朴，不拘礼节。“在起居室里，有许多书摆在书架上，却没有古玩，没有珍品，没有昂贵的家具。房子里放着破旧的沙发和藤条椅，地上铺着磨烂的廉价的地毯……一片斯巴达式的简朴。这一切都是真的。周全然不关心任何物质享受。”在一个大多数宰相都生活奢侈、腰缠万贯的中国，这的确是件新鲜事。为了反对高层办公室的铺张浪费现象，周定下了新的标准。

当韩开始提问题时，这位总理变得戒备起来，因为他得设法讲清楚共产党政府为什么在执政几年间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复辟是办不到的，”他坚持说，“复辟的大门已经关闭。我们所取得的政权绝不去放弃，也绝不代表假自由主义(5)。假自由主义只会导致一个专制政权—正如我们刚从其中解脱出来的那个一样。”由于民族的需要，“我们甚至准备与那些不赞成我们观点的人共同合作，除非他们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和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是有共同基础的，有条件限制的。

“你以为我们党内没有分歧，这是西方的一个共同的主观见解—认为共产党是坚如磐石的东西……如果你仅仅了解一下我们如何争执、讨论、辩解……我们经常持有极不相同的意见。”听到这里韩发现“他的声音带有一种怒气”。

同时，这位总理又不得不对毛及那些更为激进的领导人加速实现集体化和中国经济生产增长而日益俱增的强烈要求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毫不犹豫地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由于察觉到按苏联模式制定的

五年计划略为有些保守，因此应该加速生产，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但是，他又反对突然而至的大规模的合作化和国营化，认为这样具有破坏性。他争辩说，中国企业现存的管理体制不应轻易加以改变，好的方式方法应该作为“历史遗产加以继承和开发”。

但是，毛和左派分子的观点都压倒了周及周所召集起来的技术专家们的良好意见，这样周不得不对政治局的这些“冒进主义者”（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作出让步。周后来承认，“我对1956年反冒进主义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作了自我批评”。



1956年8月，周恩来接见中国民主促进会二大代 表和主席马叙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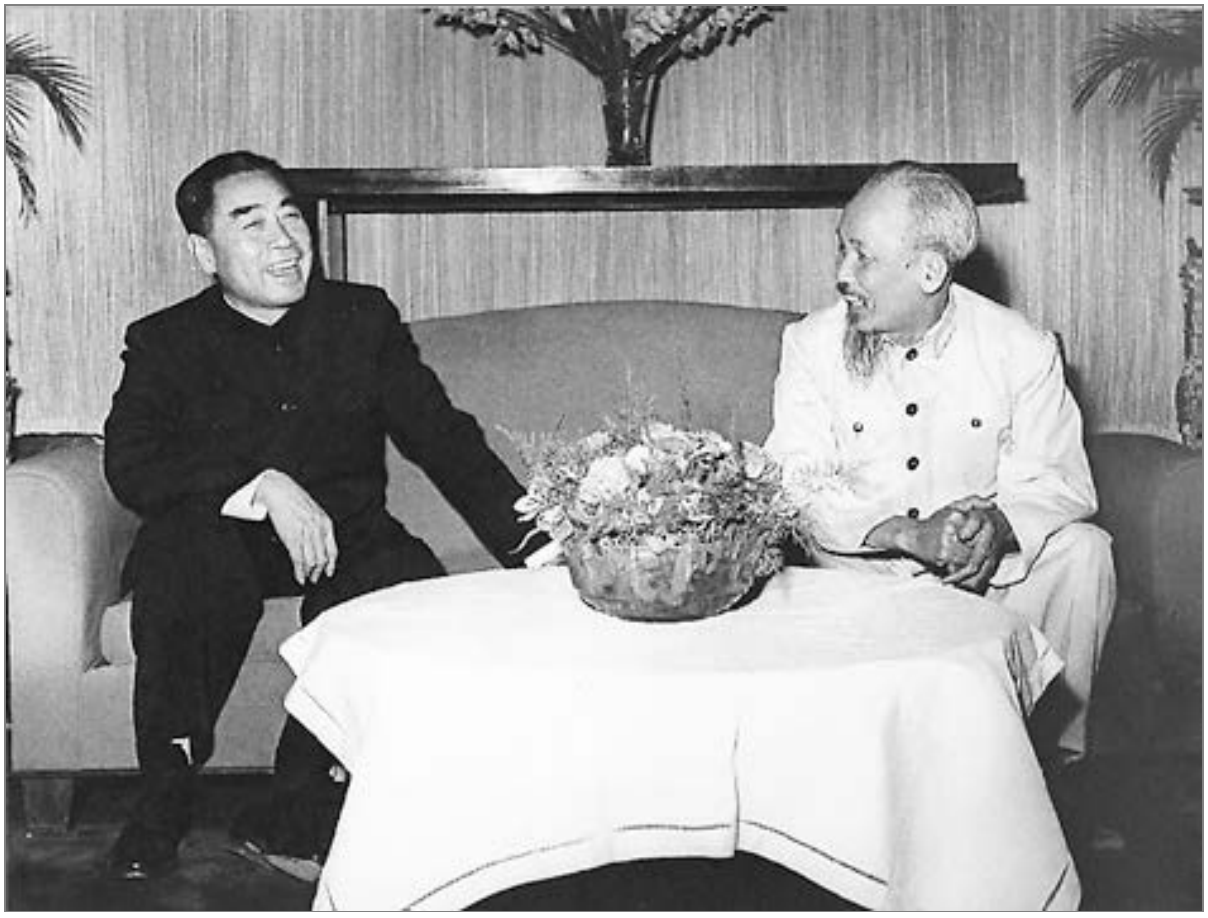
1956年1月，北京市各界人士举行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这是周恩来和彭真（右一）陪同毛泽东接受工商业代表乐松生（左一）呈献报喜信

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在介绍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时，用谨慎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在激烈的经济辩论中所持的态度。

他说：“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这种呼吁是如此地超越违背了毛的“冒进主义”和左倾所号召的“大跃进”，以至于在毛本人看来这肯定是一种挑衅。周接着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

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

“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大型项目应当与总体发展很好地协调起来，以使不同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发展。如果各部门、各地区试图在顷刻间不分场合，同时干所有的事，不考虑实际条件和盲目冒进的话，那就必然要犯错误。这一点早在1956年就已注意到了。他也明显地不同意毛盲目地蔑视国家预算中的资金限制及因此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越南时和国家主席胡志明交谈，他 们曾在1922年相识于法国巴黎

针对毛1956年在年初提出作为加速发展章程的十二年农业计划，周警告说，粮食生产的上升会受到客观的限制，如洪水、干旱、农田开垦的困难及农业机械的不足，等等。他强调工业发展必须与农业发展协调一致，以避免造成工业由于缺乏适当的原材料而受阻或不能有效地对乡村消费者销售其产品的情形。

从表面上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周并未在党的统治集团内失去任何东西，他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而且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但是，在帷幕之后，一切都是那么纷繁复杂。

周继续从事那些使外部大国对中国进行外交承认的重要工作，并进行谈判以消除美国在台湾的影响。对前者，他声称不必性急，可耐心对待。他对一名外国记者说，“中国的存在是个事实，如果在承认方面或早或迟有困难的话，即没有什么要紧的……中国可以等待”。但是，台湾及其他一些小岛屿的问题却大为不同，“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能对我们自己的领土指手画脚”，他对另一位外国来访者说，“那样做是对主权的侵犯”。他呼吁台湾领导人用超越政党的眼光来看待人民共和国。“所有爱国者，”他那年夏天说，“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加入爱国统一战线，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的罪过，都将受到‘爱国一家’这一原则和既往不咎政策的对待。”如果是周独自控制国内政策的话，那么更多的台湾国民党官员会对此作出反应。但是，后来的一些事件证明他们坚定地留在台湾是明智的。



1956年11月，周恩来访问印度抵达新德里时向欢迎 群众挥手致意。右二为尼赫鲁总理

外交问题此刻是如此繁多，但这位总理对1956年年底进行的一系列外访却感到很惬意。他于11月份离开北京，第二年2月才回到他的办公桌旁，或许他打算巧妙地摆脱党的内部斗争。

他首先访问了越南，接着是柬埔寨和印度。在印度他和尼赫鲁互相冷淡地进行了会晤。这位印度总理把边界分歧问题加以公开化，急于讨论这些问题，但周却不露声色地机敏地观察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感觉程度，声称他可以继续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放到一边，可能他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允许他与印度谈判，除非中国的军队实际上控制了中国所要求的那些领土。

西藏问题是与印度不和的一个原因，尼赫鲁为1950年以来中国对西藏的军事占领而感到惊愕，然而此刻他却未对1956年西藏当地为反抗这种占领而发生的反叛进行干涉。印度人已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很早就拥有对西藏的主权。的确，尼赫鲁也曾向达赖喇嘛说过情，劝他与中国人进行合作。达赖是西藏人的精神领袖，流亡在印度避难。

这种含义明确的干涉使周感到愤怒，因为这表明印度人比他具有更便利的条件来接近西藏的领袖。这把周看做为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争论变成了一个范围更广的东西，从而也变得较为难处理了。

在亚洲的其他地方，周能够成功地消除一些具体的抱怨。他已同意了口才雄辩的新加坡总理戴维·马歇尔的要求，并宣告只要新加坡脱离英联邦而真正独立后，中国将不再把已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中国人当成中国公民。他仅仅要求新加坡随时允许中国人回到自己祖先生活的地方并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中国国籍。（马歇尔本是个犹太人，他向周抱怨说中国阻止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移居到以色列，很明显是为了安抚俄国人。周恩来答应对此事进行调查，结果犹太人的处境事实上变得自由了。）

华侨问题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大问题。在缅甸，周告诉当地的同胞们，他们应当“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他们应当学习当地语言，与当地人联姻，成为缅甸公民，与此同时也就不再归属华侨组织。如果他们要保留中国国籍，那么就不能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不能加入政治党派或参加选举。总理郑重承诺，“我们不在华侨中创建共产主义组织或其他党派”。如果这些人想参加政治活动，那么他们要么取得当地公民资格，要么就返回中国。在中国有大量的政治活动可供他们参加。周终生坚持中国公民与海外

华侨之间的这一明确界线，他甚至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侨们改变自己的信仰，成为穆斯林。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匈牙利时同卡达尔·亚诺什总理握手

在遥远的欧洲，匈牙利人在1956年岁末的几周内，不断提高他们的要求。他们已经无视在寻求一个更加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府中共产党的领导权，公然蔑视中国领导人的警告。苏联似乎会失去对东欧的控制，这是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国际力量的巨大损害。因此，1957年新年之际，周没有如期前往尼泊尔和阿富汗，而是被召回了北京。对于匈牙利危机，毛泽东满腹的“不出我所料”。自1956年2月斯大林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公开斥责其前任的许多政策和决定以来，毛一直焦虑不安。毛有很充足的理由和赫鲁晓夫一样厌恶斯大林，但是他看得更远，他想坐视赫鲁晓夫促使人们对斯大

林产生不信任，无须中国人的劝告。于是，这样便能击中难以驾驭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权力结构的心脏。

“我在电话里告诉周恩来，”这位主席说，“苏联领导人被他们的物质成就所蒙蔽了，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赫鲁晓夫对领导人像斯大林那样搞个人崇拜提出了警告，对此周表示赞赏。他在国内吸取这一教训，例如他告诉党的官员们，“以后领导人进来时，大家不要起来鼓掌。这不是件好事情”。

中国政府需要的最后一件事是保持一个软弱的世界共产主义集团。它有助于赫鲁晓夫保持对东欧的控制。也许是赫鲁晓夫本人要求把周总理从印度召回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访问东欧代表团。苏联已经在华沙和布达佩斯失去了信誉，而中国因有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独立经验而享有声誉，所以在那里可能还会受到欢迎。1957年1月，周抵达多瑙河畔。正如华侨们很快指出的那样，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介入欧洲。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波兰时和波兰统一工人 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右）、部长 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在一起

毫无疑问，周像一个信使，携带着苏联的赫鲁晓夫、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匈牙利的卡达尔各自的最小要求。他的目的是宣传正统的中国观点，即共产主义世界必须有一位领袖，而目前唯有苏联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在这个方面，苏联人已经受到了许多批评；任何通情达理的共产主义者都应当对苏联的领导成绩感到基本满意。但是，那些不得不同苏联人的坦克相伴而生的东欧国家却不以为然。正如周在此次旅途中不断讲到的，他发现要想降低中国人对克里姆林宫的论点和政策的支持是十分方便的。然而，他的外交还是支持苏联东欧集团。

回到莫斯科，周重申了中国对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态度的疑惑。这种态度将削弱苏联政权，把苏联的短处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减速。双方各自保留不同意见。这次访问无异于在苏联人的伤口上撒盐。周后来在回忆这次访问时说：我向赫鲁晓夫总理指出，苏联已经取得了很多的领土，从东部的日本，到中国、中东、东欧和芬兰。

大概是在这次会面期间，周同赫鲁晓夫交换了意见。后来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首都对此津津乐道地作了介绍。赫鲁晓夫抵挡了周对违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修正主义”政策的斥责，在人们看来，赫鲁晓夫可能令人恼怒地攻击过周的阶级出身，“你的这种批评很好，周同志，”他说，“不过你得承认，我来自工人阶级，而你却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

一阵沉默。而后，周镇静地答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我俩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俩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1957年1月底，周又能够继续他那被中断的亚洲之行，访问阿富汗、印度、尼泊尔及锡兰。这时，他的讲话已与早些时候访问亚洲时

的讲话有了重要差异。过去，他经常肯定地说，中国永不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对苏联的明显斥责。所有的亚洲中立国后来都谴责苏对匈牙利和波兰的公然干涉。对此，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可能坚持要求他别提及此事。所以，从现在起，他开始对他的亚洲听众大谈和平共处，而不是沙文主义。在这件事上，周可以私下而不是公开地认为中国比苏联有优势。

在此期间，周在印度试图扩大人们对中国的理解。他发现戈尔创建的维斯伐哈拉提大学是印度唯一一所开设有关中国学科的学校。但是，那里缺少中国书籍。周来到这所学校并允诺给予官方的帮助。不久，1.2万册书就运到了这里，另外还送来了6万卢比（为此，这所印度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称号）。

尽管周在离开万隆以后已经开始对此习以为常，但他还是经常为自己受到的欢迎而吃惊，“在我们所访问的许多地方，”周后来说，“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总有成千上万的人不顾炎热或寒冷，走出来向我们欢呼，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民族习惯向我们问好……整个访问期间，一种强烈的亲密感从未离开我们……我们感到就像在国内，和自己的好朋友、我们的亲属或兄弟们在一起，没有身在异国之感。”假如他改变外国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能力能赶上他同外国人建立感情纽带的能力该有多好啊。

2月初，他返回中国。回北京前，他在南方停留了几周。也许他亲自向在武汉的毛作了汇报，他的同志们对了解中国南部那些弱小国家的不足的兴趣没有对东欧持续危机的兴趣大。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3月5日，周在介绍赫鲁晓夫时告诉中央委员会，“苏联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的批评已经促进了苏联各方面的生活和工作”。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换句话说，在党内应当进行更多的整顿、清除更多刚

愎自用的官员，更加准许公开过去的错误。周颇有预见地警告说，“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10年之后中国的年轻人便会起来造反。



1957年2月，周恩来访问锡兰（今斯里兰 卡）时和班达拉奈克总理在锡兰独立纪念日 庆祝大会主席台上

他劝说毛注意斯大林的暴行及混乱的教训，这些恶果已经波及赫鲁晓夫时代。但是，党内其他人则争辩说，中国和苏联有很大的区别。中国人比较有纪律，没有参与政治的传统。他们认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控制是令人满意的，无须用这种方法来贬低自己。但是，周却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这一运动以“百花齐放”运动的形式开始了，它是毛在周从亚洲和东欧回来后没几天公布的，始于夏初。（运动的名称取自一句古诗，毛把它引用来作运动的主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仿效了中国古代昌盛时期的许多做法。）“百花齐放”运动始于5月10日，同时向公众宣布了共产党的政策，对违背命令的党员严厉惩罚，以及公开地邀请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并告诉党哪些党的政策有错误。毛主席向他的顾虑重重的崇拜者们保证，给予那些对党的权力不构成威胁的非党员知识分子以足够的发言机会。



（1957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小电影演员茜尔维也 纳·罗森堡一起出席酒会，这位小演员正在北京参演 中法合作拍摄的儿童故事片《风筝》

1956年至1957年间，周坚定地支持毛对知识分子实行的这些自由政策，但是许多其他上层领导则明显地割断了与他们的联系。周是

那么天真，以至于相信最近几年上层所有的工作已经完全被用来去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层领导这样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们，会冷静地准备被资产阶级的作家们、三年级的哲学系学生们及象牙塔顶的天体物理学家们所侮辱。有时，他也不是那么乐观。

那些非共产党政治家中有三人已经成了从法律上讲是共产党统治的联合政府内阁的部长，而且他们现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珠炮似的批评引导下已经行动了。但是，周并没有因几个月来提出的问题而开除他们。

于是拥护周恩来的知识分子们在缄默了八年之久后随着“百花齐放”运动的兴起，又开始畅所欲言了，只是这一运动葬送在那些心胸狭窄的共产党员手里。他们急急忙忙劝导毛泽东：如果这种如虎似狼的自由主义任意泛滥下去而不加以制止，那么党和国家就会遭到崩溃的灭顶之灾。到6月份，周就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使那些最勇敢的“花朵”即现在所说的“毒草”受到的责难降至最低限度。目光短视、教育匮乏的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走上自由大道是有限的，即使神话般的传奇人物毛泽东自己对此亦无能为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惨重的教训。

沙文主义在各方面大肆泛滥，例如由于经验浅薄的赫鲁晓夫出尔反尔，人们对俄国的指导帮助产生了一种反感。在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说，“有些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说我们建设工作中的错误和不足是学习苏联的后果，这是有害的观点”。中国最好的途径是明智地借鉴社会主义缔造国的经验，并且避免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但他反对原样照搬和一刀切。

在6月底，周告诫他的共产党同志们，“我们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我们需要广泛的民主，因为我们想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听到他的话的人并不相信他们需要阶级敌人的帮助。

然而，革命取得了什么成果，人们始终不明白。周很悲观地总结说：“有些人说我们的生活水平自解放以来降低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贫困的农民及其代表们尤其提到了这一点，不过周在这次6月份的讲话中，阐述了在同等劳动生产力条件下，工农收入差别的问题，认为有差异是合情合理的，应该避免平均主义。其实，在后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周在论述工资问题时，曾强烈地抨击平均主义，但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他当时就受到党的左翼分子们的刁难。

为了给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他一直不遗余力，毫不动摇。8月份，他就中国少数民族问题所作的长篇讲话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是一次大曝光。此后20多年，他一直由于讲话太诚实而受到国内反对者的抵制。他小心翼翼地分析了汉族沙文主义。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以“老大”的眼光对待中国边疆地区的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这样自然形成了地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两者都应被制止。总理语重心长地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指出了西藏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不信任甚至憎恨汉人的原因。他承认，过去汉人侵犯过少数民族，不过他们也受到过报应。他捍卫政府的长期目标，为此他解释道：“同化如果意味着用武力，并使一个民族毁灭另一个民族，那它就是反动的；如果意味着民族与民族在朝着繁荣昌盛奋进过程中的自然融合，那它就是进步的。”

这是有远见的，正像周就一系列问题作过的讲话一样。然而就因为这些，他在党内的地位骤然下降。到1957年年底，他由于反“冒进”而不得不做检讨。至此，在“整风运动”和“百花齐放”运动中及在经济问题上（在这个问题上急躁的毛最终被说服了），他都是属于失势的那一方。

1958年2月，周的老朋友和同事陈毅接替他任外交部长可能就是因为以上原因。随着两方面工作重担的不断增加，他也应该放弃他的

双重职位，周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很可能的。但是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有种新的民族主义基调，这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同苏联、印度及西方关系的协调现在必须逐渐地由一种新的实力所取代。对此周可能已表示认可，因为即使陈毅接替了他的外交部长职务，但在对外决策中他依旧继续起着主导作用，如就那个时候的重大问题作出重要声明，与像尼赫鲁这样中国必须与之谈判的外国人物打交道。率领重要的中国代表团出国访问的仍是周，他曾先后到过非洲和苏联。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为了拯救陈毅，周为此作了顽强的斗争，尽管而后的事实证明这是徒劳的。1958年的决定，可能旨在减少周在国内所受到的责难。对他的批评家们来说，那或许是摆出的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姿态，或者可能是一个实质性的行政改进步骤，也很可能包括了这两个方面。无论如何，他有失体面但不少权威。



1958年，周恩来视察北京郊区玉泉山农业社

然而，关于1958年其他方面的情况，那就是毛发动了一场“大跃进”。在准备“大跃进”的乌云笼罩下，周辛勤地工作着，试图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在严重地依赖苏联顾问和专家的情况下，周和他的专家治国论者们曾指导着中国经济走过相当传统的道路达八年之久，但成效甚微。1958年年初，为了加速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毛赢得了党的支持创立了所谓的“六十条”。在这些问题上周倾向于谨慎。

但是周善于以某种方式起带头作用，其一是他提出了国家领导应当参加体力劳动。以往，党的领导疏远普通人民，党内滋长着周所描述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僚主义、僵化、傲慢和娇气”。在1958年刮起的新热潮里，周至少有三次参加了体力劳动。头两次是在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水库工地。那是一个5月的上午，周和身着工作服的毛出现在水库工地。有一则报道说，他“挖泥土然后把土放进筐里，额头上滴着汗珠。轮到他平整土地时，周恩来不仅把地面弄平而且还用锄头把它加固”。他后来又加入了运土大军—中国非机械化的建筑工地上的典型特征。（领导事先已安排工人们在他们的筐里少放些泥土，所以这些来访的领导们不得不要求多加一点土。）

几周以后，周又来到那个工地。这次他从党政部门带去了500人，在那儿待了一星期建筑水坝。当那些手掌柔滑的官僚们初次来到工地时，建筑工人的头头们向扛着红旗的周表示欢迎。

“首长，我们热烈欢迎您。”

“这里没有首长，”周告诫，“谁是‘首长’？这里没有总理，也不存在首长，我们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周在一间小房子里住了一周，屋里仅有两条窄小的长凳，一张餐桌，一床粗劣的被子，一张书桌和两把硬椅子。他和工人们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但是晚上他还得伏案研究政府文件，直至深夜。周的臂伤很能说明他这次劳动的辛苦程度非同一般，可是他仍设法拉着装满石头的手推车走在一块12英寸宽的木板

上。工人们总是择些小石块递给周，筐篓也是慢慢地拿给他，以便让他能歇息一下，但这些计谋总是被他识破，大家又不得不依着他。

7月，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那是在黄河大桥被冲垮的时候。周匆忙赶往现场，最后步行了两英里路，深夜才到达。人们递给他雨衣，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大家不都是浸在雨水中吗？”当桥梁工人们讨论下一步的措施时，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试图鼓舞大家的士气。同年，周又和陈毅一起去河北省炼钢。



1959年10月，周恩来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地视察

另外一次使周耗费精力的事是中苏关系突转紧张。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上，周优先考虑的是试图“徒劳地去说服苏联不要在修正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但是当他作为毛的副手到苏联作最后一次访问的时候，各种不可思议的背叛行为发生了。苏联驻华大使曾对赫鲁晓夫抱怨，说周是最善雄辩的苏联对手之一—而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不甚科学的分析。但是，照赫鲁晓夫自己的话说，如果毛真要使他的同事下不了台，抹掉他可能作出过的任何理解和让步，按毛自己的主张并且强迫别的党也这么做的话，那就失败了。(6)

在莫斯科周保持着沉默。但是几个月后，隔断台湾和大陆的台湾海峡，尤其是那些被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的紧张局势上升成一场危机，这很可能又会把美国人卷进去。1958年赫鲁晓夫飞到北京，他要求中国不要在他试图引诱美国人搞缓和的时候刺激美国。令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用讥诮的话气跑了苏联领导人。

接着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认可了毛的“大跃进”，大会抵制了周的劝告而又得到了刘的默许。在周及他的专家治国论者们看来，毛确定的目标太高，例如，中国是不可能一下子把粮食产量翻一番的。1958年至1959年的冬天一过，人们便都能清楚地看出毛的目标确实高得令人好笑，作为一个经济当家人的诺言兑不了现。

还将会发生什么事呢？周企图取得领导地位吗？世界报纸推测周可能成为毛的接班人当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林彪元帅可能取代周当上总理。周在克服了自己的反感后，会在有限的共产主义纲领问题上继续同毛或者刘合作吗？中国共产主义的整个未来和周的个人历程都放置在同一架天平上。

拨乱反正（1959~1961）

1959年年初，赫鲁晓夫问：“周同志，我们苏联培养出来的那些中国钢铁工程师都在哪儿？”周很不好意思地说“在农村培养他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在此期间钢厂却留给了那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来管理。早年，周曾详尽地阐述过，一个人要放下自己的资产阶级架子，就应当从事点体力劳动。但是，毛在贯彻这一政策时却做过了头。这时，俄国人坚持说，在为提高生产而开展的激烈的“大跃进”运动之后，中国的钢厂一片混乱。“大跃进”的开展，没有适当考虑到工厂和设备的管理。赫鲁晓夫指出：“我可以这么说，周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相当愚蠢的，但是他又无能为力—‘大跃进’不是他的主意。”

毛白白浪费了苏联给他的援助。然而，1959年年初，周却在莫斯科请求苏联给予更多的援助，并保证更好地加以使用。也许俄国人确实希望性情暴躁的毛泽东最终会名声扫地，与俄国人交情甚笃文质彬彬的周会不顾毛的含蓄警告，成为北京的首脑人物。不管什么原因，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了周对莫斯科朝觐的高峰，也标志着中苏关系在总体上达到了顶点。周满载而归。苏许诺帮助创建30家新工厂，并给予2.5亿美元的新的援助。

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接任毛的职务（几年前，领导内部就已同意了，但是新的形势使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时刻，周选择了强调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必要性的做法，他不仅这么说，也这么做了。当他驱车来到举行代表大会的地方时，一辆小车已停在他前面的入口处。他只好耐心地等待。当一个势利眼工作人员看到总理的车也在那里等候时，便洋相百出地赶忙领那辆车离开，让周的车通行。

“为什么让那辆车走开？”周问，“谁在里边？”当他听说那辆被无礼轰走的车内坐的是一位省级代表时，便生气地告诉那位工作人员：“请你把他请回来。他是代表，我也是代表。”

周所作的关于“大跃进”的报告，很清楚地反映了他准备作出的判断，他用一种委婉的很有技巧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怨言和申诉。这一报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是专家治国论者们对一个迅速实现共产主义的试验的评价，这一试验可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最终也给中国带来了一点进步。

“把‘大跃进’看做工农业总产值比例的增长和每项产品在以后每年里都必须提高，这是非常行不通的……许多重要的原料及其他原料、电力与运输能力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1959年5月，周恩来重返天津南开大学同师生们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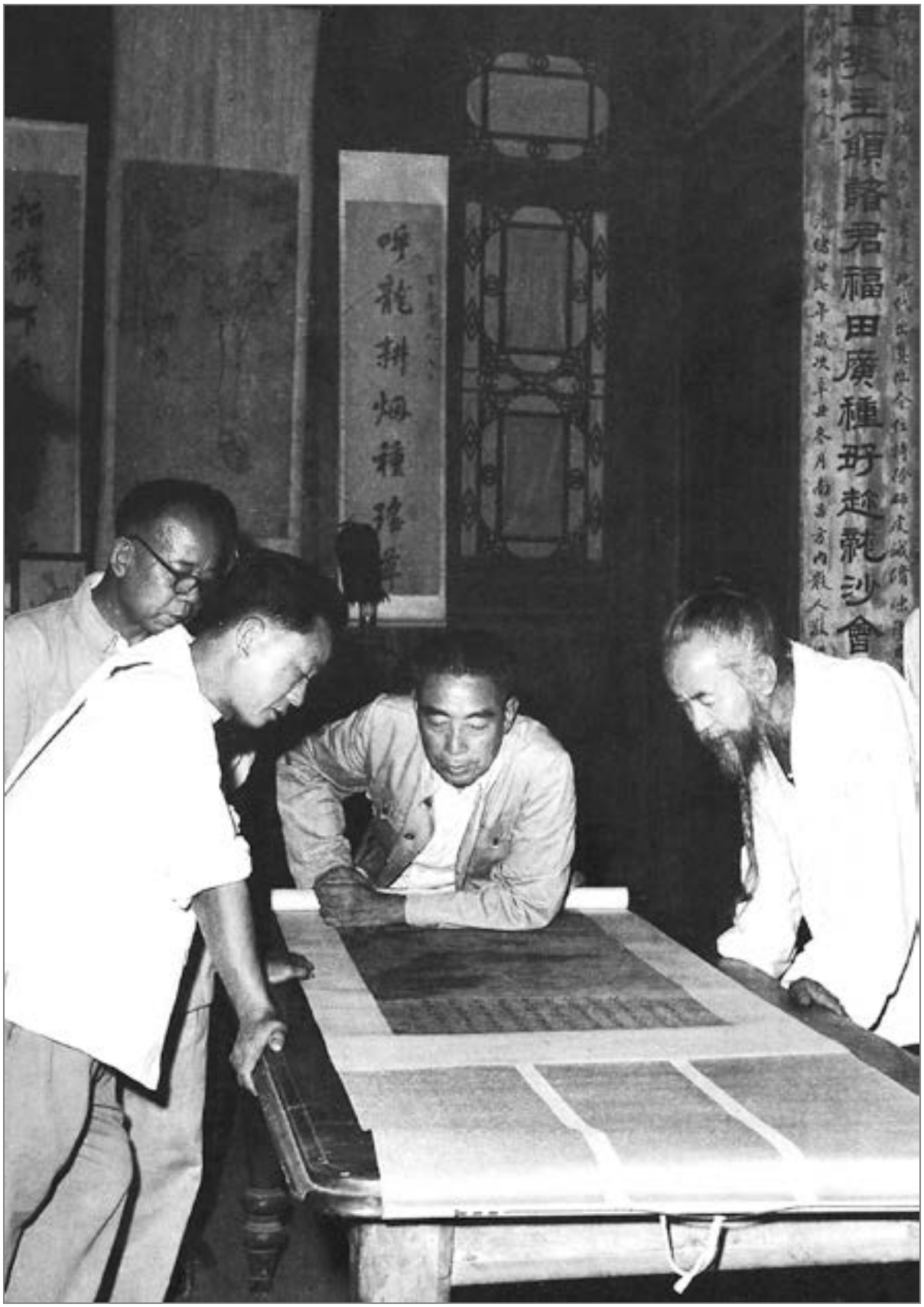
应当制订出“旬、月和季度生产与建设计划”，成立新的检查团检查结果—这一措施将宣告经济无政府主义美梦的结束。“大跃进”中生

产力的损失和浪费必将得到补偿，城镇也将不得不调出它们不熟练的劳力，使之重返需要他们的农村。

然而，即便是在耗资巨大而收效甚微的“就地”炼钢运动中，也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土洋结合方法永远适用，我们用‘土洋’表示的内容与形式方面的思想到了将来会与现在大不相同。”也就是说，小型村办工业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质量应当提高。赫赫有名的土高炉必须改进设备，然后它仍“将在炼铁与炼钢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重点在于“一定”这两个字上。周详尽阐述了把更多的生产劳动引入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并逐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这样的话，“学校就将逐渐成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学校”。

尽管周期望立即使中国走向正规道路，但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却粗率地下令取消了苏联对中国研制核炸弹项目的援助。想当初，周是那样引人注目地获得了苏联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的新许诺。然而，事隔五个月，苏联的援助就毫无指望了。

7月底，中央在庐山召开一次紧张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毛的“滑铁卢”(7)。主要问题是：毛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吗？新的领导班子及政策是什么？毛就像一个患着病正在吃饭的人，既要吃药，又想吃饭，不知所措。他承认，大约在一年前，他接管了经济工作。以此为话头，他接着说，“但是，过去的责任在其他人身上”。“煤和铁自己不会走，”毛告诉中央委员会，“它们需要用车去拉。这一点我早就料到了。我和……总理对此关心不够，你们不妨说是我们忽视了这点。”当然，他也免不了为周美言几句。“当时反冒进主义者们（如1956年反对加速发展的初期计划）现在更加坚定了。恩来同志就是一个例子。他有巨大的能力……奇怪的是，当时批评恩来的人，这次都跟他站在了一起。”



1961年9月，周恩来在江西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观赏书 画。右一为全国政协委员韩守松道士

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认为毛做得太过分了，彭德怀发起了抨击。这激起了毛强烈的报复心理，并设法联合一些中间派。这些中立者仍不愿看到他们的领导决策在中央流产。毛坚持要求再次召开一个有他自己的支持者参加的会议。他威胁说，如果党投票反对他，他就跟党分裂。这一招使他获得了向那些在庐山会议上与他作对的人实行报复的机会。但是，这件事严重地削弱了党的团结，助长了毛在未来岁月里的飞扬跋扈。

庐山会议后，周虽变得不受信任了，但还是被留了下来，以保持事情在原有基础上的连续发展。毛是全权负责人，刘为他的副手。在继庐山会议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尽可能地对此作了解释，对“大跃进”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事实证明，大中小工业齐头并进，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有它们的优越性……工厂到处林立；节省了建厂时间……促使我们对物质资源进行广泛调查，促进了节约使用运输工具……钢铁竞赛是十分壮观的……人民对如何把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改造成一个工业国家的理解……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要想掩盖粮食收成的形势是不容易的。“由于缺乏丰收条件下收获的经验、劳动力分配不当……导致匆忙抢收、脱粒……估计也过高。”从整体上看，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的经济形势十分喜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几个月后，在回顾新中国头十年的历史时，周又重申了这一成就，并祝贺中国在共产主义指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产钢国，第三大产煤国和第二大棉纺织国。在他机智老练的领导下，党在北京的宣传机构接二连三地采用统计方法公布了许多不可

靠的想象中的成就，以隐瞒目前笼罩着国家的令人忧郁的经济停滞状况。

外交战线也需要周给予关注。随着周与尼赫鲁在通信中敌对情绪的上升，1959年8月，在中印边界西藏与纳法间的中印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1958年年底，尼赫鲁曾公开对中国在阿克赛钦修造的一条公路提出了异议，并对无视麦克马洪线的中国地图提出了质疑。这是一条已被独立后的印度接受为边界线的旧的国界线。不久，西藏叛乱平息后，达赖喇嘛又逃到德里，两位政治家之间的彼此猜疑进一步加深。尼赫鲁坚持要求对中国边界的位置作出详细解释。直至9月，周才迟迟复信。尼赫鲁接到信后，则被意想不到的事惊呆了，因为信里对整整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提出了争议。

在初期的一次会谈中，当尼赫鲁假心假意地谈到麦克马洪线时，周半开玩笑地插言：“谁是麦克马洪？”他礼貌地指出，为什么老一代的英帝国主义者要支配两位推翻了殖民统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情。印度人对英国的思想、体制，乃至名字的吸收程度一直令周惊叹万分。他在致尼赫鲁的信中说，边界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中国和印度有着共同的体会，即英帝国主义“本应自然地引导他们”就边界问题“达成一致看法”，相反印度却要求中国接受被英帝国主义者单方面扩大了的边界线。信的末尾，周还用了五项原则，这些原则当初是由这两位政治家兴高采烈地公布于世的。信的最后，周还极力主张应当和平地维持现状，不应单方面或用武力方式破坏它。

尼赫鲁声称自己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他回忆道：

独立的印度政府想从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获益的说法，令我深感吃惊和忧伤。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结盟。印度人民反对国内外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众所周知的，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英国占领和统治印度次大陆违背了印度人民的意愿。这是毋庸置疑的事

实。印度边界是由几千年来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及传统而确定下来的。

9月，赫鲁晓夫访华，他徒劳地想对周的同僚仍实行约束，结果毫无用处。当周开始解释中国对印度边界问题的立场时，这位苏联领袖无视送给他的地图和文件，说："你不能重造历史。"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周对一位外宾发表评论，指出当他得知尼赫鲁在英国出版的自传里说书中地图是符合中国对边界线要求的那份地图时，深感意外。尼要么是一个两面派，要么就是没有看到那份地图。不管怎么说，周确实很惊讶。这位外宾报道："周恩来显然对尼赫鲁的性格和反应困惑不解。他以为尼赫鲁的反应会像亚洲人（指中国人）。"尼赫鲁本人是自作主张、独立行事呢，还是受"帝国主义"所迫而这么做的？对此，周不得其解。他错误地估计了国会在边界问题上对尼赫鲁行动自由的约束这一政治作用。

翌年，周想通过孤立尼赫鲁来解决印度边界争端，包括同中国南部的其他邻国签订边界条约，以此迫使印度就范。1960年1月，中缅签署条约，3月中尼签约。这些条约在另外的环境下也可以为印度提供范例。但是，当周和陈毅于该年春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及蒙古等国时，他们发现尼赫鲁还是那么固执。于是，周对新德里的访问，只是彼此重复过去的所有的争端。当尼赫鲁抗议道西藏至尼泊尔的公路将首次给中国提供了通往印度的道路时，周激动地回答："恰恰相反，它第一次为印度提供了通往中国之路。"



1960年4月，周恩来和陈毅访问缅甸时在吴努总理陪同下 欢庆泼水节
（杜修贤 摄）

周强忍了尼赫鲁的责难，又不得不忍受尼赫鲁的助手德赛的一番长篇大论。此人说教式的方法惹得周愤然离席。周同尼赫鲁的亲信、外事专家梅农相处得也不融洽。令人费解的是，印度议会却流言四起：只要周恩来掌权，印中关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周所带到德里来的大批外交部官员及使尼赫鲁感到头痛的数据都没派上用场。经过一周毫无结果的讨论，懊恼的周恩来说“我根本无法说服尼赫鲁”。他后来告诉一位记者，“我想他早已拿定了主意”。

彬彬有礼的尼泊尔人同周签订了条约。在柬埔寨，周还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一个条约。周是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父亲的葬礼的。这位亲王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都送到了北京读书。

最后一站是蒙古。中蒙已经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和援助条款。此次来蒙，周穿着大大的羊皮袍，频频举杯祝酒。骆驼皮鼓和管风琴则在一旁竞相演奏《国际歌》。

由于受到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受到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大权力中心的排斥，中国便有必要在亚洲和非洲积极寻求更多的朋友。周在4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说，这些国家“过去常常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现在已成了反对侵略与殖民主义的前方，“我们打算尽力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民族独立运动”。



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期间宣布中国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五项原 则，这是他和陈毅（右）参观狮身人面像时的留影（杜修贤 摄）

此时是周的第三世界外交出师不利的时期。例如，当叙利亚与埃及联合组成联合阿拉伯共和国时，周陷入了混乱之中。他发现自己在支持叙利亚共产主义者，由此遭到了纳赛尔的怨恨。在万隆时，周曾和他热情地相见，并在苏伊士事件的关键时刻又非常关心地相助过。周说，现在，纳赛尔则在阻挡“阿拉伯民族独立事业”。可见，周并不像他的赞赏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机智老练。

周还遇到了这样一个困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不结盟国家，都被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苏美缓和所迷惑住了。1959年年底，韩素音在北京向周坦白道：“总理，我太轻信了，竟以为戴维营会谈对全世界是件好事情。”

“而后是沉默，”她后来说，“大家都一动不动，做记录的秘书愣住了，执笔不动。”周的助手“盯着我，周恩来的面容刹那间显得很疲倦，眼圈周围布满了细小的皱纹”。

“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周说，“和解并不意味着出卖第三世界的人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它就不是和约，而是屈从。我们现在必须作出抉择：全世界的人民要么争取自己民族获得解放的权利，要么就将世代沦为奴隶……在这一点上，我们永不妥协。”韩素音说，她此时才理解西方记者们所说的“中国人不妥协”—或许还应加上，作为非欧洲文化先锋的中国人其自我领悟的作用。

然而，中国正在遭受饥荒。毛的以掠夺土地为代价多生产粮食的政策，受到了连续三年干旱和洪水的惩罚，周称之为“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天灾”。当毛和其他人闷闷不乐时，周却艰难地维持着这个绝境中的国家。一位中产阶级专家自信地说：“周……将找到一条整顿混乱局面的道路。他向来如此。”

有一次，周的秘书拿着一些药来到他的卧室。周正半躺在床上，戴着眼镜，全神贯注地阅读身边的文件，做着总结。

“让别人干这种技术性的具体工作不是更好吗？”助手建议。“你认为这种工作是具体的、技术性的？”周答道，“可是，它同样很重要。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它是解决几亿人民温饱问题的重要工作，如果我不亲自干，怎么能知道详细情况呢？”实际上，周正在计算全国的粮食配给量。

“这不是一件纯技术性的工作。”他补充道，呷了一口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周本人及全家都很少吃肉和鸡蛋，至少在家里是这样。邓颖超还主张通过少吃和节食来治疗自己的糖尿病。

中国的问题在增多。中苏之争逐步升级。1960年年初，愤怒的赫鲁晓夫从中国撤走了全部苏联技术专家。本已虚弱不堪的中国经济更加削弱了。周后来解释说，“1390名苏联专家突然全部撤走……废除了257项科学与技术合作项目。从那以后，又大规模地缩减整套设备的供应，完全打乱了中国的计划，加重了它的困难”。

当时，周还想减小这一事态的严重性。在一次会见中，周告诉埃德加·斯诺，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在理论上与分析上应当允许有差异，这是我们的希望。周接着说：“一些苏联专家的撤离回国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既然来到中国，有朝一日他们也必定要回去，他们不可能在这里待一辈子。他们在中国工作了一定的时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也许是因为这一年有大批人回归，所以才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

这种搪塞和周是不相称的。或许这表明周正忍受着极大的压力，忘我地工作着。《展望》杂志认为他是想掩盖苏联专家离去的“悲哀”。



1961年7月，周恩来和出席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的艺术 家们同游北京香山（杜修贤 摄）

作家韩素音再次拜访了周，但周的身体已变得不如从前了。

他步履缓慢，面无表情地环顾四周，明显劳累过度。但是，他在竭力控制着。跟他在一起，任何狂暴怒气都会像闪闪发亮的冰块一样，消失得无踪无迹。累了或不安时，他的声音略微打战，但始终冷峻、压抑和低沉。

他是何等的瘦弱啊！我注意到，他的衣领此时已太大了，跟他的脖子不相称。昨晚他一夜没合眼……工作太多了。前天晚上也是如此。他每天只在午饭后睡两小时，即使如此，也还不能保证。但是，

当他说到那些自以为能迫使“我们屈服的人”时，他的声音带着不可战胜的气魄。他认为，“尽管中国面临着种种困难，但它不会被吓倒，也不会被征服”。

他提醒她注意苏联在列宁时期遇到的困苦。“没有辛苦，就没有收获。”他说，她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旅行，还会发现许多问题，“但不是饥荒……‘大跃进’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结果，而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那些认为中国已经失败的人，终有一天会吃惊的”。

几天后，中央在理论上来了一个大转弯。同意开始进行毛早年已经提出的计划，即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将来国家的投资主要用于最有效地利用土地上，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重工业。

也是在1961年年初，周率领400多名随员来到仰光。这是中国派往国外的最大的官方代表团。在这里，中国间接地谈到了对印度的看法。在仰光，中缅边界协议正式通过，还签署了一项3000万英镑的无息贷款（中国对非共产主义国家提供的最大一笔贷款）。意思很明白：印度不答应中国的条件是十分愚蠢的。



1961年4月访问缅甸时，周恩来身着缅甸民族服装，手持银碗，同缅甸人民欢庆泼水节（杜修贤 摄）

1960年赫鲁晓夫突然召回所有专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共产党自身的紧密团结。1961年10月，周接受了一项棘手工作，即在莫斯科第二十二届苏联党代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言。会议的第一天，为了避免同赫鲁晓夫握手，周早早退席。当这位苏联领导人攻击中国的盟友阿尔巴尼亚时，周激动地给予反击。对苏联天真地同新的肯尼迪政府举行认真的会谈，周给予嘲弄。之后，他谈到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问题：

绝不允许任何伤害这种团结的言行。（鼓掌）我们认为，如果兄弟党或兄弟国家之间不幸出现了争端或分歧，也应本着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平等与一致同意的原则，通过磋商加以解决。任何公开的、单方的指责一个兄弟国家都不利于团结，而且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敌人面前公开暴露兄弟党或兄弟国家之间的争端都不能被看做是郑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天上午，周前往红场，不仅向列宁墓敬献了花圈，也向斯大林墓献了花圈。这是对赫鲁晓夫的公开斥责。赫曾竭力地贬低过自己的前任。会议结束前，周借口国内有急事，突然离开了莫斯科。于是，他同苏联领导人果断地断绝了关系。

非洲之行（1962~1965）

经历了“大跃进”的疯狂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之后，周恩来在1962年这一年里显得不那么活跃了。一段日子里，他在休假养病。

在两年的时间里，刘少奇与他的副手邓小平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和政体进行改革，以便使之更好地适应现实。为了有利于经济复苏和提高效率，他们不怕丧失某些党的意识形态原则。邓小平认为，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周恩来则对某些观点加以关注。

周恩来曾对一个善于同第三世界交朋友的英国高级外交官吐露过自己内心的秘密。此人叫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他父亲曾担任过第一位工党首相及战后一些英国首相的顾问。1962年秋天，周恩来对他说，一些人对在中国建立一个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要花费的时间一度持过分乐观的态度。这些乐观主义者期待人民不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毫不抱怨地接受同等报酬，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因此，这些一相情愿的思想家取消了农民在合作化早期被允许保留的自留地。但实践证明，他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们是一些错误地判断了人类本性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接着说，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要教育群众，使他们达到一个公平社会的道德水平所要求的高度。在过渡时期，必须认识到群众仍是一些普通

的人，他们中间有些人先进，有些人落后，因此“物质刺激”是必要的，鉴于那些一相情愿的思想家曾经一度认为中国在十几年内就能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周恩来估计中国还将需要30~40年才能做到资金和消费品的自给自足，而要达到西方那么高的生活水平，还需要差不多100年的时间。



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时，看望烈士子弟之家的孩子们（杜修贤 摄）

尽管麦克唐纳不同意他的看法，周恩来仍对他强调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周围从西边的巴基斯坦到南边的越南、泰国、菲律宾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但他对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表示遗憾，因为他希望中美间的友好关系将为中国带来美国的现代化技术。

他对那种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修复的观点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963年年末对路透社的总经理说：“我认为中国和苏联完全没有理由相互敌视。”然而过了不久，他就在外交领域就国际共运的领导权问题向苏联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

接着，经过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周恩来突然重新活跃起来。他与外交部长陈毅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于1963年12月11日离开北京，[8]开始进行一次异乎寻常的旅行。这次旅行历时72天，行程3.6万英里，共访问了13个第三世界的亚非国家及中国的欧洲小伙伴—阿尔巴尼亚。这次出访对其中一些国家来说是没有先例的，这些国家过去从未接待过一个中国领导人，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实际上几乎连中国人都没见过。这次出访的目的是使第三世界的舆论同苏联脱钩，并说服这些国家投向中国一边。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支持按照万隆模式来举行第二届亚非会议，并力图把苏联排除在会议之外，因为它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周恩来还希望减少非洲国家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以促使人民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的会员国资格。周恩来还希望推销一个新奇的概念，即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可取，因为中国专家愿意按第三世界的生活标准生活—不要任何特权，而西方专家们做不到这一点。



1963年周恩来在首都机场（杜修贤 摄）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突尼斯时在答谢宴会上欣赏布尔吉巴总统（前排左）赠送的影集（杜修贤 摄）

周恩来乘坐的飞机是一架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客机，这种飞机被欧洲新闻界不客气地描绘为一种“非常老式的由美国人制造、德国人驾驶的螺旋桨式飞机”，并被不恰当地命名为“波罗的海”号。周恩来在飞越印度开始其对开罗的主要旅行之前，在仰光与缅甸总统奈温共进了一次便餐。

这次旅行一开头就不顺利。纳赛尔总统甚至没有待在国内欢迎他的客人，而是在突尼斯同突尼斯人讨论怎样应付中国人来访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在万隆会议期间，他对中国很有好感，对1956年苏伊士

运河危机期间中国给予的大量的物质援助也不无感激之情。他这些好感现在已让位给胆怯的不偏不倚政策，因为俄国人正在警告每个人不要与中国接近。与此同时，纳赛尔的手下以一种值得怀疑的敬意把周恩来安置在前国王法鲁克曾住过的宫殿里，然后又不那么得体地安排周恩来参观他们视之为骄傲与欢乐的由苏联援建的阿斯旺水坝。在攀登水电站的长台阶时，周恩来的病犯了。这位总理的鼻子往外流血，他的一个助手对他进行水敷治疗。有人递给他一瓶美国软饮料，结果被他挥手拒绝。他手下的一名官员解释说：“他常犯这种病，问题不大，这就是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名医生的原因。”他的身体不如“三年困难时期”以前那么健康了。



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几内亚时观看热带粮食作物木薯（杜修贤 摄）

当周恩来后来终于见到纳赛尔时，他首先便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受到挫折，在这个问题上纳赛尔强烈地支持印度的立场。周恩来对纳赛尔说，中国与埃及能赶上并超过西方，然后“我们将把世界的重心引回东方”。但引到什么程度？埃及人对此感到疑惑。

周恩来很快飞往阿尔及利亚，那里将举行拟议中的亚非会议。接下来周又飞往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在阿尔巴尼亚他踏着舞步走进了1964年。他分别参加了三个不同的招待会，并在会上频频举杯，欢庆新年。（一个参加者回忆道：“他舞跳得极好，并能当场跳阿尔巴尼亚的民间舞。他的酒量也不小。”）后来，周在突尼斯第一次碰到了麻烦，布尔吉巴总统当面对他说：“中国的一些立场引起突尼斯人的怀疑，例如中国诉诸武力解决它与印度的边界纠纷，中国还反对禁止核试验公约。难道你不认为这个公约对全人类的愿望来说是一个保证？”（中国认为该公约是超级大国永远统治全世界的通行证。）

尽管布尔吉巴后来对记者说：“我告诉他，我们对他的观点感到吃惊。我说你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敌人，西方的敌人，印度的敌人，赫鲁晓夫的敌人—每个人的敌人而来到非洲……别的人不会对你直言，但我会。你的观点在这个大陆是不会行得通的。”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恩来在访问中进行谈判设法得到的是突尼斯对中国的承认，这几乎是他整个旅行中唯一的立即见效的实质性收获。

周恩来勇敢地飞往加纳，开始了中国领导人对黑非洲的首次访问。恩克鲁玛希望能使周恩来对他自己所声称的加纳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表示认可，但这种社会主义在形式上与共产党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他的希望落了空。周恩来对西非其他国家的访问均进行得极为平淡。

由于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和桑给巴尔还受着军人政变的威胁，在对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之后（在苏丹他感谢苏丹人杀死了查尔斯·戈登，这个英国将军曾在1860年劫掠了北京的圆明园），周恩来决定结束他的非洲之行。他从索马里飞离非洲，在那里他说了一句响亮的名言：“整个非洲大陆是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告诉索马里人：“在同一场革命中，我们亚非人民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兄弟，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斗争任务。”这些话对他来说固然痛快，但承担这些关于共同利益的概念的基础尚未建立。这个讲话对非洲那些地位不稳的国家领导人来说，则认为任何革命都是针对他们的。

非洲国家向周恩来表达了他们要摆脱欧洲影响的愿望，也许是受到这种感情的鼓舞，周恩来引用了两句中国古诗：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他补充说道：“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队伍，有如千帆过海，浩浩荡荡；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如万木逢春，欣欣向荣。”唉，可惜对大多数黑非洲国家来说，热带季节里不存在一个温和的春天去象征每年气候轮回的开始。周恩来这番话只能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正如在他之前对欧洲人所做过的那样。

因此，突尼斯的外交承认及埃塞俄比亚许诺的外交承认可算是这次费力的旅行所声称得到的全部成果。1964年2月4日，周恩来回到昆明，像在东非一样他取消了计划中对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访问。在访非期间，他还为第二届亚非会议积极游说。并极力表白中国的一个观点：非洲可以指望中国来代替苏联的援助，但他显然没有预

料到尼赫鲁的印度已在非洲获得如此之多的支持。因此，他回到昆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去仰光进行新的访问。

2月14日，周恩来在陈毅副总理和夫人陪同下到达缅甸。在那里他告诉听众：“我们新崛起的亚非国家，都曾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是继续进行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每个人都看得出，这个“新殖民主义”是指“苏联”，但没有人愿意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损害与苏联人的友谊。



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索马里时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右 一为阿里·舍马克总理（杜修贤 摄）

此时，奈温已见过了尼赫鲁，但印度总理拒绝与周恩来举行另一轮会谈。

周恩来再次飞越印度到巴基斯坦访问，最后以访问锡兰来结束他这次漫长而持久的远征。他对日本记者说“亚洲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次惊人的外交马拉松举世无双，周恩来在一次持续性的旅行中横跨了3个大陆，访问的国家中大部分是陌生的新独立的国家，他所创下的体力上的纪录，可能任何一个大国的总理也无法与之相比。但他却没能完全达到这次访问的目的—迅速扩大中国的影响。



1964年2月，周恩来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签署《中锡 联合会报》（杜修贤 摄）

有时，与第三世界拉关系的努力似乎是注定要失败。智利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拉丁美洲卓越的诗人鲍勃罗·聂鲁达特别提到周恩来曾对

一个自愿绝育的中国青年表示祝贺并把他树为学习的榜样，但聂鲁达对此加以指责。

另外还有尼赫鲁，此人似乎感染和影响了众多的周恩来想交往的非洲领导人。周恩来对锡兰来访者说：“我从未碰见过一个比尼赫鲁更傲慢的人，这样说他我很遗憾，但事实就是如此。”

然而，周恩来总是喜欢坦率地交换看法，当得知一年多以前曾访问过中国的英国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竭力为印度辩护时，他说如果能与麦克唐纳就这个问题辩论那么几个小时的话，他将感到很“高兴”。

1964年8月，疾病再次妨碍周恩来履行其公共职责。他没有公开露面。北京的外交官说他进行了一次小手术，现在正在北戴河疗养。当他终于在秋天回到办公桌旁时，他指挥生产出一件使别的国家，不论是苏联、黑非洲、美帝国主义或是吹毛求疵的不结盟国家都要对中国刮目相看的东西，那就是一颗原子弹。在此之前的10年时间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差不多成百次国防科技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和制订有关制造原子弹的问题和计划。早在1964年夏天，他已经估计到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不用苏联的帮助也能制造出原子弹来。因此，他写信给各国领导人，提出召开一个讨论有关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国际会议。此刻，1964年10月，电影和照片都证实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它的核武器。当周恩来看到蘑菇云升起时，兴奋地鼓着掌欢呼说“我们赢了”，他还急切地用放大镜仔细地检查了拍下来的照片。他再次重申了他的呼吁，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使“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

不久，周恩来再次出现在苏联，但这次去是会见苏联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俄国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准备向中国作任何让

步。当别的人都在为勃列日涅夫所提到的与美国的缓和而鼓掌时，周恩来正沉着脸保持缄默。他也没能说服苏联人取消他们计划召开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加强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控制的一个手段。像以前一样，周恩来给斯大林的坟墓献上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花圈。

后来，当柯西金总理飞往北京去会见周恩来时，周恩来继续辩论说，俄国新领导人应该取消赫鲁晓夫筹划的、目的在于显示其政策急剧转变的国际会议。

1964年年底，周恩来两次接见埃德加·斯诺，每次与他交谈的时间都达四小时之久。斯诺发现周恩来身体很好，并对他生病的“谣言”置之一笑，但他的头上却已出现了几缕白发。

坦率地讲，作为总理，我并不完全掌管中国的经济建设……我学会了一些东西，但学得不怎么好……经济发展规律极其复杂。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但还有更多的经济发展规律有待我们去探索。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干了不少好事，但我们也做错了一些事。

斯诺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将像他们宣传的那样赶上英国的工业生产？周恩来承认：“赶上英国已不再是我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我们的工业现代化也不能仅通过增加几种工业品产量的办法来实现。”

周恩来直言反对一些右倾做法，而这些做法却得到推行务实政策的刘少奇某种程度的鼓励。但周恩来倒是全力支持刘少奇的教育计划，他尤其赞成对中国的学校进行必要的改革。

当周恩来在1964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把1959年至1962年的灾难称之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失败时，许多人已经积极地

赞成扩大农民的自留地，发展自由市场；有人甚至主张在农村实行切实有效的非集体化措施。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

周恩来既不是一个死硬的保守派，也并非一个温和的自由派。当来访的欧洲作家K.S.卡罗尔问周恩来中国是否在实行斯大林主义时，周恩来借此机会作了一个使欧洲的左派人士获益匪浅的阐述。

中国革命并没有挥舞一根魔棒使社会上阶级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剥夺了剥削阶级的剥削手段，但我们没有“在肉体上消灭或者是驱逐他们。……当剥削者还能够用武力保护他们的特权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最极端的手段对付我们。现在，政权在我们手中，我们把教育手段放在首位。我们告诉剥削者，如果他们愿意为祖国效力，就都可以被教育好。……我们只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犯法行为采取严厉手段。

周恩来要求国防部延长新兵的训练期限，但忠于林彪（毛泽东的国防部长）的高级军官拒绝了这项建议，并把这项决定以一种令人恼火的形式记录下来。周恩来看了以后非常气愤。然而毛泽东支持军人们的做法，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否定周恩来的做法。1965年，周恩来对苏加诺总统试图建立一个与现存的联合国唱反调的联合国的主张表示支持。周恩来在1月份宣称现存的联合国犯了许多错误。

亚非国家对它已完全不抱希望。……它必须进行彻底地重新改组……现在这个所谓的联合国为美帝国主义所操纵，因此它只干坏事。必须建立另一个联合国，来与现在这个联合国唱对台戏。

周恩来还向日本人做工作，试图使他们对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的做法感到羞耻。他曾接见过一个日本代表团，该代表团成员对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歉意。周恩来笑着说：你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的灭亡，而且通过反对你们的民族战争，中国人民获得了新生，他们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他在接见另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我们东方国家应

该世世代代联合起来求得共同生存与共同繁荣。”为此，俄国人把他称为种族主义者。

1965年夏，周恩来再次踏上非洲大陆，为他所倡导支持的第二次亚非会议进行劝说。他访问了上一次访问错过去的坦桑尼亚，在那里他忍不住旧话重提：“现在不仅非洲，而且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后，他飞往开罗去为亚非会议做一些准备工作，却令人失望地获悉，他“在非洲最亲密的知心朋友”阿尔及利亚总理本·贝拉被迅速地推翻了。周恩来立即承认阿尔及利亚新政权，希望能继续召开亚非会议，但令他恼火的是他的外交官报告说，不论是在阻止苏联参加会议或是在谴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这些中国新近关心的问题上，中国都无法争取到大多数。周恩来与苏加诺、纳赛尔、阿尤布·汗乘坐同一辆车从开罗机场驶往一个会议厅去讨论是否能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结果答案是否定的。美国和苏联比他们要强大得多，甚至在第三世界的领导人中美国和苏联比周恩来拥有更多的朋友。

如果著名的埃及新闻工作者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话是值得相信的，而且假设他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那么周恩来此时便表现得对他的国际外交略感失望。海卡尔说，周恩来曾经告诉纳赛尔，美国部队去越南，将像安全阀一样使中国免受核攻击。中国有了“一个武力所及范围内的打击目标……这些美国部队离中国如此之近使我们能拿他们当人质”。

同时，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周恩来好像又特别需要一次外交上的成功来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然而他的运气却不太好，在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他曾写过一部关于30年以前上海革命的小说）看来，周恩来的沮丧表现得很明显。在8月份与周恩来的会见中，马尔罗发现他“无可挑剔的温文有礼”（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发现周恩来“感到倦怠”的西方人）。会谈中他说美国人正在成为“世界警

察，为什么这么干？让他们回家去，世界将再次获得和平”。 这时，在中国内部，领导层之间的危机正在临近。

一个中国最有名的戏剧家写了一出影射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剧本，人们对这个剧本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上层对立双方的态度。

“文革”之初（1966~1967）

1966年，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变得激烈起来。刘少奇对巴基斯坦和缅甸进行了一次官方访问，他显然希望像周恩来那样从这类出访中获取一定的声望。

当毛泽东在广东附近休养时，周恩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自主权越来越大。在一些日共成员拜会毛泽东，希望说服他更多地与苏联合作时，出现了一种令人尴尬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大发雷霆。因为他的部下对他封锁消息，他是从日本人嘴里才得知中国人已经与这些日本来访者签署了一个联合公报。在公报里，周恩来保证中苏将进行合作，以援助被围困的越南。而且，苏联给越南军队的装备实际上正通过中国的铁路运往越南。毛泽东当着日本客人的面对他的手下进行责难，这时周恩来的处境似乎不太妙。可周恩来的力量就在于他是毛泽东的副手中唯一能够习惯性地避免对这类挫折作出反应的人。他不对毛泽东的全面权威发起挑战，更不加入他的反对派，而仅仅是平静地接受毛泽东的责难。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正在我国兴起。这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我们必须在所有的学术、教育、新闻、艺术、文学和其他文化领域里大力

提倡无产阶级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问题。



1966年9月，周恩来同即将赴外地串联的北京中学生红卫 兵座谈

5月份，“文革”这场戏只是在北京这个相对小的舞台上展开的。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所掌握。毛泽东的激进追随者们使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来驱逐彭真和其他较低层的刘少奇的支持者，以便用左派来代替他们。这一活动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校园内进行的。北京大学人所共知的汉字缩写为“北大”。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北京的形形色色的“右倾分子”。激进的青年人认为他们的行为和决定既非社会主义又不民主。既然报纸和电台在很大程度上都为那些“右倾分子”所控制，那么这些大字报就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传播媒介。别的学校的学生和企业里的年轻工人来到北大抄下这些大字

报，然后回单位散发，因此这些“革革命者的命的革命者”的目标、战略及他们的情绪很快就会传遍全城。

然后，红卫兵首次登上了舞台，在北京和别的一些城市里，他们围攻“右倾分子”、行政官员或企业负责人，把他们扫地出门并试图接管他们的机构。这样，“左派”取代了“右派”并向着一种更直接更彻底的社会主义航行而去。

1964年开始的社教运动此时仍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由共产党积极分子组成的工作队到农村去纠正一些坏苗头，尤其是纠正由于政策有利于富裕农民不利于贫困农民而造成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据说，刘少奇对这次运动所持的态度惹火了毛。

6月下旬，周恩来出现在欧洲。在那里，他为中国正发生的事进行了辩解。他对罗马尼亚人说：“我们决心清除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用来毒害人民的所有旧思想、旧文化及旧的传统习惯，并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和文化来取代它们。”但周恩来离开布加勒斯特时没有与罗马尼亚人签署联合公报，以表示他对东道国总理毛雷尔“不加掩饰的愤怒”，因为正如某些记者所描述的那样，毛雷尔想在中苏之间保持一种中立的政策。为欢送周恩来而举行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中断了两小时，原因是两国总理发生了争吵。最后，周恩来取消了他的告别演说。

在阿尔巴尼亚这片更为友好的土地上，周恩来能够发表更为积极的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正在运用毛泽东思想粉碎那些阴谋夺权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阴谋。

周恩来回国后发现派到农村的“社教工作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的工作方法过于简单，而不是以教育为主。毛主义者以此为把柄对刘少奇展开了全面夺权行动。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抱怨说红卫兵毁坏了她父母的坟墓，他们认为那是属于“四旧”的东西。周恩来知道后进行

了干预，他让人修复了坟墓并把墓碑重新树了起来。红卫兵又把矛头对准一个著名的淘粪工人[9]，当时他已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显然是因为他曾受过刘少奇的庇护。周恩来质问红卫兵：“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去攻击一个淘粪工人？”在他的干预下，这个工人从农村回到北京，并得到治疗和道歉。



1966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抵达布加勒斯特时的情景（杜修贤 摄）

这时周的很多时间是在与那些掀起了红卫兵运动的学校的学生们一起度过的。

他在舞台上扮演这样的角色，鼓励学生们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并要求他们要遵守纪律。他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红卫兵联络中心，尽管此时已经明显无人能使所有这些年轻人按一个模式去思考和行动。有一天，他凌晨4点就去外语学院读大字报。他解释说：“毛主席要我进行调查，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是否已考虑到他不久将为他的平静、尊严甚至安全而与这些学生进行智力上的较量？当他在另一个学校吃午饭时，他像往常那样坚持要付钱并要求食堂开一张收据。8月份他至少接见了20批清华大学的学生并亲自去了四趟清华大学。在左派红卫兵之间的武斗中，有三名学生被打死了，他曾试图从中进行调解以平息此事。

有一次他冒着大雨参加清华大学批判大会，他既没打伞又没穿雨衣，只穿着他平常穿的灰制服，坐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平台的一把湿凳子上，任凭雨水打在身上，结果他身上完全湿透了。数千名淋湿了的学生齐声呼喊：“请总理打伞！请总理打伞！”周恩来说：“你们不是送给我一个红卫兵袖套吗？既然你们在风雨中锻炼，那么让我也与你们一起锻炼吧。”

他在那里一直坐了3个小时才轮到他发言。群众显然都被他的行动所感动。最后，他领着大家一起高唱“文革”赞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但身为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却担心不能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并保证以“文化大革命”为先导的激进政策的实施。当他的批评者妨碍他的计划实现时，他便像以往那样求助于军队。忠于他的国防部长林彪，从别的军区调部队开进北京以保证毛泽东的意愿而压倒刘少奇的追随者的反对。北京不再是“彭真的堡垒”了。毛泽东本人也在1966年8月加入大字报运动，写出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出了他特有的令人惊恐的无政府主义信息。这时，中央委员会在这些压力下，认可了这条新的路线。但这是在周恩来施展外交手腕进行谈判，制定了一系列重要而明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限制措施之后发生的。

这些限制措施就是在8月8日由一些领导人通过的所谓的“十六条”，它保证经济、政府部门，尤其是科学家将不受这一新运动的影响。这个妥协仅以微弱的多数得以在中央委员会上通过。林彪被指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头。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没有被清洗，他继续主持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工作。

许多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在正常情况下是周恩来的支持者，此刻他们消除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疑虑。韩素音写道：“显然，如果

周恩来支持这场运动，那它就一定是正确的。”另一个评论家更精明地写道：“周恩来跟着毛泽东走，但又落后三步。”他心里一定非常清楚他在过去20年中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府机构仍面临着威胁。毛泽东认为政府机构已经腐化变质、故步自封，应该完全推倒重来。“十六条”能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仍是个未知数。周恩来这时采取他惯用的策略，尽可能地保护政府机构。

如果不了解中国这场不同寻常的运动的复杂性，那就无法理解此后3年里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命运的沉浮。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的任何一个时刻，至少有2~3个极不相同的主要事件正在进行之中，它始于毛泽东对某些作家的攻击，然后是北京市市长受到攻击，最后是刘少奇本人。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提到社教运动，由于参加社教运动的领导人认识不同，最后该运动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上面所说的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斗争就是在社教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从根本上看，权力的斗争、组合及意识形态运动使得中国各地不同的单位企业、地区能够暂时发泄他们平时所抑制的挫折感和敌对情绪。“文化大革命”是一盘由混乱、讨伐、争权夺利所组成的大杂烩。因此，周恩来讲话的调子因时而异也是不足为奇的。

1966年8月18日黎明时刻，周恩来去天安门参加第一次红卫兵大集会。在这类集会中共有达1100万(10)青年激进分子受到领导人的检阅。在这一次检阅中，周恩来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一起，首先检阅了10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临近黄昏时，他乘的敞篷汽车，跟在毛泽东的车后面，检阅聚集在广场上的红卫兵。周恩来后来告诉别人：“我不得不使劲地维持秩序，把嗓子都喊哑啦。”5个星期后，他的嗓子也没有完全恢复。

毛主席教导我们，搞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自己。我们要教育自己，解放自己，依靠自己去进行革命……我们要坚决反对那些高高在

上，自以为什么都懂，脱离群众，瞎乱指挥的官僚主义者。



1966年8月18日，周恩来、刘少奇（中）、邓小平（左）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 卫兵）。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表明周恩来倒是相信“十六条”将使“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局限在党内，而不扩展到政府机构方面，它将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活动将受到保护。但在毛泽东和他的副手们的鼓励下，红卫兵变得胆大起来了。他们开始以毛泽东的名义控制各个城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委员会的一些正确的决定逐渐地被抛在一边。

周恩来对于红卫兵没有实权，但他仍然负责向他们解释党的路线，不断提醒他们注意中央委员会制定的种种规定，例如不能围攻或骚扰各个部机关，因为他们有工作要做。他告诉他们在写大字报时要谨慎一些，因为其中一些大字报把国家机密的详情弄得举世皆知；在出版一些非官方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时也应谨慎，因为这些出版物可能会篡改毛泽东思想；对阶级敌人的攻击应该是有限度的。他还试图阻止红卫兵扩大他们的攻击目标。

用枪去杀一个人并不困难，只要瞄准目标就能做到这一点。用拳头打伤一个人也不困难，只要你有蛮力就行……但用暴力手段进行斗争仅仅触及人的肉体，而只有通过说服教育才能触及人的灵魂。



1966年9月，周恩来和陶铸、李富春、谭震林等接见来北京串联的各界群众和红卫兵代表

周恩来反复强调，红卫兵应该正确地区分好人和坏人。例如，他们不应该批斗那些已改造好的、与政府合作的地主，而应该去揭露那些隐藏在城市里的地主。“必须搞清楚他们是否在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如果能证明他们大致是老实的，我们也应给他们一个机会。”对右派分子也一样，如果他们“老老实实接受监督改造，那就没必要再惩罚他们”。

批判资产阶级，但不应该没收他们的财产；流氓应该受到惩罚，但一些支持政府的党外政治家不应受到冲击；不能去抄知名人士的家，另外知名人士的纪念碑也不允许触犯。

那种认为当权者都是反动分子的想法是荒谬的，也是毫无价值的。在某种程度上对领导的信任感也是要有的。一个人是否革命并不是简单地由这个人的出身决定的。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被国民党封为革命者，那他就非常好辨认，但阶级出身不能作为判断一个人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周恩来认为“血统论”就是“宿命论”。他自己模糊的出身也成了这类讨论的话题。他认为红卫兵在招收新成员时对出身中产阶级的人不应该过于苛求。如果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出身的阶级并且表现良好的话”，那他们就可以加入红卫兵（尽管不能优先），“因为他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麻烦的是，当周恩来更多地谈及生产的重要性和一些对革命热情加以限制的不受欢迎的规定时，林彪之流却在以一种更为蛊惑人心的启示录式的形式鼓吹“炮轰党委”，打倒统治中国的“一小撮坏人”，扫除“牛鬼蛇神”等，这正是那些赶到北京来的年轻激进分子们所渴望听到的话。周恩来的那种学校女教师式的说教被那些声音所淹没，但他仍然坚持讲解他的那一套。

在9月中旬的另一次百万红卫兵大集会上，他声称“文化大革命”正在产生一种像第三个五年计划伊始时实现经济上的突破所需要的革命动力。

同志们，同学们！为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学和中学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县以下的组织机构和人民公社去交流革命经验以及建立革命联络……工厂和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停下生产，利用假期来闹革命。……双抢季节已经到了，红卫兵应该组织起来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支援秋收。

比起毛主义者在大街小巷每个角落吹起的号角声来，周恩来的声音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而且也不那么中听。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使得一些最激进的学生和他们的庇护者—毛主义者中的一些二、三流角色密谋反对他。

这些人当中有一个组织叫做“五·一六兵团”。他们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1966年的最后四个月里逐渐加剧，攻击他为“反革命两面派”。这些活动最初由科学院发起，但后来领导权转到了外语学院。一些高层人士如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戚本禹也先后参加了这些活动。这两人都是狂热分子，显然他们都是毛主义者。毛泽东通过手下的林彪、江青和其他几个人对他们进行领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周恩来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干的。他只不过是允许他们的激进主义得到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他也不能完全控制他的追随者，而且也不愿为此失去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总方向的支持。

一个红卫兵后来承认：

上面要我们搜集所有那些大头头们的黑材料。指挥部给我们提供一部分文件，我们则出去找另外一些材料，诸如周恩来的讲话，会议记录，所作的报告之类的东西。我们仔细琢磨其中的每一个字，以发现我们想要的东西。对周恩来的每一次行动我们也不放过。1961年，周恩来在一次关于文学问题的讲话中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是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主义呢？我们认为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他还说过：“毛主席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能否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找出其中的错误呢？我们从他的讲话中抽出一些话，然后拼凑起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必须打倒。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9月的北京街头，他在与红卫兵的一次长谈中提到了它们。这次谈话从9月25日晚上10点延续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下面是他的话：

我今天坦率地和你们谈一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自由？什么样的大字报你们都可以写。有些人甚至写了“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当然我已经知道这件事，但我并不在乎。……

有人贴出这么一张大字报……要求完全摧毁伊斯兰。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它们的人口接近4亿。怎样才能完全摧毁他们呢？答案是：这是不可能的。……

大型集会……可能产生世界范围的影响。我们只好进行干预。上海把一万名资本家拖出去游街。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打电报给上海，表示反对，因为它牵涉的范围太广，可能影响到世界舆论。……资本家不应该被拖出去游街。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很强大了。这类事情完全没有必要。……我们是要消灭阶级，但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

周恩来批评这些青年人错误的阶级分析方法，并详细讲述了他自己的阶级出身。这在某种程度表明了他残存的负罪感：

我曾犯过路线错误，但仅此并不足以判断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在南昌起义时（1927年）……我犯了错误，带部队去打城市而不是开到农村去，但这不是路线错误。……我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然而蒋介石还是要抓我。你能说我是不革命的吗？

这时他也谈到他的父亲—从阶级地位上看是一个小官僚，其他亲戚也是如此，“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侄子没有工作；另一个是解放军，这也解决不了他的工作问题。我虽然是总理，但对这些，也帮不上什么忙”。

他一再把话题扯回经济问题上：“工农业和服务行业的人不能停下来不干活。不然我们吃什么？”

周恩来总理从未像今天这样繁忙。为了筹备国庆节的庆祝活动，一些年轻战士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周恩来深夜到那里查房，替他们盖好被子。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没完没了的两派交锋的会议上，当双方正进行辩论时，周恩来坐在台阶上忙着吃一碗面条。当知道饭店的服务员在革命宣传鼓动下提出他们不再给客人擦皮鞋、应铃或上菜时，周恩来心平气和地作了解释。

由于那些有经验的高级行政与技术官员被狂热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进行人格侮辱、殴打甚至关押起来，政府部门逐渐瘫痪下来了。经过几个月白热化的“革命”之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只剩下七分之一人仍在工作。周恩来最后伤心地说：“只有财政部长李先念被留下来帮我。”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小事而不值得他费心。他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平静来处理向他提出的所有要求。他尽其所能坚持处理政府的日常事务，尽管能帮助他的只是那些剩下来的空架子机构。他所处理的事从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待外国客人，什么都有。中国的一些父母们向他抱怨说，他们的孩子被赶到了边远省份。他无一例外地向他们所有的人保证要调查并解决他们抱怨的事。

他经常彻夜不眠，与学生、工人、政府官员、地方代表谈话，调解红卫兵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并促成他们的和解。他还命令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寺庙，防止它们被激进分子毁掉。在长途电话里他说服一个狂热分子不要毁灭花园城市杭州的历史遗产。当时住在中国的两个外国人精确地描述了周恩来的活动：

成百万的中国人相信他本人是这个巨大的国家里唯一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的人……无数的人指望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指望他回答他们那些诉苦的信件，或答应为他们的孩子—在华北游荡的红卫兵搞到被子。

当10月1日的国庆节到来时，周恩来仍然能够以一种不受限制的乐观语调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灭掉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清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正在掀起。……全国七亿人民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但两天后，他又继续在有关“文革”的文件中批示，强调有关规定。

红卫兵不能进入有解放军守卫的机关，不能穿军装携带武器，因为你们不是正规军。……司法权属于法院……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不能为任何红卫兵组织所使用。

他告诉红卫兵不要去西藏，这个禁令后来被江青轻而易举地取消了。

毛主义者现在决定要提高赌注，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铺开，否定了周恩来要求“文革”不去影响工人农民的恳求，8月份制定的“十六条”被抛在了一边。负责“文革”小组目前工作的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指责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会妨碍生产，陈伯达宣称“害怕群众就是害怕革命”，陈伯达所说的这些人显然包括周恩来在内。红卫兵报道了下面一段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在10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的对话：

毛泽东说：“真正的右派分子只占总数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

周恩来插进来说：“现在可比这要多了。”

毛泽东急躁地回答：“不管他们有多少，我们都将战胜他们。”

在讨论了政治事务之后，他们开始商量红卫兵的大串联问题。周恩来很重视这件事。

他说：“应该作些适当的准备。”说他是这个政权的管家，真是一点错也没有。

毛泽东有些恼火地问道：“有什么可准备的？在哪找不到碗饭吃？”

这就是两个互为补充的革命者之间的差异，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带有普通人的那种冲动和即兴创作方面的天才；一个则是沉迷于计划，像清教徒一样律己的人。

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聪明的建议，让红卫兵仿效长征，步行而不是乘火车进行他们的串联。这样既可以缓和铁路运输的紧张局面，同时又可以耗费年轻的激进分子的精力，使他们不至于造成太多的破坏。他在参加国民党的缔造者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大胆的讲话，他痛斥上海的红卫兵闯进孙中山的遗孀的住宅。他说：“一些年轻人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像话。”

但是，他不得不再次被迫让步。不久，林彪宣布红卫兵可以像他们批评党那样来批评政府。这就抽去了由8月份妥协而产生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根支柱。周恩来在会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脸气得通红。

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或是选择当一个殉道者，或是做一个跟不上步伐的合作者。类似的情况以后又屡次出现。很明显，这个运动已越过了此前毛泽东与其他人共同商定的界限，正是这个界限才使得这场运动不是那么不可接受。在周恩来看来，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是错误的，是与社会主义的概

念相对立的。它只会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而在中国人及外国人的眼里，社会主义理想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东西。毛泽东圈子里的那些狂热分子，他们的思想深受过去中国封建时代的影响。当他们现在手中握有大权时，便任意痛斥无辜的男男女女，殴打、关押、折磨、杀害他们所讨厌的人。他们进行这些反公民的活动时毫不考虑法律程序，有时甚至把道德准则也抛在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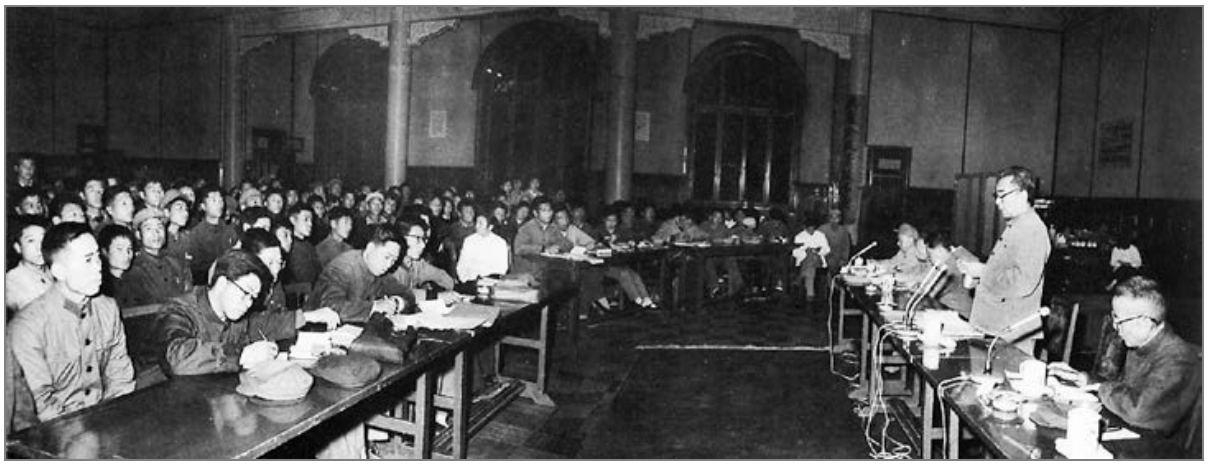
周恩来有两种选择，不过他的两种选择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他既缺少一群有组织的追随者，又未控制军队。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要求毛泽东放弃这场运动或是使红卫兵就范，但这将使周恩来变得对毛泽东毫无用处，而且使他毫无疑义地被划到妨碍“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阵营里。毛泽东的追随者里已经有人把周恩来划入反对派阵营，周恩来这么干的话将会被从他有影响的位置上赶下去，失去对政府的控制，很可能还会被红卫兵关押起来，送进监狱，受到虐待，甚至死亡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使周恩来在西方人中享有更高的声望，他将会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而结束他的一生。然而，这种不昧良心的戏剧性行为不是中国政治的传统。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更为现实，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以周恩来那样的身份做出那样的姿态，这在长期习惯于专制统治的人民看来只能是无能为力或哗众取宠。

另一种可能是继续假装支持这场运动，同时努力控制它的越轨行为，减少其危害，医治它所造成的创伤。这就是周恩来选择的道路。

从那时起，作为一个官员，他耐心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满意地看到事实表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在“文革”中遇到麻烦的无辜的人们及有用的制度被挽救下来。周恩来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赞同毛主义者的纲领，并与取代被害者的那些凶手们一起在公开场合露面。为此，一些西方人从未原谅他。但是，大多数中国人

却牢记孔夫子的一句话“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大家都极其欣赏由于周恩来的老练，说到底也由于其责任在肩和更为险峻的处境所产生的结果。



1966年11月，周恩来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半工（农）半读师生

因为周恩来原来曾支持社教运动，因此激进派把他看做一个不可信任的机会主义者。在“文革”问题上，当形势变得严峻而关键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文革”的背叛者。相形之下，开明派把他尊为这个政权所信奉的哲学中一切好的、具有建设性的东西的救星，而芸芸众生则会对他的摇摆不定感到迷惑不解。

周恩来利用林彪的一次错误在毛泽东的头脑里播下了毛对林不信任的种子。

要想在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则要困难得多。江青越来越公开坚持她在激进事业中的权威，使周恩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她发生冲突。例如，在12月的某一天，一些江青的追随者要去逮捕彭真市长，对此周恩来宣称：“谁也不能开这样一个任意抓人的先例！”他把彭真秘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他做这类事情能否成功要取决于左派分子抓人的决心的大小。他也曾不得不违心地同意红卫兵讯问和折磨他的五个同僚，这五个人都是他领导下的高效率政府机构的中

坚。周恩来曾坦率地对来访的日本人承认，在那种时候，个人将不得不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自己的“进退”。“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评价说，周恩来有时被迫做一些违心的事，是为了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

周恩来一直没有遭到什么毁灭性的麻烦，因为毛泽东和江青都需要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默默羞辱他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利用他那别人无法比拟的才能。但周恩来没能在最高层次为他的副总理、部长和副部长们寻得同样的庇护。这些人现在都忙于应付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压力。其中一些人，比如说农业部长谭震林，不善于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外交部长陈毅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言行上极不慎重，极易被红卫兵抓住把柄。尽管他在工作上是周恩来的左膀右臂，周恩来竭尽全力去保护他，最终却无济于事。

这样，便开始了一个痛苦的过程。12月份的时候，他不得不让步，同意组织一个集会批判廖承志—旧学校出来的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并组织一次示威来反对他的另一个在体委工作的被保护人。那时经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某一天周恩来告诉工厂继续生产，并要求红卫兵不要干扰工厂的生产，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发现《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写着：要像在城市所进行的事业一样，农村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同时，工厂也要进行。

1967年，“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达到了高潮。1月6日，一个15米长的大横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打倒周恩来，他的支持者们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一张大字报题为“炮打周恩来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张题目为“谁反对周恩来我们就砸烂谁的狗头”。可能是对周恩来的公开攻击引起了毛主义者领导人的担心，毛主义者的一个领导人开始出面干预此事。

但周恩来仍然被迫在这些年轻人面前为自己进行委婉的辩护：“我为党工作多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犯了不少错误。我在晚年要努力保持我对党的一片忠心。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由于红卫兵要求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周恩来的处境变得更为艰难了。有一次，他不顾这些要求，并坚持说：“你们可以批判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你们不应该要求把他们本人交给你们控制。”这时，台下响起一片诘难声。他的回答是：“我在这里代表党中央讲话，这些叫声吵得我无法讲下去。”他后来又接着说，陈毅和其他副总理一度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了错误，并在“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指导下进行工作，应该给他们一段时间来证明他们自己已经改正了错误。

然而，为刘少奇和邓小平说情则要困难得多，但他还是继续替他们讲话。当他把斗争目标限定为“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台下的一些红卫兵叫道：“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周恩来立即转过身去背对着听众。当口号变为“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周恩来才转回身来面对听众。

他说：“你们刚才喊的口号是有区别的，我们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然而，另一个口号是有问题的……他们两个仍然是中央常委……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很不好办。”

至于他自己的支持者的命运，周恩来也是心中有数的。周恩来设法把对农业部长谭震林的全面批判推迟到6月份，然而这个不幸的人不久之后还是从公众场合消失了。周恩来还用搪塞与拖延的手段，挽救了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石油部长余秋里。这两个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毛泽东去世以后的政坛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值得一提的是陈毅的情况。为了保护他，周恩来先是拖时间，然后又暂时同意让陈毅接受批判，但最后又向上面求情以挽救他。他曾主持一个批判陈

毅的群众大会，后来他还同意再开几个批判会，但必须由他来主持，必须事先提出具体而详细的批判内容，并且规定三个月以内只开这一个批判会。



周恩来尽最大努力制止林彪、江青一伙挑动批斗党政军领 导干部的行为。这是1966年12月他和受他保护的陶铸（右 一）、陈毅（右三）、贺龙（右四）在批斗大会上

他还指责红卫兵劫持他的铁道部部长。他说：“我费尽办法来找他的下落，结果却找不到。你们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月12日，周恩来发出有关“恢复名誉”的指示，为那些被非法审讯或是被错误批判的领导人重新上台铺平道路。这在当时是很需要勇气的。

在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早些时候中央委员会作出的把“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全面展开的决定所带来的全面冲击。周恩

来手下的政府官员现在要应付从工厂杀出来的革命造反派，而不是从学校里冲出来的红卫兵。这场革命的新的参加者有着与红卫兵完全不同的目标。例如，周恩来不得不花时间去起草和解释“关于工资问题的紧急指示”。他希望以此来满足造反派关于以计件工资制代替合同工资制和学徒制。实际上，他不得不暂时回避这个问题而仅仅作些装门面的改动。幸运的是，这些新造反派都是工人，他们在工厂的有组织和艰苦工作的压力下已经学会了如何遵守纪律，因此很容易通过现存的组织渠道与他们打交道。周恩来针对他们提出了一条极其恰当的几乎可以说是巧妙的口号，“夺权应该自下而上地进行，但是必须自上而下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进行”。

然而，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仅使周恩来心烦意乱，同样也使得毛泽东感到心烦意乱。毛发现无政府状态似乎已渗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有着顽固的地方主义思想的激进分子试图在上海创立一个巴黎公社式的政权，而别的城市更乱得一塌糊涂。为此，他决定停止所谓的“夺权”，这回自然又是军队应召而来去使所有这一切越轨行动停下来。

由于1月中旬发生了一起幸运的事件，使周恩来得以深入新局势下的第一线。据说江青和陈伯达对人民解放军的一位主管政治工作的将军进行了批评，起因似乎是这位将军借口为了“某些安排”去见周总理而没有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会议。事情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在第二天凌晨召开了一个有900多名高级军官参加的会议。现在还不清楚他开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澄清关于该事件的报告的错误还是为了替毛泽东的妻子和秘书的不慎重的言行作辩解。但毫无疑问他是在毛主义者和军方之间进行协调的关键人物，而且他也无可怀疑地借重了他的黄埔老关系，他过去的学生现在很多是遍及中国各省的军队指挥官，这种关系为他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条件。这是军队公开介入“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1月底，周恩来高兴地带着毛泽东的新

指示出席了一个军队的会议，他在作简短的讲话时，意味着他有新的权力（尽管他还不是特别满意）。他说，党的老干部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并且应该允许革命群众“先夺权”，然后再向国务院报告（这是对周恩来的权力监督的老公式的一个颠倒）。周恩来在解释政策时比过去走得更远，但他却很清楚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使他更容易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把握事物的细节以及对政策进行具体落实。不久他就开始行使他新获得的权力，给介入“文革”的部队下命令。例如，命令部队的指挥官把部队带回军营。

林彪现在已经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革命派及大小官员的野心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现在难以把他们有条不紊地压下去。周恩来不得不同意一个政治新方案，要求革命造反派、军队、政府机构组成三方联合来掌权。这样就把军队干预这枚苦果巧妙地包上了一层年轻的革命派所设想的与当权者平起平坐的糖衣。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法克尔在《新政治家》杂志中，对周恩来进行了一番描述，他写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伏它。”另一个英国记者，《泰晤士报》的理查德·哈里斯，把周总理比为“一个裁判员，他吹着哨子到处平息事端。在中国各地的激进派与稳健派发生冲突时，他站出来制止冲突，以免耗费比赛时间”。

由于处于一种新的地位，周恩来显然变得活跃起来。在与毛泽东进行的一次关于夺权问题的谈话里（该谈话后来被红卫兵发表），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关于对党的官员应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主张，赢得了毛泽东的赞同。

毛认为，夺权后应采用不同的方法与当权派打交道，比如说在批判他们的同时，仍然让他们在监督下工作，也可以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工作。

“这是一个好主意。”周恩来接着说，“撤他们的职，但仍然让他们继续工作，在工作中继续考验他们。这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革命造反派承担的工作量太大的话，他们将会变得被动，成为工作的奴隶。因此让一些当权派继续工作，但在工作的同时接受批判，这样更好些。”

“我们必须对这场革命的目标、它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必须制定出具体的政策。现在虽然夺了权，但在一些单位内这场竞争可能会很激烈。”

周恩来最后又温和地补充了一句他真正感兴趣的话：“此外，我们必须注意抓革命、促生产。”

到2月份，周恩来再次抱怨政府工作无法进行，因为如此众多的官员成了“文革”的牺牲品，以至于不得不让低级职员来干行政领导工作。他的睡眠时间进一步压缩，他经常连续工作3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他经常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只吃一小碗粥和一些剁碎的蔬菜，这样他可以边吃饭边工作。他明显地消瘦下来。后来医生发现他患有心脏病，但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工作，甚至邓颖超的亲自请求也不行。

因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2月底开始对他进行“造反”，他们在他的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

周恩来同志：

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地请求你接受我们的恳求。

当周恩来的夫人看了大字报后，她在“改变”两字下面画了一道红杠杠。两天后，经过与邓颖超商量，他的工作人员又写了一张“补充建议”，把它贴在门上的大字报旁边。他们在“补充建议”里要求他减少夜间工作，在做完一项工作以后，“不要接连工作”，对每日的工作安排，“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处理临时急事”；避免出席会议之后立即会见客人，以便能够“喘息”一下；缩短会见时间，以使人们在会见时说话简短一些。

第二天，为了表示对工作人员意见的重视，周恩来在大字报下面，工整地写上“诚恳接受，要看实践”8个字。他其实根本没打算去履行。

三个月以后，他的侄子和侄女来看他，责备他说：“你的行动达不到同志们的要求。”“你应该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否则你就不是‘造反派’的真正支持者。”但周恩来却避而不谈这个问题。

此外，他还试图尽可能地减少红卫兵引起的混乱对外交政策造成的影响。在就健康问题与他的工作人员交换意见的那几天里，他去外面出席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抗议苏联干扰中国驻苏大使馆的工作。红卫兵把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包围了两个多星期，以报复苏联的行为。两国间外交关系的破裂迫在眉睫。周恩来主张节制，他表示不应有过火行动。当红卫兵不顾禁令，试图冲击苏联大使馆的院子时，他马上赶去用喇叭劝说他们不要这么干。两天以后，红卫兵解除了包围，一场严重的外交冲突才得以避免。几天后，周恩来在同造反派们谈到国防工业时说，“财政、外交、国防工业等部门的行政机关属于中央领导，不许在这些部门夺权”。

2月中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党、政、军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革命和生产问题，谭震林当时已经差不多忍无可忍了。他在会上谈到自己如何为在“文革”中碰到的事而伤

心痛哭。他终于忍不住而大发脾气，他说：“你们的目的，就是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连参加革命40多年的老革命也让你们弄得妻离子散。”说完，他抓起他的外套和公文包就向大门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周恩来耐心地把他叫回来，但他发的这一通脾气使得别的领导人也公开地对毛主义者的做法进行谴责。

在这次会上，当周恩来问毛泽东的前秘书陈伯达是否看过党的理论月刊《红旗》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清样时（这篇文章号召全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该文章发表后，为红卫兵的暴力活动开了绿灯），陈伯达回答说没有看过。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周恩来厉声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果陈伯达没有时间看这篇文章，他应该把文章转给别的领导人看，这样就可以避免下面各单位任意解释政策。

对周恩来来说，加强集中制与“发动群众”是息息相关的，不应该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1967年年初，他在一次延续40天的马拉松式的辩论会上斥责红卫兵要对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负责。他对他们说：“你们自己也不会容忍被下一代拖着在大街上走。”当周恩来看到这位部长被折磨致死的照片时，据说他似乎心凉了一半地惊呼：“这叫我怎么向党中央解释？这些同志都死得不明不白呀！”他还直率地说，在彭真市长的脖子上挂上写有他的罪状的牌子以此来嘲弄他是错误的。在谴责这种公开羞辱老干部的做法的时候，他是在含蓄地指责明显偏袒这种做法的林彪。

“五·一六兵团”继续用大字报攻击周恩来，但是3月中旬有人出来维护周恩来，把他称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支持毛泽东，保证了毛泽东的政策得以通过。他再一次（但这一次是当着陈伯达的面）对农民说，春耕比夺权或革命更重要。他又当着江青的面对红卫兵说，他们应该回学校去。

你们已经为“文化大革命”立了大功。不管别人怎么批评红卫兵的过人行为，也不能抹杀红卫兵的丰功伟绩。……我们希望你们在复课的同时开展整风运动……你们要自己教育自己。

4月份，周恩来试图调解敌对各派之间的冲突。他当时面临这样一种局面，即十几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没能达成任何协议，而另外七个省的敌对派别之间的谈判还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如果周恩来有野心的话，那么现在是他夺权的最好时机。被“文革”搞得心烦意乱的将军和政府官员中的大多数人将乐于聚集在他的周围，努力重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周恩来天生不愿意追求显赫的地位。因此，他仍待在他原来的位置上，公开地做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联络员，从而保证毛主义者、军队及未被扫地出门的政府官员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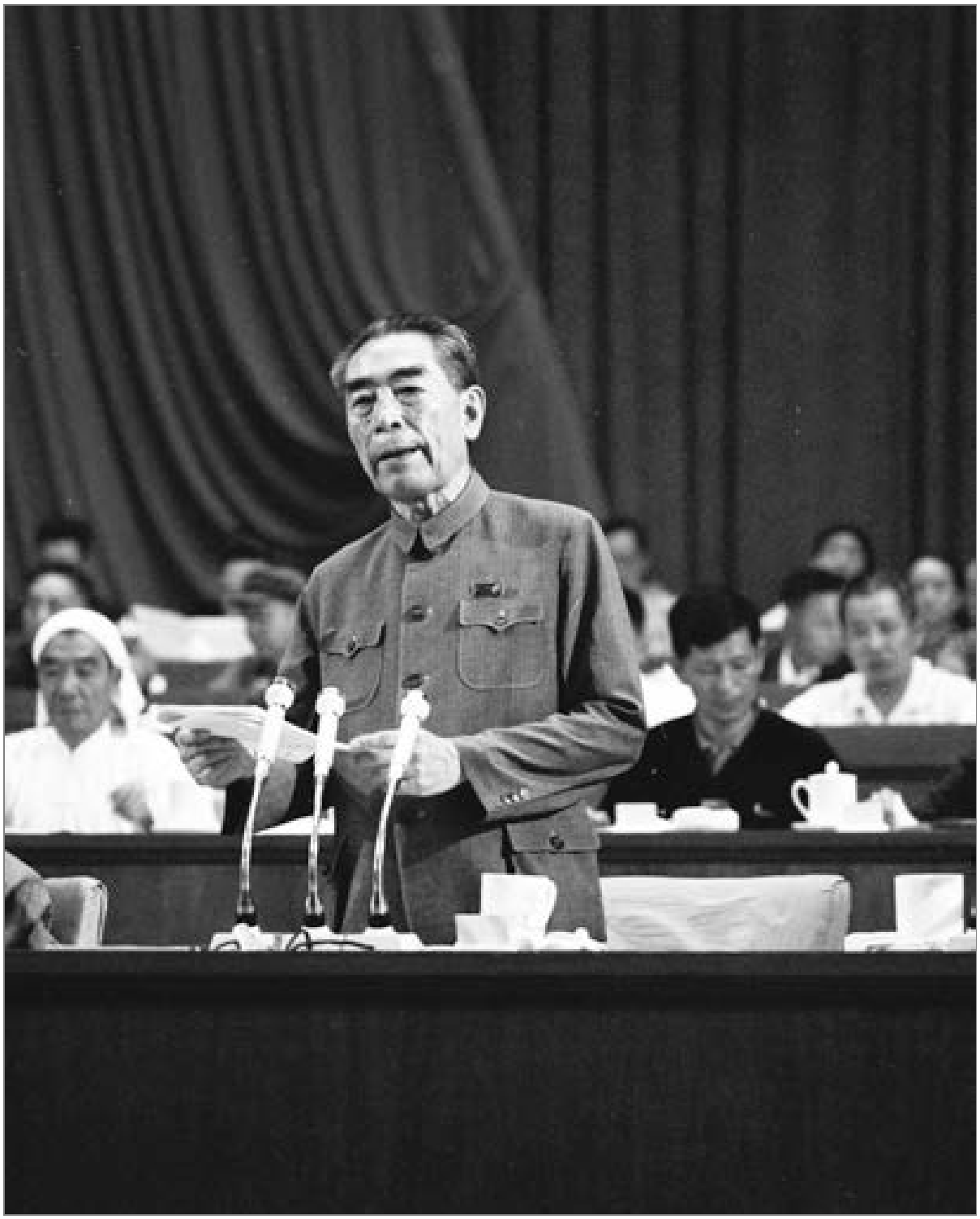
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仍在继续出现。4月中旬召开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发出了一个特别指示：“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亲密的战友，你们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贴大字报攻击周总理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但是最坏的情况还在后头，周恩来这时面临着自“文革”开始以来一直没有遇到的危险。换句话说，他的生命安全掌握在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年轻的激进分子手里。

“文革”受困（1967~1968）

对周恩来来说，1967年的“五一”劳动节庆典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他不得不出席毛泽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外交官姚登山举行的招待会。姚登山刚被印尼政府驱逐回国，因为他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导了一次夺权行动，并在一篇感情色彩强烈的沙文主义宣言里抗议印尼政府歧视华侨。姚登山的行动是对周恩来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公然挑战，在周恩来看来在印尼进行的这类行动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

在寻求增进对印尼政府的影响力方面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但姚登山现在与毛泽东和江青手挽手地站在一起，个头比他们还高，因回国以来受到的欢迎而扬扬得意。周恩来只能站在一旁勉强打起笑脸，中国人碰到极其令人窘迫的情况往往都是如此。那天晚上，在一次官方举行的游行中，人们看到他令人提心吊胆地靠着敞篷卡车栏杆，心不在焉地挥舞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身边站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

另一只大黄蜂也开始围着周恩来的脑袋嗡嗡转，他就是广东的一个红卫兵头头。过去，周恩来曾不明智地赞扬过他，现在则把他称为“黑帮”（甚至毛主义者后来也指责他骄傲、凶暴、乱搞男女关系）。在一个有各省左派组织参加的会议上，这个头头指责周恩来指挥着一个非法司令部来阻挠“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声称，“由政府的头头来决定造反派是否应该夺一个部的权，这是错误的。周恩来应该像别的高级领导人一样，必须对‘红色资本家’犯下的罪行负责，而不要在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上对我们指手画脚。……我们要声讨并摧毁他的司令部”。



“文革”中的周恩来（杜修贤 摄）

不久之后，外语学院的红卫兵乘卡车来到外交部，冲进档案室，抢走机密文件，希望从中找到不利于刘少奇、周恩来和陈毅的证据。

在5月份，这样的行动至少有两次。“五·一六兵团”现在得到了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的姚登山的支持。

周恩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极为愤慨，他又对红卫兵说：

外交部由我直接负责，他们这么干是夺我的权。他们直接给驻外使馆发报，结果被退了回来，而姚登山到处作报告，蓄意制造麻烦。他有一次去外贸部作报告，其报告不仅观点错误而且还有煽动性，对此我当场批评了他。他提出“打倒刘、邓、陈”。作为一个司局级干部怎么能随便提出这样的口号呢？谁允许的？至于发电报给驻外使馆这件事，更是闻所未闻的。你们造反派做事总喜欢走极端。

在另一个场合他质问这些年轻的造反派：

中国是由毛主席领导还是由你们领导？党中央和我尽可能地与红卫兵见面，但你们正相反，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与党商量，你们经常冲进政府机关，抓人并抢走许多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这些未经思考的行动只能使敌人高兴，使敌人从中渔利。大量消息流到外国的报纸上，使英美帝国主义和苏修从中受益。

1967年夏天，毛泽东的追随者之一王力授意一些群众组织鼓动了很多人到政府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西门驻扎。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要揪走刘少奇，但“五·一六兵团”的成员相信周恩来将出来对他们讲话。因此他们在中南海西门外支起帐篷，并告诉年轻的追随者：“他一定会和刘少奇一起出来，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他揪走。”但周恩来既不交出刘少奇，自己也不冒险出来。红卫兵在外面闹了3个星期之后终于撤走了。一个特别固执的红卫兵领袖名叫蒯大富（他甚至不在乎毛主席对他的支持并因“文革”初的造反而声名远扬），他在1967年5月这个多事之秋也转而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总理曾经没批准他的某项要求，所以他发誓要在一年内进行报复。

“五·一六兵团”把周恩来称为“一个可恶的资产阶级绅士”，这遭到了外交部出版的小报的反击。甚至陈伯达这样一个标准的毛主义者，也不得不赶来救驾。他说：“周总理在国内外都受到高度尊敬，他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负责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有任何人找周总理的麻烦。”

在这件“清白”外衣的掩护下，周恩来制订了一个极其秘密的计划来保护那些老干部，他们中的一部分遭到了红卫兵的折磨、毒打和羞辱。周恩来指示自己的警卫人员备一辆车以便随时出动，去抢救那些老干部。有一次他甚至动用一架直升飞机来抢救老干部。最后，有20名部长被他保护下来。这年夏天，有的老干部被红卫兵抓走，有的则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甚至对江青也保密。当毛泽东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1]口中得知这件事以后，他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这年夏天，周恩来用老、中、青三结合来取代他在春天建立的三方联合，原来的三方联合被证明是弊大于利，而此时已不必再借助它来掩饰军队对地方的干预。

1967年夏天，英国殖民地香港的地位问题显然也是周恩来关心的对象。在“文革”初期，周恩来就对香港的来访者表示，中国不希望这个能给中国带来大量外汇的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发生任何变化。但后来，激进的香港左派开始自行其是，就像性急的姚登山在印尼所做的那样，他们在香港开展了周恩来所不希望挑起的斗争，而周又不能对这场斗争泼冷水，因为这只会证实姚登山和“五·一六兵团”关于他对欧洲殖民主义者卑躬屈膝的指控。因此，他对香港的革命事业发表了委婉的讲话。

香港和九龙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的香港爱国同胞的一切正当权利，尤其是他们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不容任何人侵

犯……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了巨大胜利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英国殖民主义者对自己的香港同胞进行的残酷迫害。香港的命运将由我们爱国的香港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来决定，而决不是由一小撮英国殖民主义者来决定。

这类言论引起了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抱怨。“就他的言论而言已不再中听，周恩来先生咕哝着对毛主义者的教义表示赞同，而不再出面阻止北京的外交使团感到头痛的过火行为。”

“五·一六兵团”这时也加强了他们的攻势。他们在大字报里耸人听闻地写道：“向周×× 提十个问题，其一你究竟是哪个阶级的代言人？”周恩来对此进行了反击，他说：“关于‘五·一六兵团’这个反革命组织，在这里我不想多谈。参加他们活动的只有那么一小撮人，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也在火上浇油，造谣说周恩来在一家瑞士银行开有私人户头，因为“他现在感到不安全，所以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然而，这个“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谈判技巧在调停地方纠纷时派上了用场。当时，位于中国中部的武汉市的共产党组织内部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流血冲突。有两个老资格的毛主义者（其中一个是与周为敌的王力）被派去调停，但当地陈再道将军支持的群众组织逮捕了中央“文革”派去的王力。周恩来立即赶去解救以恢复中央的权威。

像以往一样，周恩来的策略是找出双方的理亏之处，迫使双方都作出使对方满意的让步。几天之后，陈再道将军到了北京，他被迫在一个长达9小时的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为自己辩护。一个毛主义者打了陈将军一记耳光以博得江青的欢心，但周恩来厉声制止说：“我们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怎么能这么做呢？”

从武汉回来后，周恩来竭尽全力去重新夺回对外交部的控制权。由于他前一段时间忙于国内事务，各省的调停工作也少不了他，这使得他的敌人接管了外交部，但他在8月份成功地也几乎是强行地夺回了对外交部的控制权。自然，红卫兵也加强了他们对陈毅的骚扰活动。在一次批判会上，他们挂出一条“打倒陈毅”的标语，周恩来看见后拒绝进入会场，直到这条标语被取下来后他才进场。还有一次，当陈毅莫名其妙地受到围攻时，周恩来愤然退出会场，并派警卫人员保护陈毅离开会场。

但有那么几天，周恩来的外交政策遭到了灭顶之灾。好斗的中国青年激进分子对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和记者大打出手，令人又回忆起义和团的时代。最恶劣的事件是红卫兵在8月中旬火烧英国代办处并殴打代办处的部分英国官员。当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之后立即赶往现场。他气得浑身发抖，命令红卫兵撤走。人们只见他发过几次脾气，而这是其中的一次。

6个月过后，他才觉得可以安全地去拜访英国代办约翰·丹森，就该事件向英国道歉并保证赔偿损失。

中国南部（尤其是广东）激进的年轻人的行动也对周恩来的外交政策造成了损害。8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对广东来的激进组织的代表说：

你们甚至比孩子还要无知。为了在你们中间搞武斗，你们抢劫作为外援运送给越南的军火。你们不仅抢手枪和步枪，还抢高射炮和导弹。这些行动不仅对我国的外援计划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也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声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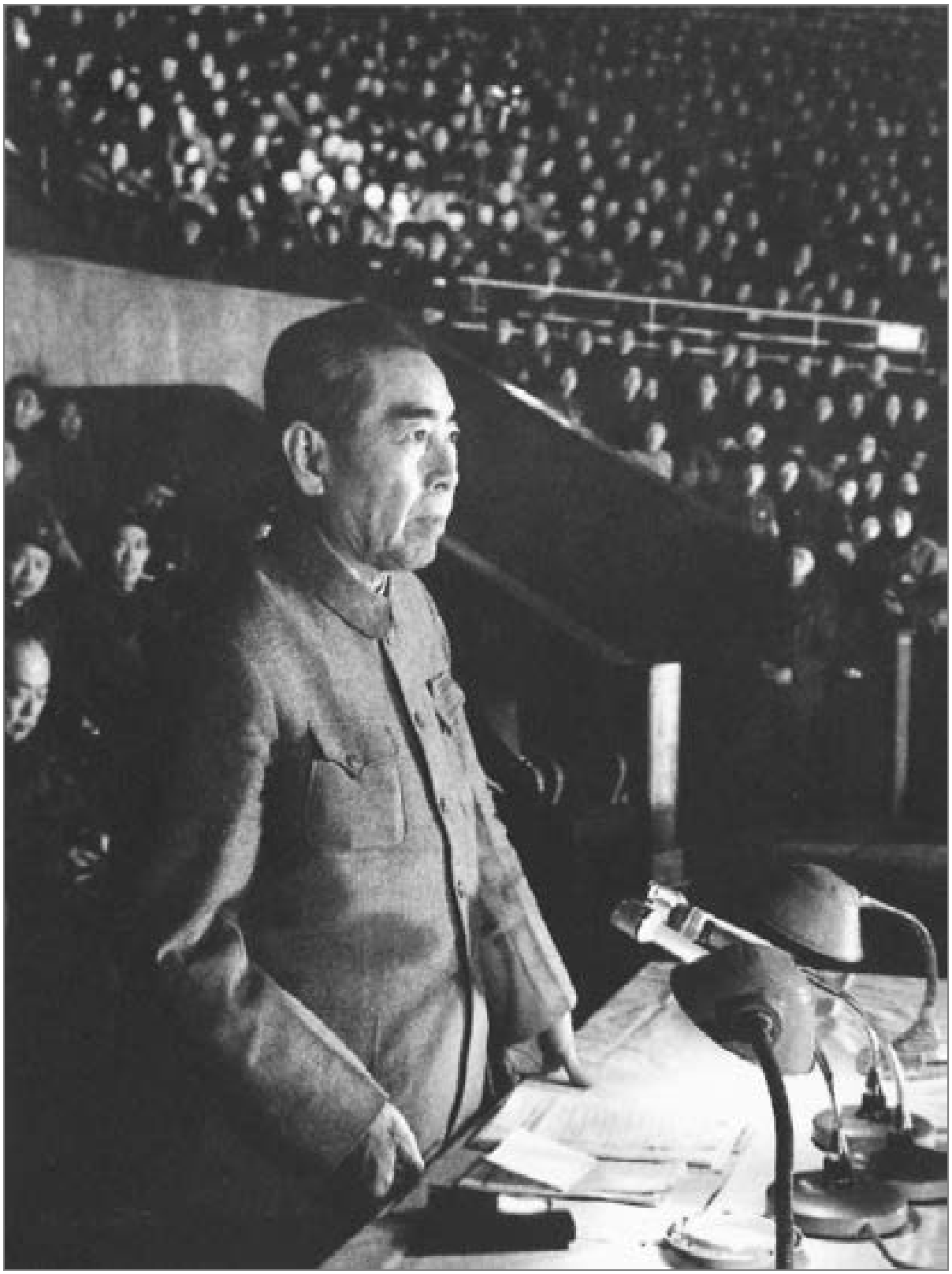
接着，8月26日1000余名红卫兵群起围攻周恩来并把他困在办公室达两天之久。这标志着反周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当时，据说毛泽东

和林彪都不在北京，周恩来得不到援军。当时最急迫的问题是关于反对陈毅的运动，红卫兵再次坚持与周总理全面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不吃、不睡、不休息地与一群接一群地轮番上场的红卫兵进行激烈的辩论，直至最后他们全部败下阵来。这样，几小时后，他的心脏病发作就不足为奇了。（有一次，周恩来乘坐的飞机驾驶员发现周恩来的座位上放了一个氧气瓶，周恩来的护士解释说，周恩来总是随身带一个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但是，他这次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周恩来这时仍不得不提防来自“五·一六兵团”的攻击。由王力支持的“五·一六兵团”是一个极左组织，他们的目标是把周恩来赶下台，但周恩来的心脏病给毛泽东敲起了警钟，他站在周恩来一边反对王力，这对周恩来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设法安排陈毅作了一次有些敷衍性质的“检查”，使得陈毅得以摆脱红卫兵的控制。江青也不得不站在周恩来一边谴责“五·一六兵团”。

11月份，他在北京对一帮争吵不休的广东红卫兵讲话时说：“今天，我们应该有一点小民主。我们不应该再抓人了。”两个星期后，他在规劝一帮因争权夺利而辩论不休的铁路工人时说：

运输工作是一件大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非常关心这件事。……有3600个车皮还闲置在那里。东北的煤和石油都无法外运。这对我国的生产和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1968年2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和直 属单位大会上讲话，强调“必须真正地解放大批干 部”，依靠他们把工农业生产“推动起

来”

1968年1月，周恩来再次在公开场合大发脾气，原因是某些红卫兵妨碍了一些重要的军事装备的生产。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一些负责工业的部门，红卫兵抢劫枪支弹药，用于敌对派系之间的武斗。周恩来对这些情况非常痛心。他气冲冲地说，这是“把无数车该运到越南的弹药白白地浪费掉”，并极为罕见地大发脾气叫道：“我实在是烦透了，烦透了。”

在这样一种时候发脾气是很正常的。3月份（临近他的70岁生日），江青设法迫使周恩来最信任的跟随他几十年的警卫员离开北京，否则就要对他进行审讯。周恩来在他离开之前请他吃了一顿饭，并紧握着他的手对他说：“注意保重身体，要经得住考验，将来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去做。”周恩来后来承认：“我以前很少哭，因为我曾饱受战火的熏陶，但这次我却忍不住掉泪了。”

周恩来在保护他的朋友时不能走得太远。有一次近百名外交部的官员贴出一张保陈毅、反极左的大字报，周恩来批评他们说：“这张大字报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它是一种来自右的干扰。”同样，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对所谓的“翻案风”也表示反对，这次“翻案风”曾使得几个“文革”的受害者恢复了职务。如果平衡被打破，不管这种打破是来自哪个方向，这个政权脆弱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

有时，甚至周恩来自己的追随者也在无意中给他带来麻烦。4月份，广东各派红卫兵的一个联合组织（它们的联合是由周恩来促成的）在庆祝该组织成立1周年的大会上，为周恩来年前的广东之行而向他致敬。他立即打电报去说，他只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了一点工作，会议上“一小部分人”借周年纪念来“突出我的名字”的做法是犯了“一个大错误……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相违背的，我坚决反对这种做法”。

周恩来不屑于突出个人的形象，他把这种事留给那些在政治上捞资本的大人物林彪和江青们去干。与此同时，他则顽强地为在全国范围内减少“文革”造成的混乱而努力工作。

但是，派仗仍在继续，倔犟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在5月份号召向敌对派别进行一次决定性攻击。他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以此作为“与周恩来算政治账”的一个手段。

在下面的一份报告里记录了1968年7月25日周恩来在北京同广西红卫兵的一次有意义的会见。广西的红卫兵曾使连接广西与别的省以及与越南的铁路中断达两个月之久。他们还被怀疑进行了纵火及其他各种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行动。这使他们到北京去之前名声就已在北京传开了。

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必须承认，尽管我们给你们打了那么多电话和电报，尽管你们20天以前就接到了通知，你们还是中断了铁路交通，使火车不能通过柳州。你们是否真的把抢来的援越军火给私分了？”

一个红卫兵领袖承认他手下的铁路造反派抢了“4000多箱”，“我们请求原谅”，但他坚持说其余的军火是对立派“造反大军”抢的。然后总理问，对立的两派是否能进行合作？另一派的一个发言人答道：“这件事可以办得到，但我们的安全没有保障。”

周恩来问头一个发言人：“你的黑后台是不是还在幕后指挥你？……你必须对我们讲实情。你能不能保证两边都不妨碍恢复交通？”

那个年轻人否认他曾阻碍交通，但一个官员插话说他们曾使用一个装置使火车越轨。

“对，有那么回事，”周恩来说，“要不是解放军在50秒钟之前赶到，火车就会出事。”

那个年轻人解释说：“那是一个不懂事的学生干的。”“你说什么？”周恩来大声地说，“不懂事？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

周恩来接着转过去问“造反大军”的头头：“我问你，你们参加了抢劫援越军火，但你们是否能交回你们抢走的军火？你们抢了11800箱，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你必须在一两天内交还所有的军火，你们很清楚火车上装的军火是运给越南的。……你知不知道抢去的军火是怎么分的？”

一个官员说他们抢军火是沙文主义行为，因为他们知道那是运给越南人—也就是运给外国人的！另一个官员说抢劫是经过周密组织的，因为整个行动花了不到一个小时。

周恩来追问道:“你们以为能骗过我而不受惩罚？你们以为能靠撒谎蒙混过关？现在你们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归还所有抢走的援越军火；第二，你们必须恢复铁路交通……保证运输畅通……”周恩来接着说，“让我们说说桂林的问题。”当时桂林各对立派别的人都在场，他们中的一个头头赶忙主动表示他们保证他们的人将在当天下午3点钟以前撤出所占领的桂林市的一所监狱。周恩来让他们打电话回去保证，当一派在撤离监狱时，另一派不得进行攻击。说到这，其中一派指出另一派抢了6000多支步枪。

周恩来表示：“两派的错误都不少，你们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你们中的一些人犯了罪，现在给你们一个改正的机会。你们可以将功赎罪。”他又转过去对桂林铁路局造反派的一个人说，“是不是你的人抢走了45号机车？”

“只抢了一次。”那人回答说。

“哦，只抢了一次，但一次就够厉害的了！因为你们两派忙于搞武斗，不管业务，而那个火车司机是特意从齐齐哈尔调去帮忙的。你们却用机关枪威胁那个司机，抢走了机车。你们还砸烂客车车厢的门，砸开一个工具箱，拿走一把斧头。只是在我打长途电话给你们并且在一夜不睡觉的情况下你们才交还了抢去的东西。为什么你们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还不作自我批评而宁愿去指责对方？”

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处理诸如此类的具体事务，去抑制恶性的红卫兵派别冲突。由于红卫兵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惜中断生产、运输和商业，使政府基本职能和外交工作被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周恩来为保证政府基本职能和外交工作的正常运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再次引发了一场东欧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希望建立一个较为松动的政府，从苏联那里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些行动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并且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苏联的好战性，以使处于“文革”动乱中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去保卫国家的安全。因此，周恩来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入侵，把它称之为“苏修叛徒集团是赤裸裸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典型”。

也许正是由于想起了来自外部的威胁，周恩来才有勇气力求结束“文化大革命”。他在9月份对形势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分析。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说，自上海无产阶级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权以来的20个月里，“我们终于粉碎了党内一小撮窃居高位的领导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旧世界正在走向灭亡。”当时中国各省都在成立由各派革命分子组成的革命委员会，这个大会就是为了庆祝最后两个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而召开的。



“文化大革命”中身别“为人民服务”红色像章的周恩来（杜修贤 摄）

从那时起直到去世，周恩来在公开场合露面时都穿着一件做工精细的毛式制服，上面别着一个不大的红色像章。像章上除了毛主席的像外，还有一句“文革”中特别流行的也是他最喜欢的口号—“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许多种不同的角色。假如能对这一最为野心勃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以正确的操纵，并使中国人将来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和科学不受冲击的话，他就会完全赞成这场使大批中共党员经受极为严酷的、触及灵魂的考验和改革。但周恩来又是一个超级的保护者。他保护同志，保护机构，甚至保护文物财产，使之免受政治运动发展所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害。他为他的同志提供庇护，但又不是不加区别，而是在自己的政治处境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行事。他的警卫把他比作一棵保护了许多优秀干部的“参天大树”。如果不是周恩来运用他的影响力和政治技巧对“文革”的危害加以限制的话，那么“文革”肯定会在历史上写下更为残酷、血腥的一页。

可悲的是，周恩来未能保护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1968年10月，他的养女孙维世死于红卫兵的酷刑之下。她曾是一个备受江青妒嫉的话剧导演。据说周恩来既无法为她说情又无法阻止此事，只是听到了她的死讯后，才迅速派出一队医生去进行尸体解剖，但已经太晚了—她的尸体已被火化，而所有与她的被害有关的人员也都溜掉了。

“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是如此复杂，使人们几乎不可能对它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但是，看清它的最好的方法是重新观察一下三个融合在一起的、性质截然不同而又都刻有“文革”标记的现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为改变大部分党员和非党员头脑中的传统观念以及封建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想而进行的意识形态运动。这场运动的最终目标是使民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周恩来是这一愿望的拥护者。

后来，周恩来就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把“文革”解释为一个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认为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几年后，他在与费利克斯·格林谈话时引述了毛的革命思想，并说道：“类似这样的革命应该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而且每一次都应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每一次都应比前一次更深入。”周恩来在这里并不是违心地讲话，而是以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的身份讲这番话的。他在这里以他一贯的乐观主义态度假定下一次革命可以避免无政府主义和权力斗争。

从高级领导层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也可算作一场夺权的斗争。在斗争中，毛泽东依靠他与周恩来和代表军队的林彪建立的强大联盟，从刘少奇手中重新夺回了他的领导权。西方观察家一般都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温和派，但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他与毛泽东站在一起。这可能是因为他更信任、尊敬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亲密地共同工作了35年，而刘少奇与周恩来却不太熟悉。

最后，还有一个低层次的“文化大革命”。这一革命发生在远离北京的地方。它打破正常的法律和秩序的限制，允许一些个人和派别进行报复活动和夺权行动。这场革命最初像是一次有益的周期性放血，但最后却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混乱，于是周恩来转而坚决反对它并在最后取得了成功。

周恩来后来对埃德加·斯诺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工厂武斗，交通混乱、停工，使1967年和1968年的工业生产有所下降。”而降低中国人口增长的计划也由于红卫兵的随意行为而受挫。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了另一个损失—它拖垮了周恩来（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的人，可能早就一命呜呼了）。周恩来再也没能恢复他往日的活力。在生命的最后7年，他本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大获成功，但他却过得相当平凡，主要忙于补救“文革”造成的损失，同时还要为自己在“文革”中造成的政治地位变动争得一席之地。

握手言和（1969~1976）

1969年春，在中苏边界北端冰封的乌苏里江中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中国士兵与具有优势的苏联军队之间进行的战斗使人们发现了中国的脆弱性。中国的邻居并没乘机利用中国这些年因红卫兵横行而造成的防务上的弱点，但周恩来和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必须恢复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渠道。这些渠道有时甚至被一些小事所堵塞。在珍宝岛危机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柯西金总理试图通过中苏之间的热线电话与周恩来联系，但他只是徒劳地发现中国的电话员拒绝替他转过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1969年秋，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云集河内，参加北越主席胡志明的葬礼，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得到了一个修复的机会。柯西金总理有意地在周恩来到达河内之前离开河内，但最后他又折回到北京。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厅里，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会晤，就导致两国边界冲突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坚持要俄国人承认19世纪中俄的“不平等”条约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但他又许诺说中国将不会要求收回根据这些条约被俄国人强占的土地。可按传统习惯线作为重新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同时，双方应该通过下面这些办法来保持边界现状，即各自把军队撤到一个双方同意的距离以外，并承担在这些实质性谈判进行期间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敌对宣传的义务。柯西金显然在口头上同意了所有这些建议。但当他回到莫斯科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攻击。



1969年4月，周恩来、陈毅出访缅甸、印尼、尼泊尔时， 在首都机场同欢送的人们握别

同时，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后政治上的人事安排问题。这是一次奇怪的大会。林彪在会上满面愁容，坐立不安，周恩来也露出一副不常见的生气的模样，只有毛泽东显然仍像以往一样挥洒自如。由他们组成的三驾马车显然是出了毛病。周恩来被大会选为秘书长，并在新选出的五人政治局里排列第三[12]，从而排在“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和康生之上。修改后的党章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周恩来对这一显然不合理的条例没有提出异议。据说他曾告诉他的追随者：“不要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让它通过吧！”

周恩来仍与林彪和毛主义者保持联盟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中国进行重建工作，但与他们打交道无疑是件既艰难又乏味的苦差事。他的一个崇拜者后来这样写道：“他甚至能与魔鬼共事，并从中获胜。”

那年秋天，在中国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的英国人—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释放，周恩来成了这次有意思的文化冲突的受害者。红卫兵扣押格雷并对他进行精神折磨一事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格雷终于获得了释放，欧洲人对他的获释普遍感到欣慰。在他获释后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周恩来急切地走到英国代办身边用他那缓慢的英语对他说。

“好啦，格雷出来了，他自由了。”

“是的，”丹森回答说，“但他还没离开中国。”

“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待在这里。”

“我可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待在这里。”

说到这里，周恩来走开了一会儿，但后来他又回来向丹森问道格雷是否也出席了这个宴会，丹森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复。在另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似乎是想为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在中国所受的苦作些补救，也许是要向他表示个人的歉意，或是给他提供一个单独会面的机会。

毛泽东开始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周恩来这时开始不动声色地重新安置他的那些饱受红卫兵折磨的副部长们和其他高级官员。1970年夏，林彪和陈伯达因行动不慎而在毛泽东面前失宠，这使周恩来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周恩来这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但挫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所带来的快乐使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体病痛。一天早上，他去出席一个会议时突然晕倒在走廊上。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出席。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坚持说自己没事，叫了一辆车又赶去参加那个会。

不久，周恩来揭开了他外交生涯中最著名的一页。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后双方的立场都未改变，仍然保持对立状态，这就意味着中苏关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发展，但中美关系则应该另当别论。林彪及其手下的大部分人仍倾向于与他们以前的莫斯科老师和好。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事未置可否，直到1970年年底林彪咄咄逼人的野心和来自北方的威胁，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与美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此外，周恩来手下的专家估计，由于国际力量的重新大组合，使

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威胁要小于苏联的威胁，周恩来反复考虑与美国进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只要华盛顿采取主动那就好办了。

这个暗示是当年8月传达给埃德加·斯诺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一次乒乓球比赛上见到了周恩来—“他的头发开始渐渐地变白，身穿一件夏天的运动衬衣，一条灰色宽松裤，下面是白色的袜子和凉鞋。”周恩来对美国国内政治极为关心，并提醒斯诺注意由北而来的对中国的威胁—来自苏联的威胁。

“如果中国要找一个盟友，”斯诺问道，“找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还是找美国的可能性大？”

在当时，这个问题还几乎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区，提出的问题很可能被简单地打发掉了。但是，斯诺提这个问题所选择的时机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周恩来的回答使人松了一口气。

这出公共关系的小戏的另一幕发生在国庆游行那天拥挤的观礼台上。当时，周恩来走到斯诺身边，拉着他的袖子，把他和他的妻子领到毛主席身边待了一会儿。这就向无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清楚地暗示下一步会是什么。

几个星期后，周恩来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在谈话中，他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辩护，对花费巨大的粮食进口的原因加以说明，他还表示伟大勤劳的中国人民也需要外国的技术。他还自豪地宣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中国既吸取了“文革”中好的教训，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暴行。他对他的国家的这番热情洋溢的描绘被

及时地披露在美国的报纸上。最后，周恩来说中国准备与美国就美国武装“入侵”台湾问题进行谈判。

有一次，周恩来与斯诺的会面从晚饭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6点，斯诺最后也支持不住了。

他低声说道：“我应该让你去睡一会儿。”

周恩来仰面笑道：“我已经睡过了，而现在我该去工作了。”

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渠道，周恩来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及尼克松的回信，不得不各自通过巴基斯坦或罗马尼亚的使者转送。在一封通过这类手段于12月初送达白宫的信中，周恩来强调他不但代表自己，也代表毛泽东和林彪讲话。他说中国“一直希望并一直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以讨论中国台湾的那一部分领土的有关问题。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将在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尼克松同意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地访问中国，为今后总统的访问作准备。

在国内，周恩来与林彪的争吵越来越公开。1971年3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据说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困惑不解的总理走出飞机之后，将军递给他那份林彪的电报。据说周恩来把电报拿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这个故事大概情况就是如此，至少这种说法在北京流传甚广。

1971年夏，毛泽东终于勉强地同意对外与西方实行缓和，对内实行经济非集中化。周恩来受委托与各省对林彪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将军们建立一个联盟，以支持新政策的实施。

这时，陈伯达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甚至变得更加极端。为此，毛泽东转而把他的这位前秘书完全抛在一边。陈伯达在1971年4月被清洗[13]，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一个小组负责进行的。周恩来让人查清了这个林彪的头号支持者的罪状。在1971年的“五一”节的庆典上，形势进一步明朗化。按照礼仪，毛泽东走在最前面，林彪跟在后面—手上挥动着毛主席语录，脸上带着腼腆的笑。周恩来走在第三位，但他不像往常那样与前两个巨人离得那么近，而是拉开三步远的距离，并略微偏在一边。



1971年4月，周恩来接见应邀来华访问的美国乒乓球全体代表团成员（杜修贤 摄）

同时，周恩来以积极的姿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他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开辟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我相信我们这次重新开始的友谊将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不知所措的运动员们没有反应过来。这时，周恩来又进一步问道：“你们同意我的话吗？”

他们中立即响起一片赞成声，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进行回访。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周恩来知道如何做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

现在，周恩来又在美国记者和来访的专业人员中间施展起他的全副外交手腕。这是他自1946年离开南京后，第一次重操旧业(14)。6月21日，他与《纽约时报》的西摩·托平，《每日新闻》的威廉·阿特伍德以及《华尔街日报》的鲍勃·基特共进晚餐。这次晚餐可算是他这类活动的一个代表作。席间，他精彩地为中国的时局和政策进行辩护，并聪明地对美国想当世界警察的念头加以取笑。



1972年10月，周恩来和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一起（杜修贤 摄）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南京度过的岁月，他说：“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指着客人手中的一个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但周会访问美国吗？

“我敢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他答道。

他在向客人推荐茅台酒时说：“这种酒不上头，尽管你可以用火柴点着它。……实际上，喝了30年的茅台以后，我现在要戒掉它了。……在精神上，我永远年轻，但是我的精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变得越来越衰弱了。”

尽管他是这么说的，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把杯中的茅台酒一口干掉并声称：“我要喝就真喝，决不装样子。”

周恩来的人情味令客人们极为感动，托平接着问他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他解释说，中国的某些地方仍像以前一样，在那里如果一对夫妇不能生出一个传统家庭所要求的男孩来，那他们就会接着生下去，直到他们生出男孩为止。他们可能会一连生出9个女孩，“这时，妻子已经45岁了，也只是到了这时，她才停止生男孩的努力，这平等吗？”

托平听到这儿，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自己是5个女儿的父亲。

“没有儿子？”周恩来抬了抬他那黑黑的浓眉问道。

“托平疲倦了。”一个美国客人打趣道。

“不。”周恩来尖刻地说，“是托平夫人感到厌倦了，我代表妇女讲话。”

类似这样的会面还有许多次，而这类对话也一直是双向进行的。周恩来向这些外国新闻界人士详细说明了中国的政策、需要和成就，同时他也向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请教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一些更为“深刻的”个人看法。一个美国生物学家惊奇地说：“他问的问题范围非常广，他甚至问及谁将在1972年大选中获胜之类的问题。”周恩来曾经笑着对英国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十分清楚尼克松要求在1972年访问北京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捞取选票，但他希望中国可能会因此而从美国那里赢得“部分有用的让步”，而不必作出相应的回报。

一个月以后，一个美国学者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警告说，不应过于乐观地把周恩来看做一个实用主义者和一个讲道理的人。“实际上”，弗朗茨·迈克尔教授说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领导人，但迈克尔所代表的观点在美国舆论界的优势地位正在动摇。周恩来那过人的才能使他不仅在国内压倒了林彪和陈伯达，而且在国外也击败了那些反对他的人。

7月9日，在亚洲执行一项外交使命的基辛格从伊斯兰堡秘密地飞往中国（人们以为他因为肚子痛而待在巴基斯坦休养）。他的外交病到中国后弄假成真，变成一次真正的肚子痛。当周恩来在他到北京后仅4小时就来宾馆与他会谈时，他所有的不适感都被抛在脑后，他们前后共谈了17个小时，这两个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代表简直喜欢上了对方。对于两大敌对阵营的发言人来说，能像周恩来和基辛格那样彼此沟通的并不多见。基辛格站在门口非常富于象征意味地伸出他的手，周恩来立即露出微笑握住了基辛格的手。他们两人这时都想起了杜勒斯。基辛格后来评论说：“这是抛弃过去的包袱所迈出的第一

步。”他意识到周恩来的矛盾心理—当台湾海峡两岸仍在对抗、越南战争仍在进行之际，自己却在和中国25年来的头号敌人进行会谈。

基辛格注意到这种矛盾心理表现在“周恩来时而陷入沉思，时而神情恍惚”。然而没有一次周恩来表现得有丝毫的不耐烦，或者是暗示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们的会议从来都没有电话干扰，也从来没有因为他要处理这样一个大国的必要公务而中断。”基辛格面前是为会议而准备的一大堆文件，而周恩来面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张纸。在后来几次会谈中情况也是如此。

周恩来固有的由中国古老文明所带来的文化上的优越感给基辛格以深刻的印象。这种优越感以及伴随而来的“优雅而轻松的举止和似乎不费力就能抓住事物本质的技巧”，缓和了敌对意识形态所带来的紧张气氛。基辛格还对周恩来发出了如下感叹：

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他的谈话轻松自如，但细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听英语时，不必等到翻译出来，脸上的神情就显得已明白语意，或立即露出微笑，这很清楚地表示他是听得懂英语的；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的锻炼，已将极为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在了他的身上。



1971年7月，周恩来会见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杜修贤 摄）

对周恩来来说，在这个不寻常的客人身上所具有的美国式的鲁莽外表下面，隐藏着成熟的欧洲智慧和知识。在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前夕，周恩来与一些来访的美国客人聊天时不时高兴地笑着拍手说：“哦，这真不错，这些东西在我与基辛格会见时用得着。”他们两人显然都在与对方进行的外交斗智中得到了一种孩子气的满足。然而，在他们第一次会面时，他们仍不免闹些误会。基辛格犯了一个初次来访的旅行者所犯的典型错误。他把中国比作“一块美丽的但对我们来说却又神秘的国土”。周恩来立即举起手来告诫他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当你熟悉它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在后来的会面中，他又提到了这个话题。

但在后来，当周恩来想知道尼克松访华的随行人员有多少时，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估计会有50人左右，这叫美国官员们不禁感到遗憾。而正确的答案是，尼克松想带700人同行。

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华并与他就政策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在尼克松总统访华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协议。这标志着周恩来政治上的一大成功，在这场戏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地位不稳的林彪将军被周恩来的胜利所激怒。他夸口说（或者是威胁说）“如果周恩来能邀请尼克松，那我也能邀请勃列日涅夫”。也许，他认为周恩来已经走得太远了。不管怎么说，他不久之后为夺取最高权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尝试，但当时的情况至今仍搞不清楚，因为存在着几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当时的情况似乎是，林彪在1971年8月计划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毛泽东当时正在中国中部地区旅行，据说是林彪的女儿及时地把情况报告了周恩来，这才救了毛泽东。然后，到了9月12日，与妻子、儿子及一些高级军官在北戴河海滨休假的林彪，在当天黄昏的时候，调了两架三叉戟飞机到北戴河机场，准备进行一次秘密的夜间飞行。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顿时起了疑心。北京流传的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说，周恩来实际上把林彪困死在“北戴河一座别墅的一条昏暗走廊的拐角上”。但是，这纯属凭空捏造。

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林彪试图逃往苏联，也许他是希望说服俄国人对中国进行干预。但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当晚就在蒙古坠毁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他的官方报告中所说的，林彪“背叛党和国家，像叛徒一样投向苏修的怀抱”。

不管怎么说，林彪死了，周恩来继承毛泽东的主要障碍已不复存在。兴高采烈的德国大使在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不顾外交礼节地向周恩来祝酒说：“周恩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林彪的死在当时是令人尴尬的。有谣传说，由于广东省的一些高级将领因他们的亲林倾向而迅速遭到清洗，因此广东省可能要分裂出去。这就需要周恩来使用他的全副本领来保证那些各省的解放

军指挥员不至于觉得他们受到排挤。当然，周恩来还要应付他那些令人厌恶的同盟者—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代表的激进的毛主义者。后来，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些人都来自上海）一起，以臭名昭著的“四人帮”而闻名于世。

周恩来重新安排其老部下的工作得以逐渐走上正轨。廖承志在8月份得到了重新任命；董必武被宣布为国家代主席；而别的老同志，像朱德、聂荣臻也都重新回到他们在军事委员会和核武器发展计划委员会的位置上。这些成就都是在“四人帮”还不那么活跃和羽毛尚未丰满的情况下取得的。

但对周的某些朋友来说，这一切却太晚了。1972年1月，陈毅去世了，他一直未能从“文革”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我们应该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在悼词中这么说。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仍呆呆地坐在会场，两眼茫然地盯着花圈，好像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或许他还沉浸在某种悔恨之中。最后，周恩来上去扶着他的胳膊，小心地把他引离会场。

周恩来后来对一个美国来访者说：“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犯过错误。……怎么会有绝对的权威呢？……毛泽东可能会在某些问题上是权威，但对于那些他不熟悉的问题，他怎么能算是权威呢？……这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你可能今天是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明天还是权威。”

对任何负责中国安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国家仍处在分裂之中，更糟的是，周围还有大国势力的威胁。谁也说不准在林彪事件的刺激下，克里姆林宫会进行什么新的冒险。周恩来对一名美国记者说：“你能这样设想一下吗？苏联军队直插黄河北岸，美国人打到长江南岸（可能从台湾或印度支那出发），同时，日本侵入并占领

山东的青岛，印度也参加进来并占领西藏。”他对另一个来访的记者说，“我们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同时迎击四面来犯之敌。”

10月份，基辛格为了制定理查德·尼克松访华的最后细节，再次来到北京。他在下榻的房间里发现一份英文的宣传公报，号召世界人民“打倒美帝国主义”。他把它交还给中国人，并干巴巴地评论说，它一定是原先的房客留在那里的。几小时后，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代表团时把传单说成是“放空炮”，他还说应该注意中国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言辞。同时，他还表现出他为会谈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看过《巴顿将军》这部电影，因为他听说尼克松很欣赏它，他并且像往常一样记下了那些随同基辛格访华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大量背景材料以及他们在政府中的职务。这使得所有这些人在离开时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同时又不免有几分得意。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等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是周恩来处理这次事件时设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办公室

这次会面给基辛格以深刻印象的是周恩来具有抓住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同寻常的能力。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周恩来懂得政治家不能创造时势，他经常引用中国的一句老话：“舵手必须顺水行舟，否则会有灭顶之灾。”

然而，基辛格落入周恩来耍的一个老外交把戏当中，他们本来已经同意把美国人为尼克松访华而起草的一份公报草案作为讨论的基础，因此基辛格认为这份公报草案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到了后来，当周恩来再次与基辛格会面的时候，他发言尖锐激烈，长达一小时—据他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明确指示行事。他宣布美国人的做法是不

可接受的，除非公报摆出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否则就是“不真实的”。与其假装观点一致，还不如正视现实的分歧。基辛格完全不能接受这些观点，但这时正好到了吃烤鸭的休息时间。饱餐一顿之后，周恩来提出了一个新的草案，上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但也留出空来让美国人阐述他们的立场。基辛格先是吃了一惊，但马上又为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所吸引，并决定同意采用这种方式。

基辛格这时又以他的一个著名的提法从周恩来那里捞回一分，他的提法是这样的：“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表示异议。”这个提法实际上摘自美国国务院20世纪50年代的一份文件，但它仍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它实际上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改变了政策，但它似乎正是中国人所要的东西。因此双方就草案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公报的基础。

当基辛格准备动身前往机场时，周恩来用英语对他说：“欢迎你快些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几个小时之后，联大投票决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这就结束了22年抵制中国的历史。对周恩来来说，这是个有保留的胜利，尽管他为此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多年前曾随同“迪克西”观察团到延安与周恩来会谈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那天正好在北京再次与周恩来见面。他开玩笑说他希望能在纽约见到周总理。听到这话，周恩来像往常一样以一种突然而自信的姿式迅速转过身来说：“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只要台湾大使馆还在华盛顿，你就决不会在美国见到我。”他很清楚，他的成功是有限的，前面还有许多路要走。

中国在联合国成功的因素之一自然是由于第三世界中要求接纳中国的呼声日益增高，正如周在1971年接见赞比亚来访者时所说

的：“我们都是发展中国家，同属第三世界。”他在访问亚非国家时也曾反复强调过这个观点，但他这个求团结的策略却又不是不负责任的。有一次，卡扎菲上校的一个副手来中国要求买一枚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枚战术原子弹。”周恩来有礼貌地通知他，中国不卖原子弹。利比亚要靠自己生产这种武器。



1972年2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出访未建交国家的总统尼克松（杜修贤 摄）

1972年2月21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到来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走出了他的专机，置身在北京那寒冬的空气中，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当尼克松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脚前未戴帽子的周恩来便开始鼓掌表示欢迎。尼克松停了一下，然后也鼓掌相报。走到舷梯下面时，尼克松向周恩来伸出了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他后来写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胯部向前稍提，肩膀略向后移，头颈挺得笔直，整个姿势给人一种略显随便的印象，一种“哦，是你啊！”的态度，与尼克松过分急切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他们一同乘车进入北京城时，周恩来评论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可见，杜勒斯的阴魂存在了多么长的时间。

诱使一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对中国共产主义怀有深仇大恨的国家的元首来中国进行官方访问（他的政府甚至还没有承认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就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进行谈判，这是周恩来长期外交生涯中最辉煌的成就。甚至周恩来自己也用同样夸张的语言把它称为国际关系中令人高兴的一个突破。

他们双方很快就变得不那么拘束了，并像通常在此类场合一样开起玩笑来。基辛格的秘密访问及他离奇地把他的失踪解释为是出于浪漫的原因成了他们俏皮话的现成材料。尼克松说，他作为总统，如果用姑娘作掩护的话，就会碰到麻烦。周恩来立即补上一句：“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

显然在周恩来眼里，中国之行是尼克松竞选战略的一部分。当尼克松说到中国乐队正在演奏的一首曲子正是他3年前就职典礼上选中的那首曲子时，周恩来立即举杯说：“为你下一次就职典礼干杯！”他对于能从苏联人那里把尼克松拉过来同样感到高兴。他夸耀说：“你先到这里来了，莫斯科气得要命！”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魅力不像基辛格那么着迷。他们相处的50个小时使他对周恩来的局限性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尼克松发现，尽管周恩来“才华出众、精力充沛”，但他的观点“被他那刻板的意识形态框框严重歪曲了”。

尼克松写道，在周恩来看来，法国对美国革命战争的干预不是由法国政府而是由拉斐特率领的志愿军进行的。周恩来还把林肯的胜利归功于人民站在他这一边—而尼克松则把林肯看做一个领导进行了南北战争的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解放黑奴只是一个军事战术上的策略（比方说，林肯没有解放北方边境各州的黑奴）。

但在政治上相互信任方面，他们两人相处得极其融洽。尼克松向周恩来承认：“我们的国务院像筛子一样极容易泄密。”周恩来对尼克松要送给他一支他签署过一些普通法案和其他一些东西的钢笔的做法感到困惑不解，他从未听说过这种习惯。当基辛格向他解释时，他似乎仍然兴趣不大—因为这听起来实在像是在干涉美国的内政似的。或许美国人可以在回国后另外再送给他一支笔吧？

台湾问题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大问题，基辛格为公报准备的那个提法，使得两国政府不受台湾问题的阻碍而走到了一起来，尽管全面解决台湾问题仍遥遥无期。周恩来说：“我们是个大国，台湾问题我们已经等了22年啦，我们还可以继续等下去。”甚至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也仍然如此。

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对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理由成为敌人，我们双方谁也不想要对方的领土，谁也不想支配对方，谁都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周恩来对这些话的反应则不那么热烈—可能是由于他的同僚仍对美国心存疑虑，因此他不愿意在与美国缓和这个问题上走得太远。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与他们最害怕的国家—苏联打交道时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中美修好对中国来说仍是一大胜利。而对中国国内一些难以驾驭的非共产党人士来说，认为这是美国式伪善的一次大展现。在与中国谈判并决定帮助中国发展经济之前美国不坚持要求先清除中国的共产主义的做法是令人吃惊的。对中国主张现代化的人来说，这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他们长期以来怀有这样一个愿望，就是中国与美国这个毕竟对世界的现代化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国家的联系终将得到恢复，而现在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中美交好生动地证明，尽管中国有着它的历史独特性及僵化的意识形态，但它已不再孤立，这是周恩来的一次巨大的胜利。这时，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周恩来在中国权力结构中取得的优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也更为明显。这与“四人帮”的权力与威望的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周恩来与尼克松的会谈中，有一个小话题曾反复多次出现，这就是周恩来的年龄问题。尼克松随行人员的年轻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总统的助手德怀特·查平只有31岁，而且看上去还更年轻一些。周恩来抱怨说：“我们的领导人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尽管他在长时间的会谈中仍能够保持机警和集中注意力（而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却打起瞌睡来，尤其是在吃过烤鸭之后），但他也偶尔走走神。当他们去看由江青领导的歌剧时，据说周恩来告诉尼克松，赫鲁晓夫7年前[(15)]来过这同一个剧场，并且是坐在尼克松坐的同一张椅子上。



1972年2月，周恩来总理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上海举行会谈并签署联合公报即中美《上海公报》

美国人注意到周恩来经常吃一些白色的小药丸，他们猜想那是治高血压的药—尽管他对尼克松说，那是治支气管炎的。有一次，周恩来表示希望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能留任，以使这些谈判的果实完全得到收获。但他又补充说：“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如果我突然死于心脏病，你们将不得不跟一个不同的对手打交道。”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确实不妙。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几天之后，周恩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得了不治之症—癌。人人都注意到总理的变化。他的一个西方问题助手在一次晚餐时说：“周恩来的皮肤变得几乎有些透明，他工作太辛苦了。我们怎么能阻止他工作呢？”周恩来对一个来访者承认，他的医生已禁止他坐飞机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安东尼·劳伦斯注意到，周恩来那曾经极其生动的眼睛—“它们活泼得像是会说话一样，现在已经变得呆滞、疲倦了。”

但周恩来仍没有放弃他的嗜好，他继续以身作则地向别人推荐茅台酒。他在7月份对美国客人说：“你们都怕癌症，因此你们美国人不吸烟。你们的香烟盒上还印上一个警告，但没有迹象显示吸烟缩短了你们的寿命。”在同一个月，他对北京大学的领导说要增加一个理论科学系，几周后他又写信要求科学院立即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

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恩来对一些小事也非常重视，8月3日晚上，周恩来的汽车与一位骑自行车的姑娘相撞，他把她送到医院进行透视检查，后来又焦虑地打电话询问结果，还命令警察不要找那个姑娘的麻烦，姑娘擦破的衣服也得到了赔偿。第二天，周恩来又派了手下3个助手去探望那位姑娘。

就在这同一个月，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年轻而又对中国充满热情的”罗克珊·威特克来中国，打算采访中国妇女，并且几次见到了江青。这个第一号妇女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曾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

1972年10月，周恩来把一首诗读给一些美国客人听。这首诗是另一个著名的中国宰相在公元3世纪写的：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16)

在他的暮年，如果他在长期的关键性日程安排表上做到重点突出的话，那么在中国究竟要花多长时间才能达到尼克松随行人员在年轻方面表现出的美国标准问题上，周就能变得更现实一些。有一次，他对一位美国朋友说：“中国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要想接近美国的物质标准，我们却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一代人肯定看不到这一天了。甚至有可能要几个世纪才能看到。”

1973年，周恩来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在会上，一些年轻的“文革”暴发户在争夺政治上的肥缺时与他发生了冲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他说：“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尤其是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总是想复活儒家思想，以阻止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确立。”（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在当时的象征手法当中，孔子代表周恩来，而在报纸上刊登批孔文章又很容易。）但周恩来则借题发挥，在针对林彪的最后一个案件中，周恩来宣称：林彪不仅投降苏修，还以一个极左派的面目来掩饰自己的右派面目。周恩来轻而易举地瓦解了“四人帮”的攻势。

在这次大会的照片上，毛泽东身边分别坐着周恩来（他坐在原先由林彪占据的椅子上）和王洪文。王洪文来自上海，是“四人帮”中最年轻的一个。毛泽东这样对待周恩来好像是在显示他同意由周恩来接班。但这位老主席直到临死前也不让任何潜在的继承者享有十分的把握，他继续对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在一些问题上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对周恩来的做法也表示同意。在周恩来把果断行事的邓小平重新安排进政治局时，毛泽东未出席大会的讨论。仅仅在几年前还被骂作是走资派刘少奇可憎的副手的邓小平，现在以救世主的面目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周恩来很欣赏他的能力，对他崇尚实用的观点也可以接受。此外，邓小平在军队里深得人心。

周恩来机敏地在大会上说，所有的政策讨论都已有定论。他解释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这样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也没有人能指责他背离了毛主席的路线。但他下面的推论显示毛主席的路线已经失败了：“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事实上，周恩来正回到他那出色的而在20世纪50年代却被极大忽略了的政策上去，他认为必须“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十大”通

过的新党章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的提法，再次平静地恢复了毛泽东的本来面目。然而，周恩来在个人讲话中，仍不忘恭维他一番。

人们只能在周恩来报告中关于国际局势的部分听到防御性的调子。这说明他与尼克松的调侃仍不受党内一些人的欢迎。“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用这句诗来说明当时世界正处在“天下大乱”之中，中国对此应该表示欢迎，因为它使得敌人乱成一团。天下大乱使得第三世界组成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统一战线一事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周恩来晚年不断强调的一个主题。中国接近美国只不过是这个长期战略中的一个战术：“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周恩来举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作为中国与美国的有益的妥协的先例。他还觉得有必要指出，在和约问题上，列宁曾经在人民委员会中居少数。是不是周恩来在与尼克松搞缓和这个问题上得到的多数太微弱？他给他的中国听众们留下了一个他们所欣赏的比喻：“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

同样在1973年，周恩来正式与数量惊人的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专家重修旧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帮助外文出版部门编辑和翻译宣传材料为职业。他们中有一些人变得比毛主义者还毛主义，并且还不明智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另一些人要显得更谨慎一些，但他们在红卫兵的仇外沙文主义狂潮中深受其害。在“三八”妇女节这天，周恩来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承认在不久前，有人做了一些有损外国专家的坏事，他代表政府对他们表示歉意，并答应要纠正错误。他边说边穿行于各桌之间，走遍了60张桌子，向每一位在中国工作的外国朋友祝酒、问候，并与这些外国朋友握手拥抱。他以他的一贯作风要求他们把他们所受的苦当做一次磨炼，认为他们是创造新中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71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新年招待会上向长期帮助我国建设的各国专家及其夫人祝贺新年， 并问候在“文革”中受过冲击的外国专家

周恩来承认，中国在对待外国人问题上存在着沙文主义和激进主义。他问道：“一个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阻止这种事将不利于中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但人人都知道，绝大多数负责日常事务的党政官员可不这么想。

出于设计一个遏制超级大国尤其是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的考虑，周恩来这时变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欧洲联合的拥护者。他对荷兰来访者说：“美国和俄国都不可信，欧洲必须集结起它自己的力量。”他邀请法国总统乔 治·蓬皮杜和数以十计的欧洲著名人士访问中国，希望能说服他们停止彼此之间的争吵，加强他们对苏联的防备。

对周恩来来说倒霉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使得他在这个美国总统身上花的工夫几乎白费了（因为中国人非常看重与外国首脑的私

人关系）。他在10月份直率地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水门事件”将不会影响中美关系，它是美国的内部事务，它在中国甚至不为人知，因为中国的新闻界对此不加报道。他认为最好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希望尼克松能够渡过难关。

当基辛格在这年秋天再次访问北京时，他发现周恩来的健康状况似乎不太妙。“他过去具有洞察力的思想火花正在消失。”但基辛格自己也有些失常，犯了策略上的错误。他显然对周恩来正在政治上深受其害的“反孔运动”作了错误的估计，他把毛泽东的中国仍看做是一个十足的儒家社会。这样的哲学妙语在一两年前可能会让周恩来高兴，但现在则有些过分。那可怜的翻译甚至还没来得及译完基辛格的评论，周恩来就回以一通激烈的驳斥，这是他第一次在基辛格面前失态。

在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这是一个最奇怪的时期。看起来很像是毛泽东一方面支持周恩来的务实政策，另一方面又不愿给他过分的信任。主席的头脑似乎异常，其中一半带有激进思想，而他对这种思想的实施者—他的妻子江青的感情似乎也令人难以捉摸。

1973年秋天的某个时候，毛泽东得知江青与罗克珊·威特克的谈话一事，这似乎是她突出自己政治形象的一种露骨手法，就像毛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埃德加·斯诺那支热情的笔所做的那样。毛泽东显然决定要与江青离婚，但周恩来认识到这样做将引发中国激进派的全面骚乱而难以收拾。因此，他强烈反对这种公开展示党内分裂并可能刺激江青走极端的做法。几周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封尖刻的绝交信给他的妻子，据说其中有这么一句伤心话：“我倒是很羡慕周恩来的婚姻。”



1973年9月，周恩来在机场迎接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杜修贤 摄）

周恩来不但婚姻美满，他在阻止他的亲戚做任何有可能被解释为利用了他的特权的事时所采取的方式也是不同寻常的。在经过了5年的农村下放生活之后，他的侄子写信给他，希望能像“文革”前那样回到城里生活。周恩来因为不愿意被人看到他对自己的亲戚有特殊照顾，于是就拒绝了侄子的要求。(17)



1974年年初，江青手下的左派分子加速了他们倒周的步伐。对他们来说，周恩来只不过是一个待在总理办公室代表着过去的老人。在清除儒家思想影响的幌子掩护下，“四人帮”越来越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在一旁幸灾乐祸地欣赏他生病又工作繁忙的痛苦。

有一次，周恩来正在与一位外国客人谈话，江青在一旁挑衅说：“我从未读过“四书五经”（在周恩来所受的教育中，自然包括这些经典），可能总理是我们当中唯一读过这几部书的人。”

周恩来避开这个圈套，转而问“四人帮”中最有学问的张春桥是否读过，张春桥撒谎说：“没有，我没读过，但现在我必须研究它们，以便摧毁它们。”

但“这个否定‘文革’的最大的儒家”（这个称呼是指周恩来）略施小计，终于扭转了“四人帮”造成的不利局面。他接手这场反对身为儒家的他的运动，并把这场运动定义为反对林彪思想的运动。周恩来在这么做时是如此的积极，以至于毛主义者的航行方向也被他所掌握。这样，他就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他是不是这场声讨运动的真正目标？

但是，这场运动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某些损失。周恩来所鼓励的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一些文化接触遭到破坏。在周恩来支持下被邀请来中国拍片的意大利电影工作者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和其他几个艺术家都倒了霉，而贝多芬与舒伯特也都成为这次攻击的受害者。甚至周恩来进口成套设备来发展新兴工业的政策也被诋毁为“崇洋媚外”和“洋奴哲学”的典型。

“四人帮“还给周恩来制造种种困难，不让他那么容易地与毛泽东进行日常谈话，而这种谈话在政治上对周恩来来说又极其必要。这

样，他们就成功地剥夺了周恩来的一部分胜利果实。然而，尽管如此，“四人帮”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1974年春，周恩来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6月和7月，他的癌症加剧，但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继续会见外国显要，尽管他这时已不再能像过去喜欢的那样一谈就是三五个小时。

7月底，他还以他特有的作风，顽强地在建军节招待会上露面。在招待会上，他步履艰难、劳累过度，会后他仍旧回到病床上去。几天以后，他在医院对美国参议员麦克·曼斯菲尔德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大门永远也不应再关上了。”他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某些事本可以完成却没有完成。

4天以后，尼日利亚的戈翁将军被告知，周恩来进行了一次手术，现在正在恢复之中。外国新闻界声称周恩来患了胃癌，但中国外交部否认了这种说法。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周恩来正在接受钴辐射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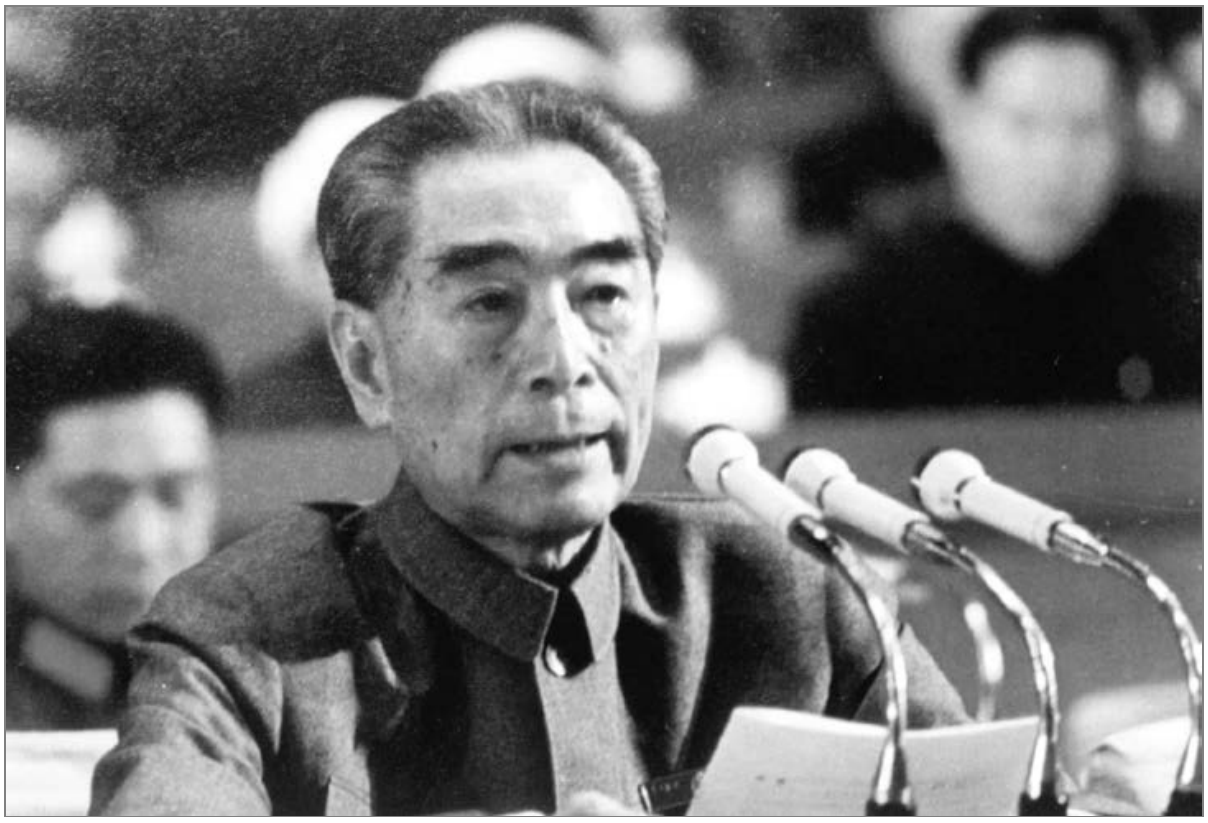
当布托总统和其他外国领导人在毛泽东的书房拜访毛泽东时，邓小平极力试图去填补周恩来留下的空白。周恩来的敌人也满怀希望地集结起来。“四人帮”授意他们的追随者写文章反对“当代大儒”。有一份省报也不失时机地斥责“一个地主分子，他经常装出十分老实和诚恳的样子……但却在暗中用他的假仁假义来蛊惑年轻人。”据说有一部电影，描写一个轻信的农民老党员（代表毛泽东）被一个狡猾的叛徒引入歧途，而这个叛徒又是从国外回来的（这暗示周恩来在法国的留学生涯）。

“四人帮”中最年轻的王洪文则赶往毛泽东在长沙附近的隐居地去报告一个新的“阴谋”。他说：“周总理虽然有重病，但他仍然‘忙’着找人谈话。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这些都是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治国论者，他们在“文革”中都受到了冲击，现在都

由周恩来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毛泽东对这次告状没有作出使王满意的反应。

邓小平在12月份告诉一个来访的日本人说，周恩来已经住院6个月了，现在只通知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周恩来决定按自己特有的方式再作最后一次拼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定于1975年1月中旬开幕，这是周恩来为排除“四人帮”急不可待而又带有破坏性的干扰，进一步把中国引向下一发展阶段的新的政府机器的最后一次机会。为了做到这一点，周恩来不得不挣扎着进行他最后一次飞行，前往长沙去争取毛泽东的支持。一名机组人员回忆说：“总理显得十分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步履也变得艰难，双手微微发颤，在登机时他得要人扶着。”当有人问到他的病情时，他回答说：“疾病嘛，就要和它作斗争。……一年没有坐飞机了，长期躺在医院里，现在好些了。”他的手颤抖得非常厉害，使他几乎不能剥开女服务员递给他的糖。但到了12月26日，他终于使得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他的宪法草案及一些新的人事安排。毛泽东同时也为自己保留了发布理论方面的“重要指示”的渠道，以保证激进思想不受国家事务的干扰而生存下去。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可以说是他的政治遗嘱。他把“文革”称为一场反资运动，他没有把经济提到政治之上，因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仍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他接着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就是以后中国一直牵肠挂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新的宪法则保证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公社将可以对更小的次级单位（生产队）实行最大限度的物质刺激，并保证自留地和副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保证了在中国的发展中采取一种混合经济的形式。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作报告

这是10年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引用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讲话来证明70年代的新政策的合理性。这样，他使人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周恩来的胜利意味着大部分军队指挥员已经集合在他的政府机构的后面，来支持一个关于中国未来的、要求达到稳定和明显进步的蓝图，而不愿光看到意识形态方面热烈的景象。邓小平被提名为第一副总理，成为周恩来有力的副手，同时他还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毛泽东仍待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许他不愿意出席这次大会来使这些事情合法化，尽管他在大会进行期间身体很好，并接见了西德的一位政治领袖。

这可能是周恩来最大的遗憾，因为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四人帮”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利用毛泽东的权威来破坏这些新计划。大多数人这时仍设想周恩来会比毛泽东活得长一些。毛泽东比周恩来大5岁，而且总的来讲，他的身体不如周恩来健康。然而，这时

医生肯定已经告诉周恩来他的最后日子还有多长。他一定考虑过如果他先于毛泽东而离开人世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毛泽东不喜欢的邓小平的管理下，这座精心建设的大厦能否经得住衰老的毛泽东的妻子及“四人帮”的攻击。



1975年6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蒙拉差翁·克立·巴 莫。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来访的外国总理（杜修贤 摄）

周恩来这时在接受中国专家治疗的同时，也接受外国专家的治疗。1975年2月，他又动了一次手术。他后来对医生说，他们应该去中国南方的云南省对锡矿工人中的矽肺病发生率做更多的调查，尽管他已经病入膏肓。有报道说，是一个后来叛逃到美国的年轻医生发明的一个治疗尿毒症的中草药药方又延长了他几个月的生命。在他生命

的最后阶段，他不让他的理发师来为他理发刮脸，因为这会使他们彼此心里都不好受。

外国来访者仍不断来看他。病危的周恩来向泰国总理克立传达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信息。他说：“你回国后告诉所有的人，特别是要告诉你的儿子和孙子，中国永远不去进攻泰国。”

克立很机智，他要求周恩来把这个承诺写下来给他。周恩来悲哀地承认，“我的手打战，我病得太厉害，不能动笔”。然而，他还是在一份关于与泰国的外交关系的协定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他最后一次官方签名。这件事发生在7月。

几周以后，周被告知，一个反对古典浪漫小说《水浒传》的新的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消息是一个专程从国外赶来为他治病的外国癌症专家告诉他的。毛泽东以前很欣赏《水浒传》这部书，但现在他把这部书看做“对投降主义的宣传”。实际上，周恩来虽然住在医院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经常去看望他，告诉他各种情况。他找来了《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在病床上翻阅。

他感叹道：“恐怕我的病已经治不好了。”

但是，他又必须忍受另一种“商量”，尽管它令人讨厌。党中央设立了一个由“四人帮”中的王洪文为头头的监督委员会来负责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一名医生后来回忆说：“周总理是被逼死的。……他们不让他休息。……甚至在我们给周总理输血时，江青也会挂电话来命令在她与总理说话时停止输血，而她尽扯些无聊的事，她却把这称为‘国家大事’。”传说有名医生还声称，中国最优秀的癌症专家提出的治疗方案没被采纳。

他这个老人并没有屈服。据说1975年11月的一天，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在首都市中心的北京饭店，他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但他是在休息吗？噢，不是！他还有一些刚从公文包里拿出来的文件要看！



周恩来住院期间动手术14次，但他仍同中央和有关方面负责 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开会47次。这是他在305医院 住过的病房

1975年12月31日，他仍在医院。那天的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在“文革”前写的两首诗，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花了不少时间来听人朗诵这两首诗。一首是《重上井冈山》，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游击根据地。这首诗是以这样两句结尾的：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第二首诗是关于中苏关系的形象化比喻，挖苦了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它的结尾是“试看天地翻覆”。据说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由于病痛而不能入睡，他突然挣扎着说出“诗词”两个字来。病床边的每个人都意识到，这是指毛主席的那两首诗。因此，他们轮流读这两首诗给他听。听到第二首诗的最后一句时，周恩来大声地笑了起来—这是他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能笑出声来。

这个故事可能是他的追随者杜撰出来的，以反击“四人帮”关于周恩来仇视毛泽东的宣传。或者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话）周恩来本人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周恩来无疑是对毛泽东心血来潮的理想主义产生出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种理想主义毕竟在它的光辉时刻曾激励过周恩来本人。

但是，另一种说法则不太可信。听说，有一份据推测是周恩来在病床上口授给邓小平的遗嘱在周恩来去世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不见了。这似乎是苏联或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编造出来的。据传，周恩来在这份遗嘱里说“一个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不应再重犯了”，还说他把中苏关系正常化当做“最大的外交目标”。从他的一贯谨慎来看，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

下面这个同样难以证实的故事也令人感到有点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故事说，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几天，毛泽东来医院陪他度过了几个小时。有一个故事说，毛泽东在周恩来去世前半小时还与他待在一起。另一个故事的说法正相反。据说毛泽东像他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那样把他的老战友冷落在了一旁，但周恩来这次要更痛苦一些，因为毛泽东根本就不来医院看他。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说周恩来在最后的时刻，忍着病痛，与坐在床边的妻子低声地唱起《国际歌》来。

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只是可能发生过。但是，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这个在20世纪的中国最受人热爱、最有才能、最成功及最激动人心的政治领导人终于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他去世的消息第二天才公布。然而，不论是他的诗词、歌曲还是他的遗嘱，都没有被采纳发表过。这些东西只可能向中国的别的政治家和普通老百姓表明，这个生命过于重要，以至于不能被留下来扼杀某些人的利益。

尾 声

随着周恩来的去世，有关他的传奇也接着产生。“四人帮”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运气有这么好，他们最强大的反对者竟然比他们勉强的保护人毛主席先离开了这个人世。因此，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周恩来的遗体。能不能把它毁掉而不引起一场抗议活动呢？

官方宣布将举行6天的悼念活动，而这是此类情况下规格最低的。在这6天中的某一天，一辆白色带蓝道的小救护车，载着一口简单的黑色棺材开出医院，穿过北京宽广的大街，后面跟着几辆小汽车，里面坐着邓颖超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没有仪仗队，没有哀乐，只有沉默的市民站在大街的两旁—据说共达150万人，这些人都是听了口头传闻之后特地赶来为已故总理送行的。在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他们冒着零下12度的严寒，默默地等候着灵车的到来。

灵车挂着黑色和黄色的饰带，满载着花圈，在天安们广场绕行一周，然后沿着长安街向落日下的西山方向开去，最后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谣传说，是政治局下命令进行火化的，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周恩来这个角色就不会那么受人怀念。这大概预示着周恩来的政策也将

遭到厄运，他的遗孀不得不向群众解释说，是周恩来自己要求进行火葬的。官方没有宣布有关的葬礼事宜，但许多中国人都带着一束束传统上表示哀悼的白色绢纸菊花赶来了。遗体仅供人瞻仰两天，有1万名受到优待的“群众代表”被允许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9个月以后，毛泽东的遗体享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周恩来的骨灰被送到古老的紫禁城的一个宏伟的殿堂里存放了3天，那个殿堂曾是皇帝拜社稷的地方[18]。前来吊唁的中国人及外国人穿过朱红色和黄色的院子，登上石阶，然后走到红色的骨灰盒前默哀几秒钟。党旗半掩着骨灰盒，后面悬挂着一幅周恩来50岁时的照片。


小超哀献

邓颖超为去世的丈夫周恩来敬献的花圈

1月15日，周恩来的骨灰被送往他工作过多年的人民大会堂，他的追悼会也将在那里举行。追悼会只有一小群官员和代表参加，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引人注目地没有出席追悼会，尽管他曾出席了陈毅和其他老同志的类似这样的追悼会。况且，他还在前几个礼拜接见了多达10人的外国使节，这些外国人都报告说他的身体很好，而几天以后他又接见了理查德·尼克松几乎达两小时之久。接着，上面又命令结束悼念活动，外国来访者也被要求不要表达他们对周恩来的敬意，据说这是“出于考虑到毛主席的感情”。

最后的行动是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向中国的江河湖海—这是打破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一个革命性的要求（甚至台湾也没有被忽略，因为有一部分骨灰撒在台湾海峡里）。周恩来还特别声明，不要为他建造纪念碑。



首都各界群众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杜修贤 摄）



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杜修贤 摄）

邓小平在葬礼上的讲话意义不同寻常，因为那是他再次下台之前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过了几年他才再次公开露面。毛泽东曾顶住了以他的妻子为首的“四人帮”要让周恩来靠边站的种种认真的尝试，而他对邓小平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因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看法可以归结于他的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四人帮”的宣传机器迫不及待地开动起来，他们声称所谓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后面是一整套修正主义纲领，周恩来是一个“走资派”等，还有诸如此类的攻击。但周恩来的崇拜者在3、4月间，利用每年一度的纪念死者的清明节进行令人吃惊的感情大示威，以反击“四人帮”对周恩来的攻击。1万多个纪念已故总理的花圈被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党的宣传家们徒劳地规劝人们“清明节是鬼节”、纪念死者是“一种过时的习俗”。但是，各种自制的白色、红色及黄色的花圈仍源源不断地送到广场来。

在天安门出现了这样一份悼词，它写道：“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山河中。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拥有全中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都是他的坟。”

纪念碑的基座很快就被花圈所淹没，堆积的花圈高达15英尺。在这次自发的纪念活动中，人们朗诵并张贴的诗词数以千计。下面是其中的几首诗：

一代英豪创天下

万人虑

谁接班？

另一首是：

啊，这是敬爱的周总理

对我们亿万儿女

最大的希望呵！

也是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将为之献身的

最崇高的理想！

还有一首是：

尸骨未寒，

忍痛悲歌。

只见舞台上留下一个空座。……

还有另一首是：

他的工作尚未完，

群魔已乱舞，

哪里去寻另一根擎天柱？

神州大地，

八亿人民共享，

这同一份无尽的思念，

这同一份强烈的情感！



人们沉浸在失去周恩来的悲痛里

到了4月5日，激进分子觉得已经受够了，他们派部下在黎明前撤下花圈，并用武力把这次讨厌的纪念活动镇压了下去。看起来，“四人帮”似乎是赢了，但是赢得不彻底—因为这时出现了一个华国锋，他不久前才从省级领导岗位上被提拔上来，名气相对较小。毛泽东选择他当总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这样，他就不必在邓小平和“四人帮”的候选人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了。然而，当毛主席在该年年底退出历史舞台时，温和派和反对极左派的力量，打着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旗

帜，发起了一场决定性的清除激进分子的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好几年。

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数千人举着装饰着黑色饰带的他的画像，来到天安门表达他们的不尽思念。他们中的一些人高呼“周总理还活着！他活在我们心里！”

结束语

周恩来经常被描绘为一个杰出的中产阶级学生，由于偶然的机会而加入了马克思主义阵营，后来又花费他毕生的精力执行他的无产阶级同志们所制定的政策，但他又从未向他们的最高权力提出挑战，因为他的心理障碍使他不愿意亲自去领导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

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尽管在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他可能不那么谨慎小心。

但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就会发现情况要复杂得多。答案必须从他的童年开始去寻找。周恩来童年那独特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他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那别具一格的表现。正如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麦克唐纳有一次在评论一些已出版的介绍周恩来的书时，曾富于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不能仅仅归因于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必须找到一些别的解释，这些解释可能存在于他早年的生活之中。一旦搞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周恩来的自我克制能力的根源……这样，我们也能搞清楚他选择共产主义道路的原因”。

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周恩来在一个大家庭里长大。在这个大家庭里，他的父母和他只构成一个更小的单位，这样就能提供足够的保障来使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能感到一种最低限度的集体安全。不管碰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来帮忙。尽管在大家庭里存在着这样一种公社式的保护制度，然而周恩来却令人伤心地遭到遗弃和排斥，这使他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先是被他的生身父亲过继给别人，当时他

生下来才几个月；然后，在他懂事之前，他的养父又撒手归天；后来，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养母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去世。由于中国家庭单位独有的特点，所以用一种过分自信的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来说明这一切是不明智的。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小时候一定非常想得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父辈人物。我们还可以合情合理地继续猜想，周恩来可能对过去怀有某种怨恨，尤其是对他的生父，他的生父不幸碰巧是他这两对父母中最没有能耐、最不关心他的人，然而这个人又是唯一活下来的并在他成年后干事业时来纠缠他的人。他后来的一些习惯，如过分地爱整洁、节俭、敏感、令人难以置信地热爱工作，等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

这样，年轻时的周恩来就以一个善于组织别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激进的爱国者的面目出现。他曾说过，交朋友是为了孤立敌人。为了革命，应该准备牺牲生命。尽管他作为一个讲信誉的人在中外享有盛誉，但他仍和别的政治家一样，为国家利益而使用策略。例如，他在20世纪50年代声称中国击落的美国飞机驾驶员是间谍。然而，与他的一些同志们比起来，他仍例外地算得上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

这位激进的、充满爱国心的周恩来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把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最现代、最时髦的信条而从心底里喜欢上它。周恩来一直对外部世界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一点与毛泽东或他那些共产党同僚们比起来显得更为突出。卢西恩·派伊教授曾经评论说：“他在国外待的时间比他那些政治局同僚们在国外待的时间的总和还要多。”

周恩来在中学的时候又接触了西方的政治科学。后来，他有意识地选择那些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学或大学就读。他自然而然地为西方的最新思潮——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相信对于极度落后的中国来说，只有最好的药方才会起作用。

纵观周恩来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地与西方发生联系。他曾就读于张伯苓博士的南开中学，而这所中学是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开办的；后来，他又在日本、法国、比利时、德国、苏联生活过。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利用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租界来逃避敌人的追捕。这类行动最早开始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期间，他曾躲在天津法租界的一所房子里召开学生会议。8年以后，他又使用一个同样亲法的女士在上海法租界的屋子来开展革命密谋活动。同年晚些时候，他还使用鲁茨主教在武汉的住宅作为避难所。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也曾短暂地求助于飘扬在香港的英国旗帜的保护。如果没有这些帝国主义领地的保护，周恩来的一生也许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周恩来对俄国人的依赖。例如，俄国人曾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他发动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一个高潮。他以非凡的决断给这次起义打上了他独特的印记。尽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但它树立了一个新的模式，为后来最终取得胜利的共产党起义开了一个先例。它也是周恩来长期革命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以最高领导人的面目出现，而且他这次的最高领导地位得到了承认。

甚至在南昌起义之前，周恩来那人所周知的拒绝担任中共最高领导的行为就已经开始。在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听从陈独秀的领导，而不是站在陈独秀的反对者一边，这令他的朋友们非常吃惊。一年以后，他支持李立三上台。又过了一年，也就是1930年，他又支持诗人瞿秋白上台，但他拒绝和别人一起谴责李立三。接下来是王明的崛起。1931年，共产国际代表支持王上台，周则在幕后对党的事务进行事实上的领导。实际上，正如他在20世纪30年代拒绝抑制李立三的过激行动而使他的部下失望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同样的事又再次发生，只不过是李立三换成了毛泽东。在后一件事上，他可以用缺乏足够的力量为理由来解释，但前一件事只能解释为他这样对待他的前上级会使他在心理上受不了。

周恩来认定自己只适合当一个行政领导，而不是象征着全民的最高代表。他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后者的地位都是短命的（在1927～1931年期间，这样的人在中共党内有4个）。此外，他还是一个辛勤耕耘的人物，他宁愿把时间花费在建设性的劳动上，并从中得到满足，而不愿搞作为最高领导人所必须用全部身心投入的政治斗争。

1935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而这一关系的线索可以追溯到遵义会议以前。周恩来在1930年年底处理富田事件时采取的方式及他在1932年宁都会议上扮演的角色，都表明他对毛泽东的批评总是温和的。而且，他还从毛泽东身上找出某些优点来加以赞扬。他从不像毛泽东的一些激烈的批评者那样对毛泽东怀有恶意。因此，毛泽东很有理由感谢周恩来的公正和灵活性，他在很久以后自己也这么说过。

遵义会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军事上的战术问题。很显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后来证明比周恩来的常规战术更为实用。但是，一旦周恩来自己掌握了游击战术，或是形势发生了变化，共产党面临的局势变得乐观、正常起来时，他完全可以再次抛开毛泽东，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在四川曾有过这样一次机会。当时，长征已到了最后的阶段，张国焘的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张阴谋夺权，但最后周恩来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另一次机会出现在1943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当时，王明再次出来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周恩来没有站在他的一边。鉴于张国焘和王明都曾是周恩来的早期合作者，而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圈子里总是表现出一副粗鲁不雅的样子，这样的人本来只会引起周恩来那样有教养的人的反感，甚至会令他那样的人感到可笑，但周恩来却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张国焘和王明，这只能解释为周恩来在长征途中培养起对毛泽东的一种忠诚。在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伙伴关系之后，周恩来可能就为毛泽东所固有的权威感及他那真正的超凡魅力所征服。

共产党第一次在上海和南昌举行的试验性城市起义后的10年时间里，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中国农民革命所提出来的挑战是巨大的，也认识到它之所以优先于城市革命的原因。在这场农民革命中，找不出比毛泽东更好的领袖。周恩来可能还发现，在政策的制定和党务工作的许多方面，毛泽东比其他人更高明一些。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补充的，正如别的同志在遵义所看到的，周恩来曾主动放弃最高领导权，在后来的长征中安于毛泽东军事上的副手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不得不对付来自诸如林彪等方面对毛泽东最高权威的挑战。一开始，周恩来就被证明是毛泽东必不可少的支持者。例如，1948年的西柏坡会议上在是否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问题上，他站在毛泽东一边。他在1957年的“百花齐放”运动中以及60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都支持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他又支持毛泽东反对林彪。周恩来只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曾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他是那么强烈地感到这场运动的不明智，以至于他不同寻常地默默地组织起各方面的反对力量，并以一种毛泽东不得不接受的方式提出他的反对意见。

但他与毛泽东的伙伴关系仍继续存在。现在人们可以从他们这种关系中发现一些不成文的默契。其中之一似乎是这样的：只要周恩来与毛泽东保持一种良好的个人工作关系，他就可以自行处理他与毛泽东的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在周恩来告诫党内年青一代的讲话中引人注目地充满了这方面的记录。他要求他们保持自己的批判能力，不要让毛泽东或毛泽东的神化和形象夺去他们的判断力，对事物的判断只应由他们自己独立完成。一旦毛泽东被抬到某种极受尊崇的地位（这种

情况尤以1943～1944年的“整风运动”及后来的“文革”为甚），那么周恩来的这些忠告就容易引起误解，他也容易因此被一些人当做敌人来看待。

另一个基本的默契是周恩来可以与主席进行激烈的争论，甚至可以在委员会里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周恩来绝不会拉帮结派去反对他。周恩来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从没组织过一个正式的属于他自己的小集团，尽管他倒是有一批庞大而松散的追随者。一旦某种特殊的目的需要的话，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他们和谐地结合起来，据说他1958年在武汉就曾这样干过一次。大批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效忠于他。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旧式的哥们儿义气，而仅仅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敬佩和感激之情，因为周恩来在过去曾给他们以教诲、忠告或信任。这种情况的起因可追溯到巴黎，在那里的中国留学生中中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几乎全都受过周恩来的影响，这些人后来都在中国政府和军队里担任要职，他们当中包括邓小平和朱德，而朱德就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

此外，尽管周恩来从未企图控制一支属于自己的部队，但他却在黄埔军校给大部分红军将领上过课。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又继续领导他们并向他们灌输军事理论。因此，他几乎在中国的任何地区都可以找到一个有用的军界朋友。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周恩来的个人安全受到来自林彪方面的威胁时，他的这些同情者便尤其显得重要。但他们也不是那种不管碰到什么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全力支持他的人。除了要求他们凭自己的良心原则办事外，他从不提任何别的要求，而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的党内，这一点对毛泽东来说是很重要的。

周恩来能够表明他对毛泽东的位置没有任何野心。他不拉帮结派，也不出版“选集”之类的东西。他不断地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人格和领导地位的尊重。埃德加·斯诺把他们俩的关系描绘成一种共生的关

系，而阿兰·皮尔费特则把毛泽东看做一个通过“周恩来这个罗马教皇”行事的圣灵。

在那些曾在党内等级制度中居于毛泽东之上的人当中，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能留在毛泽东的班子里继续任职。如果我们说毛泽东信任周恩来，那未免有点言过其实。但在经过多年的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周恩来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活力将不得不由一个农民领袖来提供。这个人知道农民是如何生活的，并清楚他们在想些什么。而另一方面，毛泽东则需要一个能在世界上代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交家。周恩来并不奉承毛泽东，但他熟悉毛泽东的个性。毛泽东一方面不信任溜须拍马之辈，另一方面又对潜在的背叛十分敏感。周恩来能够熟练地平息这些不安全因素，而毛泽东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坚如磐石般的长者形象，周恩来童年的经历或许已使他对这样一个形象十分向往。

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个人或某个圈子的利益，周恩来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做法是那么的坦荡，行事是那么的开诚布公。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们的批评，使得他能够在这场浩劫中生存下来。陈伯达说过：“没有人会相信任何反对周恩来的材料。”他还应当知道，“甚至老头子也不相信”。

因此，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可以做到不拘礼节。一个法国人在回忆他与毛泽东的一次会面时说：周恩来坐在毛泽东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懒懒地翻着一份报纸，他显然对谈话不感兴趣。这个法国人评论说：“想一想什么人敢坐在戴高乐身边读报纸。”

然而，在毛泽东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后面，可能还深深地隐藏着他对周恩来过人的技巧、风度和智慧的妒忌——这可能就是他拒绝参加周恩来葬礼的原因。毛泽东需要周恩来，他利用他并赏识他，甚至

逐渐地不再把周恩来看做是一个威胁，但他大概从未喜欢过他。在自己也行将就木之际，毛泽东可能觉得自己不再有必要做那些他并不真心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做那些不再对他未了的心愿有所帮助的事情。但这只能是个猜测，因为他的妻子完全有可能简简单单地阻止他参加周的葬礼，而她有许多理由这么做。

只要承认“错误”，就能使自己待在原来的位置上，周恩来就决不去错误地把政策上升为原则，或是宣布自己站在反对派的一边，或是做出诸如此类难堪的事情。他可能承受着某种自责的折磨，这个因素使得他献身于改善别人生活的事业中，信奉一种自己不是完人的哲学，并逐步掌握了一种组织、调动别人为自己的理想服务的技巧。正如詹姆斯·麦克唐纳所注意到的：周恩来扮演着两个角色，在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在政策制定之后他又是政策执行人，这两个角色都起着“公仆的作用”。这反过来又可以联系到周恩来身上那部分助人为乐的品质，以及他那偶尔对当时一些中国男人所不关心的妇女工作也给予的关注。

婴儿时的周恩来被父母送人这件事可能也是他产生同情并与社会上的少数派打成一片的能力的源泉之一。令人吃惊的是他经常与少数派的人交朋友，其中有穆斯林马骏、基督徒张伯苓博士。这两人都是南开中学的。还有武汉的传教士洛根·鲁兹主教。周恩来结识来自别的国家和别的文化的人的能力是杰出的，在中国没有哪个共产党领导人像他那样有那么多欧美朋友。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在共产党内解决社会问题时会抛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并变得心慈手软起来。周恩来早在1931年就曾在上海这个黑社会因谋财害命而闻名的城市以实际行动表明，他能够为了严明党的纪律而冷酷地执行必要的处决。达赖喇嘛后来也发现周恩来比起毛泽东来，是个更难对付的谈判对手。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

总是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从不打折扣——除非是政治局同意他这么做，比如在几次统一战线时期就是如此。

周恩来有时候倒是在社会经济改革的时间和优先权问题上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有过不同意见，或者周恩来希望改革得快一些，而毛泽东则希望慢一些，或者是正好相反。但这些不同意见只涉及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大家都同意的目标的手段和速度问题，而不涉及共产主义本身这个心愿。关于这一点，他们两个人心里都同样清楚。如果说毛泽东是个出色的但又有点反复无常的船长，那么周恩来就是个有耐心的大副，由他来保证发动机的正常运转及船员们的辛勤工作并负责补充给养。

关于周恩来不是西方政治术语中的“温和派”的证明，我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他在1964年11月的讲话中引用毛的名言“不破不立”，这可能预示着混乱局面的到来。当他在1965年4月号召在中国“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时，他对“文革”问题是谨慎而又严肃认真的，甚至连毛泽东也不总能做到这一点。他比毛泽东更卖力地使红卫兵不越轨，不偏离目标，希望能保持整个运动的纯洁性。

当周恩来反对毛泽东的时候，例如在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他的反对不是出于不喜欢这个运动去提高生产力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他相信这场运动是拿政治资本当赌注，押在一个没经过充分准备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上。这样的话，这场运动的整个计划就注定不能实现。周恩来头脑里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发生变化，但它们都被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理想主义意味着乐观主义。周恩来也是人，他也会由于过分自信而犯错误，情况危急时更是如此。在黄埔军校时，他就对蒋介石将来对共产党的打算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他在1927年的上海起义中的失误大概也应归根于这同一个缺点，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材料

来证明这一判断。但在后来，又有很多例子说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判断失误，比如说他在1937年的“西安事变”中再次对蒋介石表现了同样的判断失误。

周恩来在1946年失去了去美国拜访罗斯福的时机。20世纪50年代，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低估了尼赫鲁。1957年，又是过分的乐观主义导致他对“百花齐放”运动表示支持。他没有认识到党的领导人决不会容忍党外人士对党组织的攻击。在对外事务上，他过分乐观地相信安东尼·艾登能够在金门危机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上对杜勒斯施加影响。然后，他同时又误认为美国可能会入侵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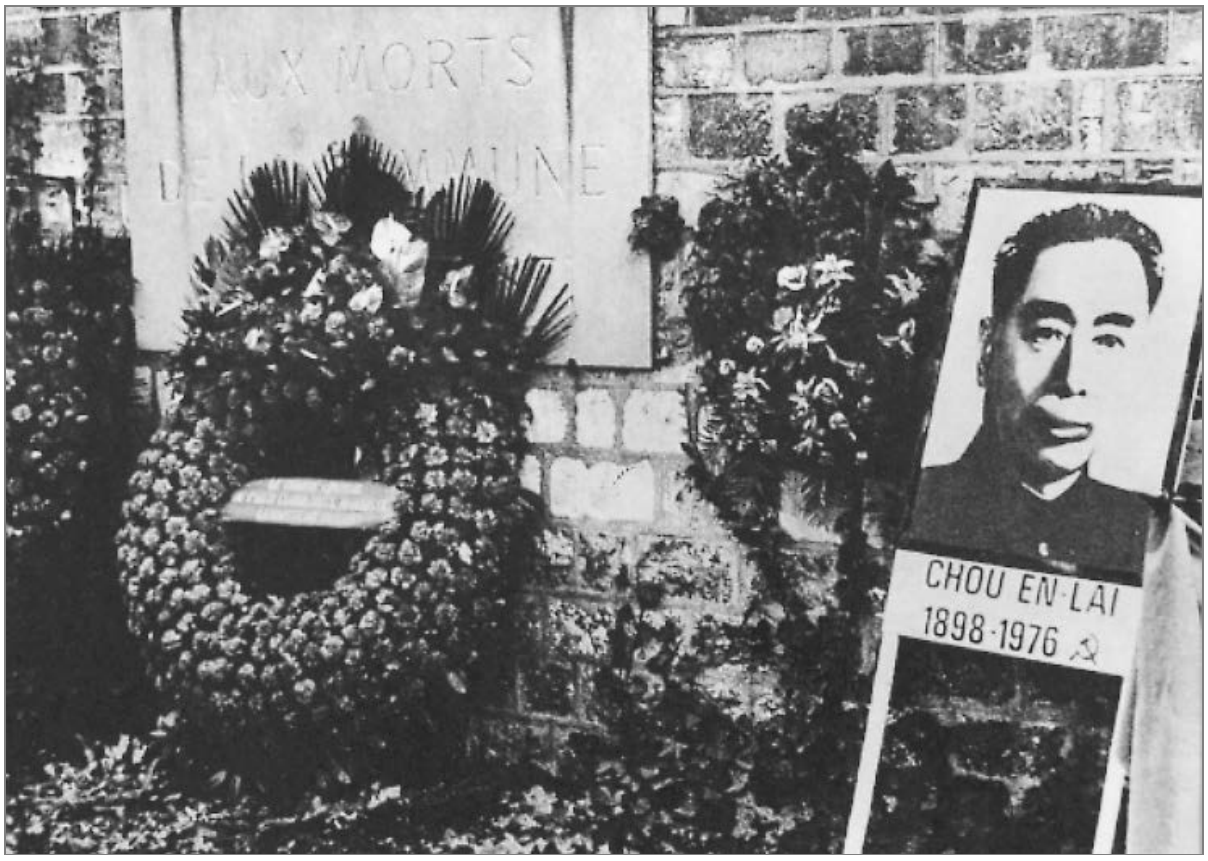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时全体起立为周恩来的逝世默哀

因此，周恩来一生的事业可以用消极的色彩来描绘。他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它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他后来发现，甚至在经济发

展这类问题上，其精选出来的信条加上他自己那第一流的实干技巧也不能带来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也在20世纪40年代就认识到除非千百万人民被成功地教育过来，把他们的思想改造得具有合作与集体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共产主义在中国就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他成为这个巨大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他就被驱使着为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所有目标而全速前进。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周恩来最后没能实现他的诺言，终其一生也没能把中国决定性地带入一个明显有着更高生活水平的更先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的现代社会。严格地说，这不是他的错，而更多的应归因于客观条件的无情。任何想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迅速取得巨大进步的人都难免会遭到巨大挫折。然而，周恩来没有在这不可避免的挫折面前撒手不管或是作出过激的反应。他只是不动声色地坚守他的阵地，为使共产党中国的改革能继续下去提供唯一的一股主要动力。他这么做的时候，不像其他领导人那样以一种执拗的、决不通融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一种永远使人感到振奋的、非常民主的风格来进行，这就使得别人不断地集合在他的周围并帮助他奋力去实现目标。



法国进步组织和友好人士将周恩来遗像安放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 并敬献花圈

当他的接班人邓小平完成其使命而去，而邓小平的接班人也经过几代变换之后，周恩来的工作和人格会比毛泽东的或其他任何人更令人怀念。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既然毛泽东集权于一身的中国的列宁和中国的斯大林的角色现在应当加以怀疑，可能会有人采取行动把无可指摘的“列宁的角色”追封到周恩来的头上——尽管他对党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完全不同的。在周恩来去世的几年之后，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衣服上佩戴的周恩来像章比毛泽东或任何人的像章都要多。周恩来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通人性而耐心思考的靠自己站起来的中国。毛泽东主张大步前进，这经常使得中国人退回到比他们原来开始时更落后的地方去。一连几周通宵达旦地大炼无用的劣质钢铁，或是鼓励青少年闯进市政府办公室去欺侮、羞辱、折磨那些地方官员，这大概很激动人心。但当人们看到这些行动实际上并不会带来任何具体的进

步，更不用说带来太平盛世时，周恩来的不那么激动人心、但更为明智的渐进主义就占了上风。

不是周恩来低估了共产主义，而是毛泽东等走得太快，因为他们在目标与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他们贪心地以违背自然规律的速度去追求效果，准备把人性中最坏的部分引导出来，还着魔似的相信这可以达到好的目的。这不是共产主义，这只是一个壮观的带有孩子气的梦幻。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别的人只不过是在玩弄空头政治，而这是他所不擅长的。他有着经过改头换面的拿破仑式的博学，还带有梅特涅式的政治上的坚韧。

周恩来对他的信仰是真诚的，正如他对中国的感情和他那持久的人性也是发自内心的一样。这使得他在20世纪的所有中国领导人中显得十分突出。不可否认，他没能理解尼赫鲁，正如他没能理解赫鲁晓夫或柯西金一样。但西方也有人犯过同样的错误，人们对此不应苛求。在周恩来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人们偶尔看到他那深埋在心里的沙文主义与他那些中国同僚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而他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与那些人比起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西方人可能会把他看做是我们最热切希望的未来的合作者，尽管他来自一个仍带有民族主义、文化优越感的国家。只要与周恩来会过面，人们就会对在一个单一的世界秩序之下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潜力充满信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留下了与他具有同样想法的人来实现他的两个理想——使中国现代化和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的角色。对他选择的生活道路，我们从内心感到欣慰；对他身后的中国，我们充满了希望。

新版译后记

本书是由英国著名记者迪克·威尔逊先生撰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周恩来的一部传记，其原名为《A Story of Zhou En-lai》（1898～1976），首次翻译出版时定名为《周恩来》。时至今日，该书之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已有20余年了。在这20余年间，共有三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中译版，分别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绿皮简装本和黄皮精装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简装本和蓝皮精装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红皮简装本和此次即将再版的红皮修订本，共计出版总数约达60余万册。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大量发行和长期再版，应该得益于原书作者迪克·威尔逊笔下内容的客观性和可读性，得益于各家出版社及各位责任编辑的重视和敬业，得益于广大读者的厚爱和支持。更重要的是，周恩来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分量很重的领袖人物，他本身的生平和经历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本书从1989年第一次翻译出版之后，译者和很多读者有过广泛的交流，其中既包括周恩来生前的秘书和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包括那些长期在党政军领域工作的老一辈领导，还包括一些专门从事周恩来生平研究的专家学者，更包括那些十分崇敬和爱戴周恩来的普通百姓。在他们看来，周恩来是一位主见独特、处事稳健、有血有肉、温和慈祥的领袖人物，他的存在和他在中央领导层所具有的特殊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政治生活的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幻。他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他的个人风格和个人魅力，深深地感染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作为译者，这种体会或许会更深，感受或许会更真。

值此再版之际，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迪克·威尔逊先生的长期大力支持是我们翻译和出版该书的先决条件。记得翻译之初，我跟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电话和信笺不断，深感他的真诚和热心。1996年11月间，迪克·威尔逊先生曾来华访问，当时他在北京极力寻找译者，希望能和译者见上一面。尽管我们通过多次电话，但毕竟我们未

曾谋面。遗憾的是，译者当时出差不在北京。等我返回北京后，他又离华回国了。迄今为止，虽然我们未曾见上一面，但怀念之心永存。

本书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书中一些不必要的注释进行了适度的删减，并增加了一些有助于读者更好理解该书内容的注释。特此说明。

封长虹2011年5月北京



周恩来总理（杜修贤 摄）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1970年）（杜修贤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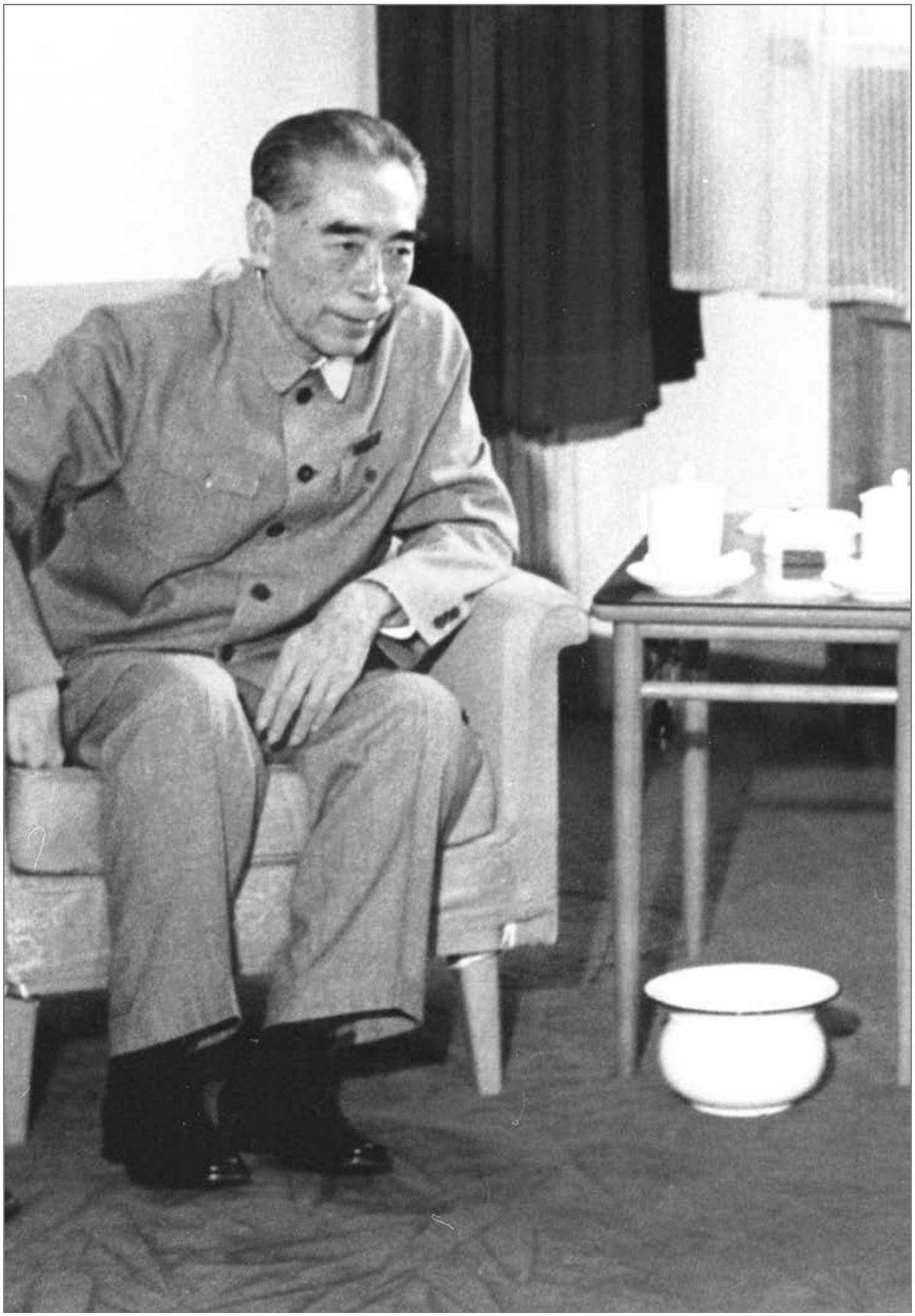
周恩来与亲人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左起：邓颖超、周恩来、王士琴、周同宇（另名周恩寿）；前排：周秉健、周秉和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同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里会见客人（1974年）



周恩来在305医院最后一次会见外宾（1975年9月7日）（杜修贤 摄）

(1)黎塞留，法国著名政治家（1585~1642）。—译者注
(2)原文如此。这里指中国人民志愿军。—译者注
(3)事实是，美国代表团团长杜勒斯向美国代表团宣布，不准与周握手。周遇到的是副团长史密斯，史因有规定，不敢同周握手。——译者注
(4)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注
(5)原文如此。—译者注
(6)这次莫斯科会议，周并没有去参加。
(7)滑铁卢是比利时的一个村镇。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此处被英国将军威灵顿公爵打败。此处以滑铁卢喻重大失败。—译者注
(8)周于1963年12月13日离开昆明，出访14国，至1964年3月1日结束访问，返回昆明。—译者注
(9)此处指的是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时传祥。—译者注
(10)原文如此。—译者注
(11)此处指的是傅崇碧，“文革”中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曾保护了大批老干部。—译者注
(12)原文如此。应为政治局常委。—译者注
(13)应是1970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
(14)旧业，指周恩来20世纪40年代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与美国外交官、记者所打的交道。—译者注
(15)原文如此。—译者注
(16)曹操《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译者注
(17)原文如此，事实是周得知正在插队的侄女参了军，就劝其仍回农村。—译者注
(18)指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古时称太庙，明清两代为皇家祖庙。—译者注